

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
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二

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

主 编 刘凤阁 任愚公

兰 州 大 学 出 版 社

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

(上)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甘)新登字 08 号

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

主编 刘凤阁 任愚公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216 号)

甘肃省庆阳地区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 X 1168 毫米 1/32

印张：33.75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847 千字

印数：1 - 1000

ISBN7-311-01020-9/K·118 定价(上下册)：19.80 元

(内部发行)



刘志丹烈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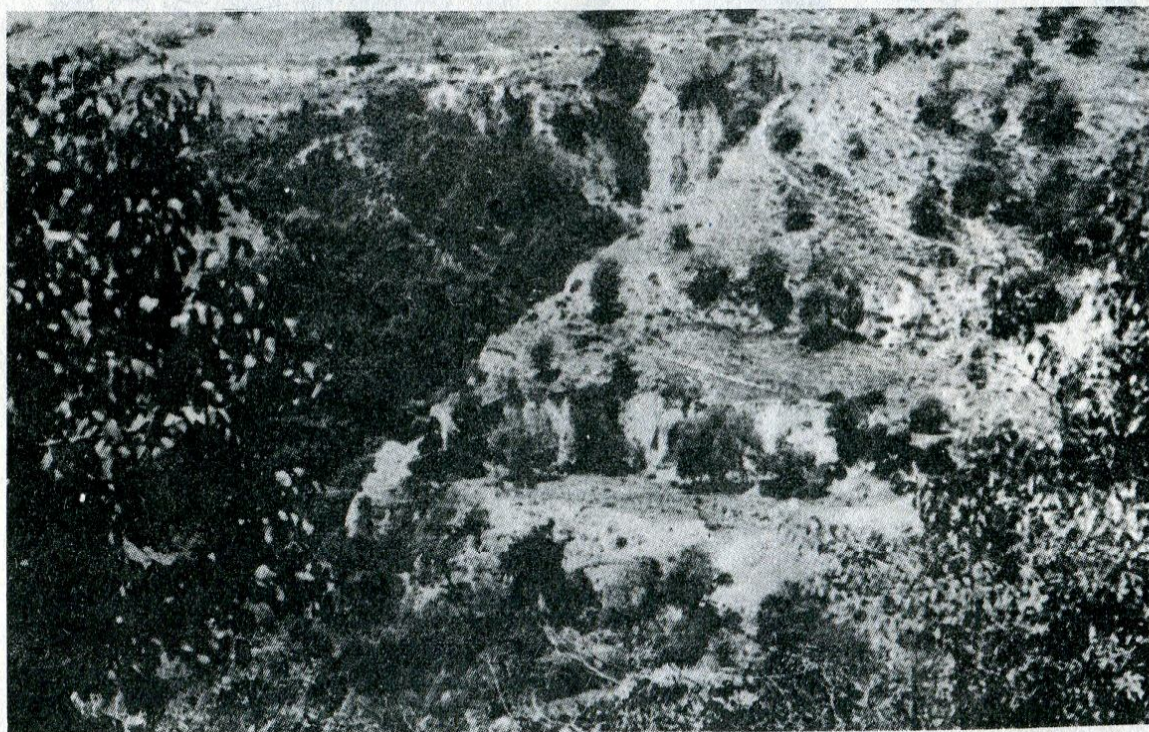
谢子长烈士



陕甘边苏区部分干部合影(王军供稿)



南梁革命纪念馆全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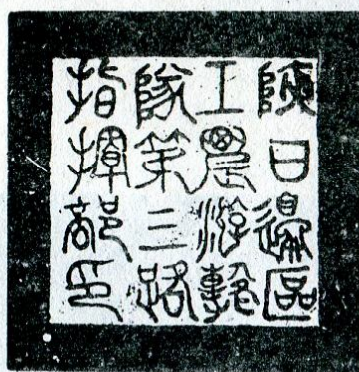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南梁寨子湾旧址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印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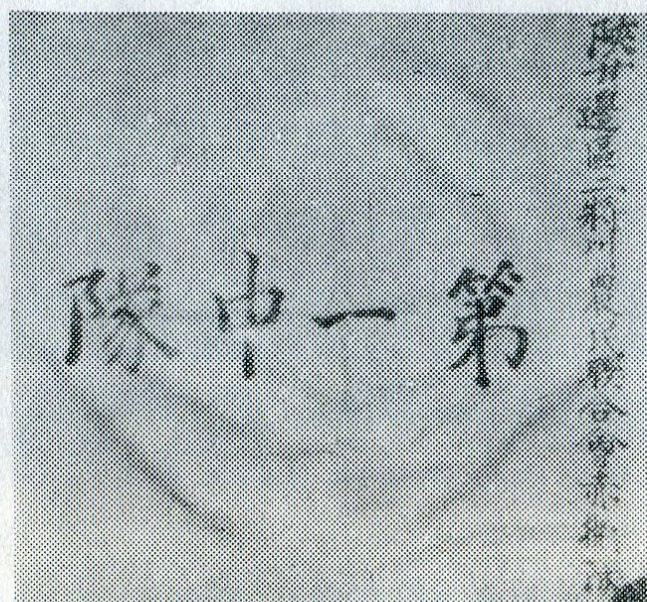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印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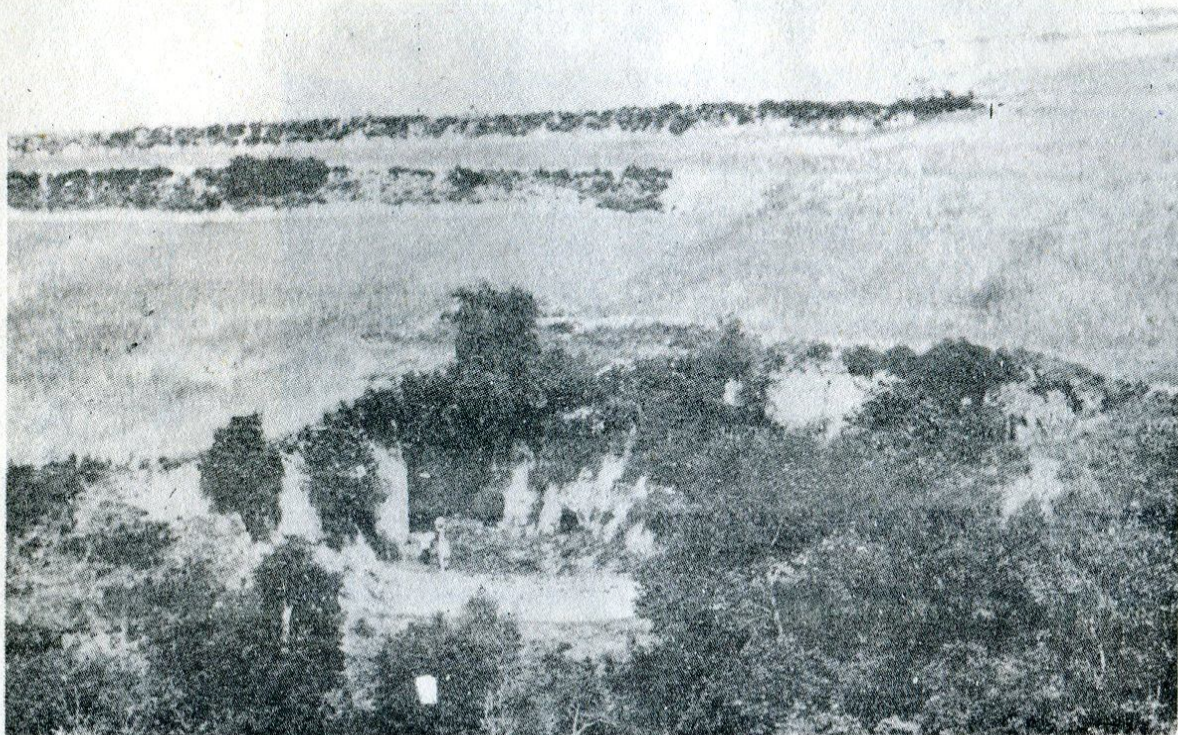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
第三路指挥部印模



陕甘边区工农游击队
第二支队印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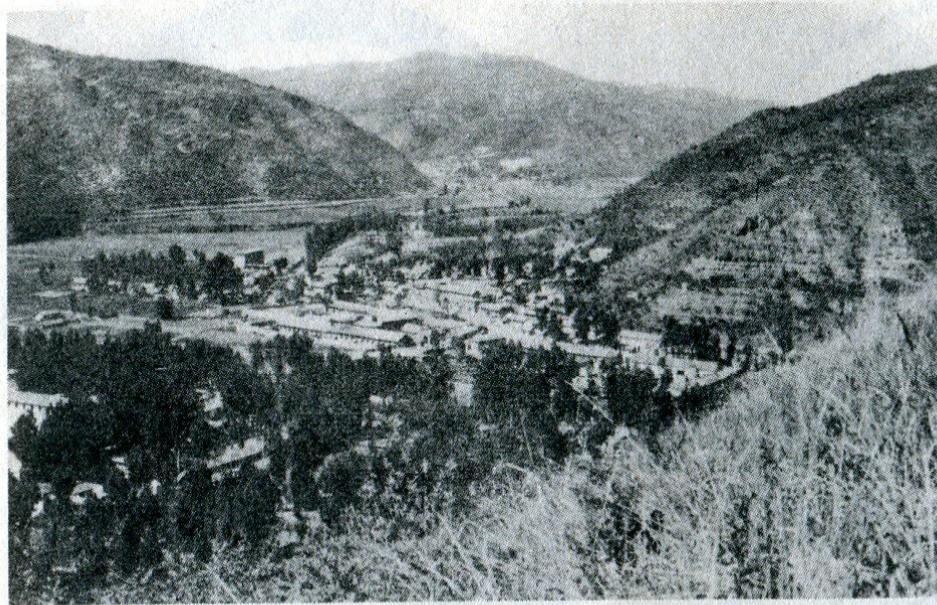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二将川赤卫队
第一中队队旗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南梁堡子岷岷旧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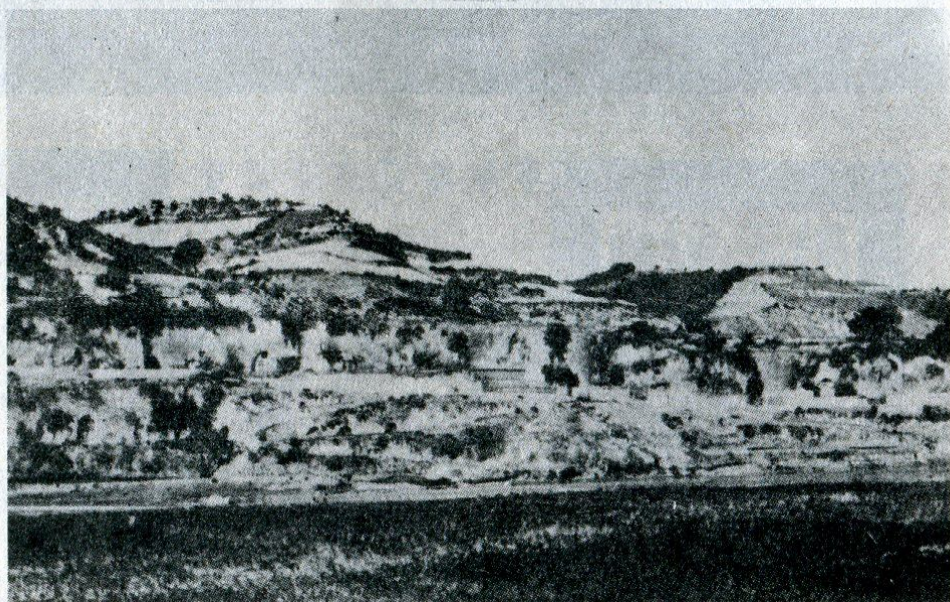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寺村原新庄子西洼旧址



红二十六军成立

旧址——转角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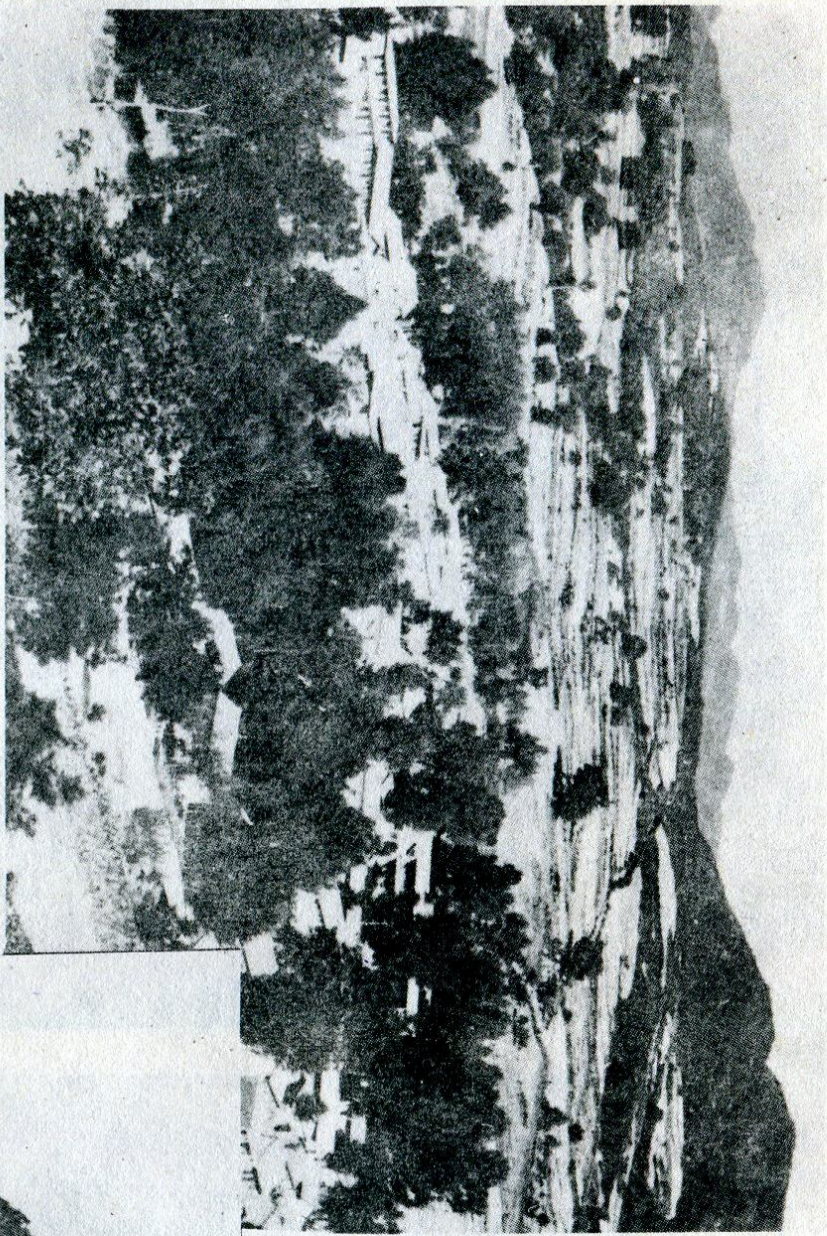


红四十二师成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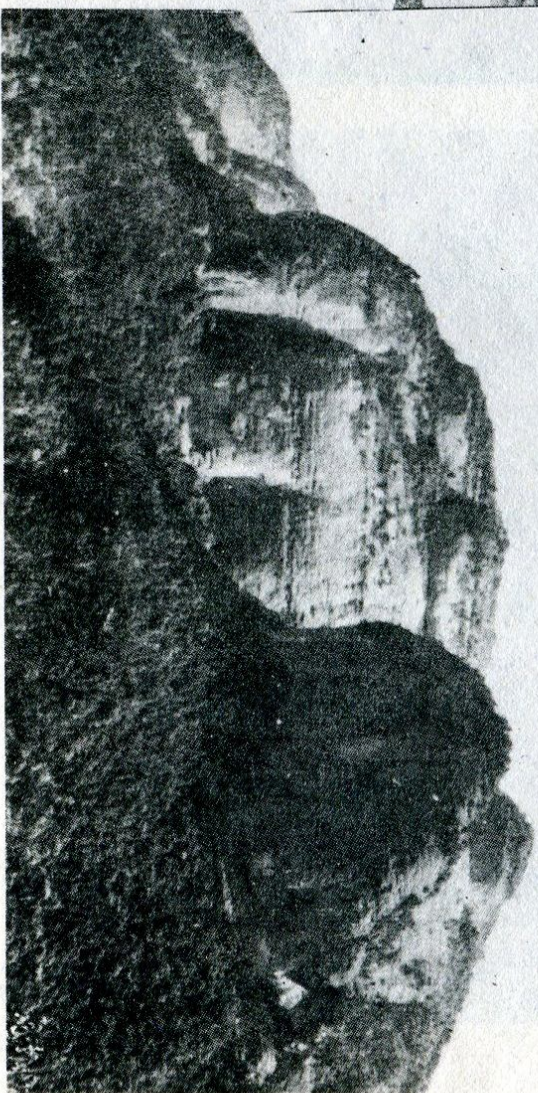
旧址——莲花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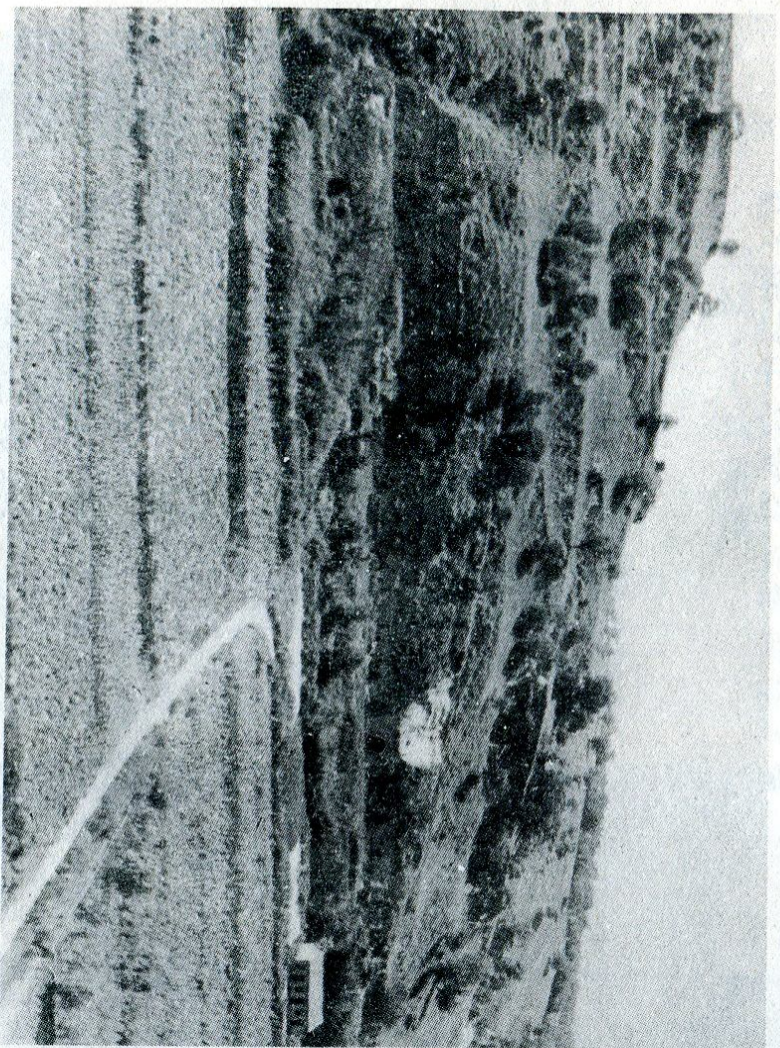
包家寨会议旧址



左：照金苏区中心照金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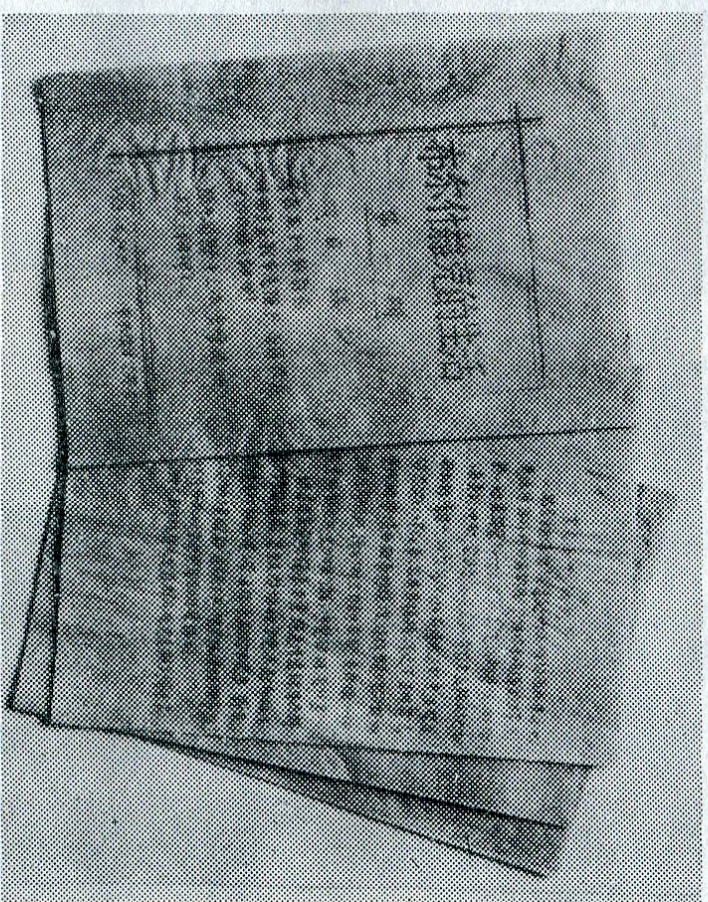


右：红二十六军后方基地薛家寨



红军干部学校

——豹子川张岔旧址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机关刊物

——《布尔什维克的生活》(王军供稿)



陝甘游擊隊成立旧址——三嘉原錦章村

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佈告 第 號

為佈告事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成立後經過數月與國民黨軍周旋戰事十次無不勝攻無不克所到之地白軍聞風披靡助正等山水溝北農民建立革命委員會組織赤衛隊等三層防禦以收其宜君中部等數十縣工農分區救濟地主之食糧財產救百萬窮苦農工和紅軍游擊隊團結一致根本動搖西北國民黨軍圍剿游擊隊北軍命途迫迫向前發展使廣大勞苦工農及白軍士兵同志起而為打倒國民黨軍圍剿游擊隊而開爭為解放自己而開爭參加紅軍游擊隊。以上各軍游擊隊起見將宣佈本軍根本宗旨於左：

一、本軍是為農民自己利益而戰。農民是革命之基礎。農民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農民。農民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農民。

二、本軍是為工人自己利益而戰。工人是革命之基礎。工人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工人。工人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工人。

三、本軍是為貧苦農民自己利益而戰。貧苦農民是革命之基礎。貧苦農民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貧苦農民。貧苦農民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貧苦農民。

四、本軍是為被壓迫民族自己利益而戰。被壓迫民族是革命之基礎。被壓迫民族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民族。被壓迫民族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民族。

五、本軍是為被壓迫宗教自己利益而戰。被壓迫宗教是革命之基礎。被壓迫宗教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宗教。被壓迫宗教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宗教。

六、本軍是為被壓迫婦女自己利益而戰。被壓迫婦女是革命之基礎。被壓迫婦女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婦女。被壓迫婦女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婦女。

七、本軍是為被壓迫兒童自己利益而戰。被壓迫兒童是革命之基礎。被壓迫兒童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兒童。被壓迫兒童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兒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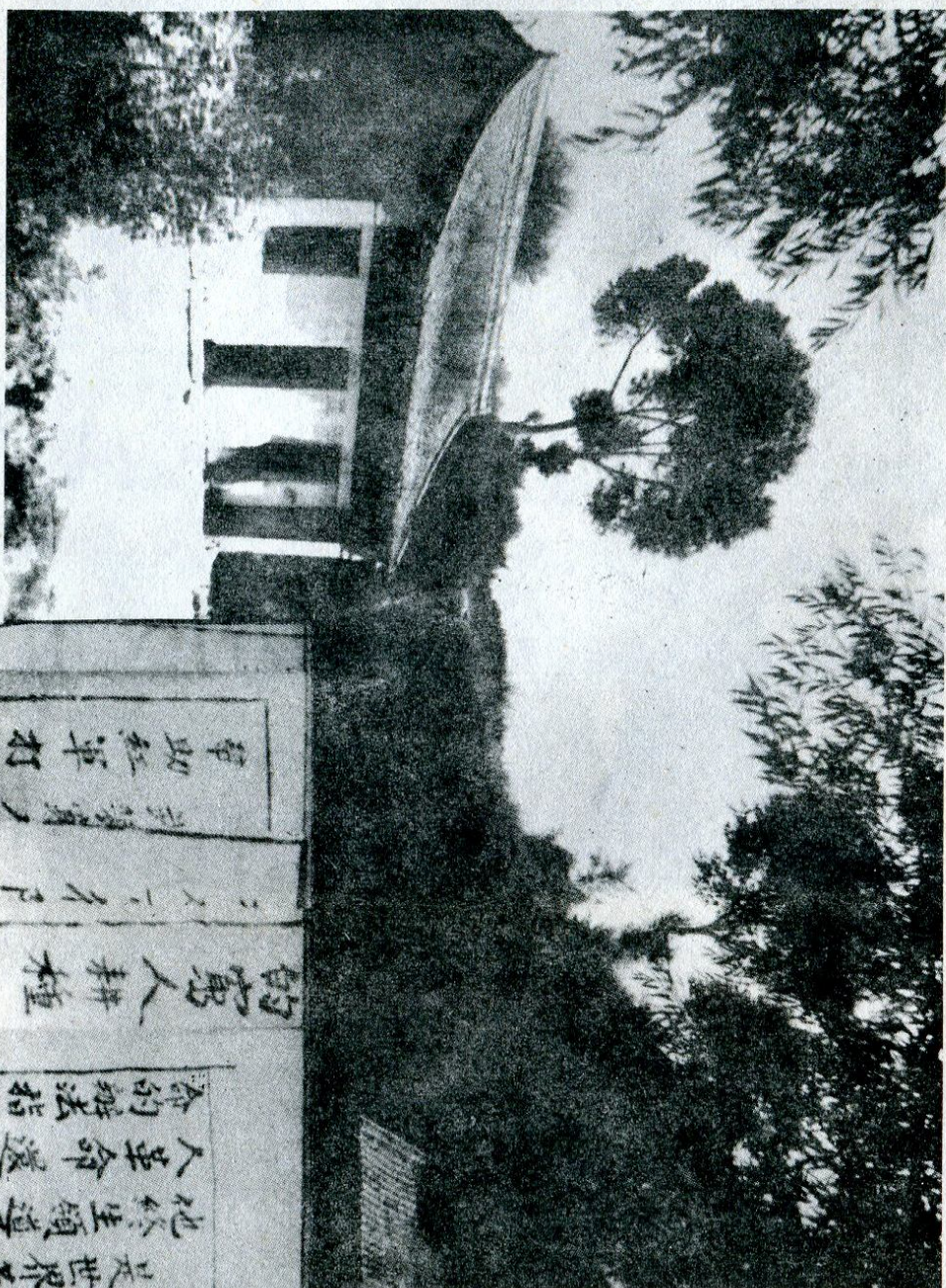
八、本軍是為被壓迫青年自己利益而戰。被壓迫青年是革命之基礎。被壓迫青年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青年。被壓迫青年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青年。

九、本軍是為被壓迫婦女自己利益而戰。被壓迫婦女是革命之基礎。被壓迫婦女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婦女。被壓迫婦女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婦女。

十、本軍是為被壓迫兒童自己利益而戰。被壓迫兒童是革命之基礎。被壓迫兒童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兒童。被壓迫兒童不革命則革命不能成功。本軍之宗旨在於解放被壓迫兒童。

總指揮 劉子丹
政治主任 范子文
丁華蘇維埃長江圖三下 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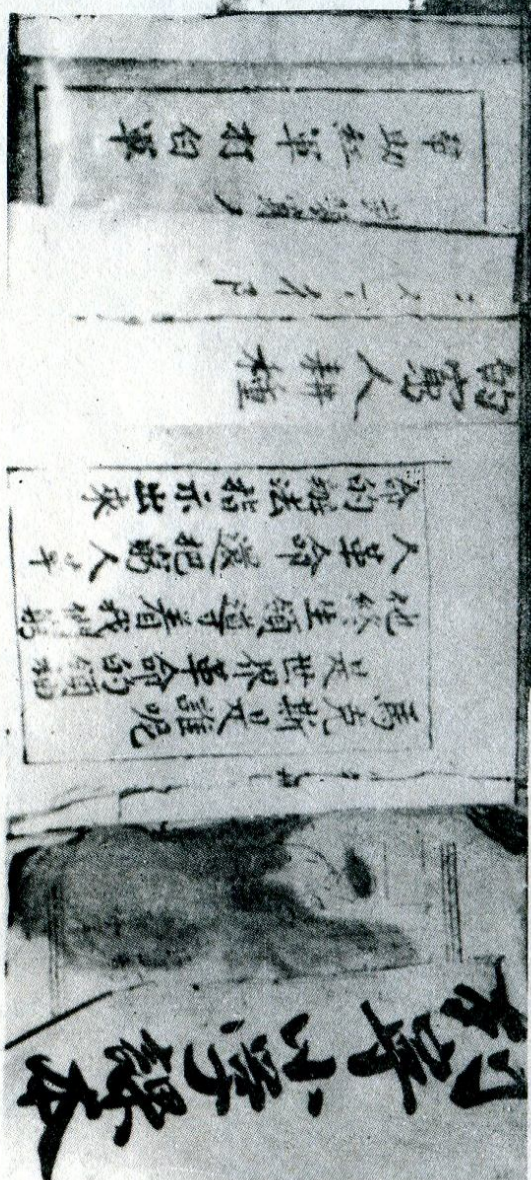
陝甘游擊隊佈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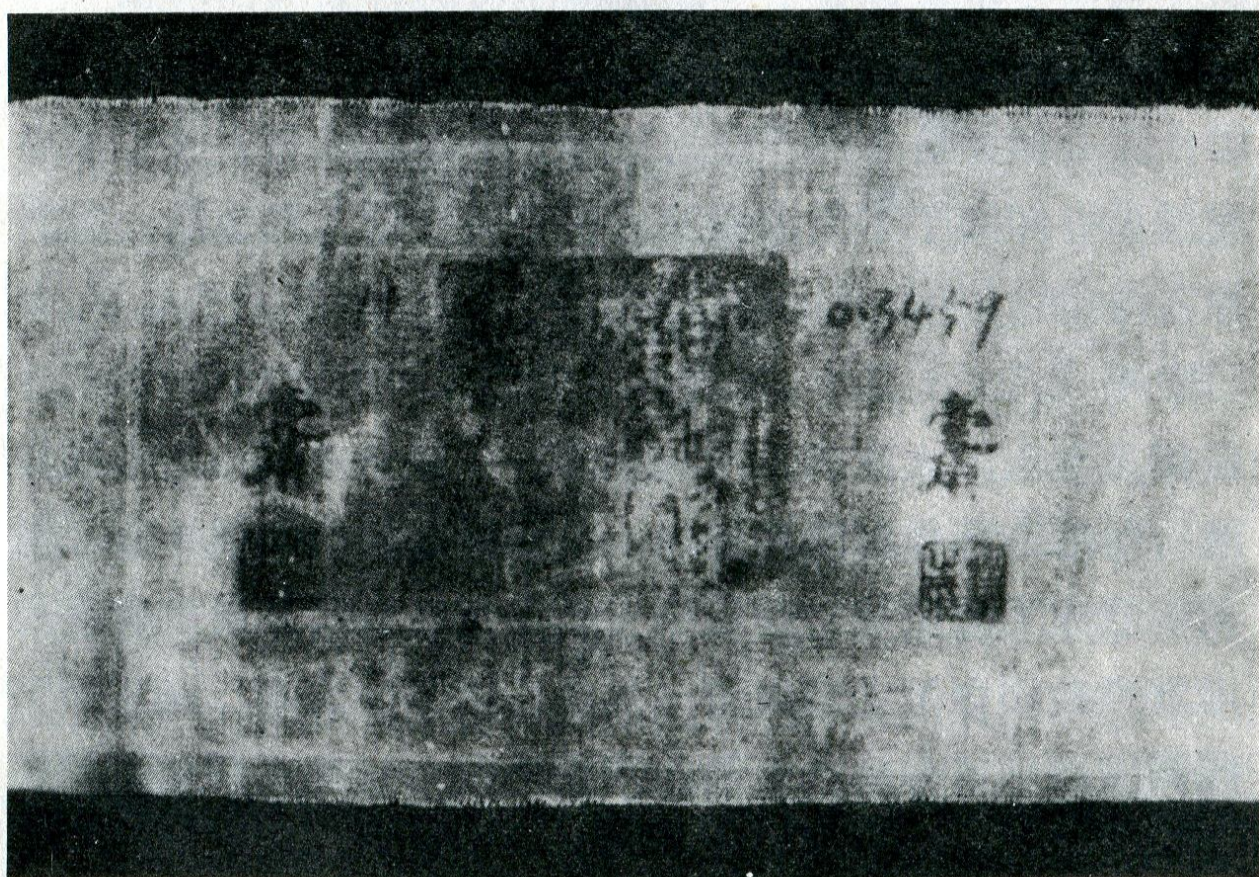


左：列宁小学

荔园堡转嘴子旧址

下：列宁小学课本





边区革命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发行的布制货币（王军供稿）

序

中共庆阳地委党史办及各县委党史办的同志，用了七年时间，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走访了曾在这里工作、战斗过的众多老同志，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编辑出版了《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十分高兴地祝贺这部资料丛书的出版，并把它推荐给广大读者。庆阳地区亦称陇东老区，是一个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1927年，中国共产党就在这里建立了党的组织——中共宁县支部，开始了“唤起民众”的革命活动。三十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等同志在陇东播下了武装斗争的火种，星星之火迅速点燃了这里的山山川川。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拉开了陇东地区游击战争的帷幕。“九·一八”事变，震撼全国。国土沦丧，民族危亡，陇东人民无不义愤填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兴起抗日救亡运动，西北反帝同盟军就在这里诞生。嗣后成立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标志着在西北地区，正式产生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陇东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新阶段，为建立革命政权提供了可靠保证。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震惊了南京政府，蒋介石调遣陕、甘、宁、晋等数省国民党军队，先后对西北这块红色区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围剿”。一大批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在极端险恶的条件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不少同志面对屠刀宁死不屈，铁骨铮铮，大义凛然，谱写出可歌可泣的革命诗篇，捍卫了这块血染的土地。并同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体，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建的极其重要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进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人民进行抗日解放斗争的总后方。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又在陇东进行了“山城堡战役”，彻底地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围剿”，标志着长达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的结束，“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引自聂荣臻：《山城堡战斗》，载《三军大会师》上册 445 页）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任弼时、彭德怀、刘伯承、贺龙、聂荣臻、杨尚昆、徐海东、程子华、习仲勋、马文瑞、耿飫、王维舟、马锡五、蔡畅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在这块土地上战斗过，对陇东根据地的扩大、巩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八年抗战期间，陇东各级组织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通过整风运动、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使老区的党员、干部在思想上、组织上达到了高度统一，使政府机构更加精干扎实，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战胜了严重的经济困难，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卓有成效地建设和保卫了陕甘宁边区。陇东人民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出发点，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竭尽全力支援抗日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起到了模范根据地的作用。就是在三年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时候，陇东人民把革命战争同自己的切身利益密切联系起来，以坚强不屈、前仆后继的革命精神，经受了严酷的考验，战胜了一切困难，终于夺取了庆阳地区的全境解放，迎来了全国的解放！庆阳地区这一光荣的历史，是我们党的伟大斗争历史的组成部分，是应该认真总结，发扬光大的。

毛泽东同志早在 1942 年延安整风时就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走过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这部丛书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以其准确的历史资料，从不同方面反映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武装，在陇东活动的主要内容、历史轮廓和革命先烈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阐明了“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这一关系中国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总结了陇东老区在新民主主义时期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成功的经验和遭受挫折的教训。这部丛书的出版，为人们了解、研究、学习陇东老区的革命历史，提供了一部真实、丰富、生动的革命历史读物和优良传统教材，为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提供了借鉴。它必然在弘扬先烈业绩，继承前辈遗志，从过去革命斗争的历史中吸取经验和教训，资政育人，发扬传统，惠及后代，启迪未来，发挥十分重要的作用。相信这部丛书会受到广大读者特别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研究者、爱好者的欢

迎。

我愿借此机会，向庆阳地委党史办的同志表示感谢！希望他们为广大青少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史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继续做出更富有成效的努力！

王秉祥

1990年5月5日

前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从中央到全国各地、各系统，都兴起了中共党史资料的征集、研究工作。党中央一贯重视这项工作，但象现在这样有组织、有领导、普遍的、系统的、全面的开展党史征研活动，还是前所未有的。它打破了过去党史研究中的某些“禁区”，使很多历史档案得以开放，一批批革命文物被发掘出来，从而使大量党史资料专辑、革命回忆录、人物传记以及用革命历史题材写成的各类文艺作品纷纷问世，这不能不说是新时期在党的建设方面开创的新局面。《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就是在这种形势推动下编纂的。

甘肃庆阳地区的大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陕甘(后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位居陇东的最东部，所以向以“陇东老区”见称。

陕甘根据地始创于土地革命中期。1929年夏，中共陕北特委开展了“兵运”活动，接着在陕甘边界首先拉起革命武装，逐渐形成陕甘边、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之后，又在反“围剿”斗争的基础上开

始联合，到 1935 年夏达到了完全的统一。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这块根据地成为当时全国众多革命根据地中唯一保留下来的一个，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与革命的大本营；此后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很快发展为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八年抗战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立足延安，成功地推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方针，巧妙地处理了国共两党错综复杂的关系，团结了国内各抗日党派乃至海外友好力量，陕甘宁边区成为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和总后方；同时，中共中央还立足于陕甘宁边区，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全面开展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以及党的自身建设，所以陕甘宁边区又是新民主主义的实验区，是当时全中国民主政治的中心和模范，是中国光明与希望的所在。陕甘宁边区的这种地位和作用，一直延续到 1948 年 3 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离开陕北。此后，陕甘宁边区作为人民解放战争西北战场的大后方，西北野战军从这里出发，开始大反攻，最后赢得了西北的彻底解放。

在整个陕甘宁根据地范围内，庆阳老解放区所占面积并不大，但它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可忽视。

还在陕甘边根据地创建时期，许多重要的革命活动和事件，如刘志丹发动“太白起义”，首创革命武装，晋西游击队与南梁游击队会合；改编反帝同盟军，成立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领导并首创寺村原游击根据地等，都发生在庆阳地区境内。特别在 1933 年后季照金根据地失守以后，南梁(原属庆阳县，今属华池县)一带便发展成为陕甘边区革命的中心，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和军事委员会都设立在这里。这期间，陇东已建立起华池、庆北、新正、新宁四个县级苏区政权。以上可以看做陇东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第一个时期。

从 1935 年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可作为陇东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陇东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首先是红二十五军、中央红军长征相继过境，横穿东西；然后是 1936 年红军西征解放曲子、环县等广大地区，接着是红军三

大主力会师后进行的山城堡战役，以及稍后纵贯陇东的南下与回师后在陇东各地的驻防。这些重大事件和活动，对庆阳地区发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曲子、环县及其周围广大地区获得解放并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使陇东的革命根据地成倍扩大，而且这些苏区既成为陕甘宁根据地的西南大门，又是进一步扩大陇东革命势力范围的后方和出发点。另一方面，由于红军在战斗、行军和驻扎休整过程中，所到之处广泛宣传了党的抗日主张，发展了统战关系，建立了不少党的基层组织和抗日群众团体，这就为党在陇东广大腹地发展组织，建立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到 1937 年 8 月，党已经在庆阳、合水、驿马关、西峰、镇原、三岔、宁县建立起了县委或工委，革命力量已基本与庆阳地区的南大门一新正、新宁(属关中特区)连成了一片。这种形势，在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国民党南京政府也只得将陇东 6 县(宁县、正宁、镇原、庆阳、合水、环县)划归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随着形势发展和革命需要，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党委又对庆阳地区的党、政建置也作了相应调整：撤销陕甘宁省（1936.5—1937.9），建立庆环分区和三边分区，庆环分区即专管陇东的华池、曲子、环县；另成立党的陇东特委(1937.7—1938.5)，领导上述新成立的几个县委、工委及整个统战区的工作。从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到抗日战争爆发，这段历史虽然只有两年多时间，却是个关键，陇东的革命形势得到迅速发展，奠定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陇东的大局。

抗日战争时期，陇东解放区可以说是陕甘宁边区的缩影，也可作为陇东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第三个时期。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陇东人民创建的业绩是多方面的，总的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立足大后方，艰苦卓绝，不怕牺牲，以极大的爱国热情从人力、物力、财力诸方面竭尽全力支援抗日前线，维护了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第二，有力地制止或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在陇东制造的一系列分裂阴谋(特别是粉碎 1939 年 4 月、11 月挑起的两次陇东摩擦事件)，保卫了陕甘宁边区的西南大门，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局；第三，利用抗战后方相对和平的环境，认真贯彻中共中央提出的各项方针、政令和决策，开展了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教育的全面建设，实践了

新民主主义总路线，使陇东毫无愧色地成为模范根据地的一部分。

三年解放战争是陇东解放区最困难、人民经受最严峻考验的阶段，这一阶段可作为研究陇东党史的第四个时期。1947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大举进攻，关中分区全部失陷，陇东分区大部失陷；6月，西北野战军出击陇东，失地虽曾一度收复，但野战军转移后，胡宗南与青、宁二马随即卷土重来。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处，无不采用烧、杀、抢、奸等最野蛮的手段，对解放区人民施行报复。在大敌压境、解放区大大缩小，物力、财力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陇东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领导地方部队和全体人民实行总动员，开展了全民游击战争。在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着前线的口号下，一方面组织灵活机动的游击队、武工队，以地方独立部队为骨干，互相配合，就地打击敌人，保卫和收复解放区，一直斗争到庆阳全境解放；一方面又竭尽全力支援前线，直到全西北大地的解放。这一时期，陇东人民既忍受了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也充分发扬了坚强不屈、团结一致的革命斗争传统。

综上所述，从1929年党在陕甘边区开始革命活动算起，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陇东老区已有整整20年历史；就是从1934年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南梁成立算起，到新中国成立也有15年历史。这段历史既是庆阳人民无上光荣的斗争历史，又包含着极其丰富的经验教训，值得认真总结，以使用庆阳人民的革命传统教育广大人民群众，而某些历史经验对今天的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也可起到一定借鉴作用。总结历史需要从整理研究资料入手。我们这部资料丛书，就是想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庆阳地区的历史提供一些方便。参与编纂这套资料的，是一些并无多少历史专业知识、原来也不熟悉陇东地方党史，只是为着工作需要而走到一起来的地、县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我们自知做不出象样的“研究”，更无著书立说的水平，只是出于对党的历史的责任感和对革命前辈的敬仰，便共同做了这点资料性的工作。

我们从1983年开始调查征集资料，到1987年底资料基本收集齐

全。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理、筛选，从实际出发，或以特定历史时期断限，或按历史事件归类，不拘一格地酌情汇编成册。基本原则是，力求每一集都能集中汇总陇东党史的某一时期或某一方面的资料；综合全套则可囊括陇东党史各方面的资料，为广大读者或党史工作者了解陇东党史、研究陇东党史提供方便。经归类，计划共编 13 本，即：

《庆阳地区中共党史大事记》(1925—1949)；

《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

《陇东革命根据地的形成》(1935.11——1937.8)；

《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军事斗争》；

《陕甘宁边区陇东党的统战工作》；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群众运动》；

《陇东的土地革命运动》；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经济建设》；

《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

《庆阳人民与解放战争》；

《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

在编辑这些书稿过程中，我们十分注意发挥集体力量。从开始的资料征集，到资料的整理归纳，我们始终坚持了分工负责、互相协作、群策群力的原则；进入编纂阶段，我们又采取了责任承包、集体审定的办法。为此成立了由刘凤阁、任愚公、李占年、李怀珍、贺长庆、王双位、陶兴范、祁学民、杨有升、苏惠民、曹清珂 11 人参加的编审组，由刘凤阁担任主编，集体负责审定把关。尽管如此，这套资料汇编，可能仍存在着体例不统一，各册之间的断限、归类不一定恰当，

可读性不强等问题。好在我们奉献给读者的毕竟是“资料”，资料的价值在于真实，如果您能从其中得到您所需要的真实资料，这套丛书便有其自身存在的价值了，我们也就比较满意了！

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编审组

1992. 6 修订

说 明

一、本书为《庆阳地区民主革命时期中共党史资料丛书》之二，主要收录 1930 年至 1935 年党领导陕甘边区人民创建红军、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资料。反映 20 年代后期党在陇东活动情况的专题报告《王孝锡与中共太昌区委》作为附录，也辑入本书，以保存资料。

二、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是互为条件、共同发展的，但又有各自不同的规律。为使叙述脉络清楚起见，概述分为《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的创立》两部分。作为地方党史资料丛书，涉及本区部分，叙述较详细，资料收录也较充实，涉及外省外区的只作简略介绍，资料收录相对较少。

三、资料分为历史文献、回忆录、调查材料、其它资料 4 大类。历史文献按成文时间顺序编排，其余资料均按涉及事件归类编排，地图、照片在卷首集中排列。

四、需注释的地方多采用脚注，资料来源多注于文后。资料标题

有改动的，原标题在文后注明。历史文献中，文内明显错讹不当之处，作了一些技术处理。错别字在〈〉内校正，缺漏字在〈〉中补出，多余字加〈〉保留，不宜出现的姓名以×××隐去，模糊不清的字用口代替。对革命回忆录、调查材料中不当的词句，在保持原意的前提下作了一些修改；史实有明显出入或几说并存的，在脚注中或予辨证，或说明待考。

五、本书资料是由地委党史办和华池县、正宁县、合水县、宁县党史办共同征集的。陕西省委、延安地委、甘泉县委、富县县委党史研究室也提供了部分资料。本书由任愚公负责资料的收集整理、补充修订、订正核实和概述编写，刘凤阁审查定稿。

六、由于占有资料不足，加之编者水平有限，错漏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值此《红二十六军与陕甘边苏区》出版之际，谨向为本书提供资料的单位和个人，向为本书编辑提出宝贵意见的党史界同仁表示致谢！

编 者

1992 年 12 月

目 录

序

前言

说明

概述部分

红二十六军的创建与发展——任愚公

陕甘边苏区的创立——任愚公

资料部分

历史文献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1 月 20 日给陕甘边境
游击队的指示信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2 月 15 日关于筹备成立
陕甘游击队给中央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3 月 6 日关于红军陕甘
游击队的决议(节录)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3 月 7 日关于红军游击队
新胜利与冲破敌人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节录)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3
月 8 日颁发的游击战争
行动纲领(节录)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委 1932 年 3 月 20 日
关于游击活动情况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3 月 21 日关于陕甘游击队
的情况给中央的信(节录)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警卫大队 1932 年 3 月

22 日工作报告

中共中央 1932 年 4 月 20 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6 月 1 日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节录)

杜衡 1932 年 6 月 2 日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向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节录)

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 1932 年 6 月 26 日关于开展游击运动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节录)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布告

中共中央 1932 年 8 月 1 日关于创造陕甘边区根据地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节录)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8 月 25 日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节录)

李艮 1932 年 9 月 14 日关于五顷园子分配土地中几个问题向陕西省委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8、9 月间关于陕甘游击队工作给中央的信(节录)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9 月 17 日制定的边区军事计划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9 月 28 日关于巡视陕甘游击队工作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10 月 25 日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

高岗 1932 年 11 月 29 日关于陕甘游击队情况给陕西省委的报告

杜衡 1932 年 12 月 22 日关于成立红二十六军筹备

情形向陕西省委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1 月 4 日给杜横的信

黄子文 1933 年 1 月 5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情况给陕西省委的信

杜衡 1933 年 1 月 9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改编经过及改编后工作概况给陕西省委的报告

郑毅 1933 年 1 月 9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军事行政问题给陕西省委的报告(节录)

金天花 1933 年 1 月 25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在庙湾作战经过给陕西省委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1 月 28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庙湾作战情况给中央的信

金理科 1933 年 2 月 2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及陕甘边区

工作概况给三原中心县委及陕西省委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2 月 3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战术问题给杜衡的指示信

杨声 1933 年 2 月 14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庙湾战斗情况给陕西省委的报告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3 月关于游击队指挥问题给红二十六军的信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3 月 15 日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节录)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4 月 15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发展情况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贾拓夫 1933 年 11 月 25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耀县起义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红二十六军 1934 年 6 月 20 日给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1934 年 7 月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

红二十六军 1935 年 1 月 31 日关于陕甘边区目前形势的报告

中共西北工委 1935 年 7 月 21 日关于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节录)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1935 年 8 月 5 日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

陕甘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5 年 8 月 15 日颁布的赤卫军暂行简明军律

中共西北工委 1935 年 9 月执委扩大会议决案(节录)

张闻天 1935 年 9 月 22 日署名文章《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节录)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1935 年 10 月 29 日致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公开信

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

中共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调查材料

马锡五 1959 年 4 月 23 日谈刘志丹的革命活动

刘景范 1983 年 5 月 16 日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

王世泰 1988 年 8 月 18 日谈刘志丹游击队

姜兆莹 1985 年 9 月 9 日谈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

张占荣 1985 年 4 月 11 日谈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

王殿斌 1979 年 6 月 1 日谈陕甘边革命斗争

黄金贵谈太白收枪

李作栋谈麻峪整编

张秀山 1984 年 1 月 10 日谈早胜事件

蒋云台 1983 年 5 月 19 日谈早胜事件

杨培盛 1985 年 8 月谈南梁游击队

雷恩俊 1979 年 7 月 24 日谈西北反帝同盟军

杨培盛 1983 年 8 月 27 日谈西北反帝同盟军

梁怀德 1985 年 9 月谈三嘉原事件

武智学 1983 年 3 月谈三嘉原事件

张积耀谈三嘉原事件

刘约三 1979 年 11 月 6 日谈三嘉原事件

吴岱峰 1984 年 8 月 8 日、1985 年 4 月 22 日谈陕甘游击队

李志合 1984 年 5 月 20 日谈农民自发斗争

赵世堂 1983 年 9 月 25 日谈农民自发斗争

崔平元 1985 年 3 月 21 日谈陕甘游击队

田致启谈两次攻打山河城

张明春 1990 年 8 月 22 日谈第一次攻打山河城

高仰月 1984 年谈第一次攻打山河城

唐中奎 1990 年 8 月 22 日谈第一次攻打山河城

王生荣 1990 年 8 月 21 日谈第一次攻打山河城

雷鸿轩 1985 年 1 月 9 日谈山河城攻守情况

李志合谈第二次攻打山河城

李维钧 1985 年 5 月 29 日谈第二次攻打山河城

李彦清谈第二次攻打山河城、五顷原失败

李志合 1984 年 5 月 22 日、1990 年 8 月 22 日谈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张富春、张福来、张玉杰 1985 年 4 月 10 日谈

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郭德林 1985 年 4 月 6 日谈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代云成 1990 年 8 月 22 日谈寺村原革命委员会

秦善玉 1990 年 8 月 18 日谈陕甘游击队在正宁的活动

吴岱峰 1983 年 5 月 20 日谈吉子峴、英旺战斗

吴岱峰 1985 年 8 月 1 日谈麻子掌、梁掌堡会议

刘景范 1985 年 4 月 13 日谈麻子掌、梁掌堡会议

师建章谈麻子掌会议

苏继儒 1984 年 9 月 20 日谈攻打保安县城

王志善 1984 年 9 月谈陕甘游击队攻打保安县城

宋飞 1986 年 11 月 3 日谈保安、张洪镇、城壕沟口战斗

赵有麟谈陕甘游击队在黑木原集结

高占胜谈合水战斗

陶继尧 1984 年 10 月谈合水战斗

赵有麟 1985 年 2 月谈合水战斗

张策 1984 年 3 月 18 日谈毛家沟门战斗

董兴旺 1979 年 6 月 3 日谈红军的几次战斗

黄罗斌谈莲花寺整编

杨积章 1979 年 6 月 3 日谈红四十二师的几次战斗

邵维汉 1984 年 8 月谈西华池战斗

高占胜谈西华池战斗

郭进德、郭相珍谈高凤坡战斗

吕战魁谈高凤坡战斗

郭廷藩谈高凤坡战斗

朱秉才 1982 年 4 月 21 日谈柳村原战斗

王四海 1986 年 11 月 6 日谈保安游击队、红二团

刘懋功 1986 年 11 月 3 日谈红二团

戴占魁 1986 年 11 月 4 日谈红二团的组建

黄罗斌 1985 年 5 月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马佩勋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张德明 1981 年 10 月 23 日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刘景范 1985 年 4 月 28 日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杨伯伦 1982 年 11 月来信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陈国栋 1985 年 5 月 2 日谈红一团

李德录、罗金财、刘永培 1981 年 3 月谈红一团

高维平 1990 年 8 月 18 日谈红一团

邢富明 1985 年 9 月谈红一团

刘富禄 1983 年 4 月 4 日谈瓦扇子战斗

杨伯伦 1986 年 9 月 26 日来信谈瓦扇子战斗

郭德林 1983 年 5 月谈王郎坡战斗

赵世堂 1983 年 9 月 25 日谈王郎坡战斗

李佐林谈曲子战斗

武占勋谈曲子战斗

戴占魁 1985 年 7 月 7 日来信谈庆阳游击队

李占义 1979 年 10 月 26 日谈庆阳游击队

李树林 1979 年 10 月 28 日谈庆阳游击队

张德才 1979 年 8 月 7 日谈庆阳游击队、庆北办事处

黄德胜 1979 年 8 月 6 日谈庆阳游击队

高世清 1979 年 8 月 7 日谈攻打悦乐堡

高有才 1979 年 6 月 4 日谈华池老游击队

王宗万 1979 年 8 月 3 日谈庆北游击队

蒋成英 1979 年 6 月 2 日谈华池游击二支队

张邦英 1985 年 5 月 6 日谈平子游击队

陈国栋 1985 年 12 月 19 日谈平子游击队

何长珍 1986 年 3 月 8 日谈平子游击队

李得禄、罗金财、刘永康 1981 年 3 月谈平子游击队

刘永珍 1986 年 3 月 9 日谈平子起义时间

刘永禄 1986 年 3 月 9 日谈平子起义时间

李含章 1985 年 3 月 28 日谈宁县一支队

梁天和、赵新勤 1986 年 3 月 8 日谈半坡暴动时间

刘绒草 1986 年 4 月 20 日谈半坡暴动时间

唐致祥谈新正特务队

袁长太谈新正三支队

郭成才谈正宁五支队

郭廷藩、罗金财、唐致祥、王明智谈正宁五支队

刘彦芳 1984 年谈正宁十七支队

李清海谈正宁十七支队

李普青谈北后游击队

王清殿 1982 年 4 月 21 日谈正宁十八、二十支队

郭廷藩 1983 年谈巧取峴子联保处

杨伯伦 1981 年 5 月 5 日谈南邑坳伏击战

郭廷藩 1981 年谈南邑坳伏击战

吕战魁谈南邑坳伏击战

陈国栋 1985 年 5 月 20 日谈攻打汪家堡子

高维平 1990 年 8 月 18 日谈夜袭湫头

郭廷藩 1983 年 8 月谈夜袭湫头

李明春 1983 年 6 月 11 日谈夜袭湫头

孙长青 1983 年 5 月 15 日谈庙梁截击战

常有福、赵元恒 1983 年 5 月谈宁县三支队月明原为民除害

刘景范 1959 年 4 月 25 日谈陕甘边苏区创建的历史条件

武海潮 1982 年 4 月 20 日谈陕甘边区民团武装

习仲勋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

刘景范 1983 年 5 月 16 日谈苏区的创建

李生华 1983 年 7 月 4 日谈苏区的创建

贾生秀 1959 年 4 月谈苏区政权建设

张志富 1959 年 14 月谈苏区创建

高生荣 1959 年 4 月 22 日、23 日谈苏区创建

王殿斌 1959 年 4 月 23 日谈苏区的创建

张钦贤 1979 年 9 月 17 日谈苏区的创建

武海潮 1979 年 6 月 20 日谈苏区的创建

王生金 1959 年 4 月 21 日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
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

王殿斌 1979 年 6 月谈南梁一带的群众组织、政权建设

刘景范谈金岔沟农民联合会的成立

白万金 1979 年 6 月 20 日谈柔远赤卫军大队

杨子勋、蒋成英、王殿斌 1979 年 6 月 2 日谈陕甘边苏区赤卫军
组织

李子贵 1979 年 6 月 20 日谈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

白天章 1986 年 4 月 8 日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刘景范 1986 年 11 月 7 日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张秀山 1983 年 4 月 20 日、1986 年 4 月 20 日谈南梁会议

张秀山 1985 年 5 月 14 日谈阎洼子会议

张邦英 1984 年 8 月 22 日谈阎洼子会议

刘景范 1984 年 4 月 28 日谈阎洼子会议

习仲勋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郭洪涛 1945 年 7 月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张文华 1979 年 11 月 1 日谈陕甘边苏区党政军建设

张秀山 1986 年 11 月 7 日谈陕甘边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

武海潮 1982 年 4 月 20 日、8 月 14 日谈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反围剿斗争

白天章 1983 年 6 月 6 日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宋飞 1985 年 5 月谈陕甘边区保卫大队

马文瑞 1943 年 1 月谈华池、庆北党史

蒋成英 1985 年 10 月谈南梁中心苏区的创建

王海清 1995 年 1 月 6 日谈赤安县苏维埃政府

高世清 1979 年 8 月 7 日谈庆北苏区

黄镇 1979 年 8 月 8 日谈庆北苏区

马占荣 1942 年 8 月 16 日谈庆北苏区

杨子勋 1942 年 8 月 16 日谈庆北办事处

李占义 1979 年 10 月 26 日谈庆北苏区

马占荣 1979 年 8 月 7 日谈庆北苏区的开辟

杨子勋 1979 年 6 月 7 日谈庆北县土地改革

王占奎 1981 年谈太白的建党建政

张邦英 1985 年 5 月 6 日谈陕甘边南区

张仲良 1982 年 9 月谈陕甘边南区

郭廷藩 1985 年 7 月谈陕甘边南区、新正县

王立成 1981 年 5 月 22 日谈正宁县建党

李进荣 1982 年 10 月 26 日谈正宁县建党

高仰月 1984 年 6 月谈正旬彬革命委员会成立

郭廷藩、唐致祥、周儒谈正宁县土地改革

郭全森谈永红县

刘邦彦 1985 年 2 月 4 日谈永红县

黄伯福谈永红县

赵清保 1985 年 2 月谈永红县

罗金财 1981 年 10 月 20 日谈宁县建党建政

王秉祥 1985 年 3 月 4 日、4 月 27 日谈新宁县

刘永培 1985 年 9 月 8 日谈宁县办事处

陈天财 1985 年 10 月 15 日谈新宁县苏维埃政府

吕兴才 1985 年 8 月 28 日谈荏掌办事处

米世英 1985 年 5 月 8 日谈宁县建党

韩秀升 1983 年 3 月 9 日谈新宁县建党建政

张自发 1983 年 3 月 7 日谈宁县建党建政

宋飞 1985 年 6 月中旬谈赤淳县

任成玉 1982 年 12 月、1983 年 11 月谈赤水、淳耀

贾兴奎谈淳耀县

姚善芳 1985 年 4 月谈赤水、淳耀县

王华等 7 人 1984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

王生玉等 25 人座谈洛河川苏区的创建

刘景范 1984 年 5 月谈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机关移驻洛河川

张文华 1983 年 11 月谈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东迁

韩明奎、薛生荣、任学才谈富西革命委员会

刘生玉 1988 年 6 月 3 日谈富甘革命委员会

刘秉温 1944 年 6 月 18 日自传谈陕甘革命委员会

张志成、刘长旺、常有智 1985 年 8 月 23 日谈肤甘县

吴岱峰 1985 年 5 月 13 日谈苏币发行

蔡子伟 1985 年 5 月 8 日谈苏票发行与集市贸易

张文华 1985 年 4 月 30 日谈列宁小学

王四海 1989 年 11 月 6 日谈列宁小学

宋飞 1982 年 4 月 21 日谈红军干部学校

吴岱峰 1959 年 5 月 21 日谈红军干部学校

杨伯伦 1982 年 11 月来信谈红军干部学校

贾生旺 1959 年 4 月 23 日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白天章 1983 年 6 月 6 日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李生华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刘景儒等 12 人 1959 年 4 月座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李树林 1987 年 4 月 11 日谈华池战区“肃反”

蒋成英 1981 年 3 月 16 日谈华池战区“肃反”

李生华 1983 年 7 月 4 日谈陕甘边“肃反”

郭廷藩 1984 年谈关中“肃反”

宋飞 1982 年 4 月 21 日谈关中“肃反”

唐致祥 1982 年 4 月谈关中“肃反”

• 概述部分 •

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和发展

任愚公

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简称红二十六军),是以刘志丹、谢子长为代表的西北地区共产党人,经过曲折的斗争而组建起来的革命军队。这支军队是创建和保卫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力红军之一,她的功绩已经载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乃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史册。现将其创建和发展的历程及其为创建陕甘边苏区英勇斗争的史实综合整理如下。

一、艰难曲折的建军活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中国共产党在西北地区的组织经过一段时间的恢复和发展,即发动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暴动等斗争,但这些起义和暴动都由于遭受强大的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残酷镇压而失败。1928年7月,中共陕西省委以六大决议为指针,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改变策略,作出了在地方军阀部队中开展“军运”,争取兵权,准备起义的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到兵营中去,到士兵中去,学习军事,争取改造旧军队,积极准备起义。同时决定,派刘志丹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谢子长任军委委员,深入到国民党统治比较薄弱的陕北、陕甘宁边界地区,领导和开展“军运”工作。

秋季,刘志丹、谢子长回到陕北。年底,陕北特委在榆林召开扩大会议,刘志丹传达了陕西省委关于开展“军运”工作的决议。会议经过争论作出决定:利用陕甘宁各地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阀部队,争取士兵群众;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准备起义。陕北特委先后组织动员了大

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陕北高自清、杨庚午，陇东谭世麟，宁夏苏雨生的部队，以及杨琪等人的商贩队中，开展“军运”活动。1929年春，刘志丹与永宁山党支部负责人曹力如、王子宜共同谋划，掌握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以后，又利用社会关系在苏雨生部第八旅十五团成立了以中共党员张东蛟为队长的学兵队，组织30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去学兵队学习，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1930年春，苏雨生失败，刘志丹、谢子长脱离苏部来到庆阳县北部三道川，在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挂名建军。

①三道川建军。三道川位于陕甘边界，是陇东民团军总司令谭世麟的势力范围。1930年春，谭世麟通过贿赂宋哲元取得旅长的头衔，急于招兵买马，扩充队伍。条件是按人数多少封官，拉来1连人给个连长，拉来1团人给个团长，并划防地，拨给养。刘志丹利用其父亲给的两支枪和陈定邦给的13支枪，又从保安县民团抽调了部分人枪，邀集马锡五、卢仲祥、刘兆庆、赵子实、薛应昌等一批党团员和贫苦农民，在金汤镇组建1个营，共百余人。五、六月间。部队开赴三道川，编为谭部骑兵第六营，刘志丹任营长，下辖2个连，分驻三道川张家沟门、白豹镇。与此同时，谢子长派李力果、阎红彦、雷恩钧在宜川后湫天杨庚午部做工作，将杨部周维奇营六七十人拉到三道川，驻齐家阳洼。此时，土匪张廷芝也脱离苏雨生，带领几十个人投靠谭世麟。以上部队共同编为谭部直辖第三团，谢子长被任命为团长，刘志丹、周维奇的部队分编为该团一、二营。随后，刘志丹被谭世麟邀请去庆阳，帮助其整训部队，襄赞军务。

张廷芝土匪成性，投靠谭世麟纯粹是政治投机，目的是为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在三道川，他看中了周维奇的人枪，便用金钱、美女收买了周维奇。周应张的要求，派39名骑兵去宁夏下马关接应张留在那里的部队。返回途中，张带队绕道安边，在井岳秀部骑兵团团长、张廷芝之父张鸿儒设的酒席宴上，张翻脸下了周营骑兵的枪，随后又在三道川缴了周营其余人员的械。张廷芝吞并周营之后，又马上派兵袭击谢子长的团部和刘志丹部队，谢子长脱险，刘志丹部队被打散。

此时，刘志丹带着从庆阳领取的军用物资返回三道川，中途闻变，即改道永宁山，在曹力如、王子宜等人协助下，摆脱了张廷芝部队的围追，去绥(德)米(脂)寻找陕北特委，途遇谢子长，遂结伴同往。

三道川建军失败，使刘志丹、谢子长等共产党人苦心聚集起来的一点革命武装丧失殆尽，然而也使他们从一系列失败的教训中清醒的认识到：要组建一支真正的独立的革命武装，不能只利用现成的军阀部队，更不能同象张廷芝那样的反动分子搞联合，而要准备条件单独干。

②刘志丹游击队的组建。1930年10月上旬，刘志丹在陕北特委第五次扩大会上，主动辞去特委军委书记职务，决心集中精力组织和领导陕甘边界的武装斗争。不久即回到永宁山，与曹力如等商议建军事宜。他们召集三道川失散人员马锡五、刘约三、卢仲祥、王廷玉、马福吉等，并从永宁山民团抽调10多个人枪，组建起一支队伍，群众称之为刘志丹游击队。部队在保安、安塞一带活动。

其时，杨树荣带来谭世麟的口信，仍希望刘志丹担任其骑兵第六营营长，并要驻太白镇的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尽力协助。于是，刘志丹与永宁山党支部遂决定将计就计，借机消灭二十四营这股反动武装，收缴武器，壮大游击队。刘志丹一方面派杨树荣去太白，告诉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骑兵第六营将赴太白镇，请他们筹备粮草，以此稳住敌人；另一方面赶制了民团军的服装和旗帜，在白沙川对游击队进行了必要的训练。

11月18日，化装成民团军的刘志丹游击队骑兵20余人进入太白镇，驻在李续增(绰号蒜客)的烧坊里。当晚，在二十四营任班长的赵连壁(乳名赵二娃)以喝酒为名，来烧坊向刘志丹报告了二十四营的内部情况。随后，游击队即与民团军展开官对官、兵对兵的“交朋友”活动。根据敌情动态，刘志丹等认为，敌众我寡，宜斗智不宜斗力，宜速战不宜持久，并制订了具体行动计划。20日晨，刘志丹、杨树荣来到二十四营营副王凤珠住处，王又请来黄毓麟。谈话中，他们将

黄、王 2 人击毙。卢仲祥等在烧坊听到枪声，也立即行动，在酒场上收缴了敌第一连的枪，并击溃了驻河东的第二连。随后，刘志丹召集群众大会，宣布了黄、王及其二十四营的罪恶，进行了革命宣传。部队向北转移途中，又俘获敌第三连连长马建有，在林锦庙收缴了第三连的枪。这次行动前后共消灭反动民团军两个连，收缴长短枪 50 余支、骡马 10 余匹。这就是陇东历史上的“太白收枪”，也是共产党人在陇东向反动派打响的第一枪。

太白收枪后，刘志丹把人员枪枝分成三部分，让赵连璧、同守孝各领一部分，在太白、南梁地区组织饥民武装，拉队伍。刘志丹自己带领一部分约 40 多人在保安、安塞地区活动，先后消灭了保安、安塞等地一些民团，打了一些土豪，扩大了政治影响，许多青年农民纷纷参军，在短短的 2 个月内，部队发展到 100 余人，编为两个中队，卢仲祥、魏佑民分别担任中队长。这是一支以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为骨干的革命队伍，党团员约 20 多名，建立了党的支部，杨树荣担任支部书记。

随着游击队的发展，政治影响不断扩大，引起反动军阀的注意。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旅长高双城令驻守保安县的高雨亭营“围剿”。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刘志丹率部队向陇东转移，途经瓦子川、平定川、豹子川，到达合水县固城，与赵连璧、同守孝组织起来的 200 多人的队伍会合。此时，贾生财从民团军中拉出 40 多人，瓦岗川民团团总唐青山也率 40 多人来固城会合，部队增加到 400 多人。2 月底，刘志丹在合水县固城的麻峪村对部队进行整编，共编为 4 个连，刘志丹担任总指挥。在全体军人大会上，刘志丹讲话，号召大家团结一心，和衷共济，坚决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地主武装斗争到底；体察老百姓疾苦，决不损害群众利益；拉出山林，打豪绅，解决给养，不断发展壮大。

麻峪整编后，游击队向南开拔。3 月初，在宁县张皮家原与陈珪璋部谢牛的混成旅骑兵遭遇。敌步骑配合猛攻，游击队仓促应战，顽强抵抗，从上午打到下午，双方都有很大伤亡。敌在正面进攻难以得

手的情况下，派骑兵绕道从东面抄了游击队的后路。游击队终因伤亡过大，子弹打光而撤出战斗，突围到麻子掌。这次战斗，游击队受到很大损失，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打散，部队剩下不足 100 人。

为了保存力量，游击队继续东撤到芦宝梁。时值大雪封山，部队驻在深山老林的破窑洞里，冻饿交加，只能拣拾野核桃充饥。面对重重困难，刘志丹等负责人开会分析形势，研究决定，派马锡五、陈鸿宾、贾生财给小石崖民团团总罗连城送去 1 匹骡子、200 两大烟土，作为见面礼，与之建立了统战关系。部队开赴小石崖，得到罗连城的接济，供应粮秣，补充子弹，安置伤员，休整 20 天。在此期间，失散的赵连璧曾找到小石崖，请示刘志丹怎么办，刘即派贾生财、赵连璧再次到南梁一带拉队伍。并派马锡五、陈鸿宾通过谷连舫与苏雨生谈判，接受其改编。4 月，游击队离开小石崖，开抵旬邑职田镇，整编为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补充团，刘志丹任团长，杨树荣、陈鸿宾任团副，下辖 2 个连。部队驻职田镇期间，筹粮中当地大豪绅刘日新抗拒自杀。地主豪绅联名告到陕西省政府，说刘志丹是共产党，图谋不轨。因此，刘志丹被苏雨生诬至彬县囚禁。游击队被苏部 2 个团包围，二连突围进入子午岭山区，被李培霄饥民武装收编；一连为保证刘志丹安全而缴械，被编为苏部运输队，目的是为休整队伍，伺机拉出。

③收编李培霄饥民武装。刘志丹在彬县被囚禁，地下党通过南汉宸、杜斌丞营救获释。

当时，陕西省委有个计划，即准备在甘肃搞 5 个旅的兵变。因此，派高岗、马志贞到彬县，指示刘志丹去平凉与陈珪璋谈判，将李培霄千余人的饥民武装收编为 1 个旅，归属陈部，站住脚后，再改造成自己的部队。于是，刘志丹一面派马锡五与刘兆庆、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联系，一面动身赴平凉。

1931 年 7 月，刘志丹由彬县到平凉，经陈珪璋部特务团团长刘宝堂引荐，与陈珪璋谈判，陈委任刘志丹为新编十三师直辖十一旅旅

长，陈鸿宾(后为朱理凯)任参谋长，驻防宁县早胜一带；并派刘宝堂率1个步兵营同往，协助收编李培霄部队。刘志丹到宁县后，设立了办事处，收容张皮家原、职团镇失散人员。王世泰闻知刘志丹的确切消息，也带在苏部运输队的部分队员前来归队，很快集中起四五十人的队伍。在与李培霄谈判中，因满足不了李的条件，李拒绝收编。当时，陈珪璋部的谢牛、蒋云台两个旅也都在设法收编，结果收编不成，将李部打散了。

在此之前，河套土匪高广仁投靠陈珪璋，被编为十三旅，驻兵早胜镇。因为苏雨生背叛杨虎城，欲北窜宁夏，杨要陈珪璋在陇东堵截，陈命令刘宝堂、刘志丹协助高广仁共同阻击苏的部队。不料，高广仁早与苏雨生、张廷芝秘密勾结，准备联合进击宁夏。因此，高广仁利用请客吃饭的机会在早胜扣押了刘志丹、刘宝堂，并将其部队全部缴械。高部北窜时，一路烧杀抢掠，途经合水店子原，攻开安吉堡子，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残酷屠杀，死伤70余人，并掳去青年妇女数人。到了合水县城东关骆驼巷，被蒋云台率3个骑兵团打散，刘志丹及其部队被解救，驻合水东关。蒋云台找借口欲逮捕刘志丹，刘宝堂闻讯，急派副官告知，刘志丹带着王廷玉、李万才连夜脱身到蒿嘴铺贾生财处，经贾掩护躲过了蒋云台的追兵。刘志丹在贾处遇到马锡五，贾将刘、马等人送到太白附近夏家沟赵连璧驻地。刘志丹留马锡五帮助赵连璧整顿部队，自己与王廷玉、李万才去保安，继续组织革命武装。

刘志丹离开合水时，指定张秀山负责部队党的工作，并委托张转告全体党员，留在陈珪璋部队积极创造条件，寻找机会搞兵变，为革命拉出武装。之后，部队编入刘宝堂部开赴平凉。

收编李培霄饥民武装，是刘志丹打着军阀旗号建军的又一次失败。

④南梁游击队的成立。刘志丹回保安不久，马锡五也到保安。2人曾钻过一个时期的梢山，对南梁一带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进行了详细的调查，为形成以南梁为中心开展游击战争的思想奠定了基础。

自张皮家原失败和职田镇被缴械以后，赵连璧、同守孝先后回到南梁地区，聚集旧部，从头干起，这时已各自拉起一支队伍。同守孝被叛徒李庚娃打死，队伍与赵连璧合在一起，约 200 多人，在太白一带活动。杨培盛在平定川也拉起几十个人的饥民武装。1931 年 9 月，刘志丹来到平定川倒水湾杨培盛部驻地，并派人通知赵连璧、贾生财率部前来会合，再次进行整编。全队共 300 多人，分编为 3 个大队，刘志丹任总指挥。游击队当时未正式命名，群众通常称之为南梁游击队。

南梁游击队成立后，首战二将川，消灭了张廷芝 1 个骑兵连，缴枪 20 余支，战马 40 多匹。接着消灭了太白民团，收缴了旦八寨子民团的部分枪枝。贾生财又联络谷聚山、张天禄，先后从陈珪璋部队中拉出五六十人参加游击队，使部队扩大到 400 多人。南梁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在军事上站住了脚，政治上也扩大了影响。

南梁游击队的核心是刘志丹、刘景范等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及党在几年兵运工作中培养起来的军事干部，基本成份是受国民党反动派剥削压迫而破产的贫苦农民。这部分人如赵连璧、杨培盛等，当时被称为土匪；贾生财是民团团总。实际他们都是贫苦农民家庭出身，本人都曾经逃荒要饭，或者以拉长工、打短工、当店员为生，因为生活过不下去上山落草，或吃粮当兵。他们与国民党反动派扶植豢养的土匪、民团有本质区别。他们的身世和革命道路大致如下：

赵连璧，乳名二娃，陕西保安白沙川人。家庭出身贫农，并当雇工 11 年，农闲即以打猎为生。1929 年为逃避地主逼债，到合水县太白镇民团当兵，后任班长。刘志丹太白收枪时曾作内应。太白收枪后，刘志丹见其勇敢，且有活动能力，给他 5 支枪，要他在太白一带拉队伍。不久，他便动员了数十名贫苦农民，并收编了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残部和当地民团三四十人，部队扩大到 100 多人。麻峪村整编时，被编为三连。1931 年 2 月，宁县张皮家原战斗突围后，与部队失去联系，只带几个人回到太白山区，很快又集合起失散人员四五十人，十几支枪，后又缴获当地民团二三十支枪，就地坚持游击。到当年夏

天，部队又发展到百余人。刘志丹合水脱险后，由贾生财护送到他的驻地夏家沟，并留马锡五帮助他整顿部队。在刘志丹等人的帮助教育下，逐步树立起革命思想，表示坚决跟刘志丹为穷人打天下。陈珪璋曾以营长之职为诱饵收编，他说：“我宁愿跟着刘志丹当兵，也不给陈珪璋当营长。”

杨培盛，陕西米脂人，家庭出身贫农，本人成份店员。1930 年冬，讨保向镇川堡商人举债，在南梁山区收购皮货，被土匪陶老三抢劫一空，不敢回家，在白马庙川给人打短工度日。后经刘志丹启发教育，开始走上反压迫的道路。一次他徒手夺了赵富奎民团一团丁的枪，要跟上刘志丹闹革命，刘志丹见他忠厚老实，又有办法，就又给了他 1 支枪，要他去联络一批由陕北逃荒来南梁山区的难民，组织游击队。他很快动员几十个难民，拿着大刀长矛在平定川一带游击。以后又缴获旦八寨民团和张廷芝匪部的枪 30 多支，队伍很快发展到 100 多人。

贾生财，陕西横山人，家庭出身贫农，幼年随父逃荒到合水山区落户，靠给地主拉长工维持生活。他聪明能干，由于忍受不了地主的剥削压迫，到驻合水城关的陇东民团军中当兵，以后当了班长、排长。1930 年夏，刘志丹在陇东民团军做兵运工作时，他曾与刘志丹有过交往，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麻峪村整编时，他拉出所在部队 40 多人参加刘志丹游击队，任连长。张皮家原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他带 20 多人突围回到合水山区，利用社会关系当上了合水东区民团团总，驻扎蒿嘴铺，作为权宜之计。刘志丹彬县出狱后，派马锡五到合水，住在他的团部做联络工作。早胜事件后，刘志丹从合水脱险，幸亏他的掩护，并把刘志丹护送到夏家沟，躲过了陈珪璋部第五旅的追捕，倒水湾改编时，他将蒿嘴铺民团 50 余人、30 多支枪以及由他联络的五六十人先后拉出参加改编，并出任大队长。

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都是在刘志丹直接帮助教育下，逐步树立了革命思想，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陕甘边区红军初创阶段的骨干，并且为革命做出了一定贡献。

南梁游击队的成立，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陕甘边区创建革命武装的胜利，标志着陕甘边区革命武装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陕甘游击队的斗争历程

随着日本对我东三省的步步蚕食，全国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在这种形势下，中共中央号召全党加强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陕西省委重视并加强了对陕甘边区武装斗争的领导，从而使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揭开了新的一页。

1931年10月陕北游击支队来到陕甘边区，同南梁游击队会合；1932年2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陕甘边区的革命武装力量正式打出革命红旗。陕甘游击队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为正式成立红二十六军创造了条件。

①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会师。1931年10月下旬，陕北游击支队寻找刘志丹部队来到南梁，曾分驻于南梁堡、阎洼子等地。不久，又移驻东华池、太白。南梁游击队得到消息后，遂派刘景范去东华池与师储杰、杨重远等负责人接洽。随之，两支游击队在东华池、林锦庙一带会合，部队共约700人，重新开赴南梁荔园堡一带驻扎。

10月初，谢子长、高岗等受陕西省委指派，去平凉了解党在陇东陈珪璋部队的兵运工作情况。在此期间，会师部队派马云泽去平凉，谢子长从马云泽那里知道两支游击队已会师，于11月上旬与高岗等来到南梁。因当时已入严冬，会师部队吃饭及冬装问题无法解决，遂决定将部队暂编归陈珪璋部，仍借用十一旅的番号，谢子长任旅长，刘志丹任副旅长。辖两个团，陕北游击支队编为第一团，南梁游击队

编为第二团。陈珪璋部划给防地，解决供给。同时，派高岗去西安，向陕西省委请示汇报工作。改编后，又派马云泽去平凉办理编制，领取军需印信等。部队即开赴庆阳新堡、城壕川张家沟门一带驻扎，休息整训。

12月，陕西省委派荣子青来新堡，传达省委指示：根据“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和西北革命形势的变化，省委决定部队脱离陈珪璋部，单独树帜，改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并内定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领导人。省委要求部队整顿后南下，向陕西关中道移动。首先，在正宁、旬邑、淳化一带发展。

1931年12月下旬，部队离开新堡，沿子午岭西侧南下。在六寸原，击溃了陈珪璋部阻击的小股部队。1932年元月初，部队到达正宁县北柴桥子村，谢子长主持召开全体军人大会，荣子青宣布正式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刘志丹任正副总指挥，杨重远任参谋长。原第一团编为一支队，第二团编为二支队。同时，部队成立了党委会，支队均建立了党支部。成立大会上举行了授旗仪式，旬邑特支书记第五伯昌向谢子长授军旗，谢子长、刘志丹、荣子青先后讲话。西北反帝同盟军的成立，使广大指战员受到很大鼓舞。

1932年1月12日，西北反帝同盟军移驻正宁三嘉原。由于供给困难，部队在整训、宣传群众的同时，打土豪解决供给问题。在此期间，发生了“三嘉原缴枪”事件。当时农历年关将近，为解决年关供给，二支队派第一大队队长赵连璧带一部分人外出打土豪。因为打击面过宽，并在1月31日永和集上抢了群众的东西，造成不良影响。于是，部队一些领导人在锦章村召集一支队党员大队长以上干部开会，决定收缴二支队的枪，处决赵连璧。2月4日上午，全军在二支队驻地南庄子一家场里集合，当场打死了赵连璧、谷聚山、周毛牛，打伤2人。并缴了二支队的枪，遣散了二支队的主要干部及大部分队员。这就是陕甘边区红军历史上的“三嘉原缴枪”事件。这次行动，也震动了一支队内部。2月6日晚，师储杰即率旧部100多人出走，不久投靠了国民党军队。这次事件，大大削弱了西北反帝同盟军的力

量。事件后刘志丹去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

部队还在新堡驻扎期间，当荣子青传达省委要部队开到关中去去的指示后，在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整顿及供给问题时，领导层就存在着意见分歧：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上，有的主张按省委意图南下关中，刘志丹主张在南梁一带；在部队整顿问题上，一致认为部队成分复杂，需要整顿。但在整顿的方法上，有的认为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主张采取教育改造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在部队的供给问题上，有的提出体现官兵一律平等，每人每月发饷银 20 元(后在柴桥子全体军人大会上宣布)，刘志丹认为部队无固定经济来源，这种提法不可能实现。三嘉原缴枪事件，是西北反帝同盟军领导层矛盾斗争的反映，本质上是陕西省委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造成的恶果。

②陕甘游击队的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期间，陕西省委派军委书记李杰夫来到部队，传达省委指示，要求立即打出红旗，执行游击战争纲领，创造革命根据地。1932 年 2 月 12 日，西北反帝同盟军在三嘉原锦章村召开军人大会，李杰夫代表陕西省委宣布，将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简称陕甘游击队)，并宣布了游击队的建制及主要负责人名单。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全军 300 余人，编为 2 个步兵大队、1 个骑兵大队和 1 个警卫队。同时，成立了中共陕甘游击队委员会(简称队委会)，李杰夫任书记。各大队设立了党支部，并任命了政治工作人员。改编后，举行了授旗仪式，李杰夫、谢子长和农民代表黄子祥先后讲话。这天的军人大会气氛热烈，群情激动。游击队员们颈系“牺牲带”，表示要为中国革命不怕牺牲流血，奋斗到底。

陕甘游击队的成立，正式打出了工农革命的旗帜，公开了这支部队的性质和面目，是一次转折性的变化。

陕甘游击队成立后，立即开始执行游击战争的行动纲领。改编的当晚即离开三嘉原，第二天，进占旬邑职田镇，没收了国民党驻镇保

安团的枪枝，捣毁区公所，逮捕当地 8 名大豪绅，并召开群众大会。宣传红军宗旨，当众烧毁豪绅地主的帐债契约，组织农民分粮抗捐。2 月 15 日，在阳坡头打退杨虎城警卫团三营和彬县、淳化、旬邑 3 县民团 500 余人的进攻，毙伤俘敌七八十人，活捉敌连排长各 1 人，缴枪 130 支，大获全胜。20 日，游击队到达香山寺，经四五天的休整，再到衣食村，在煤矿工人中开展了宣传，并吸收六七名工人参军。这时，富县、铜川、耀县 3 县民团来“围剿”，游击队对敌进行了抗击，并击溃了庙湾民团，游击队到宜君县焦家坪，收缴当地民团及国民党军队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左协中团 1 个连的枪七八十支。在艾蒿洼，打退了左团 1 个营的进攻，俘敌连长 1 名，缴枪 20 余支。在这次战斗中，童子班荣立战功，遂成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3 月初，游击队到达黄陵县上畛子。

③两次攻打山河城。陕甘游击队在上畛子打听到正宁南原农民自发起来抗粮抗款，遂于 3 月中旬开抵月明原，一边打土豪筹集粮款，一边了解农民斗争情况。先后打了南邑西头秦慎德、永和赵元亨家的土豪，并抓了秦慎德的儿子秦善玉和赵元亨做人质。

当时正值陕军十七师孙蔚如部与甘军新编十三师陈珪璋部在陇东火拼。陈部溃败后，其残部在陇东各地索粮派款，横征暴敛。正宁驻陈残部百余人，向四乡摊派粮款多达 10 万余元。农民不堪重负，组织起民团抗粮抗款，湫头原就有上五社、中五社、北八社 3 个民团。国民党正宁县催款委员马锡九、董××在湫头一带催要粮款，并吃酒作乐，群众十分气愤。号称二疯子的赵锁手持槌枷棍把马锡九轰走。县府以南原群众想造反，扬言要血洗南原。南原群众闻讯恐慌不安，各民团齐集苟仁寺商量对策。正在为难之际，听说月明原来了红军游击队，便派巩世信、范西魁 2 人去联系。在此情况下，游击队决定就地组织群众，配合攻打山河城，开辟革命根据地。派出骑兵到南原联络，约定时间，军民联合攻城。

山河镇是国民党正宁县府所在地，驻有陈珪璋残部警卫团的 1 个排，由连长刘湘林率领；公安局所属警察 8 个班；另有保安队队部武

装 10 余人，总兵力不足百人。此外，还有陈珪璋部混成旅 1 个营，步骑各一部分，由谢牛率领驻宁县早胜镇；警卫团 2 个排，由团副刘明发率领驻宁县平子镇。公安局警察二三十人在巡官窦××的率领下准备哗变内应，约定 3 月 19 日拂晓以拍手为号，开启东城门，放游击队进城，

18 日晚，湫头原各民团四五百人在苟仁寺集合，游击队派人参加并作了动员。各民团在杜兴邦率领下连夜出发，次日晨赶到山河城西柑柏树、移风一带。三嘉原 10 多个村子的民团也在张彦升的率领下赶来参加。同时，游击队主力从月明原向山河城东急行，欲与群众配合摆成两面夹击之势。不料因向导迷路，到城北九龙畔，发现方向不对，急速绕道返回，到达山河城东关时，已错过约定攻城时间，只得仓促投入战斗，攻城一日无结果。城内内应的警察也因错过约定时间，未敢开启城门。但秘密暴露，为首者窦××被捕杀，余被缴械。城西各民团群众在张圈沟塄与县保安队对斗一阵，砍伤了保安队长肖恩多，后因城上开枪射击，自行散去。第一次围攻山河城遂告失败。

第一次攻城失败后，陕甘游击队退驻西坡四疙瘩，召开队委会，重新讨论行动计划。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确定：到南原开展游击战争，打击豪绅地主的破坏；组织发动群众，将群众自发组织的民团改编为赤卫军；立即实现陕甘游击队的纲领；准备再次攻打山河；创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建立根据地。

会后，游击队开抵寺村原，部队分驻新庄子、西城、年庄子等村。乘着自发的群众斗争方兴未艾，即在苟仁寺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将原有民团改编为赤卫军，成立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绰号张聋子)任副总指挥。大会宣布了反动豪绅赵元亨的罪状，处决了赵元亨及其走狗巩得功。游击队到各村张贴标语，广泛发动群众，以村为单位成立赤卫军小队、贫农团、农民联合会村会、少先队等群众组织，号召广大贫苦农民起来反剥削反压迫，同地主豪绅作斗争。组织群众没收并分配了赵元亨家的粮食和牛羊。为筹备粮饷，扩大政治影响，游击队还到彬县的永乐、北极和旬邑的底庙等地

打土豪。

经过 10 多天的准备，陕甘游击队决定第二次攻打山河城。3 月 31 日晚，谢子长、杜兴邦分别率领游击队和赤卫军、群众千余人从寺村原出发，到达山河城东的路家崖窑和杨、巩二畔。赤卫军及群众主要任务是给游击队“壮营”，送水送饭，故再未前进。游击队继续向山河城靠近，到达东关财神庙周围。4 月 1 日，游击队从城东、北面同时发起进攻。战斗打响后，敌钻入城内，凭借着坚固的城防工事向游击队还击，双方对峙 1 日。2 日，游击队继续攻城。下午，敌驻早胜骑兵来援，绕城北向游击队猛扑，游击队迅即组织撤退，隐蔽在城东数里之西坡坳。敌骑冲过去，被游击队伏击，当场毙伤四五十人，锐气大减，急调头撤退。游击队反败为胜，一鼓作气将敌赶入城内。因敌依托坚城对抗，终不能克。当晚，游击队、赤卫军等陆续返回寺村原。此战，游击队牺牲 10 余人，双佛堂赤卫军班长赵福进落崖致死。

④创造寺村原游击根据地。如前所述，陕甘游击队第一次攻打山河失败以后，在寺村原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做了大量工作。在此基础上，于 4 月上旬，在湫头召开千余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为“土地”、“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接着以村为单位选举农民代表。每村 1 人，选出贫雇农占优势的农民代表 74 人。在新庄子山神庙前场上，召开农民代表大会，选举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委员 15 人(农民 10 人，其中回民 1 人；游击队 5 人)，常务委员 7 人。李杰夫任主席，当地农民张进元、唐桂荣任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肃反、财政、食粮等委员会。会议决定，宣告执行苏维埃政府的一切决议和法令。以农民代表会和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布告宣言，代表豪绅地主利益的国民党县政府、区公所均被推翻。会议决定设收所有豪绅地主富农食粮，一部分分配中农、贫农、雇农、苦力，一部分作为游击队给养。会议决定改组赤卫队，禁止富农参加，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由群众选举分队长 1 人；乡(或七八个村)成立大队，设正副大队长各 1 人；各乡联合成立总队

部，设正副总队长各 1 人，参谋 1 人。并以同样组织形式成立少年先锋队组织。

农民代表会的各项决议即将执行之际，陕甘游击队撤离寺村原，在无红军作后盾的情况下，设立在新庄子西洼的革命委员会机关不得不撤销，停止工作。这次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经过 20 多天的群众工作，建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是建立政权和革命根据地的一次重要的学习、锻炼和实践。在当时红军力量弱小的情况下，能够集中 20 多天做群众工作是难能可贵的。革命委员会虽然没能存在下来，但她的影响深远，在当地人民的心目中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期间，接到旬邑县地下党组织的报告，说旬邑县城守备松懈，队委会遂决定奔袭。4 月 13 日，游击队攻克旬邑县城，消灭守敌 1 个排，缴获步枪 20 余支，机枪 3 挺，子弹 1500 余发，炸弹 7 箱。后因部分敌兵逃入北山魁星楼据险死守，未能攻克，游击队退出县城。4 月 18 日，在旬邑县马家堡，杜衡主持撤销游击队总指挥部，以“执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罪名，撤销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派往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将部队改编为三、五两个支队。按支队分别成立党组织，队委会也随之解体。嗣后，三支队西进彬县、永寿、乾县、礼泉等地活动，五支队南下三原武字区配合群众斗争。面对国民党当局的重兵“围剿”，陕西省委指示游击队统一指挥，集中行动。5 月 10 日，两支队在旬邑清水原集结，恢复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杨重远任参谋长。部队发展到 500 多人。在刘志丹指挥下，游击队转战富县、洛川、黄陵、宜君等地，半月历经 9 战，8 胜 1 负，至 5 月底打破了敌人“围剿”。

⑤麻子掌、梁掌堡会议。5 月底，陕西省委命令游击队东进韩城，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遭强敌进攻，受到很大损失，遂辗转回到陕甘边区。6 月下旬，刘志丹率主力 200 多人来到宁县麻子掌。由于连战失利，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层在行动方向上发生了严重分歧。为此，在麻子掌召开队委会。会上，李杰夫等提出南下，把部队拉到三原武字区去打游击，说那里条件好，工作好开展。也有人提

出北上。刘志丹等主张依托桥山，就地开展游击战争，其理由是：1、桥山地域辽阔，回旋余地大；2、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可东去陕北，西进陇东，3、能扩大骑兵，步骑配合作战。双方争执不下，作出了分开行动的决定。刘志丹一再表示：我们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还是要行动一致，开到山区去整顿，以准备再战。但刘志丹的意见未被采纳。会后，要南下的 70 余人和北上的 130 余人各驻 1 村，准备分开行动。

正当这时，阎红彦、杨琪率少先队 100 余人由黄龙山区来到麻子掌附近的梁掌堡，从群众中了解到红军游击队将要分开活动的消息，即分别找刘志丹、李杰夫做工作。阎红彦支持刘志丹的正确意见，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就地开展游击活动。原来主张分家的干部也考虑到党的利益，认识到分开的弊端。于是，再次在梁掌堡召开队委会。由于阎红彦会前分别做了工作，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作出了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活动，伺机向南北发展的决定。会议还推选阎红彦接替刘志丹任总指挥。梁掌堡会议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对陕甘游击队的巩固和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梁掌堡会议后，李杰夫回陕西省委汇报工作。陕甘游击队到盘客原进行了短期休整，并进行了整编，将原两个支队改编为两个步兵大队和 1 个骑兵大队。

⑥西华池兵暴。1932 年到 1933 年上半年，陕西省委为粉碎国民党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保卫中央苏区，把牵制敌人兵力，瓦解敌军力量，发动革命兵暴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在甘肃先后发动了两当兵暴、凤翔路口兵暴、两次靖远兵暴、西华池兵暴、谯口兵暴、天水兵暴、蒿店兵暴以及兰州水北门兵暴等一系列武装暴动。这些暴动，因为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基本上都失败了，唯西华池兵暴在陕甘游击队的配合下取得成功，达到了预期目的。

1932 年 6 月，杨林等奉谢子长派遣，来到西华池，在国民党新十一旅特务营开展兵运活动，伺机举行兵暴。新十一旅是中共长期开

展兵运工作的部队，党的组织基础较好。特别是特务营，高鹏飞任地下党支部书记，平时注意对士兵进行抗日宣传和革命思想教育，并注意发展党员，加强组织建设。高担任连长的一连，班长以上干部和连部勤务兵多数都是党员。同时，一连人枪齐全，战斗力强，由高直接掌握，可以左右局势。杨林等与高鹏飞接头商量后，认为条件成熟，即着手兵暴的准备工作。

在举行兵暴取得一致意见之后，遂派党员班长宋廷璧持信去盘客原找陕甘游击队联系。刘志丹、阎红彦回信表示，赞同他们立即举行兵暴，游击队3天之内不离开盘客原，以接应兵暴部队，要他们周密部署，慎重行事，保证万无一失。接到回音，高鹏飞立即召开党支部委员会，具体研究行动计划，曹胜勇(二排排长)、杨林、苏杰儒，还有1位司务长参加会议。会议确定，7月9日暴动，并对武器弹药的准备，部队调动，宣传鼓动，后勤供给等工作进行了具体部署。

7月9日早饭后，副营长潘立庭邀高鹏飞去营部打麻将，高便借机稳住营部。下午饭后出操，一连有意比二连迟出半小时，曹胜勇、苏杰儒把全连集合起来，进行了暴动动员，全连一致拥护。随后，率一连突入操场，收了二连的枪，命令二连全体集合待命；同时，杨林、郝维新带勤务兵朱万才、号兵康健民等10余人，迅速闯入营部，与高鹏飞一起解除了潘立庭等人的武装。高鹏飞到操场郑重宣布特务营一、二连全体官兵正式武装暴动！在场官兵一致拥护。接着宣布了几条纪律，进行了临时整编；天黑后，兵暴部队浩浩荡荡开赴盘客原。10日上午，在武洛与前来接应的陕甘游击队骑兵团相遇，晚间与游击队主力会合。12日，陕甘游击队在湫头召开全体军人大会，庆祝西华池兵暴成功，热烈欢迎全体兵暴部队参加红军。随后，对兵暴部队进行改编，除一小部分编入骑兵团外，其余编为陕甘游击队第三大队，使陕甘游击队充实到500余人。

西华池兵暴是中国共产党在石英秀部队长期开展兵运工作的结果，陕甘军运史上最为成功的一例；这次兵暴成功与陕甘边区游击战争的推动和配合密不可分。整整瓦解敌两个连170多人的兵力，对国

民党西北军阀是一个沉重打击，充实壮大了陕甘游击队，影响是很大的。

⑦五顷原失利。陕甘游击队在湫头、五顷原活动期间，陕西省委派李艮来游击队巡视，其任务是“为了实现开展游击战争，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历史任务，彻底转变陕甘游击队与苏区的机会主义领导，以创造陕甘新苏区与廿六军”，而直接的任务则是解决所谓“机会主义领导”问题。这本身就表现了陕西省委脱离实际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和对陕甘游击队党委的不信任。李艮到游击队主要做了3件事：第一，不顾大敌当前，在正宁南邑连续召开7天干部会议，空谈创造“新苏区与廿六军”问题，批判游击队的所谓“机会主义领导”和“反革命阴谋”问题；第二，派出战士在五顷原分配土地，并限期20天内分配完毕。建立了3个村庄的临时革命政权，第三，为向“反革命阴谋分子”作斗争，又在游击队队委会之外组织了“秘密队委”。

正在游击队连续开会和分配土地期间，国民党部队驻山河的晁团乘机进占从湫头到寺村原周围的村庄要道，切断了交通，加固了王郎坡寨子，完成了“围剿”游击队的部署。而游击队的指挥机关则泡在会议无休止的争吵中，全然不顾敌人进剿的现实，未做任何反“围剿”的准备工作。李艮在敌情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认识到五顷原、寺村原有丧失的危险，而把巩固和扩大根据地又理解为军事上的死守和强攻硬拼，在这种错误指导下，连打8次败仗。

第一仗，强攻王郎坡寨子。王郎坡是一个东、北、西三面临沟的土圈子，寨内驻敌六七十人，枪械弹药充足，外围且有援兵。在没有准备、毫无胜利把握的情况下，李艮却让游击队强攻这个敌据点。游击队骑兵在前，步兵在后，勇猛冲锋，搭的云梯够不着，扔上城墙的手榴弹炸不响，却遭敌密集火力扫射，攻坚两天不下，伤亡五六十人，只好撤出战斗，转移到三嘉原。

第二仗，死守五顷原。游击队撤到三嘉原后，如果绕到外线，本可以摆脱敌人。但李艮在死守思想支配下，又转回五顷原，立足未稳，

尾追之敌骑兵已经赶到，游击队被迫应战，由于敌强我弱，抵敌不住，只好边打边撤。在战斗中，游击队广大指战员曾利用有利地形给敌以大量杀伤，歼敌百余，游击队也牺牲 30 多人，损失骡子 10 余匹，不得不东撤到高凤坡。

第三仗，三嘉原突围。游击队到高凤坡，当晚再次转移到三嘉原，驻前马原、狼牙洼、秦曲。次日晨，敌步兵又从南庄子、细嘴子包围上来。游击队边打边退，从秦曲打到狼牙洼，又从狼牙洼打到前马原。9 时许，退到菜头湾山巅上。不料从雕翎关方向追来的敌骑兵已到山下，堵死了游击队退路。在腹背受敌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可巧这时沟壑山梁上大雾骤起，能见度极小。游击队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奋力突围，才得脱险。当游击队撤到马栏时，只剩下 200 多人。

这次游击队在湫头、五顷原活动 1 月多时间，由于指挥上的错误，再次遭到严重挫折。部队在马栏休整时，广大指战员无法容忍李良的错误，甚至有人提出要处死李良。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李良只得离队回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游击队休整后，分散游击 10 余日，又集中起来在照金地区活动。8 月下旬，陕西省委重新任命谢子长担任陕甘游击队总指挥。

子午岭山区的分散游击活动。9 月初，谢子长率陕甘游击队来到宁县盘原。队委会研究，在子午岭山区活动一段后，仍回三嘉原、寺村原一带。但到了太白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北上奔袭保安县城，解决装备和给养问题。攻打保安县城时，困守敌防守严密而失利；接着，又在瓦子川、墩儿梁打了两次败仗。最后，不得不退到南梁地区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由于连战失利，士气低落；且伤寒病流行，伤病员大增，而医药又奇缺。这时天气渐冷，部队住在破窑洞里，衣服单薄，缺铺少盖，吃粮也难以解决，处境非常困难。面对重重困难，队委会研究决定，部队分 8 股外出游击，度过难关。刘志丹带领 1 个大队 70 多人到合水拓儿原一带活动；杨森、黄子文带领 60 多人到三原武字区活动；阎红彦、杨重远带领骑兵队到照金一带活动。谢子长、吴岱峰留守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照看 60 多名伤病员和少先队员。刘

志丹部以拓儿原段家庄为中心，广泛发动群众，打土豪，分财物，筹粮筹款。先后打了固城川的杨四娃、瓦岗川的吴茂森、黑本庄的高攀贵等土豪，除将没收来的财物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外，为游击队筹备了不少给养。这样，经过两个多月的分兵游击，到12月中旬，各路游击队陆续返回，在黑木原会合。由于筹集到不少粮款和物资，从而克服了严重困难，度过了难关。广大指战员再次经受了考验，士气大振。之后，谢子长、刘志丹率游击队南下照金一带，开展新的斗争。

三、红二十六军的成立、失败和恢复

1932年4月20日，中共中央为进一步开展陕甘边区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作出了《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要求陕西省委“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队伍编成为经常的正式的红军”，“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遣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同年8月1日，中央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中，再次要求“立即成立红军一团”。陕西省委先后于6月1日、8月25日分别作出《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决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对贯彻中央决议提出了具体意见。所有这些，都为成立红二十六军奠定了思想和组织基础。

红二十六军第二团应运而生，并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把陕甘边区的革命斗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由于军政委杜衡执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强令部队南下渭华，遭到惨重的失败。陕甘边区党组织不畏艰险，重振旗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保存了革命力量。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领导红军游击队打了几次胜仗，扭转了危局。特别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从陕甘边区实际出发，提出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从而使陕甘边区红军走上健康发展

的道路。

1、红二十六军第二团的成立及其创造照金苏区的斗争

1932年12月18日，陕甘游击队奉命开赴宜君县参加改编。在杜衡的主持下，首先在杨家店子“整军”，批判陕甘游击队负责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逼迫谢子长、阎红彦离开部队，赴上海受训。2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在转角正式成立，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第二团(以下简称红二团)，杜衡任军政委兼红二团政委，选举王世泰为团长，郑毅任参谋长。下辖步兵连、骑兵连、少先队、特务队。全团200余人，枪150余支。成立大会举行了授旗典礼。

红二团成立后，坚决执行陕西省委的指示，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创造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红二团和地方武装。12月26日，首战焦家坪，一举全歼敌民团，俘敌60多名，缴枪60余支。接着进占香山寺，没收分配寺庙粮食二三千石，赈济了灾民。杜衡命令放火烧毁了这座千年古刹。随后，集中时间，广泛发动群众，开辟了香山、九保两个地区。继而消灭照金、旬邑民团各一部，使苏区扩大到薛家寨、照金地区。随着红军影响日益扩大，青壮年农民和灾民纷纷要求参军，红二团组建了步兵二连。为培养干部，还成立了随营学校，部队发展到300多人。经过20余天的转战，帮助组建了香山、芋园、照金、旬邑、宜君5支游击队，为照金苏区的创造奠定了基础。1933年1月17日，杜衡强令红二团攻打庙湾夏老么民团，敌据险死守，强攻失利，伤亡二三十人。战后，刘志丹任红二团参谋长。1月27日，骑兵连在衣食村宿营，遭夏老么民团偷袭，战马损失过半，撤退中绕道经宁县、正宁返回照金。

2月初，红二团在照金遭杨虎城骑兵团、特务团及庙湾民团三路“围剿”，在芋园战斗中又受到损失，经渭北游击队支援，跳出合围。

为了统一领导根据地各游击队作战行动，中共陕西省委指示，组建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任命李妙斋为总指挥，习仲勋为政治委员。3月8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成立，金理科任书记，习仲勋任军委书记。

记。

3月下旬，红二团转外线作战，先后在同官、三原、泾阳一带活动，寻机袭击敌人，后在旬邑土桥、彬县龙马、高村游击。

4月5日，在照金召开陕甘边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周冬至当选为主席，习仲勋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机关和赤卫军总指挥部设照金，红二团后方基地设薛家寨，并先后成立了红军医院、被服厂、修械所。照金根据地初步形成。其地域以薛家寨为中心，东达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黄花山、七界石、马

栏川，北迄断头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尔原、老牛坡，地跨耀县、旬邑、淳化3县边界，方圆数十里。

正当照金苏区发展之际，国民党当局调集杨虎城部警卫团、特务团、骑兵团，井岳秀部五一一团，配合旬邑、淳化、耀县、三原、同官、宜君6县民团。兵分四路“围剿”苏区。红二团决定插入敌后。

“调动”敌人，粉碎“围剿”，由照金向西，经旬邑北上到宁县盘客。4月下旬，在武洛堡活动，遭国民党西峰驻军两个营和几个民团的进攻。刘志丹、王世泰考虑到敌我双方力量悬殊太大，决定主动撤离。王世泰带骑兵连阻击敌人。敌恃武器精良，弹药充足，用重机枪封锁红军退路。红二团骑兵连奋力抵抗，掩护大部队安全东撤，骑兵连连长李光明不幸牺牲。

5月上旬，红二团在黄陵县上畛子稍事休整，又回到宁县金村原。在此期间，国民党军队驻长武何全升部1个连哗变，也来到附近。红二团与之谈判、协商，全部收编。收编后，红二团曾派许多干部去做工作，试图改造，终因该部旧意识、旧习惯严重，不愿受红军纪律束缚，为防不测，只得缴械。80多名变兵，除少数愿参加红军者外，大部发给路费遣散回家。红二团在金村一带活动多日，还在合水段家集消灭民团数十人。

杜衡由西安返回红二团后，面对国民党当局的“围剿”，丧失信心，极力主张放弃照金根据地。5月25日，红二团回到照金。在照

金北梁，杜衡主持召开特委和红二团党委联席会议，不顾刘志丹等人的反对，强行作出南下渭华的决定。5月29日，红二十六军挥师南下，到了三原县二台子村，杜衡以向省委汇报工作为名离队，指定汪锋代理政委。红二团渡过渭河，在关中平原遭杨虎城部四五千兵力的尾追堵截，虽经英勇奋战，终因众寡悬殊，在兰田县张家坪被打散，分散潜伏终南山中，又遭敌人清山“围剿”，几乎全军覆没。

红二团南下失败，给陕甘边区红军的建设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是杜衡“左”倾冒险主义领导直接造成的恶果，也是由于陕西省委长期以来坚持到平原地区开辟根据地的指导思想造成的。

2、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的成立及其领导下的斗争

1933年6月，红二团南下失败。7月下旬，耀县起义被残酷镇压；杜衡被捕叛变，陕西省委遭受破坏；战斗在陕南的红二十九军失败；与照金苏区毗邻的渭北苏区丧失。当时，照金苏区处境十分困堆，陕甘边区党和人民经受了这一严重考验。特委领导苏区军民艰苦奋斗，整顿了苏区武装力量，加强了军队建设。在原有耀县、淳化、旬邑3个游击队的基础上，又成立了耀县三支队。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和王太吉率领耀县起义部队改编的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相继进入照金苏区，大大增强了苏区的军事力量。

8月14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在陈家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重新组建主力红军的问题，决定成立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太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领导红四团、耀县三支队、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等武装力量。陈家坡会议为重建红二十六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新组建的陕甘边区主力红军先后在庙湾、高山槐、让牛村、柳林等战斗中歼敌民团各一部。随后又绕道北上，在宁县金村庙消灭了部分地主武装，缴获长短枪数十支及一批物资。9月中旬，在合水县固城川与强世卿领导的陕北游击一支队会合。接着，挥戈南下，巧取旬邑县城张洪镇，俘虏了国民党旬邑县长、民团团总，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接着，又打退了国民党当局对照金苏区的进攻。在薛家寨，

红四团改称骑兵团。10月4日，刘志丹、王世泰从终南山化装辗转回到照金，刘志丹被任命为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10月上旬，总指挥部决定主力红军转外线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的“围剿”。

①合水战斗。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获悉合水县城驻杨志恒部赵文治团1个连，加上县保安队，总兵力不足300人，且防守不严，遂决定奔袭合水县城。10月12日，部队出照金出发，15日到达合水黑木原，当即封锁消息，赶做云梯。17日晚，部队冒雨出发，经30多里急行军，来到合水城东。鉴于红军缺乏攻坚武器，采取偷袭的办法，挑选20多名机智勇敢的指战员组成爬城突击队，以骑兵团二连和陕北游击一支队担任主攻，王世泰担任攻城总指挥。18日拂晓开始攻城，在城墙高云梯短无法攀登的情况下，宁县籍战士柴正祥用刺刀扎着第一个攀上城头，突击队员分头行动，出其不意缴了驻“葫芦把”敌人1个班的枪枝，又缴了东城门楼守敌1个排的枪，接着用驳壳枪打开城门铁锁，放进大部队。主攻部队按预定部署攻占敌连部、保安队队部和县政府，不到半小时即结束战斗，共毙、伤、俘敌100余人，缴获长短枪100余支。红军打开监狱，解救了被关押的80多名“犯人”，其中有被敌折磨致残的原西北反帝同盟军大队长杨培盛。国民党合水县公安局李彦率部起义，县长康磷等少数人弃城逃跑。战斗结束后，红军部队开仓分粮，赈济群众，并张贴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同时，处决了民愤较大的杜家传、盐税局长李德胜，其余俘虏教育释放，有的参加了红军。当晚，部队离开合水县城，宿营于包家寨子。

红军主力部队北上之后，国民党当局大举进攻照金苏区，孙友仁特务团配合耀县民团完成了对薛家寨的包围，照金游击队总指挥部率少数游击队及后勤人员200余人从13日到16日经过浴血奋战，终因众寡难敌，弃寨突围。19日，北上到达宁县盘客原，与主力红军会合。面对照金苏区丧失的实际，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决定将后方机关暂时迁驻南梁地区的平定川、豹子川一带。

②毛沟门战斗。合水战斗，国民党丢了一座县城，大为震惊，于

是派赵文治团 800 余人尾追红军不放。红军主力部队在王太吉、刘志丹的率领下，对尾追之敌采取疲劳战术，牵着兜圈子，选择有利时机予以打击。1933 年 10 月下旬，红军在城壕川消灭了当地 1 个民团。26 日下午，在庆阳三十里铺，消灭谭世麟部民团 40 余人，缴枪 30 余支；打开天主教堂，没收了一些药品器材，拉了两个外国神甫，然后东进。这时，赵文治团由庆阳尾追而来，谭世麟部也从悦乐、元城方向堵截。27 日，红军宿营于庆阳县毛家沟门村。毛沟门是个山村，住户分散在沟底和沟北半坡上。28 日早晨，敌赵文治团突然摸来，向红军发起突袭，并有数十人冲进村子。红军发现敌情，立即组织反击，把敌人赶出村。但此时敌大部队已经赶到。面对优势之敌，总指挥王太吉命令红军向河东山上转移。骄横的敌人仗着人多势重，紧追不舍，一直追到半山腰，王太吉命令停止撤退，准备反击，并作了战场动员。待敌靠近，一声令下，枪弹、手榴弹一齐开火，追敌顿时乱作一团。红军趁着有利时机，发起反冲锋，300 多名战士犹如猛虎下山，一口气把敌军压下沟底。在红军战士凌厉的攻势面前，敌溃不成军，狼狈而逃。这次战斗，共毙俘敌 200 多名，缴枪 200 余支，弹药不计其数。这时，谭世麟正在东北面山岭上观望，见状只好悄然离去。赵文治经此一战，一蹶不振，再未能恢复其团的建制。毛沟门战斗后，红军主力部队即开赴合水县包家寨子，进行短期休整。

3、红二十六军的恢复和四十二师的成立

为解决战略方向和行动方针问题，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于 1933 年 11 月 3 日至 5 日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联席会议，研究决定：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

①莲花寺整编。根据包家寨会议的决定，1933 年 11 月 8 日，王太吉、刘志丹主持在太白莲花寺整编了部队，正式宣布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四十二师，王太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红四十二师辖红三团、骑兵团，共有人枪 500 余，战马五六十匹。为

加强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师、团、连分别建立了党委和支部。红四十二师的成立，标志着陕甘边区革命武装斗争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

莲花寺整编后，部队情绪高涨，陕北游击一支队急于回陕北扩大根据地，红四十二师党委在东华池举行了欢送大会。陕北一支队到陕甘边经过月余战斗，人员由 70 多人发展到 100 多人，战斗力得到锻炼提高，武器装备也补充更新了。红军临时总指挥部还从主力部队中选派惠泽仁、魏武、康健民等加强了领导力量，为开辟第一路游击区奠定了基础。

②杨家店子战斗。红四十二师成立不久，即挥师南下，为创建三路游击区作准备。11 月中旬的一天傍晚，部队到达宜君县杨家店子，骑兵团驻在镇子里，师部和红三团驻在下川。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五一团左协中部 1 个连获得消息，由焦家坪方向偷袭红军。早晨 9 时左右，向骑兵团发起进攻。骑兵团战士听到枪声，仓促应战，向镇外冲锋，无奈敌已占据有利地形，猛烈的火力封住街道，不得不边打边退撤出镇子。师部得知敌只有 1 个连，且无后续部队时，当即命令红三团投入战斗，消灭该敌。敌见红三团向其接近，遂退守后山。下午 1 时许，红军部队发起攻击，广大指战员冒着枪林弹雨，最后终于攻上山头，夺下敌阵地，并与迂回部队合围，全歼敌 120 余人，击毙敌连长。

③荔园堡战斗。杨家店战斗后，红四十二师回到南梁地区。为了迅速打开创造苏区的局面，决定红三团东去洛河川活动，骑兵团在南梁一带扫除地方反动势力。当时，荔园堡寨子驻国民党部队警备骑兵团张廷芝部 1 个新兵营，警备懈怠，寨墙破损，易于攻取。骑兵团侦知敌情，一个猛冲，20 多名敌兵全部做了俘虏。当天，骑兵团捣毁了寨子，处决了营副梁邦栋，遣散了全部俘虏。

④城壕川口战斗。12 月初，骑兵团在城壕川活动。一天上午，部队在川道里西行，杨森政委带一连一班作尖兵，在川口附近的阳台上，与谭世麟所率四五百民团军遭遇。敌人正在开饭，双方都很突然。

面对敌情，杨森果断命令一班长宋飞率全班猛冲敌群。12 名红军战士如弓箭离弦，边射击边冲锋。敌人措手不及，被打得晕头转向，立刻四散逃命。红军一直把逃敌追上山原。当敌人发现红军只有 10 余骑时，便组织反攻，把红军又压下山来。正在这时，骑兵团后续部队赶到，遂合兵一处，再次反冲过去，敌大败溃逃。这次战斗俘敌 10 余名，并缴获谭的坐骑。此战狠狠打击了谭世麟积极配合国民党部队“围剿”红军的气焰。

在此前后，骑兵团还消灭了城壕、赵沟门、阎洼子的地主武装，拔掉了敌人的一些据点，为建立苏区奠定了基础。

12 月，红四十二师部队回到南梁，趁战斗间隙，配合地方工作干部，广泛开展群众工作。他们以连排为单位，分别到平定川、豹子川、太白川、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等地，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激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帮助组建二路游击队。同时，在南梁一带建立红四十二师后方留守分队，把伤病员安置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治疗、休养。在红军部队的帮助下，荔园堡、二将川、东华池、葫芦河等地的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相继建立，南梁还建立了乡村苏维埃政权。

四、红二十六军的发展壮大

1933 年冬到 1934 年春，陕甘边区游击战争迅猛发展。红二十六军帮助组建了二路、三路游击指挥部及众多的地方游击队。反过来，随着游击战争的发展，红二十六军又不断得到地方游击队的补充，使自身发展壮大，原有的红三团、骑兵团逐步加强，相继又组建了红二团、红一团，改编了西北抗日义勇军，发展成有 5 个团的建制，总兵力 2000 人，是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为陕甘边区乃至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立下了卓著战功。

(一)二路游击队及红二团的组建

1、二路游击队。包家寨会议确定建立二路游击总指挥部，任命杨琪为总指挥，高岗任政委。在总指挥部的领导下先后组建了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等红军游击队。

①庆阳游击队。1933年11月下旬在南梁小河沟成立，杨培盛任队长，习仲勋、惠子俊先后任指导员。开始仅有8个人，3支枪。但是，经队长杨培盛奔走串联，仅10多天时间，即动员30多名从陕北来南梁谋生的小商小贩和雇工参加游击队，在二将川、东华池、太白一带活动。为了搞到武器，杨培盛曾带领几名队员，闯入二将川刘坪堡，收缴民团枪30余支、手榴弹70多枚。接着，与保安游击队配合，将作恶多端的阎洼子民团团总赵富奎的眷属10余人抓获，迫使其缴枪65支。后随红四十二师部队在合水参加攻打固城堡子敌据点，在宁县观音庙攻打国民党警察所，并参加了西华池战斗。以后，到庆北地区活动，攻打了悦乐堡子，消灭了大沟门民团和田生孝的地主武装。在刘家沟，经过宣传动员，争取寨头刘生枝主动交出全部枪枝。在庆北地区，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群众工作，为开辟庆北苏区做出了重要贡献。1934年秋季，发展到100余人，分编为5个中队和1个少年先锋队。随后，庆阳游击队在支队长邵怀德、政委张秀山的领导下，参加了楼坊坪攻打张廷芝部据点的战斗，三、四中队配合骑兵团消灭了庆阳卅里铺孙家湾子孙向奎民团，攻克曲子镇，消灭了李恒泰民团，11月，庆阳游击队抽调60余人编入红二团为一连。其余四五十人仍编为3个中队，张志孝任队长，王宝珊任政委。1935年春，庆阳游击队配合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攻打驻悦乐黄大原田岷岷的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团部队，并参与平定了独立军叛乱，在老爷岭阻击敌三十五师部队对南梁的进攻。后随红二团在白豹川活动，曾在阎岔与敌三十五师部队作战。不久，集体编入红三团。剩余10余人，仍称庆阳游击队。5月，编入庆北游击支队；9月，庆北游击支队编入陕甘独立营为一连。

②合水游击队。1933年11月在南梁成立，张振东任队长，孙铭

章任政治指导员。刚成立时只有 6 个人。张振东曾认东华池民团团总张怀治为义父，他利用这层特殊关系，乘张怀治不备，迫其下令缴枪 25 支，摧毁了这个反动据点，很快发展队员 20 余名，向合水方向游击。曾配合主力红军打开固城堡子，消灭文富壁民团 100 余人，在盘客观音庙消灭地主武装，在太白消灭了崖寨民团。到 1934 年夏，发展到 100 余人，扩编为 3 个中队。1935 年春，曾参加田岷岷、柳村原战斗，配合红军主力对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作战。11 月，在二将川与庆华游击队合编为华池老游击队，黄克秀任队长。

③保安游击队。1933 年 12 月成立于二将川杨台村，28 人，编为 3 个班，刘约三任队长，王英任政治指导员。成立初期在南梁一带活动，先后收缴了王洼子、南梁寨子、义正川高台寨子、樊家川寨子、洛河川旦八寨子等民团的枪。2 个月时间，发展到 60 多人，扩编为 2 个中队。1934 年 4 月，保安游击队在南梁玉皇庙与刘景范带领的 60 多名新参军的青年农民会合，合编为保安游击支队，刘景范任支队长，增编为 3 个中队。此后，保安游击支队到洛河川、麻地台川等地活动，开辟新苏区。1934 年 11 月，保安游击支队抽调 100 余人编入红二团为二连。

不久，又成立了安塞游击队。

二路游击指挥部领导庆阳、合水、保安、安塞游击队，时而分散活动，时而集中作战，经过几个月的斗争，先后拔除了东华池、林锦庙、刘坪堡、阎家洼子、南梁堡、王洼子、义正川高台寨子等敌据点，缴枪 270 余支，为创建苏区打下了基础。1934 年夏的反“围剿”斗争中，二路游击队还曾去陕北配合作战。继庆阳、合水游击队之后，南梁、庆北地区还相继组建了庆北、华池、定边、庆华、环县、柔远、温台等游击队。洛河川及其以东(以下统称东区)织建了富甘、红泉等游击队。这些游击队都参加过创建和保卫苏区的战斗，并为主力红军输送了兵源。

2、红二团的组建。1934 年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陕甘边区革

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第二路游击队的庆阳、保安、安塞游击队为基础，重新组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11月初，红二团在南梁阎家洼子成立，刘景范任团长(1935年4月，刘调任边区军委主席，孔令甫接任)，胡彦英任政委，王生荣任参谋长，朱奎任政治部主任，红二团下辖两个步兵连和1个少年先锋队，全团180多人。红二团成立后，北上在罗儿坪与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张子英团高雨亭营及旦八寨民团作战，消灭部分敌人，缴获甚多。此后，在白豹川、头道川一带活动期间，先后消灭了许国祥、王希清、王定邦等民团武装，打退了张廷芝、赵昆骑兵部队的夹攻。12月，随刘志丹北上安定地区活动。

1935年春，红二团在兵力充实的基础上，将一连分编为一、三两个连。2月，由安定回到南梁苏区，积极投入反“围剿”斗争。在桥河的杨庄科与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部队遭遇，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警戒部队设计造成敌军前后队互相攻击，主力乘机撤出战斗。在悦乐黄大原田岷岷，与兄弟部队配合，消灭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团二营1个连，并在老爷岭一线阻击敌军月余。在二将川，平息了独立军叛乱。随后，按预定计划脱离战线，向三边地区发展。4月21日，在杨清川伏击敌警备三团骑兵连获胜，缴获战马数十匹，战后扩编1个骑兵排。5月中旬，在宁塞川歼敌民团百余人。20日，在定边韩家洼摧毁敌张廷祥部修械所。接着，南下奔袭吴旗民团，解放了吴旗镇。6月中旬，红二团归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建制。28日，奉命参加了攻打靖边的战斗，解放靖边县城。红二团经过2个多月的游击活动，开辟了定边以东靖边以西的大片苏区。

1935年9月18日，红十五军团在延川县永坪镇成立，红二团编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二二四团，郭宝珊任团长，马佩勋任政委。

(二)三路游击队及红一团的组建

1、三路游击队。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部队的帮助下，陕甘边南区的革命活动重新高涨起来。1934年2月，三路游击指挥部

成立，张明吾(后为王安民、陈国栋)任总指挥，黄子文(后为张仲良)任政治委员。三路游击队包括平子、旬邑、淳化、照金以及后来成立的宁县三支队、中宜游击队等，共 100 余人。在宁县、正宁、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一带活动。

①平子游击队。平子游击队是正宁县榆林子文乐村青年农民何炳正等组织起义后成立的。何炳正因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不满，平时在疙拉沟水围台聚集 10 多名青年，利用晚上习拳练武，准备以后干一番事业。1933 年 9 月 22 日，正宁县民团 5 名团丁到文乐村抓逃兵李维祥，李闻讯逃走，团丁们便把李的两个叔父抓起来，吊在圉架上拷打，逼着要人。何炳正得到这个消息，回村一面布置李家对团丁酒肉招待。一面进行了夺枪的准备。乘着团丁们东倒西歪躺在炕上吸大烟的机会，一拥而入，收缴了 5 支长枪，并杀死 5 名团丁。事件发生后，正宁县民团惊慌失措，派人封了何家的大门，并计划血洗文乐村。何炳正等在家乡难以立足，遂带领其侄子何满福等 10 余人到宁县平子原活动，后到合水固城川一带，打富济贫，人员发展到 30 多名。不久，他们与红二十六军取得联系，刘志丹对他们的举动表示赞赏，并讲述了许多革命道理，赠送一些枪枝，命名为平子游击队，何炳正(后为刘玉才)任队长，派张策(后为殷云山、郭秉坤)任政治指导员，要他们仍回正宁山区开展游击活动。1934 年 2 月，三路游击指挥部将平子游击队改编为第四支队。1934 年秋，四支队发展到 200 多人。当年冬季，抽调 100 余人编入红三团为三连，何炳正任连长。1935 年春，四支队又抽调大部分人员参加组建了红一团，为一连。

②宁县三支队。宁县三支队是半坡暴动后组建的。何炳正领导夺取国民党团丁枪枝，成立红军游击队走上革命道路的举动，深刻影响着宁县平子一带的贫苦农民。在正宁湫头、三嘉原一带，三路游击队组织群众打土豪、分财物，革命运动轰轰烈烈，使平子一带的贫苦农民进一步看到了希望，认识到只有起来斗争，才有出路。半坡村农民刘永培、刘玉才、杨兴才、王占义等，为了反对当地土豪劣绅赵新玉的残酷剥削压迫，联系正宁县永正西堡住青年王清殿，接过红军游击

队的政治口号，秘密组织六七十人打富济贫，与土豪劣绅作对。1934年11月初，他们在正宁四支队的帮助下，一举杀了赵新玉、赵老五兄弟俩，拉出40多人，到正宁湫头投奔红军。他们的举动，受到三路游击指挥部负责人张仲良的赞扬和欢迎，遂将暴动的农民队伍抽出20多人编入正宁四支队，其余编为三路游击队第三支队，任命王德宽(后叛变)为队长，李士新任政治指导员。与此同时，宁县三支队成立了中共支部，刘永培任支部书记。三路游击指挥部给宁县三支队补充了5支步枪，指示他们仍回宁县平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宁县三支队先后在柴桥子、黄陵上畛子、鸭子等地游击。曾经大闹平子镇，处决了敌人的3名情报人员，平毁了敌碉堡；与正宁四支队配合，攻克梁掌堡，消灭敌民团60余人，缴枪50余支，处决了民团头子庞老五。1935年春发展到80余人，抽调30多人编入红一团。到1935年冬，全队编入关中独立一营。

③回民游击队。回民游击队是一支少数民族革命武装。在正宁县的龙嘴子、西渠两乡聚居着300多户、2000多名回民群众。他们多是不堪忍受剥削压迫，从陕西商洛和甘肃平凉逃荒到这里来的。在陕甘边区革命浪潮的推动下，1935年后季，由王世平、马彦林等19名回族青年组成了一支武装，取名叫“回民支队”，后被改编为三路游击队第十六支队，王世平任队长，王世英任政治指导员，共20余人枪。回民游击队经常与其他游击队配合开展活动，为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贡献。以后大部分人员编入红一团四连。

三路游击队在开展游击活动中，从实际出发，紧紧依靠群众，发挥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采取灵活的战术，集中以进攻敌人，分散以骚扰诱惑敌人，积小胜为大胜，迅速打开了局面。先后配合主力红军消灭了王郎坡民团，在三里原消灭了敌何高侯部2个连，集中4个游击队消灭了产场民团。组织策应了耀县民团、国民党军队六十一师杨步飞部驻湫头侦察排各数十人的起义。游击队的组织和战斗力不断加强，到1934年秋，发展到14支游击队，人数枪枝扩大四五倍。以后又相继组建了宁县一支队、正宁五支队、八支队、二支队、三支

队、十七支队、新正特务队、底庙游击队、北后游击队、宁县十八支队、二十支队等。1934 年冬季，正宁四支队抽调 100 多人，编为红三团三连。另外，从其他游击队抽调部分队员，与彬县民团起义部队王富贵部一起，编为红三团四连。1935 年春，又以三路游击指挥部特务队为基础，抽调其他游击队部分队员，组建了红四十二师第一团，进而在更广阔的区域内开展游击战争。三路游击队的活动，为开辟陕甘边南区打下了基础。

2、红一团的组建。1934 年秋，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军委在正宁湫头会议决定，以第三路游击队为基础，组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第一团。1935 年 2 月，红一团在淳化马家山正式成立，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红一团以三路游击指挥部所属特务队、四支队为主，并从宁县三支队、正宁五支队抽调部分人员组成，编为 2 个连，共约 200 余人。

红一团成立后，与三路游击队配合，主要在陕甘边南区活动。1935 年 4 月 1 日，瓦扇子战斗中受到损失，团长陈国栋负伤离队，政委张仲良调离，陕甘边区军委派黄子文代理团长，张文华任政委。以后，寇金财、贾文义等先后任团长，郭炳坤等曾任政委。红一团经过一个时期的发展，组建了 1 个骑兵连。后来又以正宁回民支队、彬县民团起义部队为基础，组建了第四连。

随着人员的不断增加，战斗力逐步提高，活动区域越来越大。曾在淳化马家山消灭敌民团郭日五部 100 余人；施计赚开底庙城，全歼守敌 36 人；在九龙川消灭敌三十五师部队 1 个骑兵排。1935 年 7 月，与骑兵团在富县羊泉原会合，在富县、宜君、黄陵一带活动，消灭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共同消灭了黄陵县隆坊原杨相之民团，一度控制成榆公路宜君至洛川段。中旬，曾去白水、合阳、澄城、韩城一带活动。同年冬，参加了直罗镇战役。红一团作为主力红军，为巩固、发展、保卫陕甘边南区做出了重要贡献。1936 年 5 月，被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九军。

(三)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改编。30 年代初，陕西黄龙山区有以贾德功、梁占奎为首的绿林武装 2000 余人，贾德功自称师长，梁占奎自称团长。梁部营长郭宝珊，出身贫苦，自幼逃荒要饭，拉过长工，当过矿工。因国民党当局的剥削压迫，家破人亡，走投无路，是被“逼上梁山”，当上山大王的，其部自称义勇军。

自 1931 年后，郭宝珊就受到陕甘边区革命斗争的影响，刘志丹曾多次给他写信、捎话做工作，争取他弃暗投明。所以，郭宝珊开始首先做到不伤害红军，以后进而掩护红军伤病员。1934 年夏，刘志丹派黄罗武去黄龙山，再次动员郭宝珊参加革命。郭宝珊此时一方面向往革命，同时又怕蹈杨谋子覆辙，犹豫不决。

1934 年夏秋，国民党十七路军的杨志恒部威逼利诱贾德功、梁占奎。10 月，贾、梁率部 2000 余人开往庆阳，接受杨志恒收编，郭宝珊营同行。途经合水太白时，陕甘边区军委派人与郭宝珊联系，并送去补给品以示慰问。在红军的感召下，郭便通过哥老会关系给红军捎信，表示愿接受改编。当这支部队到合水城关时，刘志丹又派军委供给部长马锡五前往接头，又送去马匹和其它礼物。贾德功、梁占奎部队到达庆阳，杨志恒部队已撤离陇东。国民党军队六十一师杨步飞部、三十五师马鸿宾部派 3 个旅的兵力，将庆阳包围，迫其接受改编。在这种情况下，郭宝珊率本部 1 个连于 11 月 26 日起义，绕道环县兴隆山进入庆北苏区，驻扎柔远城子。庆北苏区党组织负责人马仰西亲自去接头，并派人去南梁汇报。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红三团、骑兵团到柔远城以南接应掩护。12 月 16 日，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在荔园堡召开欢迎大会，并宣布将郭宝珊部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派任浪华(后为黄罗斌、马佩勋)任政委。西北抗日义勇军编 8 个大队，归红四十二师指挥，但初期的军事行动、行政管理和后勤供给曾经是独立的。

西北抗日义勇军改编以后，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四十二师党委，选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到该部做政治工作，帮助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并给指战员戒烟治病。边区政府发动群众给送猪、羊、瓜、菜，进行慰

问，对他们鼓舞很大。刘志丹等领导人对他们推心置腹，以诚相待，使他们逐渐消除了疑虑，取得了相互信任。

驻扎庆阳城的贾德功、梁占奎部队，2月12日受到国民党三十五师一〇三旅马玉麟部攻击，兵败城陷，贾德功被打死。2月11日，梁占奎、史老么率部突围来到庆北苏区，后到达二将川，被红二十六军改编为独立军，受西北抗日义勇军指挥。史老么因不愿受革命纪律约束，率骑兵部队叛逃三边。梁占奎不愿接受郭宝珊指挥，私下进行策反活动，4月上旬被红军部队镇压，队伍被遣散，一部分参加了红军，被编入西北抗日义勇军。

西北抗日义勇军在以后的减员补充中，逐步增加了不少青壮年农民，也精减了少数年龄偏大、思想不健康的老兵，使部队成份发生了很大转变，随着官兵思想觉悟的逐步提高，陆续吸收了一批党员，郭宝珊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各大队都建立了党支部。在党的领导下，这个部队逐步成长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革命队伍。

西北抗日义勇军在陕甘边时期曾参加了五蛟魏家疙瘩、黄大原田岷岷、柳村原战斗。后与红三团去陕北，被编入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大小10余战，为粉碎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开辟西北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

1935年9月18日，红十五军团成立时，西北抗日义勇军与红二团合编为七十八师二二四团。

(四)红三团的发展壮大。红三团作为红四十二师主力部队，转战南北，在开辟陕甘边苏区、反对国民党军事“围剿”的斗争中，经历大小数十次战斗。早在1933年11月中旬，曾与骑兵团配合，在宜君杨家店子消灭敌八十六师五一一团1个连；1934年1月，曾南下淳耀开展游击活动。3月，与骑兵团配合作战，先后在姚曲、大石板、五里镇歼敌民团100余人，接着挥师北上，在蔺家砭消灭张廷芝新兵营100余人；在崖窑消灭敌1个骑兵连；在元城赵梁子，消灭谭世麟部1个骑兵连。在西华池全歼敌王子义团两个营又1个机枪连，毙伤

俘敌 600 余人，粉碎了敌对陕甘边苏区和红军的大规模“围剿”。5 月初，在淳化三里原全歼敌何高侯部 2 个连。中旬，在正宁五顷原、高凤坡一带与敌马弘章骑兵团苦战失利。6 月初，红三团在马子川打垮了敌高雨亭营和保安县民团的进攻。8 月初，红三团随谢子长北上陕北，与陕北游击队共同作战，先后在金吴塌、张家圪台、河口等战斗中担任主攻，消灭敌人数百名，粉碎了国民党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围剿”，保卫和发展了陕北苏区。11 月，回到庆北苏区，接应掩护郭宝珊起义部队，帮助西北抗日义勇军的改编。1935 年 1 月，与西北抗日义勇军、二路游击队共同拔除了五蛟魏家疙瘩谭世麟部的据点。在柳村原与国民党三十五师一〇五旅部队战斗，受到损失，王世泰负伤，后由吴岱峰代理团长。4 月，红三团与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在寺儿畔歼敌 1 个连。5 月 1 日，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汇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亲自指挥下，进行反“围剿”斗争。参加了杨家园子、马家坪、张家圪台、延长、兴隆寨、李家塌、靖边等战斗。红三团在 1 年多的战斗中，不断得到地方游击队的补充，扩编为 4 个连，越战越强，为西北根据地的创造和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

1935 年 9 月 18 日，红十五军团成立，红三团被编为七十八师二二二团，王富贵代团长，黄罗斌任政委。

(五)骑兵团的发展壮大。骑兵团是西北最早的骑兵部队。莲花寺整编时，只有 2 个连队，因马匹很少，二连为步兵。1933 年 11 月参加了杨家店子战斗。12 月，在荔园堡消灭了张廷芝部 1 个新兵营，在阎洼子、新堡、大沟门、赵沟门消灭了敌民团，为南梁苏区的创建扫除了障碍。1934 年 2 月，张秀山任骑兵团政委。骑兵团与红三团南下淳耀，开展游击活动。3 月，参加了姚曲、大石板、五里镇、蔺家砭、崖窑、元城、赵梁子、西华池等战斗。随着马匹的增加，组建了第三连。5 月，参加了三里原、高凤坡战斗。之后，高锦纯继任政委。6 月上旬，骑兵团在杨森师长率领下，北上安定地区，同陕北游击队会合，给陕北游击队送去一批军用物资，并活动一段时间。随后，

巧取高桥寨子，消灭安塞民团 30 余人。在交道原，歼灭陕军 1 个连。在吴旗，消灭张廷芝部队 30 余人。10 月，与赤安游击队配合，在吴堡川歼灭陕西警备二团一部。11 月 16 日，长途奔袭曲子镇，歼敌 100 余人。接着参加了楼坊坪战斗。1935 年 1 月，长途奔袭长武县城，歼敌民团一部。2 月上旬，东进延安，在当地游击队的配合下，开展游击活动。中旬，在高桥川口，诱歼敌五〇一团二营及延安民团 100 余人。在杜甫川，消灭延安南川三十里铺民团数十人。下旬，先后在松树林等地消灭甘泉县、金盆湾民团百余人。袭击临真镇，歼敌民团百余人。从而开辟了陕甘边东区。8 月上旬，回到南梁苏区，接着参加了柳村原战斗，团长赵国卿负伤，康健民继任团长。5 月中旬，东进甘泉、宜川一带，在绛头原屯石岵岷消灭敌宜川县民团 160 余人。主力兵团延长战斗后，缴获战马 100 余匹，拨给骑兵团组建了骑兵第四连。6 月初，曾攻打宜川县城，未果。接着挥师南下，在洛川、宜君、白水交界的观音堂镇消灭敌民团一股，在澄城消灭敌民团 50 余人，在合阳甘井镇歼敌民团 60 余人，并在韩城一带打土豪、分财产，筹款万余元。随后，沿黄龙山转回下寺湾。7 月上旬，骑兵团二次南下，在富县羊泉原与红一团会合，消灭黄陵县隆坊原杨相之民团，并在富县、黄陵、宜君一带活动，消灭地主武装，摧毁反动政权，开辟洛川、黄陵、宜君游击区。中旬，与红一团在白水、澄城、韩城等地活动一段时间后，返回下寺湾。骑兵团在陕甘两省东荡西杀，南征北战，为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5 年 9 月 18 日红十五军团成立，骑兵团被编为军团直属部队，康健民、高锦纯仍任团长、政委。

五、红二十六军保卫苏区的斗争

红二十六军从诞生之日起，就处于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之中。这种“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从来没有间断过，很难用次

数来分别叙述。红二十六军也正是在这种“围剿”与反“围剿”斗争中成长壮大起来的。广大红军指战员浴血奋战，足迹遍及陇东、关中和陕北各地，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这里仅将红军保卫陕甘边苏区和

(一)保卫陕甘边苏区的战斗

1、1934年2月—4月的反“围剿”斗争

包家寨会议后，创造苏区的活动顺利开展，经过3个月的努力，苏区和游击队有了很大发展，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在南梁成立。国民党当局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立刻部署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命令王子义团、仇良明团及谭世麟的民团军从正面进攻，驻耀县干部团、特务团、旬邑何高侯团、洛川冯钦哉部1个团以及延安张瑞卢团陈兵堵截。当时，红军反“围剿”的部署是：三路游击队牵制、扰乱、袭击南线之敌，红四十二师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打击与消灭正面进攻之敌。3月，红军主力部队从耀县出发，相继在姚曲、石板、五里镇、店头、蔺家砭、崖窑打了几仗，消灭大量敌人，接着进入陇东地区，取得高桥、元城、赵梁子、西华池战斗的胜利，九战九捷，彻底粉碎了这次“围剿”。

①高桥拉豪绅。高桥位于元城张川，与吴旗的崖窑只一山之隔。国民党庆阳县第四自治区区长高明山的家就住高桥，是当地有名的大豪绅。3月27日晚，红军在崖窑侦知高明山次日要给其父过周年，有几个地主也将去送礼。红军派了几个侦察员化装成“要饭”的，混入高家，控制了3处大门。大部队到来时，侦察员们掏出手枪堵住大门，未费一枪一弹，便抓获了高明山等5个豪绅地主。高家所备丰盛的酒席成了红军的午餐。

②赵梁子战斗。红军在高桥拉豪绅后，接着到达元城，消灭了驻守元城寨子的谭世麟部民团，缴获步枪10余支及其它物资。随即沿川南下。当时，谭世麟的民团军司令部驻刘家堡子，石砌堡寨非常坚固。隔河相望，赵梁子驻谭部1个骑兵连。红军决定消灭这股骑兵。首先派部队包围了刘家堡子，断其援兵。红军骑兵团直趋赵梁子，发

起凌厉的攻势，将该骑兵连全歼，击毙敌连长郭××，缴获战马 40 余匹、枪数十支。

③西华池战斗。赵梁子战斗后，红军经五蛟、庆阳南庄、合水赵家原，于 4 月 2 日午到达西华池。师部及三团驻北城，骑兵团驻东门外骡马店，二路游击队驻城东沟畔。部队正在休息，准备做饭，敌王子义团的两个营及 1 个机枪连共 700 余人，在一名团副率领下，尾追而来。王子义团是调来庆阳接赵文治团“围剿”红军的主力，四处追寻红军。4 月 1 日晚赶到合水城关，第二天又赶来西华池。该团没有同红军打过仗，十分骄横，带着很多绳子，准备捉红军请赏。

西华池镇处在东西两侧临沟、南北狭长的原面上。当王子义团到西华池附近时，即被二路游击队发现，红四十二师师长刘志丹与红三团团长王世泰一起登城瞭望，见敌在 500 米以外，排成两路纵队扑来。刘志丹根据敌情和地形特点，立即部署战斗。命令红三团正面迎击，骑兵团侧面迂回。红三团两个步兵连隐蔽在北门外一条横向壕坎下，先锋队压在北城墙上，准备掩护主力冲锋。骄横的敌人直到离红军阵地 200 米远才散开队形向红军开火，红三团立即还击。此时，骑兵团大部分下沟饮马尚未上原。一连一排长李守成见情况紧急，率全排战士冲向敌阵，但由于敌火力太猛，冲锋未能奏效，李守成阵亡。红军冲锋受阻，敌军就狂呼乱叫着向前扑。骑兵团全体集合后，迂回敌侧后，切断敌之退路；二路游击队从东沟畔向敌攻击，红三团也发起冲锋。敌在红军部队三面夹击之下，失去指挥，乱了阵脚，迫击炮还未及从马身上卸下来，重机枪也未及架起，就被压迫到西北角的沟里，人马自相践踏，鬼哭狼嚎。整个战斗只 1 个多小时就结束了。除敌团副带少数人逃跑外，共毙俘敌 600 余人，缴获德国造马克沁重机枪 2 挺，八二迫击炮 2 门，炮弹数十箱，长短枪 600 余支，骡马 50 余匹。红军只伤亡数人。这一仗，红军歼敌之多，缴获之丰，都是空前的，是红四十二师成立以来的一次大胜利。

2、1934 年 5 月一 7 月的反“围剿”斗争

国民党当局 1934 年 4 月“围剿”失败以后，紧接着于 5 月初又部署了新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杨志恒部仇良明团的骑兵团配合谭世麟民团军由庆阳出发向南梁一带进击，冯钦哉部 1 个团由富县直罗镇、黑水寺及杨家店、转角方向拦截，张子英团向西，邢团向马栏、转角方向进攻，何高侯团由淳化、土桥出击，并调马弘章骑兵团驻山河封锁西路，总兵力约 1 万余人。5 月中旬，红军主力转外线作战，仇良明、谭世麟部队占领南梁，所到之处，无所不为。在南梁杀害干部群众 6 人，活埋 24 人，烧毁民房 40 余间，毁环窑洞数百孔。小河沟、老庄河一带群众的牲畜羊只全被赶走，财物被抢劫一空。面对敌人的残暴，苏区人民团结一致，坚贞不屈，采取各种办法困扰敌人，保护干部，保护军用物资，进行英勇的反“围剿”斗争。红四十二师在外线，先后取得三里原、王郎坡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的“围剿”。

①三里原战斗。西华池战斗后，红四十二师部队南下三路游击区，在耀县打下黄堡寨子，筹到一大笔经费。在十里原、马家山活动期间，获悉敌何高侯的两个连从土桥去淳化，即将路过三里原，遂决定消灭这股敌人。骑兵团和三路游击队从三里原由两侧包围敌人，红三团从马家山跑步投入战斗。当敌发现被红军包围时，已无法逃跑，遂龟缩进甘家嘴村一个场院里负隅顽抗。红军战士经过奋勇冲杀，终于占领敌阵地，全歼敌两个连。这次红军也伤亡三四十人，杨森政委带头冲锋，也负了伤。

②智歼王郎坡民团。王郎坡寨子位于湫头镇西北，东、西、北三面临沟，地势险要。寨内驻敌民团 20 余人，团头赵世坤十分反动，凭坚固工事与红军作对。1934 年 5 月，骑兵团为拔掉这颗钉子，采取了引蛇出洞的办法。首先派骑兵团埋伏在由湫头去三嘉的要道——石炭沟口；同时，派几名战士潜入湫头镇周大海家药铺，假装行劫，拿走一些零碎东西，又拉了另一家的毛驴。然后，让周大海去王郎坡找赵世坤“报案”，纵容赵率队前往追捕。不可一世的赵世坤果然上钩。立即率民团全部出动，沿路向三嘉原方向追击。追至石炭沟口，被预

伏红军全歼。赵世坤被活捉，处决于三嘉原狼牙洼。

③高凤坡战斗。红四十二师从三里原战斗缴获的文件中了解到敌欲围歼红军于小关中的企图后，紧急命令部队转移北上，迅速跳出包围圈。部队从淳化马家山出发，向石底子前进，红三团为前锋，负责打开北上通路，骑兵团断后，掩护突围。走不多远，部队就被马弘章团骑兵咬住，紧追不舍。红军边打边撤，一夜行军 100 多华里，次日晨到达南邑。刚停下休息，准备造饭，尾追之敌已赶到。骑兵团且战且退，混乱中与敌骑兵混在一起，冲乱了步兵队形，致步兵火力难以展开。红三团团长王世泰领 1 个排在五顷原西侧山岭阻击，掩护大部队转移。在弹药将尽的情况下，钻进茂密的森林。摆脱了敌人。红三团先锋队在高凤坡阻击敌人，打得英勇顽强，终因众寡悬殊而后撤。大部队撤到雕翎关，又遇敌人堵截而激战 1 天。这次战斗打得非常激烈，红军部队受到很大损失，阵亡 30 多人。其中先锋队牺牲人数最多，有的重伤员钻进梢林无人救护而死去；有 20 多名红军被俘，残暴的敌人竟将他们活埋在山河城老爷庙里。红军仅有的迫击炮、重机枪也丢掉了。战后，红军部趴在五顷原、石底子、上畛子等地边休整边收容失散人员，到了和尚原，基本集齐。当地群众把阵亡的红军战士掩埋在高凤坡上，并到梢林里寻找负伤战士，表现了军民鱼水情深。红军排长张治忠(耀县寺沟人)，被救回住在张安子范思明家中养伤，直至伤愈归队。

④马子川战斗。南梁会议之后，刘志丹率红三团到达保安县马子川。一天清晨，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张子英团高雨亭营和保安县民团，趁大雾向红军突袭。红三团因一时敌情不清，遂一边还击，一边向十里山梁撤退。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 4 时，始终未能摆脱敌人。敌欲以正面进攻拖住红军，另组织了百余人的“敢死队”，从红军侧后迂回，企图截断红军退路。面对严重敌情，刘志丹、王世泰决定，控制山头，先打“敢死队”。在连续打退敌 8 次冲锋，当敌发动第四次进攻时，红军组织了反冲锋，一、二连从左右两侧突然出击，少年先锋队从正面压下去，成束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敢死队”顿时

土崩瓦解。此战红军共打死打伤敌四五十人，缴获枪枝一批。红军打垮了号称“铁军”的高雨亭营，在陕甘边区树立了声威。

⑤智取高桥。红三团在马子川活动的同时，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率骑兵团北上陕北，与谢子长领导的陕北游击队会合，介绍陕甘边区革命斗争形势，并给陕北游击队送去一批军用物资。同陕北游击队一起活动一段时间后回兵陕甘边。在回兵途中，智取了高桥。安塞县境的高桥山寨建在陡峭的山崖上，崖下是深深的壕沟，寨门吊桥平时高高吊起。安塞县民团驻守在寨子里，依仗地形险要，工事坚固，处处与红军为敌，骑兵团获悉延安民团团总杨××要往高桥视察，这位杨团总安塞县民团尚无人见过，遂决定智取。挑选了13名精明强悍的干部战士，由身材魁梧的二连一排长柴正祥扮“杨团总”，身穿兰大褂，头戴礼帽，架一副墨镜，带着提牛皮公文包的“师爷”和斜背驳壳枪的“护兵”，10名“团丁”全都荷枪实弹。上午10时，“杨团总”一行13人大摇大摆来到高桥寨下。安塞民团看到杨团总提前来视察的“介绍信”，立刻放下吊桥，列队出迎。“杨团总”一行进了寨门，突然枪声大作，看守寨门的哨兵被打死，吊桥被拉起，寨门被关闭，敌民团全部暴露在山寨门外。顷刻，预伏在山寨周围的骑兵团战士一齐冲出，寨内寨外一齐动手，迅速解决了战斗。这一仗，打死打伤敌30多人，全歼安塞县民团，活捉躲在山寨的大土豪3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战后，骑兵团烧毁了山寨，押着土豪，驮着缴获的物资，浩浩荡荡地离开安塞。

⑥交道原战斗。1934年夏末，杨森师长率骑兵团路经洛川北交道镇。镇上驻有国民党四十二师1个步兵连，约90余人。杨森师长决定消灭这股敌人。中午，骑兵团到了镇子附近，敌人还未察觉。经骑兵团一个猛冲，敌仓惶四散逃命。红军四处追击，毙伤俘敌甚多。战后，把三四十名俘虏全部释放，换下了俘虏的军装备用。

3、1934年10月—11月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夏季的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甘边苏区得到进一步

巩固和发展。红军游击队也得到进一步发展壮大。国民党当局于是又部署了新的“围剿”。这次是采取分兵蚕食的办法，逐步向中心区域推进。投入的兵力有：三十五师骑兵团、陕西警备骑兵团二、三团，二五六旅五一二团，甘肃警备二旅六团。这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主力骑兵团在吴堡川，打了敌人一个伏击战。随后，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长途奔袭曲子镇。红二团、骑兵团攻打楼坊坪，取得了反“围剿”斗争的胜利。

①奔袭曲子镇。曲子镇是国民党环县县政府所在地，城内驻环县民团百余人，另有县保安队 20 余人。民团团总李恒泰、保安队长崇敬义极其反动，他们加紧训练，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陕甘边区军委了解到上述敌情，决定派骑兵团与庆阳游击队配合，长途奔袭曲子镇。骑兵团于 11 月 15 日由南梁出发，在悦乐附近与庆阳游击队第三、四中队会合，共有步骑兵近 300 人。骑兵团长赵国卿、政委高锦纯及庆阳游击队负责人张秀山等在悦乐召开了军事会议，制订了具体作战方案。红军部队连夜出发，途中消灭了庆阳县孙家湾子民团，缴枪五六支。骑兵团一连一排在排长柴正祥的带领下，提前到达曲子，压马后化装进城。大部队 16 日拂晓前赶到曲子，天亮发起猛攻，预伏红军也拔出手枪，投入战斗。敌民团保安队有的还在熟睡，突遭袭击，乱作一团，稍事抵抗就四散逃走。团总李恒泰被堵在群众家中活捉，保安队 20 多人逃到曲子镇北打瓜洼山上，被红军包围俘获，战斗进行半个多小时即胜利结束。这次战斗，击毙了国民党曲子区长朱文成，俘敌李恒泰、崇敬义以下近百人，缴获战马 10 多匹，长短枪五六十枝，子弹及其它物资一批，红军无一伤亡。战斗中国民党环县县长郑致中等要员化装逃跑。战斗结束后，红军在曲子镇召开了群众大会，公审并处决了李恒泰、崇敬义等 3 人。缴获的粮食和衣物，一部分分给了当地群众，抽出部分武器弹药武装了庆阳游击队。当晚，红军部队撤离曲子镇，回到南梁。

②楼坊坪战斗。楼坊坪在白豹川口，驻守着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团第二团张廷芝部 200 多人，装备精良，有许多好枪好马，且很能打

仗。红四十二师决定派红二团、骑兵团在二路游击队的配合下围攻该敌。11月的一天早晨，红军部队包围了敌驻地，并把敌人压在窑洞里。由于红军装备很差，子弹很少，杀伤力不大，不能给敌以歼灭性打击。敌欺红军火力不足，凭借精良的武器弹药，冲出窑洞。红军顶不住退了下来，一直撤出二三十里，才摆脱敌人。这一仗，红军伤亡四五人。战后，在黑老虎塌洼总结教训，刘志丹在全体军人大会上承担了指指挥不当的责任。

4、1935年春夏的反“围剿”斗争

1935年春，蒋介石调陕西、河南、山西、宁夏、甘肃5省军阀部队4万余人，对陕甘边、陕北苏区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围剿”，其兵力部署是：三十五师马鸿宾部的3个旅(加上甘肃警二旅六团)共7个团分别进驻曲子、庆阳、合水，布成新月形战线，向南梁地区推进；胡宗南部第六十一师6个团分别进驻旬邑、宁县、正宁一带，楔入南梁、照金之间待机；杨虎城部四十二师4个团摆在宜君、中部、洛川、富县、甘泉一线，固守咸(阳)延(安)大道，作为战略警戒。八十六师井岳秀部以3个团进攻神府苏区。八十四师高桂滋部以4个团进攻安定苏区。

1935年2月5日，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硷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根据会议决定，于2月18日发布反“围剿”斗争动员令，详尽部署了反“围剿”斗争的军事行动，即红军集中优势兵力，首先打破高桂滋八十四师的防线，而后向南向西发展，以便将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连成一片，巩固扩大革命根据地。为了有效地打击敌人，红四十二师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作战；红一团在淳耀一带御敌，牵制六十一师；红二团在完成阻击三十五师的任务后，向环县三边发展；骑兵团相机东进宜川，积极向韩(城)合(阳)游击；留当地游击队坚持内线斗争；暂时放弃南梁，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机关转移到洛河川。

1月15日，国民党三十五师由宁夏出发，兵分两路：一路经中卫、环县、曲子进抵悦乐一带；另一路经固原、西峰镇、庆阳，进驻柳村原一带，2月21日，占领庆阳、新堡、悦乐、元城、柔远等地。敌人这次“围剿”采用堡垒战，到达苏区后，一面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建立所谓“战略村”，企图切断红军游击队与群众的联系，一面选择有利地形，构筑工事，修筑碉堡。仅在新堡、悦乐、五蛟、柔远、白豹等地，就修筑碉堡25座。在双方力量悬殊的情况下，红二团、二路游击队及赤卫军，采用疑兵之计，组织了有效的抵抗，在老爷岭的山头上搭了许多毛毡帐篷，密林中竖起许多红旗。白天，游击小组高举红旗四处游动，夜间，漫山遍野点燃篝火，并不断派出小股部队袭扰敌人，迫使敌大部队在老爷岭以西滞留达1月之久。

4月13日，敌三十五师部队占领二将川、荔园堡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驻地寨子湾。并派500多人紧紧追剿转移中的特委、政府机关工作人员。4月16日，在豹子川、白沙川交界的张岔岭上，政府工作人员被包围，赤卫军副总指挥兼参谋长梅生贵奉命阻击。最后只剩下他1个人，仍坚持战斗，打退了敌4次冲锋，掩护同志们脱险。终因负重伤被俘，壮烈牺牲。

在敌“围剿”期间，苏区人民坚壁清野，将粮食、灶具埋藏，把牛羊赶进山林隐蔽起来，敌人找不到粮食，就到处搜山，烧山，向山林开炮，逼使一些群众不得不回到家中。敌人对群众严刑拷打，企图得到红军、游击队及政府工作人员的去向。并贴出告示，宣称：抓到习仲勋“赏白洋2000块，马2匹”，抓到贾生秀“赏白洋1000块，马1匹”。苏区人民千方百计保护干部，使敌一无所获。敌为了彻底摧毁苏区，实行法西斯保甲制度，将南梁苏区中心区域的南梁、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全部烧毁，所有村庄变成一片废墟，还拉去壮丁200余名。

反“剿围”开始，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等在五蛟魏家疙瘩消灭了谭世麟民团军的两个连。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等在黄大原田岷岷消灭三十五师骑兵团1个连。红

三团、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柳村原与三十五师 1 个团激战，从而阻滞了敌人前进。随后，红三团与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与陕北红军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进行反“围剿”作战。红二团在桥河吴家窑子与三十五师骑兵打了一仗，北上三边地区活动，骑兵团则在长武战斗后，到东区活动，红一团在南区击敌。红军部队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终于粉碎了敌人进攻。

①魏家疙瘩战斗。五蛟魏家疙瘩驻国民党陇东民团军谭世麟部崔凤阁连，经常外出骚扰百姓，破坏革命政权。为巩固苏区，红四十二师决定拔除这个据点。1 月下旬，红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率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在庆阳游击队的配合下攻打崔部驻地魏家疙瘩山寨。由于这个山寨地形险要，加之红军无攻坚武器，强攻难以奏效，遂采取围困的办法。经过五六天的围困，敌因断水而军心动摇，趁夜假装投降企图突围，被全部消灭在山寨之外。在围困期间，谭世麟曾派张勤劳连增援，亦被红军消灭。此战共俘敌近 100 人，缴枪 80 余支及其它大批物资。

②奇袭长武城。长武县城位于陕甘交界的西兰公路上，是西安通往兰州的咽喉要道。城里驻有敌自卫团 120 多人，另有文职人员数十人。为震慑敌人，牵制“围剿”兵力，并获取给养，红四十二师决定由杨森师长率骑兵团长途奔袭长武县城。2 月的一天下午，骑兵团从宁县九岘出发，连夜急行军 90 余公里，拂晓到达长武县城北埋伏，挑选 20 多名战士化装成卖菜的、拾粪的混入西城门。随后，20 多名化装的“国民党骑兵”跟进，再后面是大队骑兵。敌守城部队以为是自已人，未加防备。当化装的骑兵进城后，立刻与西门守敌开火，经反复争夺，大开城门，红军大队人马冲进城。城内敌军听到枪声，大部分爬上西城墙，一部分钻进西北城角的碉堡。骑兵团战士冲进县府，县长带着十几个团丁已逃进隔壁院子。这个院子是关帝庙，敌自卫团团部就设在这里，院内筑有 1 个高碉堡。敌从这个高碉堡用机枪封锁了大街。战斗进行了 1 个多小时，形成对峙局面。红军宣传员趁机在街道上刷制了大量宣传标语，在西城区没收了几家大店铺，缴获了一

部分枪枝，遂撤出城。回归途中，路经泾川，守敌闻风而逃，又拉了3个豪绅。长武一战，给敌以很大震动，《晋阳日报》曾报道说，陕甘红军5万余人奔袭长武县城云云。

③桥河杨庄科战斗。3月，红二团追歼史老么骑兵未果，返回到了桥河杨庄科，部队正在睡觉，外出侦察人员发现敌三十五师骑兵部队扑来，在报警已来不及的情况下，侦察排长王四海为延缓敌人进攻争取时间，遂带侦察人员巧妙地在两股敌人中间打了几枪，随即撤出，造成敌人前后队发生误会，互相对打起来。枪一响，正在睡觉的红二团大部队立即撤离，上了打扮梁。红军只打了几枪，但敌人自相对打却受了很大损失。

④五蛟城壕战斗。国民党当局为了“围剿”苏区，加紧组建装备地方反动势力。驻华池五蛟城壕的谭世麟民团军李含英营，也得到国民党陕西警备骑兵旅二团张廷芝部的支持，接收了一批枪弹。红军骑兵团得到这个消息，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将李含英营全部消灭，俘敌五六十人，缴获枪马一批。

⑤田岷岷战斗。2月，国民党三十五师骑兵团第二营占据黄大原。在未摸清红军虚实之前，派1个连在田家岷岷制高点修筑工事，以为退守之准备。根据敌人的驻防情况，红军决定攻打田家岷岷。3月7日夜，红军、游击队分三路由老爷岭张家湾出发，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和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从正面直插田家岷岷制高点，合水、庆阳游击队分别从小川沟、钥匙沟左右夹攻，对田家岷岷之敌完成包围。8日拂晓，战斗打响，制高点敌兵从睡梦中惊醒，仓促应战，抵抗半个多小时，被全部消灭。驻岷岷深处的敌营部及另外两个连赶去增援，被合水、庆阳游击队阻击，红军在消灭田家岷岷制高点敌人之后，与游击队合兵一处，对余敌取包围之势。狡猾的敌人发现三面被围，恐被全歼，遂且战且退，逃往悦乐。这次战斗，共毙伤敌100余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

⑥六寸原战斗。田家岷岷战斗后，杨森师长率红三团、骑兵团、

西北抗日义勇军攻打六寸原。当时，六寸原驻敌三十五师一〇五旅1个团，合水游击队情报误称1个营。红军利用夜间对敌进行围攻。敌凭借有利地形和优良的装备、充足的弹药，拼命抵抗。红军部队发起几次冲锋，均被敌火力阻止，未能得手。骑兵团在伤亡严重的情况下，被迫后撤，冲乱了红三团步兵。此时，敌主力赶到，发起反攻，致使红军部队受到了较大损失，红三团团长王世泰、骑兵团团长赵国卿均负重伤。

⑦瓦扇子战斗。3月，红一团与郭炳坤率领的六支队在宁县金村、盘客一带游击。4月1日晨，红军由湘乐川到金村原畔瓦扇子，发现金村庙有敌骑兵，即返回向北转移。当时，金村庙驻三十五师骑兵团马培清部第三营、补充营，加上正宁县保安队约300余人。当敌探明红军北撤的动向后，团长马培清率三营绕道北上盘客原，堵截红军，补充营则尾追红军下湘乐川。红军上至北山坡遭敌前后夹击。在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红一团二连连长张治怀带领全连战士抢占盘客原一处高地，阻击敌人，掩护团部及兄弟连队突围。团部及其他连队突围后，二连被重重包围，遭到猛烈攻击。二连英勇顽强，打退敌人多次强攻，击毙敌补充营副营长马占林以下10余人；但终因众寡悬殊，难以突破敌人包围。为拖延时间，以便天黑突围，佯称投降，与敌谈判条件，趁敌暂停攻击，于晚7时许分散突围。但敌有防备，双方展开了白刃格斗。经过激烈拼杀，二连除少数突出重围外，连长张治怀等30多人壮烈牺牲，27人被俘。除此而外，团部及其他连队在突围中亦有伤亡，团长陈国栋和一连指导员负重伤。瓦扇子战斗，红一团损失严重，但它表现了年轻的红军部队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品格和优秀的政治素质。部队突围后，即转移到九岷桃树庄一带休整。战后第四天，宁县办事处主任刘永培受组织派遣，从小石崖前往收容失散和受伤的战士；陈国栋、郭炳坤等被送往小石崖养伤。

⑧绛头原战斗。根据西北军委部署，在陕甘边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东迁洛河川之后，骑兵团东进到宜川一带开辟新苏区。首先在延西川高桥一带，配合肤施游击队击溃延安守敌李发福部及民团300余

人；在三十里铺，收缴当地民团 50 余人的枪枝；在松树林，将临镇民团 50 余人全部缴械，并缴获民团护送的客商货物 300 余驮；在云岩，俘敌民团 48 人，缴枪 50 余支，军服 200 余套。到了宜川北 10 余里的川里，发现绛头原上有敌人伏兵，立刻策马向原上冲去。埋伏的敌民团见骑兵攻势凶猛，调头就跑，到屯石岷岷抵抗一阵，仍顶不住骑兵团的攻击，终被全部歼灭。此战共消灭国民党宜川县民团 250 余人，敌副团长冯备三也被当场击毙。随后，骑兵团又到延长、黄陵、韩城等地活动，寻机打击敌人。

（二）参加陕北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陕甘边区红军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与陕北红军相互支援，共同对敌，为创建和保卫陕甘边苏区和陕北苏区，为创造西北革命根据地作出了卓越贡献。

1、1934 年 8 月红三团北上陕北的战斗

1934 年 7 月，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下旬，谢子长、郭洪涛率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来到南梁，同陕甘边区特委、红二十六军共商破敌大计，在南梁阎家洼子举行联席会议，陕甘边特委、红二十六军方面参加的有刘志丹、张秀山、习仲勋、杨森、高岗、张邦英、惠子俊、刘景范、龚逢春等，陕北方面参加的有谢子长、郭洪涛、贺晋年及其他游击队主要干部。会上传达了上海临时中央局和中央驻北方代表给红二十六军的两封指示信，杨森向会议汇报了红二十六军扩红和创造苏区的工作情形。会上宣读的两封信，脱离实际，无端指责红二十六军领导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逃跑主义”、“梢山主义”、“枪杆子万能”和“浓厚的土匪色彩”等错误。有人在发言中，表示拥护和赞同这两封信的观点，还把由于杜衡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而导致红二团南下失败的原因，说成是刘志丹“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刘志丹、习仲勋等在发言中阐明了事实，讲清了道理，表明上述种种指责都是不能成立的。会议决定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由谢子长兼任。会议期间，陕甘边苏区

从反“围剿”斗争的大局出发，调拨 100 支步枪和数百块银元支援陕北游击队，并决定派红二十六军主力第三团随谢子长去陕北，与陕北游击队共同粉碎国民党当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

阎家洼子会议积极的一面在于，两苏区党和红军交流了情况，共商了破敌大计，为以后两支红军的联合、两苏区的统一打下了基础。

①金吴塌战斗。根据阎家洼子会议决定，谢子长率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北上安定，8 月 17 日到达金吴塌，正值陕北军阀井岳秀部 1 个连在这里“清剿”。18 日拂晓，红军向该敌发动进攻，红三团担任主攻，陕北游击队配合，经过激烈战斗，全歼敌 1 个连 100 多人。

②张家圪台战斗。清涧南区张家圪台驻有国民党军队两个排，是国民党军队的主要据点，红三团和陕北游击队以优势兵力对张家圪台之敌发动猛烈进攻，全歼敌两个排，并占领张家圪台。国民党军队见张家圪台失守，急调驻薛家峁守敌 1 个连前来增援，又被红军击退。张家圪台之战，前后共歼敌七八十人，并缴获一批枪枝。

③河口战斗。河口镇驻国民党军队 1 个连，是清涧、延川守敌的战略支撑点，对红军游击队活动妨碍极大。应清涧地下党组织之要求，红军决定攻打河口镇。8 月 26 日拂晓，部队在谢子长的指挥下，偷袭河口镇，红三团担任主攻，从山顶直扑敌阵；陕北游击队控制黄河渡口，断敌退路，从东西两面发动攻击，敌见红军攻势凌厉，慌忙退守四五个高碉堡及村边工事。由于红军缺乏攻坚武器，虽多次进攻，终未奏效。谢子长见攻坚不克，到前沿阵地察看地形，胸部中弹负伤。当日，天下大雨，道路泥泞，给部队行动造成很大困难，鉴于短时间难以攻克，遂撤出战斗。河口守敌怕红军再来进攻，不久亦东渡黄河绕道逃回清涧县城。河口镇遂告解放，成为苏区。红军部队从清涧返安定途中，在咸榆公路上消灭押送壮丁的国民党军队二三十人，解救释放壮丁 200 多人。

红三团北上陕北，与陕北游击队协同作战，三战歼敌数百人，缴枪数百支，粉碎了国民党当局对陕北苏区的第一次军事“围剿”，9

月离开安定，回到庆北地区。

2、1935 年夏季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红二团在陕北的战斗

在 1935 年春季开始的反“围剿”斗争中，红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率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奉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的命令北上陕北，4 月中旬，在寺儿畔歼敌一一团 1 个连。5 月 1 日，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县白庙岔会师，共同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前敌总指挥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进行了一系列战斗：

①杨家园、马家坪战斗。1935 年 4 月下旬，国民党军队八十四师(高桂滋部)、八十六师(井岳秀部)各一部分另以营为单位向陕北苏区中心秀延、赤源县推进，敌八十四师二五一旅五。一团三营进驻杨家园，修寨筑堡，充当“围剿”之急先锋。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机歼灭该敌。5 月 7 日拂晓，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分 3 路向杨家圈驻敌发起进攻，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担任主攻，从黄家川、玉家湾出发，夺取墩儿山寨堡。当接近玉皇岭山寨时，发现寨墙很高，不易攀登，地形狭窄，兵力无法展开，遂决定撤退。驻敌见红军撤出战斗，分两路追击。陕北红一团撤退中，伏击并歼灭敌五 00 团 1 个连，俘敌百余人。追敌到达吴家寨，受到陕北红一、二团的进攻，遂撤至自家园后山老虎塬、圆岭等高地。为解吴家寨之危，驻守杨家园敌倾巢出动，红军乘虚占领杨家园，敌五 0 一团三营处于被红军前后夹击、四面包围之中。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先敌抢占如天山、大小塬山制高点，从左右两翼向敌阵地老虎塬发起钳形冲锋，陕北红一、三团从西南侧击敌后，经过五六个小时激战，全歼敌于泥泞沟。一天之内打了两仗，歼敌 1 个营又 1 个连，毙敌 50 余人，俘敌毒 50 余人，缴枪 500 余支，轻讯枪 20 余挺。

正当红军打扫战场，处理战后事务时，又获悉敌 1 个营护送五 00 团 400 驮军用物资由清涧去瓦窑堡，被陕北游击九支队和赤卫军包围在马家坪一带。5 月 9 日，红军主力兵团与游击队、赤卫军向马家坪敌人发起冲锋，不到两小时便结束战斗，毙敌 40 余人，俘敌 400

余人，消灭“铲共义勇队”百余人，缴获长短枪 450 支、轻机枪 20 余挺、八二迫击炮 2 门、重机枪 2 挺、单军衣 2000 余套、银元数万元以及大批医药器械。反“围剿”斗争首战胜利，红军主力兵团军威大振，士气高昂，弹药充足，装备更新，国民党当局受到极大震动，慌忙将五〇〇团驻定安老县城的第一营和延川永坪镇的第二营撤回瓦窑堡，安定县城获得解放，敌进犯秀延县、赤源县的计划宣告破产。

②延长战斗。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玉家湾会议精神，决定攻打延长县城。5 月 20 日，红军主力兵团长途奔袭张家圪台，全歼敌八十四师四九九团 1 个连。敌驻苏家岩之营派 1 个连渡无定河来援，也大部被歼。战后，红军主力兵团移驻清涧店子沟地区，摆出攻打绥德、清涧的姿态，敌八十四师慌忙进行拦截部署，红军则星夜秘密南下，到延长县大连沟一带隐蔽待机。

延长县城驻国民党八十四师直属骑兵连 100 余人，民团 200 余人，矿警队 80 余人，共计 400 余人。为诱敌出城，在运动中歼灭，陕北红一团三连和游击队到距城二三十里的东原去打土豪、分财产，虚张声势。敌民团团总李鸣吾误认为东原是红军小股游击队，便于 27 日晚带 130 多人窜犯东原。三连和游击队边打边退，诱敌至距县城百余华里的茹子峪，正当敌得意之时，红军主力突于 29 日拂晓开始攻城，迅速占领县城，全歼守敌。及至李鸣吾发觉上当，返回县城时，被红军全歼于贺家峪。这一仗，生俘国民党延长县长和骑兵连长，毙伤俘敢 400 余人，缴长短枪 400 余支、轻机枪 15 挺、无线电台 1 部、战马 100 余匹。延长解放，打开了南进的门户，延川守敌惶恐不安，弃城逃往清涧。延川遂告解放。

③兴隆寨、李家塌战斗。延长、延川解放后，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集中兵力肃清西线之敌，首先攻取安塞县境各个敌人据点。6 月 10 日，红三团和西北抗日义勇军围攻安塞县政府所在地兴隆寨。守敌 1 个连见红军攻势猛，趁夜弃城逃窜，红军活捉国民党安塞县两任县长及一些要职人员。与此同时，陕北红一团与陕北四支队攻取了高桥镇，并击溃增援的延安民团百余人，接着，红军主力兵团于 6 月

17日经过1天的攻坚战斗，占领李家塌，消灭守敌100余人。至此，解放安塞全县，使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

④靖边战斗。解放安塞后，陕北红二团返回安定，保卫工委、军委机关，红二十六军二团加入主力兵团。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用5个团的兵力攻打靖边县城。靖边驻国民党八十六师五一三团1个营400余人及县警队、民团200人。6月28日拂晓，红军发起总攻。红军攻势凶猛，守敌顽强抵抗，经过五六个小时激战，终于打垮守敌。敌营长曲子鹏见大势已去，便带几名马弁向宁条梁逃窜，被红军追击全歼。这一仗，毙伤俘敌600多人，缴获长短枪500余支、重机枪2挺、迫击炮6门。俘敌县长、民团总指挥等百余人，解放了靖边县城。保安县城守敌1个营也自知无力与红军抗衡，弃城逃跑，保安县城也获得解放。

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红二团与陕北红军组成的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历经2个月，大小10余战，连战皆捷，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6座县城，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把陕甘边、陕北苏区连成一片，为中共中央把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准备了条件。红二十六军则成长为一支特别能战斗的队伍，成为西北红军的中坚。

陕甘边苏区的创立

任愚公

陕甘边苏区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

地区共产党人领导陕甘边区人民，经过百折不挠的斗争创建起来的，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苏区。后来，她与陕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大本营。她的创建与发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占有重要的地位。

陕甘边苏区的创建，历时 6 年之久，经历了寺村原、照金和南梁三个阶段。寺村原、照金时期的创建活动《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和发展》已穿插作了简要介绍，本文侧重阐述南梁时期的创建情况。

一、苏区创建的历史条件

1、复杂的地理环境有利于开展游击战争。所谓陕甘边区，实际就是指桥山山脉中南段。北起环县定边，南到淳化耀其，雄伟的桥山山脉纵贯南北，绵延数百里。这一地区包括陕西的定边、靖边、保安、安塞、延安、甘泉、富县、黄陵、宜君、铜川、淳化、耀县、旬邑，甘肃的环县、庆阳、合水、宁县、正宁等，其地理特点是沟壑纵横，地形复杂，森林茂密，交通不便。以这里为依托，进可直逼关中，退可扼守山林，向东可进军陕北，向西可开辟陇东。历来是被压迫阶级起事成军的地方。明朱农民起义领袖高迎祥、张献忠，太平天国的残部刘四等就是从这里起家的。这一地区是开展游击战争的理想场所。

2、国民党统治相对薄弱。陕甘边区远离陕西、甘肃国民党统治中心西安，兰州，虽在两省管辖之下，但都鞭长莫及。陕北、宁夏为井岳秀、马鸿逵所统治，关中则是杨虎城的势力范围。陇东还有陈珪璋以及谭世麟的民团武装，三边。保安又有地头蛇张廷芝。陕甘边区正好是这些割据势力的结合部。这些地方军阀割据势力，各自为政，他们同属国民党杂牌，有的是反蒋的，有的是随风倒，极不统一。相互之间矛盾重重同床异梦，明争暗斗，各保实力。在对待红军态度上，各打自己的小算盘，步调不一致。有的敷衍应付，并不认真进攻，如杨虎城、陈珪璋部；有的则比较坚决，死心踏地与红军为敌，如井

岳秀、马鸿逮部。加上中过共产党在这些部队中不同程度地建立了统战工作，因而有利于红军游击回旋，有利于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3、贫苦农民有着强烈的革命愿望。陕甘边区阶级分化严重，土地高度集中。庆阳北部几道川的土地，几乎全被庆阳“八大家”“裕茂隆”(韩少文)、“恒义兴”(李子良)所占有。仅“恒义兴”一家就占地7万余亩。牛羊牲畜数以万计。有所谓“出了庆阳城，走三天不住别人家店”的说法。南梁一带69.2%的土地是地主的，67.1%的农户是佃户。这里出租土地1.8万余亩，每年收取租粮四五千石。还有雇工、商利贷等剥削，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加上军阀混战，兵匪成灾。民国以来，军阀混战对陕甘边区的袭扰从未间断，靖国军、国民军、“红头军”、甄寿山的部队等曾多次来陕甘边区抢劫掳掠，正宁县城、宁县城及宁县两、南区曾被多次洗劫。张兆铎反冯(玉群)曾以陇东为后方，为扩充军费，肆意增征田赋，索粮要款。赵文华、陈珪璋趁饥荒举事成军，数万之众踏遍陇东，为患数年之久。大大小小的土匪更是数不胜数，仅在今华池一带活动的土匪就达52股之多。这些兵匪都靠刮地皮供给，压在群众头上的捐税多如牛毛。1930年，环县的各种摊派名目有120余种。不可思议的是官府竟然强迫农民种植鸦片，以便征收“烟亩罚款”，不种者则征收“懒歉”。残酷的剥削压迫逼得老百姓走投无路，自发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1915年以张九才为首的抗税斗争席卷陇东16县和保安、富县等地，发展到数万之众。从1925年起，陕甘边区各县农民纷纷组织“红枪会”，抗税抗捐，宁县、正宁、合水连续几年都发生包固县城、“交农”罢耕事件。1928年宁县新庄王瑞珊籍哥老会举事成军，号称“宁正起义”。宁县石鼓邵三纲组织“红枪会”起义，与王瑞珊及庆阳的傅明玉联合抗粮，一时形成声势。1928年到1929年陕甘大旱，三料未收，饥荒严重，草根树皮几乎被吃光。然而，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官府的苛捐杂税依然不减，兵灾匪祸越发猖獗。庆阳、合水、宁县、正宁农民纷纷组织“镢头队”、“口袋队”吃大户，求生存。在当时的情况下，广大贫苦农民只有起来反抗一条生路，革命情绪已是一呼百应。

4、党和红军从这里发轫，植根于群众之中。陕甘边区以刘志丹为代表的一大批党和红军的干部都是在这里土生土长进而走上革命道路的，他们对陕甘边区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群众疾苦和愿望要求了如指掌。刘志丹生在保安，长在陕甘，从小目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贫苦农民的饥寒交迫，立志解救人民于水火。他对陕甘边区地理非常熟悉，素有“活地图”之称。他掌握某村某户有几孔窑洞、几盘炕、几口锅。他懂得在地广人稀的山区，群众最迫切的愿望是打土豪，分配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租，不纳粮，不派款。所以，党和红军的举措都能合民心，顺民意，从而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关系融洽，对刘志丹不称“总指挥”、“师长”，而叫“老刘”。他们把党和红军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把希望寄托在党和红军身上，因而成为党和红军发展壮大力量源泉，成为根据地创建的社会基础。

二、苏区创建的历史过程

1933年11月，包家寨会议决定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从此，苏区的创建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到1935年10月，陕甘边苏区由小到大，逐步创立，并与陕北苏区联成一片，形成西北革命根据地。这一过程历时2年，是陕甘边苏区的黄金时期。

（一）、以南梁为中心创建苏区战略思想的确立

陕甘边区党组织在组建红军游击队的同时，就已经拉开了创建苏区的序幕。但是，在哪里创造根据地，思想认识还不很明确。1931年秋，刘志丹、马锡五曾经在桥山山脉中段南梁一带作过广泛深入的社会调查，认为在这里建立根据地有许多有利条件。南梁游击队同陕北支队会合以后，部队党组织在这个问题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就按照陕西省委的指示，向南开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三原、富平、长武等为主要方向”，开展游击战争。1932年3月，陕甘游击

队在正宁县寺村原进行了创建根据地的尝试，通过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但由于国民党大兵压境，不得不匆匆离开。随后，陕甘游击队南下渭北，配合当地农民斗争，遭强敌进攻，没能站住脚；不久，奉命东进韩城，也严重失利。

在陕甘游击队内部，在哪里建立根据地，思想认识也并不很一致，斗争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韩城失利回到宇县的麻子掌，由于士气低落，思想混乱，领导层内部在行动方向问题上的矛盾表面化了。有的提出渭北的回渭北，陕北的上陕北，几乎闹到分裂的程度。是刘志丹、阎红彦坚持依托桥山，就地开展游面战争，维护了团结统一，保存了革命力量，使之得以发展壮大。

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后，在耀县照金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正当创建苏区形势发展之时，杜衡又强令红二团南下，创建渭华根据地。红二团在关中平原遭受十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的围迫堵截，几乎全军覆没。1933年夏秋，国民党当局对陕甘边区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按照省委意图创建的渭北苏区被迫放弃，照金苏区也随着薛家寨的失陷而丧失。刘志丹、谢子长等红军领导人坚持在山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正确主张，一次次被陕西省委杜衡一伙否定，并被诬蔑为“梢山主义”“上山逃跑”，予以打击排斥。“左”倾冒险主义的执行者一味强调与强敌硬打硬拼，南下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结果造成屡屡失败。实践证明，弱小的红军与强大的敌人硬打硬拼是注定要失败的，在迫近敌人统治中心的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是根本行不通的。陕甘边区红军创造根据地屡遭失败；其根本原因是陕西省委杜衡一伙执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脱离实际，脱离群众造成的恶果。

1933年7月28日，杜衡、袁岳栋在西安福盛楼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叛变投敌，陕西省委遭受严重破坏。紧接着，照金苏区丧失。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又面临着一个失去上级领导和无处立足的困难局面。在哪里建立根据地，这个始终未能得到很好解决的根本问题又一次被提了出来。

实际上。陕西省委被破坏，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陕甘边区党和红军的统治；根据地丧失，促使党和红军的领导者认真思考一些问题。他们从陕甘边区的实际出发，总结了几年来开展游击战争和创建根据地的经验教训，清醒地认识到在以南梁为中心的桥山山脉中段建立根据地，地形复杂，森林茂密，进可攻，退可守，回旋余地大。特别是远离国民党统治中心，创造根据地有许多无可比拟的优越条件。在取得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红军临时总指挥部采纳刘志丹的建议，决定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战略方针转移的问题。1933年11月3日至5日，会议在合水县包家寨子召开，陕甘边区特委书记秦武山、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总指挥王太吉、政委高岗、参谋长刘志丹等参加。会议总结了几年来发展游击战争和创造苏区的经验教训，排除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统一了思想认识，作出了正确的决策：撤销陕甘边区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恢复红二十六军，成立红四十二师；建立三路游击区，第一路以安定为中心，第二路以南梁为中心，第三路以照金为中心；③建立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包家寨子会议摆脱了陕西省委“左”的束缚，作出了战略重点由南向北转移的正确决策，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西北共产党人运用革命理论解决当地实际问题的具有战略意义的会议，是陕甘边区革命斗争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

（二）、苏区创建的历史过程

陕甘边苏区的创建，依时间先后，并考虑到地缘关系，分作南梁苏区、陕甘边南区、陕甘边东区三部分分别叙述如下：

1、南梁苏区的开辟。南梁苏区即中心苏区，包括与之相联的保安、庆北、靖边等地。这是在边区党政军机关直接领导下最先开辟的苏区。

①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包家寨会议后，陕甘边区党和红军先后派张策、习仲勋到南梁地区开展群众工作。他们深入到白马庙

川、玉皇庙川、荔园堡川、小河沟一带贫苦农民当中，热情宣传革命道理，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各种群众团体。与此同时，红四十二师部队利用战斗间隙，以连排为单位开展群众工作，帮助组建游击队、赤卫军，武装群众。经过一段艰苦细致的工作，广大贫苦农民认清了国民党统治和封建剥削的本质，激发起为改变命运而斗争的革命热情，积极性空前高涨。首先在金岔沟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联合会，接着，又在白马庙、玉皇庙一带组织了农民联合会。农民联合会内部，又以贫农团、雇农工会为核心。农民赤卫军也相继组织起来，到 1934 年 2 月，已建立起 5 个大队。农民联合会是贫苦农民自己的组织，是属于半政权性质的群众团体，组织农民打土豪、分财产，开展土地革命斗争。赤卫军则是农民的军事组织，其任务是维持社会治安，协同农民联合会开展工作，并配合红军游击队作战。

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党的建设也积极而又慎重地开展起来。1934 年春，首先在白马庙发展了 4 名党员，建立了中共支部，张志德任支部书记。

在群众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开始自上而下的建政工作。1934 年 2 月 25 日，习仲勋、张策主持在南梁四合台召开群众大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白天章(后为贾生秀)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军事、文化等委员会。同时，成立保卫队。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是苏区最高临时政权机关，行使政府的行政职能。

②南梁会议。照金苏区丧失后，中共陕甘边区特委领导成员分散活动。包家寨会议后，特委书记案武双山离开边区，组织机构一直不健全。随着苏区的不断扩大，武装力量的发展，恢复特委的工作刻不容缓，成立军事领导机关也迫在眉睫。为此，1934 年 6 月，红四十二师党委在南梁寨子湾猫开会议，决定健全中共陕甘边区特委组织，设立机构，恢复工作，张秀山任特委书记；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军委)，刘志丹任军委主席；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会后，组建了特委机关。

特委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边苏区的最高领导机关，曾、经作出“包家寨会议决议”(1933年11月)、《关于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1934年7月)、《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1935年8月)等一系列文件，从路线、方针、政策上领导了苏区的创建。军委是苏区最高军事领导机关，领导苏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发展壮大红二十六军和地方游击队作出了卓越贡献。南梁会议决定恢复特委并成立军委，在苏区党和红军建设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③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随着苏区的巩固和扩大，临时革命政权转变为苏维埃政权的条件已经成熟。经过两个多月的积极筹备，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于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园堡老爷庙举行。参加会议的工人、农民和红军指战员代表100多名。会期，代表们认真讨论了苏区创建的许多重大问题，一致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重要文件。会议经过充分酝酿，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选出政府委员25人，习仲勋当选为政府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为副主席，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食、肃反、工农监察、文化、妇女等委员会。会议还选举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月任军委主席；成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任岳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在革命委员会政治保卫队的基础上，成立了苏维埃政府政治保卫大队，郭锡山任大队长，宋飞任副大队长。

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这一天，在荔园堡老爷庙清音楼前召开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除全体代表外，还有红二十六军部队、地方游击队、赤卫军及南梁一带群众3000余人。戏台上悬挂着“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的巨幅红色会标，整个会场红旗和彩旗迎风招展，锣鼓喧天，呈现出一派欢乐的节日景象。会上，庄严宣告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刘志丹、习仲勋以及各界代表讲了话，举行了授旗仪式。会后，举行阅兵。晚上，演出了京剧、秧歌等文艺节目，举行了联欢活动。

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了一系列决议，选举产生了苏维埃政府和军委领导成员，实现了临时政权向苏维埃政权的转变，标志着陕甘边苏区的确立，在陕甘边乃至西北革命斗争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④华池县的设置。在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南梁中心苏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于是决定在这里设立华池县。1934年11月上旬，中心苏区在南梁何家沟门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出席代表100余人，选举成立华池县苏维埃政府，贾生秀任主席，李彦任副主席。县苏维埃政府下设土地、劳动、财粮、肃反、青年等委员会。华池县辖4个区：一区下设3个乡，管辖小河沟、豹子川、东华池、算帐沟、林锦庙一带；二区下设2个乡，管辖马莲岔、玉皇庙、郭峁畔一带；三区下设3个乡，管辖荔园堡、何沟门、白马庙、白沟门、郭峁湾一带；四区管辖二将川周园子以北地区。

华池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健全区乡政权的同时，领导人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建设苏区做了大量工作。1935年春，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对苏区的太规模军事“围，剿”，华池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撤至洛河川。同年9月，苏区军民粉碎了国民党的“嘲剿”，边区特委和政府决定将华池县恢复为华池战区，委派崔凤鸣为战区党委书记。党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派高生荣为战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并将原来的4个区合并为白马、林镇两个区。不久，华池战区党政机关与庆北办事处合并，成立中共华池县委员会和华池县苏维埃政府。

⑤合水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合水县太白地区属南梁苏区中心区域。随着群众工作的开展，陆续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中共葫芦河支部，黄克秀任支部书记。1934年11月中旬，太白区苏维埃政府存连家砭老城成立。1935年2月，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在太白镇成立，李彦任主席。3月，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进攻，合水县革命委员会工作人员转移，太白区工作转入地下。

⑥庆北地区革命政权的建立。1934年夏，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

委员会派张秀山、惠子俊、蔡子伟、强家珍、马仰西等率庆阳游击队到庆北地区活动，在扫除地方反动武装的同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宣传革命道理，组织群众，发动群众。5月，在柔远成立了第一个农民联合会。随后，又在武家河、柳湾沟、杜家河、小川沟、城壕一带村庄成立了农民联合会分会、村会，并成立3个农民联合总会。农民联合会内部，以贫农团、雇农工会为核心，体现无产阶级的领导。与此同时，广泛组织赤卫军，首先在城壕、悦乐、钥匙沟、柔远组织4个中队，编为1个大队。庆北地区发动群众，组织了攻打悦乐堡、上堡子分粮等声势浩大的活动，影响深远。

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建党活动也逐步展开，先后发展党员50余名，建立了杜家河、武家河、城壕3个中共支部。

秋季，在雷家川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庆北办事处，强家珍任主任。办事处机关设在龙木庄，下设土地、劳动、财贸、畜牧、文化、青年等部门。先后改立一(温台)、二(柔远)2个区。不久，办事处改为县苏维埃政府筹备处，边金山任主席。1934年12月，在柳湾沟柏树掌召开群众大会，选举成立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强家珍任主席，高世清任副主席。下设土地、劳动、财政、肃反、文化等委员会。1935年2月，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机关迁驻悦乐黄大原。

不久，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占领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转入地下坚持斗争。秋季，李培福、李树林主持在杏泥沟恢复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庆北办事处，李树林任主任，李培福任游击队总指挥，恢复温台、柔远2个区的苏维埃政权，并逐步向城壕、五蛟、元城方向发展，当年又增设城壕区。1936年初，办事处迁二将川，与华池战区党政机关合并，仍为华池县。

此外，1935年春，王英等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委派，曾在三道川以南、桥川元城一带，发动群众，成立赤卫军、贫农团，组建游击队，建立了临时革命政权——北县革命委员会。不久，因国民党当局的军事“围剿”。这个临时革命政权的工作人员即转移到洛河川去了。

⑦赤安县苏维埃政权的成立。1934年夏，保安游击队离开南梁，以吴堡川为中心，向洛河川以南的三道川、白豹川、义正川广大地区发展，在肃清地方反动武装的同时，选派范文有、黄克强等干部深入群众，开展地方工作。不久，又派张策到这一带开辟苏区。他们首先在紫坊台发动雇工袁万祥、赵玉文等，成立贫农团、雇农工会，组织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接着又在脚乍川、樊家川、义正川、吴堡川、何家川、白豹川、二道川、三道川等地建立了群众组织，并着手建立基层政权。1934年11月，在吴堡川朱家沟成立赤安县苏维埃政府，边金山(后为袁万祥)任主席。1935年夏，西北主力红军在反“围剿”斗争中打了许多胜仗，慑于红军的威力，驻保安县城的高玉亭营弃城逃跑，永宁山民团两个班起义，国民党保安县政府人员向红军投城。8月30日，金鼎山民团投降红军，旦八寨民团最后也逃跑了，保安全县获得解放，全部成为苏区。赤安县先后建立10个区的苏维埃政权，即一区(水宁山)、二区(樊川、义正川)、三区(吴堡川)、四区(脚乍川)、五区(白豹川)、六区(杨清川)、七区(曹塔、顺同川)、保安区、顺宁区、三台区。

⑧靖边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在1935年春季开始的反“围剿”斗争中，红二团在南梁一带完成阻击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的任务后，向三边地区发展，经过2个多月的游击活动，开辟了定边以东、靖边以西大片苏区。秋季，成立靖边县革命委员会，殷云山任主席。

2、陕甘边南区的恢复和发展。陕甘边南区即三路游击区。在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主力部队的帮助下，三路游击队得到迅速发展，南区的革命活动重新高涨起来，后在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群众工作广泛深入地开展，党的基层组织和革命政权相继建立，成为陕甘边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

①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1934年9月，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决定将三路游击区划为陕甘边南区。为加强南区工作的领导，成立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派张邦英任南区党委书记，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党政机关驻中部县双龙镇上川小

石崖附近的高窑子和灵湾。1935 年秋，西北工委派唐洪澄任南区党委书记，张邦英改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党政机关迁至正宁县三嘉原，后又迁至南邑。原属中、宜、富、甘、洛等县党政工作交由特委租边区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主持建立健全了新正、新宁、淳耀、赤水、永红 5 县县区乡党政组织。11 月，南区工农兵代表会议在正宁三嘉原白沟召开，选举产生了南区苏维埃政府，当地雇农张月任主席，张邦英任副主席。政府下设拥红、肃反、财政、教育等委员会。不久，中央决定成立关中特区，南区即为关中特区。

②新正县的设置。1934 年 2 月，张仲良带领三路游击队到正宁县湫头、孟家河一带开辟苏区，着手湫头地区党组织的筹建工作。不久，桂宛、李德禄也来到湫头，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先后接收了 4 名党员，7 月下甸建立了党小组。8 月，又发展了 15 名党员，并成立了党支部，郭存信任支部书记。之后，在南邑、湫头、龙嘴子、孟家河、巩家斜、西城、秦家店、谣沟、石家湾子、三嘉、上宫庄等村庄积极开展建党工作。到 1935 年 7 月，共发展党员 70 多名，建立了湫头、三嘉、长舌头 3 个区委。8 月，在湫头蚬子村召开党员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中国共产党新正县委员会，卢永财任书记，李科任副书记。县委下设秘书、宣传、组织、统战、妇女、青年等部门固。

另外，1935 年后季，新正县委存山河镇秘密发展党员 5 名，并成立了山河城关地下党支部，屈则升任支部书记，受新正县委统战部领导。

正宁的建政活动则可追溯到陕甘游击队时期。1932 年三四月间，陕甘游击队曾在寺村原建立革命政权(见《红二十六军的创建和发展》一文《创建寺村原游击根据地》)。后因游击队撤离而解体，但打下了群众工作的基础。后来，这一带一直属于红军的游击根据地。1934 年 2 月，第三路游击指挥部成立后，经过一段群众工作，首先在五顷原成立了农民联合会。7 月，成立五顷原乡革命委员会，郭自发任主席，何正兴任副主席。冬季，南邑、湫头、巩家斜、西城、西沟、石家湾子、龙嘴子等乡临时革命政权相继建立。1935 年春，成立南区

革命委员会正宁办事处，郭廷藩任主任，封振宝、杜宛协助工作，着手筹建县、区级革命政权。5月，国民党军队“围剿”，正宁办事处遭国民党正宁县自卫队雷同春部袭击而破坏，工作人员转移到柴桥子一带。8月，在南区党委、革命委员会的直接领导下，相继建立了湫头、三嘉、长舌头3个区的革命政权。并在张邦英(时任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的主持下，在湫头召开100多人参加的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新正县革命委员会，郭廷藩当选为主席，左怀玉、李进荣为副主席。革命委员会下设财政、粮食、军事、土地、劳动、文教、审判、民政等部。同年10月，新正县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新正县以后又设立了湫坡头、长乐、底庙3个区，全县共辖3.7万人。

③永红县革命政权的建立。为巩固扩大苏区，南区党委派赵红军在正宁县的下南坡头、旬邑县的底庙一带秘密串联，发动群众，建立基层党政组织。1935年11月，在正宁县下南坡头西村召开大会，宣布成立永红县，选举产生永红县苏维埃政府领导成员，梁文汉任主席，李银清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中共永红县委，赵红军任书记，赵廷宝任副书记。永红县辖南坡头、罗沟圈、郭村、产场、北庄、榆家庄、田村、店子河、底庙、房家原、牛家坡等村庄。不久，国民党东北军“围剿”，党政工作人员转入地下，永红县解体，所辖区域成为新正县底庙区的一部分。

④新宁县的设置：1935年春，南区党委、革命委员会派李德禄、刘永培、李尚勤等到九岷、杨家原一带开辟苏区，成立了南区革命委员会宁县办事处，刘永培任主任，李尚勤任副主任。李德禄、李尚勤扮作土匠，到九岷走乡串户，发动了上至康原、下至北庄子八九个行政村的群众，成立了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并组织群众没收了王相堡子土豪马瞎子的120多石粮食，分给了贫苦农民。接着，又在杨家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在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发展了一批党员，10月14日，在九岷南嘴子栗文杰家中成立了中共九岷支部，米世英担任支部书记。

与此同时，王占奎、吕兴财等革命青年受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

席习仲勋指示，约同共产党员许兴堂到宁县盘客荏掌一带开辟苏区。王占奎、吕兴财经许兴堂介绍，加入共产党。他们在黄克秀游击队的配合下，组织了荏掌办事处，许兴堂任主任。荏掌办事处先后在荏掌、潘村、罗后、武洛等地发动群众，并组建起游击队，张生才(后为张占荣)任队长，郭秀宁任指导员。

到 1935 年冬，宁县东部地区的九岷、金村、杨家原及九龙川、平道川等地地方工作普遍开展起来，在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建立 7 个乡的苏维埃政权，设立了两个区。一区设在杨家原的韩坳、辖瓦沟圈、贾邑川、杨家原、九龙川 4 个乡；二区设在九岷、的马洼，辖九岷、平道川，金村 3 个乡。并先后接收党员 40 余名，7 个乡均建立了支部，两个区均设了区委。

1935 年 11 月下旬，南区党委、苏维埃政府派焦怀兴来宁县，主持在杨家原召开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张有鹏任主席。政府下设财政、粮食、土地、军事、警卫等部门。同时，召开党员代表会议，选举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新宁县委员会，焦怀兴任书记。县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新宁县辖区：东至芦宝梁，西至石鼓黑庄子，南至西坡，北至盘客罗后堡。全县 3 万多人。

⑤淳耀、赤水县的设置。1934 年冬季，南区革命委员会主席黄子文等到旬邑、淳化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地方工作，并在两县边界地区成立了赤淳工委，先后由金理科、宋飞负责，活动范围包括：东至城前头，西至庙上，南至正赵家原、北至清水原。随着苏区的不断扩大，于 1935 年 8 月成立了中共赤淳县委和县革命委员会，杜宛任县委书记，姚殿新任革命委员会主席，王振喜任副主席。赤淳县包括东西两个区。1935 年 11 月，在南区党政领导的主持下，在赤淳东区的基础上成立淳耀县，郭廷藩任中共淳耀县委书记，姚殿新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卢德明任副主席。淳耀县辖淳化的铁王、秦河、周山、南村、方里北部及耀县的照金、柳林、庙湾、香山等地。与此同时，在赤淳西区的基础上成立赤水县，杜宛任中共赤水县委书记，姚振华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任贵选任副主席。赤水县辖淳化的卜家、润镇、

十里原、官庄，旬邑县的土桥、大小南乡、清水原、排厦、石门关等地。

3、陕甘边东区的开辟。这里所说的东区，指桥山以东，即洛三川及其周围地区。是继南梁苏区之后开辟的破甘边苏区的东半部。

①陕甘边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东迁。1935年2月，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和陕北苏区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南梁是敌三十五师进攻的主要目标。4月上旬，苏区党政军负责人在寨子湾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按照西北工委的统一部署，暂时放弃南梁，向东区转移。4月13日，特委、政府和军委机关工作人员开始向瓦子川、大东沟一带撤退。下旬，进驻洛河川。特委机关驻王家湾，苏维埃政府、机关驻阎家湾，军委机关驻屑沟坪。苏区党政军机关东迁洛河川以后，直接领导东区的开辟，并继续致力于整个苏区的巩固和发展。11月，中央决定在陕甘边苏区的基础上成立陕甘省和关中特区，陕甘边苏区党政军领导机关随即撤销。

②安塞县苏维埃政府的成立。1934年7月，红二十六军部队消灭了刘老庄、胡皮头等村寨的民团武装，收缴了土匪余丑娃的枪械，解放了洛上川。不久，在安家坪成立了安塞县革命委员会，王聚德任主席。下辖桥扶峪、下寺湾、王家坪3个区。12月中旬，安塞县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1935年4月，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机关迁至洛河川，以上3个区改由边区政府直属，安塞县苏维埃政府迁至高桥川，开辟新苏区。

③中宜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34年，在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驻三路办事处的领导下，小石崖一带就组建了红军游击队。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直接领导创造了一小块苏区。1935年4月，在前桃园成立中宜县革命委员会，张仲良任主席。中宜县辖区：东至吉子岷原、归村、富村，西至张家村、陈家村、夏家沟，南至南沟畔、阿党村，北至张村驿，东西13公里，南北11公里。同年11月，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并成立中共中宜县委，刘恩善任县委书记。

记。

④富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35 年春，陕甘边区特委派李彦到富县直罗镇小河子川雷家沟一带开辟苏区，经过一段时间的群众工作，组建了赤卫军，成立了游击队，农民联合会也相继建立。3 月，在药埠头选举成立了富西革命委员会，韩明奎任主席。富西革命委员会管辖小河子至槐树庄、安家川至党家湾一带村庄。11 月，与富甘合并，成立甘洛县，建立了正式的苏维埃政权。

⑤富甘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35 年春，陕甘边区特委派马文瑞、贾生秀主持在甘泉县府村川曹家沟成立富甘革命委员会，主席主居仁（后为李彦）。革命委员会下设土地、粮食、肃反、军事等部门，并组建起富甘游击队。后季，富甘革命委员会移驻富县余家原。11 月，与富西合并，成立苜洛县。

⑥肤甘县委和肤甘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35 年 6 月，在延安南龙儿寺成立肤甘革命委员会；主席刘秉温。肤甘革命委员会管辖延安南川、龙儿寺、杜甫川、登山峪等地。不久，成立中共肤甘县委，王生海任县委书记。9 月，肤村县撤销，划归肤施县。

⑦赤川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35 年 3 月，陕甘边东区工委在临镇成立。不久，东区工委主持在宜川雷多村成立了赤川县革命委员会，黑志德任主席。

⑧红泉县委和红泉县革命委员会的成立。1935 年 5 月，为适应反“围剿”斗争形势需要，陕甘边区军委决定在宜川、临镇一带建立东路游击总指挥部，曹力如任总指挥，马文瑞任政委。不久，在临镇成立红泉县革命委员会，奚玉山任主席。同时，成立中共红泉县委，马文瑞任书记。

（三）陕甘边与陕北两苏区的统一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陕甘边、陕北两苏区统一党政军领导已成为历史的必然，两苏区领导人都有这个愿望。1935 年元月上旬，刘志丹率红二团北上，一方面探望伤病中的谢子长，一方面就苏区创建、反“围剿”斗争等重大问题同谢子

长及陕北特委领导人交换意见。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在取得较一致意见的基础上，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和陕北特委根据中央驻北方代表巡视员黄翰的倡议，于2月5日在安定周家招召开联席会议，刘志丹、张秀山、崔田夫、郭洪涛、马明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两苏区统一党政军领导及反“围剿”斗争的战略、方针等问题，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西北工作委员会(简称西北工委)，选举惠子俊任书记；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西北军委)，选举刘志丹任主席，谢子长、高岗任副主席。周家砭会议是西北革命斗争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在历史的转折关头，统一两苏区党政军领导和反“围剿”的战略方针，从而将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推上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周家砭会议精神，2月18日，刘志丹以西北军委主席的名义发布了反“围剿”斗争动员令。为粉碎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大规模“围剿”，调红四十二师政委张秀山率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5月1日，与红二十七军八十四师在安定白庙岔会师，组成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同时，宣布成立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统一指挥反“围剿”作战。西北红军主力兵团在刘志丹的直接指挥下，历经2月，大小10余战，连战皆捷，解放了延长、延川、安塞、安定、靖边、保安6座县城，在2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工农民主政权，使游击区扩大到30多个县，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人左右，地方游击队发展到4000人，把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连成一片。其中，陕甘边苏区扩大到陕甘两省十九个县的地域，包括甘肃的庆阳、合水、正宁、宁县，陕西的保安、安塞、旬邑、淳化、彬县、耀县、洛川、中部、宜君、甘泉、富县、宜川、肤施、靖边、定边县的全部或部分地区。建立县级苏维埃政权的有华池、庆北、新正、新宁、永红、赤安、安塞、淳耀、赤水、甘洛等，建立县级临时革命政权的有合水、靖边、富西、富甘、肤甘、肤施、中宜、红泉、赤川等。陕甘边与陕北苏区联成一片，形成统一的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三、苏区建设

陕甘边区党和政府重视苏区的建设工作，为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巩固和扩大苏区，参照中央根据地的文件精神，结合陕甘边区实际，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采取了许多切实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显著成绩。

(一)、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农民的土地要求

陕甘边区土地比较集中，一些大豪绅地主田连阡陌，而广大贫苦农民只能以租佃求生。土地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土地革命斗争早在陕甘游击队时期就已经开始，但初期只限于分浮财。1932年3月下旬，陕甘游击队在寺村原活动期间，就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发动当地贫苦农民，没收了西城村的土豪刘西坤、于家庄土豪。赵元亨、琴宅土豪赵秉义等户的牛羊牲畜，粮食和浮财，除部分留作军用外，其余分给了贫苦农民。同年七八月，在五顷原开展分配土地的斗争。但是，由于当时尚未建立起稳固的政权，群众也没有充分发动起来，结果失败了。此后，红军、游击队曾在陕甘边区各县多次打土豪、分财产，解决军需民用。

1934年，陕甘边苏区随着农民联合会、赤卫军等群众组织的普遍建立，打土豪、分财产的同时，开始了有组织的分配土地。南梁苏区中心区域荔园堡、庆北的柔远等地分配土地较早。荔园堡一带土地绝大部分是庆阳城“八大家”恒义成、裕茂隆的，土地较多，每人可分川地10亩，山地则要多少给多少。柔远城子没收了4户出租的土地，全部分给了门客，谁种归谁。三路游击区也在五顷原、孟家河等地，没收了赵老八等4户出租土地198亩，分给何正兴等10多户佃农。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及其以后的苏维埃政府，都专设土地委员

会，各县区也都相应设有土地工作部门，其职责就是组织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1934 年冬季，陕甘边区特委、苏维埃政府根据当地实际，参照中央苏区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制定了土地革命政策。确定没收地主的土地、牛羊、粮食、庄宅和其它财产，没收富农封建剥削部分的土地财产，分配给贫雇农或缺少土地、牲畜的中农，地主家庭中参加劳动的成员，也留给其能维持生活的土地和财产。川台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山地根据需求和耕种能力按户划块。土地以区为单位平衡，调剂余缺。土地和青苗一起分配。红军家属有分得好地的优先权；凡家在苏区的红军战士，都分配给土地。白军士兵暂不分地，应分部分留作公田。苏区中心区域分配土地，边缘地区暂不分地，随苏区的发展逐步扩大分配区域。

1935 年春，国民党军队对苏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围剿”，土地分配工作被迫停止。同年秋季，反“围剿”斗争胜利后，在恢复建立革命政权的同时，在试点工作的基础上，全面开展土地革命，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边区政府在洛河川举办了土地分配训练班，培训了一批干部。随后华池及庆北的柔远、温台、城壕 3 个区全面分配土地。南区党委也首先在新正县阳坡头南岭村试点，随后组成 3 个工作组，分别到新正、新宁、赤水等县进行土地改革工作，登记土地、没收分配地主土地、富农多余土地，确定农民的土地所有权。新正县在一、二、三区的 17 个乡开展。由于一些负责人执行政策不准，工作中侵犯了中农利益。12 月 15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颁布新富农政策后，又发生右的倾向，把过去没收分配了的土地归给了原主，致使许多雇农又失去土地，造成群众对苏维埃政策的误解。不久，关中特区领导机关发现后，进行了纠正，确定原没收分配仍然有效，只把剩余土地或公地补给富农一部分。新宁县土改工作 12 月开始。以二区三乡为例，全乡 174 户，其中分得户 110 户，未动的 44 户，被没收分配的地主 7 户，富农，绅士和土地出租者 13 户。在这 20 户打击对象中，镇压 11 人。

这次分配土地工作历时两年之久。1936 年，依据各户家庭经济

状况，按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定了阶级成份。华池县(包括庆北)共定地主、富农 300 多户，约占总农户的 5%。

陕甘边区的土地革命，消灭了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农民最迫切的土地要求，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为巩固和扩大苏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减轻农民负担，予民生息

陕甘边区长期以来经济落后，广大农民生活极其贫困。边区政府采取予民生息的方针，决定对农民不征粮，不派款。党政军纳开支，主要向豪绅地主索取，依靠打土豪作为主要财政来源。政府机关及红军、游击队等所有公职人员全部实行供给制，从领导干部到一般工作人员，从指挥员到战士，经济待遇一律平等。所有费用都出财政委员会统一筹措，统一安排使用。政府在各地设立了收购站，按市价收购粮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备。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牛羊和其它财产，除分配给贫苦农民外，留一部分作为党政机关、红军、游击队的公粮和公畜，保存在农村。1934 年 6 月，庆阳游击队没收发了紫坊畔塔儿掌土豪胡克申家粮食 500 石，牛 100 多头，羊 2000 余只，自洋 1000 块，就是一部分留作军用，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秋季，庆阳游击队打开“恒义和”在悦乐上堡子的租粮仓库，就地分粮 2000 余石、烟叶子 1000 多斤，并分配牲畜 700 多头，羊 800 余只。政府还办了一些小型牧场，把留作公用的牲畜、羊只集中放养，以备食饲。华池县各区乡当时差不多都有这样的小牧场。这样以来，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政府鼓励农民发展生产，保证民生，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还教育改造那些游手好闲的二流子参加生产，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发展，昔日食不果腹的农民，不少人都积攒了余粮，拿到市场上出售。

(三)采取有效措施，活跃农村经济

在根据地生产发展的基础上，边区政府在荔园堡首先设立了集

市，确定农历每月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日，为当地农民提供了互通有无，调剂余缺的市场。每逢集日，荔园堡方圆数十里的群众纷纷前来赶集，卖余粮的，卖吃食的，生意兴隆，一派生机。边区政府迁驻洛河川后，又在胡皮头村设立了集市，逢五为集，每月3次。习仲勋等边区领导经常到集市上了解情况，鼓励群众，发展生产，活跃经济。边区政府鼓励国民党统治区的商人来苏区做生意，并保护他们的利益。这些商人将苏区的山货、羊畜运出去，又将苏区短缺的布匹和其它物资运进来。出于采取争取、欢迎和保护的政策，逐渐与一批开明商人建立了合作关系，边区政府保证这些商人有利可图，这些商人也越来越同情革命，千方百计为苏区运送货物。有的为了通过国民党的封锁线，采取行贿收买的办法，拉拢国民党稽查关卡人员，疏通了苏区与外地的物资流通渠道。

边区政府为了促进生产的发展，还在华池县各区试办合作社，制订了计划。红三团曾为合作社捐款60余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鸡、养猪，发展农副业生产。由于国民党军队“围剿”，未能完全实现。到了洛河川，又先后在下寺湾、石门子集股兴办了合作社。

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1934年11月印制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苏币”(群众称之为“苏票”)，造印厂设在小河沟老庄河邵凤麟家中。采用木刻版，印在自平布上，涂以桐油。票面分为一元、五角、二角、一角4种。“苏币”与银元等值。为取信于民，解除群众和商人的顾虑，边区政府财政委员会在荔园堡设立了“苏币”银元兑换处，使“苏币”得到了很高的信誉。边区政府迁到洛河川后，又继续发行货币，方便交换。

由于边区政府采取了设立集市、发行“苏币”，办合作社等一些切实的措施，从而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促进了苏区的经济发展。

(四)开办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事业。

边区政府在积极发展经济的同时，重视了文化教育工作。过去，南梁地区没有1所学校。边区政府成立后，习仲勋、蔡子伟等领导人

亲自发动群众创办学校。首先在荔园堡办起了第一所列宁小学，郝建德、张静文(女)任教员，在校学生六七十名。校舍是没收地主的房子，师生们自力更生，架木板当桌子，垒土台当凳子，用石板当黑板，扫锅墨当墨汁，设备因陋就简。教材是自编的油印本或手抄本。边区政府文化委员长蔡子伟亲自为学生编教材。这些教材通俗易懂，完全是新的革命内容，多采用顺口溜的形式，朗朗上口，好学易记，既是文化课，又是政治课。以后，又在太白、葫芦河、荔园堡川口以及洛河川的桥扶峪、阎家沟、下寺湾、王家坪、杏子沟门等地陆续办起列宁小学，使落后山区的农民子弟有了受教育的权利。

边区政府还十分注意成人的文化教育，在一些村庄办起了成人扫盲识字班。同时，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破除陈规陋习、移风易俗活动，设立了禁烟、禁赌、放足委员会，发布了相应的条例，并制定了反对封建婚姻、反对迷信活动等法规，开展了以“劝破除迷信、劝戒赌博、劝戒鸦片烟、劝禁止买卖婚姻、劝妇女放足、劝男人剪辫子”为内容的“六劝”活动。用新思想、新文化教育群众，引导他们从封建思想的枷锁中解放出来。

为了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团结、教育人民，陕甘边区特委创办了党内刊物《布尔塞维克的生活》作为特委机关报，由龚逢春负责。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创办了不定期刊物《红色西北》。这个刊物发表的文章和消息，以红军战报和经济建设等为多，特委和边区政府的决议及一些带号召性的文件也经常刊载。这两个油印小报，到洛河川后仍坚持发行，为苏区的党政军建设及发展生产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苏区不断扩大和武装斗争的深入发展，部队和地方都需要大量干部。为适应革命形势需要，陕甘边区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4年10月在南梁开办红军干部学校。开始，校址设在荔园堡，后迁往豹子川张岔、安塞。校长由刘志丹兼任，政委由习仲勋兼任。吴岱峰任军事主任，主持日常工作，马文瑞、蔡子伟曾兼任教员。学员主要来自部队中下层干部，还有少量地方干部。教学内容主要有政治、军事、文化和政权建设。政治课包括“工农红军”、“共产党”、“土

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六大决定”(十大纲领、革命性质等);军事课包括:“制式教练”(基本动作)、“尖兵活动”、“游击战术”等。刘志丹亲自担任军事课。由于学员文化程度较低,文化课主要以扫盲为主。红军干部学校在荔园堡举办第一期,1月时间。边区政府成立后,校址迁到张岔办了第二期,70多天。迁安塞办了第三期,3个月。前后共培训干部200余人。这些学员结业后,多数回到了原单位。红军干部学校对于提高广大军政干部的政治和军事素质起到了重要作用。

• 资料部分 •

历史文献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1 月 20 日 给陕甘边境游击队的指示信

圆委转诸同志;

省委听了△△同志报告后关于你们的工作有以下的指示,希望你们深刻训论,坚决的执行:

一、目前陕西正是几年灾荒中,农民群众受不了豪绅地主国民党军阀政府的压榨剥削,反抗的斗争普遍的起来,士兵群众受不了生活的痛苦,官长的野蛮待遇,自发的哗变逃亡斗争,游漫各部队。这些群众斗争,在中华苏维埃临时政府已经成立,红军胜口苏维埃运动的影响在欧西剧烈扩大情形之下,必然要更加迅速的发展前去。这一开展形势正需要我们党坚决领导农民革命的游击战争。与革命的兵士哗变,才能推进斗争的发展与保障他的胜利,使正在开展能群众斗争,

汇合到苏维埃的旗帜下来，这一客观的政治形势，是经常有利于你们发展的条件。

二、在这一形势下面，无疑的你们行动的方针，是应加紧政治上组织上技术上的各种工作，坚决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区域和方向，应以关中道的三水，淳化、三原、富平、长武等为主要方向，因为这些地方党与群众是有相当的基础，尤其是在三原、冒平一带，是农民斗争最高涨的区域。所以你们将来必须和这区域内的农民斗争配合起来。

三、为要实现这个行动方针，必须执行下列的具体工作：

(1)发展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根据△△同志的报告你们现在所住的区域，虽然人家稀少，但这些人都是最贫苦的贫农和中农，尤其是贫农，你们绝不应该因为人少，即放弃这些贫农和中农的工作。相反，你们必须在这些群众中建立巩固的基础，得到这些农民热烈的拥护，才能有很好的发展前途。所以你们必须马上在这些农民中建立农民委员会、贫农苦力工会的群众组织，在这些群众组织领导之下，没收豪绅地主食粮分配给农民，没收豪绅地主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反抗国民党政府的苛捐杂税，焚毁豪(绅)地主契约，反抗高利贷等群众的切身利益。在这些切身利益斗争中。扩大苏维埃运动和党的政治口号的宣传鼓动，把群众团结在我们党的周围，使群众对你们有相当的认识，起码要打破群众对你们是“好土匪”的认识，这样才能扩大到附近区域而得到更广大的群众的拥护。

(2)扩大苏维埃运动的影响。你们现在所处的区域，因为交通的不便，文化的落后，大革命的影响非常微弱或者根本没有，苏维埃运动的影响，自然更是听不着的，唯其因为如此，所以你们在行动的过程中，和群众组织中，首先要集中力量，向群众解释苏维埃政府是什么？国民党政府是什么？苏维埃区域内的群众生活，国民政府下的群众生活比较起来，而尤其主要的是苏维埃政府的土地法令，劳动法令，非常通俗的在群众中广泛的宣传，使群众根本认识只有推翻现在的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才能有根本的办法和唯一的出路，以提高群众

斗争勇气和决心，以提高群众政治认识。进行这一工作必须经常召集群众大会，讲演会，当地的通俗歌谣，小曲书口夜校等办法去扩大，但主要的是在群众组织中，在每个斗争过程中，给群众解释，才更容易使群众了解和扩大这一影响。

(3)加强本部队政治教育，改变现有成份。你们现在的部队成份是非常不好，又不是从群众斗争中产生出来，大部份还是土匪成份，流氓无产阶级占最大多数，这样部队决不能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同时现在的土匪<成份>行动还是继续，这样无疑的是得不到群众拥护的。因此现在的唯一口切工作，是加强部队政治教育工作，首先应找住比较先进的份子，成立干部训练队，每天规定几点钟的课程，用讨论方式，讨论游击战争中几个问题，使这些干部在政治上能够有坚定的认识，为游击战争的中心领导骨干。对于一般群众，亦应经常召集大会、小组会，公开报告和讨论党在游击战争中的各种策略问题，尤其是关于红军和苏维埃运动的发展历史，与苏区中的各种实际情况。对于目前部队成份的改变只有一方(面)加强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尽(量)大量的吸收附近的贫农雇农苦力来参加，使逐渐转变到这些成份上面来，在每次行动中都应征调一些贫农雇农苦力进来。

(4)加紧附近白军(军)队中的士兵工作。必须马上选择本部队中勇敢积极，认识比较好的群众。派遣打入附近的军队中去，在这些军队的士兵群众中，建立兄弟会，士兵委员会等组织，领导士兵的要(改善)伙食，反抗官长的日常斗争，在这些斗争中，加紧革命兵变的鼓动工作，给上兵群众<中>指出，只有举行革命兵变和农民配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才是根本的出路。同时必须扩大红军和苏维埃运动在这些士兵群众中的影响。在这些工作上面，组织革命兵变和你们的部队能够汇合起来。

(5)健全党的组织，转变党的成份，树立铁的纪律。现在党的组织仪有其名而已，党的成份又很不好，党内流氓意识非常浓厚。目前党的工作，仪是建立(在)一个同志的威信上面。这是非常危险的，使一切工作的进行形成各个人英雄式的领导，使党的政治领导是绝对不能加强的，结果呢?一定根本脱离党的政治路线，而成乱烧乱抢的土

匪行动。因此你们必须首先健全党的组织，团委必须加强自己的工作，根据这个指示信，拟定自己的工作计划，举行经常的会议，定期检查一切工作进行成绩，发展由上而下的自我批评，应积极转变党的成份，党的组织要向雇农贫农苦力出身的群众上面，在地方农民群众中军队中普遍的建立起党的组织来，同时必须加强党内教育工作，举行党的训练班以加强党员群众的无产阶级教育，以转变党的成份。支部中的铁的纪律，亦必须建立起来，尤其是在成份不好的部队内更为重要。必须分配每个同志以具体工作，团委与支部书记经常检查，如果消极怠工，不执行党的决议时加以毫不客气的自我批评，如果教育再不能改正时即严格加以组织上裁制，把党内的异己份子，逐渐淘汰出去。

陕西省委员会

1932年1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2 月 15 日关于 筹备成立陕甘游击队给中央的报告

中央：

现在陕西有我们领导下的一部份军事力量，现在名义是反帝同盟军，党预备转变成为革命的游击队，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将经过情形及省委的指示与计划详细报告：

这个部队的中心力量，是过去山西的游击队，当红军二十四军行动向陕西发展时，山西即令这个游击队到陕西来，开发游击战争，帮助廿四军，但山西省委当时并没有给他们在政治上以丝毫的指示，只是令他们到陕北去，这时游击队的军事负责同志绕到西安与陕西省委接头，当时省委谈及他们的行动时在政治上没有丝毫的了解，只有单独式的军事投机与土匪式的乱抢乱烧。当时常委即指出他〈们〉在政治上的严重错误。但他们的实际力量都已到陕北，人数一百余，枪五六十支，在陕北单纯的军事上与井岳秀部大小十五战，解决井部军队一连，枪枝上即有些补充，最后被井部军队压迫开到陕甘边境保安

一带，这些区域完全是荒山，几年来为土匪的骚扰，人口密度稀到极点，给养人〈及〉大革命的影响，丝毫没有，行动上完全没有办法。当这个军事负责同志到部队中去时，省委指示他们向陕西关中道移动，首先在三水(枸邑)、淳化、甘肃正宁一带发展。当这个同志到部队中时已受甘肃小军阀陈畦璋收编，和其他土匪混合，共编入两团，人数六百余人，枪二百余支，机关枪二十余支，党的组织已成立团委。派同志向省委报告，当时即派军委负责同志去工作，不久，他们就将陈畦璋一连人解决，缴枪一百余支，名义改称反帝国盟军，成立总指挥部，编为两个支部〈队〉，设支队司令二人，发表对外宣言，总指挥即山西过来的那个负责同志，这完全是他们自己干的，并不是根据省委指示。当时为什么要叫反帝同盟军，因各部队太复杂，都是过去的土匪，流氓无产阶级，充满到处乱抢乱烧，不敢揭出工农游击队和“红军”等名义，因为恐怕在群众中的政治信仰倒地，离开广大群众，因此即改此名义。执行省委指示向陕甘边境一三水、正宁，开拔时，途中抢掠烧杀无所不为，即将我们同志最多、枪枝战斗力最好的一个中心大从改为警卫队(即执法队)直属军事委员会，镇压土匪的抢掠行动完全有了，变为公买公卖的好军队，游击战争纲领还是根本没有执行，这即他们的经过情形。

一、该部队的客观条件

目前该部队在陕甘边境的三水、正宁，各种条件，都是有利于游击战争的发展：

A、群众方向〈面〉，这一带的农村阶级分化非常显〈鲜〉明尖锐，佃农占 70% 以上，全县土地几乎完全(掌)握在两三个大豪绅手里，豪绅对农民生死予夺无所不为，苛捐杂税高利贷各种方式的剥削，都是特别严重，因此农民对豪绅对抗形成极尖锐的形势，有些地方(三原、富平等)去年收成还是不好，冬荒时大多数群众，没有饭吃，春荒到来更是没有办法，因此在群众方面，只有这个部队能够坚决的执行游击战争纲领一分配食粮，烧毁一切契约，摧毁豪绅统治，分配土地等等，无疑的是获得成千成万农民群众热烈的拥护。

B、群众斗争与政治影响。这些区域内(三水、淳化、莫原、暂平、耀县、宜君、同宵)群众斗争，自去年秋收后，斗争是非常普遍的。主要内容——反抗捐税，反抗豪绅，抗债抗租，接二连三的开始。富平一县一月内农民有三次广泛起来抗捐税的事件，包围县城，火烧城门。三原方面除过反捐税反抗豪绅斗争外，农民群众在党领导下的普遍反日运动已经起来，并且武装了大多数的中农贫农，赶走了区长(关于这些内容另报告)。经过了这些斗争后，农民的斗争情绪非常高涨，春荒斗争必然更要剧烈，政治影响在这些区域内比较深入，红军与苏维埃在三原、富平等地普遍深入，1927年大革命的影响也很普遍的。三水在1928年在党领导下成立过苏维埃，固然这次(是)完全盲动主义于起来的，但到现在还是有相当影响。因此在群众斗争形势与政治影响方面，也是有利于游击战争条件的开展。

C、地方方面，更是有利的。政治区域是陕甘边境，在陕两甘肃小军阀的相互冲突和对立的形势下面，容易给他们各个击破，为保我们的优势发展，军事地形崎岖，大山接连着平原，于军事发展条件更有利。

D、党的领导，在这几个区域内，比较是要健全的，自去年秋收斗争后，党在群众中的领导，组织和数量上的发展也很迅速。尤其是党的成份改造上是有绝大的进步，新党员成份完全是雇农贫农苦力中农。

在以上四个条件下，我们认为这(支)部队游击战争的客观条件是非常充分的。

三、省委的计划与指示

(省委指示信，军事计划，另附上，兹不赘，仅述省委的实际布置)

在以上条件下，省委坚决指示他们，执行游击战争的纲领，开发革命的游击战争，开辟陕西的苏维埃区域，为了执行这个任务，实际工作布置如下，

①省委调大批军事的政治的干部到部队中去，建立党的领导骨

干，已经计划派廿个干部去充任下级官长、政治员，同时派军委书记杰夫同志作省委巡视员实际去领导布置一切军事的政治的工作。

②关于内部的改造，建立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设立政治委员会，政治指导员，树立党的领导骨干。关于组织在军事计划上有组织系统表，政治工作有详细条例，这次不能(带)来，下次可带来请审查！

③名义现在暂是陕西游击队，经过改造与整理后即改为“中国红军陕西游击队”，正式发宣言通电决议宣誓和(举行)阅兵等仪式。

④党的组织方面，成立游击指委为最高指导机关，队委书记省委已指定由杰夫同志去担任，其总的吸收士兵同志政治工作同志担任。队委下，以中队为中心，组织支部，暂时可成立一两个支部。

⑤对地方党部工作，省委已派一个比较得力同志负责地方党部书记，加强当地群众工作，以与这游击队的任务配合，

以上是大概情形，至于最近情形如何，执行程度如何？还未得到详细报告。

陕西省委

2月15日

符号分别：

——党的路线领导

——接行政指挥

1、队委书记兼政治委员

2、各大队的支部书记为大队的政治委员，指导员遇有纠纷可出队政治委员解决。

3、队长和政治委员遇有纠纷时，队长得执行其命令，同事〈时〉在军事委员会来解决。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3 月 6 日关于 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决议(节录)

八、根据以上的客观形势估计与游击队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下的一切错误与弱点，省委特别指出游击队必须很迅速的执行以下的工作，在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实行彻底改造。①坚决执行省委的指示，毫不迟疑的向三原雷平耀县以至西路去游击，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的区域，只有在这个游击过程中，才能使游击队壮大和发展起来，执行红军游击队的政治任务，坚决打破“关住门暂时休息”、“大家整顿”，不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以延缓了目前最迫切的任务。②立刻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在游击区域内，马上没收豪绅地主寺院的土地，平均分给农民，决不能有丝毫的迟疑犹豫。正确的解决土地问题，是开展游击战争的唯一前提。③开始执行建立新苏区的计划，目前在游击战争过程中，摧毁豪绅的统治及马上建立乡村或一区一镇的苏维埃或革命委员会，执行没收和分配土地，逮捕豪绅。分配食粮，建立群众武装组织等任务，以树立新苏区的基础，以发展苏维埃运动。④加强红军苏维埃的政治鼓动工作，游击队所列的区域，必须召集群众大会，说明红军苏维埃是什么，苏维(埃)、政纲是什么。红军游击队的纲领是什么，中国苏维埃发展状况等，给群众清楚的解释，使群众能够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进行这个鼓动工作，除群众大会外，应用各种方式去进行，使群众对红军苏维埃游击队能够彻底的认识。⑤建立当地各种群众组织 - 农民代表协会，雇农工会等，武装组织少年先锋队、赤卫队等，游击队应该积极帮助这些工作的建立后，再向别(的)地方游击。⑥游击(队)所到的区域，必须实现一切纲领后，再向另一个区域游击，必须坚决反对只是军事上行动而不执行游击战争纲领，这样是不能建立巩固的区域，使游击战争不能很迅速的开展起来。⑦游击队的政治工作必须能够实际的建立起来，绝不能有名无实，政治委员必使群众中有威信的同志担任，政治工作条例，必须绝对服从，必须经常的召集士兵委员会，建说士兵委员会的领导，建立兵委的日常工作，召集各群种的群众会议，解释党的政治策略与游击战争纲领，使每个同志，每个战斗员，彻底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为什么而战，只有这样，才能巩固游击队的战斗力，把

党的政治威信建立起来。⑧游击队的成份还须彻底改造，党应征调工人贫农苦力大批的到游击队中去，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和一切小资产阶级土匪流氓意识作拼命的斗争，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在游击战争中吸收大批的贫农雇农苦力参加，绝对打破只靠省委和派迁〈遗〉人去改造成份的错误观点。⑨宣传工作应马上建立起来，首先要加强宣传队的组织，按军事编制，每大队应设一宣传队，受政治员的指导，经常讨论宣传工作的方法，同时应有经常的工作计划，政治部和政治委员，要经常检查宣传工作的成绩和进行的程度。绝对要改正宣传工作只是临时抱佛脚，只是张贴标语传单，这样是不能使政治影响深入到群众中去的。⑩对白军的士兵工作，必须抓紧这些胜利的影响，派遣俘虏过来的白军士兵兄弟，回到白军中去，领导士兵斗争，组织士兵哗变，投到游击队中来。⑪加强党的领导，健全党的组织，是目前最迫切的工作，由队委直至支部必须有经常的工作计划，经常召开会议，有系统的讨论党的策略，一切游击队斗争中的一切工作问题，使党的工作能够经常有系统的进行。支部纪律，必须树立起来，发展自我批评，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与工作精神，党的组织应尽力发展到游击队中新进来的农民，或白军士兵中去，队委或支部必须按期检查，各支部都要经常开流动和短期。训练班，培养新的积极干部。⑫粮秣和经费问题，应该想各种办法去解决，应该利用鄂豫皖苏区的经验，发起打豪绅的竞赛，规定奖励办法，没收豪绅地主的粮食财产等。最主要的还是配合军事政治条件，加强游击队中的鼓动工作，加强群众工作的建立，夺取几个城市，才能根本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执行这一任务，绝对反对不经过准备工作，动员群众单独军事冒险。⑬积极建立军事根据地，医院，军需、经济，都应存积在根据地，尤其军医院，更应很迅速的建立起来。⑭建立各部的支部，各部都要有条例经常的计划和报告，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经常的检查和督促，绝对不能形成无组织的散漫状态，有名无实，使政治上军事上受莫大的损失。⑮游击队要执行自己的任务，必须加紧两条战线的斗争，拼命的与右倾机会主义，左倾立三路线，口是心非的两面派作坚决斗争。目前最明显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表现(是)，不执行土地革命，不扩大红军苏维

埃运动，对客观形势估计不足，关住门的整顿改造，只执行部分的游击战争纲领，不利用一切机会向敌人进攻，尽是退守让步，实际工作的消极怠工，散漫不紧张，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右倾机会主义，实是目前最严重的敌人，必须集中火力去反对。左倾派立三路线的主要表现是不相信群众力量，不□□群众，建立群众工作，脱离群众的单独军事冒险，不顾一切的盲动等。要克服这两个严重敌人，必须尽量发展由上而下、由下而上的自我批评，定期的工作检阅，实行个别的负责制，创造列宁主义的竞赛。只有这样才能使游击队在国际路线之下，和一个人一样的团结起来。

同志们!只有坚决的执行国际的正确路线，争取陕西革命的新胜利以至全因，与全国革命运动发展配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陕西省委员会

1932年3月6日 4月27日到

中共陕西省委 1932年3月7日关于 红军游击队新胜利与冲破敌人 围剿的主要策略决议(节录)

七、在这个形势下面，党的迫切任务无疑的是加强游击(队)领导，进行彻底的改造，尽量领导和开展群众斗争，把广泛的群众斗争，组织和汇合起来，开展游击战争，这样去冲破敌人“围剿”，建立新苏区。

八、为要执行这个任务，党的主要策略是。①游击队必须坚决的执行进攻的路线，要分两部分游击，向旬邑、三原、富平发展，配合正在开展的渭北农民斗争，在这些游击区内——立刻执行平均分配土地的任务，建立群众的组织，最主要的是要把当地农民武装起来，建立新苏维埃政权，开辟新苏区，坚决反对“上山”、“退避”的右倾观念，只有这样才能迎击敌人接二连三的“围剿”，争取胜利和发展。②游击队必须坚决执行省委对游击队的决议，进行彻底改造，加强游

击队在政治上与战斗上的力量。⑧党要集中力量领导正在开展的渭北农民斗争，立刻开始农民和灾民自动的分配豪绅地主食粮，焚毁一切契约帐簿，反对苛捐杂税，反对豪绅地主的国民党政府剥削的迫切斗争，普遍建立或加强各种群众组织，(如同心会、穷人会、分粮会等)，建立农民和灾民的武装组织，夺取豪绅的地主的武装，武装自己。至于三原反日救国会的纠察队，更应加强党的领导，搜集武装武器，这些一切工作和扩大游击队的影响，抓住两次胜利，加紧农民群众中的鼓励工作联系起来，召集农民群众大会，庆祝游击队的胜利，反对“围剿”游击队，组织慰劳队、募捐队、宣传队等等组织，实际的帮助红军游击队。游击队新到的地方，党要动员农民起来，召集欢迎或慰劳大会，组织担挑队、做饭队、缝衣队、洗衣队等等，以提高游击队战斗员勇气和决心，以开展农民斗争。立刻号召广大农民参加游击队，以扩大或加强游击队的力量。④西路和渭北灾区中灾民斗争，党必须立即设法去领导，建立灾民团、吃大户团、分粮队、灾民自救队会等等群众组织，经过这些组织坚决自动的分配豪绅地主食粮，包围赈济机关，向国民党政府要饭吃等等斗争，在这些斗争过程中，尽量扩大红军游击队的宣传鼓动，指出只有这样和游击队配合起来，才能根本解决了灾荒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号召农民群众到游击队中去，游击队必须注意到灾区内的的发展，尽可能的到灾区去游击。⑤加紧几个中心部队中士兵工作，尽量领导士兵的要饷、分伙食，反对官长打骂等日常斗争，在这些斗争中马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兄弟会等组织。党经过这些组织，扩大拥护红军游击队的鼓动，使每个士兵群众都要认识只有“打死官长投红军游击队去!”“不打红军游击队”，“创造陕西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才是唯一的出路，这样去组织几个部队内尤其是中心部队中的革命兵变，以与游击战争配合，以瓦解敌人的部队。……

省委

1932年3月7日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3 月 8 日 颁发的游击战争行动纲领(节录)

(四)游击战争的任务与行动

(7)扩大红军与苏维埃的影响，建立部分的苏维埃政权，执行苏维埃中央政府一切法令。

(8)执行土地革命，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财产分配给中农和贫农。

(9)没收豪绅的粮食和财产，分配给贫农雇农和苦力。

(10)摧毁豪绅在乡村一切政权机关。

(11)宣布一切高利贷无效，焚毁一切奴役和剥削农民的契约。

(12)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税的税收，加重负担与〈予〉富农身上(或临时征收也照同样原则)。

(13)建立革命委员会，由此准备建(立)苏(维埃)政府。

(14)解决豪绅地主的武装，武装各地的农民，组织赤卫队、少先队。

(15)援助农民暴动或兵士哗变，帮助贫农雇农对富农的一切斗争，不损坏〈害〉中农的利益。

(16)陷城市之后首先拘捕豪绅，以便制止其他豪绅武装力量之进攻，然后交给群众大会审判。

(17)游击队努力建立自己政治上的力量与军事上的根据地。

(18)游击队有计划的经常扰乱敌人的交通网、后方宿营粮秣军械储藏等等。

(19)游击队本身须有铁的纪律，严密的组织政治教育工作，反对一切错误倾向及无意识的烧杀等，组织宣传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

(20)尽量吸收贫农、雇农、苦力成份参加。

(21)对农民的原始组织如红枪会等：①在政治上号召他(们)，争取他们的同情，分化他们揭破首领的罪恶。②派去作(做)工作。③尽

量避免军事上的冲突。

(22)对附近各地士兵应有计划的派人工作去。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委 1932年3月20日关于游击 活动情况的报告

一、三嘉原准备时期

由新堡开至三家〈嘉〉原时，仅在中途举超反帝同盟军名义。当驻扎三家〈嘉〉原时分为二个支队，第一支队是中心骨干，第二支队纯系土匪杂合面成。当省委巡视员未来之前，仅在第一支队成立了士兵委员会，提出官兵一律月薪廿元的口号，而第二支队完全拒绝，斯时第一支队共分四个大队，其中以警卫大队在纪律上、成份上比较好些，但是这些还不是政治上的团结，而是个人感情乡土观念的集合，党的领导在政治上非常薄弱，其他一二三各部队，个人感情拉拢的工作尚未做到，尤其是第二大队，时常防备其哗变偷走，而各大队土匪都占绝大多数，在第二大队有洋烟灯八十余架，这些即可证明成份的好坏。据一般调查所得，这些份子有了洋烟，共产党红军什么都好！但洋烟瘾发了胡弄一阵。零碎在民间私取物件等事还不断发生，不过好者，就是不敢公然抢劫奸淫妇女而已！而第二支队则更坏，时常出外抢人，奸淫妇女，与土匪毫无分别。

在这样成份组织成部队，只有很坚决的肃清土匪流氓分子，洗刷部队，企图渐次的改造，纯是幻想。因此决定工作第一首先将第一支队许多土匪首领赶出部队，然后渐次肃清，其群众尽可能的保存一部分觉悟的先进分子。第二将第二支队完全解决。

因此第一支队将几个土匪首领一齐肃清出去，他们企图哗变，因有士兵报告，枪决了1个。第二支队于二月初完全交〈缴〉械，保留了一小部分，其他的一大部分完全开除出去。

此后按省委所指示的军事计划，实行编制，分为四个大队，各大

队附骑兵中队一队，冲锋班一班。建立各大队的政治委员系统，第一二三大队的政治委员已派就，只缺警卫大队的政治委员。

当时军事计划有两方面，或者游击职田镇，或者为解决经济问题袭击山合（河），但袭击山合[河]有单纯的军事冒险，同时因第三大队之哗变，最后决定向三水游击。

现在名义问题，用什么名义呢？仅仅游击队是不能在政治上号召群众，虽然内部成份恶劣，在游击时有发生土匪行动之虞，但为政治上能号召群众起见，故定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内部政治动员，游击(队)战争纲领在士兵委员会中详细讨论一致通过，拟定纪律大纲亦在士兵委员会详细逐条讨论。

二月十二日举行授旗礼，由反帝同盟军旗而变为红军游击队旗帜，全体战士集合，各个自由讲演，士兵委(员)会的代表及三水农民代表。这一天重要的解释，是说明红旗之意义及游击队之政治任务。

游击计划：开始占据职田镇，逮捕各区重要豪绅，执行游击战争纲领。首先组织分粮运动，捣毁行政机关，召集群众大会，更进一步的进行土地革命，争取广大的群众对于这一部队的同情。行动区域先占职原，次再进清水、土桥，然后直冲浮化口子头、三原武字区、富平一带。

关于逮捕豪绅，一致的通过，先行秘密逮捕，然后公布其罪状，若号召群众共同逮捕，恐怕闻风先逃，一个也捉不到了，群众目前一时也不敢来。

此时公布了布告第一号告农友书与告士兵书，这些文件都在士兵委员会讨论。

二、职田镇游击之经过。

二月十二日举行授旗礼后，即决定晚间进占职田镇。这一日早即派骑兵到职田镇……(此处原件不清，下同)监视职田镇区区长与团头，当日晚大部队全进职田镇，……拂晓派三四路去捉豪绅，全盘捕捉豪绅的计划完全实现，差不多职镇原的重要豪绅都捉到了。

次日正在职田镇原开始作宣传鼓动工作，以公布的口号、传单和

布告第一号为根据，阴历一月九日(职田镇集日)召集了职田镇群众大会，在大会上选举了三个农民主席，参加大会者有四五百人，议事日程第一、宣布本军的任务，解释红军是什么?红军的任务是什么?第二、宣布解散区公所及民团，并将区公所及民团一切帐项焚毁；第三、焚毁一切帐债契约，将所被逮捕豪绅。的帐债契约，当场焚毁；第四、进行分粮。

关于分粮运动，必须有详细的记载。因为在分粮过程中，可以看出农民一般的情绪及我们应取的策略。开始分粮，一般群众多不敢要，因此我们将职田镇粮食运至城外开群众大会的场地上。收毕后，请他们自由去取，首先引起他们分粮的行动。在这一日，将多数尚未领到粮食的人，引至职田镇去了。一般的该本村人无论如何不敢分本村豪绅的或地主的粮食，农民都说，你们在此是可以的，你们走了以后怎样呢?如果豪绅没有逮捕，则更不敢要，这时分粮运动是无组织的、散漫的，谁来就给谁。当时军委会讨论分粮工作，决定组织各村的分粮委员会，由分粮委员会组织，进行有组织的分粮运动，去团结一部分进行〈步〉分子，由分粮委员会过渡到群众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这一工作完全未实现。

关于农民赤卫队及群众组织的建立。因为职田镇没有地方，组织非常困难，但有一机会，使我们用全副力量，至少可以建立部分组织，其情况如下：我们开始逮捕豪绅时，离职田镇不远之墙下村农民数十人报告该村土豪董××系一富农，无恶不作，由该村农民引路，我们将他父子三人完全逮捕，后来我们退职田镇，董姓家属企图威胁全村农民，准备向军队告状，捉拿这些农民，这些农民连夜赶至我们防地，当第二次进占职田镇时，听说墙下的农民要求，将该董姓处置死刑。这样墙下农民和董姓结下死仇，我们利用这个机会来建立农民赤卫队，给这些农民的武装，在该村召集群众大会，号召组织赤卫队，但大多数农民恐惧心理非常之大，情愿在红军中当兵，不愿在家组织赤卫军，大约有八九人都来参加了我们的队伍，同时因移动关系，这一工作暂时放弃。当时决定以这一村为中心组织农民赤卫军，渐次向其它各村发展。

我们得到了敌人进攻我们的消息之后，我们即计划如下：第一……兵对于本部队尚未有任何认识，敌人的兵士尚未经过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第二……或在职田镇作战，地形上对我们不是有利的。因此退在阳坡头(离职田镇十里)退可以守，进可以袭击敌人。当晚拟定宣传鼓动的中心口号，如“……杀包赌打骂士兵的樊营长①”，“枪杀苛扣军饷的樊营长”，“枪杀无理杀毙士兵的机关(枪)连长”，“欢迎警卫团士兵加入红军”，“红军官兵一律月饷廿元”等口号，宣传品、告士兵书贴满职田镇城内。

退住阳坡头时犯了一种错误，估计……或按敌人拂晓攻击职田镇之计划，当少数骑兵(因当晚准备和敌人作战，……)因三水大路都派有哨兵，当退出职田镇时，第二日上午二时许两个哨兵迷路……。出发时夜少两个战斗员，正派少数骑兵在向三水搜索找哨兵，于第二日……次的报告：口七时职田镇尚未发现敌人，当时我们的估计，敌人计划进攻职田镇，但现在已近乎十时，敌人或许不至于来，如果来必在明日，或必须有新的计划。因为阳坡头地方情形是非常有利于我们的，所以在军事上放松了对敌军的准备。

此次作战因地形关系，敌军损失很大。敌军数目按当时估计，警卫团三符六、九连，机枪连及彬县等处民团共计五百余人，此次作战将九连与彬县民团完全解决，七连与机枪连损失很大，交械共计百余，这是红军游击队第一次胜利。在作战时，许多战斗员同样呼我们的政治口号，“士兵不打士兵”，“士兵不打红军”，“交枪不打人”，“红军月饷一律廿元”等口号。

战后对俘虏的工作，所有的俘虏都安置在一处，第二日仍回职田镇，俘虏中愿意留者在此作事，不愿者随同伤兵回去，留部队者仅七人，其他一律送回，由士兵委员会开会慰问欢送，用士兵委员会的名义买各种礼物同宣言、传单一并给。当俘虏时，一般士兵恐惧心理非常大，尤其以第五连为最，因为该连长曾经与士兵讲话，被共产党捉住就不得活，所以许多士兵多半跳入深沟受伤，阵亡的白军士兵都用大车送至旬邑。留部队的士兵弟兄当日晚召集士兵委员联席会欢迎。

关于第九连长，当时我们认为下级军官，尽可能的放去，尤其是在第一次西北的红军和白军作战，若放去，可以使以后下级军官可以减少决死战之决心，如果要执行处置，必须要(以)该连士兵弟兄的意见为标准，或者暂时不释放，但当第九连连长已带受重伤，部分的士兵对该连长还有些好感，从招待服侍时可以看出，所以决定该连长与七连一个排长共同释放。

此次俘虏未受伤者三四十人，受伤者廿余人，阵亡者近廿人，而我们则仅三人受伤。

据事后调查，根据俘虏的话说，敌人内部是动摇的，七连可说是无作战的准备，九连及其他部队都受了政治影响，不愿十分坚决的作战。

在职田镇连开差作战游击一星期之久。

在这一战争后，我们估计敌人必然要调大军来围剿，可能者必然是警卫团或者特务团，所以决定工作计划乘敌人兵力未来集中以前，先向土桥、清水原一带游击，然后直冲淳化向三原发展。最初计划共同绕县城一直到土桥解决当地民团，逮捕袁书等豪绅，向三原发展。

二月十九日夜，行军绕县城经过清水原。临行又改变计划，就是不以全体部队到土桥，如果全体部队到土桥，亦随同伤兵行军非常迟缓，若敌人从淳化来，则我们完全无退路，故另决定大部队以清水原郝村为根据地。到郝村时，首先派骑兵逮捕土桥豪绅。恰巧这一天(十九日)警卫团开至旬邑，特务团由淳化于晚十一时开到土桥，原防军饭后……向旬……豪绅因白军开来各回家乡。因为自我们发动以来，不在家住宿。恰好红色……于天明时赶到目的地，所要逮捕的人均未逃走。

骑兵将所有的消息报告后，必须变更自己的游击计划。因为在职田镇游击有一星期之久，这此〈次〉长途行军，步兵六十余里，骑兵近乎百多里，终夜未睡，兼之伤兵必须拾上，行动非常迟缓。故当时决定，现在若由淳化直到三原，是冒着极严重的危险，同时枪枝多数必须修理，警卫队的枪枝损坏，多半不能用，目前人困马乏，不能继

续作战。同时清水原的农民，又没有配合，故按黄同志提议暂退离清水原有两天路距离之香山寺，作短时期军事上的休息，整顿内部，然后绕柳林耀州一直到三原。

三、退入香山寺，又不战口焦家坪、宜君及返回甘肃山合〈河〉二十日到香山寺后，沿路经赵街〈照金〉，将该处民团驱散，缴枪一支。至香山寺工作的经过——各大队内发生许多坏的现象。尤其以警卫大队为最。警卫大队自胡同志受伤后(队附)，大队长不负责，部队内个人纠纷非常之多，愈弄愈坏。此时即决定赵同志任<三原>该队政治委员，三、四大队附，但二人均系新任，一切情形不十分明瞭，第二大队经过了……的工作，在群众中用反对烟灯为名，开士兵委员会，将十余人开除。

政治工作决定了四个课目，政治委员会共开两次，支部会开了一次，讨论职镇游击之经过，停了四五日得到了相当的休息，决定在耀州川游击，然后再三原，故派黄同志找耀州组织，部队即开至义石[衣食]村(距香山寺三四十里)。义石[衣食]村是炭井所在地，据黄同志报告，该地炭井工人二三百人，地势非常优越，我们部队在此候黄同志，黄同志回来再决定游击计划，但黄同志一去不返，无法再往前进。

义石〈衣食〉村炭井工人，因新年才过，留存者仅二三十人，我们最初提出“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时间”，“工人自己组织炭井”等口号来号召工人。但第二日调查，这些口号是不适合的，因为工人和窑头共同租官地开炭井，工人与窑头按股分配，生产物多，工人与窑头同样多挣钱，并且工人与窑头共同担负炭捐官税，这样窑头剥削工人，而且将捐税转给工人身上。最后我们提出“反对炭捐摊派，工人自己组织炭井”，但因工人非常之少，工作没有成绩。第三日即派骑兵到瑶曲(义石村北大镇)游击，然群众逃避一空，所逮捕的豪绅自己逃去，在此地吸收炭井工人六七人。

是日晚得到消息，耀口各县民团集合于柳林，而我们当晚即准备次日拂晓战，胡三集合三县民团二千七百多来围剿，但敌人仍然没有得手，互相支持半日之久，敌的损失比我们大，并将庙湾团完全驱散，

我们因山地作战，即不能进攻，无所谓延长战争，随后退，而安然退至焦家坪。

焦家坪是宜君重镇，驻民团与井岳秀左团一连人，我们退至焦家坪时，将民团与左团一连步兵部队完全击散，在焦家坪共驻了三四日，最初人民逃避一空，他们都不明真象，不知是队伍，也不知是土匪。首先设法将人渐次唤回。次日进行分粮，但一般人都不敢要，第二大队进行分粮时将粮食用自己的牲口送至穷人家，在此贴出告陕北农民与井岳秀军队士兵书。

这时适有榆林教育团的同志魏来参加部队。他曾组织同官士兵哗变，但未成功，故和我们商议决定配合城内哗变，攻取同官，断绝敌人交通要道，解决经济问题与武器问题。在出发前又接到另一消息，耀州开差，宜君驻有重兵，我们判断敌人分两路进攻焦家坪，胡三团有可能由后路进攻，临时变更计划不进攻同官，即夜行军去袭击宜君来之敌军。

途中并未遇见敌人，又驻宜君北之爱好窑，适左团来袭，将一营打败，收枪二十余支，俘虏七人，内排长一人(事后查内一连长)对俘虏作了相当的工作，一齐放回。这一回对俘虏工作比职田镇更好。由此战后决定，重向三水游击，实现我们游击一周的计划。

这一时期的游击，在部队内发生了许多坏现象。抢人零碎东西，企图奸淫妇女，因粮秣与住宿困难，发生了纷乱不听从命令、自由行动等现象，土匪的面孔完全暴露出来。因为经济困难不能发饷，部队中发生“军队不发饷，土匪不放抢”之谈。整个的部队不〈还〉建筑在个人感情团结之上，除第二大队尚有党的核心外，其他各大队还未建立。零碎开小差者有五人(之)多，而鞋袜与薪饷成为很严重的问题。

四、三合〈山河〉游击之行动

三月十九日到山河之北柴桥子驻扎，最初准备经口村原到职镇游击。到山合[河]后，时间大变动。陈国〈珪〉璋失败，陈的残部到处骚扰，给农民派款派粮，或土匪成群。因此激起陇东数县农民抗款运动。刘副官给三合[山河]派款数万元，南原农民将摧〈催〉款人赶跑

了，各处农村门动集团准备抗款围城。

军委会即决定暂时不向三水游击，援助三合〈山河〉农民抗。款围城，号召南原农民共同行动，就地组织三合〈山河〉农民，□□□传单，号召抗款围城的斗争。

围城，第一配合士兵哗变，第二号召南原农民，都受到了暂时的失败。

第一，配合士兵哗变。城内共有士兵近乎百人，有二三十人准备内应，约好举动日期，拂晓进攻，但因夜间行军，警卫大队迷路，不能按时到达城边，致围攻一日，城内不敢举动，夜间我们退出关外，事机泄露，内应者被捕。第二，南原农民被豪绅阻止，命令解散团，以致南原农民不能按时前来围城。同时东南西各区以南原农民的马首是瞻。

这次失败的原因：我们的错误，第一、事前未将南原各处豪绅逮捕；第二、没有实际到南原游击，只派人去找或交涉，派骑兵武装宣传……都因：(一)农民恐惧心理大；(二)豪绅阻止未能集齐。

这两次失败后立即变更计划，第一到南原游击解决豪绅；第二将集合的团改组成为赤卫队；第三立即实现布告第一号之几个纲领；第四仍然准备围城；第五创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准备围城……在中心区域(史〈寺〉村原)成立苏维埃政府，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具体办法请各大队……分别区域，各大队负责建立各区的工作，先召集各村的群众大会及建立各村的赤卫队，以各村为单位……原大会成立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用此委员会公布苏维埃政府的一切法令。

关于三合〈山河〉游击报告这是很……的，我们随即将很详细的报告与工作计划送上审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队委

三月二日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3 月 21 日关于陕甘游击队的情况给中央的信(节录)

中央：

中国红军陕甘游击队，已于 1 月前在欧甘边境旬邑(即三水)举行宣誓授旗典礼，发表宣言通电指令等，共编制 3 个大队，设立总指挥部，人数共 400 余人，枪 300 余支，都是好枪。2 月初在旬邑职田镇击溃白军 1 营，得到手提机枪 20 余支，盒子炮 7 支，长枪 100 余支，俘虏白军士兵 40 余人，连长亦被俘，赤色战士的勇气立即提高，同时把旬邑豪绅完全逮捕，粮食分配，农民最近在耀州两县又大大击溃民团、白军井岳秀，缴短枪数 10 支。据昨天来信，已回到陕甘边境，不久又到旬邑，人数已达千余人，枪 1000 余支。

根据以上，省委认为：

3、红军游击队迅速向三原发展(很近的一天可到)，配合 3000 农民武装(已经组织好的，完全是党的领导)，城市中的革命兵变(已准备的)广大贫民，夺取陕西政治经济最中心的三原，马上建立苏维埃政权，很快的进攻泾阳、高陵、咸阳，沿渭河流域截断渭河交通(在这数县内都没有驻军，而且是灾区，党的工作最有历史的几个区域)，开辟西北上一大片苏维埃区域，省委估计了主观和客观的条件，都是极充分的可能，只要党能坚决的正确的去领导。

③因为各方面的配合，军事上必须准备成立正式红军。怎样编制，番号如何规定，请立即答复，来人必须于廿天到西安，绝勿有误，十万火急，并先盼复！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警卫大队
1932 年 3 月 22 日工作报告

I、前提：警卫大队是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的基本部队，在前一时期(去年)无论在战斗员与指挥员的成份上，政治认识上，战斗力上都可作整个部队的模范与领导者。但在今年一月间因部队的扩大，与另行编制，各部需用人才太急，于是将警卫队的中心干部调动了 30 余人，这时候警卫大队的中心干部确实成了极严重的问题，但因为其他各大队自经过三大队全部哗变后(在三家〈嘉〉原)因成分之极不好，时常有哗变携械逃亡的可能。因之由省派来的许多干部及农民中的中坚分子尽派入一二大队，至于警卫大队呢？虽然不是多么很好，但暂时不发生什么严重问题，于是也就不加紧改造，在事实上就忽略了另一方面，警卫大队士兵的成分，也是很不好的，在总数 78 人中(战斗员与指挥员)，工人占 4，农人 30，士兵 20，土匪 7，团丁 3，商人 5，学生 8。在表面看来，似乎成分很好，但一考查，其实际就不尽然了。①这些农民以及军人出身的战斗员，因为家庭经济的破产，很早就出外胡逛，到这部队后又未能加紧政治教育，肃清他们的流氓习气，因之流氓意识还是非常浓厚。②有许多新参加的农民以及团丁，也渐次流氓化了，还有 10 余人是哥老会分子，他们现在虽没甚么可以被人觉察的活动，但他们的意识以及举动，是很不好的。在三家〈嘉〉原易帜时，各大队部有政治委员之设立，担任士兵的政治教育，但警卫大队，直到香山后方开始发表，以后在深山中数月〈乎〉天天行军，一切政治教育都感觉到紊乱而无系统，每日忙于士兵相(互)间纠纷及其他复杂问题的解决，在实际上收效也很小。

一般战斗员在上述的情况之下，他们的政治认识是非常低微的，在 70 余人中几乎 3 / 4 是陕北人，到这一部队并不是政治上去号召的，完全拿同乡的感情去拉拢的，占有绝对多数的战斗员，是为了每月 20 元大洋而革命的，经济极端困难的现在，他们告假的人也就很多了！在这一大队中，俗语所谓“逛架子”太多了，对于他们的政治教育是极感困难的，他们在表面上虽可以接受政治委员的指导，但在实际行动中，自己是另有成竹在胸。

II、战士委员会：警卫大队战士委员会(先名为士兵委员会)是今

年1月18日在三家〈嘉〉原成立的，首先由战斗员中之积极分子发起，委员会由5人组成之，另设常委会，处理日常事务，委员会的分工，有研究会、拳术会、戏剧团、识字班、辩论会等部门，各部门工作，除拳术会稍有工作外，其他都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在成立后的两月内，共开大会4次，各级代表会1次，常委会6次，会议的主要决议约有数项：①对于各级指挥员之监督，撤换和警告处罚，已撤换者有中队长1，警告并在济上处罚者3(事由大半为打骂战斗员与能力缺乏不能统率部队者)；③对于战斗员违犯政治纪律之处置，如出差私扣衣物及银钱等；⑨对于高级指挥机关军事上及其他方面的各种建议如军需战斗指挥等；④对于战斗员切身利益的争取如发给鞋袜衣服

一般战斗员(对于战士委员会只认为是对于指挥员对于上级的一种自求切身利益的组织，根本不认识自己管理自己，监督各战斗员，还是主要的任务，有时候对于自己的主要错误(如行军违犯纪律……)却不管了。

战委会在两月来的工作过程中，确实没有多大的成绩，战委会基本上是不健全的。2月22日，因工作不能推动，决议改组，但改组后的工作仍和以前是同样的消极状态，有些同志认为所以有此种结果是因为行军没有一定的地址，经常出差没多余的时间，致耽误了战委会的工作，但主要的原因并不在此，战委会的负责人，根本上对于战委会的工作是怠工的表现，有困难问题，不能很虚心的用自我批评的态度求得适当的解决，政治委员不能有计划有系统的去督促，去指导，一般战斗员对于战委会的基本任务还不明瞭，有少数战斗员，认为有无战委会没有关系，即是明证。

III、宣传队：宣传队是政治委员直接指导下之一种鼓动群众组织群众的组织，宣传队的任务是很严重的，现在警卫大队的宣传队并不能担负此种严重的责任。①现在警务大队的宣传员只有8人，一般宣传员的政治水平以及对党的策略的认识与了解，根本上是谈不到的，因之也不能切实执行宣传队的任务；②没有经常的宣传会议，宣传队成立两月来，只开过四次会，每次会议，不能讨论党组织群众鼓动群众的策略，宣传的中心口号，宣传的具体方式与方法，宣传工作的经

验与教训，只是解决了许多锁〈琐〉碎的技术上的问题(如宣传分工，准备标语传单口号等)；③口头上的鼓动群众，虽然到每一地方后都已执行了，但执行的是非常不够，尤其没有运用个别的谈话，去宣传与教育一般群众，贴标语，写口号，成为主要的宣传方式，这样所得的成效是非常之少的。

IV、党的组织与工作：警卫大队现在只有同志 10 人(指导员 6 人，战斗员 4 人)。在此 10 人中，工人 1 人，农民 2 人，兵士 4 人，商人 1 人，学生 2 人。由此可以知道党员的成分是不很好的，党员还没有深入到下级战斗员中，指导员同志多于战斗员同志，一般同志的政治认识与对党的策略的了解程度非常浅薄，除过新来的几个同志外，旧日的同志多反映着流氓的意识，因此不正的(倾)向时常表现(如对整个部队或某个同志不满意，不运用组织的方式去解决，很随便的在群众中公开宣布，引起群众对于整个部队的不满意，群众中的不正确观念，党员同志不但不能克服，反而助火添油，跟着群众的落后意识跑，同志相互间的纠纷等。)

警卫大队的同志，现在还不能在自己的部队中作中心骨干，起中心的领导作用(有时党完全解决同志与群众间无意识的纠纷，如战士委员会对各队长同志的处分等)。

现在士兵群众中，有中心对象十二三人，已经成熟的六七人，刻下即可介绍。

党的支部会议不能经常举行(两月内只开过 4 次正式的，1 次临时的)关于党的以及部队内的中心问题，不能经常讨论，过去几次会议所讨论的，多半是防范土匪掠械潜逃以及调换枪械兼调换指导员等，省委对陕甘游击队的指示信，只讨论过 1 次。

3 月 26 日

其他各大队的报告，因来人仓促归家，未能同时带上，一二日当再报告。

中共中央 1932 年 4 月 20 日关于 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 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

一、在空前的灾荒与农民斗争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陕甘边的赤色游击队在与国民党军队及民团的英勇战斗中，得到了许多新利，而且日益壮大起来。他正走向与三原的农民武装队伍汇合起来，而成为一个很大的力量。陕甘边农民游击队的英勇的战斗与胜利。粉碎了一切机会主义者的“北方落后论”，给了“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和土地革命斗争的勇气和决心，”，的机会主义的胡说，以致命的打击。证明了党提出的“要在这些武装斗争已经成熟的农民区域，集中力量去发动那边的农民斗争，一直到游击战争。在北方更要特别注意兵变发展的区域，使这些兵变配合着当地的农民与工人的斗争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的任务(中央 9 月 20 日决议)是完全正确的适时的。

二、估计到目前陕西的农民反抗捐税，反对高利贷，反对国民党统治，争取土地，灾民分粮抗粮的斗争普遍与紧张，估计到陕西的士兵哗变的激流的增涨，估计陕甘游击队及三原农民武装队的力量，及该区敌人武力的薄弱，最后估计到全国革命危机的成熟，应该清楚地提出，在积极的开展当地的游击运动中，创立新的红军的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

三、为着实现上面的任务，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拔中坚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最迫切的任务。

“建立完全有战斗力的政治上坚定的红军，在现在中国的特殊条件之下，是第一等的任务。解决这个任务，就一定可以保障革命的强大的发展”。这在今天陕西的经济与政治的环境中是更加明显与迫切的。

“红军的社会成份应当是工农的。主要的指挥干部应当是工人的，要有坚决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者，要有最靠得住的，要有铁的纪律。力因之，在组织陕甘边的经常的红军时应该注意到：

A、以武装农民为新的红军的主要成份，最大限度的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陕西省委必须从西安动员大批的工人群众去参加红军，建立在这部队中的工人的骨干；B、从游击队中选拔最可靠的党员与工农分子来担任红军的指挥员，即刻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来指挥红军行动；在可能的情况之下，即刻开始开办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C、立即开始建立红军中的政治工作，指令可靠党员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实现中央制定的红军编制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青年团的各种条例，红军中的政治委员是红军中苏维埃政权与党中的代表，他对于部队的纪律，政治觉悟与战斗力的加强等等与军事指挥员负同样的责任，党的团的组织任务是提高红军战斗员的政治觉悟，巩固部队的纪律与战斗力，他们应该在政治委员的指导之下工作。中央责成陕西省委从自己的常委中派遣一人去担任二十六军政委；D、在最初应该编成红军 1 师(按照红军编制法)，即该师应有 3 团，每团 3 连，每连 3 排，每排 3 班，并努力求得在最短时间达到红军 2 师。该部队翻〈番〉号暂用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四十一师。E、红军的军械军需及给养的补充的来源，只能把军阀的军队作目标；为着这个目的，可以而且应该实行游击敌人后方的辎重队和交通队。

四、在目前游击队行动的区域中，必须立即彻底的执行下列的任务，以便将这个区域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些任务是。①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它平均分配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之下，分得一份劳动的土地，土地应该按照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平均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念雇佣和贫农的利盖，而且要顾念中农的利盖。只有在基本农民群众愿意和拥护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及租税应立即废除。②彻底的摧毁当地的反革命的政权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权机关。应当从当地的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组织陕甘边苏区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的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革命。革命

委员会必须宣布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一切决议与法令，并努力实现这些法令，它应该根据苏维埃的组织法来组织分村县以至全边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之中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及党的领导。⑧解除边区内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组织农民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这些队伍的任务是与苏区内部的反革命作斗争，保护苏区边界，参加一般的政治和组织工作，他们同时应该是补充红军的后备军。迅速的彻底的实行上面的任务，才能创立真正的巩固地——目前游击队的行动的区域三水正宁三原这一带，有着建立这样游击队的优点。农民斗争的紧张，与和三原长安等中心城市等等。应该首先巩固这一带区域作为我们陕甘边苏区向前发展的根据地。

五、经常的红军部队与巩固的根据地的创立，绝对不是说要来取消或减弱游击战争的开展，相反地应该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及其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要记得，如果在国民党统治区域，没有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环绕在苏区周围的农民游击战争是苏维埃运动的开展与苏区的巩固的保障。因之，在三原同官蒲城一带去开展广大的农民游击战争与迫切的任务。游击队的主要任务，要在敌人的后方动作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夺取枪械，发动当地的农民斗争，摧毁反动的乡村或县城中的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等等，游击队应该是土地革命的宣传者与组织者。游击队应该吸取当地的农民群众参加自己的队伍，并努力从游击队生长成为正式的红军。红军的指挥员应该努力指导游击队的动作并将他与红军的作战任务联系起来。红军的动作存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在目前对于敌人(井岳秀民团等)应该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但是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为省委的提议)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与游击队能胜任的。这种情况，在将来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的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但是在今天是不适合的。红军目前发展的方向应该是在泾渭三水之间，消灭敌人在这里的力量创立较大的根据地。

六、红军基本任务：除了以武装对付国民党的军队之外，还要用

红军的全部人员与政治机关去做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联欢会等等，去夺取白色的士兵群众，并应该派遣〈遣〉我们的工作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他们投入红军。这种工作要与红军的武装战斗同时并进。同时中央责成陕西省委去加强在杨虎城及其他军阀的中心部队中的我们的工作。

七、在苏区及红军中建立强固的党的委员会与党的组织上的中心任务。这些党部要能够保证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游击队与红军和区域内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的领导。中央责成使陕西省委及中央组织局采取必要的办法来加强陕甘特委的领导，现在的渭北特委应该移到苏区中去，在红军根据地与游击队的区域中应该最大限度的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及优秀的中农分子入党，严格防止富农(及)阶级异己分子混入政权机关及党内来。最大限度的加强党员群众的政治觉悟与军事训练，使党的队伍能够适合于向前发展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环境。必须即刻在这区域建立群众的青年团、贫农团、工会的组织，发展他们工作上最大限度的积极性，中央责成团中央及陕西省委，采取一切必要的方法来创立这区域中团的组织。并改换与加强团西安市委的领导，应该考虑建立强有力的团的陕西省委的问题，党及一切群众组织应该在深入土地革命，创立红军与苏区根据地及扩大红军及游击队上发展〈挥〉其极大的积极性。应该引用其他苏区的经验来进行广大的拥护红军扩大红军的运动(慰劳、收集粮食、打草鞋、动员到红军中去等等)。

八、陕西省委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来开展西安等中心城市中的工人的罢工运动及反帝运动，及蒲城富平渭南凤翔的农民游击战争的发动，组织士兵的革命兵变，以及灾民分粮抢粮的革命斗争。“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个群众的发动，这在非苏区之中不但是组织群众的一步，亦就是进行武装暴动的一步。而且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陕西省委及陕西党的组织，必然十倍的加紧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这种倾向表现在：对于目前形势的估计不足，认为陕西没有发动游击战争与革命兵变的可能，认为“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政权及土地革命斗争的决心和勇气！”忽视无产阶级在反帝运

动与土地革命中的领导权等等，坚决的布尔什维克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能够顺利的克服这些部分的动摇游疑，而在坚决的实现这个决议的基础上，在光荣与勇敢的斗争中造成新的广大的坚固的陕甘边苏区与英勇的红二十六军！

中央

1932年4月20日

中共陕西省委 1932年6月1日 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 游击队的工作决议(节录)

(四)在省委检查了这些错误，根据中央的决议，对于创造新苏区与游击队的工作，有以下的决议：

(1)我们清醒的估计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深刻的检查了省委过去领导的错误，必须以十二万分的力量改正党的“左”右倾动摇的错误，确定布尔什维克的正确的路线，坚决的、顽强的创造陕甘边新苏区，执行中央所指出的“在积极的开展当地的游击战争运动中，创造新的红军队伍及陕甘边苏维埃的任务与巩固苏维埃根据地的三个任务”(见中央决议)。

(2)在创造新苏区与开展游击运动上绝不能有丝毫的分离，相反的，正是一个任务两面执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必须与开展围绕这一区域的游击运动，开展游击运动也就是对于创造新苏区最有力的帮助，所以必须组织几(个)农民斗争比较高涨的区域与农民游击队—无论新式武装的多少，都把他组织起来，开展游击战争，到处扰乱国民党的后方，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夺取武装枪械，发动当地的农民斗争，摧毁反动的乡村或县城中的政权，进行土地革命等等。以扩大苏维埃运动，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3)为要执行这一任务，必须大批的动员与征调同志与劳苦群众到游击队中，积极改造游击队内部的成份，以武装农民为新的游击队

的主要成份，用最大限度吸收贫农和雇农参加。省委必须马上发动西安的几个工人与三原、富平、蒲城一带的农民去参加，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每一个指挥员都要是很可靠的共产党员与工农分子，这样去保障党的路线的执行。

(4)特别加紧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指定可靠的同志为政治委员与政治指导员，实行中央编制的政治工作，政治委员政治部，党和团各种条例，加紧对于游击队政治教育。提高战斗员的政治觉悟与战斗力，要使每个战斗员都能了解他们是为什么而当红军，现在应当把月饷 20 元的口号取消，提出优待战斗员的口号，并补充以“财政公开”、“平等待遇”，“有钱大家用，无钱大家穷”以及发动群众组织慰劳队、洗衣队、运输队，开欢迎欢送大会，在作战胜利或失败的时候，都应当鼓励或解释劝慰，以提高战斗员的决心与勇气，战事〈士〉委员会的组织应当马上取消，因为这是我们用以瓦解敌人的军队的组织。加紧训练新的干部。在可能的范围内，即刻开始开办红军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指挥官。同嘲在新成立的或由白军中哗变过来的队伍，指挥员还不是我们的同志，或好的群众，我们用这种组织监视并改造这些指挥员，现在的情形一般的讲，指挥员还要比战斗员好些，而我们的战事〈士〉委员会却有撤换指挥员的权限，并且我们的命令，也要经战事〈士〉委员会的讨论，这无异于自拆其台。对于这一群众的工作，应当组织俱乐部，或战士联合会，他的主要任务应当是：①加紧战斗员政治的军事的训练；②战斗员的互相监视与督促；③检查经济与指挥员以及改良战斗员生活；④检查战斗员或指挥员触犯红军纪律；⑤严查反革命阴谋，肃清反革命分子与嫌疑分子。

(5)对于革命委员会或当用最大限度的力量领导，这一革命委员会很快的能执行土地革命，以转变为苏维埃政府。这是党目前一个中心工作，应当而且必须加强他的组织力量，具体的经济的规定他的工作，他的组织成份应当是工人雇人苦力贫民中农与游击队的代表，严防富农豪绅……等混到里边来，同时又须在各地舱游击运动中，普遍加紧建立革命委员会，以扩大并深入苏维埃运动。

(6)应当用最大限度的力量去建立陕西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这

是我们巩固根据地的最主要工作，解除边区内一切反革命武装，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庭农贫农和中农，肃清边区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保护苏区边界，参加一般的政治组织的工作”，这些队伍必须经常的加紧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使他们成为坚强有力的战斗队伍，成为巩固根据地的支柱。在这里边继续的挑选精锐的部队，组织新的红军——这样才是扩大红军最好的办法。

(7)现在的红军游击队应当抽出一部分最精锐较好的部队(枪有200余，人有二三百余就可以)编为一团，其余的仍编为小的游击队，但是我们所说的抽调精锐的部队组织红军，绝不是放弃对于小的游击队的领导，相反的我们一定有计划的去怎样把握着小的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主要的任务应当是经常围绕着苏区的周围，肃清反革命势力，捣乱白军后方，执行游击纲领，帮助并发展农民的各种斗争，尤其是帮助农民分配土地。

(8)红军游击队的任务，不但用着自己的军事力量去对付国民党军队。而且要“用红军全部人员和政治机关去作瓦解国民党军队的工作用传单标语联欢会等去争取白军的士兵群众”，这一工作对目前陕甘游击队尤为重要，因为现在陕甘一般兵士的生活特别痛苦，士兵心里非常动摇，而恰恰相反的，我们的游击队对于这一工作过去却作的十二分的不够，以至根本没有。要记得，如果我们不加紧这一工作以争取白军士兵群众，这是我们很大的损失，这将阻碍着我们政治任务的顺利的执行，大大的削弱我们的战斗力，客观是帮助敌人，应当马上派去专门工作的人员，到敌人军队中去组织兵变，与煽动他们投入红军，这种工作要与红军的武装斗争同时并进。

(9)着重的指出创造新苏区与开展游击战争运动，和改造游击队的成份，这绝不能单独的只靠着现在游击队，而是陕西全党的…个中心(任)务，这一任务的执行，除了游击队与边区应当马上执行巩固根据地与开展游击运动外，各地党部应当：①各地党部应当发动群众各种斗争，工人罢工，要加工资，减工时，要特别工。尤其是在夏收的当儿，发动农民的抗捐抗粮抗款抗债，分粮，分配豪绅地主的牲畜和所有的财产，分配土地，积极武装群众，士兵中要欠饷，要经常发

饷，要衬衣要鞋袜，反对打骂，告假自由等斗争。应该牢牢的记住，每一个经济斗争，每一个罢工，每一群众斗争的发动，这在非苏区不但是进到组织群众的一步，尤就〈其〉是进到武装暴动的一步，而且是直接对于苏维埃区域的帮助。②积极的组织各地的农民游击队，在三原、富平、蒲城、韩城农民斗争比较利害的区域，应当马上开始游击战争，“消灭敌人的小部队，夺取枪械，发动当地的农民斗争，摧毁反动的乡村或县城中的政权，进行上地革命等”。③应当特别注意边区周围的区域，用最大限度的力量组织小的游击队与各种群众组织。扰乱白军后方争取白军兵士群众，动摇士兵的心理。④省委责成团市委应当用很大的力最建立游击队中团的工作，并发(动)大批的团员到游击队中去，军委应当特别对于“围剿”部队的工作，尤其是中心部队杨子恒、冯钦哉部，应当用最大限度的力量派得力同志去开展工作，组织兵变，煽动他们投入红军。同时省委责成渭北各地党部加紧民团中的工作，尤其是富平党部，应当派调大批同志与群众到胡三团中去。⑤各地党部应当征调大批同志与劳苦群众到游击队中去。省委也应当积极设法派去几个工人，改造游击队的成份，加强党的领导。⑥各地党部应将敌人的一切情形，指定专门人员经常向游击队通知，并向省委报告。

(10)红军游击队的动作，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对于敌人战斗力较弱的军队(井岳秀、特务团、警卫团、警三旅等)应当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对于敌人的中心部队(如杨子恒、冯钦哉等)，应当袭击扰乱(这决不是逃避)，应当在战术策略上特别注意(这当然不是说对于敌人战斗力比较薄弱的军队就不注意战术策略)。“但是在今天争取大城。市或截断渭河交通，还不是目前陕西红军游击队所能胜任的”。同时我们必须集中兵力反对“游而不击”的可耻的逃跑主义。

(11)对于俘虏的士兵，我们绝对反对过去的只给买些糖吃，不给任何政治教育，便释放出来，哄小孩子的办法，这样使兵士不能了解我们为什么要优待他们，释放他们，希望他们干什么。只是认为对于他们好，甚至认为“不敢惹”他们，“巴结”他们，对我们的宣传

也不过是“对他们好”而已。所以我们对俘虏当然是优待的，但必须说明红军游击队是干什么的，我们是怎(样)干法，我们为什么要优待俘虏的士兵，而虐待以至杀戮他们的官长，士兵和游击队的关系，当红军有什么好处，他们若要出来，我们应当很和善很优待，很迅速的释放他们。给他们拿相当的路费，证明我们希望和要求他们出来作些什么事情_但不是命令他们，把我们对他们所讲的一切话和对俘虏士兵的优待在白军中作普遍的宣传，并说我们非常欢迎士兵兄弟到红军中来，并愿帮助他们打死他们的反动官长……等。同时必须细心检查当中是否有化装的官长，对于俘虏的官长，必须开群众大会来审判，出群众定罪。在这当儿我们必须细心检查这些反动官民的阶级与他们平目的行动〈为〉。对于敌人的侦探，我们过去也采取了非常错误的办法，有的枪毙，有的释放。对于侦探绝对不能采取菩萨心肠的办法，也美名曰扩大政治影响，这一错误的实质： 1、不能够引起当侦探者的警惕，认为抓住只要你会捣鬼也不一定就丧命。2、在这个被释放的回来至少可以带一部分消息，在游击队上次释放的 3 个侦探，枪毙的 1 个是特务团的连长。而释放的两个当中，还有 1 个是王一山的兄弟。所以我们对侦探应当绝不留情的杀戮。同时还应当向他们拷问他的许多消息以及他们侦探的情形。

(12)我们必须有计划的进行关于新苏区与游击队宣传鼓动工作，应当把游击队胜利拍消息与新苏区群众斗争的情形，以及他们生活的改善，他们这样发展。又对于每个劳苦群众的关系，每个劳苦群众应当怎样去拥护他，发动群众的反对“围剿”红军游击队的斗争与庆祝红军游击队胜利大会，经常制定关于拥护红军游击队创造新苏区的标语与传单，这一工作关于红军游击队与边区，更应当特别注意，因为在历次对于这一工作的忽视，给了我们很大的损失。现在应当具体的经常的制定自己的宣传计划，加紧内部的政治教育与农民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每个战斗员都是宣传者与组织者。

(13)在苏区及红军游击队中，建立坚固的党的委员(会)是党的组织上的中心任务，这些党部要能够保证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游击队与红军和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的领导，省委派得力同志去组织边特

委，并责成游击队队委与旬邑党部用最大限度的力量去建立这一工作，在红军的根据地与游击区域中，应当最大限度的发展党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及良好的中农入党，严格的防止富农及阶级异己分子混入政权机关及党内来，最大限度的加强党员的政治教育与军事训练，使党的队伍能够适合于目前发展的革命的国内战争的环境，立即建立这些区域内群众的青年团、贫农团、雇农工会组织，必须使这些组织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保障土地革命与建立政权的任务顺利的执行。省委责成游击队队委与旬邑党部团市委，必须建立这些区域与红军游击队中团的组织。

(14)目前的根据应当是陕甘边区(三原南原、职田镇原)，必须积极向三含〈山河〉北愿处发展，肃清那个区域内一切反动势力，在最短期间使那里也成为红军新的根据地，因为那个区域对于我们建立根据地有更好的条件。同时游击队应当积极的向淳化一带发展，肃清这些区域豪绅地主民团一切反革命统治，使边区能够与武字区与富平打通，能够使这些区域的游击运动配合起来。

(15)在执行这一任务中，必须加紧两条战线斗争，由省委以至各地党部都应当深刻的了解省委过去对于创(造)苏区与游击队工作领导的错误，以至各地党部的消极旁观等待等态度，和对于这一运动一切军事冒险，“游而不击”的上出逃避主义，应当在政治上军事上采取绝对的积极策略，无论是进攻或防御—自然要(灵)活的运用战术与策略。

一九三二年六月一日

杜衡 1932 年 6 月 2 日关于陕甘 游击队情况向北方各省委代表 联席会议的报告(节录)

I、红军游击队的产生历史及其成份

游击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一)山西工革游击队完全是在山西□特委领导之下的，大部分是同志，成份多半是白军中的下级官长和兵士，还有兵工厂人、农民，一部分学生，人数有 20 余人，枪枝 30 余支。(二)甚柱吉完全是土匪，在山西贩鸦片烟土、拉票子，在山西时和游击队有相当关系，人数 100 余，枪六七十支，都是陕北人。(三)刘子丹部都是土匪，在保安一带，人 100 余，枪六七十支。刘是同志，黄埔学生，渭华县动时任过总指挥，□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开陕北特委书记，以后和党无形脱离关系。山西工农革命游击队在山西时，并没有执行游击战争任务，完全是拉豪绅地主的票子，群众中得到“好土匪”的名誉。且占据汾西深山，击溃过很多白军军队，战斗力很强。最后山西国民党政府动员三师军队包围深山，□游击队无法存在，即偷过黄河，预备和红军二十四军去汇合，当时二十四军将到陕北。过河后，二十四军已缴械，他们孤军独战，大小 20 余战，把井岳秀部种〈钟〉宝卿骑兵团、蒋梅生步兵团、数县民团完全击溃，得到战马 30 余匹，收到三四十支枪，由安定跑到陕甘边境保安 一带，即与以上两部土匪混合，受陈珪璋改变〈编〉为两团。因为有许多同志在部队中能起不少作用，下层群众与谢浩如(白军内任过营长、旅长、连长等职)同志有许多历史关系，还能号召起来。当时陕西省委即派浩如等三四个同志去领导，开到接近关中道一带与农民斗(争)配合起来，改造为红军游击队，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浩如同志去后，不久即将全部领出来，用反帝同盟军旗帜开到陕甘边境的正宁县。省委又派常委

杰夫同志去领导。高同志去后不久，把第二支队刘子丹部完全缴枪。正式改编，于 3 月间在旬邑职田镇行授旗典礼，正式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共编制了 3 个步兵大队，1 个警卫大队(即山西游击队为中心)，每大队两步兵中队附一骑兵中队，人数 90 人。设立总指挥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总指挥即谢浩如同志。将改编后，第三大队(即史柱吉部)完全哗变，损失精锐枪 60 余支。这时全部队有枪 200 余支，人数 600 余人。成份除在旬邑吸收了极少数的一部分农民外，大部分还是老土匪，直到现在土匪还占 1/2 以上。因为游击队是这

样产生出来的，因此彻底改造也就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了。

II、高维汗同志领导下的游击战争——右倾机会主义的逃避与置倾立三路线的冒险

当维汗同志未去游击队前，省委对于游击队的改造和游击战争任务执行的问题，是引起了严重的争论，问题的争论是正确的国际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斗争。省委大多数的同志认为“游击队的成份是不好的，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办法，只有(在)坚决的执行游击战争纲领，执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运动，发动广大农民的斗争中，吸收贫农、雇农、苦力、工人，大批的加入到游击队中去，方能肃清土匪成份，加强政治工作，树立为两团。因为有许多同志在部队中能起不少作用，下层群众与谢浩如(白军内任过营长、旅长、连长等职)同志有许多历史关系，还能号召起来。当时陕西省委即派浩如等三四个同志去领导，开到接近关中道一带与农民斗(争)配合起来，改造为红军游击队，执行土地革命的任务。浩如同志去后，不久即将全部领出来，用反帝同盟军旗帜开到陕甘边境的正宁县。省委又派常委杰夫同志去领导。高同志去后不久，把第二支队刘子丹部完全缴枪。正式改编，于3月间在旬邑职田镇行授旗典礼，正式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共编制了3个步兵大队，1个警卫大队(即山西游击队为中心)，每大队两步兵中队附一骑兵中队，人数90人。设立总指挥部，为最高军事指挥，总指挥即谢浩如同志。将改编后，第三大队(即史柱吉部)完全哗变，损失精锐枪60余支。这时全部队有枪200余支，人数600余人。成份除在旬邑吸收了极少数的一部分农民外，大部分还是老土匪，直到现在土匪还占1/2以上。因为游击队是这样产生出来的，因此彻底改造也就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了。

II、高维汗同志领导下的游击战争——右倾机会主义的逃避与置倾立三路线的冒险当维汗同志未去游击队前，省委对于游击队的改造和游击战争任务执行的问题，是引起了严重的争论，问题的争论是正确的国际路线与右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斗争。省委大多数的同志认为“游击队的成份是不好的，必须彻底改造，改造的办法，只有(在)坚决的执行游击战争纲领，执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运动，发动广大农

民的斗争中，吸收贫农、雇农、苦力、工人，大批的加入到游击队中去，方能肃清土匪成份，加强政治工作，树立党的领导骨干，才能把成份很坏、土匪布满的游击队彻底改造过来，创造正式红军，开辟新的苏区。”但维汗同志则提出另一条完全相反的路线来，他的意见是“游击队现在成份很坏，还不能执。行游击战争任务，只能执行一部份纲领，因此必须把游击队改造好后，再去开展游击运动，执行全部的游击战争纲领。目前，主要的是逮捕最大豪绅地主。”最后，经过同志们的激烈反对，他是表示接受了大多数同志的意见。省委即决定他负军事责任，另派李同志(现省委书记)去负政治责任，担任队委书记。但李同志走到中途动摇了，认为自己的能力不够，不能完成省委给他的任务，所以又回到省委。当时即决定我去巡视，负责执行省委的决定。我到边区后；游击队已离开，没有追上，但我在当地农民群众中已考察出游击队许多严重错误，省委根据我的报告，成立关于游击队决议，冲破围剿策略的主要决议(两个决议想中央已经看到)，但这些决(议)还不能很迅速的传达游击队中去。同时省委已经估计维汗同志是不能执行这些决议的。最后，我追到陕甘边境，和游击队正式接头，即详细的从各方面检查维汗对游击队的政治领导，真是非常严重，简直是革命的罪人!当我到的时候，正是游击队到了一个非常危险、几乎要瓦解的状态。这样的危险完全是维汗同志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和立三路线的军事冒险的恶果。

1、逃避上山消极退却，不采取积极的正确的进攻策略。游击队将成立后，第一次遇到了白军警卫团第三营和邪州旬邑民团，由三营营长樊连城率领，由旬邑县城向职田镇进攻，人数约 300 余人，未出发前，三营八连连长已给游击队通知，当时游击队即退出职田镇，离职田镇 20 里之阳坡头宿营，地势是非常险要的……，敌人是很迅速的向阳坡头进攻了。战斗员和下级指挥员发现敌人时，已经散兵线扑到宿营地的面前，下级指挥员战斗员自动的不候指挥部命令，即迅速的给敌人以迎头痛击，没有半点钟，把敌人完全击溃，收枪 100 余支，俘虏回兵士 40 余人，九连连长带伤被俘，逃出敌人只有 40 余人，营长亦和机关枪 3 架亦逃出去了。战

事已毕，总指挥、参谋处人员和维汗才到前方，这时指挥员、战斗员3次要求骑兵步兵穷追残敌，活捉樊营长，都被这些最高指挥人员命令禁止了，以致残敌活活的逃回县城……这次战争大胜利后，杨虎城震动，调最精锐和中心的特务团，连夜起程，兼程并进，开到旬邑县城去围剿，人数和警卫团共有1000游击队这次作战后，也估计到敌人定要来追，即决定星夜开职田之南清水原。到清水原后，逮捕了几个豪绅地主，知道特务团已到旬邑县城，即警〈惊〉惶失措，星夜离开，经过两天路程，走上耀县境内很有历史的香山寺。香山是四面孤山，周围人家很少，山上有数百僧人，粮食是很充足的，维汗同志领导游击队逃避到这样清静孤山上静养去了。住两日，无事可做，战斗员都说：“我们是干什么的！就在这个山上吃吗？”同时军事地形上是最危险的，敌人如果包围，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高山做不成清梦，没有办法，维汗同志又领导走上了毫无群众工作、政治影响的深山中宜君去了。这时特务团跟踪追击，井岳秀部队迎头堵截，更是恐惧万分，只有逃跑，完全靠着中下级指挥员自动作战的英勇，在宜君用30人击溃敌军1营，约300余人，但自己的干部战斗员也有10余人带伤。从此又逃跑了几夭，特务团到宜君驻扎县城，再未跟踪追击，才又回到陕甘边境的正宁县三合〈山河〉附近。跑了一个大圈子，本来省委的指示要游击队向农民斗争开展，党的工作有基础的区域三原一带发展，帮助农民斗争，吸收大批的农民进去，改造游击队的成份，开始建立渭北的新苏维埃区域，彻底执行分粮分地摧毁豪绅地主统治的斗争……

2、投降豪绅地主富农，放弃土地革命，在抗款围城的口号之下阻止农民斗争的深入。游击队回到陕甘边境时，正是陇东混战刚结束，陈珪璋残部刘团占据三合〈山河〉县城，苛捐杂税的摊派真是严重到极点，军队每天都到乡里去，百里周围的农民都被吊打烧拷，催迫款子。同时奸淫妇女，抢劫财物，无所不为。这时在一部分豪绅地主富农领导之下，正在鼓动农民到县城交农，农民情绪非常高涨，游击队到后，豪绅地主富农害怕了，立刻把农民解散，并且在农民中造谣煽动，威吓农民，使农民不敢跟游击(队)跑，当地没有党的组织，农民

是受到了他们的吓诈，游击队到后，都不敢起来。这时因为跑了一圈，队员的生活是苦到了极点，经济毫无办法。三合〈山河〉是陇东重镇，交通

要道，非常富足。因此即在“抗款围城”，“打开城弄钱”的口号之下，围攻三合〈山河〉县城，游击队员主要的在“打开城弄钱”的口号下面，赞成围攻。当时的办法，在政治鼓动方面，印发了许多抗款围城的口号，在狗人〈苟仁〉寺召集了一个 1000 余人的农民大会，把阻止群众、破坏群众斗争的大豪绅逮捕了两个，在群众大会上枪决了。大会通过围攻县城，农民群众的情绪是大大的提高了，南原上把刘团派得(的)收款委员，被群众打死了。这样的情形，要能继续的发展和深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食粮和土地，平分给广大的中农贫农雇农，最迫切的是分粮问题，彻底摧毁豪绅地主富农统治，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临时政权，深入反富农斗争，建立农民的武装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这样的去动员广大农民群众加入游击队，改造游击队。创造以三合〈山河〉南原为中心的根据地。但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者维汗和其他负责同志，不敢不愿这样的去作，仅仅是作到抗款围城，广大富农所热烈拥护的口号，至于中农贫农呢？抗款他们是参加的，因为抗款要围城拼死，他们就不来参加了。广大群众是不能动员起来的了，维汗同志可要非常聪明的想了一条妙计，把保护豪绅地主富农利益的民团，改成赤卫队，民团青天白日旗去掉，换成镰刀斧头的旗帜，旧的团头团总没有更动，把一个旧团总老杜弄成赤卫队总指挥。不错！老杜当时是非常热烈和积极的，用甜言蜜语，把维汗同(志)诱昏了。事实上老杜是为自己利益的，因为他和刘团长左右的最大豪绅张赞承冲突的，刘团要杀他，所以他不得不利用游击队把县城攻开，□〈把〉刘团长和豪绅杀掉，给他除害报仇，同时他更可以在维汗面前作劳苦功高的老将，好在群众中敲榨剥削无恶不作的了。至于游击队的牺牲，他是当然不顾的，最可耻的维汗还认为他是贫农领袖，因为他家庭不十分好，因为这个问题在队委会中还和其他同志大起争论，最后他以组织地位是压服下去了。这样和反革命的豪绅勾结布置好后，即动员(是命令)群众去围攻县城了。两方面的动员(是命令)，老杜下命令每

家要去 1 人围城，谁家不去，红军要罚要杀。同时，聪明的高维汗还怕老杜命令不行，星夜令第二天队政委高硕卿同志带骑兵一中队到南原去捉催。敢于用这样反革命的办法，农民怕砍头强迫每家 1 人，集合 1000 余人，给红军去围城。这样的群众，要把县城攻下，除非是历史开了玩笑，不然绝不会有可倖的，结果是完全失败了……

3、另一方面，不执行游击战争的正确战术，而是军事上的冒险。围攻三合〈山河〉县城，如果能够用游击战术，刚到正宁时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袭击县城，敌人是毫无准备的，不用很大的力量，就可以占据了。不这样去做，是完全用军事的力量围攻，敌人已有充分的准备了，城是很坚固的，围攻是不容易克取的，游击队的力量还不能胜任的，在军事计划上又遭到两次的失败。第一次是城内兵士哗变，接游击队进城，但时间迟延了几个钟头，到城下时已天明，敌兵士候了一晚候不着，又把城门关了，被敌人发觉，兵士 30 余人完全被捕，主要领导人被杀。第二次是夜间袭击东关，第二大队又误 3 个钟头，又失败了，敌人就来一个猛烈反攻，战事非常剧烈，第二大队几〈乎〉完全覆没。战事结束后，牺牲最好的几个战斗员，全部队子弹消耗 2 / 3 以上，战斗情绪低落的〈到〉极点，引起了支部同志和战斗员的严厉反对，宣告再不围攻了。最后敌人又开到援军一旅，当时的情形，如果不争取一个军事胜利，再无法维持下去了，就维汗个人都是垂头丧气，束手无策的了，开队委全体会议讨论游击队的行动，维汗和谢浩如及其他同志大吵闹一阵，无结果而散，更影响到党员群众和一般战斗员的情绪。会后，才决定把敌人诱击一下，再决定行动。可巧战争是胜利了，把敌人诱到险要地形，一个猛击，把敌军 1 团完全击溃，战斗情绪才相当的提高了。即放弃围攻，退到群众斗争最高涨的南原，这时我已到了，即开始路线的转变，执行省委的决议，把涣散了的情绪从新提高起来。这次的冒险，真是最危险的一次，是可以引到完全失败的道路。

4、政治工作徒有空名，党的威信扫地。政治工作是等于零，各大队政治委员不知道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对战斗员的一切政治教育根本谈不到，形成包办一团的事务员，每日事无巨细，都要有政治委员

管理，各大队长不负责任，党的策略和一切政治问题，从来没有在战斗员中进行过，苏维埃、红军、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决议法令，不但游击队委，就是党的同志都不知道……部队的团结，不是在党的政纲之下，而是在月饷 20 元的口号之下，发清欠饷的口号，成了一般人常常谈到，如果每月没饷，生活比较痛苦些，携枪潜逃、土匪阴谋叛变的活动就特别厉害了……

6、游击队成份的改造，不在斗争中吸收广大农民群众来参加，而是招募的方式。游击到陕甘边境后，招募了 100 余名农民和一部分土匪，成立了 1 个补充队……

III、两条战线斗争与建立边区根据地，开始全部的转变

我到游击队后……在实际工作中，开始了全部的转变。深入土地革命斗争，开辟新苏区，建立边区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是当时的 4 个主要任务，在这几个任务下面的具体工作是：

1、第一次农民群众大会，选举完全以贫农雇农为中心的各村代表会议，通过土地法令和一切决议、法令，成立革命委员会。在九（湫）头镇召集第二次的全区农民大会，到会农民 1000 余人。这个大会两个主要议程。第一，是游击队和共产党代表公开的报告游击队投降豪绅地主富农，阻碍分土地、分粮食、改编赤卫队、强迫围城的各个错误，提出我们党新的斗争纲领。号召农民为“土地力“分粮”“建立苏维埃政权"而斗争。在这个报告中，每个农民都高度的兴奋和热烈的情绪，都说“现在才对了”的呼声。第二个议程，选举各村代表，每树一人，禁制[止]富农参加，结果选出代表 70 余人，最后的统计，约贫农 40 余人，雇农 10 余人，其他是中农。农民高兴得意的说：“这才是真正穷人的世事了”，把杜指挥的种种罪恶都暴露出(来)了，代表大会第二日开幕，主要议程是：(A)土地法令和苏(维埃)政府一切决议和法令；(B)成立革命委员会；(C)分配粮食和游击队给养问题；(D)建立赤卫队；(E)推翻正宁县豪绅地主统治——县政府、区公所、民团。第一个议程农民最为热烈，会场的空气真是紧张万分，发言的人极多，几乎每个人都积极发表他对土地法令的意见。农民对土地法令

这样的回答高维汗领导的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胡言乱语，“只有这样分土地才是彻底办法”、“土地分了人就心齐”，“好得很”的呼声坚决沉重的从会场里喊出。有游击队一个战斗员参加，是非同志，他受到群众高度热烈情绪的感激(染)，把他自己的钱都买成纸烟送给农民代表，证明“农民不敢要土地”的话，真是狗屁胡说，是保护豪绅地主富农反革命利益的忠实工具的见解。土地法令一切决议都在欢呼声中通过了。第二个议程，革命委员会通过成立，农民选出委员 10 人，游击队 5 人，共 15 人组成，常务委员 7 人，正副主席 3 人。执行委员会内有土地委员会、肃反委员会、财政委员会、食粮委员会，委员中有回民代表 1 人，成份完全是贫农雇农，中农 1 人，常委内雇农 3 人，正主席高维汗，副主席张静元(雇农)李××(中农)。土地李××(中农)，食粮陈生财(雇农)，肃反张静元，财政李××(雇农)。各村成立各村委员会，大村 5 人，小村 3 人。第三项议程决定没收所有豪绅地主富农食粮，一部分分配中农、贫农、雇农、苦力，一部分供游击(队)给养。这时地主豪绅富农把粮食已大批的卖出，或埋在地下，没有农民群众工作是很难找出粮食的。第四项议程，决定旧赤卫队完全解散，因为他是民团，并不是赤卫队，富农豪绅地主都参加，每家一人的。从新组织完全是中农贫农雇农苦力群众的武装组织，自愿的加入，禁止富农豪绅地主加入，组织的办法是以村为单位，成立分队，队长由群众选出，以 1 乡(约七八个村子)成立 I 大队，大队长 1 人，附〈副〉队长 1 人。各乡结合起来成立总队部，设总队长、附〈副〉队长各 1 人，参谋 1 人，组织队部，属革命委员会。少年先锋队亦决定成立，组织与赤卫队同。第五项决定用〈以〉代表会议和革命委员会发出布告宣言，宣布三合〈山河〉县政府、区公所、民团、团总等都一概推翻，成立革命委员会农民自己的政权。这些决议是的确真正的动员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热烈的拥护游击队了。代表大会后，即开始执行这些决议，决定首先从下八社、余家庄开始执行。正在这个期间，敌人的围剿加紧了，预备执行的那天，敌人开到 1000 余人，迫近游击队，已(只有)三四十里路了，当时把这些任务都给第三支队去执行，巩固边区根据地，第五支队向三原发展，扰乱敌人后防。第

三支队又推翻了这个决定，逃出边区，以致这些决议还没有执行又被机会主义断送了。关于这点以下详细叙述。

2、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也相当的改善。政治委员的任务和主要工作也规定出来，党的政策和主要口号都发动群众起来讨论，经常召集全体讲话，和战斗员作个别谈话，调查每个战斗员的历史成份，现在的政治认识。这些工作执行比较好的第二大队……

3、党的工作的建立。省委的指示和决议各支部都热烈地起来讨论，把过去的工作有个详细的检阅，对省委的路线都热烈的接受了，维汗的右倾机会主义、各支部都受到严重打击。支部都确定工作计划，经常按期开会，党员要在战斗员中起核心的领导作用，处处要给群众作模范。第二，党的各种决议和具体策略，都经过支部具体讨论。支部要领导非党员群众参加各种群众斗争，经常用个别谈话和集体讨论党所提出的各种政治口号纲领，给以深刻的解释，同时积极的发展组织，吸收积极的战斗员中的农民和白军中来的士兵入党，各支部都有新的计划，分配同志执行。

4、袭取旬邑县城的完全胜利。为了提高边区群众的斗争情绪，发动旬邑农比斗争，挺起游击队在围攻三合〈山河〉后的失败情绪和全部战斗力，扩大游击战争的政治影响，补充子弹枪械等(方)面原因，必须袭取旬邑县城。那时敢在旬邑县是警卫团第一营平射炮一连、步兵第二连一排，离旬邑县城 30 坦职田镇往第二连两排，兵力是很单薄的，城的地形也很不好，容易攻击。估计力量的对比是绝对能够胜利的。县城离游击队只有 70 里。估计了一切条件，即决定袭取的军事计划。4 月 15 日(时间我记不清楚了)晚出发，16 日早 6 时把城占领，西堡子上只打两枪，敌人 1 排完全缴枪，共缴长枪 20 余支，手提机关枪 3 支，子弹 1500 余发，炸弹 7 箱。因为军事计划的错误，城内敌人 1 连，据险死抗，没有攻下，1 个指挥员带伤(这次只有 1 人带伤，没有死亡)，晚即退出城去，回到边区。

5、游击队的改编。为了对付敌人的围剿，游击队分开，编为两个支队，番号(为)第三支队、第五支队。旬邑袭击后，敌人一定要很

迅速的围剿，即马上改编。编制是支队部：支队长 1 人，政委 1 人，参谋长 1 人，经济员 1 人，传令兵 2 人，马 3 匹，骡子 1 头，司号 1 人，火马夫 2 人。大部[队]部，大队长 1 人，队附 1 人，政委 1 人，经济员 1 人，司号 1 人，马火夫 1 人，传令(兵)1 人，马 1 匹，骡子 1 头。中队有 3 分队，每分队战斗员 10 人。火马夫 4 人，骡子 3 头。每支队两个步兵火队，1 个骑兵中队，少年先锋队直属支队部。第三支队因在根据地，还附设军医处、修械处。两支队的任务，三支队留在边区根据地，五支队南下到三原，帮助三原农民斗争。

6、敌人大“围剿”，与我们冲破“围剿”的主要策略。敌人“围剿”的布置，共调 6 团兵力，陇东杨予恒 1 团，刘文伯部 2 团，特务团 2 营，警卫团 1 营。出旬邑彬州向边区进攻，井岳秀 1 团由宜君县堵截，冯钦哉部 1 团由耀县堵截，刘文伯总指挥陇东旬邑方面进攻，宜耀军队和民团堵截。队委经过两次会议的讨论(改编前 1 次，改编后 1 次)，一致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主要策略：第一，积极巩固根据地，实际执行农民代表会议的决议，号召广大农民起来和游击队共同作战，在敌人还来布置好以前，即给敌人先到部队以迎头痛击，击溃一方面，给敌人围剿以打击，但必须在深入农民斗争中才有可能。第二，五支队迅速南下，乘敌还没有准备，即到三原和三原开展的农民斗争配合，敌人必然的要集中力量对付三原，因为三原是敌人心腹。这时五支队可与三原农民配合起来，由淳化回师旬邑，和三支队与边区农民夹攻特务团、警卫团，有可能的把特务团与警卫团全部解决。第三，加紧对敌人士兵的鼓动工作，小传单标语口号在大路上和敌人必须经过的村庄、道路、镇、店，普遍的书写和张贴，以动摇敌人的士兵。第四，战术完全用游击战争的战术，运用群众的隐蔽诱敌深入、猛击，用赤卫队扰乱敌人的后防宿营地，以疲惫敌人，削弱战斗力再加以袭击。第五，组织甘肃王志远旅兵变的组织和游击队配合，牵制甘肃军队。这些策略决定后，改编的当天晚问情报，敌人已逼近了，五支队连夜起程，当时的分工，维汗同志仍留边区领导三支队的工作，我随五支队南下回省委报告工作，同时组织渭北特委。

以上是我 3 月 29 到边区后，4 月 18 号离开边区时的 10 余日工

作的经过。

7、少数民族问题。边区回民很少，只有四五个农村，大半都是在山中开荒地生活，都是贫农，只有一两家富农，游击队中有两个回民非常勇敢，都牺牲了。即派代表给家属送三四石粮食礼物，召集几个村的回民大会，宣布我们的政纲和苏(维埃)政府对回民的决议，回民更热烈的起来拥护我们的土地政策，拿东西慰问游击队，回民也选代表参加革命委员会，许多回民对我们表示，他们可以自己派人到甘肃回民区域，宣传我们的政纲，解释回〈过〉去冯玉〈祥〉时代回汗〈汉〉战争的原因，号召回民起来拥护我们。回民也组织了赤卫队，很强悍的，游击队中有 8 个叛变的土匪，携枪 8 支，路过回民区域，回民打死 1 个，收长枪 1 支、盒子枪 1 支、冲锋机关 1 支，最后把机枪送到游击队中米，给全体战斗员…个最强有力的实际教育，认识了群众的力量，认识了只有游击队才能得到群众的拥护。这些都证明了只有一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彻底解决民族问题。

以上是我在边区 10 余日工作的经过。

IV、五支队南下掀动了渭北农民斗争

1、南下时的渭北农民斗争形势。渭北农民斗争，五支队南下时，形势是非常高涨的，三原北区是中心斗争区域。在三原党的领导之下，开始农民普遍的分粮斗争，武字前区、后区，西原兴字区农民都起来没收豪绅地主富农的食粮分配，共分配粮食 200 余石。领导中心的组织是农民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武装是义勇队，武器是梭标，增加 10 余支新式武装，国民党派军队 1 排去，被 200 余武装义勇队赶跑了……

2、农民帮助游击队围攻马额城，欢迎慰问游击队。游击队到三原武字后区离马额镇 3 里之尚村宿营。马额城内豪绅地主王茂成还在城里，有枪 20 余支，我令参谋长杨重远同志带骑兵中队把城包围，用炸弹猛攻，敌人允许缴枪，同时来信要投降。这时我到前边找地方党部接头，我走到中途，即见到前区武装农民 200 人，狂呼飞跑的到马额镇，帮助游击队围攻，带农民联合会的欢迎慰问信，到时游击队

因连日行军疲乏，撤退休息几个钟头，即准备上城攻击。农民到后，即从各方面包围了，进城后，民团已在这个时(候)都逃跑了，没有捉到 1 人，随即进占马额城。这时游击队与农民的情绪都高度的提起了。

3、农民欢迎游击队的群众大会，通过党所提出的一切提案。到后的第二天上午 10 时，在前后区交界的火烧庙，由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召集欢迎游击队的武装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 3000 余人，一律武装梭标、如森林似的排立起来。游击队各大队去 1 中队，骑兵中队、少年先锋队都去参加……大会上的决议，主要的是：①成立革命委员会，由游击队、三原党、反日救国会、农民联合会代表 7 人组成，责成革命委员会颁布苏维埃一切法令和决议。②第二天，前后区农民全体武装分成两队，一到耀县西原分粮，一到西原分粮。因前后区食粮很少，不够分配，只有向外发展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游击队亦分两部分帮助。第二天早 8 时集合，游击队的给养就从没收来的粮食提出一部分给游击队。③义勇队改组为赤卫队，驱逐义勇队中沟富农，禁止富农参加。④取消区公所民团一切机关，逮捕王茂成、区长。⑤给苏维埃中央政府、各红军、中央、陕西省委、全国各革命团体工农兵劳苦群众发通电，电文由革命委员会拟发……

4、敌人的进攻与五支队的离开……到崖窑村宿营，知三支队已过泾河到醴泉去了，我和政委黄子文同志决定仍回边区，继续执行三支队放弃了的任务，巩固边区。这时边区敌人都开走了，各支部都一致同意这个决定，我把工作交黄子文同志，离开游击队回省委报告和决定一切工作。

5、三支(队)推翻决议，放弃巩固根据地任务

我离边区时，对高维汗的一切错误经过各种会议和谈话，指出他的反革命罪恶，当时他是完全接受了，并且工作上也积极起来，再没有别的同志能够代替他的工作，所以仍令他担任支队政委兼党的书记，重新领导边区工作，一切策略和工作都决定好了。但五支队将离开边区后，三支队即放弃了自己的任务，离开根据地南下了，虽然这个南下，我离省委时还没有得到报告，不能有详细材料的供给，但无

论如何，我们可以相信是在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之下，继续过去的错误是毫无疑意（义）的。同时更证明了两条战线的斗争还是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还不能保障党正确路线的执行。

V、接受中央关于陕甘边区决议与新的布置

VI、游击队的最近消息

我回到省委后，游击队再未来报告，他们给三原地方党部有一信，把淳化县城攻下，未占据退出，两支队又合在一块，到宜君击溃白军1营，收枪50余支，计划到白水、蒲城、富平以北一带游击，省委决定令游击队迅速开回陕甘边境，□□改编整顿，执行中央与省委决议。

北方各省委代表联席会议 1932年6月26日关于开展游击运动 与创造北方苏区的决议(节录)

(三)、为创造北方苏维埃政权而斗争

在北方革命运动烈火般的发展中，在开展游击战争领导义勇军运动，创造新的苏区以争取反帝国主义土地革命的胜利中，北方党的基本任务与工作是：

第一，创造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的苏区

1、在边区首先应当发动广大劳苦群众百倍的开展和深入群众斗争(农民反地主，雇农反富农)，巩固与加强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工作，要绝对保证党在这一临时政权内的领导。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与号召之下，立即没收一切地主土地，依照劳动力与人口的混合原则分配给雇农贫农和中农，摧毁与肃清边区一切反动势力，武装广大劳苦民众，组织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广大的建立与发展雇农工会、贫农团的组织，宣布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一切法令(土地法、劳动法等)与最大限度的实施，发展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吸引劳动妇女青年一切

组织与活动。在边区广大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域巩固与扩大之下，在红二十六军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应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2、在已开始生长成为红二十六军的游击部队中，应该毫不延缓的征调大批工人与吸收雇农、贫农及可靠的中农进去，坚决淘汰土匪流氓分子，以彻底改造它的社会成份；必须依照红军的编制改编它的队伍，并与立即切实开展红军政治工作，以绝对保证党的领导。在战术上，红二十六军目前虽仍可以广大利用进攻袭击的战术，但同时即须逐渐学习阵地战平原战等，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苏区。在边区四周，特别是在陕西渭北及西路群众斗争剧烈发展与我们工作较有基础的地方(如三原等县)应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对于白军，尤其是杨虎城的直属部队，应特别加紧我们士兵工作。

3、为保障无产阶级的领导，须百倍的发展雇农工作；建立与开展城市工作，特别是中心城市(如西安)；大批的征调工人到苏区中去；在红军中，在苏维埃机关中，切须有一定的工人数量，以保障工人骨骼的领导作用。

4、广泛宣传党的政纲，猛烈的发展党的组织与吸收大批雇农、贫农入党，派遣最可靠的有能力的政治坚定的同志到红军苏维埃中去，开展党的工作，同时必须吸收边区有威信的积极的雇农贫农同志参加边区特委组织，以改造与健全党的领导。

5、北方党应即开始在广大劳苦民众中，进行关于拥护陕甘边区新的运动(宣传、征调、捐助等)。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布告

第号

为布告事，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经过晋陕甘数省，与国民党

军阀血战数十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所到之地，白军闻风披靡。帮助正宁、山水、淳化农民建立革命委员会，组织赤卫队；帮助三原、富平、邠州、醴泉、宜君、中部等数十县工农，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数百万。劳苦群众和红军游击队团结一致，根本动摇西北国民党军阀统治，推进西北革命迅速向前发展，使扩〈广〉大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起来为打倒国民党军阀剥削与压迫而斗争，为解放自己而斗争，来参加红军游击队，拥护红军游击队起见，特宣布本军根本任务于左：

一、本军是贫苦工农自己的武装力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与国民党军阀作必死的斗争，绝不与任何统治势力相妥协。

二、本军所到区域，对于困比党军阀统治机关——县政府、区公所、民团局、里正等——一律铲除。

三、□□国民党军阀给予工农劳苦群众一切苛捐杂税、摊派勒索，概[概]作无效。

四、帮助穷苦工农、门军士兵，起来分配豪绅地主的食粮财产和土地。

五、一切文字的口头的高利贷、账债、契约，宣告无效。

六、缴收白军，民团、警察的武装，武装农民赤卫队，保护、自己的利益。

七、建立陕甘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

八、创造西北工农红军。

以上为本军之根本任务，望各地劳苦工农及白军士兵同志深刻认识，并迅速协同本军努力执行，以期早日实现，是为至要，此布。

总指挥 刘子丹

政治主任 黄子文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二年

月 日

中共中央 1932 年 8 月 1 日关于创造陕甘边区根据地给陕西省委的指示信(节录)

……在中央和北方会议正确的决议之下，努力去转变并开展党的工作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苏区与红军和巩固并扩大陕甘边游击区域为中心，积极的去领导并组织工人斗争、农民斗争、士兵斗争以及广大劳动群众反帝反国民党斗争，坚决的执行中央路线，反对一切“左”右摇摆的机会主义，特别集中火力去打击右倾机会主义，是陕西党目前在创造新苏区中最迫切的中心工作。

陕西党必须在这一两条战线斗争的开展中，去坚决的执行下列的基本任务：

(一)巩固陕甘边根据地创造新苏区。陕西党必须十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首先第一必须坚决的没收地主阶级与祠堂庙宇及土豪劣绅的土地，按照劳动力与人口，平均分配给雇农贫农以及中农，在分配土地过程中，不许动摇中农的利益，富农的土地亦必须没收，在他们不反革命的条件之下，把坏的劳动份地给他们，同时要尽可能的做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以彻底肃清封建的残余，但这必须使基本的农民群众了解并在自愿之下来执行的。第二，为巩固这一革命起见，必须组织雇农工会、贫农团使之成为拥护并支持土地革命的基本队伍，吸收他们参加政治活动，实现真正的工农政权——苏维埃政权。第三，立即成立红军一团，进行广大的征收红军战士运动，要动员工人、雇农及贫农加入红军，积极改造士兵的成分，红军士兵必须分给土地，按照红军优待条例，给予特别的待遇，决不能借口特殊情形而忽略这一真正改造的实施，同时必须成立赤卫队、政治保卫队等以武装当地农民。第四、红军必须开始有计划的游击运动，以旬邑、淳化、邠州及正宁为中心，扩大游击区域，以与三原、富平为中心的农民斗争相配合。第五，加强边区党的工作，吸收并提拔新的大批干部，特别要对广大的工人、雇农及贫农开门，吸收新的坚决的分子入党。红军士兵之中，必须建立健全的支部生活，根本的改造过去的土匪成分。第

六，要进行广大的拥护红军，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的运动。扩大红军胜利的宣传，以提高广大群众斗争的情绪，以开展边区的工作。第七，为实现这一任务，边区的党必须严重的打击过去逃跑主义的残余，肃清放弃根据地的倾向，坚决的执行在巩固并扩大边区工作中创立新苏区的路线。(中央“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在目前继续有效)

关于甘肃回民中的工作，中央要唤起省委同志的严重注意，陕西省委现在就应该担任创造甘肃省委的工作。过去把甘肃的工作，限制在士兵中的倾向，中央认为是错误的。为了加强陕甘边区游击队的工作，中央同意××同志为陕甘边游击队的主要负责者。省委书记中央决定××同志，×同志在几天之后，即可出发前来。

中央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8 月 25 日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案(节录)

七、为了□□□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为了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红廿六军，口为了准备“帝国主义直接武装冲突与大规模的民族革命战争”，为了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从)西北上进攻苏联的战线，陕西党必须执行以下的战斗任务：

(一)“首先应该从现在的游击队中，选择中坚的有力的队伍，编成经常的正式的红军，这是丝毫不能延缓的迫切任务”。的确，“这在今天陕西的经济与政治的环境中是更显明与急切的”(中央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决议)。因此，必须按照现在游击队的力量，立刻编成红军一团，在最近期间，实现编制一师的任务(番号即用红军廿六

军四十一师第一团)。执行这一任务，必须彻底改造现在的游击队成份，“红军的社会成份，应当是工农的，主要的指挥骨干应该是工人的。要有坚决的共产党的骨干领导者，要有最十分得□〈力〉的指挥者，要有铁的纪律”。动员广大的雇农、苦力、贫农以及最可靠的中农，参加到红军中去，红军的优待条例必须广泛的深入到群众中去，以提高加入到红军中去的积极性。省委丝毫不能迟延的经过互济会、各种群众组织，在西安工人群众中，扩大征调到红军中去的运动，动员大批工人□□□工人的指挥骨干。目前红军的指挥员，必须是最可靠的共产党员和工人，坚决的立刻撤换现在游击队中的土匪流氓、公开进行反革命活动的指挥员。对于现在游击队中的土匪成份，应该毫不迟疑清洗出去。只有这样，才能巩固<了>红军的基础。红军的干部必须立即选择游击队中可靠的分子，开办各种短期训练班，以及随营学校，提拔这些新干部去担任红军中的工作，绝对要打击过去只靠省委派人去，放弃了这一工作的机会主义的等待观点。红军中的政治工作，立刻按照中央所颁布的红军中政治工作条例去建立。

“在战术上，红廿六军目前虽仍可以广大利用袭击进攻的战术，但同时即须学习阵地战与平原战争，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巩固与发展陕甘边新苏区”(北方会议决议)。“红军的动作在任何情况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目前对于敌人应该采取积极进攻姿态”(中央决议)。红军要根据这个原则，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一方面，以击破敌人的“围剿”。必须坚决执行省委的军事计划，以实现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红军的作战必须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集中领导。无论是袭击和进攻，绝对纠正过去各自为战，完全没有指挥的零乱散漫的现象”，只拘泥在“化整为零，化零为整”，失掉集中指挥的逃避战略。但同时绝不能以进攻策略，解释成为军事冒险，不顾一切的拼命主义”。

(二)“土地问题的正确的解决，在提高劳苦群众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上，在保证苏维埃运动的胜利上有决定的意义”，“应该组织和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绅士祠堂庙宇及帮助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平均分配给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中央决议)“中国富农的

特性是兼口地主和商利贷者，其土地亦须同样没收与分配”，“富农在没收土地后，在他(们)不反革命的条件下，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土地法令)，深入土地革命斗争是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唯一前提。因此，第一必须坚决执行以上的原则，坚决反对杰夫同志领导时不搞调查统计，以延缓土地革命任务，以至根本认为土地革命，边区还不可能的可耻胡言。打击愚痴同志领导下的富农路线，不没收富农土地，并且与贫农雇农平分，侵犯中农利益，对没收地主阶级土地的动摇。第二，苦力、雇农分配土地要占优先权，成立贫农团、雇农工会，以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自然对中农的利益也必须顾及，对中农土地一般的是以不动为原则。第三，红军兵士与游击队战斗员，也必须分配土地，并执行对红军的优待条例，坚决反对不给红军和游击队战斗员分配土地的错误观念。藉口土地少，放弃了这一工作的执行，是不能提高他们的战斗勇气(的)。第四，分配土地必须是在党领导之下的广泛群众运动，宣传鼓动广大群众自动起来分配土地，反对脱离群众的命令主义，反对狭隘的只从三个两个农民入手，同时把土地革命束缚在游击队中、党的支部、以致少数党员的活动。动员群众起来，去参加分配土地的运动。

(三)建立和巩固革命委员会的临时革命政权，红军政治部、士兵代表、以及选择当地最可靠的苦力雇农贫农分子，立刻成立边区革命委员会，集中对红军群众组织和当地革命运动的领导，彻底摧毁消灭豪绅地主的反动统治，把所有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彻底肃清，颁布和实现苏维埃政府各种法令和决议。革命委员会一定要健全起来，设立各种委员会，以加强其领导。过去游击队把革命委员会看成游击队下的一个部门，听游击队的指挥，不了解她是一个群众的政权机关，以致革命委员会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形成强有力的政权机关。革命委员会必须吸收当地的苦力雇农贫农参加，以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这样去转变革命委员会的工作，才能彻底的肃清富农分子。过去的革命委员会，因为不能执行一切革命政权的任务，有些富农跑到革命委员会中，以进行反革命的活动，阻止土地革命的执行。“在边区广大的劳苦民众热烈要求与拥护之下，在游击区的巩固与扩大之

下，在红廿六军及一切群众武装强有力的保卫之下，革命委员会依照苏维埃选举法令，正式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四)坚决执行肃反工作，肃清一切反革命阴谋，再没有比现在这样紧张与迫切了，谁要忽视和延缓了这个任务的执行，就是有意的把现在的游击队送给敌人去摧残，以至消灭，根本断送了党所指出创造新苏区的严重任务。因此，必须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动员群众，团结一部分可靠的干部，立刻破坏反革命阴谋，逮捕一切主要分子，公开的在群众中审判，以教育群众，更提高红军的战斗力，这是各苏区的宝贵经验，绝不能有丝毫的忽略。至于地方上的肃反工作，必须在革命委员会之下成立健全的肃反委员会，坚决的肃清豪绅地主富农一切反革命的活动，才能创造和巩固了边区。

(五)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彻底执行以上一切任务的先决问题，必须最严厉的打击过去省委以及游击队对无产阶级工作的取消，直至最近愚痴同志对游击队和边区工作盼领导，还是放弃了这一工作的最严重错误。第一，边区内的阶级工会立刻成立，不论工人数量的多少，把苦力雇农贫农都组织在工会中去；第二，立刻实施劳动法令；第三，从西安动员产业工人到边区去；第四，党的组织中大量的吸收苦力雇农加入，以巩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第五，立刻把游击队中的工人苦力雇农分子提拔起来，作红军干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必须是苦力雇农。

(六)开展游击运动，建立赤卫队、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组织。为了创造和巩固边区根据地，粉碎四次围剿，必须尽量的开展边区周围的农民游击运动，组成大小的武装队伍，到处扰乱敌人的后防，袭击敌人的辎重，使敌人不能集中力量进攻。同时，开展游击区域，摧毁豪绅地主统治，进行土地革命，扩大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目前主要的游击区域是旬邑、正宁、淳化，向□山北发展，以与渭北的游击战争联成一片，互相呼应，这样去巩固根据地，粉碎四次围剿，□边区内的农民武装的组织，必须特别加强，毫不放松的去进行。建立农民的赤卫队、游击队、少年先锋队等武装组织，以保卫苏维埃政权，进行与反革命派的斗争。同时，也就是红军的后备队伍。进行这

些工作，必须最严厉的打击杰夫同志以及游击队中□花同志□□□□□□□□农民组织□□□□□□□夺了武装农民的一切工作，投降豪绅地主，把民团改编赤卫队领导，双手送给豪绅地主富农，一切可耻的右倾机会主义。

(七)在边区内，应该抓紧日本帝国主义进占热河平津及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瓜分中国，镇压中国革命，进攻苏联的一切事实，进行最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宣传鼓动。在一切宣传鼓动中，加紧去揭破一切国民党的出卖民族污辱民族，来揭破一切反革命派实际上是帮助国民党维持她的反革命统治，“应该在这种宣传与鼓动的基础上，动员组织领导工农红军与成千成万的劳苦群众进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创造和扩大苏区，消灭国民党的武力，是给帝国主义的直接打击，是与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是民族革命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是真正的拥护苏联的革命斗争。为着实现这个任务，必须十倍的加紧扩大红军及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使每个劳苦群众及红军战斗员了解，只有在土地革命产生起来的得着千百万劳苦群众热烈拥护的工农红军，是唯一能够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及保障中国民族解放的力量。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是四次围剿苏区的主要的组织者与指挥者。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者直接的武力进攻苏区的危险。使他们了解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土地革命的胜利是不能巩固的”，如组织反日会与反帝大同盟等反帝组织，组织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和反日义勇军，组织检查日货，□彻底检查日货。把没收来的日货充失业工人生活费和各种群众反日团体的经费，积极加紧民众反日会的筹备与组织，以集中反目反帝的运动。

(八)用红军和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瓦解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用各种方式：标语口号，宣传品以动摇士兵，最主要的是在游击队和当地农民群众中，选派一部分积极分子，打进围剿的部队中当兵，组织这些部队中的革命兵变，以瓦解敌人的军队。

(九)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是执行以上任务最主要的中心，现在那样稀少的党员，是担负不起这个任务的。因此，游击队中必须很快的吸收大批的新党员，成份主要的是工农。巩固支部组织，建立支

部生活，把现在党内存留的土匪和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深入两条战线斗争中彻底肃清出去，巩固党的组织。中央和省委的决议与指示，支部中必须详细讨论，以提高党员的政治水平，使每个党员都能了解党的路线和策略，为党的正确路线而斗争。给过去杰夫同志领导时，否认中央与省委的领导，不要省委的政治领导，只是和省委要人要子弹的错误观点：以致命打击。坚决的与脱离党的路线单纯军事行动。作最坚决的斗争。边区地方党的组织，必须很快的建立起来，开始即选择当地积极的苦力雇农贫农，无条件的吸收他们入党，反对一切关门主义或者认为地方党是省委的事情，这是最有害的观点。为了加边区工作，省委认为立刻成立陕甘边特委，旬邑，淳化地方党部由边特委去领导。边特委由×××同志等组织，边特书记由×同志担任。青年团的工作，必须很快的建立起来。

(十)积极多于展妇女运动，“在白区内，根据劳动妇女特殊地位与痛苦，尽量发动他们为本身的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加紧领导他们一切的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用各种适当的方法和方式，吸收她们参加整个的工农的为苏维埃政权的革命斗争。在苏区内应加紧领导劳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的斗争，利用各种组织的方式，尽量发展她们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组织领导她们拥护苏维埃红军(利用洗衣队、作鞋队，救护队、慰劳队等方式)，改良自己的生活，同时必须站在两条战线的战线上，坚决的消灭一切对于劳动妇女工作的忽视和错误”。可急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各级党部与群众组(织)必须建立妇女部、妇委会和妇女组织员等组织。

(十一)开展青年运动，建立青年团工作。过去陕西党根本不了解陕甘边新苏区的创造，没有广大青年群众起来热烈拥护，是不能够得到彻底胜利。所以对青年团工作，完全取消，直到今天，游击队还是没有丝毫的转变，省委认为这只能从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右倾机会主义动摇出发。开展青年运动，建立青年团的组织，是边区内不能有丝毫的迟延。首先党必须帮助青年团建立红军中以及当地工农劳苦青年群众中青年团的组织，帮助青年团广泛的组织少年先锋队、儿童团等青年群众的组织，在深入土地革命斗争中，以开展青年运动。他

们的主要任务是进行边区中的肃反工作，保卫边区，参加一切群众政治和组织工作，同时就是红军的后备军。

(十二)建立回民工作是边区内丝毫不能放松的工作，根据苏维埃政府的少数民族决议，深入回民中的土地革命阶级斗争，肃清回民中豪绅地主分子，建立回民的武装组织，过去游击队对回民工作是有相当成绩，但对回民中的阶级斗争，根本没有去执行，这是和回民中的豪绅地主去妥协。

(十三)在边区内，首先必须加紧扩大拥护苏维埃与红军运动。千倍百倍的加紧这一工作，动员成千百万的群众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四次围剿，反对国民党进攻陕甘边苏区，扩大募捐运动，征调大批工人到陕甘边区去，组织慰劳队、代表团到边区去，鼓励边区红军、游击队和“群众的斗争勇气，提高非边区内的斗争情绪。

(十四)建立城市工作，开展工人的经济政治斗争和罢工。党必须加强西安几个中心工厂中的工作，尤其是西安华阴兵工厂运输工人中的工作，在增加工资、反对加工、减少工作时间、发清欠薪、反对削工等日常斗争基础上，号召工人反对进攻苏区、拥护红军的罢工示威，号召兵工厂工人不造一枪一弹去进攻红军，运输工人不运一兵一卒去进攻红军的斗争，号召大批工人到红军中去。

(十五)加强农民与灾民斗争的领导，开展渭北、东府、西路的游击运动。省委必须集中领导这几个区域内的工作，建立农民的武装，发展群众组织，领导农民反捐税，抗租税债，分粮抢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平均分给苦力雇农贫农中农的斗争，摧毁豪绅地主统治，建立这些区域内的苏维埃政权，以创造这几个区域内的新苏区，以与陕甘边区互相呼应，打成一片，为创造一大块苏区而斗争。

(十六)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工作，更要特别加强，尤其是围剿边区部队中的工作。省委必须集中力量，加强十七师、四十二师、特务团工作的领导，派些得力干部到这些部队中去，组织革命兵变，投到红军中去。对现在士兵中已经开始的拥护红军运动，募捐一个子弹给红军，十倍百倍的扩大起来，以瓦解敌人的部队，以提高士兵斗争

情绪。

(十七)反日反帝维护苏联斗争必须开展起来，加强工人反日救国会、农民反日救国会、士兵反日救国会、城市贫民反日救国会、学生反日救国会中的工作，建立反日义勇军的武装，号召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进攻华北，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进攻苏联大战的示威，以与反对围剿陕甘边区的斗争联系起来。

(十八)为着实现上面所指出的任务，必须真正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这一斗争不应停留在上级机关，而应深入支部，深入群众。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是陕西党目前最主要的危险。这些右倾机会主义主要表现在：对目前革命形势估计不足，藏躲在“北方落后论”、“陕西特殊论”、“革命发展不平衡”、“农民没有土地政权要求”等等理论之下，不去组织并领导工人阶级的日常斗争，执行十足的富农路线，忽视甚至公开阻止农民抢粮分粮、分土地的斗争。不积极组织革命兵变，以官长路线代替士兵工作，忽视创造陕甘苏区和扩大红军的任务，不了解红军积极行动的必要，而陷于可耻的上山逃跑主义，忽视反苏联战争的危险，忽视反帝运动与土地革命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轻视中国革命、民族解放的任务，与帝国主义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同时对于“左”倾机会主义，也不能一点放松。只有对这些倾向尤，其是右倾作坚决无情的斗争，才能保障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

1932 年 8 月 25 日印

9 月 4 日到

李艮 1932 年 9 月 14 日关于五顷园子 分配土地中几个问题向陕西省委的报告

在陕西革命危机日益增长，陕西党领导广大的群众创造陕西新苏区，首先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右倾机会主义者用着农民不敢要以至不

需要土地革命，创造新苏区还不可能的“北方落后论”的谰言，和中央与(陕西)省委的路线非难和对抗的时候，五顷园子开始分配了土地，建立起革命委员会，其他几个堡子(五坡冶、龙嘴子、×××村…一等)也正在紧张的继续进行着。这首先给了右倾机会主义者以迎头痛击。特别是分得了土地的农民，他们已经了解到只有和红军配合起来努力奋斗，才能保障住他们已经分得的土地和进一步的推翻国民党统治。自动的帮助红军作战。开辟陕西革命的新阶段，给了陕西群众特别是边区群众以很大的信心。这一(运)动的开展，无疑的将引导陕西革命起(达)到更高的阶段。

但是在五顷园子的分土地中，在我们领导之下，执行了富农路线，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1、因为对于目前形势估计不足，与游击队党的不了解省委路线，不能动员起来，使土地革命还不能普遍地发动起来，只束缚在一两个堡子。这是右倾机会主义。

2、就是在这一个堡子(五顷园子)分地中还犯了许多严重的错误。

(一)富农路线。把全村的土地按全村的人口(除过豪绅地主和反革命富农)平均分配；还有一家富农也和穷人一样，而且只是按人口的多少。这一错误的来源有三点，而最严重的还是第一点：①我对于土地没收和分配的原则，根本是富农路线的了解，就是认□□□□□□□土地，不是完全没收，而是没收其剩余土地，这是十足的保障富农利益的富农路线。②对五顷园子这一富农认识的动摇，因为这个富农共有土地 130 亩，人 14 口，负债 10 元，未雇人，牲(口)不够用，租地 25 亩，自己的种 100 据说出租田地，因为牲口不够用。据当地人讲要能维持生活，每人需地 10 亩。我觉得这家每人既不满 10 亩，又负债，且未雇人，对这家不能给以肯定的阶级认识。③机械地执行平分土地与被群众的落后意识支配。我们当时虽然对这一富农没有清楚的认识，但决定将他照富农看待，给他分坏地(但当时还只是单按人口)，并少分，而当中的群众胡说：“我们才开始，不要太利〈厉〉害了，这也是受苦人”。当时我们一方面因为群众情绪是这样，不是

一下子可以转变过来，同时因为没有地方党部，红军和群众的关系还很生疏，群众的落后意识不能很快克服，反叫群众认为是红军的命令。

(二)没有实行雇农苦力的优先权。这也是富农路线的结果。在富农路线之下，自然不能执行雇农苦力的优先权。

(三)侵犯中农利益。有一个中农，他的平均土地，每人有原地 4 亩(按照当地的情形，在苏维埃制度之下，有原地五六亩，就可以维持生活，4 亩耕种勤苦些，也可以勉强过活)，我们将他的每人 4 亩原地减了 1 亩，而换了 2 亩坡地，(按 2 亩坡地在平常年份收获量当 1 亩原地，甚或强些，但歉年就不能想象，有时一点不收，有时一亩可当一亩原地，但费的劳力非常大，一亩坡地需要一亩半或二亩的劳动力而所得值原地半亩之谱)。这对于中农利益是有害的。如果我们在土地革命中与一切农村斗争把握不住中农，中农会被富农拉去，是我们农民运动中很大的障碍。

(四)还有一家有 6 口人，原地 30 亩，因维持不住生活，将土地租于别人(每亩租 1 斗，共计每年 3 石)，自己到城市中作苦力生意(磨面、卖馍等)，我们将他的土地解决得非常奇怪，一方面没收了给当村人分配了，每年却还给他由村苏维埃付半租(每年 1 石 5 斗)，这一问题的解决，也是根本错误。无论他是谁的土地，无论出租的动机若何，都是封建剥削，都应无条件的没收(如果当时这家愿意自耕其地，那当然可以不动他的土地)他是苦力，在土地革命中还可以享有优先权，在别处另分。

(五)不实行红军的优先权。在土地少不够分配(此处土地分后，当地群众生活还不能维持)，“不侵犯穷人利益”的错误之下，不给红军分地。这是不了解红军是土地革命的先锋和支柱，要解决红军的问题，也就是有土地革命，而反过来给红军分地，要等到穷人分了剩下以后。红军土地革命在前方肉搏，才能分剩下的土地，剩不下，红军是没有希望的，以至五顷园子上富农都可分土地，而不给红军。这是非常严重的富农路线与立三路线的错误。自然这个区域土地少，不能使红军每个士兵都分得土地。我们可以划出若干土地为红军的公

田，首先没收那个富农的 42 亩原地，作为红军公田，以提起红军斗争的勇气和决定〈心〉这一经验希望全党同志研究。

(九月十四日)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8、9 月间关于 陕甘游击队工作给中央的信(节录)

中央：

现将几个主要工作上的问题简略报告于下：

一、在××同志到西安，李根同志巡视陕甘边游击队返省之后，新省委就根据北方会议和中央对陕西省委的指示信，检查了过去这一时期游击队的工作，并通过了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和工作计划，并且决定派励君等同志立即前往边区主持边区和游击队的工作，但因交通一时中断，出发的同志全部停留在三原，直到昨天才分几路向边区前进。

游击队前近没有报告，但听那边回来的同志和群众的谈话，可以知其大概。旧历七月十五，游击队在三原附近与胡三民团 200 余接触，将敌人全部缴械，俘虏了民团重要首领及一部分团丁，并且拉走不少豪绅，随后又与国民党军队开火，双方各有损伤，但最严重的是游击队内部情形。

李根同志在游击队做〈犯〉了严重的错误，并且造成了极坏的恶果。李根同志对党内反倾向斗争往往离开实际工作的会议上的争论，所以他巡视游击队虽仅三星期，停止了一切紧张的工作，却开会占了五六天的功夫，会议口后，白军大规模的来包围，李根同志解释巩固根据地死守四(寺)村原，于是同敌人接连打了三次硬仗，使我们部队受了很大的损伤。他不了解政权的意义，将 72 个村庄选举出来的革命委员会实行取消，在五顷原小小的一个村庄，实行没收分配土地，建立一村的革命委员会，企图这样一村一村逐渐的“巩固”和“扩大”，

以至完成创造陕甘新苏区的任务。

李根同志这种领导，在部队中激起了群众强烈的反感，在一次群众大会上，群众说李根同志不能代表省委，提议驱逐李根，这一提议得到全□的赞助（成），全场一致通过。另外，还有游击队队员对大队长说，队长我们一定要当心这个家伙（指李根），他大概是杨虎城派来的暗探，想办法来破坏我们的。这些严重的事实，李根同志返省后，始终没有向省委报告。最近李根同志才又补充了一个事实，就是那次会议的第二天，当他提出要回西安的时候，在群众会议上还有群众挽留，但最近传得各方面报告，群众对李根同志反感还是很深，游击队队员说李根倘若回来，一定要解决他。三原的农民受了游击队的影响，也说倘若李根来，非打他不可。

在游击队中，现正进行着极严重的反革命活动，有几个领导分子在那里公开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建立苏维埃，反对党，说不管党是怎样正确，但是我们不能□□□□，即所谓群众现不要土地，更不要政权。不但如此，这些领导分子并且向国民党军阀联名写过两次信，承认（认）错误，请求改编。第一封信，杰夫同志看过，第二封信叫杰夫看，杰夫说不用看了，没有提出任何反对的意见，李根同志也没有勇气解决这一问题，不敢在群众中暴露这些反革命分子的罪恶，领导群众与他们作坚决的斗争，并且积极进行肃反。完全相反，李根同志是用阴谋手段对付阴谋，在公开的队委中又组织了一个秘密队委，企图□□来“监视”反革命的活动，“保证”党的领导。现在这个秘密队委在部队中又（已）经成了公开的秘密。反动派并且抓住这一问题打击秘密队委的领导分子，说这是分裂党，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这就是反革命的阴谋，并且要解决几个。

一方面因李根同志领导的错误，另一方面直到今天，省委派去的同志还不能到边区主持工作，这就使游击队失掉了党的中心领导，形成非常严重的现象，许多队员离开部队，三原回来几十个农民战斗员，在部队里大家怠工，许多群众害怕机会主义的大帽子（李根党内斗争“打击”的影响），不发表意见，都知道肃反，人人自危，不知道自己是否在被肃之列，这里恐怖空气是非常严重的。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9 月 17 日 制定的边区军事计划

(一)四次围剿与目前政治形势

在两个世界对立之下，中国革命危机的程度更加深入，使两个政权工农苏维埃政权与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政权尖锐的对立，红军四次围剿中的新胜利，苏维埃之伟大胜利和巩固发展争取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形势之下，陕甘游击队与游击区域的创造，加以工人斗争之活跃，农民斗争汹涌澎湃，士兵不断哗变，反帝反国民党的怒潮，这一切更推动了陕西革命危机的前途，创造了北方新苏区初生的基础，这应给帝魁主义国民党疯狂似的四次围剿的严重打击，给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有力回答，因此粉碎敌人的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红廿六军是有严重的历史意义。

(二)粉碎四次围剿的军事任务

为了完成以上的任务，在党的正确路线之下，根据目前军事政治条件，决定我们的军事行动，很迅速的，有计划的，在积极进攻的战略之下，从四面八方粉碎敌人四次的围剿，争取我们的新胜利，在新胜利中开展游击区域，创造和巩固陕甘边新苏区，是边区军事上最迫切而且极端严重的任务。

(三)估计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力量

在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正在大规模进攻着中国工农红军苏维埃区域的围剿中，陕西国民党军阀也开始了对陕甘边的四次围剿，清楚的估计敌人的力量，是粉碎敌人围剿的主要前提，对于敌人力量的估计可以从两个方面：

第一、军事的布置及其力量的估计

1、孙玉〈蔚〉如十七师开到平凉，以杨子恒一旅为中心，由早胜三合〈山河〉来包围，杨旅在杨虎城全部中战斗力是很强的，九七、九八两团是最强的，人数每团约有一千五六百人，枪械都是好的，这

是担任进攻部队。

2、邠州长武方面是警卫团的一营，担任堵截西大路的任务，战斗力最弱，枪械不好，子弹不十分充足，几次与红军游击队接触都受到了很大损失，与红军作战士兵完全没有战斗的勇气。

3、马兰方面至耀县同官现住夏老妖〈么〉民团非常薄弱，枪械很好，子弹也很充足，担任堵截的任务。

4、旬邑职田镇原、清水原，有何高侯一个游击支队约百余人，以职田镇为中心，常向边区游击，镇压群众斗争，战斗力较够〈强〉。

5、胡景铨民团口子封一营，正在调动的还有四十二师的1团，在耀州官〈同〉官三原间堵截，截断边区与三原间的联络，这些部队中四十二师战斗力很强，其余战斗力都很弱，枪械不好，子弹缺乏。

6、统计敌人的围剿兵力约 3000 余人。

第二、敌人的几个弱点：

1、红军与苏维埃运动，在士兵中普遍的扩大深入，士兵生活痛苦已到极点，因此哗变投降红军的心理普遍存在，对进攻红军是没有决心和勇气，常是动摇的，在游击队大小十余战中是充分的指明了这一点。

2、工农劳苦群众是强有力的反对和仇视，使敌人的军事行动和计划处处受到阻碍。

3、部队复杂，指挥不统一，不灵活，各个部队间的相互联络是不能密切的。

4、给养和辎重必须大量的运输，这在边区是很困难的，大部兵力不易长期的支持。

5、小部队的单独战斗力是完全没有的，敌人的作战都是以大部队(起码一营)，没有分散的能力。第三、估计了敌人的力量是很清楚的可以看到，红廿六军在党的路线之下，动员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的力量利用敌人的弱点，有利的边区地形，各方面配合起来，互

相呼应，毫无疑(义)的是可以粉碎国民党的围剿，建立陕甘新苏区，以燃烧北方苏维埃的火把。

(四)红军游击队的军事经验和教训

陕甘游击队在杰夫同志领导之下，因为对于目前政治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一贯的右倾路线之下，放弃了创造新苏区的历史任务，脱离群众的单独军事行动，执行了上山逃避的可耻右倾策略，使最后游击队受到了相当损失，然而在这长期的斗争中，是给了不少的经验与教训，把握住这些血的教训，是我们粉碎围剿的有力武器。

首先要指出游击队的严重错误和弱点

1、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行动，不信任群众力量。

2、不建立根据地上山逃避，一切军事行动都是消极的应付，不是积极的进攻。

3、不运用游击战争的战术，不开展游击运动，组织当地农民小的游击队。

4、每次作战都是没有精密的计划，没有指挥的作战，都是无组织的零乱散慢的各自为战。

5、军事组织形式是正式红军，但没有建立起红军的组织系统，行动迟滞不灵活。

6、战斗员的军事政治教育工作完全没有。

7、干部的提拔不是从可靠的工农分子与共产党员而是纯粹军事作战上的老土匪。

8、军事纪律没有树立起来，失掉战斗力。

9、侦探通讯联络没有建立，对敌情常是不明。

10、给养军火不利用敌人的运输队，完全靠作战。然而数月以来经过大小十余战，表现了游击队的优点，在军事上 已经有了相当转变：

1、上山逃避已经引起了战斗员的猛烈反对。

2、指挥员战斗员作战是非常英勇的。

3、指挥员战斗员单独战斗力是非常强。

4、开始边区中的游击运动，清水原建立丁农民游击队。

5、有广大群众拥护，行动易于荫蔽，使敌人对我们的力量不能有清楚的估计。

(五)军事战术和战略

红廿六军目前军事战术和战略，是以党的正确路线，目前军事政治条件为基础，在这个基础上：

1、北方会议已清楚的指出，红廿六军目前最主要的还是袭击和进攻为主要的战术，逐渐演习对垒和平原战，以加强红廿六军的战斗力。

2、目前的战略毫无疑义的是积极进攻的(无论防御和进攻)应广泛的运用农民游击队的活动和红廿六军的配合起来，肃清旬邑淳化间的敌人，以取得与渭北游击战争的汇合，使渭北苏区与陕甘边新苏区打成一片，把这方面的敌人肃清后即与史〈寺〉村盘克秋〈湫〉头等处游击队配合起来进攻三合〈山河〉早胜方面的杨子恒部主力，先用游击队积极的向早胜一带游击，把三合[山河]与早胜间的敌人扰乱和截断，使三合〈山河〉孤立起来，以消灭三合[山河]方面的敌人，这样把苏区方面的敌人都肃清，以巩固边区根据地。对马兰方面的敌人，用清水原照金一带的游击队，马上解决这里的民团后即以这些游击队经常在这里游击，扰乱牵制使其不能向边区活动，把这几方面的敌人肃清后，解决这方面的敌人。

4、边区中的防御工程必须开始按照各处的险要地形动员当地广大群众起来，在红军的领导之下建筑工程，红军开始演习阵地和平原战。

边区的军事地形是有利于平原战的，敌人的大部兵力不能开展，运用非常困难，因此红军的平原战术即可开始运用，绝对要打击把红军拘泥和束缚在游击战术中。

(六)红军的编制及军事政治教育工作

(一)在以上的战术战略原则上红军的编制

1、暂编 1 团 3 个步兵连、1 个手枪连、1 个骑兵连、1 个少年先

锋队，步兵连以现在的3个大队为基础，骑兵连以现在的骑兵大队为中心，这4个连暂以每连70人编制，以口枪250支，其余每连编一大刀队以补充枪枝不足，手枪连在现在的4个大队中挑最可靠的工农分子与共产党员编制，把全部队的盒子枪集中起来，手提机关冲锋机关都集中在机械连，编制一机枪排，手枪连要成为红军的最主要骨干。

2、此外再编一补充营，以新加入的工农充任，补充营可暂编两个大队，一个大刀队一个梭标队，在作战中和其他各连配合起来作战。

3、在最短期内，把全团补充起来，按照红军编制条例编制，同时积极实现扩充成一师的任务。

(二)红军的政治军事教育

1、每天无论如何要有两点钟口政治教(育)课，分两次教授，由各连政治指导员担任，课程由团政治委员口同各政治指挥员编辑。

2、除(上)课教课员〈外〉，可开各种政治讨论小组会议，政治指挥员参加。

3、政治教育，团政治委员，至少每周实行检查一次政治工作的成绩，实际到士兵中检查，然后召集各级政治指导会议讨论和检查政治工作。

4、每天无论如何要有4点钟的军事课程，分两次教授，由参谋处派人协同各连长担任，课程应以现代各种战术为基础，注意实际的演习，过去各自军中的死的课堂上的教育没有用的。

5、团长政治委员每天应分别到各连去检查军事教育的进行如何。

6、每周各连集合演习2次，每次以4点钟为限。

7、军事政治教育工作的进行，用革命竞赛启发式的方法进行。各连经常举行各种竞赛以提高士兵的情绪。

(七)组织边区周围的农民游击队开展游击运动

1、立刻组织史〈寺〉村原湫头原三家〈嘉〉原盘克原职田原淳化照金一带的农民游击队。

2、各游击队的任务和联络

A、游击队的组织以 5 人和 10 人为 1 小队，3 小队为 1 中队，3 中队为 1 大队，大队以上成立支队。

B、以清水原现在的农民游击队为中心，职田原最近亦成立 1 大队，编成 1 个支队，史〈寺〉村、湫头、三家〈嘉〉等原成立两个支队，龙嘴回民成立 1 大队，淳化成立 1 中队，由淳化地方党部负责，照金一带成立 1 大队，由三原地方党部和边特负责，盘克至少成立 1 中队。

C、清水职田照金一带游击队的军事任务是袭击和扰乱，从马兰淳化邠州来的敌军，肃清这区域敌人一切的武装力量，截断与宁州三合〈山河〉方面的杨子恒部的联络。

D、史〈寺〉村湫头盘克游击队的任务，经常向早胜坪[平]子正宁等地游击，牵制扰乱杨子恒部，和红军配合起来，用全部的力量消灭敌人在三合〈山河〉正宁宁州方向杨子恒部的主力。

3、游击队的武器目前主要的还是用旧式的大刀梭标，必须很迅速的积极进攻中，完全补充成为新式武装。

4、各个游击队和边区军事委员会联络要很密切，每个游击队与边区必须有 5 个以上的联络通讯员。

5、游击队的成分是当地的工农干部，必须在游击队员中挑选可靠分子，由革命军事委员会必须负责帮助游击队的军事政治教育工作。

(八)普遍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

在深入土地革命的基础上，在边区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普遍的建立群众的武装组织。

1、赤卫队以村为单位去组织，所有的雇农贫农中农都可以参加，必须是自愿的，不许富农加入，赤卫队的建立和扩大与实际分配土地是不可分离的。

2、政治保卫队立刻成立，成分是积极的苦力雇农贫农中农为中心，红军政治部必帮助革命委员会，对政治保卫队的政治教育工作特别加强。

3、帮助和领导青年团迅速建立少年先锋队，动员边区中所有的青年来参加(富农除外)。

4、这些武装组织的武装还是主要的以旧式武器为目前的中心，在胜利中不断的可以新式武装去补充。

5、最广泛的动员这些武装的组织，在积极进攻的战略之下保卫边区肃清边区的一切反革命分子，帮助红军作战，特别加强军事政治教育，动员他们参加红军，以猛烈的扩充红军，实现编制红军 1 师的任务。

(九)根据地的创造与改造

1、边区范围目前以旬邑职田清水原土桥原淳化鞍子坡白厢原盘克原耀县耀〈照〉金马兰一带正宁之山河北原盘克原九〈湫〉头原史〈寺〉村原周围 400 里为中心，军事根据地在九[湫]头原，

2、配合群众武装首先肃清边区周围的白军和民团武装。

3、肃清豪绅地主寓农一切反革命活动。

4、立刻开始测验边区中的一切军事险要的开始建筑防御工程，搜集一切旧式的大炮火器配备在这些工程上面。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9 月 28 日 关于巡视陕甘游击队工作的报告

(一)陕甘边目前的经济政治的形势与群众斗争概况。在我许多次的报告中已将口前边区的经济政治形势述过，在这里不必多讲，只将主要的几点，作成结论的形式写出：

(1)在今年夏收以后，农村经济的破产不但没有丝毫的减轻，反而更加剧烈的发展，因为：A、在连年浩大的灾荒中，广大的农民失掉土地和生产工具根本就没地可种，有的种下少许，也因为没饭吃在去年冬季和今年春荒中当卖净尽，因此没有一点收成。B、有一部分农民剩下没有当卖完的少许土地，也因为去年种子没有，或出外逃

荒以及没有牲口等，也都没有种下，同样的在今年夏收，他们是没有收成。C、有许多农民也没有种子和牲口的不应手，种得或迟或早的不合时令，或旱或湿的不适耕耘，以及借到别人的牲口，种的不能很好，所以收成也少。D、因为穷人牲口的不行(特别是久早的时候，必要较好的牲口)不能深耕，和没有肥料，以及因为没有饭吃，要作别的事情，马马虎虎种下的，地也不能常常来耙锄，因此也就收得很少。E、就是有一部分穷人，有少许的收成——特别是贫农和完全勤苦的雇农，所有一点收成也没有：(甲)连年大灾旱中，负累着豪绅地主富农的帐项，被逼净尽。(乙)连年灾荒中，负累着地主的租子。(丙)国民党政府藉口夏收加紧各种摊派和剥削(捐税的名目很多，不能详列，在边区更其特别的是剿赤捐，剿赤军队支应费……只在王拉[郎]坡附近几个村子，每日除供给国民党的军队 300 人的饭以外，还要出洋 30 元)。(丁)在这种情势之下，特别是因为群众斗争的开展与红军的配合行动而被抄家的(牛羊牲口家具粮食完全没收，家里的主要人物被捕)很多，在职田镇二三十家人约 200 口，清水源[原]10 余家，人够 100 口，史林源[寺村原]数目不清，五顷源[原]因为分地，20 余家，77 口被逐净尽，粮食家具……完全焚毁；五坡俭、贤子口、南邑的粮食家具，也焚毁净尽。因此□□更多的(约六七百人)群众完全失掉一切食粮和工具，以至于土地或者只有马上出卖他的土地过活，但是这些土地还是要的人很少，很难出卖出去，就只有听其饿死。F、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使得农产(村)破产更剧烈的破产，特别是在夏收时，广大的农民的粮食牲口被高利贷租税等剥削净尽，广大的农民把打下的粮食和生产工具通通给人，还不够还债纳租、出捐税，大批的土地被豪绅地主富农夺去，形成了广大的群众从生产中赶出来，完全化为赤贫，土地大量的集中，在这里我们没有很多的确切的统计材料只能够把我的部份的写出，我和职镇源[原]一个同志谈话，他们那里只有 30 家人，就有 25 家负有财债，十家有八家都租种、或完全租种人家的土地。嘴头人家，只有 30 余家人，负债的有 27 家，将收麦就有 7 家人，完全没有饭吃，粮食吃不到秋收的，约有 20 余家之谱。五顷源[原]子 20 余家人，除了一家富农外，其余都租种或完全租种

人家的土地，这只是几个例子，详细统计，以后再续。G、因为农村经济剧烈的破产，把广大群众从生产中赶出来，就造成了豪绅地主富农向雇农更残酷的剥削，因之就造成了雇农大批的失业，和在业者生活日益恶化，工资减少，工作繁忙(平素雇 2 人的，现在只雇、1 人)。H、因为农村经济破产的深入，豪绅地主富农就更残酷的剥削群众，利率的增高与贱价收买土地，以及国民党捐税苛索，使群众破产的更加迅速，农村经济破产的更加剧烈。

(2)在这种情形之下，就造成了乡村阶级尖锐的对立起来，阶级斗争普遍的开展与深入，特别是对于分粮和土地的要求迫切到万分，分粮杀豪绅杀催款委员等斗争，在边区普遍的发展着，土地革命已经进行，五顷源〈原〉子，在分配土地当中，许多村子，也在进行，特别是五顷原子分地以后，九顷原的三村六社都继续的发展起来。在矢[寺]村原三家[嘉]原职镇原清水源〈原〉土桥源〈原〉张洪源〈原〉等一拉[提]出土地革命群众都是热烈的欢迎和拥护。这一形势把陕西省委过去的“陕西农民还没有为苏维埃政权与土地革命而斗争的勇气和决心”以及李杰夫、黄子文等说“农民不敢要地”以至认为“目前的中心还是抗粮抗捐抗债抗租分粮等，在这些斗争中联系到土地革命”的右倾机会主义打得粉碎，农村阶级的对立，已经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的形势。

(3)在这个区域群众斗争发展中，特别是武装斗争的发展，非常剧烈，每个斗争都包含着武装斗争的性质，有许多斗争一开始便是武装冲突，广大的群众都在积极的武装自己，在边区现在乡村的斗争已经没有和平讲理的余地，只看见“你是豪绅地主我便要打倒你”，或“你是共产党和红军我便要杀你。”

(4)群众的政治觉悟大大的提高了，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的欺骗，已经起不了什么大的作用，让杨子恒的军队整齐而群众却呼之以扫地平，特务团呼之为贼队团，把一切反动军队都认为是坏东西，有呼之以害民军……等名目，群众一般的呼声白军来了，豪绅地主就吃开了；红军来了，穷人就吃开了。这显然，群众的批评已经不是看守〈军〉队的风纪军纪的好坏，而是站在阶级立场上而讲的，完全是由

阶级利益出发的，这就可以看见群众的阶级认识。但是这时还必须抓紧群众的落后意识，国民党豪绅地主富农的阴险的威吓和蒙蔽之下，还有许多群众在其蒙蔽之下，我们在开展边区工作中必须深刻的注意到这些问题，不肃清这些现象是我们在创造边苏区中最大的障碍(有许多具体事实以后再续)。

(5)红军的影响与群众对于红军的认识。红军在半年来的发展中政治影响在群众中大大的扩大与深入，特别是因为土地革命的执行更其得到了广大的群众的欢迎和拥护，群众替游击队放哨，帮助和配合着游击队作战，这些事实我不必只讲几件事情，在红军派出了在史〈寺〉村原游击的小游击支队，当地群众因为他们跑得太乏自告奋勇给他们放哨，热烈的给他们探听和报告消息。龙嘴子的农民(回民)见了游击队和敌人作战而失散的一个战斗员(他穿着灰色衣服的)农民问他干什么?他害怕，他答称是赶红军的李桂清的军队(白军)，农民拿上锄头披〈簑〉头追赶，不远又撞见几个别的红军战斗员，话说明，农民埋怨他穿灰衣服的为什么不早些说呢?马上很高兴的把他请到家里去弄吃弄喝，服侍他们。把消息一问清楚，才送他们去赶大队。有一次在和敌人作战中，一个同志在一个地方压着，穿〈窰〉来十几个农民各执刀斧等农具，问这一同志是干什么的?这一同志在惊慌中只得答是红军，以为这一下就算完了，但是农民却说好!好!我们就帮助你!这位同志才半信半疑的稍放下(心)了，到回来后，这一同志本来不相信群众，这里的为〈群众〉，对红军真好!五顷原子的农民拿上梭标配合红军作战。在边区一带就是比较落后的群众看见红军来了，都眉飞色舞的高兴起来，最低限度也觉得红军是好军队，不骚扰百姓，自然在红军本身还有许多弱点和群众对于红军不正确的认识，让我们在下边报告红军的时候再讲。

(二)红军游击队的状况：(1)红军中党的影响的扩大和党的力量的加强， 以及在政治上的进步，当这里游击队改造之初，党在广大的群众中没有力量，特别因为当时的成份太坏，党的政治路线就不容易得到他们的拥护，以及有许多份子，公开的反对共产党，在这半年的发展中，党的政治影响在群众中渐次扩大和深入，党的力量大大的

发展起来，现在在红军游击队中已经有了决定的作用，不过在这时候，中央和省委的文件，还没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深刻了解，就是在党内还是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一现象我们必须用着最大限度的力量肃清，只有肃清这种错误，党的路线才能有保障；(2)成份的改造：成份的改造，也是红军游击队的很大的进步，有3个步兵大队，2个主要的都是三原五家〈武字〉区与三水以及其他各处的贫苦农民，第三大队就是石子俊兵变过来的士兵，大部分也是穷人出身，成为问题只有骑兵大队，所以我们要加紧政治教育，特别加紧土地革命的执行，群众很容易争取在党的领导之下。

中共陕西省委 1932 年 10 月 25 日 关于组织革命兵变开展甘肃 陇东游击战争的决议

一、甘肃一般士兵生活恶化，政治觉悟急剧增长与兵变的潮流化

因为帝国主义急剧的瓜分中国，国民党无耻的出卖中国，因为全国国民经济总崩溃的加深，因为地主资产阶级国民党反动的统治与连年不断的军阀战争，造成西北连年不断继续深入扩大的大灾荒。大灾荒的浩劫完全摧毁了农村经济，千百万劳苦群众变为饥寒交迫的灾民。大灾荒的经济浩劫，使国民党的统治，急剧的走到崩溃，影响到广大士兵生活极端的恶化。尤其是甘肃方面广大士兵的生活恶劣到前所未闻不堪亩状的地步，廿一年度只发过两次二元的维持费(定西补充团)，吃最劣等的粮食，且常不饱，广大士兵都没有衣服鞋袜穿，是在赤着足上操走路。因为营养不足，气候寒冷，许多士兵都害起病来，长官没有任何设备与救济，士兵待遇是最不堪的，一天只是拚命的上操。长官时时严厉监视士兵的行动，禁止连与连之间士兵发生任何的关系，打骂监禁以至于砍头，紧紧束缚着士兵的行动，谈不上丝毫的自由。目前是处在军阀战争的形势之下，杨虎城与马青苑的军阀战争，把广大士兵拉到火炮〈线〉上当炮灰。广大士兵生活恶化的痛

苦，使他们完全不能维持下去。

在广大士兵生活日益的恶化和痛苦的基础上，由于全国革命危机尖锐的增长，反帝怒潮与民族革命战争~争的扩大与深入，全国工农劳苦群众斗争与士兵哗变的高涨，特别是由于苏维埃红军新的不断的伟大胜利与陕甘红廿六军的生长，及陕甘边新苏区的创造，甘肃广大士兵的政治觉悟，是在急剧的增长。无疑的党在兵中间的威信是大大的提高了。广大士兵完全明白，要解决目前士兵生活的痛苦，要得到政治和经济上的彻底解放，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哗变到红军中去，走上苏维埃道路。广大士兵已经不断的为了自身利益的改善英勇的斗争起来了。士兵要求发饷算伙食帐的斗争，弥漫了甘肃所有的部队。士兵为了没鞋袜穿爆发了不上操的斗争(定西补充团)，结果争取到鞋袜。更因为算粮算帐要发给养钱与骡马费逼跑了营长，整个一营哗变了出来(定西补充二团第三营)。此外还有我们所不知道的，不知有多少士兵自发的日常斗争。甘肃广大士兵的兵变潮流，是在剧烈开展着了。警备三旅王子日〈元〉部几次的士兵哗变。邓宝珊干部补充队军事〈士〉队的兵变。定西补充二团三营全营的兵变。以至不断的士兵零星哗变。士兵从军阀部队中拖枪跑出来的事实已经不是新闻，而是最普遍的一种潮流。在固原海原之间有数不清的从军阀部队中哗变出来的士兵部队存在着。这些都需要党去坚决的领导他们，走上红军苏维埃的道路。

甘肃广大士兵哗变潮流的开展，无疑的是把领导广大士兵日常斗争组织与发动革命兵变，开展甘肃陇东游击战争三位一体的斗争任务，放到甘肃所有军队中我们党的面前。

二、在官长路线之下，党的领导与工作是远远落后于广大士兵的积极性与革命化发展的后面

甘肃军队中我们的党完全没有了解在目前中国两个政权尖锐对立之下，甘肃广大士兵急剧革命化的形势，换言之，对目前甘肃士兵兵变潮流高涨的形势，是没有清楚认识，估计不足的。我们非常清楚的看到，我们党的领导与工作远远落后于广大士兵积极革命化发展

形势的后面，而且还落后于我们在士兵中政治影响扩大的后面。我们甘肃军队中党一般的对于士兵日常斗争的领导还是消极的。在定西××团士兵拒绝上操的斗争中，我们作了群众斗争的尾巴。在补充二团三营士兵哗变中，同样的我们没有在政治上夺取更广大的甚至全部的士兵在我们领导之下。我们事前是没有充分鼓励与准备工作。我们只夺取出求我们所影响的一部分。我们党对士兵组织工作，表现了取消的倾向。我们没有建立士兵委员会与士兵反日会、红军之友社以及一切附属组织去团结广大的士兵群众。在日本帝国主义新的积极的进攻面前，我们党没有在广大士兵中进行反日反帝运动。在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的当中，我们党没有在广大士兵中进行广泛的拥护苏维埃红军的运动。我们党没有抓住广大士兵政治觉悟的增长生进行有系统的有力的对士兵的教育工作。我们的宣传鼓动在士兵中间进行得非常不够。我们党没有抓住甘肃军阀战争中广大士兵生活的痛苦，去组织与领导士兵的反对军阀战争，哗变到红军中去的斗争与兵变。我们没有抓住一功士兵斗争的形势，去有计划有准备的组织和发动革命兵变。我们的兵变路线还完全是脱离群众立三路线的阴谋(如警三旅王予日〈元〉部的兵变，邓宝珊军事〈士〉队的兵变等)。我们党还没有了解兵变的意义与兵变后游击战争的任务与路线，几次的兵变出来，不进行群众工作与它的政治任务，而是……完全实行山上的乱窜。最严重的我们党在军队中的工作路线完全是官长路线。党没有用最大力量去进行士兵中间的工作，去夺取广大士兵在党的周围。官长路线阻碍了我们工作的深入与扩大。官长路线给我们的党与士兵群众中间造成一座壁垒，阻止了士兵斗争与兵变的开展。党的组织工作更是严重到不能容忍的地步，我们的组织是非常的散漫。军特委是个空架子，没有具体工作，没有对各部队经常的有力的领导。许多部队(如定西)还没有军委或军支的组织，而是几个官长同志有事一块商量一下组织的形式，代替了党的集体的组织领导。组织上形成了关门主义。在广大士兵革命情绪政治觉悟日益尖锐增长的面前，我们党没有进行广大的征收士兵加入党的工作，形成我们在士兵中间的基础非常薄弱，影响我们管内活动是非常狭隘的范围。我们甘肃军队的党首先必须用最

无情的火力向着这些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官长路线斗争，变党为真正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为着当前的任务而斗争。

三、坚决领导士兵日常斗争，组织发动与领导革命兵变，开展陇东游击战争。

①党首先应坚决的去领导广大士兵的日常斗争，领导士兵要欠饷、发冬衣、发鞋袜、改良伙食、算伙食帐与粮帐，要医药费，减少上操，改良待遇，反对打骂肉刑，行动自由，一切大大小小的日常斗争，以致反对军阀战争，士兵不打士兵，不打工农与红军的斗争。在这些斗争当中，用最大力量，组织士兵委员会与各种附属组织(如兄弟会、拳术会、俱乐部、足球队等)，团结广大士兵在党的周围。在斗争中应特别注意秘密工作与公开工作的联系。不让一个士兵自发的斗争不在党的领导之下。坚决打击一切忽视士兵日常斗争而空喊兵变的立三路线。同时反对把士兵斗争束缚在日常经济苛争范围内，不向更高阶段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

②在广大士兵中间，应加紧党的政治宣传与鼓动。在士兵生活恶化的基础上，在士兵日常斗争当中，我们必须给广大士兵指明只有实行革命兵变，投到红军中去是脱离恶劣痛苦生活与彻底解放的唯一出路。抓着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件，进行我们对士兵的政治煽动和教育。特别注意在斗争中提高士兵的斗争情绪与政治觉悟，出版兵营小报与画报，经常输送小册子，小传单和党的一切宣传品到士兵中间去。用切口头的文字的方法扩大党的政治影响，使每个士兵都明白党的政纲、纲领、政策与主张，争取广大士兵在党的政治门号的周围。

③立刻进行在士兵中间广大的反帝运动。我们必须利用一切公开的半公开的可能，告诉士兵群众日本帝国主义新进攻，李顿报告书的意义，以及国民党更加无耻的新投降，告诉他们上海十九路军英勇地抗日战争及国民党出卖东北，义勇军继续一年之久抗日战争；告诉他们苏维埃中央政府对日本作战的通电与红军为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与国民党的战争，鼓动士兵最高的热情，集会罢操、罢岗、示威宣言、通电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和国民党的卖国。组织士兵反日会和

反帝大同盟，进行广泛的反日反帝及反国民党的斗争。同时就应告诉士兵群众，只有苏维埃是中国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唯一领导与组织者，只有红军是民族革命战争唯一主力军。号召广大士兵群众起来拥护苏维埃红军，开大会庆祝红军胜利，罢操罢岗与示威反对四次围剿，组织红军之友社，给红军通电、募子弹、赠物件以至领导士兵哗变到红廿六军中去。同时这一工作和拥护苏联运动不能丝毫的分离，应当同时加紧去进行。必须把这一任务看成目前我们党的特殊的紧急的战斗任务。

④在士兵日常斗争中，依据我们有力的政治煽动，有计划有准备的去组织与发展和领导广大士兵的革命哗变，领导革命士兵杀死反动长官投到红廿六军中去，投到农村中去开展陇东游击战争。我们的兵变必须是有士兵群众工作的基础，必须在广大士兵完全明了兵变意义之下，必须依据着广大士兵最高的斗争与哗变的情绪去发动兵变，必须有充分计划与准备，不论在军事上、政治上均应有十分的把握。我们坚决反对军事投机与军事阴谋，反对不要群众依靠官长的路线。

⑤兵变后积极开展当地的游击战争。我们同志必须明白，兵变与游击战争的任务，是在发动与领导群众的斗争，组织与武装群众实行土地革命与创造新苏区。我们同志更要明白认识过去甘肃几次兵变的失败，完全因为没有得到群众的拥护与帮助，没有和群众斗争配合起来。我们必须用最大力量到农村中去发动农民，一切分粮分土地斗争，组织与武装广大的农民群众，在农民群众斗争中，建立地方党部与工作。这在目前甘肃没有地方党部组织与工作的形势之下，更是我们兵变与游击战争最紧要的特殊政治任务。我们兵变与游击战争是否能得到发展与胜利，就看我们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成绩强弱而决定。我们必须在发动与领导群众斗争中取得群众的拥护与帮助，用我们游击战争的战术与战略，积极的向敌人小部队袭击，解决敌人小的部队或敌人一方面的武装。游击队必须按政治条件与地理环境，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有阵地的向敌人袭击。游击队必须在群众斗争中吸收广大的雇农苦力和贫农参加，不断的改造部队的成分，很快的在红廿六军番号下，组织正式的红军，积极向正宁、庆阳方面发展”和陕甘游击队取得联

系，巩固与扩大陕甘边苏区的创造。关于其他游击战争、土地革命与创造新的苏区的路线，省委关于(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苏区与红廿六军决议，对于陇东是完全适用的。

⑥我们在军队里的组织状况，是一刻也不能容忍下去的，必须立刻健全各部队中党的组织，充实党的生活与日常工作，加紧党在管内的活动，反对组织上的关门主义，必须最大限度的征收广大的积极勇敢的士兵加入党，加强我们在士兵中间的堡垒。在省委“十月革命号召”中，陇东军队中我们党必须有计划的实现三倍的发展党的组织，进行广大范围的征收党员运动。必须立刻在党的一切组织系统中讨论党的重要文件，讨论省委这个决议，定出具体工作计划，切实执行。必须用训练班、个别谈话、研究问题，讨论文件一切方式，加紧对士兵同志的教育训练，提高一般同志的政治水平，使每个同志都要明白党的路线，提高一般同志的积极性与革命热情，为党的工作速度而斗争。必须立刻进行党的改造工作，尽量提拔好的士兵同志来担负党的领导工作，把一切动摇不定的官长同志，从领导机关肃清，使我们能够在士兵中间成为真正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⑦立刻进行党内无情的两条路线的斗争。集中火力反对官长路线；反对对士兵斗争形势估计不足，把士兵斗争束缚在日常经济斗争上，不开展与深入的(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不领导士兵的日常斗争而只空喊兵变的立三路线；反对对士兵日常斗争与组织士兵的消极；反对一切军事投机、军事阴谋与军事冒险的兵。变路线；反对脱离士兵的官长路线。我们同志必须清楚的了解，如果没有党内两条战线的斗争，党的路线便不能正确的执行。

⑧估计陇东士兵工作的重要，省委决定组织陇东军特委。军特委重要的任务是领导陇东一带兵士的斗争与兵变，为省委决议而斗争。军特委对陇南与兰州各地军队中工作亦必须注意去加紧领导，以开展甘肃整个的士兵斗争、兵变与游击战争。军特委更应用一切力量调派同志到农村中去开辟工作，设法建立陇东地方党部的组织与工作。

省委号召陇东甘肃军队中党的同志们，用布尔什维克的坚定性与

不挠性在北方会议与省委领导之下，为开展陇东游击战争，创造陕甘新苏区而斗争，为争取苏维埃的中尉而斗争！

陕 西 省 委

十月二十五日

高岗 1932 年 11 月 29 日关于陕甘 游击队情况给陕西省委的报告

I、游击队的根本严重问题：

1、游击队的产生是由于阶级模糊的同志采取乱拉票予的方式弄钱买枪而创造的，不是由阶级斗争中创造出来的。

2、内边大部分的群众是土匪和贩大烟土的流氓。

3、发动时是由陕北来了一部分和三水汇合、流动的形成，不是由当地劳苦群众斗争而产生的，所以不能开展群众斗争深入群众斗争而使斗争扩大，使游击队的组织壮大。

4、政治委员差不多成了副官差夫，没有政治工作条例，没有经常教育士兵工作，没有加强士兵的领导与阶级的改造。

5、没有自己所把握的武力中心，因此许许多多的问题就没有法子来解决。

6、有反革命阴谋分子，他们抓着军事上的地位，把好的枪枝完全操在这些分子的手中，形成我们领导下没中心部队，没有骨干领导(最主要的)。

7、党的〈在〉这些部队中领导力量非常薄弱，因此不能执行铁的纪律，在组织上非常松懈。

在这些严重问题下面，遂使游击队无法执行土地革命，扩大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

II、愚痴同志巡视的经过：

1、愚痴同志到了游击队以后，即开了一个队委会议(在南邑，我未参加)，第三天才开了一个支部联席会议(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的中心议程是：1、政治报告；2、检查过去的军事政治的错误；3、队委的改组；4、通过省委路线；5、部队的组织。在这一会议上主要的工作决定是：①执行土地革命；②成立革命委员会；③分成四个小游击队，在各处骚扰敌人牵制敌人；④决定成立独立团，保卫边区苏维埃政府(这会议我未参加完即游击去了，以后详情我都不知道)。

2、我游击回来以后，愚痴又召集了一个政治委员会(我不是政治委员，允许我参加)参加者有黄、马、连我，在这会议上，我们反对他们的决议，他们认为在南邑凭借这一中队成立革命委员会，执行土地革命以及一切问题，其他部开在辛[新]庄一带工作，我们不同意他这种意见，第一，南邑土地革命还没有开始执行，富农从中作怪，赤卫队、游击队还未建立；第二，军事上一中队决不能负担这种责任：A、地形复杂，B、距敌人很近(相距 30 里)，C、顾了政治顾不了军事，顾了军事顾不了政治，D、辛〔新〕庄距我们还有 25 里之遥，敌人如果把九〔湫〕头一占，即有将我们分开的危险，E、工作方式不好，南邑工作和辛〔新〕庄工作不能打成一片，使两方面工作如经敌人一袭击，要受很大损失，经过我们讨论以后，愚痴同志才同意了我们的意见，把骑兵团开在九〔湫〕头联络(但第二晨，我们这一部队又被敌人袭击而退却了)。

3、经过这一挫折以后，全部队开在狼家湾，在此地开了一个会议，决定分开游击，刘、黄带一队到三水、清水源[原]游击，高三保带一队到三水职田镇游击，曹盛荣、严文炳带一队到梁家原游击，骑兵团、步兵中队在狼家湾游击(这是会议的主要决定，我未参加，其他我不知道)。

4、经过部队出发以后，光丢下一个骑兵团和步兵中队，骑兵与步兵队长都带彩了，军事上没有直接负责人，严鸿[阎红]彦是指挥，杨仲远参谋长，到这时军事上一点不作准备，不作游击计划，到

第二天他们还睡大觉，敌人已进攻，把步兵队打散了，他们才知道，因此大受损失，他们这时都抱怒[怨]省委路线之不正确，他们都说：省委的路线执行了，我们的部队快损失完了。

5、在这一失败之后，刘志丹部队完全退到马来(马栏)。在12点钟开了个队委员〈会〉议(这会我未参加，详情未知)在下午3点开了一个群众大会，宣布了一切新的路线(这详情我亦未知)，当时由王虎臣、古振元(中队长)提议不要愚痴当政治委员(这里我们要注意的是王虎臣在闹南北问题，抢枪、抢马，古振元等主张监视李杰夫的行动)，同时北边这一伙混帐东西决定蒋〈强〉龙光枪打李杰夫、荣子清、谢保涵、高三保(这话是刘志丹说的，知道的人很多)愚痴走后，他们在群众中大骂愚痴混帐，省委路线不正确，这是他们为争取领导权的反革命阴谋。

6、由争领袖而失败一①在南邑愚痴主张一个中队能把军事上政治上的问题都可解决，刘志丹同志反对，严鸿〈阎红〉彦极端赞成，本来愚痴同志对军事上一点不懂的。③刘家店子在队委会议上决定到盘克，严鸿〈阎红〉彦因不满意谢浩如当指挥，他不同意到盘克古，因此在和谢浩如争执中对于军事不作一点准备，使我们部队不解〈能〉很快的开去，又被敌人袭击大受损失，③在吉志贤决定宿营，严鸿〈阎红〉彦不满意刘志丹，将五支队宿在吉志贤(镇名)五里地的一个沟中，在上吉志贤的时候，沟畔上不放哨，又不通知刘志丹，因此特务团左团围攻时自。己才发急，布置已来不及，因此我们又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7、在愚痴同志巡视工作中，就我知道的错误是：①南邑的决定工作，③愚痴同志在会议上态度不好，同志们一发言他便说右倾，因此使一般同志都不敢发言了。⑧没有很快的考查支部工作。

III 愚痴离开部队后的经过情形

1、当愚痴走对，定仍在史〈寺〉村原、互家〈嘉〉原一带分开游击，开发工作，他走后各部队没有执行这一决议，高三保到庙湾游击，严鸿〈阎红〉彦带步兵大队骑兵大队到蒲庄一带游击，过了十几

天又集中各部队在赵〈照〉金游击，解决了柴子方〈发〉民团，在这时又决定各部队在赵〈照〉金、史〈寺〉村原、三家〈嘉〉原、清水原分开游击，谢浩如同志到后主张兵力集中，不应该分散，在这一会议上，又把前次决议推翻，决定在盘克游击，到盘克又开了一个会，认为盘克危险，一方面敌人在后追击，一方面子弹缺乏，衣服问题不能解决。谢浩如、杨仲远等提议上陕北，可以抢马闹衣服(因为陕北羊多)闹子弹，增加群众，扩大组织，我当时提出反对，我认为：第一，敌人在什么地方都要进攻我们，绝不会让我们一块地方给我们建立苏维埃政府；第二、游击队是有政治生命的，我们要在广大群众中开展群众斗争，使斗争深入，才能冲破敌人的围剿，才能解决衣服子弹等问题，第三、我们没子弹，要到陕北解决这些问题，而且陕北都是大森林，人烟稀少，当然我们到的地方要吃要穿，这是军事冒险和土匪路线，第四、向外部脱离群众，在外部没有广大群众拥护(因为森林中住的都是两家三家，人烟稀少)。在内部三水和三原的群众不愿到陕北去；第五、保安、定边一带没有大市镇，如果衣服问题解决不了，那问题就更严重了，把敌人解决不了，敌人再进攻我们，这一部队就要受到很大损失，我主张把部队化整为零，在盘克原金村庙原(西)华池镇一带分开游击，摧毁统治势力，发动农民斗争，作分粮分土地的运动，在这过程中，逮捕豪绅解决衣服问题和子弹的接济，但当时未被通过，刘志丹提议把部队开在山上，绕黄水寺张村驿店头等镇，再向各山上出来，向清水原、史〈寺〉村原、三家〈嘉〉原一带游击(他说在这些镇上能够解决衣服问题，在涧[建]庄萧[小]石崖可以买子弹，还能避免敌人围剿)结果全场通过，第二天开在太白，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又无条件的将这一队委会议推翻了，执行了军事会议上陕北的路线，到了陕北，群众望风远逃，将群众吃的一扫而光，所过路途，百姓骂为土匪，更谈不到什么政治路线，到保安，因子弹的空虚，兵力的疲乏和指挥的不统一，又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返到白包〈豹〉川又开了一个会议，检查了自己在军事上政治上的错误，决定新的路线，骑兵队和第二大队到盘克

原一带游击，刘志丹带一部分到保安游击，和陕北特委接洽，李

光明到洞庄马来〈栏〉一带游击，群众大会宣布了这个路线，到瓦子川住了六七天，又不执行这个决议，仍然采取了陕北的路线，召集会议，决定杨仲远、严鸿〈阎红〉彦带上骑兵大队到甘泉霄〈鄜〉州一带游击，吴岱峰、杨赓武、曹胜荣带第一队到安定、横山游击，刘志丹带一部分到保安游击，李光明仍在马来〈栏〉一带游击，决定张赫杨森带三原的农民回武字区，双邱带三水的农民回三水(注意，这两部分带了一个短枪，其余都是坏的不能用的长枪)。还要注意的是吴岱峰是叛党已经开除党籍、开除部队的坏家伙，杨赓武是开除党籍多年，又当过多年土匪的领袖，并在孙蔚如(部)当过走狗的，来让这些东西到安定横山收当过二十年土匪的王绩奎以广〈扩〉大军事力疑，试问这是壮大土匪的力量还是壮大我们的力量，还有可笑的是杨仲远，我们老早认为有反革命阴谋的一个主动者，黄子文同志曾提议在军事上撤销他的参谋长，并成立决议案，通知全党同志监视他们的行动，而谢浩如没经队委决定竟委为骑兵大队的政治委员，而且始终没有撤销他的参谋(长)职务，并且把我们好的同志杨纪得、李明章、杨森等逐出骑兵队，张赫看了没办法，就将南边的群众带回武字区，杨仲远当晚出叫令是“驱逐恶魔”。张赫走后，他们仍在大森林的深山中，南北距有人的地方不知有几百里，西距有人的地方约百里，东距有人的地方约四五十里。这样永无人到的地方连一粒米、一个碗、一个锅都没有，他们于是就把穷苦老百姓的锅和粮食一扫而光的运到这里来生活，第二天下午又被敌人打得飞散了，在这个条件之下群众赤足精身，没有吃的东西，还要打硬仗，必然造成群众继续不断携枪逃跑了。

在这个时候，骑兵队到甘泉游击去了，步兵队五六天以后才集合起 70 多根枪，100 余人在平定川，杨赓武、姬振元、吴岱峰等清一色的东西仍主张上陕北，在这时候，我始来鼓动南边少部分群众和变过来一部分士兵战斗员绝对不上陕北，要回边区武字区，剩下清一色的东西出谢浩如带领驻扎平定川和陕北特委联络，保护伤兵。

当我们走的时候，有四五十个小孩，8 个伤兵，10 多个伙马、夫，50 来支枪，齐集盘克原和敌人作了一战，打死民团 4 个，退在

黑母〈木〉原，这时候连一个子弹也没有，衣服也没有，决定活动少部分子弹，解决衣服问题，决定向盘克原、黑母〈木〉原金村庙原板桥镇游击，逮捕豪绅(现已逮了 7 个)解决一切问题。

在这过程中谢浩如和骑兵队在陕北抢了一些马匹回到盘克原，开了两个支部联席会，报告两个部队游击经过，决定我到省委来，这里应注意的是：1、他们在平定川遣杨腰武给陕北特委送上 800 烟土，2、鲁文昌(中队长是同志)带了一支盒子手枪、长枪跑了，陕北特委有些枪，而清一色的东西又介绍杨赓武、鲁文昌向陕北特委取去了，3、他们所谓忠实干部党进修老程都带着枪骑着马当土匪去了，4、杨仲远、严鸿〈阔红〉彦灼□□计划，骑兵有许多小孩，小孩不能骑马，把步兵士掉[队调]过来一部大人，马上到武字区去，5、他们本来不想和省委接头，可是他们计划带上骑兵到武字区一跑，马上就回去，他们可以藉口说，我们找省委，因为武字区不能立足，没有介绍信，一定接不头，武字区已不能立足，和〈新〉，字区候你们，好解决一切问题，他们说这样我们就不去，叫省委和××找他们来，由以上种种事实说明，他们已是阶级的叛徒，绝不能执行省委的路线和政治的任务。我们执行布尔什维克的路线，必须要把这些东西彻底肃清，我们党必须派得力的在政治上、在军事上的干部彻底改造这一部分，然后才能完成红二十六军的任务。

4、现有部队组织状况是：

骑兵火队 — 一中三分队 — 二中 — 三中

步兵大队 1 — 2 — 3 — 5 — 6 分队

骑兵大队队长阎 OO，政委杨 OO，中队长姬 OO、张 OO

步兵大队队长刘 OO，大队副曹 OO，代政委李 OO

步兵一二二三分队为成人班，四五六分队为少先队，骑兵有 100 人，长枪 50 多枝，短枪 17 枝；步兵队人有 70 人，长枪 50 多枝，短枪 8 枝。

阎：当过号兵、马弁、土匪、富农；

刘：土匪、学生、富农；

杨：学生、白军中的军官、贫农；

姬：农民、土匪、中农、浩如之外甥，

张：土匪、中农；

李：学生、白军中的排长。

骑兵队群众成份：土匪、流氓占 1 / 3，余为破产的农民。

步兵队群众成份：有 40 个小孩(过去的少先)系贫农，成人精一部分是自军士兵过来的，余皆贫农。

5、党的组织状况：

骑兵：支部一，支书即杨 OO，人数不详，约 10 人；步兵：支部一，支书为王 OO，7 人，团有 4 人。

6、我们在游击队中所得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在部队中必须建立自己在军事上在政治上强有力的中心部队，以作我们的保障和肃反；

第二、必须经常的肃清反革命分子，使反动派在我们队伍中没有立足之地，以巩固我们的组织；

第三，游击队员有广大的农村市镇中开展群众的抗租债税捐粮，抢粮分粮，执行土地革命，与捣毁国民党的一切机关的斗争，在这种过程中建立游击队、赤卫队大队各种群众的武装组织，才能使他〈我〉们的游击队壮大起来，才能建立苏维埃政府。

第四，必须(在)部队中加强党的政治领导，才能使我们的部队有布尔什维克的顽强性与坚持性，不致发生动摇于敌人持久作战时。

第五、在部队中必须有工人无产阶级的得力干部和具有工人无产阶级的精神的共产党人，去作政治军事的领导，才有保障。

第六，只有加紧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左的军事冒险阴谋和在政治上、组织(上)不发动群众的斗争，而只是逃跑，上山脱离群众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仗反革命阴谋无机可乘来破坏我们的部队。

第七，游击队必须有铁的纪律，才能使我们部队的组织指挥统一，

战斗力加强。

第八，在部队中一般战斗员生活非常干燥，应当有俱乐部的组织，以提高战斗员的情绪。

第九，在斗争中必须发展组织，提拔干部加强我们的领导，过去党在部队中完全关门主义，常向省委要干部，自己不会培植干部锻炼干部。

第十、在部队中必须成立红军随营学校，造成许多的干部。

第十一、迅速执行红军工作条例、政治工作条例。

第十二、用政治手腕必须把那些混帐东西完全清出去。

第十三、把部队中土匪流氓成分根本铲除。

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杜衡 1932 年 12 月 22 日 关于成立红二十六军筹备情形 向陕西省委的报告

省委：

我已于 18 口星夜追到部队，只与步兵和三原游击队接头，骑兵还在文王山，昨天我已去信调了，今日上午 12 时前可完全集合起来，明天把二十六军的问题即可解决，现只将简单的情形作概略报告，部队整理好后，将有更详细的报告寄来。

第一、我来了和几个同志谈了话以后，知道内部的问题比以前更严重了，一切行动，他们已经有计划布置了，人数枪枝都已有分配，在某个时期他们必然要很快的行动起来，但他们主要的在指挥员方面，群众他们是无法抓去的。在这种条件之下，我想这个问题，根据我们的计划最近毫无问题的可以得到彻底的解决，但这个问题目前确是万分严重的问题。

第二、部队到这一带后，已经分了 4 天粮，在 4 天中动员了广大

的群众，这个过程是很惊人，第一天只有 10 余人，第二天 300 余人，第三天(我到的那一天)到有 1200 余人，成年男子 800 余人，妇女 200 余人，小孩 250 余人，群众到足没有计划的进行，紊乱到万分，进行些什么工作也没有准备，宣传鼓动工作也是没有的，使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力量。我到后看着这种现象，临时选出 10 个分粮委员，各村选出个代表，共同讨论分粮的办法。同时举行了一个临时群众大会，三原农联代表、共产党陕西省委代表、青年团代表、二十八军代表都有讲演，讲演后即开始分粮。我代表省委讲演，主要是土地革命、消灭豪绅地主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建立群众武装组织。这个讲演引起了群众疯狂似的拥护，群众在讲话中都大声呐喊，掌声如雷，那种热烈的状况真到了极点。但因时间太仓卒（促），工作还是不能令人满意。昨天又召集一次，到有 2000 余人，队伍有二三里长，但离分粮的地方太远，有些群众回去了，组织起来有 800 余人，共到 76 村，每村一个代表，我们抓紧这些代表开始这里的一切工作，今天我们召集群众大会，由于大会通过没收香山寺的粮，分配给农民，同时今天即着手进行分配土地，建立赤卫队、农民联合会，红军战斗员的征收，征收新党员工作进行如何，将来再报告。

第三，部队已经全部开到这里，已经动员起来广大群众，我和几个同志谈话，即以此地作根据，这个根据地具备了几个主要条件：①这地是三水、淳化、耀县、三原、宜君的中心，接连陕甘边，尤其是接近了开展的渭北群众斗争，与渭北新苏区的创造是作到了最密功的连系配合，红二十六军在这里更能飞速地推动渭北新苏区的创造。②这个区域内有西路各地逃到的灾民，约略估计总有 20 万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的要求是万分的迫切，这带土地是集中起来的，这是我们创造苏区和根据地的最有力的条件。③群众的动员是更迅速的，同时接近三原耀县，动员广大群众到二十六军的各种问题是更有利的，而且很快的可以解决了。④粮食这一带是最多的，红军是可以得到充分的给养。⑤军事地形上是有利的，前面东西都是平原，后面是山，进攻防御都是有利于我们的，根据了这些条件，我决定二十六军再不向北移动，即从这一带作根据地，创造陕甘边新苏区，与渭北新苏区联

结起来，打成一片，这个计划，今天部队集合后，即提出实际执行的工作来。

第四，正式成立红二十六军，大概在后天，明天我们集中力量，解决部队中的一些问题，后天举行正式典礼，同时我宣布就职，我们将有通电宣言发出。红军的编制，暂时组织 3 个步兵连，1 个骑兵连，是二十六军过去的基本，即刘志丹带的步兵大队，1 个补充连，完全是新战斗员，内有 1 个炭井工人，还有些雇农，今天即宣布成立，举行成立典礼，1 个青年连，由过去的少先队改编，因少先队是群众的组织，红军还是按照正式军队去组织，组织两个骑兵连(马 60 余匹)，以旧的做基础，马补充些新的，扩充为两连，此外组织特务队，把现有的短枪集中起来，挑选一部分最好的和最积极的组织，目前以 30 人去组织，直属政委，我将用全副的力量解决部队中的一切问题，不然我在这里是很危险的，那些反革命分子在我未来前已经开始反对我的工作，我在常委时的估计是适合了事实，所以我对部队的问题的解决，是要极端慎重和布尔什维克旧决心去布置。

第五，经费问题是可以解决的，我听说骑兵中还有 20 包鸦片烟土，约 1000 两，我预备全交常委，作常委经费，一部分给二十六军作工作上用，如组织后方办事处，输送及购买医药、宣传机器等用，这些东西，将派三原游击队保送下来，同时我听予文计算武字区的现款，目前都在 3000 以上，省委应责成特派员和三原中心县委负责提出一部分交常委。

第六，群众工作这样开展，二十六军大规模的发展，需要省委更实际的帮助这个苏区的建立，目前最主要的是干部，立刻开始许多工作就要许多干部去负担，省委要采取中央四中全会后对各苏区的办法，派遣许多中心干部领导各苏区的转变，有了今天的成绩，至于红二十六军的问题，比各苏区严重千万倍，需要更多的干部来完成这一艰苦的工作，省委必须坚决的打破有我来就对了，其他干部都觉得是留作省委和其他地方工作，这样毫无问题的是可以和缓我们工作的进行。大批干部的输送，以帮助红军与苏区的工作，这是万分的迫切政治任务，不是简单个人和干部问题，我要求省委把这个问题讨论后，

立刻报告中央，和中央共同解决这一问题，比较是更有效力的，中央过去抓的 3 个人，一个(个)都有工作，这次要求中央派遣干部特别注意到，这是一点。关于干部问题，这里最近自己想办法来解决，目前最需要的干部：1、政治工作。2、宣传鼓动工作。3、技术人才。这些人才可以大批的征调，征调好后，可叫南原游击队输送来。

第七，现在已经给省委大洋 300 元、烟土两大包，红军办事处大洋 300 元、烟土 3 大包，这蝗经费均由三原游击队送来，请向兰原县委要去。

第八，征调好的人才及省委各种文件，红军组织条例，政治工作条例，必须马上送来，一周内骑兵来三原取东西，办事处经费项下再买 2 付油印机、腊（蜡）纸油墨等 canten 墨水复写纸练习等。

第九，无论如何派几个秘书人才，文字能力比较好的同志来这里工作，这种人才，造里是没办法择出来的。

第十，二十六军编制情形，明天即可决定了，将存详细报告，昨天我宣誓就职，今天开党员大会，明日进行改编。

励君

(1932)12 / 22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1 月 4 日 给杜衡的信

励君同志：

12 月 23 日第一号报告昨收到，特复如下：

在你追到部队后，立即动员了七十几个村庄千余群众进行分粮斗争，着手分配土地，建立赤卫队及农联，进行征调战斗员征收党员，负责的广大号召和红二十六军的改造，省委认为这是在红四方面军来陕促进二十六军的新形势下正确执行党的路线的初步成绩，现在

必须抓紧这一形势，坚定的执行全部工作的彻底转变，情势的开展一定是非常迅速非常广泛的。

省委同意你们在渭北关于创造新的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军事计划的决定，但同时指出敌人围剿绝不仅限于特三团小邱营和民团从南面作弧形进攻，在红廿六军会师和新的猛烈发展过程（程）中，敌人必然要集中一切力量，从正面从陇东从陕北向我们举行全线包剿，不但要动员所有陕西的部队，同时国民党中央军也一样要积极参加作战，大的冲突已经紧迫的逼到面前，反对围剿是全党的紧急任务，我们需要用大的力量扩大巩固红廿六军，开展边区广泛的群众运动。同时特别加强渭北西路和陇东的工作，也绝对不容再事延缓，因为这在冲破敌人围剿中是有决定意义的。

我们不想一般的提出领导群众斗争，开展游击和建立政权的问题，只指出几个特殊的实际工作：

1、关于红廿六军内部问题的解决，主要的要在开展群众斗争和在红廿六军战斗员中深入两条战线斗争过程中（的），来扩大巩固和改造它。要依靠着群众从党的正确路线出发解决一切问题。形势是严重的，但不要过分估计它的严重性，因为这可以使我们走到操之过急的冒险道路上去。问题迅速的，但要大胆的慎重处理，建立特务队是必要的，但集中一切短枪的办法省委认为并不妥当，因为这可能影响作战，可能使问题趋于复杂。

2、青年连的问题，过去少先队已经是红军的性质，现在正式改编为红军是对的，但不必冠以青年连的称号。因为这可以在红军中形成青年成年的对立，这更可以助长青年团先锋主义的发展，这已经和cy省委(协商)同此意。

3、巩固党的领导是红廿六军的一切工作的前提，应该立即进行一个征收党员的公开号召，吸收大批的积极的战斗员到党里面来，建立支部生活，巩固团委的领导，团委书记最好提拔一个新的积极战斗员来担任。

4、边特地方党部问题，省委认为应该建立在新的根、根据地，三

水受其直接领导。边特书记，省委仍决定由×曾同志负责，现调来省委，日内即行出发。三水问题非常严重，直到前两天才来一个普通同志(负责的都相互推诿不来)，工作是在不和平的停顿中，过去所谓井坳官组斗争实是执行富农路线。

5、省委对渭北征调三四人到红军的号召，三原县委直到最近完全没有实际工作的动员，省委与李克同志讨论之后，现要他仍回三原领导执行这一工作任务，省委在西安从10号起进行一个征调到红军中去的10日运动周，特别配合着现在机器局爆发的斗争，准备征调200人到廿六军去，今天在准备期间，已经开始有初步的成绩。

6、关于陇东工作，省委只要有钱便立即派人巡视，坚决发动那里的兵变，淳化军队中亦同样进行。但军队工作主要的还要地方党部运用群众路线去进行。

7、目前关于军事指挥问题，省委意见是提拔最坚决的工人干部来负责。

8、省委几日内可以抽调四五个干部前来，可以做政治处主任，其余的另行分配在部队中参加政治工作。

9、后方办事处省委已决定△△同志负责，但另一方面红廿六军应派一代表常〈长〉川〈期〉驻省(人选以坚定的战斗员，熟悉军中一切情形者为宜)。

10、向中央要人及委任问题，省委可向中央提出，需要的一切文件即送来，用具有钱时即照办(现在完全是山穷水尽)，地图正在找，现有的是陕南部分，并不适用。省委派老马同志前来与你们解决一切工作问题，但他不能留部队工作，一定期内仍须返省。

陕省委

1933年1月4日

黄子文 1933年1月5日关于 红二十六军情况给陕西省委的信

省委：

红二十六军于我们动身回武字区的先一日，正式举行了授旗典礼，内部许多问题以及改造都获得了相当的成绩，因为我们动身的急促，励君未得写报告，叫我回来给省委负责报告，一方面不知省委何时前来，一方面因武字（字）区太口不能久留，所以先给你们写个报告转来。

1、红二十六军的数量以及质量，武装及战斗力，高麻子已给你们有详细的报告，我们到时无多变化，只是在通源沟后收土匪武装的20支枪，部队的组织，分步、骑两大队，各自在军事上及经济上都星独立的，没有支队的组织，有许多问题时，有两个支联来解决，党的组织也是骑、步两支部，骑兵大队中党员约10余人，步兵大队中共7人，团的同志3人，其实完全没有支部的作用，只做了几个军事首领——宏（红）彦和子（志）丹——闹私人意见的工具，他们一切都没有计划，过着得过且过的日子，渭北红游去那，他们又准备北去，好处是我早到半天他们没去得了，不然又不知何时才可以见上，励君到（等）数人，在我们到3日前抵部队，当我们到时同他们支联决定骑兵到武字区，接省委派来的人，骑兵和我们在高三（山）槐一带帮助分粮斗争，骑兵没碰见励君，因他们先到了步兵大队中，于第3日骑兵便在香山会合，当天便有飞机两架及一团白军到照金及柳林一带，因为部队要解决许多问题，便决定北移，经衣食村到杨家店子召集了全体党员大会及战士代表讨论了政治问题及检查工作、改组部队诸问题，一般战士代表，及一般党员都很气愤的反对过去的上山逃跑路线，露了几个军事首领的错误，在一般这样热烈的情绪基础上，便将部队改造了，对谢、阎，刘，杨4人，执行了党的纪律，开除部队，新团长由班长中选举了党员王世太[泰]，骑兵改为骑兵连，步兵一连，青年一连，特务队一小团队，于行过授旗典礼的第一日即开始了他们新的军事行动。

2、部队的成份比以前要好的多了，并且在数日的行动中，参加了煤矿工人及雇约70余人。关于反革命阴谋的问题，并没有像你们过去根据口初及杰夫报告的那样的严重，由许多的事实及行动以及这

几个同志的热烈的接受他们的错误表现上，证明了他们没有其它的组织及破坏部队的行动，同时在解决这些问题，也没发生其它的变化，实出励君初来估计之外，现在因为新的基础还没有十分稳定，旧有的指挥系统初行改造，为了军事技术及地理诸问题，重远暂时仍担任参谋处长，子〈志〉丹担任政治处长，先决定予长及宏〈红〉彦离开部队到中央去训练，子长决定留党察看 3 月，红彦魁严重警告，他们 2 人已到武字区，要省委立即解决了他们好起身。部队中各级新的指挥人员，是出政委任命的，我走时团委还没有正式成立。

3、现在部队在新的改造中，虽然有了相当的成绩，但是不采取猛烈的扩大及积极的胜利进攻路线，许多的任务很难迅速执行。第一，要省委督促各地方党部，即速动员农民扩大二十六军的组织，完成 3000 人参加的任务。第二，要省委马上调派政治军事工作人员，建立军事及教育训练工作，群众工作尤其是政治工作人员，现在骑兵连政治指导员是克寿暂理，步兵还没人，同时励君更挺出要省委刻不容缓的去注意这些工作，不要以为他去了，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同时派去的老郑，因为他观念上有许多问题，励君提出要省委另派参谋长去，要省上马上去人协同，三原中心县委 1 人，耀县代表 1 人，讨论新的工作布置，你们去时或先到三原给他送信，着人来接你们或直(接)到部队中去。

4、关于根据地的问题，是同意了励君来时和三原中心县委讨论决定的地址，三原中心县委以[一]定详细报告，不多写，我们经过很长的讨论，认为他们决定的地址，在军事政治地理群众工作都是中心，更能配合四方面(军)的游击与群众斗争，关于军事会议决定的军事行动，另外报告，在此不写。在军事会议上决定要叫省委调动泾阳的游击队，往北移动到凤凰山一带，在军事(上)可起到呼应，不然相去 200 余里，很难取到配合的行动，要省委马上讨论执行，其它关于渭北游击军事配合问题，渭北红游已有代表参加他们的军事会议决定了行动。

5、励君的信，我已交革委转你们给省委，经费大洋 300 元，大烟 200 两，给红军办事处经费是大烟 500 两，给三原战死的同志薛保

函大烟 100 两，给胡庭俊家中大烟 200 两，完全交到革委财政委员会，你们立即派人去取，不宜在那里久放，以防意外。

6、你们接到报告后讨论(后)，立即去三原和县委去接头，谢、阎怎样办，因为他们不能在那里久住，我马上从这里回去，如能在那再候数天，将问题能解决了更好，如那里严重，我便把他们送到渭华一带，你们再酌决，你们给送报告人决定，再送报告人回来，路费由你们给他。

子文 1. 5.

杜衡 1933 年 1 月 9 日关于红二十六军 改编经过及改编后的工作概况 给陕西省委的报告

省委：

前给两函，一由送我们的人带回，一由子文带回，关于改编后的各种情形，由子文当面报告，想已见面了。

现在我将我来后的工作，作一个系统报告，请省委详细指示为要：

第一、改编的经过。关于我来后对于：部队接头后的工作，详第一号报告中，兹不赘。我到骑兵后，即于当晚开到王石府，第二日我就军政委及团政委，举行就职典礼，我作了一个很长的演词，指出红二十六(军)英勇的战绩，在北方革命运动中的作用，指出省委过去的领导，谓子长的右倾机会主义上山逃跑，使部队削弱的罪恶，最后指出红二十六军的正确路线及紧急任务。演词完后即宣誓就职。我宣誓词：“我誓以无产阶级的至诚，执行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和省委的正确路线，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所给予的任务，以争取中国苏维埃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彻底胜利”。宣誓后即有许多同志讲演，热烈指出

过去上山逃跑主义的错误，拥护省委的正确路线。这一个大会，是〈对〉〈个〉一般战斗员(是)一个很大的兴奋，党的路线是开始到群众中去。为了很快的改编部队，当天即开到杨家店子，晚间即召集负责同志会议，决定先开全体党员大会，各连赤色战士及指导员都派代表参加，大会共两天，因为军事政治环境不允许我们延长，议程中间的许多问题还没有讨论即闭会了，立即进行改编。关于党员大会的详情，我另作详细报告。大会的议程是：①主席报告；②追悼阵亡将士；③廿六军政治委员训词；④各代表讲演；⑤各主要负责同志报告和过去工作检查；⑥讨论：廿六军的改造和扩大及编制问题；b 根据地与目前行动策略问题；c 团委组织问题，d 党的工作问题；e 政治工作问题；f 纪律问题；g 呼口号。大会后，当天即着手改编。关于改编的情形，首先我要讲到关于团长的问题。团长的人选，我们为了执行省委对反革命阴谋的决定，在未宣布团长之前，把过去负责的人都作了彻底检查，把他们的错误和罪恶都露在群众的面前，粉碎过去那些信仰，最后我们提出由党员大会上选出 8 人，由政治委员任命 1 个。但团长的资格必须在班长和战斗员中，不能在过去的指挥员中。大会一致通过步兵大队王世泰担任团长。这是个同志，很忠实，过去在平凉工作，一般战斗员中信仰很好，我即在 3 人中任命他当团长，同时为了在军事上给他以强有力的帮助，即命郑毅同志作参谋长帮助世泰同志。其次，两个军事负责同志发表后，即进行改编，共编 3 个连：步兵连、骑兵连、青年连。政治委员直属下有特务队，团部有政治处、参谋处、经理处，各处组织还不能按照红军组织条例，因为干部缺乏，部队范围还不很大，所以暂时还是只能撑起个架子来，尤其是政治处，因为群众工作的开展，政治处组织的不健全，只是忙碌的应付而已。编制后枪枝 150 余支，人数 200 余人。这是改编的大概情形。

第二、改编后的工作概况

①缴收焦家坪民团枪。转角举行授旗典礼后，我们将渭北游击队，即决定具体军事计划与行动策略，游击队回三原与廿六军积极行动配合起来。当天我们即到焦家坪，把民团枪全部缴了。这是出师后第一次胜利。焦家坪住 10 天，召集了 500 余人的群众大会，把几家豪绅

的粮食没收分配了。晚间的敌情，有 3 连人离焦家坪 10 余里，我们因面前地形不熟，不能给敌人以袭击。焦家坪在军(事)上最不利，拂晓我们即离开焦家坪，到要险布防。本来我们计划把焦家坪民团枪收后，即进攻庙湾，根据派去的同志回来说，团长防备很严，单纯军事行动不能得到十分的胜利。我们决定的策略，先到我们根据地照金一带建立群众工作，有相当基础后，即往远处移动，在敌人不备中去袭击，一鼓作气把敌人完全消灭，使根据地的后防能巩固起来，因此即开回香山一带。

②创造根据的具体工作。回到香山一带后，首先建立这一带的群众组织，开发〈展〉群众的分粮斗争。在斗争的基础上，把群众提到更高的阶段上去。现在我们把香山保的农民联合会与赤卫队游击队的组织，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游击队 20 余人已经开始单独行动，扰乱敌人逮捕豪绅，土地革命在群众中已经深入了，得到了群众的热烈拥护。这两天，我们即组织革命委员(会)，开始分配土地，九保、西社，决定一周后要把土地分配完，香山保也提出最近就要把土地分配了。一周后这两保的分配土地即可执行了。这两保的群众工作有了基础，我们即抓住这基础积极的局面向前发展，与三原耀州西原的农民斗争配合起来，以创造渭北新苏区，雇农工会的组织已经开始。工会组织的办法，先有〈在〉农联中把雇农小组建立起来，由雇农小组建立雇农工会，地方党的组织已经建立了两个支部，成份都很好，最近能有更大的发展，预计一二日内可以成以〈立〉三四个支部。关于地方工作的领导，我们在 20 天前已经给三原县委信，叫耀州县委来个代表，和我们决定关系，谁知麻木不仁的县委，直到现在不见来个人影。我们即决定成立区委指导这些支部。区委直属政治委员，这是临时办法，将来在这一带的组织，究竟如何建立，由那里管辖，还必须(由)省委去决定。这些工作已有相当建立，我们即配合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武装组织，集中力量解决披据地内的一切豪绅地主的武装，以巩固我们的后防。在有后防作战条件之下，我们即大举进攻，在积极进攻的策略上，完成巩固和扩大红廿六军的任务。

③巩固和扩大红军的工作。自我到以后，即积极的吸收新战斗员，

在每次群众会议中和分粮斗争中，即派人公开讲演，很短时期内以〈已〉发展了一倍，成份都是很好的，不过现在的问题必须千倍百倍的加紧政治教育、军事教育的工作，以巩固红军的基础。教育训练已经开始了，目前唯一的困难是没有得力的政治指导员。对于政治工作的领导，真是薄弱到万分，这是目前一个最大的困难问题，需要省委派一个得力的干部，以过这一过渡时期。如果干部已经过一个相当的培养时期，毫无问题无须省委来解决了。为了完成廿六军的任务，我坚决的向省委提出来。如四中全会后中央对于各苏区一样的严重注意，必须坚决打破忽视廿六军扩大和巩固中的干部问题。在这里必须提出我第一次向省委的报告已经 1 月，子文下来时间已将 2 周，但据昨天革命委员会代表来，省委还没有一个字答复，交通是没有问题的，而是省委对于问题的解决是不可容许的迟缓。关于通讯问题，我万分诚恳的要求省委要用尽可能的力量解决这些问题。

第三、所有要求省委解决的问题；

①实行 3000 人的号召；

②派进军事政治干部；

③修械工人；

④军医和药；

⑤交通站托建立；

⑥军枣指导[挥]人材(参谋长、团长、师长)也应该向中央、提出；

⑦党的组织问题，边特委是否组织，如不成立，根据地内党的领导由那里管理；

⑧各种文件法令等每样送一份来；

⑨写字的技术人才；

⑩油印机、墨、硬纸、好墨水、铅笔、日记本等物件，报纸各种。

励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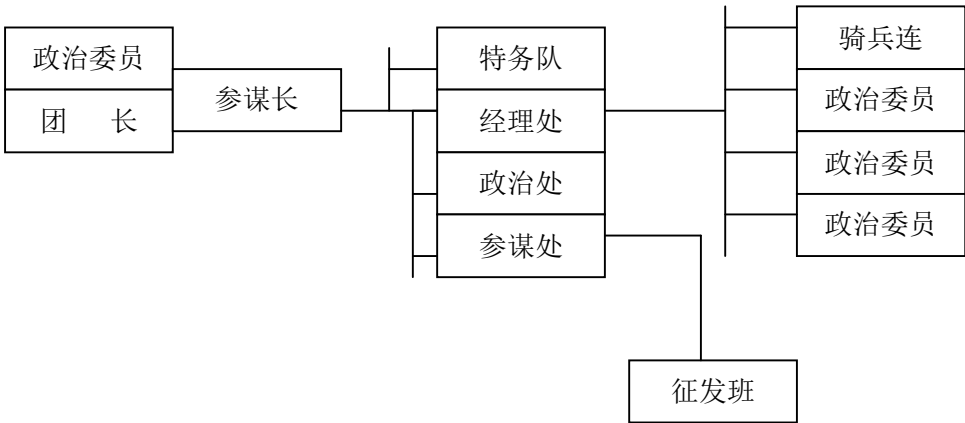
1、9(1933)

郑毅 1933 年 1 月 9 日
关于红二十六军军事行政问题
给陕西省委的报告(节录)

省委：

关于军事政治方面，励君已经报告过了，我只把军事行政方面的事项报告于下：

(一)、编制：现在编制还没有按照中苏政府的法令，因为物质方面的不够，所以暂时是新旧混合编制成的，不过我们正在新的编制路上走着，以达到中苏政府红军组织法令规定的编制，暂时的编制如下：



这些编制，除步(兵)连(九班制)足额外，其余都不足，我们在最近要扩充一个步兵营。

(二)战争[斗]力及人事数量与质量：在训练上虽然差池，但在英勇上是超过白军的几倍的，所以在现时的战斗力，运用得当，可与一营白军对抗，并歼灭之。人数 300 余名，枪 150 余支，子弹每枪约三四十枚，战争[斗]员成份以雇农为最多，但骑兵连学生成份多，工人少，枪枝虽不十分好，但大半可用，马 40 余匹，骡 30 余头。

(三)训练：每人[天]两操两讲堂，朝会自习训练 8 小时，但行军作战时则停止，并成立军事政治速成训练班(两星期)，实行上课。

关于训练的材料(军事的与政治的)与教授人材，非常缺乏，这要请你们火速派人来和送教育材料来的。

(四)内务：在卫生上简直糟糕的很，全军没有一个医生，也没有卫生材料，有病的时候，没法调治，只随其自然(或痊愈或死亡)，修械及造弹等事也不能实施，所以关于医生军械工人兽医生等技术人员，我们也请你们火速派来的。

(五)战略：关于战略，我们遵照你们的指示，达到我们党目前的任务，这一样不详写了。

(六)附带的质问与请求……

郑毅

1 月 9 日于照金□

金天花 1933 年 1 月 25 日 关于红二十六军在庙湾作战 经过给陕西省委的报告

省委：

在达一个报告内，我打算把我这一次在廿六军所见到的关于最近的情形，作简单的叙述：

(1)最近在庙湾和夏老么作战的经过。在军事会议上决定收夏老么的民团枪枝。半月以前一个拂晓，廿六军全部和所有的各游击队一齐前去，当时因为骑兵到的早些，使敌人知觉，马上作了准备，向我们射击，为了地理的关系(他们占着三角式的小番山堡)，我们骑兵吃〈受〉了很大的损失(骑兵连长曾世云〈曹胜荣〉阵亡，政治指导员张秀山带伤，六七个战斗员也带伤，遗失战马 2 匹，子弹消耗许多)。当时将该团包围半天，因恐援兵到来，只好暂时退下，回到老爷岭和

前后雨原一带驻扎。在这内〈里〉开会检讨这一次行动中许多严重错误。

(2)团委会与军事会议的决定。会议中我和子文同志一同参加，子文同志给他们报告了最近旧政治形势，同时子文同志负责报告了他这一次回省对省委传达廿六军对于过去许多计划的决议。子文同志在报告中谈到他这一次下来在武字区，因为要避免敌人的捕捉，故不〈尔〉跑到渭南去，在渭南他给省委写了一次报告，遣人送去，以后三五天始终没有见到那人回来，他当时只好仍回到武字区，同时见到省委特派员理科同志和见文同志，并给他们作了一次日头的报告，当时他们指出子文同志在这一行动中的错误，同时派他帮助天花同志到上边解决游击问题后回廿六军工作。在会议中励君同志指出省委多日来对于廿六军的工作，有严重的问题；①省委的意见，认为励君同志到廿六军后，一切可以迎刃而解，殊不知这是非常危险的概念。②征调 3000 人到红军去的工作，一直到现在还不见一个人影子。③干部与技术人才的问题，④关于拥护红军的工作，所谓军旗鞋袜等一件也见不到。⑤对于各地群众斗争均发动，尤其是耀县，如果不加紧做去，单靠红廿六军做，是绝对不成功的。⑥省委过去所说派马同志到廿六军来，始终没有见到。三原耀州各县也没有人来过。香山堡一带已成立起党团组织(建立区委)，始终没见到耀县负责同志，因而仍要红廿六军直接领导。在会议中同时指出目前的军事行动问题，决定步兵仍在雨原一带积极行动，骑兵向庙湾民团仍取包围形势，渭北游击队回耀州西南原一带，破坏敌人后方，三水游击队在兔儿岭一带游击，香山雨原游击队仍在该地配合廿六军行动，宜君游击队仍在该地游击，王子祥的游击队在小丘一带游击(这一游击队，王子祥已逃走，由我们另派程同志暂代)。

(3)会议后的形势。夏老么最近很残酷的屠杀香山一带的群众，死者五六十人。会议后第二天和敌人又接火(胡三、夏老么民团，小丘白军特务三团)。当时骑兵已走(到柳林庙湾)敌人向我方进攻，作战 3 小时，我兵退走，将三水、渭北各游击队退到西坡一带，廿六军退到石门关一带，骑兵和夏老么接火，作战数小时，骑兵步行边〈拼〉

杀，随质来了敌兵，将战马 20 几匹夺去，当时连夜开回衣石〈食〉村驻扎，第二天早被特务三团及民团包围，当时我们被敌人冲散，回到高山槐一带，隐约听到北边炮火连天，杀声大噪整整一夜，未知后事如何？以后据下来群众谈称，特务团有兵变一营投我们，我们久队会合把民团又形包围(但不知确否)。{晋北游击队一队在新字区行动，二队在高山槐西原一带行动。

天花

1933 年 1 月 25 日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1 月 28 日 关于红廿六军庙湾作战 情况给中央的信

中央：

收到励君这个报告后，省委又听到廿六军在最近与敌人作战受了很大损失，4 个连长，1 个阵亡，2 个失踪，参谋长失踪，骑兵连损失尤大，马死 30 多匹，励君现在步兵适中，干部损失很多。这次败仗前，他们有人 300 余，枪 100 多支。经过这次损失，不知如何了，待得确实消息再弹报中央。

陕委

1 月 28 日（1933）

附

励君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报告

省委：

你们 1 月 4 日的信收到了，所送文件都已收到。

前两天我派朱同志来省委<与>报告进攻庙湾事件，我们在军事上

所受的损失，以及最近的军事行动计划，兹不赘送(述)。

这次军事上的损失，使根据地的工作更加困难了，<一个>群众的情绪，因为还没有强圈的武装组织，所以低落了。昨天集合赤卫队都没有集合起来，而夏老么对人民的进攻屠杀更厉害了。昨晚军事会议，我和其他同志都起了很严重的斗争，他们又要重复过去的错误，作单纯冒险，脱离创造根据地的工作，结论就是同意了我的意见。今天根据我的意见向庙湾周围作积极的进攻，号召广大群众起来，消灭夏老么的统治，以提高群众的斗争情绪，创造和巩固根据地的工作。这里的工作有相当的成绩，即渭北群众斗争配合起来，击溃敌人的一方面，以冲破敌人的严重围剿¹。但我认为这个围剿的冲破，还必须看对于各方面工作的配合如何。如果只是红廿六军的孤军独战，结果在这个区域内是不能有完全战胜敌人的把握。同时在我们工作中的最大困难，这里是没有党的工作，群众斗争主要的是靠红军的力量发动起来的。这是根据地的工作中最大困难，这个困难一直到现在还不能克服过来。耀州地方党部，我们给三原去信，叫他们派代表来，直到现在还不见来，他们对于我们在这一带的发展完全不管。这种富农的领导，省委必须给以彻底的转变，新的根据地完全是耀县的，望省委特别注意。

今天我要严重的指出，省委对于廿六军的工作，必须用布尔什维克的做〈警〉觉性加以严重的注意，再不派几个得力干部帮助工作的转变，只靠我一人的力量是不可能的。同时现在的纠纷还是严重的问题，都不是从土地革命中的群众斗争产生出来的积极分子。加以敌人的严重的围剿，这个困难，是我们要以最大的力量克服的。三原渭北3000人的号召，必须有相当的成绩，100工人的号召不要成为空谈，这是克服这些困难的最主要的办法。另一方面，廿六军加强根‘据地各种工作的建立，再派得力的干部，是目前最主要的问题。省委对这个问题必须很迅速的解决。关于我的问题，我是不能担任这个任务的。因为我在军事上完全不懂得，政委在军事(上)与团长负(有)同样的责任。因为这个问题，这次军事作战中的损失，使我在战斗员中的威信是削减了，尤其是目前的团长参谋长都不能负责，这样政委必须要熟

于军事的，才能使廿六军有很迅速的转变，这个问题，省委须提出讨论为要。

省委关于廿六军的关系必须密切起来，我要三原派来十几个交通，到现在不见一人，这种迟缓现象真是不能容忍的，要责成三原交通站负责按期派来。

速派参谋长来，速送医药来，现在有伤兵六七人，无法医治。油印机、各种文件、战斗员都速望游击队护送来。关于政治事干我们这里真是黑暗地狱。

励君

1933 年 1 月 15 日于大崖之

金理科 1933 年 2 月关于红廿六军 及陕甘边区作概况给三原中心 县委及陕西省委的报告

三原中心县委转省委：

a、红二十六军的情形。自从遭受敌人的围剿后，部队开往陕甘边区，计划在边区一带开展工作，在贤子园一带号召了几十个灾民分粮，但是粮尚未分到即发现山河敌人的进攻，部队与敌人接火后即将敌人打退。因为经费的困难和子弹的缺乏，决定部队开往盘克原一带，配合庆阳石子俊部的兵变，以巩固部队的势力。我动身旋里时，部队已经开拔走了。计划于两礼拜内完成兵变的配合后即回到赵集〈照金〉一带。至于部队里的领导，因为励君对军事不懂，团长对领导也没办法，整个形成了志丹参谋长个人意见，所以建议省委很快遣派政治军事人才到部队来，并实现 3000 人的号召到红二十六军来。

b、建立边区特委问题。我与二十六军特派员李妙哉谈到当地党

的组织情形，在过去这里只有 6 个同志，3 个参加游击队，3 个因为白色恐怖而逃跑，所以当地根本不能提拔干部，因之建议马上派干部到边区建立特委。至于群众组织的情形，因为在二十六军的影响之下，群众的情绪非常高涨，建立起 6 个农联分会。

c、边区游击队的情形。现在共有 5 个支队，(三水 1 个、老陈 1 个、耀州一二支队，□州变兵 1 队)，最近尚有富平宜君派代表接洽，受我们的编制，在游击运动这样的开展之下，缺少党的政治和军事上的领导，因之，我于阴(历)正月六日，回到武字区和区委讨论，征调人才，现在武区已决定 4 个人员(同志和群众)到边区游击队中去，同志〈时〉建议马上派一批政治和军事上的人才到游击队来，并派得力的同志担任特委的军委。

d、交通问题。现在马上要建直二十六军与边区的交通处，省委与县委要在武字区建立交通站，由武字区转二十六军和边区特委。

理科 2 月 2 日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2 月 3 日 关于红二十六军的战术问题 给杜衡的指示信

励君同志：

1 月 15 号和 9 号的报告先后收到，朱同志并来到省，庙湾战事经过不得其详，最近由三原褥到消息，知道损失是很大的，在这封信里，省委不是对你们提出一般工作意见，现在特别讲到的是战术问题。

在今天红二十六军本身还存在着许多严重弱点，还不是有根据地强大坚固的与南方红军所能比拟的，因此他还不能与敌人做对垒战，主要的应当采用游击战术，红二十六军生长成为正式的有力的队伍，还须要一个过程——积极发动群众斗争，广泛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

庙湾军事受挫的教训也就在这里，以红二十六军今天的实力解决(有)一二百条枪而防备很严的民团，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你们虽

然认为“单纯军事行动没有胜利的把握”，却又企图“把敌人一鼓作气，完全消灭，使根据地的后防巩固起来”，这是非常矛盾而且十分冒险的，现在事实上也证明确实是军事冒险，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认识与民团做〈作〉战和与白军做[作]战是不同的，因为民团是地方反动武装，他们地理熟习〈悉〉，固与民团做[作]战就更须要藉重当地的工农游击队，我们这次做〈作〉战，在战〈术〉方面显然不是在一个有利的地位，我们还向民团探问地理，还遭受到民团的袭击，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省委认为红二十六军今天还不应当用“撑架子”的办法，勉强按红军条例编制，也不是编成一个大游击队，因为支队过渡〈度〉的扩大起来，不易迅速移动粮秣，供给困难，移动难于隐蔽，容易使敌人识破其企图，也就不容易完成其游击任务，并且在敌人大包围之下，容易被敌人击溃。因此省委的意见，红二十六军今天应当配合当地群众，编成许多小的游击支队，这种小支队人少的缺点是可以神速的动作、突然的袭击、诡计等等方法来补救的，采取的战术应当是游击，所谓“阵地战”还不是红二十六军今天所能胜利〈任〉(的)，游击应当很有计划的进行，这就是说应当注意侦察，设埋伏，破坏敌人交通，袭击敌人运输队、征发队，解决敌人部分武装，要很好的运用“化零为整”“化整为零”的方法，各支队彼此要有很密切的联络，每支队都应当有一个至几个秘密的隐蔽地，要这样很有计划的进行游击，就须要一个指挥部，统一这些支队的行动，我们特别看重这些小游击队的编成，必须配合当地工农群众这一点，应当将现在红二十六军里面久经战斗、政治上非常坚定的战斗员分别与当地斗争中的群众编成小游击队，这才能更发挥地方游击运动的作用。骑兵游击队还是非常重要的，这里骑兵于战斗中则往敌人侧翼动作，于追击时压迫敌人后尾，扰乱其侧方或后方，同时骑兵还是游击队主要的通讯工具和侦查工具。

我们这里的意见绝不是取消红二十六军(二十六军的名义固然要保持)，相反的这正是积极开展游击运动中来巩固和扩大红二十六军，并且也只有这样才能极广泛开展当地群众的斗争，摧残乡村中反动政

权，创造许多新的苏区，粉碎敌人对我们“围剿”。

省委要求你们详细讨论游击队怎样动作和中国游击运动问题两本小册子，并且要详细研究红二十六军长期作战的经验和教训。

最后省委想答复你们信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省委对二十六军绝不是完全忽视的，三原县委最近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省委累〈屡〉次派人去都没有很好解决那里的问题，现在省委又抽调三原地方的中心干部来省讨论他们那里的工作，三原形势的严重障碍了许多任务的执行，3000 人的号召，省委与二十六军交通关系的建立，甚至经费问题(骡子被敌人拉去了，一直到今天还有一半没卖出送来，党团省委最近曾派了一些干部和修械工人到二十六军去，但到三原无人招待，有的坚决到边区去，中途数次被捕又折回省委，几天之前才知道你们又折回边区，交通不必经过三原，省委现设交通科布置全省交通网，兼理红二十六、红二十九、红四方面军一切交通事宜，现在三原的修械工人及其他同志，仍着三原游击队护送过去。此外，省委另派一个军事干部和做文化政治工作的同志前来，杨森等出狱，经过训练之后，仍派回二十六军来。向中央提出的要求，一律转向中央，油印机、医药、文具、文件，都已准备好，即日送来。军医尚在物色中，从前派往二十六军去的几个军医，现在是否均已离开部队。边特委仍须成立，省委几星期前，已派李科同志前去负责，其他同志折回，只是他不知足否到目的地。耀县工作开展，另外又发生严重问题，你们在那里成立的组织暂由边特领导，这次三原同志回去之后，再去接收。

陕西省委

1933、2、3

**杨声 1933 年 2 月 14 日关于
红二十六军庙湾战斗情况给
陕西省委的报告(节录)**

红二十六军到香山、照金后，群众斗争开展非常迅速，红军的影响在广大劳苦群众中是普遍的大火加强了。这次因为红军进攻夏老腰〈么〉未果，在军事上受了挫折。夏老么民团原先散住耀州两北原一带，因红二一六军来到，遂集庙湾，当时对红军没有取进攻的形势，是采取缓和的手段。就我的估计，红二十六军当时为了争取军事上一些胜利，他们估计夏老腰〈么〉是能够解决的。红二十六军因此动员骑兵等实行向夏老腰[么]进攻，要解决夏老腰〈么〉，因军事上如错误(不详)，连战数次未能取胜，骑兵连连长曹被打死，后因骑兵术防，夏老腰〈么〉暗中向骑兵袭击，结果听说骑兵一擗人马(约二十六七个人马枪杖)救解决，从南边“围剿”的是小邱军队，并由下面开上去数连(不详)，首先与渭北游击队缴[交]战，同时与红二十六军接触，听说红二十六军步兵损失短枪一支，带伤的数人，据回来人说，23日，二十六军撤距三水以东30里地，向四〈寺〉树原一带行动。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3 月关于游击队 指挥问题给红二十六军的信

励君及团委诸同志：

适才接到三原报告，知道在耀县、宜君、三水最近产生了五个游击队，省委根据这一形势，更[现]提出下面几个意见：

(一)省委认为前次关于游击战术及红廿六军编制问题的信，仍是正确的，红廿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指挥部之下应有一中心部队，作为生长成正式红军的骨干。

(二)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对敌人围剿做有计划的反攻。省委现已调天花同志来省，解决渭北游击队问题。

(三)关于由兵变组织的耀县游击队，省委不同意三原县委提出的办法，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据县委报告，他们已征调了五六

十个农民战斗员到这一部队去，现在的办法，应该是将这些变兵与当地农民配合起来，成为几个小游击队，开始游击行动。在编制时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小队须要几个最坚定的分子作骨干。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3 月 15 日 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节录)

英勇的红二十六军同志们：

根据了以上的分析和估计，针对着红二十六军的过去错误与缺点，二十六军必须迅速的执行以下的具体工作：

(一)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进攻华北，已经占领热河，平津危急，整个华北将成为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运动强有力的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直接武装干涉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危险，更加紧张，大规模的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残酷围剿，中国国民党继续一年来无耻的投降帝圈主义政策，与帝剧主义分工合作的集中一切武力去围剿唯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武装力量，“蒋介石北上”“请缨抗日”等等，都是国民党出卖中国的烟幕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在东北在华北已布置好了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毫无问题的要更积极的布置西北上进攻苏联战争的根据地。一年以来，建立西安陪都，开展西北，都是布置进攻苏联的步骤。这样，红廿六军的任务，更加严重了。如红廿六军的发展和巩固，陕甘边与渭北新苏区的创造，就给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迎头痛击。因此红廿六军必须更英勇的担负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出卖中图民族利益的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反对进攻苏联的前线任务。这个任务的执行必须：

第一、“十倍的加紧扩大红军及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使每个劳苦群众、赤色战斗员了解，只有在土地革命产生起来，得着千百万劳苦群众热忱拥护的工农红军，是唯一能够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保

障中国民族解放的力量。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直接。武装进攻中国苏区的危险，使他们了解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土地革命的胜利是不能巩固的。”(区党部的信)

第二、进行广大的政治鼓动。廿六军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立即发表宣言通电，号召边区及全陕西的工农劳苦群众。对日宣战，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在各种群众的会议上，清楚的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严重的意义，揭破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各帝国主义侵略清除道路的作用。

第三、动员边区工农劳苦群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武装拥护苏联的大示威。召集群众大会，报告帝国主义的新进攻，报告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各种事实，揭破国民党的一切民族武断宣传，指出只有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够真正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以提高工农劳苦群众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情绪。

第四、建立边区反帝大同盟，团结反日反帝的广大群众，把中央苏区反帝大同盟的纲领最广泛的向工农劳苦群众解释。

(二)为了进行反：商因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红廿六军必“围剿”的是小邱军队，并由下面开上去数连(不详)，首先与渭北游击队缴[交]战，同时与红二十六军接触，听说红二十六军步兵损失短枪一支，带伤的数人，据回来人说，23日，二十六军撤距三水以东30里地，向四[寺]树原一带行动。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3 月关于游击队 指挥问题给红二十六军的信

励君及团委诸同志：

适才接到三原报告，知道在耀县、宜君、三水最近产生了五个游击队，省委根据这一形势，更[现]提出下面几个意见：

(一)省委认为前次关于游击战术及红廿六军编制问题的信，仍

是正确的，红廿六(军)应即成立一指挥部，指挥边区耀县宜君一带的游击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指挥部之下应有一中心部队，作为生长成正式红军的骨干。

(二)在三原富平另外成立一游击队指挥机关，指挥当地游击战争。这一指挥机关与红二十六(军)发生横的关系，对敌人围剿做有计划的反攻。省委现已调天花同志来省，解决渭北游击队问题。

(三)关于由兵变组织的耀县游击队，省委不同意三原县委提出的办法，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三团。据县委报告，他们已征调了五六十个农民战斗员到这一部队去，现在的办法，应该是将这些变兵与当地农民配合起来，成为几个小游击队，开始游击行动。在编制时一定要注意每一个小队须要几个最坚定的分子作骨干。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3 月 15 日 给红二十六军的指示信(节录)

英勇的红二十六军同志们：

根据了以上的分析和估计，针对着红二十六军的过去错误与缺点，二十六军必须迅速的执行以下的具体工作：

(一)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的进攻华北，已经占领热河，平津危急，整个华北将成为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进攻苏联进攻中国苏维埃运动强有力的根据地。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进攻，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直接武装干涉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危险，更加紧张，大规模的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残酷围剿，中国国民党继续一年来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政策，与帝国主义分工合作的集中一切武力去围剿唯一的反帝国主义的民族武装力量，“蒋介石北上”“请缨抗日”等等，都是国民党出卖中国的烟幕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在东北在华北已布置好了进攻苏联的根据地，毫无问题的要更积极的布置西北上进攻苏联战争的根据地。一年以来，建立西安陪都，开展西北，都是布置进攻苏联的步骤。这样，红廿六军的任务，更加严重了。如红廿六军的发展和巩固，

陕甘边与渭北新苏区的创造，就给了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联的迎头痛击。因此红廿六军必须更英勇的担负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反对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反对进攻苏联的前线任务。这个任务的执行必须：

第一、“十倍的加紧扩大红军及红军中的政治工作，使每个劳苦群众、赤色战斗员了解，只有在土地革命产生起来，得着千百万劳苦群众热忱拥护的工农红军，是唯一能够统一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保障中国民族解放的力量。使他们了解帝国主义直接。武装进攻中国苏区的危险，使他们了解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土地革命的胜利是不能巩固的。”(区党部的信)

第二、进行广大的政治鼓动。廿六军根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言，立即发表宣言通电，号召边区及全陕西的工农劳苦群众。对日宣战，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在各种群众的会议上，清楚的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严重的意义，揭破国民党的出卖民族利益与各帝国主义侵略清除道路的作用。

第三、动员边区工农劳苦群众，组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武装拥护苏联的大示威。召集群众大会，报告帝国主义的新进攻，报告国民党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各种事实，揭破国民党的一切民族武断宣传，指出只有中华苏维埃政府与中国工农红军，才能够真正打倒帝国主义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以提高工农劳苦群众与民族革命战争的情绪。

第四、建立边区反帝大同盟，团结反日反帝的广大群众，把中央苏区反帝大同盟的纲领最广泛的向工农劳苦群众解释。

(二)为了进行反：商因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红廿六军必须更要加紧创造以照金一带为中心的新苏区与红廿六军向外发展的根据地。这一任务的执行，必须粉碎廿六军的同志们对这一形势估计不足的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新苏区的根据地还不是我们能够即刻建立的。这一必须经过一个比较长的时期，这是障碍着这一任务的执行。廿六

军必须一分钟不迟延的执行中央关于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指示。在目前的游击队行动区域中，必须立即彻底执行下列的任务，以便造成红军与游击队的巩固的根据地，这些任务是：①组织翻领导农民群众起来没收一切地主祠堂庙宇及反革命的富农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苦力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绝对不能在任何名义的掩盖之下，分得土地。富农只有在他自己耕种的条件之下，分得一份劳动土地。土地应该(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标准来分配。在分配土地时，不仅要顾虑(及)雇农和贫农的利益，而且要顾虑[及]中农的利益。只有在基本农民愿意和帮助之下，才能实行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一切农民过去的欠债与租税应立即废除。②彻底摧毁当地反革命的政府机关，组织苏维埃的政府机关，应该从当地群众组织及游击队中选择可靠的党员和非党员来加强陕甘边苏区的革命委员会来领导农民斗争，扑灭反革命的势力与夺取武装。革命委员会必须宣布全国苏(维埃)大会的一切决议与法令，并努力实现这些法令。他应该根据苏维埃的组织法，来组织村乡县以至全边区的工农兵代表会议的政权。这里应该特别注意保证在苏维埃政权之中的无产阶级与雇农的骨干及党的领导。③解除边区内一切反革命派的武装，广大的进行武装工人雇农贫农和中农，组织农民的赤卫队与少年先锋队——这些队伍的任务(是)，于[与]苏区内的反革命作斗争，保护苏区边界和参加一般政治和组织的工作。他同时应该是补充红军的后备军迅速盼执行上面的任务，才能够创立真正的根据地，巩固这些任务的具体执行。省委特别指出：第一、廿六军、游击队、农民联合会及党与青年团员作最广泛的群众鼓动，动员群众自动的起来，在革命委员会领导之下分土地，不要成为廿六军的分土地。第二，把香山寺香山堡、照金、玉原、八九堡一带豪绅地主的土地，立刻没收来分配。交际上这些区域内的豪绅地主都跑了和杀掉，需要我们去立刻执行。第三，深入反富农斗争。过去你们在这个区域内是没有进行反富农斗争，使富农在这区域内的利益，还是丝毫没有动的，并且富农在分粮良斗争中，还混入分粮，这些富农在这个区域内，明的暗的作他们反革命的活动，在他们影响之下，农民说：“土地慢些分，豪绅地主都跑了，无论什么时候，土地都是自己的”。这显然是寓农

的作用，延缓土地革命的执行。第四，立即恢复香山堡的农代联合会、赤卫队，同时在八堡九堡农联积极开展，建立这里的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应该很迅速的组织起来。第五，目前各游击队应该最积极的向外发展，消灭附近区域内的敌人，以保障土地革命的彻底执行。第六、在分土地中立刻实施红军优待条例，以提高赤色战士的战斗情绪。第七，边区革命委员会在现时条件之下，立刻由农联、游击队、共产党、红廿六军代表共同组织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必须执行一切政权的任务，纠正过去三原革命委员会形成群众组织的错议。

(三)用千百倍的力量扩大并巩固红廿六军。在这方面，省委提出红廿六军与渭北各级党部(在)一个共同的口号下面，红廿六军与渭北各地党部(要)有计划的征调工人雇农苦力贫农大批到红廿六军去。二十六军在这方面必须更加努力和积极起来，在一切群众斗争与群众运动中，不要忘了征收新战斗员的工作，尤其是在千百万工农劳苦群众在热烈拥护红军的情形之下，毫无问题的是有利于红军的扩大。同时红军中的政治工作，必须千百倍的加强起来。因为“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每个红军战斗员不仅要能够有充分的军事技术——手的武装，而且最重(要)的是脑子的武装。必须充实现有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实现中央政治工作条例。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中央给中央局苏区及闽干〈赣〉粤省委信)只有这样二十六军才能巩固起来，成为强有力的工农红军。

(四)积极开展游击运动。只有用更大的力量，开展这个区域及附近的游击队的行动，才能保障根据地的巩固和创造。你们在这方面是已有相当的成绩，但还必须更广泛的组织农民队。积极的向耀州、同官、小丘、淳化、旬邑等地行动，以与红军的行动配合起来，消灭国民党的军队和民团及一切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要记得“如果在国民党区域没有很大的农民游击战争，红军是很(难)得到决定的胜利的”(中央)。因此你们提出把渭北游击队编为廿六军的一连，省委认为是不适合的。因渭北游击队恰在敌人围剿廿六军的后防上，保障渭北游击队的强有力的行动，是对红军有更大的帮助，是使红军更能迅速的有利的执行创造新苏区的任务。省委为了统一渭北各游击支队的

行动，并且为了红廿六军的行动，更密切的配合起来，廿六军在渭北成立游击队总指挥部，名义用“中国工农红军二十六军直辖渭北工农游击队总指挥部”。省委决定××同志负其责。你们现在成立的边区游击队总指挥部，省委认为是不适合的，应该取消，你们应立即组织边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统一红军和游击队及一切群众武

装的领导。

(五)用红军和游击队中的政治工作，瓦解国民党的军队。经常用各种方式：标语、口号、宣传品，以动摇国民党的士兵，最重要的是游击队和当地农民群众中、二十六军中选择一部分积极分子，打进小丘、耀州、旬邑何高侯等部队中当兵，组织这次〈些〉部队中的革命兵变，以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一工作再没有比这严重了。然而你们不能了解这一点，放弃了这个工作，认为这是省委的工作，等待省委去组织兵变，这是最有害的机会主义观点，是掩饰你们对白军工作瓦解敌人部队的消极怠工。

(六)肃反工作是万分严重的，你们必须用布尔什维克的警觉性，运用各苏区中肃反经验，很慎密的去进行。你们对郑毅的处置，我们认为是适当的。但你们把这个事件秘密起来是不对的，你们必须即时将郑死的这一事件向全体战斗员公布，说明郑毅一切反宣传反革命的活动，与共产党的领导是根本相反的，以教育全体赤色战士，引起他们的警惕，动员群众起来，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一切反革命活动、任何破坏红军与苏区的企图。至于地方的肃反工作，必须特别加强革命委员会中的肃反委员会工作，有系统的动员群众消灭豪绅地主的统治。

(七)“即刻开始红军的随营学校与干部学校来训练新的指挥员”(中央)。省委决定你们应诊立即开始这一工作，第一期 30X。成份 3/2 要是工，由各地和游击队派送。二十七六军选择 10 人。期限一月。随营学校不仅训练新干部，而且要成为廿六军的中心力量。学生是武装的，前方战事需要，随营即全体参加作战，成为全军的模范。巩固后防，参加宣传组织群众的工作，这在转变二十六军中是最迫切的工

作。各地学生，20 天内即送来。边区军事主任，省委特派杰犬同志担任。政治主任，本久即前来。

(八)最后要讲到战术战略及红军行动问题。你们回师南下，决定集中力量，积极进攻是正确的，但省委必须指出，二十六军的战术不是要以游击队战术为中心，要渐次练习阵地战平原战，以锻炼成为强有力的红军。但攻坚与对垒战还不是二十六军目前所能胜住的，这种战争将来在军事的进展红军的坚强与根据地巩固之后，必定能够改变的，改变到有利于红军的这种动作。“红军的动作，在任何情形之下(进攻或防御等)都应采取绝对的积极性”。这些原则的运用，第一，尽量加强游击队的活动，向敌人的四方八面扰乱进攻，使敌人的围剿增加困难。第二，红军与游击队的活动配合起来，诱出抄击敌人。第三，对边区的敌人，首先用各种方法消灭夏老么。在这方面，你们的计划，省委是同意的。第四，红军的行动一定要有计划的行动，不要你们在这个时期内，每天都在行军，保持了过去的游击主义。第五，红军的粮食必须用大规模的组织辎重队，把全部的骡子集中起来，再动员群众集中力量，把淳化玉原的粮食集中在后防点，以防备粮食的恐慌。

以上是省委对你们几个重要工作的指示，以后关于工人工作，土地问题，红军问题，政权问题及党的工作问题，还有专门指示，你们必须借[供]给省委以一切材料。除个[讨]这个信外，省委认为中央 4 月决议，去年 1 月 25 日省委对于红二十六军的决议，还是适用的。和这个指示信一并执行。

励君同志，：不能前来，省委另派××同志来作代理政委，昨日(3 月 14 日)已出发了。

高级军事干部，省委与中央共同解决，陕西是找不出的。此致敬礼！

省委

三月十五日

中共陕西省委 1933 年 4 月 15 日关于 红二十六军发展情况给中央的

报告(节录)

关于省委改组，前次已有简单报告，现将最近工作情形报告，希详细指示。

②最近红二十六军在边区一带，得到更进一步的开展，人数增加到 500 多人，枪械也增加了，成分是得到很大的改造，发展了队伍周围的农民斗争与游击运动，游击队除渭北的不算外，已成立 18 个游击队，人数 900 多人，成分完全是破产的农民。分配土地已开始，使渭北游击队与边区红二十六军政治的军事的动作的联系，更有计划的在实际工作中争取边区与渭北新苏区的胜利，决定成立渭北红二十六军直辖游击队总指挥部现在正式成立，来统一渭北游击战争，开展渭北群众斗争与游击运动，把边区与渭北群众斗争配合起来。我们在红五月过程中，动员全党的力量与群众斗争坚决的执行布尔什维克进攻路线，完成红二十六军一师人的号召，彻底执行与完成中央去年×月×日“关于开展游击运动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的指示，红二十六军随营学校已开始成立，边区与红二十六军虽然是突飞的发展，但还没有百分之百的执行省委最近给他们的指示，还有很多严重的错误与缺点(详情以后报告)。省委为着加强对于红二十六军的领导，坚决执行彻底的转变，因此决定派常委组织部励君同志到红二十六军去负政治委员工作。……

这个报告是个别的问题，请中央根据省委改组的决议及最近的各种文件，给我们详细的指示再。

陕西省委

1933 年 4 月 15 日

贾拓夫 1933 年_11 月 25 日

关于红二十六军、耀县起义 给中央的报告(节录)

关于红二十六军与红二十九军的报告

(一)去年12月间，励君才与廿六军接头，那时廿六军从陕北回来，实际上只有一百大几十人，三四十匹马，枪不满百支。励君去后，主要的批评与检查了过去行动中一切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在省委冲破四次周剿争取陕甘边渭北新苏区胜利决议下提出二十六军战斗任务，给过去错误主要负责者阎鸿雁〈红彦〉谢于常〈长〉等以开除部队的处分，重新改编二十六军为一个骑兵连三个步兵连(内订一连即过去之少先队)，编制好后。在耀西与香山发动了有成千农民的分粮斗争，在分粮斗争中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组织了分粮委员会，在那些地方创立了几个农村支部。关于农民武装组织问题、土地问题及政权问题，都未解决。即开始军事行动，经过几次与白军民团的战争，都没有得到胜利。主要原因是单纯军事行动，没有与群众配合起来，以及指挥不统一，作战准备不充分，地理情形不十分熟悉等军事上的错误所致。经过三次战争的失利，马失去十几匹，死指挥员战斗员数人，枪枝亦损失了一部分，在受到军事上的失利以后，二十六军就离开照金根据地到三水后区陕甘边境一带去了。去的意义是企图配合甘肃一个兵变，但未成事实。当时敌人围剿的情形，是有王太吉团、何高侯旅小邱一营、陕北军队一团，及附近耀原各地民团共3000多人。今年2、3月间，二十六军又回到照金一带与泾阳苗加律部谋取得联络，结果未成事实。在领导耀西香山农民分粮斗争后，二十六军大部在行军与敌人作战时期，对于群众工作多未进行。2、3月间回照金时，励君因不同意省委关于二十六军提出的意见，回省与省委讨论，结果省委改组，励君在省委负责，改派王烈①去代理政委，派杰夫去作行〈随〉营学校军事教官。在王烈去一个时期，二十六军陈军事上二有了些增加外，再看不到什么具体成绩，省委提出二十六军一切工作任务还都未执行。4月里省委又派励君去二十六军工作，这

时二十六军已扩大了。有从何高侯部下变到二十六军连白军。但二十六军对这1连白军，一方(面)没有打破旧的组织系统，一方(面)又未加强对士兵政治教育，在以后即被反动长官欺骗又变出去。励君这一次去，在一个多月过程中，完全没有执行他去时出他自己起草的指示信，除了解决了游击队问题以外，在王烈领导二十六军时期，边区特委与游击队指挥部，用改编土匪的办法代替了在斗争基础上组织游击队工作。当时在游击队指挥部下有十几个游击队，这些游击队足怎样东西呢？都用[是]游击队用委任状改编的土匪，不论什么人来一报名，于是就给他一张委任状，编为多少多少支队。因此，有〈虽〉在名义上有十几队，但有很些指挥部根本就没有见过，这些土匪部队利用我们的红旗到处随意勒索群众，好淫掳劫无所不为，群众谓之“假红军”，加以富平一部分土匪部队在与二十六军签订作战协定下也开到边区，蹂躏得边区群众鸡犬不宁，群众都逃走了。当时励君去后，在省委指示下，彻底解决这些游击队问题，不解〈过〉这种解决还只依靠二十六军(军)事力量，没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与这些土匪部队作斗争，这个时候，在边区正是群众斗争高涨与游击战争开展的时候，在边区与渭北，我们领导之下有七八个游击队，但以励君为中心，在敌人围剿面前表现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动摇，他们认为敌人围剿严重，边区根据地已失守，根据地群众都跑光了，粮食缺乏等。同时他们在以下几个左的空洞词句的掩盖之下决定离开边区到陕北去。到陕北的意见是：①打通国际路线；②与外蒙古接洽；③开展民族革命战争；④发展骑兵团；⑤休息一时期。这显然是重复过去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当时边区情形并不如他们所能想象的那样坏，敌人围剿已表现了无能，何高侯在此几次受挫后，已失去作战勇气。王太吉团正在在一个极端动摇的过程，特务第三团开到三原未敢北上，民团过去都受过二十六军的打击，都微不足道，而且敌人的进攻都不一致，在观风势，这是有利我们击破敌人的，后防根据地并未失守，粮食亦不成问题，照金群众虽然很多走了，失掉根据地的条件，但可以在其他地方重新建立根据地的。当时省委边特委及三原县委一致反对他们这一右倾机会主义逃跑路线。边特派人去传达特委同志意见，告诉二十六军边区这

些具体实际情形，二十六军于是又开到边区，这时省委已讨论了他们问题，写好指示信叫交通带去，并派岳栋到三原就近解决二十六军问题，当岳栋到三原见励君时，二十六军又南下渡河了。

二十六军开到三原时,这时励军自己提出停止政委工作，由王烈代理，他自己回省报告，当时提出二十六军根据地问题讨论，励君不表示意见，王烈、杰犬提出到渭华去：①渭华人口稠密，②物质条件良好，③过去有渭华暴〈暴〉动影响，④形势好，⑤有党的组织与工作等。励君最后作结论，同意这种意见。本来当时决定给省委报告，待得到省委指示后再具体行动，但不知他们从哪里得到了敌情的报告，说三原、耀县开来 2 团兵力进攻廿六军来了(其实不确)，于是不待省委指示，便匆匆过河了。廿六军过河到渭华，仍是在〈从〉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观点出发，一种“左”倾的军事冒险。渭华一般的说来，是陕西统治阶级统治最雄厚的一环，那里是东西交通大道，豪绅地主力量最雄厚的地方，而那里党的工作与基础比边区渭北削弱的多，他们完全离开中央省委路线，取消了创造陕甘边苏区的任务，而代以空洞的创造渭华兰洛新苏区。

当廿六军北上折回来及过河，曾得到相当军事上的胜利，在淳化解决了一个民团，在高陵收了民团二十几支枪，在灞桥收民团数支武装，以及台省委提出廿六军 1 师人的号召之下，渭北各地动员了相当群众到廿六军去。因此，廿六军当过河时比改编时差不多扩大了有一倍。那时实在情形是人数有 400，枪 300 支，且

大半系好枪，马 40 多匹，子弹比较充足起来，每抢平均有一排子弹的样子，一般战斗员情绪都非常积极。到渭南去这个问题，并没有在一般干部中间作深切的讨论，只是上层几个负责同志讨论决定，马上是一个执行的命令，政治委员给战斗员讲话只说到：“到渭华去总能(使)大家有白面吃”，此外政治上的鼓动是没有的。因此，一般战斗员都表现不满的情绪。

省委得到廿六军过河的消息，马上、讨论，认为北上与南下一样的是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摇摆。省委要他们在一切适当的条件下，回师

陕甘边渭北，在目前应当积极发动渭华一带的游击战争与群众一切斗争，坚决袭击敌人，争取廿六军的扩大的胜利。派巡视员去解决他们的问题。同时几路派交通追他们去，传达省委意见。巡视员去没有追上，交通亦都找不到他们。以后，廿六军溃散的消息便传到西安来，同时有廿十六军的同志回来，才给我们证实了。

当廿六军一过河，国民党立刻调动渭华警备旅，在高塘各坳口布防，调动商洛一团在南山各重镇布防，另从西安开出特务二团追击廿六军。统计当时在廿六军周围，白军及民团有 4000 至 5000 之兵力。敌人当时策略是将高塘几个坳口前后左右重兵包围，然后以一团兵力在坳内游击与袭击廿六军，一面围困，一面袭击。廿六军从高陵过河经灞桥(离西安 20 里)临潼到达渭华山谷中，那一带是华山山脉，有南北长二三十里几个大坳，坳口有树庄，南北出口非常狭小，廿六军即在这几个坳内活动，他们去时亦未与渭华当地取得很好的联系，因此被敌人围困在这几个山谷之中。

廿六军到渭华去一个月，没有与白军作过战争，最后一次便被敌人击散了。因为他们的谍报工作太坏，不知道敌人的军事力量，每每是望敌影而逃。有一次遇到白军十几个骑兵，他们都不敢袭击，恐怕中了敌人的埋伏，实际上是这些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缺乏袭击进攻敌人的决心和勇气。粮食成为绝对问题，骑兵失掉作用(因在山中)，且多饿死与丢掉，最后他们宿营在一个地方叫张家坪。这个地方地形是低下的，可是放哨的在山坡上能看出 10 里远的敌人。但当廿六军正吃饭时，是下雨天，敌人从后面山坡进攻来了，于是一个迅雷不及掩耳的就被白军冲散，王烈与杰夫集合一部分(四五十人)向西兰田去了，刘子〈志〉丹、王世泰集合七八十人向东南焦家坪一带去了，其余零星散乱与被敌人俘虏一部分。杰夫王烈这一部分到兰田境内，晚间住在一个地势不好的村庄，战斗员们都不住，因为地势不好，而且后面即有民团，但王烈说，不要紧，这个民团与他有亲戚关系。第二天拂晓即被民团包围缴枪了。省委这时又派一个同志到渭华找到刘子

〈志〉丹们，要他们把所余部队重新编制为 3 个连，在那一带积极开展游击战争，执行省委以前给他们的指示，但当这个同志去见刘

子〈志〉丹们时，廿六军已经全体溃散了。原因是因为没有吃的，战斗员都是饿了好几天了，于是把枪枝埋藏起来，战斗员们解散。这些战斗员们都是在廿六军经过无数英勇斗争与战争的，他们当〈临〉走时皆失声大哭，痛恨王烈杰夫励君们到极点，这些战斗员后来都回渭北参加第四团了。而埋藏起来的枪枝，当我们以后去时，已经被白军拿去了。这样自动的损失了七八十支枪。这样二来，廿六军第二团便完全失败了。

廿六军的成份在不断的改造中已经非常之好的了，大多是三原边区经过无数斗争的最坚定的贫农雇农等，他们拿一杆枪真是“人在枪在”。在这次失败中，给敌人缴枪的都是变兵，这些战斗员没有一个交枪给敌人。廿六军这次失败非常明显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断送了的，主要的当然是励君，励君到廿六军根本就不愿意去，就是从他到廿六军开始就表现动摇了，这是在他叛变以后给国民党公开自首的信内很明白很真确讲了的，他因为怕省委说他右倾，所以只得勉强去(信内)，因此他就不能坚定的执行中央省委正确的路线，当他第二次去，连他自己起草的给廿六军指示信一点都未执行。这个事实，难道还不清楚吗？省委当时也看出励君不愿去的各种表现，但省委没有与他作坚决的斗争，克服他的动摇。不论北上与南下，都是以励君为中心的。在励君这样政治动摇的过程中，被捕叛变是无足怪的。

当廿六军第二团遭到失败后，新的第四团又在渭北成立起来。上面已经说到四团成立后，曾袭击敌人一次得到胜利，此外，再无新的材料可报告。

(二)现在再说到廿九军的情形……

关于骑兵团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事件的报告

骑兵团名为骑兵，实无马匹，人数不上 1000 人，枪枝七八百支，去年冬杨虎城调骑兵团到渭北耀州一带，围剿廿六军，委团长王太吉为剿匪总司令。王太吉过去系同志，渭华暴动失败后，脱离党，投奔杨虎城部下，后升任团长。王部下士兵中，仅一连有组织，同志七八人。在半年来剿匪过程中，骑兵团士兵备尝了一切艰辛与痛苦，而军

饷仍是数月不发，兵士生活痛苦已达极点。同时在剿匪过程中，廿六军给了广大士兵极深刻的政治影响，兵士们都不愿打红军，在士兵中爆发了好几次日常斗争，兵士中公开说红军好。因此在与廿六军几次战争中兵士大多实行怠战或不开枪，结果王太吉把部队开到耀县驻扎，但士兵仍每天在闹饷的斗争，长官无如之何。在今年4月间中央苏区及四川红军胜利的捷报传到陕西后，更给了广大士兵极大的兴奋，而二十六军这时亦较壮大起来，党与红军的政治影响，更加在士兵中扩大了，这时又正当国民党出卖热河，订立华北停战协定之后，在陕西亦推动了广大群众的反帝怒潮。西安各校组织抗日会，进行一切抗日活动。虽受国民党疯狂的镇压与大批的逮捕，但反帝斗争仍不断的蓬勃起来。三原学生抗日总会召开群众大会反对停战协定，封闭国民党部的示威运动，在工人兵士中的反目反帝情绪，同时更加高涨起来，士兵中给红军募子弹。要求开出关外打日本纳呼声，到处可以听见。在这样形势之下，更推动了骑兵团兵士的动摇与革命化。而士兵生活的日渐恶化，更促进他们的政治觉悟。于是王太吉便幻想效冯玉祥在张家口的办法，找一条新的出路，经过三原一个同志的关系，找到党。当时省委估计了骑兵团的实际情形以后，即提出以下的条件：

- ①脱离国民党杨虎城关系，树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旗帜。
- ②与二十六军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立即停止对二十六军的进攻。
- ③拥护并帮助群众反国民党地主豪绅统治的一切斗争。
- ⑤主张民众武装的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一切帝国主等。

在行动方面，我们提出向西发展，以蒲白作中心活动的区域，同时要他在物质上给党以帮助。这些条件，都为王太吉接受，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与准备，在7月23日在耀县发动，那时省委已派励君前去传达党的意见，二十六军派杨声去作代表，召集全体士兵大会，举行就职典礼，王太吉为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司令，杨声暂代理政治部工作。通电是党起草的，送到耀州去，但王太吉用油印印的散发出去，在无线电上则又另用一个宣言拍出去，这个宣言内容只说到反对停战协定抗日的问题，意义很含糊。同时当大会时，杨声公开讲演，

提出我们的反日反帝的路线，与拥护苏维埃红军抗日协定的三个条件。散会后，王告杨声说太红了，现在时机尚不到。在编制方面亦未能接受我们意见，打破旧的系统，因此还包含了一部分很反动的长官。发动后，对于当地地主豪绅统治亦未能摧毁，只帮助耀县组织了2个游击队，给四团送去一二十支武器，给党的帮助仅200来元与一些烟土。

发动后我们对这部分的策略是：

①巩固与发展党在士兵中的支部，同时发动渭北各地群众到这部分去以巩固党的基础，与加强在士兵中的活动。

②加紧士兵反对反动长官及一切日常斗争，开展两条战线斗争，监督长官的动摇与出卖。

③组织公开的士兵委员会，深入党的活动。

④在士兵与工农联合的口号下，帮助群众各种斗争。

⑤开展拥护红军的运动。

⑥深入党的一切政治鼓动。

⑦公开进行没收日货及组织抗日会反帝同盟反日示威等，一切反目反帝活动。

⑧在耀州及渭北尽量发动广大群众各种抗日运动，与群众日常斗争、游击战争、土地革命密切联系起来。

当时士兵委员会，已在大部分士兵中组织起来，饷已发了数千元。士兵情绪很好，当时省委经很多事实上看出王太吉不坚定，同时我们又不能注意到他会有什么其他的阴谋作用，因此，我们的支部活动还要取秘密与公开的联系的方式，在政治部则可公开的在士兵中进行我们的政治活动。

发动以后，杨虎城即派赵文伯一团杨竹蓀一团及特务第一团合力围剿，以后王太吉怎样离开耀县到边区一带，怎样在军事上受到损失。关于这些情形，在励君回来后，再未得到那里的事实材料。接着就是省委的破坏，与那里失掉关系。关于王太吉部这些情形，都是根据励君回来时给省委的报告。

红二十六军 1934 年 6 月 20 日给 中共中央的工作报告

(注：因为写时没有写好，所有的都模糊洗不出来，现在用最大力量，才看出以下的内容。)

1933 年 2 月第二团执行南下错误后，完全失败……(中间完全没有了)没有去注意广泛的发展群众运动与普遍的开展游击战争，或只注意到扩大自己的区域，摸〈磨〉灭这些区域的反动武装，这些都是失败的原因。

1933 年 7 月，杨虎城的骑兵团在陕西省委领导之下，哗变为民众抗日义勇军。因为在部队内党的基础薄弱，军事政治的策略错误，遭到很大的失败，连败两仗，仅余剩 10 人。敌人趁着义勇军失败的形势，开了四口两团兵力“围剿”三原苏区和二十六军四团，苏区的工作整个给了一个大破坏，逮捕党内同志七八百人，并用大批军队企图作长期驻扎，四团所以才离开苏区和义勇军配合行动。当时部队经常动摇，又口配合了陕北游击队在积极进攻过程中，解决许多的军阀部队，才渐次的扩大与巩固起来。

1933 年 7 月初，陕北〈西〉省委破坏后，部队失去上级领导。接着，9 月间，谢〈薛〉家寨失守，特委瓦解，耀西区委整个破坏，同时三水县也遭到了破坏。这时陕甘边区及渭北的工作完全停顿，部队长期在白色区域行动，整个形成恐慌动摇的部队，党才有创造新根据地的决定，同时决定广泛发展群众斗争，普遍开展游击运动，来恢复原有的根据地。在这个任务下面，首先创造了三水与正口的游击队，因为耀西苏区的破坏，谢〈薛〉家寨失守，故耀西游击队受了相当的打击，叛变了一部分，只余三四十人，单独行动了一时期，于 6〈8〉月和义勇军、红四团配合起来，解决庆阳五属民团、陕北一部白军，并击杨虎城的进兵。在获得了许多胜利底下，和我们反对封建势力反

帝国主义国民党出卖民族镇压革命及一切抗款抗税抗粮抗租抗债等的号召下，得到陕甘苏区与白区劳苦群众的拥护。因此，抓住这个形势，为扩大政治影响，于 11 月成立四十二师，重编三、四团、义勇军，创造游击队三团四连及建立少年先锋队四团。××××，当时，人约 300 多，枪约二百五六十支。另外，恢复庆阳、保安游击队，同时创造了□□游击队。自四十二师建立后，部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尤其是□□部队发展，……。今年 2 月，陕北游击队在陕北党领导下，神木、府谷、横山、清涧、绥德、吴堡、安定等等 4 个游击队……。今年 4 月，第二路合水、庆阳等游击队，又创造了耀县游击队，三原的渭北游击队，共有人 300 多名，枪口百五六十，……钱约六百……(中间约有 500 余字看不清)。

C、部队的成份，工人占 5%，雇农占 50%，贫农占 20%至 30%，及其他成份 20%。因为部队工人成份很少，所以农民意识特别浓厚。

D、部队的军政领导(成)员十分之八九是小资产阶级，因此，”有时不站在党的团体的立场上，闹小意见，不能团结象一个人一样，并且许多领导人员没有常态，忽而积极，忽而消极。

E、部队领导问题及政治水平低落，对某个政治形势不是估计过商，便是估计不足，因此把握不定路线，使部队不能很快发展与迅速巩固，更不能创造苏区，这是遭敌人打击的一个太原因。

F、部队中军政干部万分缺乏，所有少数的几个干部都是能力经验不足，因此部队的军事政治训练不能切实进行，所以部队不能转变成铁的红军。省委亦无法提拔一切的军政干部来转变部队的基础。

G、部队的政治策略路线长期不进步，更不能灵活运用游击战术，因此，北面“围剿”严重向南逃跑，南面“围剿”严重又向北面逃跑，长期离开自己的区域，在白色区域行动作战。这次敌人运用了 4(个)团兵力布满在各要口，因此，部队遭受到严重打击。

H、目前部队的主要领导人，没有一点决心，因此，党组决，定许多任务不能军事行动，下面未完成的军事，就是这次失败的原因，大部分还要归罪军事领导人。

I、军队长期的失掉上级领导，又把握不住策略路线，消息又很沉闷，所以在某种政治转变形势下(如闽变及宁长事变等)”放弃了客观有利的条件，来执行自己的任务。

J、部队行动区域及其周围，没有地方党及兵营党的配合，农民自发斗争，士兵自行哗变，但是部队仍是陷了孤立状态，这就是陕北区域不能很快形成的一个原因。

二、这些地方工作的恢复与开展

A、在第一路的党(陕北的党)向从来没有和四十二师取得密切的联系，因此对陕北的实际情形，我们不能具体的了解，所知道的陕北党目前正在党团建立下巩固的基础，各游击队都有他们的区域与根据地，各游击队成千成万的劳苦群众团结在他们的周围，尤其群众情绪非常高涨，目前已到了武装群众的阶段，但枪械的缺乏是我们的一弱点。

B、在第二路的党——游击区域在合水、庆阳、保安、安塞、甘泉、富县、宁夏等处，中心区域，建立在合水、保安、安塞、庆阳之间，周围大约三四百里。这个区域已建立健全的农民联合会 22 个，农村支部已建立了两个，并有许多农民同志，赤卫队组织了 6 个大队，每大队含 3 中队或 4 中队，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在这个区域内的群众，还没有强的大规模的斗争过，这次敌人来“围剿”，每个区域遭掳口，大施屠杀，群众愤恨异常，民众起来要求武装，所以现在斗争比较深入一步，但是有一部分群众因为敌人多次的血腥镇压的结果，表现是消极，这是一个严重问题，现在正在发动他们的情绪。不但为庆阳、合水、保安、安塞等游击队，自己都有相当的群众工作，且中心苏区的周围许多地方群众斗争情绪非常高涨，但是因为干部困难，没法去领导群众。

C、第三路游出区域在三原、耀县、同官、淳化、旬邑一线，党已经恢复三水(旬邑)、耀县，党的群众工作在耀县、淳化、旬邑一带，零星的建立了许多组织，同时因为干部的困难，没有专负地方工作的人，因此，一时不能普遍建立农村支部，更不能很快的把这些区

域打成一片。因此，目前只有创造许多小游击队，专门来发展地方工作任务。目前第三路要用最大的力量加强耀县和三原游击队的领导，来恢复耀县和三原的苏区。

三、目前的策略路线

A、召集四十二师的党，一、二、三、□游击队的党和边区各地的党，在扩大会议上建立强有力的边特委领导，坚强陕甘边区的游击运动和农村支部与兵营的党，领导边区一切武装的革命团体的党。

B、加强党的领导

1、肃清小资产阶级意识，养成无产阶级意识。

2、加强党的训练与提拔工人、雇农成份参加领导机关。

3、动员全部力量在实际工作中和叛徒作斗争，击破右派组织复兴委员会的活动。

C、这次敌人的“围剿”我们的区域，受到相当的损失，一般群众斗争情绪低落，因此，决定于最短期间联合一、二、三路精锐，配合四十二师与群众，在我们区域内很有把握的解决一切敌人的武装，来武装一、二、三路的群众，更普遍的开展游击战争，并提高我们区域内群众斗争的情绪。

D、第一路积极向南发展，第三路向北发展，第二路向南北两面发展，使一、二、三队（路）游击队打成一片。

E、一二三路有基础的斗争，成立革命委员会转变成为苏维埃政权。

F、目前中国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在这一决斗时期，我们

要粉碎国民党的“围剿”，瓦解国民党的统治，从下面解放出来。

1、望中央无论如何在最短期问给四十二师派最得力的政治军事干部来领导四十二师及各游击队。

2、目前的右派在西北大肆活动，向我们团体施行破坏，因此要中央在最短期问介绍几个能干人来。

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

师委会全体委员

1934年6月20日

附：石心给中共上海中央局的信

中央：红二十六军工作，过去是由中央与陕西直接领导的，不知你们和他们的关系如何？以后究竟由何处领导？象这样重要一个部队，似乎长期失掉关系。经过此间将他们派出找关系的代表两次送交你们以后，杳无消息，据说你们把他调作不一定需要他去做的工作去了，这是我不能同意的。

石

10月8日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1934年7月关于 陕甘边区党的任务的决议

英勇的工农红军与澎湃着的群众斗争，已经粉碎了大部分的国民党的绝望的五次“围剿”，苏维埃政权有空前的扩大与巩固，全国反帝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开展与游击运动普遍的扩大，军阀矛盾的急剧的深刻化，形成国民党统治的根本动摇。

在这一形势之下，无耻的国民党已深深的了解自己本身的力量是绝对不会维系垂危的统治，遂极端的出卖中国民族利益，投降帝国主义，好叫帮忙自己作最后的统治。因此，向帝国主义者公开与秘密的借来大批的借款与大批飞机、大炮、军事干部等等，在同一的利害关系上，协同帝国主义作五次“围剿”红军与苏区，以镇压中国革命运动。

但在这五次“围剿”的当中，除中央红军的英勇的胜利外，鄂豫皖红军解决了东北军六七团人，川陕苏区和贵州苏区的扩大，国民党军阀一定要更进一步的加重城市工人与农村劳苦群众的压迫和剥削，一定要更进一步的无耻投降帝国主义。这样一来，会促成工农兵为苏维埃彻底胜利与反对国民党的血腥统治而作坚决的斗争，整个掀

动了中团革命浪潮猛烈的向前推动，象当前唐山，上海等地的工人的大罢工，各地农民的暴动，就是铁的事实。

尤其是在占据西北的杨虎城及一切军阀、官僚、豪绅、地主残酷的压迫剥削之下，一般劳苦群众不断的发动一切斗争，特别是在陕甘边区，红四十二师与各地游击队的政治影响之下，群众斗争的情绪愈加深入，开始便是武装冲突，如同陇东群众自动的杀死催款委员，陕北成千成万有组织的农民，公开的反对国民党的苛捐杂税，要粮要款，一直到开展游击战争与分土地，更进到新红军与新苏区的创造的阶段中，同时，一般白军士兵也是同样的受不了国民党军阀的压迫欺骗，一批一批的哗变出来，到红军中为自己找出路。

在这样情形之下，更加强了我们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任务。但是因为党的领导太薄弱，一切的工作远远的落在客观形势的后面，党的组织除了各部队所有的支部外，在地方党，仅仅只有华池苏区内 3 个不健全的支部，三淳耀的党，自赵〈照〉金苏区失败后。边特委倒台，直到现在还是塌台的现象，甚至边特委还是在最近才恢复的。同时，部队中的党，在这个期间的领导，仍然犯了许多严重错误，主要的是右倾机会主义的脱离群众与党内斗争的不深入，没有把许多消极怠工、机会主义者与官僚主义者从党的正确路线上肃清出去，党简直做群众的尾巴和空架子，不起核心作用，对游击队的领导是脱离群众的土匪路线(如合水游击队)，而不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只是招兵买马式的组织游击队。由这些错误形成了西北革命运动向前发展的最大障碍。

特委根据目前革命的客观形势与主观的(领)导力量，对边区党的任务有以下的决议与布置：

(一)党的工作

(一)加强华池苏区的领导，在最短期间，必须把现有的 3 个支部充实起来，并成立 1 个区委，以巩固苏区内的各种群众组织，形成苏区的核心。

(2)恢复保安党的组织，尽可能的找过去同志的关系，并

以脚祚〈扎〉川、五〈吴〉堡川、百宝〈白豹〉川为中心，建立农民支部。

(3)在平子原、四〈寺〉村原、三家〈嘉〉原，在群众斗争的基础上，吸收最勇敢的、最坚决的、最忠实的雇农、贫农分子大批入党，成立 3 个支部。

(4)三水找王正沧等同志的关系，详加考察，如无问题，再恢复 1(个)支部。

(5)耀县的特支和淳化瓦解了的支部，应该转变领导，各成立 1 个正式的支部。

(6)加强渭北游击队的领导，以恢复渭北的党。应当以新武两区及二台为中心区域，找旧(日)同志并新介绍，暂时成立 1 个支部。

(7)由张仲良负责建立三路的区委，并提拔得力干部同志担任区委书记，三原、耀县、三水、正宁、淳化的支部都归该区委领导。

(8)四十二师及各路游击队的党，应该纠正过去的错误，彻底转变部队的领导，使党真正的成为部队的核心。

(9)地方党的支部，必须十倍扩大党的组织，部队内的党也须发展一倍党员。

(10)每个区委和各队委，在加强领导的过程中，必须选择一个中心支部。

(11)特委成立一个训练班，提拔最有认识的农民同志以及各连队派两个最好的同志受训练。各部队也尽可能的成立短期训练班，以培养干部，并在实际的工作中，深刻指示领导方法，以锻炼干部。

(12)党的工作进行，应该立即转变领导的方式，主要的是一切领导机关须深入下层，倾听群众的意见，密切党的关系，严密党的组织，并用启发式。与革命竞赛的方法去领导。

(13)特委责成全党同志以最大的努力发展团同志，在建立团支部的过程中，成立团工作委员会。

(二)政权问题

(1)创造中心苏区，转变临时政权——立即成立革委党团，以加强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整顿各部门的工作，各委员会应该马上颁布一切法令，规定施政方针，以巩固苏区。对于农联会、赤卫队、先锋队、雇工会、贫农田等群众组织，也须颁布条例与简章。扩大政治保卫围〈卫〉队，最近必须要发展成5个政治保卫围〈卫〉分队，担任警戒苏区，并宣布戒严令，在这样巩固苏区的过程中，分配土地、统计人口、宣布苏维埃的选举法，务必于十月革命纪念日成立正式苏维埃政权，即以此华池苏区为陕甘边的中心苏区，向四外发展。

(2)恢复赵[照]金苏区。打通陕北苏区，——我们连队[建议]四十二师要以最大的力量，帮助三路游击队，恢复赵〈照〉金苏区，特委责成第三路游击队于十月革命节恢复革命委员会。同时，建议四十二师要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创造新苏区的任务，更要四十二师各路游击队配合地方党的力量把陕北苏区与赵〈照〉金苏区打通(即是由三原的武字起一直到绥远的边境止)，彻底解除国民党、豪绅、地主的反动武装与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许多苏区能(联成)一片，并且四十二师与各路游击队经常要互相叫〈呼〉应，以粉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五“围剿”。

(三)为扩大巩固部队而斗争

特委为加强无产阶级的武装力量，保障无产阶级的政权，责成二、三路游击队于两个月内各完成一团铁的红军的任务，建议四十二师帮助陕北游击队完成一师红军的任务，同时要扩大四十二师为一军的号召。要扩大军队，必须巩固军队，巩固部队的办法，除了加强党的领导外，最主要的是加紧教育训练”今后各连队的政治人员，一方面按照政治课程去教育，另外必须组织到〈列〉宁室、识字班、政治研究会等，以提高战士的政治水平。同时，特委责成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后防开设军事政治学校，以训练大批的军政干部，这一任务，在目前扩大部队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最为迫切。

(四)普遍的开展游击运动

要扩大与巩固苏区，只有(在)普遍的开展游击运动的过程中提出

最彻底的办法，在目前各路游击队要完成红军团的任务之下，各支队务要产生第三个游击队，产生的办法是要抓住群众迫切要求，发动一切斗争，以开展游击战争，特委最近要用各种方法把洛宜游击队和酃州游击队组织起来，并且坚决反对过去招兵买马的组织游击队，而各游击队必须根据特委制定的游击队行动纲领去发动。

(五)深入土地革命

实行土地革命是我们目前最迫切的任务。除了分配苏区内的土地以外，必须向四周去开展，在各游击区域内，群众(斗争)高涨的地方，立即开始分配土地，如五〈吴〉堡川、百宝[自豹]川、平子原等处。

(六) □□[开展]民族革命战争

在发动群众日常的抗粮、抗租、抗债、抗捐、抗款、分粮，杀豪绅、地主、催款委员的过程中，必须联系到反帝斗争，全党的同志们要抓紧目前各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新形势，如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四省，又积极的进攻察哈尔，鼓动内蒙组织自由〈治〉政府，更进的和国民党订定〈立〉秘密协定，共同开发西北，英帝国主义趋〈驱〉使藏兵进攻西康，鼓动新疆南部独立，和日本取同一的步调，所以促成英日同盟；美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深入内地，给国民党帮助大批军火和军事干部，最近又有抵押正太铁路借款等等。国民党镇压群众的反帝运动，极端的投降帝国主义，更在开展西北的欺骗之下，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清道夫。同时国民党和帝国主义一致的进攻苏区与红军，屠杀劳苦群众，抓住这些事实在劳苦群众面前做广泛的宣传与鼓动，以引起群众的反对与仇恨。在这个基础上组织义勇军，反帝同盟军等，与帝国主义国民党武装冲突，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在这一号召之下，决定派一得力同志领导组织义勇军！

(七)群众工作

我们过去一贯的错误是政治工作的不深入，(在)我们目前的任务之下，再不能有丝毫的忽视了。各部队转变的关键也在这里：(1)工人工作，许多同志认为西北产业落后，没有工人。因此把这一工作也就忽视了。今后对边区的手工业者要特别注意，如修械所的工人和乡

间的木匠、铁匠等，组织工会，发动他们的日常斗争，并且要把他们训练成党的干部。(2)灾民工作。1、组织群众：要在深刻的宣传鼓动当中，组织灾民联合会，并且要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要组织雇农工会和贫农团以及儿童团，要了解儿童是将来革命战线上的主要分子，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去实现这一工作，同时要组织妇女联合会，边区的妇女还没有拥护红军的认识，现在要地方党的同志和群众对妇女群众深刻的宣传鼓动，以组织拥护红军的洗衣队、慰劳队、缝衣队、2、武装群众：赤卫队少年先锋队许多地方都是形式上的不起作用。必须动员群众自动的打梭标、大刀，买土枪，或集股买快枪，并且要鼓起他们的勇气，夺取敌人的武装，武装自己。3、领导群众的斗争，抓住群众的迫切需要，发动日常斗争。但是这些斗争，各地都有它的特殊情形，如五（吴）堡川，洛河川的群众，要求分土地和牛羊，合水、正宁的群众，最需要的是抗捐、抗粮、抗款、杀豪绅。在发动斗争以后，必须组织斗争委员会和党团，以及斗争指挥部，这样才能避免紊乱与坏的影响。(3)士兵工作：在中国不断的军阀混战与长期的围剿红军的过程中，一般士兵生活的恶化同动摇，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因此，陕甘等地兵变的事实到处都是，但是我们党一次也没有领导过。特委为了瓦解国民党的武装力量，粉碎五次围剿，要各级党抽调一部分同志打火周围的白军民团中去组织革命兵变。

(八)肃清欺骗群众与出卖群众斗争的右派

自去年察省抗日同盟军失败以后，张慕陶、王霖等叛徒勾结(结)革命战线新旧的逃跑分子，组织反革命右派，他们的政治路线主要是：“联日反蒋”，利用小军阀反对法西斯，加紧军阀矛盾。造成军阀混战，冲破国民党围剿苏区，他们在党的阴谋是混入党内，争取下层工作的领导，说中央及省委以上的领导，纯粹官僚主义化。他们在党内的伎俩是抓住缺点，从侧面攻击，夸大官僚主义的领导，挑拨离间等。硬说苏区和红军不见中央领导的成绩，企图号召一切叛徒和他们所抓的下层同志，开七次代表大会，改组中央及省委领导以上的机关。领导在这反革命右派篡极活动之下，要全党的同志坚决的在广大群众面前，拿上我们的正确路线，来揭破反革命右派的无耻欺骗。他们是军

阀战争的罪魁，是屠杀劳苦群众的刽子手，黄色政客集团，他们不主张革命兵变，和领导群众斗争，而是欺骗群众，出卖群众斗争，允许〈充当〉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新走狗。不但要在口头上揭破反革命右派的阴谋，必须把反右派的宣言大量印刷，派人散发到国民党的中心城市，并且严防右派深入党内的捣乱。

(九)为了要实现以上的任务，必须深入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要各位同志集中火力向消极怠工的右倾机会主义与悲观失望的动摇分子以及官僚主义的领导者作残酷的无情的斗争，使党的路线正确的执行，顺利的完成我们的任务。

这个决议就是陕甘边区党最近的路线，特委希望全党同志必须深入支部作彻底的讨论，百分之百的去执行，并把执行的日程报告特委。

边特委

1934年7月

红二十六军 1935 年 1 月 31 日关于 陕甘边区目前形势的报告

(甲)党的组织：

在陕北各县有陕北特委，在陕甘边有陕甘边特委。此两特委，谁领导谁，不清楚，关系不密切。

1、陕北特委领导着陕北革命委员会、陕北红军独立师第一团团委会、第一路游击队政委会及地方各级党部。

2、边区特委领导口有：

①边区革命委员会党团支部；

②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师委、各团委——各连支部；

③第三路游击队总部政委会——各支队支部；

④耀县、淳化、旬邑 3 个县委——各区委——各支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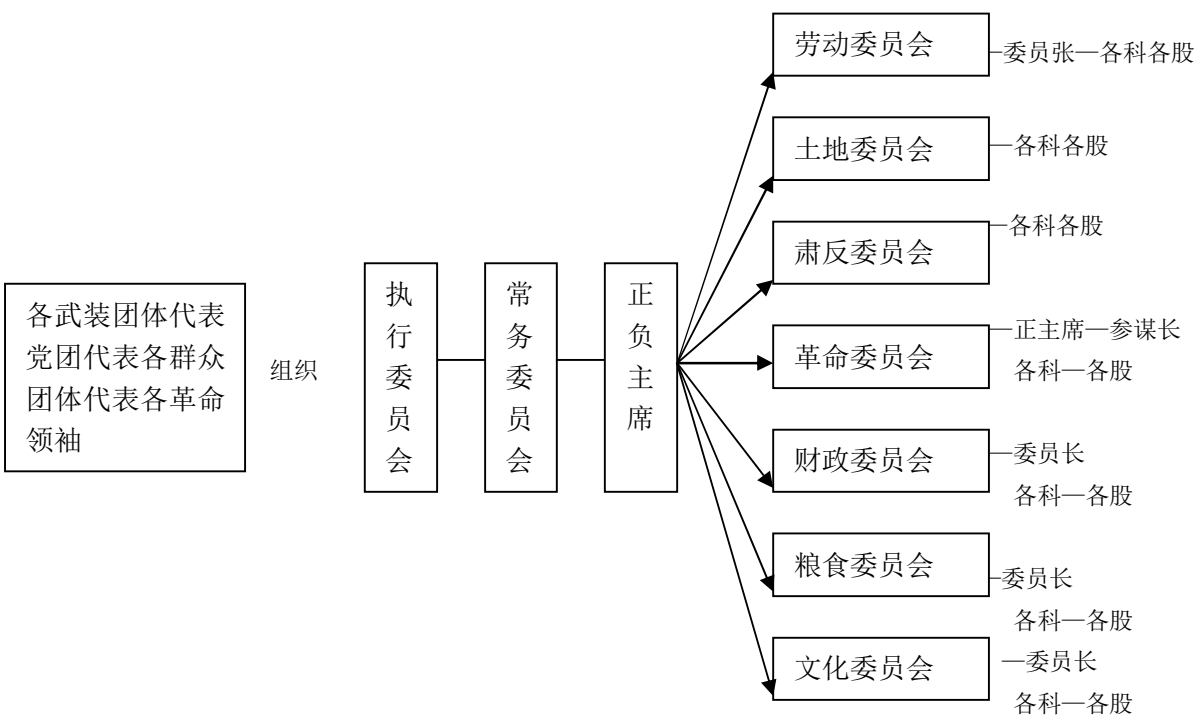
⑤庆阳、保安、中宜、合水、鄜州、柔远川等 9 个游击队支部

⑥农民联合会各总会区委一一各支部。

(各级党部有团的组织)

(乙)边区革命委员(会)的组织及负责人的成份：

组织如下表：



(丙)群众组织：

过去农民的组织，村会，每 3 村会以上为分会，3 分会为总会，最高机关为农民联合会，现又将中心苏区的农民阶级已分别组成雇农—程农工会，贫农—贫农团。

雇农工会—总会—分会—村会

贫农团—区团—乡团—村团

各级受各级苏维埃政府领导。

赤卫队—总指挥部—各大队—各中队—各分队。

(丁)军事方面，

1、陕北有独立团——枪 400 余支。又一路游击队分神木、府谷、榆林、定边、葭县、米脂等。

2、共 13 游击支队，枪枝未详。

3、四十二师分 3 团(内骑兵团 1)枪 700 余支。

4、三路有耀县、耀西、淳化、山水、平子、渭北、宁县、正宁、特务 9 支队，共枪 270 支。

5、革命军委会直属庆阳等 9 游击队，枪 310 支。

6、政治保卫队分 4 中队，枪 103 支。

7、赤卫队共分 23 大队，人数未详，均持土枪(快枪也有)，陕北的在外。

革命委员会现已于今年十月革命节时变成苏维埃政府。

在西安时已讨论就绪：

边区苏维埃——3 个县苏维埃——区——乡_村。

农民联合会，除陕北未详外，南到淳化之马家山(离县 40 里)、邠县底庙(——百里)、耀县之平子(未详)，东至宜君之马庄川(90 里)、中部之小石崖、槐树庄保安周围，惟县城有寨子未下，北离花马池盐池只 100 里，陕北离盐池 60 里。

物品方面、弹药方面，虽各方争取(除有重机枪 1 架、迫击炮 1 座外)，终没有造弹药的设备，只有修械而已。

干部人材缺乏得很。

详细报告，待至后方再作。

@陈

中共西北工委 1935 年 7 月 21 日关于 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对陕甘三次“围剿” 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节录)

一、帝国主义国民党对于陕甘的三〈二〉次“围剿”，经过 9 个多月的战斗过程，业已证明国民党的“围剿”是失败了。在革命的战线上，已经被我们粉碎了。这使得国民党不得不变更原有“围剿”的计划，增调新的兵力，来布置新的第三次对陕甘苏维埃红军的“围剿”。

在冲破帝国主义国民党二次“围剿”的战斗中，由于苏区扩大，工农群众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汹涌斗争，由于红军游击队在军委会统一指挥之下，英勇战斗；由于全国的革命发展与白区群众斗争的呼应配合，特别是由于中央主力红军与全国红军的胜利；有于陕甘宁党在五中全会的正确路线与中央驻北方代表具体领导之下的艰苦努力，获得了伟大的胜利。击溃白匪在 20 营以上，缴获敌人大批长枪、短枪及新武器。主力红军有一倍以上的扩大，开始走上了铁军的道路，游击队有两倍以上的发展，巩固发展了苏维埃根据地，占领了安定、延川、延长、安塞、靖边、保安 6 个县城。抗日浪潮的开展，广大群众因为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情绪愈益积极顽强，白军士兵与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化，日益加强起来。这一伟大的胜利即是给予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察者〈省〉侵略西北以迎头痛击，即是给予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出卖中国以有力的回答，即是尽力武装保卫苏维埃迎接主力红军北上抗日的伟大任务。并推动白区革命工作的向前发展，使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更形崩溃，使中国的革命危机更加尖锐化。

总结二次战役中的经验与教训，虽是我们初步的执行了中央正确路线，但是我们没有普遍的发展广大的群众进行革命战争，在某些地方允许组织清乡会，和敌人和平苟安的进行妥协，在敌人进攻面前悲

观失望，在战略上的退却逃跑，以及执行单纯的坚壁清野政策，阻碍革命的开展，没有充分开展在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完全忽视地方暴动的配合，没有早定出军事计划，既得决定计划之后，军事行动的迟缓，不得迅速执行，红军没有应有的扩大，白区与白区士兵工作的忽视，苏维埃的民主制度没有广泛的建立起来，这都是我们在第二次战役中没有给全线冲破“围剿”与得到应有的收获的最大原因，这些事实都是我们会议〈今后〉的宝贵经验与教训。

七、根据目前形势的分析，我们为争取这些战役的完全胜利及为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而斗争，同样成为我们党的当前任务。

1、紧急的动员群众参加革命战争，召集群众的代表会议、群众大会、各群众团体的会议，讨论三次“围剿”的意义及冲破的办法，号召群众“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的三次“围剿”，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武装保卫苏区，不让敌人蹂躏边区一寸土地”。在这些口号之下动员群众，发扬他们的积极性，领导赤少队配合红军游击战争，动员群众组织运输队，交通队、侦探队，动员妇女组织洗衣队、缝衣队、慰劳队，动员妇女老汉儿童放哨、送信。全苏区人民战斗的动员起来，为着革命战争前线上的胜利而斗争。

2、红军游击队在统一的军事计划及军委会的领导之下进行战争，配合地方暴动，消灭在苏区内的敌人支撑点，及开展敌人侧翼及后方的广大革命战争的阵线，运用红军的基本的运动战的策略，配合着阵地战坚决的进攻敌人，在敌人新的“围剿”未布置之前，先行打碎。争取神府和吴绥以南苏区打成一片，巩固宜川一带的苏区西〈向〉韩邠发展，恢复已失去的米东庆北华池苏区，开展洛川工作，消灭甘郿等地的白区，以洛川作中心，积极向定边陇东发展，以马栏作中心，向同官、富平、耀县、泾阳发展，坚决执行巩固向南发展的路线，与红二十五军北上抗日部队取得呼应，争取这些战役的全战胜利，巩固发展陕甘基本苏区创造新苏区与新游击区，联系陕南与川陕苏区的〈为〉一片。

3、吸收积极勇敢的工农群众参加红军，在“为创造两万铁的红军游击队而斗争”的口号之下进行工作，在十月革命节前，首先完成十万六千人的两军红军。为适应目前战争的需要，要完成这一任务，首先督促各级苏维埃切实执行优待红军条例，使新红色战士(没)有家庭的顾虑，坚决的上前线去。

4、于十月革命节成立陕甘军委会，统一加强陕甘各级苏维埃的领导，根据全苏大会选举条例，严格检查阶级，不许一切豪绅地主富农异己分子混入选举运动中与当选苏维埃执委。建立坚强而有力的苏维埃政府，建立苏维埃民主制度，实行自我批评，进行经常的反消极怠工贪污腐化分子的斗争。党领导各级苏维埃彻底领导分配土地与查田斗争，坚决的执行土地与劳动法令。加强工农群众的阶级警觉性，防止反动派进行散布反革命的宣传活动，破坏苏维埃红军破坏战争的阴谋，要绝对给以严厉的镇压和肃清。

5、在“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武装保卫中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反对日本占领华北武装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口号之下号召群众、苏维埃红军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就是中华民族反日神圣战争的胜利。非苏区的党进行政治动员拥护红军、拥护苏维埃的工作，反对敌人的三次“围剿”。

6、广泛的进行群众的组织工作，首先是陕西省工会代表大会及总工会的组织工作，加强贫农会，反帝革命互济会、儿童团的工作，迅速的转变妇联会为妇女工作代表会，扩大起来。

7、加强白区城市的士兵工作，领导白区城镇的白军士兵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以至组织地方暴动及革命兵变，和苏维埃红军的发展汇合起来。

8、我们应该明白了解三次，“围剿”是帝国主义殖民化西北最凶恶的步骤，冲破三次“圈剿”的胜利是对于阻止殖民地〈化〉西北有决定意义。要争取这个战争的胜利，决定于党的正确领导，必须坚决的面向支部。猛烈扩大陕甘边党的组织，建立工作的检查制度，发展

自我批评，提拔工人干部，反对对于争取战争胜利的动摇无信心，反对“陕甘边特殊论”的观点。最后着重地说，把这一决议案深入到支部中去，保证决议案的具体实现，是争取战争胜利的先决条件。

中共陕甘边区特委 1935 年 8 月 5 日关于 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案

一、目前西北政治形势与新“围剿”布置及前途的估计

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的汇合，二十五军半年来的节节胜利，及最近对第一次大“围剿”的粉碎，复以二十八军胜利的西征，迅速打通了二十五军与豫鄂皖的联系，陕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在冲破“围剿”中飞跃的壮大，与五六县完整苏区的创造，在“围剿”陕甘与汉南红军中，白军士兵的极度动摇，整营、连、排、班的零星兵变之多，的确在西北省份是空前未有，红军游击队在白区行动之处突然的即可组织起农民的游击战争。这些事实，如火样明显的告诉我们：“西北革命形势大大踏进直接革命的阶段”了。

正因为西北革命形势飞跃的发展，更引起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对西北革命正在加紧着布置新的“围剿”。

摆在眼前的新“围剿”，比今春开始的“围剿”，敌人在军事与政治方面，采取着更残酷毒辣的完密计划。

1、在军事上增加了晋军一师(在陕北)，并计划关麟征亦全师入陕北“剿赤”。同时又于南区淳、旬、原、耀一带，增加了被二十五军击溃的柳彦彪旅。进驻宁正的马鸿宾师，仍然在建筑工事。

2、并且已经在绥德修好飞机场，准备着残暴的轰炸，企图血洗苏区的劳苦群众。

3、除了久已增兵严防晋北与绥远外，近又在晋南严加防备红军

向晋省的发展。

4、因为陕甘红军与苏区的一胜一败，已直接影响着中央红军北上抗日的胜利，更直接帮助着二十五军的胜利，所以敌人亦将陕甘与汉南置于一个位置来看待，亦以同一计划中来“围剿”了。于学忠来陕，王均西去，亦是与今春“围剿”不同的地方。

5、陕甘红军苏区飞跃的壮大及汉南苏区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中央红军空前发展，令敌人已对陕甘红军的新“围剿”采取了较前不同的战略：(一)清剿苏区以师(旅)为单位，并于师(旅)清剿区分为营(团)兵力的若干分区；(二)采取避强就弱，所谓“先其易，后其难，逐段推进”的办法，以企图增其“围剿”苏区的顺利条件；(三)驻剿部队于驻防处构筑坚固工事，渐次扩大范围，速缀成一封锁线；(四)在所谓“剿匪”区，设一个或两个以营兵力的基干的游击支队。

敌人不但在军事上更较严密的、有计划的来“围剿”，在政治方面：

(1)更加强制群众于豪绅联保民团之下，尽量扶持地方武装组织。

(2)用各种方式掩饰国民党的卖国事实，为了掩饰其出卖华北，而反诬蔑工农红军乃俄国走狗。

(3)垂死的敌人对陕甘为其碉堡政策的施行便利，辣[棘]手实行着最难实行的移民并村政策。

(4)极残酷的厉行其对革命士兵或同情红军的士兵的残杀——甘泉、保安，甚至与红军作战时，对动摇的士兵即予以枪毙(正定解决屈营时)。

(5)敌人为欺骗群众于一时，企图绝望“围剿”的胜利，免除了陕北 17 县的粮赋，显然这 17 县粮赋，十之八九为群众斗争力量所废除，但以血杀与改良欺骗双管齐下的政策下，是可在落后群众中造成幻想的。

(6)在近两月来，因为泾阳游击队的胜利创造，骑兵团与一团在韩、郃、澄、白的行动，引起了渭北各县及东府各县的严加防备，加紧着公路的修筑与电话的架设。

虽然垂死统治阶级对这次“围剿”的新布置，无论军事、政治均较前加重，但目前我们的比较今春始时有利的多了。

①唯一的优良条件是西北整个的革命形势已走入了直接革命形势的阶段，主要的标志：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的胜利汇合，且更顺利的向北进攻，已击溃了 10 数师白匪；廿八军的继续西征，二十五军最近粉碎了敌人的新“围剿”，在省南兰田一带的游击运动，直接威胁省垣的统治，这便是对边区粉碎“围剿”的直接帮手。

②复次便是我们已(有)县以上的土地完整的苏区，在苏区内，我们已有着数万久经战斗的群众武装。

⑧而且我们又有四五年血战出来的铁的红军，这一支铁的红军，已经有二十九县的游击队、赤少队，为他们做军事上的助力。

④残酷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察省之后，已激起广大群众的愤怒，已千百倍的仇恨着国民党的卖国行为。因此，亦千百倍的热望着彻底反帝的红军。

⑤国民党垂死时残酷剥削与压迫，苏区土地革命的胜利，及游击区域抗粮、抗租、抗税、抗债的胜利，已引起了韩、郃、白、蒲、中、宜、富、洛以及泾、原、乾、礼、永、临一带白区劳苦群众的热望红军来解除其痛苦，过去四十二师及游击队在这一带白区的行动的明白告诉我们的了。

⑥不但白区的工农群众热望红军来解其痛苦，而且要求自动成立游击队的地方纷至沓来。(如延安、洛川、临镇一带)尤其最近白军士兵零星哗变与对红军的同情动摇，已显然的增涨了。在三两日内，甘泉、延安、富县、三水、淳化、洛川等地的白军

士兵，已都有以上的事实出现。

⑦就是敌人堡垒内的群众、团丁已同情了苏维埃政权。与我、们顽强战斗年余的永宁山团丁于7月18日竟哗变出来12个，致我们克服丁永宁山，这并非偶然的。尤其是有些(豪)绅的民团不战而降，这也是数年〈见〉不鲜。白军县长不战而逃，如延川、安定、保安，这也不是(偶)然的。敌人在革命浪潮中动摇没落，在陕北、陕甘边是普遍的现象，这正给我们以粉碎新“围剿”力的极顺利条件。

⑧我们已经在中共布尔什维克路线之上，在新“围剿”未布置之前，采取着进攻的路线，获得了伟大的胜利，攻克靖边，消灭了顽强白匪一营。中、宜、富、洛的游击运动正在迅速的开展与胜利中壮大，且消灭几个敌人的堡垒。保安全境敌人在逃之中，而我对他们在围困中，且围困中克服了永宁山，四十二师的骑兵团与一团袭开洛川旧县；甘泉、延安、宜川几个敌人死守县城，已被游击队、赤少队围得将近死亡了。以上种种，是我们粉碎新的“围剿”主要的优良条件。

日本在国民党出卖之下，占领河北与察省之后，复积极向陕西侵入。日兵来欧，并于西安设日领使馆，的确可能很快的成(为)事实。同时内蒙已成为日人荷包之物丁。近日又发现日本勾结回民内奸于新、甘、青的活动，完全证实日本欲灭亡全中国的计划下，空前的加紧着并吞华北与西北的步骤。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是一贯的双管齐下的政策，日本的确担任了进攻苏联与瓜分中国的先锋军，所以在日李占领华北与即将侵入陕西的今天，迫切的要求着陕甘党极应加紧对日作战的准备，千百倍的加重了陕甘党来领导广大群众执行武装保护苏联的任务。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与进攻苏联日益加紧的道途上，国民党完全尽了清道夫的责任。目前阎锡山、蒋介石对陕甘“围剿”的凶毒布置与拼命进攻，直接阻止着陕甘红军对日本作战。我们为了保护无产阶级的祖国，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为争取陕西革命首先胜利，以至全中国革命胜利，必须集中一切力量粉碎转眼即临的大规模的“围剿”。

二、陕甘党的任务

所以，陕甘党的总任务：是组织革命战争粉碎敌人“围剿”。粉碎“围剿”的胜利，全靠着党的以下的任务的胜利实现：

(1)有阵地的向南开展与二十五军直接呼应，在军事上在

一个计划之下来向敌人进攻，完成巩固苏区的伟大任务，必须集中火力，布置以延安、甘泉、宜川、鄜州为中心的地方暴动工作，必须是党日常工作之一。

(2)彻底的消灭苏区的一切白点。这一任务我们目前已有极优良的条件去完成，李家嘴、保安、永宁山、卜巷等堡垒的消灭，已明显的教训我们了。对消灭白点的工作，必须订成一个计划，有步骤的去完成，充分将我们过去关于这一工作的教训整理起，普遍深入在每个干部、每个，战士的脑海，运用教训发挥伟大的布尔什维克的创造性，使每个地方的政权及军事干部，均能适机的进行消灭白点的任务。“这几个中心城市组织的建立，必须订出具体计划限期完成。与忽视城市布置暴动工作的倾向作残酷的斗争。城镇内士兵团丁工作的突出，边区党至今仍万分的忽视着，这种不可容忍的错误，实在是对革命的罪恶，限最短期间必须派两个突击队打入冯钦哉部队及马鸿宾部队。关于布置暴动的方法及暴动的知识，必须迅速的深入在党员群众中。”

(3)彻底的、残酷的肃清苏区内的反动分子及豪绅地主残余，组织警卫机关专门进行肃反工作，绝对禁止因经济问题释放豪绅的办法。彻底肃清政权内的富农、流氓、豪绅地主分子，严厉的剥夺富农及阶级异己分子的选举权，在新开展的区域内，必须选举阶级意识最坚定的干部去负责肃反工作。AB团的活动虽然发现于陕北，但陕甘应最高限度的警觉。必须把南方苏区的反革命的活动与肃清经过，及陕北AB团的活动方法与破获，详细的宣布在群众中，掀起广大群众对反革命活动的积极肃清与严防。

加紧苏维埃政权的建设工作。根据二苏大会的苏维埃政权建设决议：吸收广大群众直接参加政权工作。厉行代表主任制，在工作过程中驱逐一切不可救药的消极怠工分子出政权机关，纠正过去贫农、中

农、雇农分别选举，积极加强雇农工会对贫农团的领导，使在选举中起领导作用。彻底举行查田运动，坚决的反对富农路线的分田错误，深入反富农斗争，吸收长工、短工、农村手工业者一律参加到工会里来，发动群众向富农要求退回过去的债约。粉碎剥削分子的恢复旧剥削关系的企图。在深入反富农斗争，消灭隐藏阶级的现象。因为农村生活的散漫，长期战斗的艰苦，无产阶级出身分子的影响，以及政权机关，组织形式的散漫与劳动纪律的松懈，所以形成了工作涣散与迟缓，今后必须以最大限度的力量克服“工作涣散与迟缓”的现象，百分之百的提高劳动的纪律，自八一及青年国际节，对苏维埃机关工作人员作总的检查，坚决的对不可救药的消极怠工分子，驱逐出党及政权机关，以劳动纪律标准及阶级成份为政府党团吸收党员的主要条件。

(二)巩固苏区与扩大苏区是不可分离的任务，和一刀两刃一样，左右砍去，横竖可以消灭敌人。关于扩大苏区：

(1)在残酷战斗(中)积极的转变临真、宜川、肤甘、甘富、中富、定边、靖边等处临时政权为巩固的苏维埃政权。这一任务的完成，全在土地的彻底分配，残酷的肃清反动，坚决的消灭苏区的白点，苏维埃法令的宣传深入与充实的筹选代表运动。

(2)与南区迅速的打成一片，消灭南区与边区间的白点，立即组成一部分武装力量，专任南区和边区的联络，中富特别应注意到店头与双树一带的工作。

(3)南区应加强泾阳游击战争的开展，及永麟游击战争的开发。更必须极力恢复渭北游击区域，创造耀县游击队，有计划的向同宜发展，以期与宜君交通大道的工作联系起来。

(4)中、富、宜、洛新苏区的创造与游击战争的开发，是边区党及苏区政府有阵地向南发展，与二十五军直接呼应的重要任务，这一任务的具体执行：

A、极力加重对富中的领导，每月必须派得力同志巡视一次中富

的工作，经常检查中富一切工作的速度与成绩，选派得力的干部与指导员，充实对中富工作的领导。特别责成中富党加强对龙坊、南原及洛川游击小组的创立和领导，并尽量帮助宜君游击队的创造。

B、骑团一团在宜君最近的行动，大大的提高了群众的斗争情绪，动摇了统治秩序，党必须抓紧这一优良时机与现有工作关系，有具体计划的限时完成宜君游击队的建立，蒲白与宜君接境，且过去有党的广大基础，于三月内必须建立起蒲白党的组织。

(5)韩、郃，澄以过去爆发过游击战争与最近陕甘、汉南红军胜利的影响，及骑步团于韩、郃一带的胜利行动，号召群众分粮的影响，促成韩城等县爆发游击战争的成熟条件，党必须不失时机的迅速组织韩城游击战争，主要的方法是：

A、立即派人去找失掉组织关系的可靠党员。

B、收集苏区各地部队与群众团体中可靠的韩城人，施最短训练，编成突击队去突击韩城工作。

C、选择有组织煽动能力的同志或军人，参加东区某游击队，随军去韩城北部行动，组织群众一功斗争及游击战争。这一任务东区党与政权应负起一半责任来。

(6)向甘肃发展，在策应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有着极大意义。因此：

人、应责成定边党向西开展庆环工作，并恢复庆北苏区。

B、立即恢复华池党的组织，加紧马鸿宾部队士兵工作，秘密恢复农联组织；百方洞悉华池敌情，以期配合军事力量，歼灭自匪。

C、宁正工作虽然在敌“围剿”之下，遭到打击，但党在政治影响深入及群众游击运动长期斗争的历史，以至现在宁正游击队仍继续着顽强的战斗，特委在领导上必须研究宁正工作的具体问题，经常给以具体指示，虽然自曲环以至宁正是人烟稀少的千百荒山，但为了与中央(红)军的呼应，必须争取陇东的发展，而宁、正、庆、合、环是

争取陇东的必要阵地。

(三)为扩大 3000 红军而战斗。厉行监督苏区的各级党部，起核心作用，发动 1600 人参加红军。边苏扩红计划指示的工作方法，各级党部、政权机关、党团及一切支部，不但应尽可能的鼓动领导群众来执行，尤须极度发挥布尔什维克的创造性，费尽天才，集中力量，为这一工作而斗争。这一动员工作，在毛泽东二苏大会报告中及边苏计划中已由有很多的工作方法了，用不着再费唇舌。不过特委要重复说：“大规模的‘围剿’摆在眼前，谁对扩大红军工作怠，便等于帮助了敌人来‘围剿’苏区”。

(四)对于反帝抗日工作的领导，是我粉碎新“围剿”的力量源泉。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河北、察省之后，引起华北群众的怒吼，陕西群众的愤怒。据游击队截获的个人信件上及反动报章的语言吐露，足以说明反日运动及群众革命情绪是飞跃的增长，关麟征(伪二十五师长)在保定 2000 多学生集会送别席上，以言“现在要退出河北”，全场 2000 余人大哭，连那师长也为感而泣了。西安许多人的通信上亦可看见不少的问类事实。我们必须在一切会议上、宣传品上尽可能的发动群众，为准备和日本直接作战和参加红军，使每个群众了解这新“围剿”与日本的关系，提高群众对日本及其走狗国民党的阶级仇恨。发动苏区群众对抗日义勇军、人民革命军及白区抗日团体，尽可能的作精神的、物质的援助。无论在粉碎“围剿”动员中，兵变的政治煽动，白区群众斗争的发动，抗日必须是中心的煽动口号。创造义勇军是执行抗日任务的中心工作，运用过去边区的实际经验及目前群众抗日情绪高涨的优良条件，扩大义勇军至一倍，并创造新的义勇军。此外，须广泛的极力的号召白军士兵及一切抗日武装部队作抗日协定，广泛的宣传中央苏区政府的一切抗日主张，边苏对这一工作，须根据中苏抗日主张，拟出更具体的抗日主张，深入到士兵及工农群众中去，抗日任务的工作完成，是将粉碎“围剿”的工作完成了一部分也不是过火的说法。

(五)中心任务的完成。总任务的完全胜利，完全依靠边区党布

尔什维克的领导，依靠着克服党在组织上、政治领导上的弱点：

A、吸收无产阶级分子入党，扩大党无产阶级的基础，猛烈的扩大党的组织基础，在八一及青年国际节，举行公开征收党员运动，增加党员数量到 2000 人。同时，必须提高党的质量，专门设立经常的训练班，以提高党的政治理论水平。

B、边区党支部的组织形式，除部队外，多半不是以机关为单位(如农村支部不按农村成立支部，而是此村数人，那村数人，混在一个支部)。这样是失掉了支部战斗作用与意义。同时，党始终没有集中火力对革命战争有决定胜负作用的阵营去突击，以建立党在城市兵营、军事要镇、交通要道的工作。今后边区党必须克服一切困难，建立曲环、庆合、宁正、山淳、泾原、耀宜、同蒲、白澄、韩郃、中富、宜川、甘延等县的城镇工作，及沿成榆大道工作。凡是驻白军地方及军事重地的，必须建立起党的组织。支部的组织形式，必须是以工厂、村镇苏维埃为单位，这样党方能发挥布尔什维克的战斗力量，这样方能使组织适应战斗。

C、为了保证党的路线完全实现，在工作中必须经常的严格检查工作，建立党的检查制度，运用突击队方法，革命竞赛，千万倍的加速党的工作速率与成果收获。

D、青年运动的重要，谁都知道，尤其是农青运动是农运的中心战术之一。但过去边区党大大忽视这一工作，最近虽然有了很大的转变，但党仍然必须为创造团的组织基础起最大的帮助工作。在青年国际节，必须在各地青年集会上举行公开征收团员运动。

E、保证一切任务的完成，绝对要开展自我批评，暴露一切工作的弱点，极力克服一切弱点存在党内，与日前党内的右倾危险作无情的斗争。

中共陕甘边特委

一九三五年八月五日

陕甘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5 年 8 月 15 日颁布的赤卫军

暂行简明军律

总 则

本会为了加强赤卫军阶级基础，提高其战斗力量，促进其团“结精神，各级政府除特加紧政治教育训练外，更应站在无产阶级利益的立场上，规立暂时简明军律，以补助政治教育训练之不及，使其很快的转变为真正红军游击队后备军。同时在未奉到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赤卫队军(律)前，这一简明军律为有效实施。

第一条违抗命令者处死刑。

第二条私放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者处死刑。

第三条侵犯劳苦群众利益者处死刑。

第四条强奸妇女者治罪如下：

(一)强奸妇女有证据者处死刑。

(二)强奸未遂者罚苦役半年。

第五条凡在斗争中无故打骂劳苦群众者斟酌情形轻重罚以 1 月

以上 3 月以下之苦役。

第六条无有命令私自焚烧豪绅房屋食粮者罚苦役 3 月，延及穷人房屋者，首犯罚苦役 10 月，从犯罚苦役 6 月，并共同负赔偿责任。

第七条凡在斗争中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的财物而不报告者治罪如下：

(甲)价值在 20 元以上者处死刑。

(乙)价值在 20 元以下者斟酌情形轻重处以徒刑或苦役。

第八条 凡无故集合不到者治罪如下；

(甲)一次不到者罚苦役半月。

(乙)二次不到者罚苦役 1 月。

(丙)三次不到者罚苦役 3 月。

第九条 凡集合时以老弱或儿童代替充数者治罪如下：

(甲)一次罚苦役 10 日。

(乙)二次罚苦役 20 日。

(丙)三次罚苦役 1 月。

第十条 凡在斗争中未奉命令私自没收豪绅地主及反革命分子财物者
罚苦役 3 月。

第十一条 凡在斗争中私自脱逃者斟酌情形轻重罚以 3 月以上半年以下之有期徒刑或苦役。

第十二条 本军律自呈请边区苏(维埃)政府批准颁布后执行之。

附 则

1、本简明军律系在赤卫军斗争中所常犯的错误规定出的，凡本会所属之一切赤卫军皆适用之。

2、凡赤卫军遇有违犯本军律之一者，得由该指挥机关军政负责人以及下层代表，组织革命法庭执行之。

3、如有不服从该级革命法庭之判决者，得提出理由向本会上诉，作最后之判决。

陕甘军区革命军事委员会边区分会印

1935 年 8 月 15 日

中共西北工委 1935 年 9 月执委 大大会议决案(节录)

(四)在这种情势之前，我们认为除总的完全执行中代的指示上所布置的工作，必须特别着重以下的中心工作：①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反对三次“围剿”，与红军配合起来，冲破敌人的“围剿”；②领导群众政治经济斗争，在斗争上动员广大群众参加红军；③组织地方暴动；④巩固与扩大现有苏区与游击区域，彻底实行苏维埃民主制度，建立陕甘省苏维埃政府；⑤彻底深入土地革命，实行查田运动，纠正过去许多错误；⑥领导白区群众工作与白军士兵工作，特别是加强城市工作。

(七)为着要更加顺利的领导陕甘的工作，成立陕甘省委是目前刻不容缓的任务。因此，省委全体党员在中代所提出的以下 4 个光荣工作，使其早日实现，来迎接新省委的成立：①开展反对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使陕甘党完全站在布尔塞维克的道路上；②要实现完成实足铁的两军红军(9000 人数)；③争取到数县巩固的苏维埃根据地；④创造几个模范支部。

陕甘党动员全体同志一致的执行这几个任务，争取陕西省委旧建立。

张闻天 1935 年 9 月 22 日
署名文章《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
革命运动》(节录)

天津反动的《大公报》曾经这样的讲到陕西苏维埃革命运动：“徐向前朱毛之趋向，尚不尽明，今姑暂不论之，而专就陕事一言。第一，国人应注意者，现在不独陕北有匪，陕南亦然。徐海东一股，猖獗已久，迄未扑灭，故论陕乱，不能专看北部。第二，过去所谓陕北，系指归榆林、绥德、延安属，近则韩城一带亦见匪踪，是由陕北而关中矣。第三，就陕北言，兵队确不为多，就全陕论，则目下集中之军队，殆不下 10 师以上，而匪方总数，通南北计之，有械者当不过万余。山第一、二两点，可知陕乱之轮廓，由第三点，可知迄今为止，军事效率之不良，证明此后应努力之点，不仅军事上的问题而已也。

“关于农村赤化问题，陕北确甚于陕南。陕南匪区小，为时亦暂，陕北则有广大之区域，与较久之根据地故也。大体言之，陕北 23 县中，近唯井岳秀师担之归榆林府属 5 县及米脂县情形较安。绥德以南迄延安鄜州一带，七八百里间，路早不通，多不可问。近月陷城之县有 6，即延长、延川、安塞、保安、安定、靖边。高桂滋师驻绥德，目下可维持两县，余不可及。近时最危者，为延安城之运命，驻有井、高两师部队，已月余不通音耗，延安以南，情况更不可知，要之纵横数百里间，殆尽成赤化，较之赣事紧急时，其区域之大相若”。(7 月 29 日社论《论陕乱》)

山西老军阎锡山于 7 月 20 日在绥靖公署及省府纪念周报告上也说：“陕北共匪甚为猖獗。全陕北 23 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有 8 县，半赤化者 10 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全陕北赤化人民 70 余万，编为赤卫队者 20 余万，赤军者 2 万。”(见 7 月 23 日《大公报》)

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则说：“盘踞陕北者为红军二十六军，其确实人数究有若干，现无从统计，但其枪有万余。匪军长刘志丹辖 3 师，为匪主力部队，其下尚有 14 个游出支队，此外各种小组及赤卫队等则甚多，匪军现完全占领者有 5 县城，为延川、延长、保安、安

塞、安定等。靖边一度陷落，顷已收复。本自去岁开到陕北接防担任剿匪后，与匪大小战不下百余次，其后困扰乱绥远之杨猴小匪部窜至陕境，本人抽兵前往堵剿，同时冯钦哉部又调至陕南镇慑，以防范徐海东匪部，官兵之力量薄弱，匪军之防地乃愈扩大。当时所被占有 10 县之地，防线延长，交通不便，如是剿匪更为不易，现在陕北状况，正与民国 20 年之江西情形相仿佛。”（见 8 月 1 日《大公报》）

关于红二十五军徐海东部该报同 13 有这样的记载：

“徐海东于 7 月中旬率悍匪 3000 余众，由商县雒南、镇安、柞水等县突围而去，是役追击徐匪之警备第一旅唐嗣桐旅有两团覆灭，唐旅长被俘，终以身殉。其后匪部即过兰田，出洛南山口。窜长安县境之引驾回镇，另有一股由子午口窜出，两地距省城均四五十里之谱。”据我们所知道的徐海东同志所领导的二十五军以前曾占领甘南之两当、徽县，逼近天水，陷秦安，渡渭水，而至陕甘之交，取得许多伟大胜利，现在想来已与陕北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

从反动报纸上来看，甘南之东部也有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尤其在庆阳五属。“该地毗连陕西、宁夏边区，地面辽阔，人烟稀少。山脉起伏，槐林密茂，昔在升平之际，犹复跳梁出没，近年国家多故，共匪仍据险发展其意志。于是时而猖獗，时而敛迹，行动诡秘，声东击西，去冬攻曲子，陷长武，陇东震动。击此则彼窜，击彼则此逃。遇大军则化整为零，隐匿深山，遇小军则啸聚猛扑，施其淫威。”

从各种反动报纸上看来，红军与赤色游击队在陕甘 2 省内正在普遍的发展管。这种发展使所有反动统治的领袖张惶失措，拼着性命动员他们所有的力量来同苏维埃与红军做斗争。7 月 27 日起在西安所召集的“西北剿匪会议”就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然而一切这些是徒然的，响应着陕甘红军与赤色游击队的活动，我们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之一部，已经开始进入了甘南的重要地区。这在政治上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

甘边之苏维埃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8月20日中央《关于目前战略方针补充决定》)这将大大的推动陕甘苏维埃革命运动前进，发动千百万西北劳苦群众为苏维埃革命而斗争。

1935年9月22日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1935年10月29日 致红二十五、二十六军的公开信

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全体英勇的指战员：

亲爱的弟兄们：

我们经过了2万余里的长途远征，经历了11省的地区，粉碎了一切国民党军阀的堵击、追击、截击，越过了无数的天险要隘、高山大河，为的是要与亲爱的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弟兄会合，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替中国苏维埃运动定下巩固的基础，迅速赤化全中国。

现在，我们已经胜利的完成了党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任务，到达了陕北苏区，与亲爱的弟兄们会面了，帝国主义、国民党任何阻止我们的企图完全失败了。我们久已听到了二十六军同志们在陕甘边长期斗争的历史、二十五军同志在鄂豫皖的英勇斗争和在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的远征，听到群众对于你们优良纪律和英勇战斗的称赞，最近更听到你们在合水会合的消息和夺取清涧、瓦窑(窑)堡消灭白军与地主武装的胜利，这些使我们非常喜欢。今天我们来亲自和你们会面，和你们握手，这使我们更加兴奋。亲爱的同志们!记着!我们的会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导炮!

正因为陕甘革命运动的巨大发展，因为我们的会合震撼了地主资

本家的反动统治，帝国主义、国民党正在准备用新的围剿来对付我们。但是，我们有着会合了的力量和丰富的战斗经验，有着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着广大群众的拥护，我们必定能够取得胜利。

亲爱的同志们!我们亲爱〈密〉的团结起来，为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粉碎敌人新的围剿，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的大局面，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武装保卫苏联而斗争!

同志们!我们手牵着手勇敢前进!伟大的胜利在前面。

苏维埃新中国万岁!

中共陕甘晋省委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

在党与苏维埃领导下，虽然分配 10 余县的土地，可是在分地过程中，豪绅地主不可避免的要隐藏土地，他们用种种狡猾的手段，表示自己也是很革命的，混进党与苏维埃的领导机关中，使得落后群众误认他们是革命的，可怜他们，对他们让步，他们错定阶级成份，把地主当富农，富农当中农，隐藏自己本来的面目。因此把土地革命的果实没有完全落到贫雇中农手里。他方面，反革命的右倾取消主义者特别是由西安派来右派有组织的有计划的阻止与捣乱分地斗争，故意保存豪绅地主的残余势力，他们有意破坏土地革命，诬蔑群众斗争为土匪行动，抑制群众革命的积极性，培植豪绅地主在苏区的势力，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围剿”相呼应。敌人在三次“围剿”中的主要策略，是利用右倾取消主义者右派与豪绅地主富农从苏区内部捣乱，阎锡山所说的“九分政治，一分军事”就是这个意思。为肃清苏区中的封建残余势力，与隐藏在农村中的反革命分子，为提高群众的积极性，使他们热烈的参加革命战争，以彻底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因此查田运动成了目前的中心工作。查田运动和粉碎三次“围剿”的斗争是密切联系的不可分离的，借口别的工作忙碌，不领导查田运动和

以官僚主义的敷衍态度，来对付查田运动或是不作艰苦的群众工作而来取简单的省事的命令主义，惩办主义都是有害的。

过去各地的党虽个别的零星的领导过许多查田工作，查出了不少豪绅地主隐藏下的土地，可是严格的说，我们的查田运动没有广泛的开始，我们的查田工作存在着下列的错误：

1、一般同志对于查田运动的严重意义估计不够，不明瞭粉碎敌人的三次“围剿”中查田运动之重要性，所以不能把查田运动与粉碎三次“围剿”的斗争密切的联系起来。

2、把查田认为重分土地，查阶级时连中农贫农雇农一齐查，把土地一分再分，甚至有些工作人员认为土地必须每年分一次的，使土地的分配在长期不定的状态中，不能使土地固定的保持在农民手中，影响了农民对土地生产的积极性，使贫雇中农怀疑我们的政策(如秀延)，还有的中农大起恐慌，这样影响了我们与中农巩固的联盟。

3、查田运动是清查豪绅地主富农的一个残酷阶级斗争，只有在这个斗争开展的基础上，群众的积极性才能提高，各种工作才能顺利的开展。可是我们过去的查田是采取了和平方式，没有动员广大的群众集中火力对付豪绅地主，只由少数人在农村里去调查，所以过去的查田没有得到应有的成绩。

4、查田没有经过群众路线，没有动员对土地革命最坚决的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经过他们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查田运动，也没有组织查田委员会，只是个别的附带的去查出些隐藏下的土地。把没收的土地与财物没有立刻给群众分配，不能在分配豪绅地主的财物的基础上发动广大的群众参加查田运动，使农村的阶级斗争深入。

在以前查田运动中，充分表示党的领导薄弱，没有把查田运动变成广大的群众运动，我们要纠正过去的错误，作充分的准备工作，把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密切的联系起来。各级党与团应深刻的讨论查田运动的意义，过去所犯的错误，及今后的工作方式，组织上的动员工作如下：

1、各县委应召集县区苏维埃党团、妇女代表会的党团，党团区委及全县活动分子联席会。

2、各区委应召全区的党团员大会深刻地讨论查田运动，检讨过去的错误，把全体党团员动员起来，有计划的领导查田运动。使各村的小组在自己村中起领导作用。

3、各级苏维埃由乡至省应成立查田委员会，吸收全体雇农工会与贫农团中的积极分子参加，各级苏维埃主席应该是查田委员会的主任，上级查田委员会应召集下级查田委员开三四天短期训练班，讨论过去的缺点错误，经验教训，动员的方式，阶级路线，与争取群众的方法，同时查田委员要与群众团体发生密切关系，去各村调查收集报告。

4、雇农是土地革命的先锋队，查田委员会必须与雇农工会取得密切联系，使雇农在查田运动中起领导作用。雇农工会应以区为单位，召集代表大会，讨论查田运动的意(义)与怎样领导这个运动。雇农工会必须刻不容缓的集体的加入贫农团，在贫农团中成立雇农小组领导贫农团。

5、贫农是土地革命坚决的拥护者，贫农团在查田运动中起很大的作用，我们要把各乡的贫农团动员起来，经过他们动员广大的群众参加查田运动。过去雇农工会与贫农团的党团，不健全的地方应立刻健全起来。

6、各级党应把查田运动放在每次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同时目前苏维埃的中心工作是查田运动，各级党应经常的检查苏维埃对这一工作的领导。

查田运动中的宣传工作也是不能放松的，首先应制定宣传大纲与口号大纲，组织大批的宣传队，在各村中各个院子中讲阶级，给群众说明查田不是重新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雇农，广泛地讲我们定阶级的标准，举实际的例子说明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中农不同之处。说明过去不按剥削方式只按人口平均土地后所多余的土地数

量，定阶级的错误，使群众明白查田查阶级是自己的责任，是自己的利益，广泛的宣传联合中农，不侵犯中农利益的政策，使中农稳定起来，与贫农雇农站在一条战线积极的参加查田运动。更要动员雇农工会与贫农团，使他们也组织宣传队讲阶级，把讲阶级变成农村中男女老少谈话的材料。

调查阶级成份要发动广大的群众，详细的收集各个成份的材料，证明给群众看。关于阶级成份首先应经过查田委员会的分析，然后交贫农团讨论通过，由区苏批准，再到被没收人的村子里，召集全村群众大会解释明白举手赞成。对于中农与富农中间的疑似成份应审慎的决定，千万不要弄错，应得到广大群众的允许与赞成。

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及富农的长余(土地)，应学习江西的办法，动员广大的群众，尤其是本村的群众去参加，在大会上举出没收分配委员，在群众监视下，进行没收。没收的东西，堆在一块，经过群众的同意，立即分配给应得东西的群众，本村的群众要多分东西。能吃的东西如肉面之类，另放在一块，给全体参加的群众吃一顿。党与苏维埃工作人员一点东西也不应拿，在出的土地给地少与地不好的群众分配。

在这查田运动中应注意反革命的活动，对于豪绅地主富农企图反抗或其轨外行为的应立刻逮捕起来再行动员群众。同时要注意豪绅地主富农之诬赖，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时候，他们用尽种种方法诬赖。在延川曾发现过豪绅地主之女人诬赖群众强奸她的事。同时，各县保卫局，应趁着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建立自己的工作系统，在群众中建立侦探网，发动群众参加肃反斗争，无情的镇压一切反革命的活动。更要把查田运动与反右派与右倾取消主义的斗争联系起来，有系统的揭发右派与占倾取消主义者阻止分田抑制群众斗争包藏豪绅地主的罪恶，打击对于查田运动估计不够与消极怠工的不正确的倾向。把苏维埃运动选举运动和查田运动密切的联系起来，在查阶级运动中，把各乡有选举权与无选举权的人清楚的审定，在群众大会上通过。同时，在各级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把查田运动应列到议事日程上，热烈的去讨

论，把领导查田运动当成检查工作的尺度，我们要有系统的发动自我批评，开展思想斗争，洗刷贪污腐化消极怠工的分子，反对不开展与深入思想斗争，只采取省事的简单的惩办主义的办法，各级党与苏维埃应趁着群众斗争情绪高涨的时候，动员群众参加红军与一切革命工作，千万不要等上级督促工作，然后再去开会宣传鼓动。

在查田运动中，要坚决的开展两条战线的斗争，反对对查田运动估计不足的倾向，反对在残酷阶级斗争面前表现机会主义的动摇的分子，反对对地主富农的妥协投降，反对对群众斗争的尾巴主义的领导，同时反对侵犯中农利益的任何企图，反对全部没收富农旧“左”的企图，一切不作艰苦的群众：工作的命令主义与惩办主义，对于查田运动都是有害的。以上所说的右的与“左”的不正确的倾向都是查田运动中障碍物，只有集中火力扫除这些障碍物，坚决的执行中央的经过雇农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反对富农，消灭地主的阶级路线，才能肃清农村中封建残余与敌人在苏区的内在，才能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争取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中共中央关于 1935 年陕北 (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 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

(党内秘密文件)

中央根据 10 月(1942 年)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对于陕北历史问题的检讨与结论，认为 1935 年 9、10 月间×××、×××等同志所主持的“肃反”将陕北苏区和红军创造者刘志丹、××、张秀山、杨森等同志逮捕，并杀害了 200 以上的党政军干部，这种将党的最好干部诬认为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和杀害，不仅完全是错误，而且是革命的罪恶。

从陕北历史问题检讨中，可以看出在这一错误肃反开始之前，陕北党内曾发生了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以刘志丹、××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这一路线之下，创造和发展了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另一方面是以×××、×××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这也是遵义会议前一个时期内在党内曾占统治地位的路线——这种路线几乎使陕北的苏区和红军全部塌台。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发展的结果，由于×××、×××两同志个人主义、高度领袖欲和政治野心家的恶劣品质，以及他们打击刘、×抬高自己预定的企图，就把党的原则斗争发展成为党外对敌斗争性质，他们企图用这种方法来压倒刘志丹、××等同志所执行的正确路线，并满足自己篡夺整个陕北党政军领导地位的目的，这样，就造成了当时杀害和逮捕执行正确路线的领导干部，造成了极大的恶果。“假若不是中央到达陕北制止这一错误肃反，且断定这些被诬陷的同志并非反革命，则陕北的苏区与红军有全部丧失的危险”。

×××同志是当时陕北党的最高负责者(代表团书记和陕甘晋省委书记)，他在1935年未到陕北前即抱着陕甘党内存在右倾机会主义的成见，来到陕北后便以钦差大臣的架子，不与刘志丹、××等同志作任何谈话，不作具体情况的调查研究，只是片面听信×××同志关于苏区红军党和群众工作及干部等方面的情况报告(×是1933年底到达陕北，曾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打击过陕北特委重要负责同志马明方等，1934年7月在阎家洼子会议上又打击过刘志丹、××企图夺取红军及陕甘党的领导地位，但这种企图受到抵抗而未能成功)，而×××同志所供给的报告材料基本上又是挑拨离间造谣中伤的性质，这样就造成了他们对陕甘边及廿六军的主要干部是右倾取消主义者和右派反革命的包庇者(其实刘、×曾对右派作过斗争的)的共同认识。在党的刊物上和会议上有意识的打击刘×张等主要干部，而且在西北工作委员会执受扩大会议的决议中公开指出。“这种右倾取消主义者，他们企踢阻止党的正确路线的执行，这种右倾机会主义者，在事实上他们表现要取消阶级利益，他们是阶级的仇敌……动员全党同志一致的揭发这些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欺骗叛卖作用，只有坚决

的斗争与驱逐右倾取消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分子……”。

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作了“肃反”的准备，而红廿五军的到达陕北；其领导者又带有过去鄂豫皖张国焘时代错误肃反路线的影响，以及在陕南错误的处理张汉民问题的成见，因此他们的到达，对×××、×××实行错误肃反起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于是就促成了这一错误肃反的大暴发。张国焘时代鄂豫皖保卫局任过审讯科长的×××同志，被任为当时的保卫局长，他在这一错误肃反中起了积极赞助作用。×××同志当时任陕北军委会主席，他在前方主持这一肃反，部队中廿六军的干部被逮捕杀害者特别多。

当这一错误肃反开始进行时，正值中央率领中央红军由甘肃南向陕北进发，后来×××、×××同志(×是当时陕甘晋省委副书记)，明知中央的红军到达陕北的地境，然而他们既拒绝了前方同志(当时刘、×都在前方)迎接中央和中央红军的提议，又不等待中央和中央红军到来或派人去与中央接洽之后来妥善处理这一重大问题，仍然逮捕了刘志丹、××等重要干部，这都是不可允许的 errors 和罪恶。

×××、×××二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应该负最重要的责任。但他们在长期中不仅不愿意承认自己错误，反而颠倒是非，互相订立所谓“统一战线”，掩盖真实情况，千方百计，企图欺瞒中央，×××同志自己也承认他在7年之间欺骗了党10次之多。他们在1935年中央解决陕北“肃反”问题之后，仍然继续那一贯的错误思想与行为。×××同志当中央到达下寺湾制止了“肃反”、禁止再行逮捕时，而他还曾密令保卫局要拘捕4个同志，以后他在河南代理华中局书记时，继续执行了打击干部抬高自己的错误政策，近来任陕甘银行行长时期，又向政府和党闹独立牲。×××同志在1936、1937年任陕西省委和边区党委书记时，对廿六军及陕甘边干部采取了宗派主义的压制政策，以后当他任山东分局书记时，对本地干部又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这种不正确的干部政策的结果，也促成了湖西肃反的错误，后来回到延安时，继续在干部中破坏××_同志的威信，挑拨离间，造谣中伤，企图造成干部相互间、地方与中央间、及中央内部的

不团结在这次陕甘宁党的高干会议上，×××·××× 在到会高级干部严正批评揭发下，虽然在头上一般的承认了应负错误肃反的主要责任，但对于自己错误之揭发仍然不是诚恳和坦白的，他们这种隐瞒事实和互相推诿责任的态度，证明至今尚无彻底改正自己错误的决心。中央在重新审查陕北“肃反”问题后，特作如下决定：

一、×××、×××二同志本应开除党籍，估计他们曾为党作过一些工作，本着中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给予以最后严重警告之处分，撤销×××同志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之职务，撤销×××同志山东分局书记的职务，并限定×、×二同志在3年以内不能担负重要的党的工作。由中央组织部与西北局继续搜集材料，如果发现他们继续对党欺骗，而不认识改正他们的错误，党就必须重新讨论他们的党籍问题。

二、因为×××、×××二同志是当时“肃反”的坚决赞助者和执行者，而他们在高干会上对自己错误之承认也还是不坦白不诚恳的。现在中央认为中央(当时称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30日的决议。对于×××、×××二同志的处分(给×××同志以最后警告，给×××同志以严重警告)仍然是有效的。同时也应当指出：×××同志在这次错误肃反中，也应负一些责任。

三、中央认为在1935年及以前陕北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刘志丹、××等同志所坚持的政治路线和立场是正确的，而×××与×××所执行的路线是错误的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因此中央及党务委员会1935年11月间的决议除对×、×处分仍保留有效外，应当取消，如党务委员会决议中对于陕甘边和红廿六军领导者所执行的路线之估计；对陕北“肃反”之估计；和对刘志丹、××、张秀山等被诬害的同志之估计，说：“陕甘边区南区及廿六军部队中有些负责任的同志犯了右倾取消主义及对反革命派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的错误，以致反革命得以进行有计划的活动”又说。“当时在地方党内及红色部队中进行严厉的肃反工作，是必要的”。又说：“把许多只犯错误而没有犯罪实据的同志逮捕起来”。这些估计现在证明都是错误的，

应当指出：那时中央及党务委员会对于这次错误肃反的整个过程缺乏周密的调查研究和客观的分析，以致未能发现×、×二同志的恶劣品质，以及这种品质对于这一错误肃反所造成的影响，是一种缺憾。尤其应当指出：当时中央党务委员会之所以作出这个错误的决定，其基本原因是在于那时中央还没有作出“遵义会议以前一个时期内在中国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这一决定的原故。×××、×××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而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

刘志丹、××等同志在 1934～1935 年间陕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时，在×××、×××两同志的高压和打击之下，依然坚持了自己的正确路线，并且当遭受了诬害和逮捕，以及后来一个时期，当陕北“肃反”问题未彻底弄清楚时，他们一贯的把握了应有的布尔什维克的立场和态度，这是值得我党同志学习和效法的。

四、委托西北中央局负责向过去在错误肃反中被冤屈的同志解释×××、×××所主持的“肃反”的错误，并审查和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家属。

中央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调查材料

马锡五 1959 年 4 月 23 日谈刘志丹的革命活动 我所了解的是刘志丹 1930 年以后的革命活动情况。1930 年春，志丹从宁夏回来，带着他父亲给的 1 支短枪和 1 支套筒枪，还有陈定邦给的 13 支长枪，准备在甘肃民团队伍中搞点势力。在保安县金汤镇成立了 1 个营，卢仲祥任一连连长。这时，刘写信要我出来帮助他搞军队。我于阴历四月初到达金汤镇。我到金汤之初，曾去安塞雷嘴河等地与李子实及薛应昌(时为党员)联系，李答应参加志丹的队伍。约在五六月，谢子长

也来了。

当时志丹有个军事计划，准备建立自己的武装，把陕北党团员中在地方上站不住或家庭经济情况不好的，都吸收到队伍中来，组织一支武装力量。谢子长来时，带着两支枪。六月，后湫天杨庚午的部队被高双成部队打垮，周维琪(杨部)带出部分队伍来保安。那时，志丹队伍住三道川，周维琪部队住在齐家桥。张廷芝也带一部分队伍回来住在保家梁寨子。甘肃谭世麟这时当陇东民团总司令。刘志丹曾与谭交涉，编1个团。谭世麟问刘志丹：“你们谁当团长好，张廷芝还是谢浩如？”志丹说：“张廷芝靠不住，吃谁的饭，砸谁的锅。”他推荐谢当了团长，志丹自己当了第六营营长，张廷芝和周维琪分任其他两个营的营长。此后志丹留在庆阳谭世麟处。

张廷芝这时已不怀好意，张廷祥有几百人的队伍，愿归我们收编，我们抽了十几把盒子去接。张廷芝把派去的十几个人缴了枪，并以许亲(把张廷芝的妹妹许给周维琪作老婆)为钓饵把周维琪骗去，缴了周营的枪，又包围志丹的第六营，我们这营队伍被张廷芝解决，子长逃出。卢仲祥那连只有马福吉1人带出1支枪。我和陶尔曼在白豹川被张廷芝的队伍捉去，我被押了3个月。志丹当时不在那里，若在，可能不会受那么大的损失。志丹回来，到白豹川已打听周维琪的队伍被张廷芝缴枪，他那营被打垮的消息，接着离开那里。张廷芝派1个营追志丹，追到永宁山(保安县政府所在地)，我们设计把追兵营长蔺世昌赚到山上，训斥了一顿，蔺带兵退去。

此后谢子长也到永宁山，接着和志丹到东路活动去了。

不久志丹又回到永宁山，搞了个太白收枪，人枪又有了些，总共已有100多人，并开始打土豪。到安塞县镰刀湾子就打了几家土豪。这是1930年冬天的事了。

腊月间，我们住在保安县瓦子川下面的刘老庄。腊月二十八，王子宜送信来，说是延安高双成派队伍来打我们。我们决定立即转移，二十九日到瓦子川。除夕，志丹叫我买了点肉，大家过了个年。

原来在太白收枪时，志丹就派赵二娃出去活动，搞武装。这时赵二娃、贾生才、唐青山等已搞起了 300 多人的武装，和志丹会合后，总共有四五百人。

除夕会餐后，队伍连夜出发，急行军到了固城川。当时下大雪，队伍被陈珪璋部的蒋云台旅包围，由于敌强我弱(我们人称几百，但枪仅百余支，刚编起来，组织性不强，可说是乌合之众)，被敌打败。收集残军剩下百余人，钻了梢山。大雪，人无粮，马无草，处境很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与彬县杨虎城苏雨生部联系。志丹派我同陈鸿宾、贾生才前去。路过宜君小石崖罗连城(民团团总)处，贾生才留那里活动，我与陈鸿宾同去彬县。苏雨生很欢迎和我们联合，并派 1 营队伍跟我前来接志丹的队伍。行至转角，派来的那营队伍不愿去，我和一个团丁找到志丹。这时，志丹和罗连城拉好了统战关系，并派贾生才、赵二娃再出去活动武装。志丹的队伍到旬邑职田镇后，编为苏雨生部的补充团。

在职田镇时，志丹的计划是：休整队伍，筹些粮款军费，扩大队伍，再把队伍带走。这时高岗曾代表省委到过职田镇。由于陈鸿宾催粮太紧，粮台(管粮的地主)自杀，当地豪绅告到西安。苏雨生把志丹调到彬县，把志丹逮捕，并派军队包围职田镇。我们开支部会议，决定为了营救志丹，交枪。同守孝和杨志贤带枪 1 支和 100 多人去东山。

我们交枪后，被编为运输队。我去彬县监狱探望志丹，他安慰我：“不要伤心，我几天就会出去，我现在有个大计划(把毕梅轩和李培霄两股土匪武装收编，搞掉陈珪璋的势力，成立一支武装。开展革命活动)，我出狱后，马上就开始执行。”

二十几天后，志丹出狱，与朱侠夫等去陈珪璋部，陈编了个十一旅，刘任旅长。

陈珪璋的企图是利用刘志丹收编李培霄的土匪武装，扩大他的势力。这时同守孝、杨志贤已去李培霄部，编了 2 个营。不知怎的，李

培霄把杨志贤部的枪收了，并打死了杨。这时李有 1000 多人。我到早胜，了解到上述情况。

几天后，志丹到了早胜，前去宁州和李培霄谈判，收编李队伍的问题。我们在宁州相会，我把上述情况告诉了志丹。志丹感到在李部中我们的力量太小，要我去保安联系刘兆庆(给志丹买枪的)，朱侠夫去找谢子长。我去保安时，碰到贾生才，他已搞起了百多人的队伍，住在蒿嘴铺。我到保安适逢曹力如、王子宜等被捕。高岗也遭到捆绑，狼狈不堪。我送走了高岗，曹等又被释放。找到曹后，又碰到敌人二次来捕，曹等被逮捕，我逃脱了。

当时斗争形势是很复杂的。李培霄部队未收编得了，李反而叛变。那时有个高广仁，有几百人，接受了陈珪璋的改编。高任陈部十三旅旅长。陈派志丹收编李培霄部队时，高受苏雨生的唆使，把志丹和刘宝堂(陈部团长)的枪收了，并将二刘扣押。我听到这个消息，赶到合水，陈珪璋派刘庆祥旅前来解救，消灭了押解二刘的高部第二营，救出他们。这时陈部副旅长蒋云台要捉刘志丹。刘宝堂得悉，事先通知志丹，志丹与另两个同志连夜冒大雨脱险。刘走后我赶去，在蒿嘴铺贾生才处遇上，蒋云台派百多骑兵来追，由于志丹有很高的警惕性，巧妙地摆脱了敌人的追击，翻了几架山，赶了几十里路，到了姚家园子。在那里正遇上姚姓人家请纸工扎糊金斗银斗之类的祭品，志丹给画了几个画，博得姚姓称赞，说刘志丹是“贵人遇难”，备饭留宿。

这时赵二娃又搞了几十个人枪的队伍，住在夏家沟。我们去那里，刘志丹留我在赵二娃的队伍里工作，整顿队伍。他和王廷玉、李万才去保安，联系了解刘兆庆、曹力如等的情况。那时杨培盛也搞了几支枪，进行活动。我在赵二娃的队伍中呆了一个多月，又去找到刘志丹。那时王、李不干了，只剩下志丹一人。我和他一起钻了一个时期梢山。

有一次，我问他：“你搞土匪的队伍，他们纪律不好，怎么能行？”他说：“现在王八打起墙了，没有鳖走的路啦！”土匪军队中有的是基本群众一贫农，他是坚决相信党可以改造这些人的，钻梢林

时，生活非常艰苦，但志丹从不叫苦，这是志丹的特点之一。

有一次，我和志丹走的很疲倦了，本想到榆树沟找个驴子骑上走，但却碰上了给刘志丹送家信的记脸子。志丹的父亲要志丹回家，要志丹和张廷芝妥协。志丹说：“我能在他张廷芝的狗下巴下面捉苍蝇吗？”打发送信人走后，不顾疲倦，连夜又赶了 20 多里，离开那个地方(志丹恐怕因送信人来，走漏消息，敌人来捉)。这是 1931 年秋天的事情。

这时杨培盛、贾生才已分头搞起了百多人或几十人的队伍。

1931 年秋，晋西游击队来到南梁，和志丹领导的队伍会合。刘志丹把赵二娃、贾生才、杨培盛 3 股队伍集合起来，编为二支队，(晋西游击队编为一支队)，志丹任支队长，下边分 3 个营，贾生才、赵二娃和杨培盛各领导 1 个营。整个部队没有什么公开的名义。晋西与南梁游击队会师后，本想到陈珪璋处找个立足点，休整一下。陈对我们很冷淡，没搞得成。1931 年冬，在柴桥进行改编，成立反帝同盟军。

1932 年春，三嘉原收枪，队伍改称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收枪以后，志丹去西安陕西省委，我也离开部队，以后的情况就不清楚了。

刘志丹同志党的观念是很强的，他处处时时都依靠党的领导。

志丹同志和群众的关系很好，并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如对罗连城等的统战工作就做的很好，这对于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有很大的便利。即使保安县的一些士绅地主(比较开明的)，对志丹也很尊重，在经济上对志丹的革命活动曾给予帮助。

志丹同志有远大的理想和科学的预见，对于开展革命运动有非常周密的计划，每走一步都看到下一步，并步步留有后路，使革命活动进可以发展，退可保存力量。如他屡次派赵二娃等出去搞武装，就是为了给革命留后路。每当志丹的武装活动失败后，还有赵二娃等的武装可以依靠，于是很快的就又搞起来了。

志丹同志很重视根据地的建立。南梁根据地的建立，是根据几年的根据地的建立与失败后经验与教训总结出来：要在敌人统治最薄弱的地区建立根据地，而且根据地要建立几处，使革命武装有回旋的余地。

志丹同志的革命意志非常坚强。在极端艰难困苦的情况下，从不叫苦，即使剩下他一个人，也坚持继续干，直至搞起革命武装为止。

刘景范 1983 年 5 月 16 日谈陕甘边早期革命武装斗争 1928 年，陕西渭华起义失败以后，西北地区的革命形势处于低潮。党的六大决议指出：现阶段中革命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陕西省委根据“六大”精神，制定了开展“军运”工作决议，号召共产党员到兵营中去，争取群众，准备起义。同时派刘志丹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领导陕北和陕、甘、宁边界“军运”工作。

1928 年后，刘志丹，谢子长回到陕北，向陕北特委传达了省委开展“军运”工作的决议，并根据省委的指示，提出利用陕、甘、宁各地军阀扩充势力的机会，动员党团员和革命青年打入军闭部队，争取士兵群众；同时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做上层工作，争取掌握兵权，准备起义。他的这个正确主张，遭到特委书记杨国栋的反对。杨以保存力量为借口，要党员都隐蔽起来停止活动。刘志丹批评了杨国栋的右倾思想，在特委多数委员的支持下，做出开展“军运”工作的决定。

1928 年秋到 1930 年秋，志丹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期间，组织动员了大批党团员和进步青年，打入陕北高自清、杨庚午，甘肃谭世麟，宁夏苏雨生等军阀部队以及杨琪等商贩队中，进行“军运，工作。1929 年秋，刘志丹指导保安县党支部夺取了保安县民团的领导权；1930 年春，利用社会关系在苏雨生部第八旅十五团成立了以张东蛟(党员)为队长的学兵队，组织了 30 多名党团员和进步青年去学兵队学习，培养了一批军事干部。以后的靖远和西华池的兵变，都是他们起了主要作用的。同时，志丹利用社会关系，入陇东军闷谭世麟部，取得陇东民团骑兵第六营营长职务的合法地位。陕北党组织动员了一

批党、团员和农民参加了部队，又从保安民团中抽调了一部分人和枪，组织起一百几十人的部队，编为3个连：一连连长卢仲祥、二连连长刘兆庆、三连连长同其仁。部队驻在庆阳北部三道川。这时，谢子长从宜川土匪杨庚午部拉出以周维琪为首的100多人来三道川，也准备给陇东民团编1个营。1930年夏，由于周维琪被土匪张廷芝收买，自动向张缴械。张又率部袭击了刘志丹营，部队遭到很大失败。

1930年秋，志丹辞去了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亲自去陕甘边界组织武装起义。9月下旬，志丹带骑六营进驻合水县太白镇，10月1日，在太白镇举行起义，打死陇东民团军第二十四营营长黄毓麟，收缴了该营大部分武装。太白起义后，部队分三部分在陕甘边界游击：赵连璧带一部分人在合水太白地区，同守孝带一部分人在庆阳南梁、二将川一带，刘志丹、卢仲祥带大部分人在保安、安塞边界游击。游击队先后消灭了黄毓麟的残部和合水、庆阳、保安、安塞地区的民团100多人。还发动群众分配了几家土豪的财物。由于游击队的活动，引起陕北军阀井岳秀的恐慌，派兵“围剿”，陕北特委通知游击队向南转移。1930年12月底我们离开保安向合水转移。这时，贾生财由陇东民团军拉出三四十人，参加了游击队。唐清山在合水组织了几十名饥民，参加了游击队。

1931年1月，游击队在合水固城汇合时，已扩大到300多人。汇合后部队编为4个连，第一连连长卢仲祥，副连长魏佑民，第二连连长同守孝，第三连连长赵连璧，第四连连长贾生财(当时我在一连当排长)。

部队汇合后，开到宁县宇村原张皮村，与陈珪璋部的谢牛旅遭遇，激战四五个小时，一连连长卢仲祥阵亡，三、四连被冲散，一、二连退到芦宝梁、小石崖。这里有个罗连城，是哥老会大爷，又是民团团头，志丹派马锡五与他联系，送给他200两大烟土，他帮我们买了好多子弹和大米、白面，罗还来看了志丹，从此我们与他建立了统战关系。此人在红军时期对我们帮助很大，替我们寄养过许多伤员。

部队在小石崖休整一段时间，接到省委指示，叫开到职田镇。省委这时打算在西北搞几个旅，组织反蒋势力，其中之一就是驻彬县的陕西警备骑兵旅苏雨生部为1个旅，(另外还有石子俊、王子元)，所以让志丹与苏谈判联合。我们边与苏谈判边打土豪，解决部队的供给问题。打了旬邑县一家最大的恶霸地主刘日新，没收了一些粮食和钱，还向他征粮20石，刘抗拒交纳，自杀死了。刘在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有人，通过省党部秘令苏雨生消灭我们，这时志丹正在彬县与苏谈判，被苏抓起来，并派两个骑兵团包围了我们一连，缴了枪；二连跑出去了。志丹被押在彬县狱中。一连被苏编成一个运输队，驻在彬县东关娘娘庙。我去监狱看过志丹，志丹叫我们在那里好好学习军事，派马锡五去与同守孝、赵连璧、贾生财联系。志丹被押后，陕西省委通过杜斌丞、南汉宸的营救，过了1个多月，苏雨生把志丹放了。

当时，宁县一带有一股饥民队伍，约1000多人，为首的是李培霄(是志丹的朋友)，他们被陈珪璋的部队打得站不住脚。于是省委又派马志贞、高岗来彬县，叫刘志丹去平凉同陈珪璋谈判，把李培霄的部队编为陈部一个旅，站住脚后，改造成自己的部队。志丹到平凉通过陈珪璋的警卫团团长刘宝堂(志丹的朋友)与陈谈判，陈答应编为十一旅，委刘志丹为十一旅旅长，李培霄为副旅长，并派刘宝堂带1个营配合志丹收编。志丹和刘宝堂到宁县早胜镇，正与李培霄商量收编中，这时候，陈部之蒋云台、谢牛两个旅也都各自想收编李培霄，收编不成就把李的部队打散了。志丹到早胜后就派王世泰到彬县，要我们设法离开彬县来早胜，我们趁苏雨生与毕梅轩作战的机会，离开彬县到早胜。我们刚到早胜，驻早胜的陈珪璋的十三旅旅长高广仁邀请志丹和刘宝堂吃饭，我听高部下的一个熟人说，高要借请客之机收刘宝堂部队的枪。我把消息告诉志丹，志丹叫刘宝堂不要去，刘宝堂不相信高广仁会缴他的枪，他自己去了。结果被下了枪，拉到早胜堡子下，逼刘宝堂下令全营缴了枪。在这以前，马锡五到早胜向志丹汇报了赵连璧、同守孝、贾生财的活动情况。

高广仁收了刘宝堂的枪后，一直往北开，准备回陕北，我们也只

好跟上走，到合水以北，找自己的队伍去。我们跟在高的第三团后面，他们走错了路，一天下午走到合水县城东边只有几里路的地方，驻合水的蒋云台旅出击，把第三团消灭了。把我们弄到合水城，刘宝堂和他的人都住在县城里，志丹和我们几十个人住在合水东关一家客店。刚吃过晚饭，天下着大雨，刘宝堂得到消息说蒋云台要抓刘志丹，让志丹快走，离开合水。志丹就带了个王廷玉匆忙离开合水，向蒿嘴铺去了。这时，贾生财利用社会关系弄到合水东区民团团总的合法名义，部队驻在蒿嘴铺。他们走后约 10 来分钟，蒋云台就派人包围了我们的住店，搜查了一阵没有搜出志丹，又派骑兵追赶。志丹到了蒿嘴铺贾生财的部队住处，遇到马锡五也在贾生财处。贾生财把志丹藏了起来。不一会蒋云台的骑兵果然追来了，贾用烟酒应酬了一下，把他们打发走了。贾又派人把志丹送到罗家沟圈赵连璧部队。这是 1931 年 8 月初的事。

志丹在合水脱险后，在庆阳、合水山区开展游击战争。这时候有赵连璧、同守孝的武装共 200 多人，同守孝被叛徒李庚娃打死，部队合在赵连璧一起，不久杨培盛在南梁地区组织超几十个人的游击队。贾生财把民团带出来了。合起来有 300 多人。这时候，在二将川打了一回张廷芝的骑兵连，缴获 20 多支枪，战马 40 多匹，还消灭了太白民团，收了旦八民团的一部分枪，又有谷聚山、张天禄先后从陈珪璋部拉出五六十人参加了游击队，部队共发展到 400 多人，300 多支枪。

到了阴历十月中旬，我们曾与晋西游击队和陕北商贩队汇合。晋西游击队过河后有二三十人，在陕北与师储杰、杨琪等商贩队汇合，合起来近 300 人，大队长师储杰、参谋长杨重远(党员)，共有 4 个中队，晋西游击队是其中 1 个中队。晋西游击队原来的队长是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到陕北后拓克宽牺牲，黄子文被北方局调走，阎红彦当过短时间的队长，打仗时掉了队，白锡龄当队长(阎后来到了我家，我父亲派张明科拉毛驴送他到了南梁)。他们在陕北打了几仗，到陕甘边找到刘志丹，志丹派我去迎接。我到东华池见了师储杰、杨重远，也

见了白锡龄、杨琪。

队伍会合后，就开到南梁周围活动。这时共有七八百人。11 月谢子长与高岗从平凉来到南梁。谢在平凉与陈珪璋谈判，把部队编为十一旅，谢子长当旅长，刘志丹当副旅长，宣布编为 2 个团，一团长师储杰，二团长刘志丹兼，谢派马云泽到平凉办理编制和领军装等具体事宜。部队由南梁地区开到庆阳附近的新堡和悦乐住了一个来月，11 月陕西省委派荣子青来传达省委指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西北的革命形势已发生变化，现在我们要单独搞起武装，决定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同盟军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同时成立了同盟军党委会，谢任书记，刘、荣为委员。同盟军下设第一、第二两个支队，陕北商贩队和晋西游击队编为第一支队，师储杰为支队长，陕甘边界游击队编为第二支队，刘志丹兼支队长。省委要开到关中去，这样号召力大，影响大。在讨论部队的行动方针和整顿问题以及部队的供给问题上发生了争议：第一，在哪一带搞根据地？刘志丹主张在桥山北段的保安，庆阳、合水、甘泉好，这里敌人势力薄弱，活动范围大，党在这里搞了几年武装斗争，群众很拥护我们；谢子长、荣子青认为关中影响大，号召力也大。群众、部队容易发展等。第二、整顿部队。同盟军是各方面汇集起来的，成分很复杂(一支队中有许多地痞流氓，大部分吸食大烟。二支队也混入吸大烟的地痞流氓)需要整顿，意见是一致的。如何整顿法？谢子长提出，对那些成份复杂不可靠的部队，该缴械的缴械，该解散的解散，该枪毙的枪毙，刘志丹不同意，主张采取教育、改造为主的办法，不堪改造的个别清理。第三，部队发不发饷？子长提出：为了体现官兵一律平等，易于扩大部队，同盟军不论官兵每人每月发 20 个银元的饷；刘志丹不同意，说我们没有固定的经济来源，靠打土豪筹款，只能解决吃饭问题，那有这么多的钱发饷。这三条争议在新堡没统一，部队就向南开了。

部队开到正宁县柴桥子，1932 年元旦在柴桥子召开了全军大会，省委代表荣子青宣布成立西北反帝同盟军以及同盟军的领导人。荣子青、谢子长、刘志丹都讲了话。子长讲话时宣布每人每月发 20 元饷。

反帝同盟军成立后开到正宁县三嘉原，一面整编训练，一面向地主筹粮筹款，解决供给问题。同盟军一支队 300 多人编了 3 个大队，1 个警卫队，杨鼎、杨同、杨琪分任一、二、三大队队长，白锡龄任警卫大队队长。二支队 400 多人，编了 3 个大队 1 个警卫队，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分任一、二、三大队队长，刘景范、白冠五、谷聚山分任一、二、三大队副队长，警卫队长刘丕杰。

部队编制完成后，志丹先后召集二支队的党支部(当时我是支部组织委员)和各大队领导开会，研究整顿工作。二支队整顿中清洗了混入部队的十几名地痞流氓，每人给 1 头毛驴让其回家。当时部队生活很困难，就决定打土豪，两个支队都打了，二支队派赵连璧到湘乐川打了一个土豪的寨子，没收了些现洋、大烟土、还有几口猪、几头骡子，过旧历年的三十日晚上，会了一顿饭，每人发了 2 元鞋袜费和零用钱。

1932 年春节大年初一，×××命令全军集合。部队集合在三嘉原细嘴子的一个打麦场上，××讲了几句话，最后说：“我们不能挂羊头卖狗肉”，这话是事先约定好的暗号。这话一说，×××上去抱住赵连璧，×××一枪就把赵打死了×××收了志丹的枪，×××收了我的枪。这次打死了赵连璧，还打死了贾生财的副大队长谷聚山和第一大队的一个姓王的中队长，名字记不清了，还打伤了二大队副队长白冠五。

收枪后，××宣布二支队解散，押了志丹，开除了二支队 40 多名干部，战士各自回家。当时二支队哭成一团，我后来给××说情，他给我和马锡五两人 1 头毛驴作路费，让其回家。临走时我想见一面志丹，他们都不让，当时二支队干部只留了一个刘约三。

我到职田镇马家堡子碰见高岗从省委来，高岗到三嘉原后放出了志丹。我在西安住了 1 个月，志丹来西安后就让我和白冠五一块到谷连舫的部队搞兵运工作了。

收枪后的当天晚上，师储杰带上他的 200 多人跑了，当时七八百

人的部队，只剩下 100 多人。在这件事上，××是犯了严重错误。这个同志有对“左”得很。志丹到陕西省委汇报了这个情况，省委批评了××。

其他几个问题：

关于“寺村原根据地”。1932 年是杜衡积极推行王明路线的一年，不让红军游击队到山区建立根据地，去了就说你是“右倾机会主义”、“土匪路线，而在平原地区又四处遭受敌人围攻，站不住脚。所以 1932 年没有建立起根据地。杜衡下命令叫在平原地区建立一村一乡的根据地，也没建立起来。所谓“寺村原根据地”不过是陕甘游击队去宣布了一下就走了，没起过一点根据地的作用，不能算根据地。到了 1933 年春季，照金游击队才在耀县山区照金建立了一小块根据地。

关于陕甘边根据地创建。1933 年 10 月，陕甘红军的领导机关在合水包家寨子开会决定建立三路游击队，开辟陕甘边根据地。成立第一路游击队，强世卿为指挥，魏武为政委，以安定为中心，建立陕北根据地，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杨琪为指挥，高岗为政委，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桥山北段根据地；成立第三路游击队，王安民为指挥，张仲良为政委，以照金为中心，建立桥山南段根据地。这次会议志丹同志总结了过去失败的教训，对照井冈山的道路，提出建立三路游击队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是战略性的决策，也是战略性的转变。从此，陕甘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在刘志丹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得到了很快地发展。

1933 年冬到 1934 年春，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南梁和照金地区消灭了大量的白军和民团，这两个地区在陕甘特委领导下，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广泛地开展起来了，各县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于 1934 年 2 月在南梁地区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5 月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1934 年苏联十月革命节，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到 1934 年底，陕甘红军粉碎

了敌人 5 次较大的“围剿”，在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宁县、正宁、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定边、富县、甘泉等十八九个县的大部分和部分地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都建立了临时的或正式的革命政权。每个县都有游击支队或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发展到 4 个团和义勇军共有 2000 多人。各县游击队共有 1500 多人，这是当时西北建立最早、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影响也最大的一支红军。

王世泰 1988 年 8 月 18 日谈刘志丹游击队 在南梁游击队之前，还有个刘志丹游击队。三道川失败后，刘志丹就在保安建立起了一支武装，我去找刘志丹，就参加了这支部队。

三道川失败，刘志丹营有个党员叫马福吉，带回来了 1 支枪。刘志丹又从永宁山民团中抽出 10 来支枪，后来又买了 2 支驳壳枪，人员骨干大多是三道川失败时刘志丹那个营的，有马锡五、刘约三、卢仲祥、王廷玉，搞起了游击队，没有正式定名，群众叫刘志丹游击队。这是我们党独立领导的一支武装，聚集了相当一部分党员。部队的管理、教育工作是姜兆莹(当时叫杨树荣)负责，党员有刘志丹、姜兆莹、魏佑民、刘约三、贺彦龙、李锦如、王廷光、马福吉、魏长胜、常佩清、杜义祥、杨植本、杨彦儒、薛运昌、方英杰等，共 20 多名。我去时，带了张文元，又增加了两名党员。这些党员，多数都是学生，有一定文化程度。

我是 1930 年 10 月到刘志丹游击队的，是经延安区委刘明镜介绍，经保安县民团一个党员的帮助找到刘志丹的。这时，刘志丹游击队有六七十人，30 来条步枪，3 把驳壳枪，活动于保安、安塞一带。游击队党的工作由姜兆莹负责，我和张文元的组织关系就交给了姜兆莹。当时部队很困难，我建议让我回延安取枪，刘志丹同意了，取枪在延安待了一段，春节时回到游击队。在我取枪期间，大约在元月份(农历十月)，他们搞了一次“太白收枪”收了 40 多条枪。太白收枪后，武器多了，人员也扩大了，有 100 来人，六七十条枪，还有几十匹马。游击队的党员将近 30 个。这一段历史，党史要反映出来。

姜兆莹 1985 年 9 月 9 日谈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 我在驻陕北的国民党军队四十八师军事教育团炮工队时，发展了一批中共党员，成立了支部，因而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对我监视很严，活动无法开展。当时，有一个通讯员是我们地下党的联络员，我把我的处境给他说了，让他报告特委。过了一个星期(大约是 1929 年下半年)，他说特委让我利用开小差的方式，离开国民党军队，去咱的部队。咱的部队就是刘志丹、谢子长的部队。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就利用半天放假开小差，跑到绥德师范学校见到了特委苏士杰。苏说特委决定你到咱的部队去。咱的部队在哪里，他还不知道。只知道谢当时是庆阳谭世麟的补充第二团团长，刘志丹是谢的第二营营长。谢子长有了这个名义，收了三边的 1 排骑兵，为一营，营长周维琪。刘志丹是二营，赵子实是志丹的营副，下面有两个连：卢仲祥一个连，刘约三一个连。我先到安定县委(在高等小学校)，书记赵伯平也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就到谢的家里，他家里人说在三道川，并给我画了个路线图，我拿着特委的介绍信见了谢子长；谢把刘志丹叫来介绍了一下，说他是团长，团副马云泽，一营营长周维琪(阎红彦他同母异父哥)，二营营长刘志丹。过了不久，大概有 10 来天功夫，庆阳谭世麟的司令部通知，叫去庆阳开会。甘肃省长刘郁芬给庆阳民团个骑兵旅的番号，谭世麟庆祝旅司令部成立，让各部队都要有人参加。商量了一下，子长说他不能去，叫志丹和我去，志丹是二营营长的职务，我没职务。我由绥德去的时候是陕北特委的特派员，这是党内职务。志丹写介绍信时给我写的是中校团副，马云泽当时是中校团副。当时去了 20 来名骑兵，志丹领着他的刘连长和两个护兵，给我也从一营调了 1 匹马，我们就从三道川到了庆阳，见了谭世麟。谭很赞赏谢，又当面恭维刘志丹。因为刘以前当过马鸿逵的军政治部主任，开会时还请刘志丹讲话。开了 3 天会，各部队都返回原防，我也和刘志丹回来了。在半路上一个岔路口，志丹说他去保安，回去看一下活动情况，让我们先回驻地。志丹当时回了永宁山。当晚，反动派张廷芝哄骗周维琪，把周的枪下了，周营跑出去的士兵给团部报信，谢说咱们先离开团部。当晚天很黑，又下濛濛雨，一出门，连方向也搞不清，他们都走了。我

想，一、二营驻地张廷芝必来。刚下了一个坡，就听见有马蹄声，我估计必定是张廷芝来打团部。团部已无人，必然去刘志丹的二营。骑兵过来了，我就钻进了一个水洞，不一会，听着人马都过去了，后来听不见声音了。我钻出水洞，向北是蔺家兄弟，向东是张来的路都不能去，向南是回去的路也不能去，只有西面。两面是一面坡；很滑，整整爬了一晚上才爬上去。我知道西面是元城子川，天明到山头上看，方向是对的，下了山问老百姓，证实了我的判断正确。我问民团团长住的地方，这民团被谭世麟编成营了。去到民团团长家里把情况说了，民团团长说。“张廷芝咧娃不是好东西，你吃住就在我这里，不要操心。”因这个人和张廷芝是亲戚关系，我很不放心，决定去庆阳。到庆阳见了谭世麟，那时我的名字叫杨树荣(从四十八师跑出来，我把名字就改成了杨树荣，所以三道川这一段用这个名字)一见谭，谭说杨团副来了，并埋怨了张廷芝。还说：“你能不能把谢团长、刘营长请回来？”我说：“能行！”谭说“你就住几天，路上不好走，有危险。太白王营副在这里，我给安顿。”于是谭给王营副安顿说，“以后杨团副，就撩衣服抽枪。我一看就打了一个——黄营长，志丹打了王营副。都从凳子上栽下去了，收了两支小枪是八响。卢连长、刘约三他们在烧坊那边喝酒猜拳拉关系，也早有准备。听到我们这边枪响了，他们也收了几支枪。黄营的人大部分在河东边的砭上驻着哩，卢连长就准备带人过河去打。志丹与我从西边过来，到烧坊门口吹号，说不要追，因人家长枪多，本地人，地理又熟，追过去对我不利。这次在太白收了 10 来条枪。以后就开了个群众会，把民团的罪恶公布了一下。谭世麟还编了个九营，大都是些土匪，这些人要求把他们的枪(都是些烂枪)还给他，跟上咱们走哩。志丹应允，他们跟上走，但没有给枪，这些人也没有跟上来。此后就回永宁山，刘约三在前边走，听见马叫唤，在一个门口拴着，是马建有(马建有是谭世麟的独立连连长，以后给黄营编了一个连)在他身上一搜，搜出个折腰子枪。马连长驻在林锦庙，有 20 来条长枪。擒贼先擒王，捉住马后，给说咱们一块干，马表示愿意跟上来。走到林锦庙下边，给我留了一部分人，占住去永宁山的路口，他们向西北到林锦庙，命令马建有把堡子门叫

开，马说：“把枪给刘营长缴了！”缴了 20 来支枪。这次行动，前后共收了 30 多条枪，两匹马(王营副的 1 匹，马建有的 1 匹)，太白和林锦庙的那些人都没有跟我们来。

太白收枪时，赵二娃在烧坊，和我们有联系，作了内应。到底是黄营的兵，还是烧坊的人，我不太清楚。以后谢子长在靖远给我说过：赵二娃是土匪，败坏了我们的名誉，我把他拾掇了，打赵二娃的时候，刘志丹还不满意，蹲在一旁闷闷不乐。我们把二支队的枪收了，把志丹的枪也收了，志丹很不满意。我问赵二娃对咱有啥帮助，谢说早就有联系，详细过程咱不清楚。

太白收枪后，回到永宁山，国民党保安县长崔孟九(以前是中共党员)给志丹说：“你们现在人数多了，风声也大，这里离延安只 100 多里，你们不能长在这儿住了。一公安局长也笑骂说：“这些亡命之徒，去时两手空空，回来时一人拿两三条枪！”从此以后就开始游击，先到安塞地区活动了一次，人数稍微多了一点，四五十个人。当时以谭世麟的名义活动，打不起红旗，安塞转了一圈后，又向陇东活动，在盘客原上会合了一些质量不太纯的游击队(有想发财的，也有想革命的，也有借这摊子哭他的恹惶哩，)有个姓唐的，安排了个营长，赵二娃也有一部分人。这些人土匪成分多，抢老百姓的东西。盘客原是陈珪璋的地盘，陈派骑兵从南边打来，卢连长猛得很，率部把敌人打跑了。敌人又从东包抄过来，我和王世泰等十几人与骑兵打，骑兵目标大，冲不过来，就把马压了用步兵上，志丹看前后都有敌人，就把步兵调回，这时敌人已冲到跟前。在此情况下，我们不敢向南去，就向东下了小，敌人尾追而来，我用短枪换了志丹护兵的长枪，打了几枪，敌人再未追赶，我们就上了东山，天也快黑了。志丹召集开会，志丹认为陈珪璋是土匪军队，并非是训练有素的，打了胜仗必然麻痹，晚上派人去摸一下最好。但一检查自己的武器，息壳的息壳，拉不动的拉不动，人也整整一天水米未进，后来也就未去摸。就向东撤，在芦宝梁，有很多窑洞，以前住过人，野核桃很多，我们拾的吃了些核桃，驻在这里，志丹想利用哥老会，去时给那个民团头(名字忘了)拉

了1匹骡子，交涉的结果，给了些子弹、粮秣。到哪里落脚呢？陕北不能去，陇东有陈珪璋，平凉正在打仗不能去，陕西的杨虎城也看不上咱这点力量。对周围的环境全面分析的结果，认为苏雨生可以暂时利用，这人是河套的土匪出身。最后派马锡五、陈鸿宾去找苏雨生。苏雨生的副旅长谷连舫在榆林中学当过教员，是志丹的老师，志丹写信叫两人带上去找谷连舫，由谷找苏说就编的事，在苏雨生的部下搞了一个补充团。骑兵团4大连就够了，实际只编了1个连，魏佑民是连长，志丹是团长，我任中校团副，陈鸿宾任少校团副，马锡五任军需，这样名义上就算有了着落，编后驻守职田镇。当时三水县也有个补充团，编的早。驻下后，志丹说咱以前一直是陕北特委领导，有些指示1个月才能来，慢得很，现在咱们离西安近，可以去找省委。大家一致同意，研究决定派我去。在职田镇住下后，召开了党员大会，选了支部书记，我、志丹、王世泰3人分工，我当支部书记，志丹的宣传，世泰搞组织。当时有十几个党员，现在记得起的除我和志丹外，还有刘约三、魏佑民、王世泰、马福吉、王廷光、常佩青、李锦儒等。以前没有支部。决定我去西安，目的是去请示汇报工作，汇报部队情况。去后我在骑兵旅驻西安办事处住，地点在今解放市场开元寺里头老佛殿里，通讯员是看佛像的。我到老佛殿找到通讯员，他问了我的住处，说叫我先回去住下，他给省委汇报。两天后他带我到省委，省委表示欢迎，说以前对你们的情况不了解，以后我们可以帮忙。第二次我见了一个人，不知道啥名字，以后想可能是杜衡，他说已通知省城工兵营，派人借出差的名义把武器带到你们那里。以后我与骑兵旅办事处一伙夫(长安人)闲谈，他说：“我听说你们团长叫扣住了，与你关系不大，我以后再给你打听。”我听到此消息，第二天早早起来，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的被褥拉上到安君子(建国中学当教员)家去，安让我住下。我打听到是把部队的枪收了，把志丹押了，把部队改成了学兵队。我住在西安给彬县去信试着问，他们给我来信说：“王世泰、刘约三这些人都在，原先叫你来，现在不一定来了。”刘约三在彬县街道转，碰见杜斌丞，给杜把刘志丹被押的情况说了，杜要苏马上把志丹放了，志丹也就出来了，杜斌丞对志丹很亲热。

从彬县离开后，我个人想以后怎么办。陈珪璋跟前有个交际处长王敬甫说：“刘志丹对你多么好吗，你这样吃住的给干？高广仁编了个骑兵十一旅，缺团副，把你推荐在当高当团副。”我就到了高那儿。高是个粗人，没多大能耐。后来了一个姓赵的，原在二军当过营长，这人给高当参谋。志丹从彬县出来后，到平凉，刘宝堂给陈珪璋说的给了个十一旅旅长(陈珪璋这人，只要你跟我来，要多大的官都给哩)。志丹名义是十一旅旅长，力量靠刘宝堂带一营人(步兵，200多条枪)去早胜，计划能把高广仁说服就说服，不行就把枪收了，给刘志丹编十二旅。去时人家早下手为强，把刘宝堂的步兵子弹全收了。事后，高广仁觉得自己在早胜站不住脚，就奸淫掳掠，放枪往陕北跑了，把刘宝堂也裹上走了。好几个共产党员也被裹去了，如贺晋年、张秀山，刘约三等。刘宝堂当时是团长，在陈珪璋跟前很能说话，看得起。高跑后，我们返回到正宁县驻下，刘宝堂对志丹说，现在回平凉他没脸，他在靖远指挥几个团得了胜利，这次失败很丢脸，说不起话。叫志丹也不要回平凉，黄营长的儿子在陈珪璋手下当营长。说我也不能去，黄营长是我打死的。黄的儿子在陈面前说坏话。刘宝堂当时给了我几个硬洋，让我自寻出路，我就离开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清楚了。

刘志丹早期在陇东的革命活动三起三落，三道川事件到回永宁山算第1次；张皮原失败到彬县入狱算第2次；早胜事件算第3次。我与他共事时间都很短。

张占荣 1985年4月11日谈陕甘边革命武装的创建 民国20年(即1931年)古历四月，刘志丹、刘丕杰、马锡五等一行6人从早胜出来路过我的家乡，开始要我为他们带路去太白，但去太白后就留我给刘志丹当了警卫员。刚到太白，刘志丹给我剃掉长辫子头发，因而受凉感冒。刘志丹让我寄住在牛车坡养病，他们就出去搞活动去了。过了三四个月，刘志丹同马锡五回来了，第三天人睡定时就在豹子川掌的马泉圪崂找到了赵二娃。当时赵二娃又拉起了近200人的队伍。住了三四天，我们一起又到了白马庙川的雷家坡，在此又住了近半个

月时间，翻回到小河沟、豹子川住了约 1 个月的时间。这时又打问到杨培盛也搞起了一二百人马，就住在平定川口的倒水湾一带。这时，刘志丹、马锡五、赵二娃商量着要成立一个游击队，刘志丹说他从早胜突围后是贾生财接应他的。还说：高广仁在北掌堡子开了杀戒，共杀死了六七十名无辜老百姓。经过划算，他说：加上贾生财的四五十人，同守孝的 100 多人，唐清山的三四十人，合起来就在 600 名左右，足可成立一大型的游击队，再要遇到象高广仁那样强大的土匪时，就能抵得住。商量完后，刘志丹让马锡五通知这些人带队前往倒水湾杨培盛的驻地去整编。整编期间，我因病复发没有去，就在郑家庄史二狗子家养病。整编完毕后，刘志丹究竟成了什么官衔我也没弄清。有人叫他刘队长，有人叫他刘指挥，也有人把他称呼刘团长，或刘书记。时隔不久，我同刘志丹都在豹子川那里住。此时，叛徒李庚娃暗杀了同守孝。李庚娃往山上逃跑时被人抓住了，刘志丹亲手杀了李庚娃(在杀的时候，只在脖子上大抹了一刀，一直拌侃了 1 夜和半天才断气)。这时，唐清山也来了，刘志丹就让唐清山接替了同守孝第四大队长的职务。

这里我再说一说最初跟刘志丹闹革命的这些头面人物的身世，有些是听人说的，不一定准确。

赵连璧同刘志丹是姑表亲，自幼死了父母，一直在志丹家里长大。此人胆子大，仗火硬，枪法准，南梁一带的土匪都怕他。他的小名叫赵二娃，但南梁一带的土匪见了，都称他为“赵二爷”。他对刘志丹跟得最紧，最肯为刘志丹出力。但在三嘉原整编中被人暗算了。死的非常可惜，对革命是个大损失。

杨培盛、同守孝都是米脂县人，两人的家听说相隔不远，原来都以收皮货为生。但杨培盛被国民党的便衣队抢了，生活混不下去，他又反过来借机会夺了国民党士兵的 1 支枪，又用这支枪打的夺来了 8 支枪。从此，他就和同守孝等几个收皮子的，搞起了自发革命，后来又接受了刘志丹的收编，走上了正式的革命道路。

贾生财的原籍是横山县人，小时候逃荒到蒿嘴铺，早同刘志丹就相识，后来在蒿嘴铺搞了个民团。公开叫民团，实际上也是刘志丹部下的兵马。此人后来也被伙夥多里的坏人杀害了。听说事情是这样的：因他搞的民团里面有一部分陕北人，也有蒿嘴铺的当地人，队伍发展后，那些陕北人坚持要他带队回陕北，而贾生财却坚持要跟刘志丹在南梁一带闹革命，那些陕北人就把贾生财偷着杀了，带着一部分枪回了陕北。

唐清山原籍河南省，后来落脚到西华池跟前，是个江湖武夫出身，最爱结交义士朋友。听说刘志丹第一次固城整编队伍时，唐清山就曾带上他的队伍请求改编，但刘志丹为了考验他，当时没收他，最后他一直紧追刘志丹，坚持要革命，刘志丹到底还是把他收为四营长。

在倒水湾成立起南梁游击队不久，又从榆林过来师储杰等很多人，在林锦庙同南梁游击队含在了一起，起码有 900 多到 1000 人、队伍住不下，又向新堡一带转移，二团长由刘志丹兼。此时，我被编入赵二娃的一营一连当了二班长，刘景范是副营长。我记得，我们一营共编了 3 个连，一连长是胡占奎，二连长谷金海，三连长是王占元。

1931 年古历腊月初上，我们从庆阳新堡、城壕川起身，途经盘客的罗后、荏掌时还在那里宿过营，打败了赵润才民团，一支队还杀了荏掌堡子里面的 21 名群众，后来听说是强世清的陕北一支队里面的一个叫郭立本的战士带头干的事。当天晚上高岗在荏掌庙开会追查此事时，才知道郭在干了坏事后立即跑脱了。

北柴桥子改番号后，又转移到正宁的三嘉原，这时已是腊月，眼看要过年了，部队穷得叮当响，队委会决定打土豪筹备年茶食，两个支队都去打土豪。听说赵二娃在打土豪过程中太过火，抢了永和集，在双佛堂一带连一般老百姓的猪肉吊子都提来了，群众告到谢浩如跟前，谢和刘志丹商量要整顿军纪。我记得大约是腊月二十八在细咀子一个大场里开的会，天爷还下了一鸡爪子厚的雪。会议一开始，先讲话。他讲话时站在场里的一个碌碡上，事前叫部队把枪放在场边架起

来。在×××讲了一阵后，猛然提高声音说：“我们这个队伍太复杂了，有的人挂的羊头卖的狗肉。”这时，×××暗没防抱住了赵二娃，×××立即掏出了手枪打死了赵二娃。部队马上有些动乱，谷聚山质问，为什么要打人，不知是谁回答说：“他抢了人，是土匪。”谷聚山就这么一质问，当即也挨了一枪，被打死了。有个叫周毛牛的战士正要跑到场边摸枪，也被打伤了。在打倒了赵二娃以后，气氛很紧张，有的人吓呆了，有的人吓跑了，看热闹的群众满地乱跑，都不知道为什么。气氛稍为平静后，我看到刘志丹蹲在场边的一个硬辕子车的辕上，情绪很低沉，连一句话都没说，一声没吭。快天黑的时候，我有意找借口打探刘志丹的情况，找来找去，我见刘志丹和马锡五两个人住在一群众家里，马锡五蹲在炕边上，刘志丹斜身躺在炕的另一边，盒子枪还在大挎着，不知两人在低声说什么，门上也没有站岗的。从这天以后，我就好久再没见到刘志丹，只听说他把自冠五送到西安看伤去了。

王殿斌 1979 年 6 月 1 日谈陕甘边革命斗争 1930 年，刘志丹给谭世麟成军第二十六营。1931 年农历七八月，师储杰领 300 多人(有冲锋枪 40 余)来驻南梁堡子，与刘志丹的部队会合。到正宁柴桥子成立了反帝同盟军。到三嘉原开会，说不准抢人，要推翻国民党统治，成立陕甘游击队，正式打出红旗。把赵二娃枪打了，师储杰带 100 多人叛了。陕甘游击队二次上来打保安，有这么几句顺口溜：“陕甘游击队，老谢总指挥，一心上陕北。打保安，失败回，西瓜吃了个美。退在墩儿梁，敌人来撵上，撑住打一仗，两家都没伤。到了麻地台，战士没鞋穿，志丹打麻鞋。”南下到淳化、彬县、到洛河川东的墩儿梁被打散了，高岗放了 1 月羊。冬季上来驻在平定川，不久南下。1933 年在照金建立根据地，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五六月，收了王泰吉一百四五十人。秋季上来，在莲花寺整编，改为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委，刘志丹任参谋长。王世泰是三团团长，赵国卿是四团团长。九月，上到南梁堡子打白子文，白跑了，扎了两天，转到合水、宁县、正宁一带。1 月，上来在寨子湾驻 5 天，放了 3 个游击队：保安游击队队长刘约三，庆阳游击队长杨培盛，合水游击队

长张振东。庆阳游击队共 11 人，有邵凤林、邵占元、张光喜、李文元等，共 3 条枪。关中放了 4 个游击队。

黄金贵谈太白收枪 我今年 69 岁了，一直就在太白街上住。1930 年“太白收枪”中，打死的黄团头就是我老人，他没干过什么坏事。那时成立民团是为了护村保庄，为当地群众办事防土匪。但谭世麟为了扩充他在陇东的势力范围，给所有民团都安上了营的番号，一律归他管辖。谭世麟这样一搞，就把民团的性质改变了，成为反动的组织，我父亲也就因此而送了命。

刘志丹收太白的枪恐怕早就有安排。马文章(即马锡五)、李蒜客、赵副官(即赵连璧)都是提前派来搞底线的。马文章两年以前就在穆团头和保安张廷芝在太白镇合开的杂货部里当相公。他的人品很好，常和太白跟前的一些小幼谈天说地，有时也说到刘景桂其人。他说刘景桂会草上飞，一夜能跑四五百里路，将来还要来这里打富安良等等。

那次打死的人员中，除我父亲外，还有王老四和王老五弟兄两个。王老四的官号叫王凤珠，小名叫德娃，是民团内的第一连长，他的枪法很准，人也歹毒，曾经打伤过刘景桂一个骑马的侦探，收枪中又被刘景桂把他打死了。这也算是冤冤相报。王老五名叫王猛儿，他的披挂很美，打死我父亲和王凤珠后，刘景桂怕王猛儿反扑，所以他在回伙房端饭中也被刘景桂的勤务兵打死了。总之，所打死的这 3 个人，都是些老粗。副团头穆寿禄略识文墨，能看来头势，收枪的人一来，人家就看出了破绽，所以后来请他赴宴时，他总是推三推四的找借口未去。

李作栋谈麻峪整编 我父亲在世时，最讲江湖义气，也爱拉连绿林好汉。当时同大山门的李增萼(团头)、李增彦弟兄两人很相好，后来又结识了瓦岗川团头唐清山。记得民国 20 年(1931 年)刚过旧历年，刘志丹带四五百人来到固城川，分别驻在大山门和麻峪一带，当地人不明真相，以为是土匪队伍，多数都躲避了，我父亲没有躲，还同李家弟兄与刘志丹结拜了弟兄，关系很密切。听说刘志丹在麻峪进行整

编，还叫我父亲和李增萼传话给唐清山，所以唐清山也把他在瓦岗川的队伍带来了，但刘志丹只挑好的留了二三十人，剩下一半让唐带回去了，一直到当年冬里才把唐清山收为他的第四营营长。

张秀山 1984 年 1 月 10 日谈早胜事件 1931 年 4 月间，我从定西和高岗一块到了平凉，住在新编十三师特务二团的团部(团长刘宝堂)，我第一次见到刘志丹同志。在此以前，虽然我未见过志丹同志，但是对他的名字却是熟悉的，听到过他的革命事迹，对他很敬佩，能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感到很高兴。经高岗介绍我和刘志丹同志接上党的关系，才知道刘志丹同志在彬县搞兵运失败的情况。志丹同志在彬县经过杜斌丞和南汉宸营救出狱后来到平凉，经过刘宝堂引见新编十三师师长陈珪璋。陈珪璋知道刘志丹手下有人，想利用刘志丹，所以就委任刘志丹同志为十一旅的旅长。陈珪璋为什么要委任刘志丹同志为旅长呢?这是因为当时甘肃各地小军阀割据，统治陇东 14 县的陈珪璋正在四面楚歌之中。彬县驻有包头土匪出身的苏雨生的骑兵旅(原骑兵第四师，此时被杨虎城收编为旅)；张廷芝在庆阳以东也想乘机霸占陈珪璋的一部分地盘；李培霄部队也在正宁一带活动。尤其是张应坤、杨万清、毕梅轩 3 个旅开始在镇原一带进攻。这 3 个旅原属甄寿山部，1930 年杨虎城从河南返回陕西后打垮了甄寿山部队，这 3 个旅逃跑到静宁、固原一带。1931 年春，杨万清部在固原消灭了小军阀黄德贵后，杨万清、张应坤、毕梅轩就联合起来进攻陈珪璋，想占领陇东地盘。陈珪璋处在这种腹背受敌的情况下，委任刘志丹当旅长，想利用志丹收编李培霄，牵制张廷芝和苏雨生，这样，陈部就得以集中兵力在北线作战，打垮张、杨、毕等部。

土军阀陈珪璋想利用刘志丹，我们也想利用陈珪璋给我们的名义和防地，招兵买马成立我们的军队。志丹同志曾经不止一次说过：“我总要把陕北青年组成一支革命队伍”。当时十一旅旅部驻在宁县，志丹同志在宁县积极组建武装力量。他派人收编李培霄部(准备给编 1 个团)，派人到商梁一带联络赵二娃、贾生财、杨培盛等旧部；并且接待收集各地方来的同志：在平凉就有从青海回来的曹华民、傅剑寒

(都是湖北麻城县人，大革命失败后回到青海、甘肃等地活动)等同志。还有陕西、甘肃各地找刘志丹的一批同志。旅部成立后，志丹叫我当手枪队长，曹华民同志当书记官，陈鸿宾任参谋长，还有平凉人朱力凯等人也来到旅部，陈鸿宾被派回陕北活动后，朱力凯当参谋长。朱力凯家在平凉东关，他大革命时曾参加过党，这时已脱离党，但表示愿意革命，所以志丹叫他任参谋长(后来他在平凉给国民党干事了)。当时高岗在十一旅没有职务，他是陕西省委和刘志丹同志取联系的人。记得我们在盘客原活动时，高岗和我曾在一个小庙里给陕西省委写过密信报告情况。因为志丹在旅部时身边还有非党员，所以要避开在小庙里草写。密信是先公开写几句问候的话，然后在背面用白矾水写报告，对方收到信以后，用碘酒一涂字就显出来了。

1931年7月间志丹同志在组织部队时，从宁县到平凉办事后，和刘宝堂等一同从平凉到宁县早胜镇和高广仁联络。这时高广仁又叛变当土匪了，把刘宝堂和志丹及我们缴械押起来，收缴了子弹和手枪、冲锋枪，步枪未收去。高广仁原是井岳秀部驻定边县的任和亭团的军官，他活动任团哗变出来到陇东投降陈珪璋，陈珪璋委任他为十三旅旅长。但高广仁匪性成惯，又叛变为匪，他的部队到了合水县店子原，打开北掌堡，奸淫烧杀，无恶不作。在我们被裹胁押解期间，沿途亲眼看见高部把西华池的几个青年妇女用骡马驮走，这些女人哭着离开了丈夫和儿女。后来，高匪窜到宁夏，被马鸿宾消灭。

高广仁派他手下一个姓马的团长押着我们到合水县东时，被陈珪璋的蒋云台旅(第五旅)打败。为了表示我们不是和高广仁一起叛变的，在火线上，刘宝堂就喊：“特务二团枪放下”！我们把没有子弹的枪枝放下了，被蒋云台缴走。刘宝堂和我们又回到了陈珪璋的部队。但是蒋云台借口宁县失守要谋害刘志丹。实际上是因为争取收编李培霄的矛盾：蒋云台派人去收编李培霄部，李培霄知道蒋云台诡诈，不愿与他合作，要和刘志丹合作，蒋云台就妒嫉刘志丹同志。那天晚上我们驻在合水县城外的东关，刘宝堂进城见蒋云台谈早胜镇事变的经过，蒋云台对刘宝堂说宁县失守是刘志丹十一旅没有守住，要抓刘

志丹。刘宝堂回到东关，把蒋云台的阴谋告诉了刘志丹，志丹只好出走。当时我和刘景范同志也要和他一起走，志丹说人多不方便，所以他只带了一个副官王璧成冒着大雨走了(因为王璧成是哥老会，在这一带熟悉，可以得到哥老会的保护)。如果不是早胜镇事变，我们十一旅会聚集更多的革命力量，组成一支浩大的革命队伍，在适当时机打出红旗的。志丹同志回到南梁地区，就和他的旧部赵二娃、贾生财、杨培盛等组成了二三百人的一支部队，不久和晋西游击队汇合了。

志丹同志走时叫我和王世泰、曹华民、刘景范以及从彬县运输队来的一批同志跟着刘宝堂回到平凉去，就在刘宝堂部工作。我们在刘宝堂团工作时给陕西省委报告，说一连有多少党员，三连有多少党员。省委来信时把我们的支部写成营委，实际没有成立营委。当时党员有十几个人：一连有王世泰、魏长顺、张秀山、赵光亚、王庭光(后脱党给国民党当军官去了)等；三连有贺耀华、杨植凯、张效良等人。我们组成一个支部，我是支部书记，王世泰是组织委员，曹华民是宣传委员。(我先在一连当班长，后当排长)。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陕西省委派谢子长、李光明同志来平凉检查我们的工作，他们住在东关的一个小旅店，我和王世泰、曹华民同志去向他们报告工作情况，子长同志对我们作了指示。要加强抗日宣传。子长同志走时留下李光明同志，让他以商人身份活动，不久即离开平凉。这时旧军队中的军官、士兵大多数是主张抗日的，上边不讲抗日，但下级议论的都是支持马占山抗日举动。当时，国内许多报纸都在宣传马占山抗日事迹。刘宝堂部队里许多军官、士兵也都议论抗日，不满意不抵抗主义，但是也有些反动军官骂共产党。我们连一个姓刘的排长就教士兵唱反共歌，什么“共产党、日本人罪恶比天高”等等，我们共产党员不能公开斗争，只有采取在队伍里边低声唱“国民党、日本人罪恶比天高”。当时我们和士兵个别谈论时，总是议论抗日的问题。有些下级军官在操练喊口号时，把“一、二、三、四”改喊成：“打倒日本!打倒倭奴!”当然，在士兵中多数人是没有什么政治主张的。在这种形势下，我们经过积极工作，在部队中发展

了一批党员，并用结拜弟兄的方式团结了一批士兵群众。我们这样的工作方式是对的，隐蔽活动，可以保存和发展革命力量，准备在有适当机会的时候组织革命兵变。但是当时陕西省委给我们来了左倾路线的指示，要我们发动士兵要求发饷发日用品，改善生活，并在这种日常斗争的基础上组织士兵罢岗罢操，公开上街游行示威、飞行集会，扩大政治影响。我们当时没有这样做，之所以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我们当时就认识了这是左倾路线，只是觉得我们这里党员少、力量不大，如果这样做，暴露共产党员的面貌，就会被敌人杀害，毫无代价。在这年的夏天，刘耀西同志在平凉教导团当政治教官时，因他给教导团的士兵讲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就被陈珪璋抓去杀了。耀西同志是陕北佳县人，志丹同志在陕北特委工作时就和他熟悉，是个很好的同志。组建十一旅时我们常往返于宁县和平凉一带进行活动，大约是 1931 年六七月间我们从宁县到平凉去的途中，在朱力凯家里吃午饭时，得知刘耀西同志被杀害的消息。当时，我们很紧张，因为志丹同志未到平凉时，刘耀西、附宝珊同志即在陈部教导团以政治教官身份活动，贺晋年、史法直等同志由定西跑来平凉也在该团工作(公开身份当班长)，志丹同志到平凉后，耀西同志常来特务二团见志丹，如果刘耀西暴露出什么情况将对党的秘密组织造成严重损害。后来听说耀西同志牺牲得很英勇，敌人什么口供也没有问出来，我们才稍微放心一些。耀西同志被坏人告密牺牲后，附宝珊、贺晋年、史法直逃出教导团，贺到靖远活动，史法直回陕北继续工作。

1931 年秋冬，杨虎城的孙蔚如十七师和新编十三师联合打开兰州之后，1932 年旧历正月十五的晚上，孙蔚如请陈珪璋在兰州城里吃饭时杀了陈珪璋，半夜时孙部从兰州——平凉——泾川一线同时发动进攻，把陈珪璋部队消灭了。当时，我带十几个人守平凉东门，因为发的子弹很少，每人只有 10 发，子弹打完我就在城墙三角处跳下去跑了。王世泰同志在团部院外，子弹打完被缴了械，以后又在孙蔚如部下工作。在军阀混战时，被俘的士兵就又都当兵了。我到西安向陕西省委汇报工作；曹华民同志跟着刘宝堂跑出平凉和其他同志一起随着刘宝堂部队在三边继续做党的工作，在抗日战争中被国民党反动

派活埋了。后来，王世泰同志带一部分在平凉时发展的党员参加了红军陕甘游击队，其中魏长顺同志在陕甘游击队时任班长，1932 年在淳化县鞍子洼战斗中牺牲；贺耀华在红二十六军二团时当排长，1933 年南下渭华作战中牺牲。

志丹同志在陇东一带组织的兵运，是在军阀混战的极其复杂困难的条件下工作的，他坚韧不拔，机智勇敢，经过艰苦的斗争，终于在南梁地区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从此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发展到新阶段。志丹走后，我们根据他的指示，继续在平凉工作，成绩不很大，但是也锻炼出一批我党的军事干部，参加了红军。

蒋云台 1983 年 5 月 19 日谈早胜事件 1931 年刘志丹来到十三师陈珪璋部，陈给刘志丹以十一旅旅长之职。后派刘志丹到陕北去收编高广仁。大约四五月间，刘志丹去陕北路过庆阳，我(时任国民党十三师第五旅旅长)向刘建议，让他在庆阳把高广仁部的枪下了，刘不同意。刘志丹并对陈珪璋说，收编高广仁没问题，并向陈做了保证。陈珪璋部的正式黄埔(军校)学生只有刘志丹 1 个人，因此陈对刘志丹很看得起，在刘志丹没有一兵一卒的情况下给他旅长职务。高广仁驻早胜时，陈珪璋令其二旅四团团长刘宝堂带两个营归刘志丹指挥，也去驻早胜，让刘宝堂一面监视高广仁，一面保护刘志丹，以便刘志丹收编高广仁部。就在这个时候，驻彬县的苏雨生部被杨虎城打败，苏经早胜到陕北、内蒙一带。据说苏和高有关系，苏曾勾结高一起去陕北。当时我旅驻西峰，刘志丹驻早胜，他经泾川可以直接与在平凉的陈珪璋联系。高广仁的叛变大约是那年西瓜长熟的时候。高广仁缴了刘志丹、刘宝堂及两个营的枪，并把二刘抓起来准备拉到陕北去。高叛变后的第 6 天，刘宝堂部下的连长尚生耀跑了出来，渡过马莲河到西峰向我报告，我才知道高叛变了。我立即向陈珪璋打电话，报告了高广仁叛变的情况，并建议把陈珪璋直接指挥的骑兵团、镇原七旅骑兵团和我旅驻合水的骑兵团调集起来，由我率领去撵高广仁。起初陈不同意，认为高叛变已经 6 天，可能跑远了，我们连调兵追赶就得十几天，那时高也许已经逃到了陕北。我认为，虽然高叛变已经 6 天，

但仍未离开合水，正沿路打劫老百姓的堡子，我一定能截住他，况且他们是步兵，行军慢，骑兵一定能追得上。随后，陈就同意了我的建议。高部逃到(记不清是宁县还是合水的)安吉寨，把堡子打开，只留下十八九岁的一些女子驮在马上准备带走，其余的群众全杀了。陈珪璋的骑兵团和镇原七旅骑兵团来了之后，我即率他们前往合水。过了板桥、上了北原(庆阳东原)，来到合水城的最高处葫芦把，看见骆驼巷有 1000 多人的队伍，乱七八糟地由南向北走，用望远镜一看，正是高广仁的部队。我当即命令陈珪璋的骑兵团和镇原七旅骑兵团冲下原去，从侧面攻击，我旅骑兵团由团长徐建勋率领，沿合水川向骆驼巷攻击，前后约 4 小时就将高广仁部全部打散。刘志丹和刘宝堂都跑了回来，我们对叛军残兵也没有追击。当天晚上我即派人到西峰向陈珪璋报告，第 2 天 3 个骑兵团各自返回驻地。当天晚上我和刘志丹谈话时，刘说他对不起陈珪璋，不愿回平凉，就回家去了。刘宝堂仍回平凉当了团长。早胜兵变是刘宝堂的责任，刘志丹没有责任。刘宝堂不但没有监视好高广仁，没有保护好刘志丹，反而让高广仁缴了枪。

杨培盛 1985 年 8 月谈南梁游击队 1930 年，我赊了一些钱，做起了生意。在城壕川买了 200 多只羊和一些杂货，被陶老三抢去了，把我也抓去了，拉了 1 个多月时间，碰见一个叫张常治的人，和土匪是拈香弟兄，说哪是个穷鬼，赊了一点本，办了了一点货，你把他拉上咋办。就这样，东西叫他们拿去了，把我放了。我就在白马庙川一带受苦。秋季我和同守孝碰到了刘志丹，他听了我们的遭遇，对我们说：“土匪抢你们，生意做不成，如果愿意就跟我干”。我们答应了刘志丹。刘志丹并对我们说，你们就在这周围，活动些穷人，弄一些枪枝。和我一起弄生意的都是镇川堡人，也都烂干了，经过动员，都跟了我。头一回弄了 1 支枪。当时，阎家洼子赵富奎打发 1 个团丁催粮，我就跟在他后面，到一个僻静的地方，我猛的一下把他压倒，把枪夺了下来。那时，我们都住在梢林里，刘志丹白天把标语写好，黑夜里我们就下山去贴。还有一次旦八寨子有 6 个团丁拿了 6 条枪来，这些人大烟瘾犯了，刚好我们带着大烟土，就给这些人抽，到了晚上，这些人抽了大烟都睡着了，我们就把枪给提了，这样我们就有了 7 条

枪。等我们发展到 100 多人时，刘志丹就把我们组织起来，成立了南梁游击队。

雷恩俊 1979 年 7 月 24 日谈西北反帝同盟军 1931 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晋西游击队与师储杰、杨琪、肖永胜 3 股武装组织了 1 个支队，支队长师储杰、参谋长杨仲远，人都叫师大队。下编 3 个大队、1 个执法队，肖永胜、阎红彦、呼成章分任大队长，我任执法队长，共约 200 多人枪，阎红彦大队是骨干。我们与张廷芝打了几次仗，把阎红彦丢了(以后在豹子川赶上部队的)。过来到南梁，一、二大队驻在南梁堡子，三大队、执法队驻阎洼子。这时，解散了执法队，我负责三大队。我们下到太白一带转了一趟，六七天又回到阎洼子。这时谢子长来了，谢总负责。刘志丹的部队也编 1 个支队，共 100 多人，枪枝很少，赵二娃、杨培盛任大队长。过几天转移到新堡，驻了 20 多天。十一月下旬，省委派荣子卿一行四五个人带来了指示，要求部队开到旬邑、淳化、耀县一带去。部队南进途中，到盘客有个寨子当着去路不让过，部队打了这个寨子，死了二三十个人。十一月底，到了柴桥子，只驻了 2 天，开了个会，打出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的旗号。再下去，我们驻在湫头，刘志丹部驻三嘉原。

农历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谢子长在他的驻地召集反帝同盟军一支队大队长以上党员负责人开会，讨论群众纪律问题。荣子卿、杨仲远、阎红彦、白锡龄、胡廷俊、我都参加了。师储杰未参加，怕走露消息，也没有通知刘志丹参加。会上，子长说赵二娃等人违犯群众纪律，把群众的辘辘故意丢下井，晚上出去抢人，抢老百姓的东西，搞得群众害怕我们，让大家讨论怎么办？参加会的同志都说我们不能脱离群众，改造不行，要采取坚决措施。最后决定用部队开拔集合讲话机会收二支队的枪，处决赵二娃。第二天(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早上，整个部队集合在三嘉原一群众的打麦场上，子长站在这场边一个粪堆上讲话，话一毕，白锡龄就一枪打死了赵二娃，并收了二支队的枪。收二支队的枪，师储杰心里有些害怕，加上部队宣布要进行整顿，严明纪律，过去干土匪的都觉得不大自由了，就暗地里活动师叛变。正月

初三晚上，师派他侄儿来找我，说第七中队长马风银(我发展的党员，与我关系好)肚子痛，叫我去看看，我一进门，就被用 4 把盒子枪逼住下了枪。大队副程玉清也被扣押了。当时原准备把我俩及子长、红彦等都打死后再叛变，但马风银坚决反对，说：“你们不愿在这里干就走，但不能伤害 1 个人。”马的话师还是中听的。于是，这天晚上就把我和程两人押上偷偷地带上部队开到了南梁的阎洼子。到了南梁后，马劝我留下和他们一起干，我说我不当土匪，他们便把我俩放了，我就回了陕北。我们走后，听说张廷祥派了两个人收编未成，打了一仗，马风银被打死，师部受损后到西安投靠了杨虎城的孙苍浪团，师储杰放弃部队经商去了。

杨培盛 1983 年 8 月 27 日谈西北反帝同盟军 西北反帝同盟军编 2 个支队，一支队是师储杰他们那些，二支队是我们这些。二支队有 3 个大队，一大队队长赵二娃，二大队队长是我，三大队队长贾生财。贾以后去小石崖了，谷聚山代理大队长。腊月，快过年了，各队抽人去打土豪，搞年茶食，共去了二三十人。赵二娃领的人在永和抢了集，拉回来五六个毛驴。过了几天队伍要开，集合在一个场里，一支队向东，二支队向西，我和赵二娃并排站。赵二娃跟前站的阎红彦、白锡龄、强龙光等。部队站好后，×××讲话说：“赵二娃是老土匪，杨培盛是半年的土匪。一支队缴二支队的枪”，当即白锡龄开枪打死了赵二娃。谷聚山刚要反抗，不知谁从后面把谷打死了。白冠五(二大队指导员)也被打伤，子弹是从裤裆里打过去的。当时刘志丹并没有反抗，×××说要缴二支队的枪，刘志丹把枪扔给×××，×不要，又还给志丹了。我在场边树梢后面躲了一下，后又转回来。二支队从此就散伙了。师储杰带了些人投杨虎城去了。第三天，我去小石崖了。临行，谢还给了我路费，他只给干部，不给士兵。我去后一直在小石崖给人下苦，维持生活。刘志丹失败 3 次，赵二娃都跟着，赵二娃是被冤杀了。一支队也抢人，路过盘客原打开人家寨子，打死几十个人，这是咋说呢？

梁怀德 1985 年 9 月谈三嘉原事件 谢浩如、刘志丹部队民国 20

年(1931 年)腊月初五来到三嘉，先驻后坡、锦章村，刘志丹驻细嘴子张有芳(张万有)家中，谢浩如驻锦章张积发家，指挥部设锦章村。正月，有部分部队驻索络南庄子村。部队驻防期间，赵营长(赵二娃)腊月二十四日带队伍抢了永和集，主要抢了些大烟土(那时做买卖的把大烟土摆在大街上卖)和布匹，抢集的人回到黄柏峴子时，未抢集的打了几枪，回到南庄子。以后刘志丹、谢浩如知道了，在腊月二十八日以开拔为名，把部队集合在一起，把枪架起放在场边，×××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话，×手下的人把赵营长等 3 人打死了，打伤了 2 人。我们在场边看的约百人，枪一响，部队和群众都跑了。埋赵营长时，买了南庄子王自成(王保西之父)的黑油漆棺材。另一个买了武成信未油的棺材。有一个负伤的，部队叫我在东庄子派张积富、范存树、武有娃等 4 个人送到彬县水帘洞。第二年正月初七，队伍在锦章村大柳树前场里整编，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每个队员脖子上都带着红布锁锁。

武智学 1983 年 3 月谈三嘉原事件 1931 年腊月，陕甘游击队来三嘉原，驻在后坡、细嘴子、锦章等村。二十四日，赵二娃抢了永和集，二十八日早饭后，部队到南庄子开会，把枪架在一边。总指挥×××站在碌碡上讲了几句话，就开了枪，当场打死了赵二娃和另一个人，杨培盛跑了，一个姓自的队长负伤后，我们在东庄派了 4 个人送到彬县治疗，每人得了两块钱工钱。南庄子村派人送了赵二娃的家属。埋这几个人时，赵二娃用了王保西父亲的黑油漆棺材，另一个人占用了武成信家的棺材。

张积耀谈三嘉原事件民国 20 年(1931 年)腊月初五，我给父母做棺材，正给棺材上颜色，谢浩如部队来了，木匠被吓跑了。当时，赵、杨二营长驻索络村，刘志丹驻细嘴子。后来部队上把 1 个战士打死了，用了我母亲的棺材，给了我 1 头毛驴，顶了棺材价。听说赵营长也被打死了。

刘约三 1979 年 11 月 6 日谈三嘉原事件 1931 年冬，西北反帝同盟军到了三嘉原，把二支队缴了械，打死了赵二娃，清洗了 100 多

人。清洗后的二支队编了 1 个新兵连，成立陕甘游击队时，把这个新兵连分编到了 4 个大队。

1933 年红二团南下失败，我从商洛回根据地时，带西安兵工厂一些修械工人。1933 年 9 月，在照金成立了修械所，共 15 人，惠子俊是主任。同时，成立了医务所，共五六个人，都是耀县兵变过来的，陈守印是所长。根据地还成立了运输队，有 40 个骡子。还有缝衣队。

当时，照金有许多游击队：彬长游击大队，队长李光明；中宜游击队，队长邵凤龄；耀县三支队，支队长陈学鼎，政委张邦英；山水游击支队，支队长陈双印，指导员李××。李妙斋任游击队总指挥。

陈克明是西华池兵变过来的，原是马家部队的骑兵，这时任我骑兵连的班长，率 1 个班叛变了。当时，骑兵连、山水游击队驻在湫头，陈克明叛变时，打死了山水游击队长陈双印，投降了国民党，带着敌人“围剿”我照金根据地。

成立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部队在合水县莲花寺的野鸡台改编的，师长是王太吉。骑兵团团长黄子祥，参谋长是我。

1933 年农历十月初成立保安、庆阳、合水、安塞 4 县游击队。在这之前，骑兵团在荔园堡消灭了张廷芝的前哨营(3 个连、近 200 人)，打死了营长梁邦栋，缴枪六七十支。开始我们派了一个便衣队，化装成农民，有的背柴，有的赶着羊，有的装做下地干活的，同群众一道进了堡子，占领了有利地形，骑兵再一冲，里应外合，不到半小时就结束了战斗。

1934 年二三月，习仲勋等到了南梁，5 月建立了政权。

吴岱峰 1984 年 8 月 18 日、1985 年 4 月 22 日谈陕甘游击队
1932 年 2 月 12 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三嘉原成立，有四五百人。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委兼队委书记，杨仲远任参谋长。刘志丹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去了。游击队有 2 个步兵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1 月后来部队)；

警卫大队队长白锡龄，政委胡廷俊；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副队长杨琪。还有个补充队，队长吕振邦，副队长陈双印。每大队编制 1 个机枪班，9 个步兵班，1 个通讯班，约 120 人。新战士先到补充队训练，后补编给各大队。

陕甘游击队成立的第二天早晨，部队进到旬邑县职田镇，没收了保安团的枪枝。2 月 15 日，在杨坡头打败了杨虎城警卫团和彬县、淳化、旬邑 3 县民团约千余人的进攻，毙伤俘敌 300 多，缴枪 300 多。这次战斗，震动西北，国民党正规军与地方民团开始联合“围剿”游击队。2 月 21 日，游击队到耀县照金镇，收民团枪二三十支。22 日，游击队向耀县香山开进，并在香山进行短期休整。接着去衣食村，沿路有富、铜、耀 3 县民团尾随。游击队翻越桥山到陕北宜君县的焦家坪，收缴了当地民团七八十人的枪，并发动群众分了豪绅地主的粮食。游击队到宜君县西 10 余里的艾蒿洼，敌八十六师 1 个营和当地民团向我进攻，先头部队攻到总指挥部附近，谢子长总指挥命令童子班增援，打退了敌人。童子班立了战功，使游击队转危为安，谢子长在军人大会上命名童子班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少年先锋队”。农历正月下旬，游击队到黄陵县上畛子，听到陈珪璋的暂编十三师与杨虎城的十七师在陇东混战，正宁县农民抗款抗粮，于是决定奔袭正宁县城山河镇。正月下旬由上畛子出发，遇天刮黄风，尘土飞扬，土雾弥漫，山坡还有冰雪，路滑难行，赶到山河时，敌方有了准备，攻城未克。游击队撤到寺村原，驻在新庄子，开展群众工作。在党的领导下，成立了农协会，发动群众分土地。游击队在寺村原驻了 20 天，群众要求再打山河镇，拔掉敌据点，以利开展工作。队委接受群众要求。二次攻打山河时，赤卫军四五百人配合行动。步兵在围城，骑兵队在城西阻击西峰镇敌援兵，赤卫军则布置在二线。正宁县山河城城墙高，只有东西两个城门。城内兵力不详，敌人还配有迫击炮。我们围城一两天，经过几次攻坚，未能取胜，我军有伤亡(王明德、郭万芝、阎保忠 3 人牺牲)。敌内部有我们的内应，因被敌发觉暴露，加之西峰镇敌兵来援，我军遂撤出战斗。游击队组织奋勇队，由张应琪率领击溃了尾追之敌，退到盘客原。这时，省委书记杜衡来到游击队，

说游击队“游而不击，梢山主义”，因为两次未打下山河城，撤销了谢子长的总指挥职务，只是没有公开宣布。因为谢在部队威信高，怕影响部队情绪。农历三月中旬，打下了旬邑县城，当晚撤到马家堡时，杜衡把游击队分成三、五支队，调谢子长到甘肃靖远搞兵运工作去了。

游击队在寺村原驻防期间，成立了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建立了农民协会、赤卫军、儿童团、妇女等组织，配合地方打土豪、分田地、分粮食。甩围发展到东约 20 里，西至泾河畔，长达百余里。寺村原南北都是大沟，部队经常到附近村庄去宣传组织群众，参加会议，张贴传单、标语，并与赤卫军一起打过两次山河。

李志合 1984 年 5 月 20 日谈农民自发斗争 民国十八九年，由于连年遭灾，酿成年馑。那时土匪也多得很，抢人劫物，闹得不得安宁。后来，黄、韩的部队下来，摊粮派款又多又重，把老百姓给扎了。俗话说：“官逼民反”，从那时起群众为抵御贼寇，抵粮款，护宅舍，就自动组织起来了，按当地话说叫“提民团”。这条原上据我所知，有上五社民团、中五社民团、北八社民团。每个民团都有一个群众集体举荐的团头负责，上五社团头是巩世信，中五社团头是张进选，北八社团头是杜兴邦。上下原民团还有，只是听说，不十分清楚，象东三社民团，团长是邢进友等等。因为有过去红枪会的影响，提民团并不难。民团提起来后，人仍在自己家中，一旦有事，几个团头一商量，就以击鼓为号，在荀仁寺院集中。到民国 21 年(1932 年)，这些民团都还保留着。

民国 21 年前季，有一次群众把国民党正宁县府的催粮款人赶跑了，那人走时说他要回县府控告，带队伍来血洗南区，提几个人头等等。事后，群众害怕了，急忙集中民团准备应付。这大概就是第一次攻打山河的前因吧。民团虽然人多，但没有枪枝，只有矛杆子或农具，投红军是为了借助红军的势力。这次我没去，听说民团集中后，派巩世信、范西魁到北原与游击队联系。这一次民团与游击队把路走错了，没打成，第二天就陆续回来了。

赵世堂 1983 年 9 月 25 日谈农民自发斗争 民国十八九年，连年大旱，造成年馔，官府粮款繁重，土匪极多，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了对付官府催粮派款，抵御土匪骚扰，各村都先后组织了群众武装，叫做“提民团”。当时，湫头一条原就有上五社、中五社、北八社组成的 3 个民团，分别由杜兴邦、巩世信、张进选为团头。我是中五社民团里的。1932 年，正宁县催款委员“马师爷”和“董师爷”在湫头一带催粮要款，吃酒作乐，群众非常气愤，号称二疯子的赵锁，手拿鞭枷棍边追边骂，一口气把“马师爷”赶下年庄子。马、董 2 人即回县告状说南原群众反了。县府扬言要组织人马血洗南原。马、董 2 人被赶走后，一些老年人分析可能要出事，群众又害怕了。于是各民团团头商议了一下，决定击鼓集中民团来在苟仁寺准备应付情况。共集中了约二三百人。民团集中后，听说北原来了部队，为了借助部队的势力，巩世信和范西魁即去北原了解情况。巩、范去后见到了谢浩如，并将南原的情况向谢作了介绍，谢还表扬了南原群众的革命行动。当天巩和范就回到苟仁，接着部队就来了。我当时只见有 40 多匹马队。部队来后，在这里开了会，当天晚上就和群众围了一次山河城。

崔平元 1985 年 3 月 21 日谈陕甘游击队 1932 年 3 月 18 日晚，我随陕甘游击队从西坡去打山河。晚上行军向导带错了路，走到九龙畔才急转回来，19 日早晨到山河，攻城 1 日不克，当晚撤退，第二天转移到寺村原，在这里发动农民开展革命斗争，拉豪绅，成立了赤卫军、贫农团，72 村革命委员会，并准备第二次攻打山河。4 月 13 日，游击队和赤卫军千余人，围攻山河城两天，不得手，部队撤离山河驻西坡，等待战机，赤卫军返回寺村原。16 日早，敌增援山河的庆阳驻军刘明发带 1 营人马直奔西坡，至西坡坳与我交战，敌伤亡三四十人，我军乘胜追击，残敌逃入山河城。这次攻打山河，我牺牲 10 余人。16 日下午，我军撤回寺村原。4 月 20 日晚，部队离开寺村原，去攻旬邑县城。

同年 4 月 11 日，阎红彦带游击队在湫头集结，召开了军民联欢大会，欢迎西华池兵变部队。这时，游击队编为 3 个大队，500 余人，

驻在湫头、五顷原一带。7月23日，李艮到游击队任政委。李艮召集队委会开会好多天，在这期间，敌人占领了湫头、寺村原的许多村庄。8月13日，游击队攻打王郎坡敌据点。王郎坡东西北三面临沟，地势险固，有敌兵六七十人。我们在南边城墙侧搭云梯攻击，但因敌火力猛，攻不上去，扔上城的手榴弹不响，我军伤亡五六十人。8月15日晚撤离王郎坡，16日转移到三嘉原。为摆脱敌人的尾追，游击队又转移到五顷原。我们正准备休息做饭，不料马鸿逵1个骑兵团从宁县赶到五顷原，我军立即组织反击，留1个班坚守阵地，并阻击敌军，掩护大部队撤退。一、三大队撤到乏牛坡，敌人又上来了。我们利用有利地形阻击1个多小时，歼敌百余，缴枪百余支，我们也牺牲30多人，损失骡子10匹。之后，向东撤退到高凤坡，当晚又转移到三嘉原的秦曲、狼牙洼、前马原。19日天未大亮，敌人又从白沟追袭而来，我军从秦曲到狼牙洼，边打边退，撤到菜头湾山岭上，利用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敌人。这时，敌骑兵部队经雕翎关到了菜头湾，抄了我军后路。面对这危险处境，全体红军指成员奋勇冲杀，趁着升起的大雾突围而出，经粮米梁撤到了马栏。到8月24日，在马栏附近一个村子归队集中，召开军人大会，游击队只剩200余人。对省委派来的那个政委，大家非常气愤。在马栏驻了几天，就转移到耀县照金去了。

田致启谈两次攻打山河城 我是陕甘游击队队员。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是1932年3月，原定分东西路夹攻，并与山河城内敌驻军陶连长(关中人)约定内应，19日拂晓以拍手为号，开启东城门让游击队攻入，结果驻在西坡的游击队18日晚行军途中，向导因天黑迷了路，把部队带到山河城北的九龙畔，发现路走错了，即偏西向南赶到山河，时已到19日半早晨了，错过了约定攻城时间，作内应的陶连长等不敢开启城门。到了下午，游击队一士兵(山河城里人)叛变，偷爬到城墙底下，被敌用绳子吊上城。由于这个叛徒告密，致使陶连长被捕杀害，部下士兵全被缴械。这次参加攻城的有三嘉原10多个村子的民团，由张彦升带领；寺村原的民团由杜兴邦带领。他们手持大刀、长矛，都是去助威的，大部分没有去攻城，分别驻在杨巩二畔和甘柏树

一带。最后攻城失败了。

陕甘游击队进驻寺村原，总指挥部驻新庄子，警卫大队驻苟仁，一大队驻首蓆岭，二大队驻西城。部队总共七八百人。在游击队的帮助下，成立了寺村原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张进元，副主席是唐贵荣。寺村原本没有 72 村，还包括三嘉原的 10 多个村子，也有柴桥子一带的一些村子，总共 72 村。

第二次攻打山河城是 1934 年 4 月 13 日。围城期间，敌军向我游击队驻地西坡方向冲过来，在西坡坳里与我警卫大队接火，警卫大队队长白锡龄在接到指挥部的命令后，立即下令警卫大队猛烈反击，击毙敌四五十人，敌因死伤严重，即向山河城撤退。警卫大队追到山河城下，敌军一个排钻进城外东北的一个窑洞里，游击队员们利用窑洞附近涝池的地形，组织向窑洞里的敌人射击，并喊话：“把枪扔出来，缴枪不杀！”敌兵果然把枪扔出来了。警卫队战士郝金标去拾枪时，窑内敌人突然开枪，当即把郝打死了。敌乘机冲出窑洞逃入城里去了。这时已到午饭时分，我军撤退到西坡，在那里埋葬了牺牲的 12 名战士，其中有郝金标、王孝明等。

张明春 1990 年 8 月 22 日谈第一次攻打山河城 第一次围山河我参加了。在苟仁寺开会，集合了永和、湫头一带的四五百人，谢浩如部队的姬参谋带了两个兵也参加会。从苟仁出发，沿苜蓿岭子、半川，到山河西坡、蔡峪、移风、桐家圪塔一带住。第二天是二月二。第三天被谢牛部队冲散了。谢浩如部队在城东。第四天，杜团头和我到城东，在杨畔住了一晚。部队在东面转了几天来到新庄子，第三天在苟仁开大会，宣布成立赤卫军，选杜兴邦为总指挥，巩世信为副总指挥。那天枪毙了赵元亨，第二天枪毙巩德功。赵元亨在新庄子押了七八天才枪毙的。苟仁大会后，大约在三月初几，在新庄子还开过一次大会，成立革命委员会，选张进元为主席。第二次打山河我没去，记得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再没有打山河。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找了个窑窑住了几天，游击队一走就散了。

高仰月 1984 年谈第一次攻打山河城 1932 年 3 月，陕甘游击队、赤卫军第一次攻打山河时，我也作为赤卫队员参加了。记得在苟仁寺集合的有六七百人。赤卫军在杜兴邦的带领下由苟仁寺出发，经半川上到洼里圪塔，后移到张圈沟堵。是半夜出发的，到张圈沟崂已太阳一杆子高了。我们没有见游击队，后来听说游击队把路走错了，沿川进去，经湾子上山，到了西坡的新庄子。

唐中奎 1990 年 8 月 22 日谈第一次攻打山河城 民国 21 年(1932 年)，我和唐芳雄 4 个人，赶着 7 头驴从山河往职田镇贩粮，有一次从山河翻沟过来上山哩，见高麻子(高岗)带着 40 多名骑兵从苜蓿岭下山，队前打着红旗，骑兵多是陕北口音，有人问我。“是到圪塔装晌粮吗？”说着就过去了。我们见到赵元亨被绑着跟在队列里，听说赵骑了头黑驴，因为下坡不好骑，下来走着。这次把赵拉过去在北原转了几天，拉过来枪毙了。听说在永和梁庄把魏刀客从沟里拉出来杀了，把赵元亨拉去的。

王生荣 1990 年 8 月 21 日谈第一次攻打山河城 1932 年春，这条原群众两次攻打山河我都参加了。苟仁开会动员，那是第一次，去的人很多，杜指挥(兴邦)带领，从苜蓿岭下山，洼里圪塔上坡，在甘柏树、东西王阁一带。在王沟圈把肖恩多头上砍了一刀，只把头皮砍破了。因为这，王九九就跑出去了。第二天，国民党部队来把人冲散了。当时游击队在城东。10 多天以后，在新庄子开会，商量打第二次。第一次打罢山河在苟仁寺开群众会，当天在新庄子枪毙了赵元亨。巩德功因为出面作保，为赵说情，也被枪毙了。10 来天后，新庄子又开大会，车家沟的张进元(乳名同锁)当了主席，在大会上讲话来。会上还有游击队的人讲了话，我见谢浩如来，但没见刘志丹。

雷鸿轩 1985 年 1 月 9 日谈山河城攻守情况 1932 年 3 月，我任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收发主任。陕甘游击队在南原群众配合下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我曾上城目睹。据我所知，当时国民党陆军第十七师孙蔚如部与甘军暂编第十三师陈珪璋部在陇东火并，陈部溃败。陈的残部在陇东与官府勾结，乘政局混乱之机，残酷剥削压榨陇东人民，向百

姓摊派粮款极重，仅正宁一个小县，摊派多达数 10 万元。从而激起百姓的反抗。

山河镇是正宁县的统治中心，党政军机关均驻山河城内。当时陈部警卫团的刘湘林连在团副刘明发的指挥下驻防山河。刘明发和我是表兄弟，家在乎子，并在平子镇交有姘头，所以带两个排(包括部分骑兵)常驻平子镇，一般不到山河来。常驻山河的只有 1 个排，30 多人枪，由刘湘林带领。城内还有公安局警察 3 个班，每班 11 人，共 33 人枪。另有县保安队队部约 10 多人。城内常

王生荣 1990 年 8 月 21 日谈第一次攻打山河城 1932 年春，这条原群众两次攻打山河我都参加了。苟仁开会动员，那是第一次，去的人很多，杜指挥(兴邦)带领，从苜蓿岭下山，洼里圪塔上坡，在甘柏树、东西王阁一带。在王沟圈把肖恩多头上砍了一刀，只把头皮砍破了。因为这，王九九就跑出去了。第二天，国民党部队来把人冲散了。当时游击队在城东。10 多天以后，在新庄子开会，商量打第二次。第一次打罢山河在苟仁寺开群众会，当天在新庄子枪毙了赵元亨。巩德功因为出面作保，为赵说情，也被枪毙了。10 来天后，新庄子又开大会，车家沟的张进元(乳名同锁)当了主席，在大会上讲话来。会上还有游击队的人讲了话，我见谢浩如来，但没见刘志丹。

雷鸿轩 1985 年 1 月 9 日谈山河城攻守情况 1932 年 3 月，我任国民党正宁县政府收发主任。陕甘游击队在南原群众配合下第一次攻打山河城，我曾上城目睹。据我所知，当时国民党陆军第十七师孙蔚如部与甘军暂编第十三师陈珪璋部在陇东火并，陈部溃败。陈的残部在陇东与官府勾结，乘政局混乱之机，残酷剥削压榨陇东人民，向百姓摊派粮款极重，仅正宁一个小县，摊派多达数 10 万元。从而激起百姓的反抗。

山河镇是正宁县的统治中心，党政军机关均驻山河城内。当时陈部警卫团的刘湘林连在团副刘明发的指挥下驻防山河。刘明发和我是表兄弟，家在乎子，并在平子镇交有姘头，所以带两个排(包括部分

骑兵)常驻平子镇，一般不到山河来。常驻山河的只有 1 个排，30 多人枪，由刘湘林带领。城内还有公安局警察 3 个班，每班 11 人，共 33 人枪。另有县保安队队部约 10 多人。城内常驻兵力，总共不足 100 人。除此以外，陈珪璋部暂编十三师混成旅 1 个营，由谢牛率领驻防宁县早胜镇，步骑各一部分。

第一次攻打山河时，游击队、赤卫军及群众从永和原新庄子出发，下到半川。赤卫军拂晓上坡到洼里圪塔，早饭后已到山河城西 3 华里的张圈沟姥。国民党正宁县政府闻讯，立即派保安队长肖恩多出城抵御。肖见都是手持红缨枪的老百姓时，即鸣枪弹压，但赤卫军摆成弧形包围前进，保安队见势严重，沿西胡同逃回，队长肖恩多在核桃树上被围，慑迫下树交械，并将肖砍了一刀。这时，守城的警察和暂编十三师部队开始放枪，赤卫军队形即乱，从李家庄子娘娘庙胡同向西南沟边撤退。到下午 5 时左右，已无人影。守城士兵从现场抬回肖恩多，经过治疗，半月伤愈。

关于窦巡官作内应被杀的情况是这样的：1932 年朱门任国民党正宁县长，接着成立公安局，局长吴宏斌，巡官姓窦，手下有警察 3 个班，主要负责县城警卫及地方保卫工作。吴宏斌是杜斌丞的外甥，朱门认为吴不可靠，产生怀疑，意欲处理。这个消息被我听到了，我与吴关系很要好，很快告知吴，吴恐遭不测，连夜逃走。窦巡官作内应攻城，可能与吴宏斌有关系。当时我尚不知道，只听说群众第一次围城时，窦以一个地方武官的身份同刘明发部士兵守卫山河东门，下午山河城周围一些商号店铺的人都向城里拥，由于东面红军游击队攻城，县政府命令将东城门压掉，这时刘部士兵发现窦巡官胳膊上绑着红布条，刘湘林即将窦逮捕，在城里一个铺子审讯，不知审的结果怎样，第三天刘明发就将窦在城内杀害了。窦和我家是邻居，窦死后其家属给我哭诉过几次，我记得比较清楚。这次共捕了几个人，我就知道了。

李志合谈第二次攻打山河城 1932 年 3 月底，陕甘游击队在苟仁寺院召开群众大会，在新庄子枪毙了赵元亨、巩德功，以后不多几

天又组织攻打了一次山河城。这一次我也参加了，去的人很多，游击队、赤卫军，还有群众，共约千人。我们这条原上至南邑，下至西城周围赤卫军都参加了。所来的赤卫军、群众拿着土枪，矛杆子、农具等。晚上出发，游击队在谢浩如率领下从新庄子起身，沿苜蓿岭子下川，经刘家沟、张家坪、刘家店子上山到路家崖窑；赤卫军在杜兴邦带领下沿解家川、石家湾子上原到杨巩二畔，我当时跟的是巩世信。我们赤卫军、群众就往在杨巩二畔，游击队到县城附近，隐蔽在域东边为财神爷庙周围。第一天打了一天，第二天打了多半天吊枪，到下午敌人马队上来了，在西坡坳及杨巩二畔汀了一仗，把敌人赶回山河城去了，至此也再没围城，晚上部队和我们都撤下川了。这一次赤卫军实际主要是壮营哩。部队当晚回到了新庄子，我们下到川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才回来的。实际上赤卫军多半是第二天天亮后继续回来的，群众和部分赤卫军队员也就从川里自行回家了。

李维钧同志 1985 年 5 月 29 日谈第二次攻打山河城 1932 年 4 月 13 日，陕甘游击队第二次攻打山河城。刘志丹带部队在山河城东原，阎红彦带部队在山河城西原，从东西两面夹攻山河驻敌谢牛部队。我军共有 600 人，编为 2 个步兵大队，1 个警卫队和骑兵团，少先队也分编了。当时我在二大队一中队任副班长。

我们部队这次攻打山河城，开始从东、北、西 3 面以老百姓房屋为掩护进到城下，因为城墙高，云梯无法搭，先把牛车拉的放到城墙底下，车箱内装满土，然后架起云梯攻城。敌人在城上打冷枪，把手榴弹两个一捆往下扔，造成我军严重伤亡。仅我知道的就有十二三人牺牲。围攻 3 天未克，加上驻早胜谢牛部援兵已到山河，于是我军在第三天下午撤驻山河城东 20 里的西坡一带。第四天上午，谢牛部队从山河出动，步骑 300 余人，配有机枪大炮，向我军驻地猛攻而来。这时，配合攻城的赤卫军已于前一天撤散。我游击队给敌以猛烈反击，骑兵在前冲击，步兵迂回两侧夹攻，敌仓惶向山河城内逃跑，被我俘获二三十人枪。这次战斗，我游击队战士郝金标牺牲。当时，敌有 1 个排在我军追击下钻进城东北的一个窑洞里，把 2 支枪从窑洞扔到院

子里，表示愿意投降，郝金标从伏击的涝池边站起来去拾那2支枪，被窑洞里的敌人开枪打死了。这股顽敌趁机一轰而出，逃入城内。这天下午，我军全部撤出阵地。

游击队在驻寺村原期间，宣传群众，组织赤卫军、贫农团，并建立了72村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张进元。还在寺村原打土豪，分配财产。后来，部队撤离了，革命委员会就解散了。

李彦清谈第二次攻打山河城、五顷原失败 我和袁长太两人去打柴，走到解家川，听说红军打富济贫，对穷人好，我们就跟在过路的部队后面看。到了新庄子，部队驻下了，我们两个就参加了游击队。我被编到二大队少先队，队长是郭德海，彬县人。我们驻在新庄子村，其他队也都驻在这周围。部队在寺村原驻防期间，在赤卫军配合下打过一次山河城，是农历三月，具体日子记不清了。赤卫军总指挥是杜兴邦，副总指挥巩世信，游击队和赤卫军都在山河城东。一天下午，谢牛部队冲上来了，到西坡以杨、巩二畔，同游击队打了一仗，游击队把敌人赶下去了。这次游击队牺牲了几个人，就埋在西坡庙院地里。晚上，游击队陆续返回寺村原。

1932年农历六月初二，陕甘游击队在总指挥阎红彦的带领下，经柴桥子、龙嘴子过来到南邑驻了10多天。游击队有个李代表，听说是从西安来的，大高个，主持部队整天开会，黄子文在会上还讲过活。会后游击队攻打过王郎坡寨子。当时游击队编为一、二、三3个大队和1个骑兵团，我在三大队，大队长是高鹏飞，班长是王世泰。打王郎坡是阎红彦指挥。阎在普义沟用望远镜观察后，命令部队冲锋，骑兵团在前。步兵随后。游击队冲上去后，敌人一部分向沟里撤退，一部分钻进寨子。这是个土围子。三面临沟，一面有路，敌人凭借险要地形。用密集火力向游击队扫射，寨子未能攻下来，子弹从高鹏飞腿部穿过，打进了马肚子，人马俱伤。三大队还有几个人负伤，其他大队伤亡情况我不清楚。打了王郎坡，游击队回兵驻在岷子一带。在此期间，国民党部队驻山河的晁团和李贵清部队组织“圈剿”游击队被迫撤到三嘉原。敌人又追到三嘉原，从南庄子、细嘴子包围上来，游

击队边打边退。在敌步兵进攻的同时，骑兵也从刘家店子截断了游击队的退路。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我们奋力拼杀，仍不能冲破包围。正当危急之时，沟岭上梁上迷雾骤起，几步之外，什么都看不清楚，我们正好借助迷雾突围而出。如果鞋不是天时地利，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尽管这样，游击队的伤亡仍很惨重，骑兵大队的袁志朋(旬邑土桥人)阵亡。战斗结束后收军时，骑兵队长强龙光和其弟强世清等同志不知去向，大家都很痛心。过了几天，强龙光、强世清等出乎意料地回来了，还收缴了敌人的几匹马，大家非常高兴。部队到了马栏，李代表召集部队开会，在士气低落的情况下，提出分成二三十人一股分散活动，这一错误主张受到大家的一致反对，李代表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离开了部对。

李志合 1984 年 5 月 22 日、1990 年 8 月 22 日谈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第一次围攻山河失利后，部队第二天陆续来到新庄子。以民团为基础，常和部队负责人接头的是杜兴邦、巩世信、张进选 3 个团头。当时，民团与部队联络主要是想借助部队的势力抗粮抗款，部队就利用这个条件落脚到新庄子了。所以，部队到这里后就派人到周围各村活动，分头做群众工作。不久，就将民团改为赤卫军，并成立了寺村原赤卫军总指挥部。杜兴邦任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号称张聋子)任副总指挥。过了不长时间，就筹备成立寺村原革命委员会。当时寻主席费了大事，那时对成份提得严的很，把上下原的穷苦人大都摸遍了，要找一个最穷的人。结果摸到了车家沟的张进元。这人的确穷的很，弟兄、父子常年给人拉长工，一家光棍。可是这人胆子大，嘴头能说，大小场合他不怯，因此就摸准了他。另一个是西城的唐贵荣，是个中农，非常老实。3 月下旬的一天，在新庄子山神庙场里开大会，有五六百人，都是周围村上的群众。会上谢浩如先讲话，大概内容是宣传革命道理的。讲完后接着选主席，群众没人说话，后来谢在台上提出叫张进元当主席，唐贵荣当副主席，群众齐声同意。选毕，张进元上台讲话，很土气，声音很大，说了几句把人都惹笑了。寺村原革命委员会成立后驻西洼张进友家，每晚还有五六个赤卫队员拿着矛杆子站岗。张进元、唐贵荣都不识字。当时我已小学毕业在家没事

干。张进元是我家邻居，他就把我叫去给他看上面来的条子，晚上写标语等等，实际上是给办文书工作。我去后一直和他们在一起，这个革命委员会只有正、副主席，再没有什么下设的组织。

革命委员会成立后，不到 20 天，听说谢牛部队到了彬县，陕甘游击队连夜就撤走了。我们都不知道，游击队撤离后，张进元、唐贵荣都跑了，工作也就瘫痪了。原先，游击队给张进元的 1 匹马也未带走，在沟里藏了几天，以后拉到耀县，交给了游击队。

张寓春、张福来、张玉杰 1985 年 4 月 10 日谈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1932 年 3 月，一天早饭后，红军陕甘游击队来到新庄子，群众都跑去看热闹。部队约摸有百十人，其中骑兵四五十个，少先队都是十五六岁的娃娃，背着马拐枪。当时新庄子有 20 多户人家，部队来后，群众就给部队腾房屋。谢浩如、刘志丹、杨参谋住在张进德家里，骑兵由高岗带领住苜蓿岭。部队在张治发家安着机器，修理枪炮。每天傍晚，有装做讨饭的，收皮张的、担货郎担的，从四面八方来到总指挥部，听说他们都是化装搞情报的。游击队驻新庄子时，借用群众东西自己起灶，用后归还群众，并打扫院落，部队在新庄子驻扎月余，新庄子沟一直是迷雾笼罩。

第一次在新庄子山神庙旁边的场里开会，参加约千人，选举成立寺村原赤卫军总指挥部；第二次又在新庄子开会，参加约千二三百人，成立寺村原革命委员会。赤卫军总指挥部和革命委员会都设在新庄子张玉述家。赤卫军总指挥杜兴邦，副总指挥巩世信、张进选。革命委员会主席张进元，副主席唐贵荣。

各村都成立了赤卫军和贫农团。新庄子赤卫军队长张六娃，有队员 20 多人，贫农团长张广辉。贫农团发动群众分了新庄子、于家庄大豪绅刘西昆、赵元亨的土地、粮食、牛羊等财产，并在新庄子关门口枪毙了赵元亨、巩德功和南邑一个豪绅。两次围攻山河城，新庄子参加的各有 20 多人，由张福来带领，第一次张玉春左臂曾中弹受伤。

郭德林 1985 年 4 月 6 日谈寺村原游击根据地 第一次攻打山河我

参加过，湫头这个_村子去 30 多人，出村民团头屈喜福带领。湫头和王郎城名团百余人编在一起。整个寺村原各村社民团共约五六百人，在一天的后半夜集中于苟仁寺开会，游击队上来的一个人讲了话，大意是说国民党正宁当局欺压百姓，大家要组织起来开展斗争。要在杜兴邦指挥下，从山河城西包围县城，游击队在城东攻打。全后，我们民团群众在杜兴邦率领下从苟仁出发，早晨就到了山河城西。这次攻打山河回来，游击队先把各村社的民团改编成赤卫军，并成立了寺村原赤卫军总指挥部，总指挥杜兴邦，副总指挥巩世信。不久，又成立了寺村原 72 村革命委员会，主席张进元，副主席唐贵荣。赤卫军各村设有队长，凡愿意搞革命的都参加。湫头村队长是郭云升，队员有四五十人。赤卫军的任务主要是配合红军游击队打土豪。我也参加了赤卫军，跟着游击队去北川拉过豪绅彭辛家的驴，去王郎坡拉过豪绅家的骡子等。当时还组织了贫农团，由最穷的农民参加，村里设有正副团长。湫头村贫农团有 30 多人，团长是屈喜福和王立成。贫农团的任务是给红军游击队筹备粮草，安排食宿，通知开会等。

代云成 1990 年 8 月 22 日谈寺村原革命委员会 1932 年红军来这里活动时，我当过先锋队长。新庄子开大会，我没到。大概是枪毙赵元亨 10 多天后的事。成立后还打过山河。记得革命委员会成立时选唐贵荣当副主席，第二次打山河时，唐说锣和沙毡能挡枪子儿，动员大家。成立革命委员会前，唐不管这些事。

秦善玉 1990 年 3 月 18 日谈话 民国 21 年(1932 年)我 18 岁，农历二月初二那天，我被陕甘游击队以土豪拉了票子，因为我父亲秦慎德当过绅士。那时游击队总指挥是谢浩如。开始把我拉到新庄子，后到上南坡头，以后经苜蓿岭到西坡的党峪岷，说是围山河城哩，以后又拉回新庄子，这前后不过 10 天。赵元亨也拉来与我押在一起。过了几天，约二月二十前后，枪毙了赵元亨，把我也拉上去了，并脱光了衣服。我结婚不久，腰里扎了个红布腰带，被群众撕成络络，给娃娃拴了锁锁，说是逼邪。但没有毙我，又把我押下。以后听我舅(张西海父)说，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我在一起押的还有南原(旬邑)的马

作珍，1个姓吕的，苜蓿岭1个姓袁的老汉。造3个人杀到焦家坪了。杀这3人时，宣布把我放了，但我不敢回家，一直跟部队走，后来到了柴桥子，我才跑回家，刚好是五月端午。我回来对，总指挥是刘志丹了。我家为了赎我，共花了700多自元，听说部队只见到500来元。

吴岱峰 1983年5月20日谈陕甘游击队吉子峴、英旺战斗 农历三月半，省委来信说，西安有个“剿共总指挥部”，调动了几个团的兵力，经彬县、淳化、旬邑向我进攻，旬邑、正宁民团配合在北边堵截。省委指示两个支队汇合起来。5月15日，三、五支队分别回到清水原。刘志丹担任总指挥。汇合后，决定北上。游击队经阳坡头、刘家店，在马栏把井岳秀两个连打垮；在焦家坪收了民团的枪；继续东进到五里镇，收了300多民团的枪，抓了土豪杨百万，发动群众分了他的粮；又到白水窑禾镇，民团跑了，发动群众分了粮，后经大石板撒至黄陵隆坊镇。这时，部队发展到近千人。当地群众报告说：吉子峴粮多，但都在地主手里，穷人很苦。我们决定去那里打土豪分粮食。我们从清水原出发时，杨虎城部孙友仁的特务团1000多人一直跟在后边。我们在吉子峴分粮时，他们的一些人化装成便衣队，混在群众中。我们警惕性不高，没能识别。分完粮，部队集合准备走，敌人向我密集处开枪，我们赶忙应战。孙友仁的大部队从南面压过来，我骑兵压下。敌人又用迫击炮掩护冲锋，北面八十六师1个营配合地方民团冲上来。从下午1点一直打到黄昏，我五支队侯奉孝大队100多人被消灭了，其余人沿洛河撤到交道原。部队刚过河，洪水下来，把敌人挡住了。我们东进至牛武镇。这时宜川来了群众，报告说宜川开来了陈卓武的1个工兵营，正在英旺挖工事。参谋长杨重远详细地了解了地形、路线，派中队长王虎城带1个游击队连夜赶到临镇东山上，控制了制高点，刘志丹率部队向英旺进军，第二天一早，接近英旺，两边夹击敌人，把敌人1个营消灭了。这是农历四月二十日左右的事了，部队休整后，攻打临镇。五支队，骑兵队由东川向临镇进攻，从早晨打到中午12点，没攻下。敌人一个反攻，把李维钧带的1个中队赶到沟里。当时高岗是二大队政委兼队长(我有病，在总指挥部住)，任务是占领临镇东面的山寨，伺机反攻。敌人火力转向东山，

高岗即带两个中队向北跑，钻了山。其他部队只得撤出战斗。

部队向东撤到宜川集义镇，与地方党取得联系，休整了几天，过了端午节，并开展了分粮等活动。又沿黄河走了3天，到韩城以东的西庄。

吴岱峰 1985年8月1日谈麻子枣、梁掌堡会议 红军陕甘游击队在韩城县境作战失利的情况下，当时一些人思想上产生了动摇情绪，农历五月下旬游击队返回到陇东宁县麻子掌时，部队剩下200多人，大部分是党团员骨干。即召开队委(党委)会，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政委李杰夫、队委委员杨森等提出意见，这样长期行军作战得不到休息，怎能受得了!要把部队拉到三原县新武字区，采取“昼伏夜出”打游击。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仲远等多数同志指出，新武字区是平原地区，离三原县城近，东有高陵，西接淳化，都驻有敌人，三面受敌，离敌人统治中心近，平原人马不易隐蔽。并说那里也能去活动，新武字区打伏击战，是死路一条。又说北上桥山中段南梁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地区辽阔，回旋余地大，东去陕北，西进陇东，便于开展游击。同时又能扩大骑兵，利于步骑配合作战。两种意见争论不休，政治部主任黄子文又提出愿意南下者南下，愿意北上者北上，队委作了这样的决定。中午在大树下召开的军人大会上，刘志丹同志让我讲话，我说“不同意分散游击”，但黄子文等不顾大家的反对，非分不可，在分开时，南下的六七十人站出去了，愿北上的130多人站着没有动，阎润平等人手里提着枪，为了争人争枪争马几乎火并，部队分开后各驻一村，准备各自行动。

在韩城香山时，队委会决定由阎红彦、杨琪率少先队百余人，深入黄龙山区，开展游击，建立根据地，作为后方向外发展。阎、杨2同志率队进入山区到石铺一带发动群众开展工作，宣传党的政策，扩大部队。正在这时，听到百姓说，总指挥刘志丹率部队西进回陇东的消息。因此，阎、杨即率部队赶回陇东到宁县麻子掌南原时，听百姓传说，红军闹不团结，部队分开了。他们听到十分震惊，这时阎红彦立即给总指挥刘志丹、政委李杰夫写信报告我们回来了。这时南北双

方都派人去说服阎红彦、杨琪，争取到各自一边。政治部主任黄子文、政委李杰夫 2 人，亲自见阎红彦，没等他们把话说完，阎红彦直接了当的指责黄子文说：“你这样做，是分裂共产党，瓦解红军，是革命历史上的罪人”。又批评李杰夫说：“你是省委派来的党代表，又是游击队的政委，把这个问题不能适当处理，如果把部队分开搞垮了，看你向省委怎样交待？”当时李、黄 2 人面红耳赤，哑口无言。他又说。“我主张那里也不去，就地游击，建议双方人员都不要走，明天开会讨论讨论。”

第二天部队到梁掌集合，队委召开扩大的队委会，阎红彦讲了部队不能分开的道理，参加会议的同志听后，一致认为阎红彦同志党性强，觉悟高，站得高，看得远。在这关键时刻，挽救了部队，避免了分裂，有功。同志们一致推选阎红彦同志担任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政委李杰夫借口向省委汇报，即离开部队回西安去了。

阎红彦到梁掌堡，见了志丹同志，痛心地说，你是总指挥，不同意把部队分开，他黄子文有什么办法。

刘景范 1985 年 4 月 13 日谈麻子掌、梁掌堡会议 陕甘游击队 1932 年在宁县麻子掌开会是有，我没有参加。当时我在保安，以后听人说的。1932 年刘志丹在陕甘边打了一圈子胜仗，到了宜川北原，省委下命令要刘志丹同志到韩城去，支援地下工作人员的暴动，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那时省委是执行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他们要在平原搞，在县城搞，我们在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就扣大帽子，什么“梢山主义”、“右倾路线”等等。打韩城本身就是错误的。刘志丹到了韩城，才知道地下力量不是那么好，在什么地方打了一仗(地名现在记不起来了)。部队遭受损失，韩城站不住脚，又撤回来了。撤到宁县麻子掌时，部队思想比较混乱，有人提出要南下，有人提出要北上，刘志丹主张以桥山为依托，就地开展游击战争。桥山是老游击区了，刘志丹的意见明显看来是正确的。当时要下三原，要回陕北的意见是谁提出来的，这要查一查，查出来还要研究，现在知道这件事的人可能没有了。有个材料说是黄子文提出来的，黄子文是三原

入，提出来南下有可能。黄子文这个人是讲实际的，当时他提的一些意见。现在看来是比较正确的，他不可能结把子、搞分裂的事。以后有人说黄子文的坏话，实际上黄子文是个诚实人，讲实际的人。当时部队陕北人不少，有些陕北人提出回陕北。南下、北上的意见，究竟是谁提出来的？要研究。意见分歧，思想混乱，这是主要的。最后会议取得了就地开展游击，伺机向三原、陕北发展的结论，也是容易一致的。因为那时部队打了多次仗，跑了很多路，人也少了？需要补充、休整，就地搞游击，扩大力量。也是能够接受的，梁掌堡会议容易成功的原因也在这里。

师建章谈麻子掌会议 陕甘游击队撤离韩城以后，到了麻子掌，在个出坡上开会，有人吵着要向南，有人要求北上。有个干部名叫吕子成(旬邑人)。他说：“还是不分开好！”刘志丹就站起来给大家讲话：“革命是长期的、曲折的。不要因为打了一两次败仗就闹情绪，我们还是应当行动一致，开到山区去整顿。以准备再战”。这时已把大家说服了，意见统一了。之后阎红彦才松松散散的来了。后来，我听说，阎红彦讲有个南北分家，是他解决的。我很生气。那时我才十五六岁，记得最清楚，我常给指挥部办些零碎事，刘志丹他们说什么话我都听见了。

苏继儒 1984 年 9 月 20 日谈攻打保安县城 1932 年，我和杨林受谢子长、刘志丹的指示，带上高廷飞(党员)连的人提了敌高玉廷营部和二连的枪，这大约是农历七月的事。不久，我们在盘克原仁庄堡子和陕甘游击队参谋长杨重远带的人汇合了。过了几天，刘志丹从南面游击回来，把我们起义的两个连重新进行了整编。这时，陕甘游击队总共有 500 多人。因游击队的力量增大，敌人也比较注意我们，我们常常遭敌人围打。

记得在马栏时，省委派来代表要我们南下，刘志丹不同意。1932 年七月底八月初，我们到太白，在此休息了两天，又到平定川住了几天。就在这时，刘志丹、谢子长(部队在马栏时他来到部队)决定攻打保安县城，目的是想搞一些枪和子弹。当时这个决定没有给部队所有

战士传达，只是说北上。八月初十，我们从平定川动身，沿贺老庄、桃庄湾、孙岔等地，走了两天两夜到了保安县城的附近。到了小石山上时，天已大亮了，我们开始攻城。冲下去的有强龙光带的骑兵大队，我带的三大队二中队和少年先锋队的一部分。我们到街上后，敌八十六师高玉廷营的机枪打得我们不能前进。正在激战时，通讯员传达命令让往山上撤。我正考虑该怎样从周围不利的地形中撤出去，天上下来大雾。乘着云雾敌人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撤了上去。

这次战斗，我们牺牲了1人，负伤2人，掉队1人。晚上部队走到顺宁川的保湾沟门，在这儿开了会，总结了这次战斗，研究了以后的工作。第二天从保湾沟门动身，过了河到了保安县城的西岭，后又退到墩湾。在墩湾，刘志丹决定再打一仗。天快黑了，战斗开始，此战双方互有伤亡。晚上到黑水寺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把牺牲的同志埋了后，部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刘志丹同志带着向东游击，一部分留当地游击。

王志善 1984年9月谈陕甘游击队攻打保安县城 1932年我在高玉廷营部当通讯员。我记得刘志丹农历八月十二日早上打的保安县城。高玉廷营长头一天带1连人去二区(杏河川)，他派出去的探子侦察到刘志丹要打保安城并报告了他，所以高玉廷当天又返回来了。刘志丹他们不知道这个情况，只知道高玉廷去二区了。

攻城在吃早饭时。游击队兵分两路，一路由刘志丹带着从诚隍庙沟下来攻后街，一路由谢子长带着从小石山下来攻前街。攻前街的游击队和我们一接头，看我们的火力和势头不对，就往山上退，我们进行反击。正在双方打得厉害时，晴朗的天上下来一片大雾，什么也看不见，我们只好等雾散了再打。雾散后，游击队退到了张家湾。这次战斗，因我们事先知道了要打城，所以有准备，当场打死1名游击队员，打伤的1名被抬回后也因伤重而死。

当时高玉廷营有3个连，五连连长叫李韩方，七连连长叫魏士金，六连连长记不起，全营共有300多人。来打我们的游击队有二三百人，

他们当时还有骑兵，从川里来，走到杨庄科听见步兵退了，没有上来。这次战斗我们伤 1 人。

宋飞 1986 年 11 月 3 日谈保安、张洪镇、城壕沟口战斗 我是 1932 年 7 月参加陕甘游击队。9 月，谢子长率我们去打保安，洛河涨水把我们挡住了，没有按时到达，保安没有打下来，我的中队长也牺牲了。返回来，游击队被分作三部分，一路在保安、安塞这一带，一路在照金一带，我们这一路由杨森带着到耀县、淳化、三原去，不几天被雷天益民团打散了，不好活动，在我们班长家住了两三天，每人发给我们 10 块钱，叫我们回去活动，叫我到旬邑县民团上去搞兵变。我先在何高侯的特务连搞了两三个月，失败了，枪被收了。地下党组织又把我派到张洪镇民团。我们这个民团被红军打散了，两个队长和 1 个教官被打死了。杨森叫我带路去打张洪镇，抓住了国民党县长。这次战斗，缴获甚多，武器、弹药、钢洋，驮了 25 驮。同到薛家寨，正式宣布红四团改为骑兵团，我在张洪镇战斗立了功，叫我到骑兵团一班当班长，我骑一匹黄骠马，骑兵团一连有马，是骑兵，李志伯任连长；二连是步兵，连长高占胜；还有个少先队。团长黄子祥，政委是杨森。

1933 年 11 月，红军骑兵团在城壕收了一个地主的武装，缴了几支枪，我们用地主的豌豆喂马，战士们正在吃饭，敌人大部队来了，战士们骑上马就跑，结果因为马吃豌豆太多了，胀死了 4 匹马。

1933 年 10 月中旬，打罢含水以后，骑兵团(张洪镇战斗以后，在薛家寨由红四团改编)到城壕川游击。这时，国民党派正规军、民团军围剿我们。有一天，谭世麟的民团军在城壕川口的台上正在吃饭(派老百姓给送的饭)。杨森政委率我们前卫班(我任班长)到了川口，突然发现敌人。我请示杨森，杨说：“冲”！。我们 12 个骑兵一下子冲进了敌群，敌人慌忙丢下碗筷就往北山上爬。我们追敌到原上，敌见我们人少，又返回来把我们压了下来。到了半坡，我们的大队到了，又返回去追敌，再一次把敌人追到原上，敌人从西边山坡上跑下去了。谭世麟丢下乘马徒步逃跑了，马被我们抓住了。这老家伙在马身上驮

着栽绒毯、洋烟打、烟盒子，还有个合枕头。这次只把敌人冲垮了，但缴的枪不多，只有几条枪。

赵有麟谈陕甘游击队在黑木原集结 民国 21 年(1932 年)冬季，刘志丹和高岗带领队伍在我们这一带活动。大部分人员住在拓儿原东面山里段家庄、拉猪山。那里山场大、僻静、安全，一遇到敌人，几道小川里都能隐蔽、撤退。队伍和我们老百姓相处得很好，我们常给他们送粮送草。刘志丹和高岗还在这一带打了许多土豪，有固城川的杨四娃，瓦岗川的吴茂森，还有我们庄里高家财东。没收来的财物大部分分给了当地穷人，部队只拿走了一少部分。快到过年的时候，从关中又上来了许多步兵和马队，都归刘志丹管辖。谢浩如也来过。眼看要过年了，他们就全部向南撤走了，当地人留不住他们，就恋恋不舍地把他们送走了。

高占胜谈合水战斗 打合水县城，从黑木原抬着 6 个梯子去的。编了 3 个组； 1 个组是把城门的锁子打开，另两个组打东门、北门(葫芦把)。上城的时候决定我打东门，上去后往东城门楼走，接近了哨兵，他问：“谁？”我说：“查哨的”。走到他跟前，他哇的一声就跑，我们就追，追到楼子前，一脚踢进去，门是用席子做的，进去就打了两枪，我们的人却在外面往里扔炸弹，把我的头碰了一下，我就伏在角落里，不一会我们就收了他们的枪。此仗，全城都打开了，敌人只跑了几个，就是葫芦把上的敌人跑了，其余全部俘获，并把县政府也烧了。

陶继尧 1984 年 10 月谈合水战斗 1933 年冬，刘志丹带领红军攻打老合水，那时我还在城关中山小学上学，打完仗，国民党合水县的公安局长起义投诚了，县长康林跑了，红军临走时拉去了 13 个人，有个姓李的盐税局长，是陕西蒲城人。还有教育局长杜家传，人称“杜老爷”，是前清贡生。还有县长康林的哥哥和小学教员赵学鼎、红笔师爷余含章、杜老爷的孙子杜儒刚等，我也被糊里糊涂的卷去了。红军在往包家寨子方向撤时，对拉去的人审查一个放一个，最后只剩杜老爷、余含章、赵学鼎和盐税局长 4 个人没有放。余含章第二天早晨

被当地派去的人到包家寨子保释，赵学鼎被红军留下当了兵。因为赵有知识，眼光远，红军想用他的才，他本人也想当红军，听说那个盐税局长被拉到包家寨子后，当天晚上队伍宿营时就枪毙了。因为那时候红军最恨的就是土豪，作恶多端的比团团头和国民党收税的。这3种人凡是被红军抓住的，十有八九都枪毙了。杜老爷当时年龄已经很大了，红军主要是想让他家里人用钱赎，给部队搞军费。

赵有麟 1985 年 2 月谈合水战斗 1933 年红军攻打合水县城时，天气已经快冷了。红军早晨从盘克武洛来我庄，天还下着零星雨。来时就抬着 1 架云梯，在我们庄里又绑了两架。在庄里住时，封锁消息，不让村里人外出，也不让外人进庄。刘志丹还给我村王、高两家断了 1 案官司，打了高攀挂家的土豪。打合水是晚上人睡定部队走的，第三天又经过我树。听说这一仗打得很漂亮，在县城拉了杜老爷，翻固城川朝盘克去了。

张策 1984 年 3 月 18 日谈毛家沟门战斗 1933 年秋季，红二十六军在这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我记得我们从二将川过来，第一仗打了城壕川。当天黄昏时候，部队来了个急行军，大约到晚上三四点钟，偷袭了州铺，国民党地方民团逃跑了，没有完全消灭敌人。我们打开天主教堂，拉了两个洋人，杨森同志受了伤，我们抬着转移到毛沟门宿营。当时，并不知道杨子恒部队赵文治团的

情况，刘志丹把枪都拆了。早晨，部队准备集合动身，结果敌人来了，刘志丹急忙包好枪就指挥战斗。我们把敌人打跑了，正在追击，敌人的后续部队来了，我们改变主意，不追了。但敌人拼命追我们，我们又组织反击，把敌人打垮了，缴获好多枪支弹药，但质量都不好，多被我们扔进河里了。这一趟，两天打了 3 仗，可以说是一个战役。

量兴旺 1979 年 6 月 3 日谈红军的几次战斗 1933 年秋季，刘志丹率红军部队在庆阳卅里铺拉了外国神甫，敌赵团 1000 多人跟踪追击，到毛沟门，被红军击溃。这次战斗中，当地群众李玉英被打死。

从此，红军声威大振。

1931 年春，红军部队在刘志丹率领下，由三道川南下，在高桥拉了高明出，到先寨子消灭了谭部 1 个芝，打死了连长郭某，接着又消灭了张勤芳的部队。

1935 年春，高岗率骑兵团在五蛟城壕消灭了谭部李含英营，俘敌五六十人，缴枪七八支，马七八匹。

黄罗斌谈莲花寺整编 根据刘志丹同志建议，1933 年 11 月，部队打下合水县城后，乘胜开到莲花寺。在这里，正式恢复了红二十六军，下属四十二师。王太吉同志任师长不久，便去做兵运工作。接着，刘志丹同志任师长，张秀山同志任政委。王太吉同志在耀县发动起义后的部队抗日义勇军和张邦英同志领导的耀县游击支队等编为红三团，原渭北游击队组编的红四团改为骑兵团。红二十六军恢复后，在刘志丹同志的统一指挥下……接连打了许多胜仗，扩大了红军，革命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

杨积章 1979 年 8 月 3 日谈红四十二师的几次战斗 1933 年春季，红四团在柔远大沟门全歼谭世麟部田树图民团，俘敌二三十人，一部分逃跑，枪毙了 1 个收税的姓夏。

1934 年秋季，刘志丹指挥红军部队及保安、庆阳、合水游击队攻打楼坊坪驻敌张廷芝部，因骑兵部队未布置好而失利，骑兵团长赵国卿负伤，杨凯被俘。战后部队撤至紫坊畔西的黑老虎塌洼，刘志丹讲了话，承担了指挥不当的责任，给参加战斗的红军战士、游击队员每人发了 1 个银元。

1935 年春，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庆阳游击队攻打驻五蛟魏家疙瘩的谭部崔凤阁连，围攻五六天，全歼该敌，俘敌 100 余人，缴枪 80 余支，只逃跑了 5 个敌兵。

1935 年春，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庆阳游击队在黄家大原与宁马部队 1 个营作战，俘敌 1 人，毙伤不详，阻滞了敌对根据地的

进攻，我军牺牲 6 人，黄德胜负伤。郭宝珊作战勇敢，浑身血污。

1935 年 2 月，红二团在打扮吴家害子与宁马部队作战 1 次。

1934 年 11，庆阳游击队在赤卫军的配合下，攻打驻悦乐的崔凤阁连，未能歼敌。1935 年春，庆阳游击队攻打驻悦乐堡子的谭振武连，未能攻克。经多次骚扰，驻敌弃寨逃窜。

邵维汉 1984 年 8 月谈西华池战斗 刘志丹部队 1934 年打西华池的具体时间是农历二月十九日二十日是西华池庙会，因打仗，第二天的庙会没过成。

高占胜谈西华池战斗 西华池战斗，我的伤刚好。当时，骑兵还没有编二连，司令部住在西华池城里，我们在城外沟畔窑里驻，一发现敌人就拉着马往城跟前跑，到城附近，刘志丹说：你们游击队(二路游击队，指挥杨琪，政委高岗)的骑兵冲他一下吧!我就带着 20 几名骑兵冲了上去。敌人喊：快打!骑兵上来了。敌人打枪，我们稍停了一下，又打了几枪，我们就往上冲，2 个班冲上去，打了一阵，大队骑兵都从东面沟里上来了，全都上去了。敌人共来了 2 个营，1 个团部，1 个机炮连，如同掀倒了一堵墙一样，把敌人一下子赶下沟里去了，全部歼灭。共缴获短枪 20 余支，长枪四五百支，马 6 匹。这次战斗，我红军牺牲了李守成、安子振 2 人，都是排长，李守成是宁县柴场子工人，安子振是三原县新字区安家村人。这次战斗取得胜利的主要经验是，进攻得快，取得了主动。

郭进德、郭相珍谈高风坡战斗 1934 年春季锄麦时节，一天早晨天刚亮，刘志丹带骑兵 100 多人、步兵三四百人，从峴子上来，在五顷原停下做早饭。看来是连夜行军，人困马乏。队伍在我家的场里、院里躺下休息，几十匹马驮的东西很重。时间不长，做饭早的还吃了些饭，做饭迟的饭都未吃，敌人部队就追上来了。敌人的骑兵是从南邑上来的。发现敌情，红军部队吹号紧急集合，立即撤退。撤退时，在五顷原西侧山岭通道上压了 1 挺机枪，敌骑兵追到五顷原对面的水池塔时，机枪班奋勇阻击，敌战马嘶鸣着冲下坡，在那里周旋，冲得

尘土飞扬。不一会，敌人战马越来越多，向南侧的硷塄上往上冲，由于马多把硷塄冲了一道豁口，机枪班打死了敌人几匹战马和士兵，但由于敌人一拥而上，冲到五顷原下面的崾崴，机枪班一看撑不住，向沟里撤退，钻进梢林里去了。敌人在五顷原西侧被打死的尸体装在口袋里驮着。红军边打边退，少先队在五顷原东侧的陡坡子又进行阻击，掩护部队撤退。敌人追到陡坡子，在这里进行了激战，红军牺牲了几十个人。红军一直向东退，到雕岭关时，又遇到了敌人的堵截，马匹驮的东西大部分丢掉。战斗结束后，红军在石底子集合了几天人，听说这次伤亡和失散的人不少。五顷原赵畔的谭富娃(少先队战士)就在这次牺牲的。有的负重伤钻了梢林，被发现时已经死了。有1个伤员在烂窑里，经群众送吃送喝养伤，伤愈后归队。

吕战魁谈高风坡战斗 1934年，我在红四十二师当司号员，刘志丹率部队在耀县和马家部队打了一仗，缴获了敌人二门迫击炮，还有不少弹药。敌人虽然失利，但并不甘心失败，集中多我数倍兵力尾追而来。我军从耀县上来到了香山河，经油房沟，绕黑牛窝、马栏、老爷岭、刘家店、西渠一路北进，好在部队路径比较熟，只管从后面传来“越快越好”的口令，部队在梢林里穿插如飞。一夜急行军100多里路太阳冒花赶到南邑峁子。我们正准备吃饭，尾追之敌又赶上来了。在五顷原和敌人交火打了一阵，没有阻击得住，红军部队边打边撤。在高风坡，先锋队摆开阵势，打得很顽强，反复同敌人拼杀，阵亡30多人。赵畔姓谭的小伙子就牺牲在高风坡了。为了保存力量，不致全军覆没，部队钻梢林撤向沟里。这次战斗中，迫击炮又被敌人夺去，好多辎重和马匹都丢掉了。战后，在石底子一带收集了几天队伍，1000多人的部队失散了300多人，先锋队200多人只剩几十个人了。五顷原这次战斗伤亡是惨重的。

郭廷藩谈离风坡战斗 1934年前季。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三原、耀县、淳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纠集8个团约上万人的兵力“围剿”关中地区。我四十二师为了避开敌主力，转移北上，途经五顷原、高风坡，由于情况不明，缺乏战斗准备，突遭马弘璋骑兵团

袭击。红三团、红四团和少年先锋队仓促应战。战斗失利，阵亡 30 余人，被俘 200 多人，其中有 20 多人被拉到山河老爷庙活埋。2 门迫击炮及所有辎重全部丢失。战后，红军撤到石底子，召集失散人马，进行休整。

朱秉才 1982 年 4 月 21 日谈柳村原战斗 柳村原战斗，红三刚、骑兵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参战，攻打冶骡子部队。这一仗红军失利，损失很大。我所在的骑兵团团长赵国卿、一连连长马子英负伤。南梁政府迁到洛河川后，我们的伤员在碾子沟养伤，赵国卿等被敌人抓去。有人说赵表现得很勇敢，在合水被敌枪毙了。

王四海 1986 年 11 月 6 日谈保安游击队、红二团 我 1934 年 4 月参加保安游击队。保安游击队成立在这之前，听说是抽特委保卫队的 1 个班、骑兵队和三团的一部分伤员成立的，20 多人，刘约三任队长。开始在华池这一带活动，后到保安一带活动。返回在玉皇庙，与刘景范带来的几十个人合并了，刘景范任队。我父亲(王生荣)和我哥(王四贵)是正月初三在吴堡川的双庙参加保安游击队。我被白军拉了兵，在庆阳驻一段，半发跳城跑出来，到二将川的曹拐沟经我父兄介绍参加了保安游击队。我们家也搬到了南梁堡，我去时正开杏花，刘景范是队长，王英是政委，我哥是二中队队长，马福吉也是个队长。二路游击队还包括庆阳、合水、保安、安塞、定边、靖边、甘泉等游击队，指挥是杨琪，政委是高岗。

红二团是 1934 年农历九月二十几日发布，但未正式成立。庆祝南梁政府成立阅兵后，即 11 月 9 日，部队北上到罗儿坪川的湘北沟，安塞游击队来了，编入红二团的其他各部也都到齐了，先锋队也分开另编了，这应该说是正式成立。保安游击队大部分编入二团了，留下一部分仍为保安游击队，马福吉任支队长，张明科任指导员(后为政委)。从此我到二团当战士了。二团编 3 个连，一连是庆阳游击队，三连是安塞游击队，这 2 个连的人少，合在一起，王子昌(原安塞游击队长)任连长，(1935 年春分开为一、三两个连)。二连是保安游击队的，100 多人，连长王四贵。除二连外，园部的通讯员、

司号员、掌旗员、副官处、政治处，都是保安游击队的。刘景范任团长，王生荣任参谋长。等了一两个月，胡彦英调来当政委。过一段，刘景范作战负伤，在南梁堡养过一个时期的伤。1935年3月，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进攻，刘景范回部队又当团长。打罢黄大原，刘景范任军委主席，从骑兵团调来孔令甫任团长；四五月，从三团调来朱奎任政治部主任。

1934年农历九月，刘志丹率骑兵团、保安游击队、庆阳游击队攻打楼坊坪张廷芝部，一天下午从打扮岭动身，经白豹镇、任家砭，到界牌沟门，抓住张廷芝部两个侦探，绕开李家洼子(蔺士殿部驻地)，进攻楼坊坪。张廷芝部钻进窑洞，志丹说要引蛇出洞，我们把敌人引到孔家涧，杀了一个回马枪，把敌人打垮了。这次战斗骑兵团长赵国卿负伤。

南梁阅兵，红二团参加了。这以前，我们驻在阎洼子训练赤卫军。三路游击队也派代表来了，来的人很多，几十里路上住的人。4日，志丹上阎洼子来看各地来的代表，问我们训练的课目是什么，我们说阅兵式、分列式。志丹说：我们的主力部队训练都没有时间，游击队、赤卫军嘛，训练那个干啥！学一学射击、投弹、埋伏、袭击、侦察就可以了。至于阅兵，走过去就可以了。到开大会那天(11月7日)，山头上到处插的红旗。上午10点钟开会，下午在马洼子阅兵，我和宋飞在主席台下面站标兵。

阅兵后我们上到罗儿坪川，保安游击队为我们准备了荞面饸饹，杀的羊，正在吃饭，保安游击队送来消息，说高雨亭营(属国民党八十六师二五六旅张子英团为一营)和曹俊章(旦八团头)部准备到罗儿坪抢人，我们就与敌人接火打了一仗，缴获甚多。我父亲(王生荣)抓住了曹俊章的坐骑，那匹骡子有4只大蹄子，4只小蹄子，叫“八爪龙”，值1000多个响洋，以后卖均作了军费。

打罢这一仗，第二天准备打保安，接到命令叫我们到白豹镇待命。我们到白豹，杨森师长带三团、骑兵团已到。杨师长准备带我们3个

团到三边、宁夏去。下午就碰见许国祥的队伍，打了一下。第二天早晨到达吴旗镇，接到军委命令，说郭宝珊从庆阳起义到了柔远城子，叫我们立即南下，迎接郭宝珊部并防堵追兵。三团、骑兵团即南下了，我们到头道川铁边城下面，消灭了王西沟民团几十个人。第二天，张廷芝、赵昆各带1个骑兵营来夹击我们，我军抢先占领山头，二团先锋连抗击敌人，掩护部队通过。然后下到三道川，再到高桥、刘家堡子。谭世麟驻在刘家堡子，向我们射击，我们说：“不打你们”。谭说，给他留个饭碗，不打几下不好交差。都没有伤人，我们就从冰滩上过了河。到柔远城子，又驻2天，到了二将川的走马湾。杨森师长、张秀山政委主持在荔园堡编郭宝珊部为西北抗日义勇军。

郭宝珊率部起义以后，与郭一起从黄龙山来的梁占奎、贾德功部队仍在庆阳城。以后梁占奎等人电率部来到根据地。我团还在安定的时候，即1935年农历正月十二日，志丹给团首长谈话，叫我团立即南下，迎接梁占奎部并防堵敌追兵，我们赶到二将川的走马湾，见到了梁的部队。梁部被编为独立军，并给授了旗。独立军步兵共编为4个大队。受义勇军司令郭宝珊指挥。骑兵史殿成(史老么)部住在刘坪。史老么嫌苏区生活苦，红军纪律严，不多几天就跑了。出了苏区，与张廷芝部队打了一仗，进了草地。我团奉命追史的骑兵，追到楼坊坪以北的界牌沟门。老百姓说头一天就过去了。加上洛河消冰，不好过河。实际上，步兵也追不上骑兵，就返回来了。过了打扮岭，驻在杨庄科。团里派我(时任排长)带几个便衣出去侦察，发现敌人马队上来了，这时我们的大部队正在睡觉，为延缓敌人进攻，我们在敌人中间打了一下，就退了。敌人前后自己打起来了。枪一响，我刚部队就上了山。我们退到白豹去了，敌人还在自己打自己。独立军部队弹药充足，枪法也很准，很能打仗，但纪律很坏。每住一个地方，杀猪、宰羊，扰得老百姓不得安宁。当时，梁占奎住在荔园堡，没到前防去。但派人去部队活动，不受郭宝珊指挥，搞分裂。到3月底4月初，我们用郭宝珊的名义把梁占奎和几个大队长叫来，一个一个地抓了起来，枪毙了大队长以上几个头头，缴了独立军的械。对一些大烟鬼，组织训练了10来天，每人发10块大洋遣散了。

西北军委主席刘志丹命令张秀山率领红三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北上陕北，正准备动身，接到合水游击队送来的消息，说宁马部队1个骑兵营刚到柳村原，立足未稳，遂决定由三团、骑兵团、义勇军去打柳村原敌人。结果敌非1个营，而是1个团。打着打着，敌骑兵往后退了，我们的步兵与自己骑兵打起来了。这一仗损失很大，红三团第四连几乎打完了，王世泰、赵国卿两个团长都负了伤。

柳村原战斗之后，三团、义勇军去了陕北，我们二团保卫南梁坚持了一段，子弹也打光了。敌从合水上来，袭击南梁，苏维埃政府撤退到甘泉下寺湾。敌到南梁后，就再没有追击，我们从麻地台川向北去打旦八。从金顶山上，到杨清川打了张廷芝的骑兵。在靖边的五谷城消灭了常备军。

刘懋功 1986年11月3日谈红二团 1934年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组建了红二团。抽调庆阳、安塞游击队各一部分编为一连，邵占魁(陕西韩城人)任连长，我是司务长，戴占魁是排长；保安游击队编为二连，王四贵任连长。刘景范任团长，在刘未到任前，由安塞的王志昌代理团长。二团成立不久就随志丹去陕北。1935年9月，陕甘边红军编入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其中：红二团、西北抗日义勇军合编为二三四团，郭宝珊任团长，马佩勋任政委；红三团编为二三二团，王富贵代团长，黄罗斌代政委。

戴占魁 1986年11月4日谈红二团的组建 1934年冬季，红二团在南梁阎洼子整编成立。是由保安、庆阳、安塞、合水游击队抽人组建起来的，其中保安、庆阳游击队人多些。我在二连任排长，王四贵任连长。刘景范团长因脚伤来到任，由孔令甫任团长。红二团成立不久，就去陕北了。

黄罗斌 1985年5月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郭宝珊，家里很穷。遭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从山东带领全家逃到邵阳一带，时隔不久，就投靠了梁占奎、贾德功(土匪头子)。当时，梁、贾2人驻守黄龙山脉的梁山。郭宝珊这个人打仗很勇敢，能独立带三二百人打仗，梁、贾看

他很能干，就给郭宝珊封为营长官衔。到了 1933、1934 年，刘志丹想把他争取过来，就给黄罗武(我兄)同志写信，让他去与郭宝珊接头，这是我亲眼看见的。黄罗武去做郭宝珊的思想工作，给郭宝珊讲了为什么受地主的剥削、压迫，我们共产党政策以及打土豪、分田地等等。希望郭宝珊与红二十六军合作。

梁占奎、贾德功部队被杨志恒收编，从黄龙山开到了庆阳。途经合水太白、黑水寺时，郭宝珊就从群众中听到刘志丹红军的政策和威力，思想准备在无路可走时就投奔南梁。国民党部队在庆阳准备消灭郭宝珊部队，郭在这个处境下，立即撤出庆阳，宣布起义。

1934 年，红三团上陕北去了。刘志丹听到郭宝珊部队要来庆阳，以后又听到郭部处境困难，决定调红三团回来。11 月，红三团回到南梁，立即去接郭宝珊部队。郭部起义后，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派任浪花同志去做政治工作。

柳村原战斗后，调我到西北抗日义勇军任政委。为了加强部队的战斗力，红军制定了二十条简明军纪，当时我就用这“二十条”给西北抗日义勇军讲课，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讲为谁打仗等等。同时，动员郭宝珊部队的战士戒大烟。这个部队 99% 的人都抽大烟，开始叫他们少抽，逐步做到不抽。郭宝珊很有决心，第一个带头戒烟，了戒烟受了很大的委屈。以后部队的成份变化很大。原来的人不多了，工农成份增加了。

那时，郭宝珊已是 40 多岁的人了，还没有老婆，刘志丹同志给郭宝珊介绍了妻子，名叫车先锋(现住西安)，这样郭宝珊的情绪也随之更加稳定。后来，成立了党支部，发展了党员。部队处处都有政治教育，没有一个开小差的。总的来讲，这些人把生命和鲜血献给了苏区。

陕北肃反，枪毙了郭部营长余振玺。郭宝珊这个人刘志丹跟得很紧，也是一个能上能下的人。曾任十二师师长，后任保安大队长。这个人在当时年龄大，品质很好。从第三次反围剿，打了慕家原以后，

马佩勋接了我的政委手续。

马佩勋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郭宝珊这个人也应该给写个东西。黄罗斌和我都当过他的政委。郭宝珊是一股土匪，有好几百人。1934年刘志丹派黄罗武到黄龙山活动郭宝珊。冬季郭宝珊带领他的亲信部队来到南梁正式宣称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番号是黄罗斌定的。1935年9月与二十五军汇合后，义勇军编为二十四团，郭宝珊为团长，我是政委。10月，我介绍郭宝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后郭宝珊是正军级干部。

我们对郭宝珊部队改造是成功的。主要是因人而待。郭本人出身贫穷，被官府豪绅“逼上梁山”。我们在官军清剿他时帮助他，这样就把郭争取过来了。我们还给他介绍了对象，是子长县人，党员。争取了郭宝珊后还影响了其他一些土匪投降我们。

义勇军打仗是很勇敢的，是二十六军的主力部队。我和义勇军一起打的仗有慕家原、杨家原子、定仙埧，劳山战役等。义勇军经过这几次大的战斗，牺牲的差不多了，补充后才有200人。

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汇合后，给义勇军每连派了1个支部书记，1个号长，1个挑文件的。肃反时，我和高岗、郭宝珊等被捕后关在一起坐牢。郭宝珊同志是能经受住考验的，过后他没有怨气。

“双十二”事变后，郭宝珊部队被编为独立师，张达志任师长。郭宝珊任团长，担任剿匪任务。一度保安、甘泉一带的土匪猖獗，郭宝珊亲自去剿匪。土匪中有的熟悉郭宝珊，一听说郭来了，有的吓跑了，有的被打垮了，很快就平定了这些匪乱。

张德明 1981年10月23日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1933年我跟郭宝珊上了黄龙山。1934年农历七八月离开黄龙山去西山的。路过太白镇时，刘志丹还给我们送来了不少羊、肉等东西。到庆阳，未过农历年，郭宝珊带我们1个连投奔刘志丹，参加红军后被改编为抗日义勇军。我们走后不久，即1935年正月，马鸿宾部冶骡子旅就开始打贾德功部，贾被打死，梁占奎等人也来投了红军，被编为“独立军”，

归“义勇军”指挥。时间不长，“独立军”头领叛变被枪决。

刘景范 1985 年 4 月 28 日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郭宝珊是黄龙山的土匪。后来，他起义参加了革命。郭宝珊起义是我们经过长时间做工的结果。黄龙山原有 3 股土匪，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他们每人有约 1 个营的兵力。这 3 个人中，郭宝珊比较好一些。他们在黄龙山站不住脚了，就带队伍投了杨志恒，被杨编为 1 个团调驻庆阳。由于我们做了工作，郭宝珊就带一个连起义了。郭带着部队向苏区开，梁占奎、贾德功还带部队追。史老么的骑兵团也起义了，史起义是假的，想借起义把部队拉出来，后来他到底跑了。我们是在悦乐接上郭宝珊部队的。起义后对部队进行了整顿，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郭宝珊任司令员，我们派了个政委叫任浪花，义勇军后来配合我们红二团打了一次马鸿宾部队，在黄家大原歼敌 1 个连，是在 1935 年 2 月打的。这一仗打完后，郭宝珊把部队整顿了一下，他那个部队里有一部分战士发生了问题，这次整顿就把这部分人的枪收了。后来，郭宝珊部队就和红三团上陕北去了。他们这个部队在作战中很勇敢，后来大多数都牺牲了，只留下郭宝珊和一个打残的战士。这个战士后来给我们当管理员了。

杨伯伦 1982 年 11 月来信谈西北抗日义勇军 西北抗日义勇军的前身是原黄龙山坐地土匪梁占奎部的 1 个营，即郭宝珊营。1934 年六七月间，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为了收编梁部，对梁实行了重兵围攻，迫其向他们投降。梁占奎在无法立足的情况下，离开黄龙山来到庆北，扎营二将川一带，约有六七百人，为了争取和改造这支队伍，我们先后与之进行过多次接触，但梁占奎为匪成性，鸦片烟瘾很大，整天安灯吸烟，还经常抢人，不但不接受我们的改造，反而拉着队伍去庆阳投奔杨志恒部队。梁部中的郭宝珊营长，早与我党有联系，这时毅然逃出虎口，投靠红军，于这年 10 月 20 日，率本部 120 余人宣告起义，来到南梁。梁占奎去庆阳住了两三个月，因与杨志恒发生矛盾，被杨部击溃，残部数百人窜入我庆北革命根据地。我原打算收留并改造梁占奎残众，不料该匪怙恶不悛，不但不接受改造，反而密

谋瓦解我军，扩充势力。我获悉情报，先敌以突然行动，活捉了梁占奎(后被我处决于黄陵县小石崖)。缴了梁匪的武器，并解散了他的队伍，对愿意参加革命的，编入了郭宝珊部队，其余均予遣散。至此，郭宝珊部正式改编为西北抗日义勇军，约 300 人，任命郭宝珊司令员。为了更好地领导和改造义勇军，我党派马佩勋同志(原晋西游击队来陕北时的领导人之一，现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担任政委。

义勇军建立后，在我党的领导下，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在部队中开展爱国主义和党的政策宣传，进行新旧军队的对比教育，使他们逐步提高了阶级觉悟，坚定了革命的信心，增强了组织纪律性。我们还给指战员戒烟治病，整顿军纪，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很快就成为一支战斗力很强的部队。在 1935 年秋冬的劳山、榆林桥等战役中，义勇军表现非常突出，对创造陕甘革命根据地做出了重大贡献。郭宝珊经过红军部队的锻炼，英勇善战，成为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全国解放后，被任命为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以后调任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员，1964 年逝世。

陈国栋 1985 年 5 月 2 日谈红一团 1934 年下半年陕甘边特委决定以三路游击队为基础成立红一团，主要由平子游击队、特务队和少先队组成，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红一团下设 2 个连，1 个先锋队。一连连长寇金财，指导员郭炳坤；二连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张嘉伯(原特务队队长)，共有 200 多人。

红一团成立后就配合宁县一支队行动，先到金村庙原，与马鸿宾部队遭遇，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敌人把我们包围了，我们决定晚上突围。突围中，我军死伤 10 多人，死了 1 个连长，我也负伤。部队突围出去以后，转移到桃树庄，集合队伍，清点人数，进行休整。我因负伤休息了，不久张仲良同志也调走了。陕甘边特委军事委员会另派了两个同志(名字记不清)担任红一团团长和政委。

李德录、罗金财、刘永培 1981 年 8 月谈红一团 1934 年，正宁四支队发展到 100 多人。何炳正、殷云山调离，由刘玉才、郭炳坤接

任队长、指导员。1935 年，奉上级指示，决定从正宁四支队、宁县三支队及国民党部队起义过来的 1 个连各抽调一部分人，组建了红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

高维平 1990 年 8 月 18 日谈红一团 我原在三路游击指挥部特务队当兵，1935 年正二月编入红一团。改编是在淳化马家山，编 2 个连，一连连长张怀治，二连连长张志行，都是耀县人。陈国栋任团长，张仲良任政委，全团 100 多人，除特务队的外，还抽有其他游击队的人员。还在特务队时，我们打过麻子掌，在湫头冲过马家部队 1 个营，拉了敌人 17 匹马，缴了十几条枪。成立红一团后约两三个月，在金村与马家骑兵打了一仗，损失极大，只回去了 30 来个人，陈国栋把自己大腿打了一枪。以后贾文义当团长之前，寇金财还代理过一段团长。金村战斗后，红一团打过底庙，抓住 1 个催款子的，哄的叫开城门，缴敌人枪二三十条。在九龙川曾消灭过马家部队的 1 个骑兵排。在淳化马家山曾消灭敌民团郭日五部百十人。郭的坐骑也被我们缴获了。在直罗战役之前，贾文义受伤了，×××(国民党中央军变过来的)由连长提为团长，这人吃不了苦，活动叛变，被我们消灭在羊泉了，共镇压了 13 个。

邢富明 1985 年 9 月谈红一团 我是 1934 年参加革命，开始在五支队，队长刘玉财。后来从五支队抽了些人组建红一团，我也被抽调，刚我一起被抽调的还有赵铁娃、关一姓、王九九、巩牛等。团长、政委是陈国栋和张仲良。一团正式编了 2 个连，一连连长刘玉财，二连连长牛书声。

刘富禄 1983 年 4 月 4 日谈瓦扇子战斗 1935 年农历二月二十七日，我红一团夜宿北川九原子(方村)，第二天欲去观音庙打土豪，消息被驻盘克的马鸿宾部队知道，派 1 个骑兵营截击，敌先期到达金村北庄。二十八日，红军从瓦扇子余家庄梁上往上走，敌军即组织围袭。12 叫左右，双方在余家梁接火，红军打的很勇敢，击毙了敌人 1 个副营长。红军边打边向山里退，敌从瓦扇子王峁、岳王洞两个山梁包围过来，在义雪沟双方展开白刃战，红军又退到余家湾，坚守阵地，

打退敌数十次冲锋。到了晚上，天气骤冷，雪雨交加，红军用一排排手榴弹打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又上到金村原，撤到了桃树庄。这次战斗，红军被俘 20 多人。

杨伯伦 1986 年 9 月 26 日来信谈瓦扇子战斗 1935 年三四月，陈国栋、张仲良率红一团与郭秉坤带的六支队在宁县一带活动。当时红一团只编了 2 个连，加上团直属排，共约 280 多人。我是二连指导员，连长姓马，是个回民，才从国党军队变过来不久。六支队约 70 多人，与红一团配合行动。

一天晚上，我们在南义井袭击敌人未成，折向苏区转移，由湘乐川上山到瓦扇子原畔时，已是上午八九点钟，发现金村庙敌骑兵在溜马，知是马家部队(战后知是 1 个骑兵团，800 余人)面对敌情，团首长当即决定由一连掩护，其余跑步向北原撤退。这时，敌军也发现我们，一面派骑兵从正面向我冲击，一面从东侧迂回包围我军。我一连指战员英勇阻击，除阵亡者外，均被俘虏，连长张治怀、指导员徐兴堂都牺牲了。向北撤的还未全部上到盘克原，即被敌骑包围在严家沟村。甩不脱敌人，只得在一个山岭上组织抵抗。指战员用手榴弹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并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我伤亡 30 余人。形势对我们十分不利，敌又喊话要我们投降。为减少伤亡，我军答应与敌谈判，派代表去敌阵地交涉。谈判中，我军提出缴枪的三个条件：①不得虐待所俘我军人员；②释放(包括以往)俘虏我方人员；③当即送饭给我军(已一天未吃饭了)。这样来来去去谈判几次，挨到天黑，我们向南面悬崖突围而出。突围中，有 6 人摔坏了腿。在这个山岭上与敌激战的，多半是六支队。他们行军时在后面，从瓦扇子撤退时又在先头，上严家村山岭的人多些。这次战斗，六支队损失较小。

突围后，我们二连只剩 40 多人，团直属排剩 30 多人。张仲良和我到九岘时，天快明了，我们共集合 70 余人。始在村里做饭吃，并休整 3 天。以后又陆续归队 20 多人，我们转到淳化一带去活动。六支队突围后向石鼓方向去了。

郭德林 1983 年 5 月谈王郎坡战斗 民国 22 年(1933 年)前季,红二团为消灭王郎坡驻敌赵世坤民团,决定采取诱敌出巢的办法,派人化装成“土匪”,假装抢了湫头街周大海的药铺,还拉走了群众一条毛驴,向南去了。周大海即去王郎坡向赵世坤报告,赵以为真是土匪,急忙带民团追击,追到石炭沟口,被杨师长预先埋伏在这里的骑兵全部歼灭。

赵世堂 1983 年 9 月 25 日谈王郎坡战斗 1933 年 3 月,赵世坤率民团驻守王郎坡寨子,红二十六军二团派部分战士假装去没收了北原芋子沟周先生在湫头开的中药铺,周即到王郎坡向赵世坤报告。赵亲自率民团尾随追击,二团战士将赵的民团诱至三嘉原的石炭沟口,快上烟孙梁时,红二团 40 多名骑兵从黄台沟出来,把赵世坤民团全部歼灭,只有六七个人逃跑,赵世坤被活捉,拉到三嘉原狼牙洼处决了。

李佐林谈曲子战斗 李恒太是我二爷,生前是环县民团团总。民团辖 3 个队,念海智、刘天云、鲁占彪分任队长,共有 200 多人,30 多匹马,30 多条枪,大部为杆子队,全团只有 1 枝手枪。1934 年农历十月初十(11 月 16 日)刘志丹部队来曲子,当天下午我二爷李恒太等 4 人被杀。当时我 14 岁,我二爷百日之后,我结的婚,这点我记得较清楚。

武占勋谈曲子战斗 1934 年农历十月,刘志丹部队从孙家湾子沟里出来,在孙家湾子杀了国民党两个当差的,十月十日晨沿川北上,该部大约有百余人,10 多匹马,皆是陕北农民打扮,头扎白羊肚子毛巾。当时李恒太团在曲子老城驻防,刘部到曲子后,李部哨兵并未发现,刘部当即猛攻,李部毫无准备,溃不成军,最后李部四散而逃。朱文成在北头山洼上被红军击毙,李恒太在曲子街郑百随家被捉,崇景义、甄××也先后被捉住,当天下午就将李恒太等 3 人杀死在曲子老城。第二天刘志丹部队也未休整,撤离曲子黄台经龙家原等地向东而去。

戴占魁 1985 年 7 月 1 日来信谈庆阳游击队 我是华池县豹子川王街子人，与杨培盛住的很近。1933 年冬季，庆阳游击队在南梁小河沟成立，杨培盛任队长。不几天，杨把队伍带到豹子川，我就参加了庆阳游击队。这时，全队约 20 多人。接着，到东华池、大凤川、葫芦河、莲花砭、太白一带游击，消灭小股土匪，拉豪绅地主。活动一段后，随红三团、骑兵团到固城川打了敌人固城堡子，又到宁县盘克观音庙打了敌人的警察所，在湘乐川活动一段，在西华池配合主力红军消灭了国民党骑兵数百人，缴获了敌人很多马匹、枪枝。这时，杨培盛离开了庆阳游击队。张秀山率领我们到城壕川活动，并向悦乐堡发动进攻，因敌援兵赶到，未能攻下，撤出战斗。在大沟门，我们消灭了敌人一股民团。随后，在悦乐、温台一带开展群众工作。

1934 年夏季，庆阳游击队已发展壮大，编为 2 个支队和 1 个骑兵团：一支队队长张志孝，我任大队长；二支队队长邵怀德，政委王宝珊；骑兵团队长马福吉，我们在柔远川消灭了恶霸地主田生孝的反动武装 30 多人，并活捉了田生孝。在刘家沟，通过宣传动员，争取了刘寨头，主动缴出了枪枝。我们将元城川以东的广大区域开辟成为苏区，与南梁苏区联成一片，建立了革命政权。

我们曾经配合主力红军在元城袭击谭世麟部队，激战一个上午，击溃了敌人。敌丢弃不少死伤人员和马匹枪枝，退回寨子。因无重武器攻坚，我们撤离了元城。秋季，我们配合主力红军在头道川、三道川与张延芝部作战几次，袭击了张的兵工厂，消灭了张的 1 个营和 1 个骑兵团。后来，在楼坊坪包围了张的营房，但未能消灭敌人，撤出了战斗。我们又在白豹川、吴堡川一带活动，打土豪。

李占义 1979 年 10 月 26 日谈庆阳游击队 1934 年农历九月五日，我组织了 9 个人在大沟门参加庆阳游击队。庆阳游击队支队长邵怀德，政委张秀山，共七八十人，五六十条枪。编为 3 个中队：第一中队长赵文善，第二中队长张志荣，第三中队长王兴成，先锋队长刘全。我们参加后，新编了四中队，我任中队长，共 15 人。同时编了五中队，杨凯任队长。不久，三、四中队配合骑兵团在庆阳孙家湾子(王

嘴子沟口)消灭了绅士保长孙向奎的武装，杀了孙向奎父子及管家，接着到曲子消灭了李恒太民团步骑两个队七八十人，缴获枪五六十支，战马 30 多匹。活捉了李恒太、税务局长及敌县长等 5 人，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后枪毙。曲子战斗后，第三中队改为骑兵团，王兴成仍任中队长，十月间，庆阳游击队的一、二、四中队、先锋队、合水游击队、保安游击队 200 多人同骑兵团共 400 多人在刘志丹的指挥下在楼坊坪攻打张廷芝部。开始强攻，未能得手，又相持 1 个多小时，由于敌人枪械装备好，我军顶不住，有几个战士阵亡，只得撤出战王卜。

楼坊坪战斗后，庆阳游击队进行整编，四队同二队合并，五队编进一队。一队队长戴占魁，二队队长李占义，三队(骑兵团)队长王兴成，指导员王宝珊，先锋队队长张志孝、刘全，共 100 多人。

十一月，在柔远成立了红二团，从庆阳游击队抽调年轻身强力壮战士 60 多人，编为二连，戴占魁任一排长，我任二排长；保安游击队抽调的人员编为一个连。全团 100 多人，刘景范任团长，胡彦英任政委。

成立红二团以后，庆阳游击支队张志孝任支队长，王宝珊任政委，仍编 3 个中队，二中队队长李生友，三中队仍为骑兵团，共 40 多人。

1935 年春，宁马部队进攻边区。这时，我又回到了庆阳游击队。1 月 20 日，红二团、庆阳游击队、独立军(贾德功、史老么、梁占奎带的兵不兵匪不匪的队伍三四百人被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打败，投降红军后所编)在田家峪岷打了第一仗，各有伤亡，无胜负。战后，贾德功 1 率队叛变，先后在杜河、枣刺湾、二将川被红二团、庆阳游击队、西北抗日义勇军消灭，缴获了大量枪枝弹药。

随后一两天，红三团、红四团 1、合水游击队在柳村原攻打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一个营。红军步兵从一方包剿，骑兵从另一方包剿，因天黑，联络失误，自己打自己，被敌钻了空子，造成很大伤亡，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

二月，庆阳游击队在马梁阻击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打了一下就

撤退了。在老爷岭，又阻击几个小时。

老爷岭阻击战后，庆阳游击队与红二团向白豹川出击。在阎岔与宁马部队打了一仗。我们自口撤退到荔园堡，庆阳游击队全部编入红三团，仅留王宝珊、李占义、张弟、黄宗万、张得海、李生友、杨生良等十几个人，组织庆环游击队。张弟被派到定边游击队任指导员，我到环县游击队任指导员(队长王怀刚)。马守明、饶九 2 人成立了镇原游击队，分任队长、指导员。其余 12 人仍为庆阳游击队，张得海任队长，下设 1 个班，不久扩大到 30 多人，编 4 个班。这 4 支游击队有分有合，有事集中组成战斗队，无事分散活动。四月十几日在白马岷岷第三次汇合，共 100 余人，30 多条枪。当时，宁马部队 1 个骑兵连，樊文英的民团、靖边高贵子的李营，合起来追击我们，兵力多于我几倍。我们撤退到志丹县的樊川，仅剩四五十人。我们同赤安县接上关系，与赤安游击队联合行动。以后又配合红二团在宁塞川一带活动。当时，强家珍、马仰西也在过里活动，并成立了苏维埃政府。五月间，在靖边、保安之间统一改编为庆北游击支队，支队长王怀刚(后叛变)，政委强家珍。70 多人编 2 个大队。第一大队队长季彦凯，指导员是我，辖 4 个中队；第二大队队长何××，指导员张弟，辖 2 个中队。九月间，改编为陕甘宁独立第一营，庆北游击支队为一连，保安调来的 1 个大队为二连。一连于十月下旬调回华池担任警戒，但由于东北军“围剿”，转了一圈又回到三边。独立一营以后编入陕甘宁独立师一团了。

1934 年农历四月，庆北发生游击队叛变的事。这个游击队共十几个人，其中梁海清、张岁来、田贵义、田贵礼，郭聚德、田三贵、李番子、刘存、张××(柳湾沟张三的儿子)9 个人都是哥老会上的，是温台民团团总杨禄指派打入游击队，目的在于拖枪叛变。四月的一天，这些人在田河叛变，把指导员(年仅 18 岁)杀了。队长在一群众家里养病，也被拉去杀害。当时，庆阳游击队在安定一带活动，五六月间回到华池，杀了梁海清、田贵义、田贵礼等。

李树林 1979 年 10 月 28 日谈庆阳游击队 1933 年，悦乐一带已

有刘志丹的红军游击队活动，并秘密组织赤卫军。1934年的二三月，张秀山率庆阳游击队来到庆北，开辟苏区，赤卫军公开活动，开始打土豪。我(当时叫李信)担任温台赤卫军大队长，李万义(宁马部队进攻时叛变，被我镇压)是悦乐赤卫军大队长。以后，成立了庆北县，管辖柔远、城壕、悦乐、白豹区。

1934年12月，我参加庆阳游击队。这之前，庆阳游击队大部分被红二团编去，仅留十几二十人的骨干，队长是王宝珊。庆阳游击队在韩岔与宁马部队作战，我负了伤。部队退却，我留在地方养伤。1935年农历三月，宁马部队进攻老爷岭时，我组织了一支13人的游击队，组织起来五六天后，归到庆阳游击队了。

1935年农历六月，我与李培福组织了一支10来个人的小游击队，田生弟任队长，我做党的工作，在温台、元城、半个城、二将川等地活动。十月间，这个游击队已发展到六七十人，编为4个班，其中有1个特务班。在悦乐攻扣国民党中央军，队长田生弟牺牲，我改名李树林指挥这支游击队。中央红军打直罗镇时，李培福带这个游击队在二将川参加整编，这个游击队同合水游击队合编为庆阳老游击队。我仍留温台工作。

早在农历七八月间，我同李培福成立了庆北办事处，在龙木庄、杜家崾岈、杏泥沟一带秘密活动，多在敌人堡子底下住。我任办事处主席(李培福有病)，马占荣是秘书，主要任务是开展游击活动，相讯消灭敌人。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撤离后，我们就公开活动，陆续恢复柔远、温台、城壕、白豹、元城、白马区，1936年五月。红军西征时，庆北办事处同华池战区合并为华池县。

1935年农历十月，李培福带游击队去二将川参加整编时，将特务班留在温台，我又在此基础上重新成立庆阳游击队，不久发展到六七十人，分为5个班。1936年，庆北办事处与华池战区合并后，庆阳游击队改名为庆华游击队，我任队长。六月，成立独立师，庆华游击队与环县游击队合编为独立师三团三连，连长陈美义，指导员李树林。

一连是由曲子游击队和马岭游击队合编组成，连长系中央红军派来，指导员方振邦；二连是由庆环(赤庆)游击队和×城游击队合编组成，连长张××，指导员李秀荣。

张德才 1979 年 8 月 7 日谈庆阳游击队、庆北办事处 1934 年 1 月，红军破了刘寨子。庆阳游击队在五蛟的城壕袭击国民党段团变兵(骑兵)二十几人，缴获盒子枪 1 支、长枪 3 枝，马 2 匹。

八九月间，红军骑兵团在五蛟城壕收了谭营枪 100 余支。当年冬季，庆阳游击队、赤卫军先后几次攻打悦乐堡子，没有打下来。五蛟魏家疙驻谭世麟部崔凤阁 1 个连，其中有骑兵 20 多人。红军部队围攻几天，把敌人的枪收了。

1935 年农历二月，红二团、郭宝珊的独立营、庆阳游击队在田家岘与马鸿宾部队作战，我红军部队伤亡较大。接着，红三团、骑兵团、郭宝珊的独立营、庆阳游击队等，在柳村原攻打马鸿宾部队，因晚上联络失误，开始红军部队自己打自己，损失较大，骑兵团长赵国卿负伤，在合水被敌抓住杀害了。

庆北办事处先后成立过二次：第一次是 1934 年农历三四月间在杏泥沟苦荞嘴成立的，第二次是 1935 年，李培福任主席。马鸿宾撤退后，成立区乡。

黄德胜 1979 年 8 月 6 日谈庆阳游击队 1933 年农历十一月，我在悦乐街参加庆阳游击队，队长张志孝，指导员王宝珊。腊月编为红二团一连，我队一起编入十人。团长刘景范，政委胡彦英。我们去陕北回来，1935 年的二月初四在田岷岷与马家部队打了一仗，我负伤，在贺家湾医院住 40 多天。四月归队，说我跟不上部队。六月，在洛河川见到强家珍、马仰西，他们叫我找李培福。一起走的还有黄太等 4 人，实际只回来我 1 个。九月，我跟李培福到脚乍川找到李树林的游击队，李当时是指导员，打悦乐，队长田生弟牺牲了，李占义当队长。这个游击队 1936 年三月编到黄克秀游击队的机枪班，以后又编入红四团，黄克秀团长，刘培清政委。再后，在曲子编为独立营，

整训 2 个月，又编入红五团 4，团长尹国赤，政委刘培清。

高世清 1979 年 8 月 7 日谈攻打悦乐堡 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待批时期，我带王宝珊游击队、1 个赤卫军大队(3 个中队)共 200 多人偷袭悦乐下堡子驻敌谭部崔风阁连。造了 2 个云梯，因下雨，把 1 个丢掉了。云梯短，够不着，上不去，被敌发现了，没打成。等了好几天，第二次去攻，又被发现了，没打成。再等不多几天，第三次去打，直打到天黑，打不下来，咱们的队伍退了留下 10 来个人监视，打冷枪。敌人恐慌之下，逃到五蛟去了。我们就带领群众把悦乐这个敌堡刨平了。

高有才 1979 年 6 月 4 日谈华池老游击队 1935 年冬，我带华池一支队与黄克秀的老游击队在葫芦河消灭国民党东北军一〇八师 1 个便衣队，毙伤俘敌 17 人，缴枪 17 支，只有几个敌人逃跑了。

王宗万 1979 年 8 月 3 日谈庆北游击队 1933 年冬，我在庆阳北七里原李向林家拉长工，还民国 18 年借粮的利息。听人说刘志丹的红军来了，在卅里铺拉过洋人，在毛沟门打过仗，是一支为穷人的好军队，就跑到南梁，找到了红军，领导上问了我的身世，把我留在先锋队。等了一两个月，南梁成立革命委员会，习仲勋当了主席。当时，我们的大队长是邵怀德，队长叫陈世荣。大约三月间，派我到庆北柔远一带招游击队，我动员了于占海、白万和、白生秀、黄太、黄宗万、张得海、吴秀龙、张金山等人，组织了庆北游击队，从南梁调来的赵占彪任队长，任有升任指导员，我任副队长。结果，民团头子杨禄打进来些坏人，以梁海清，田贵义等为首活动叛变，赵占彪被一个姓景的诱到家里吃饭，叫叛军拉住杀了，任有升被叛军杀在海沟岔了。游击队被搞散了，收去了十几条枪，我到老爷岭等了几天，没人来归队，就去豹子川，向习仲勋汇报，要求处罚。习仲勋说：“你把人没认清，恕你无罪。以后再招人，土匪、民团不能要！”以后，庆阳游击队到庆北，杀了搞叛变的田贵义等人，我又动员了李树林、李满券(李培福)等，重新成立了庆北游击队，李树林任队长。黄德胜从叛军中跑出来，参加了李树林的游击队。

蒋成英 1979 年 6 月 2 日谈华池游击二支队 1935 年，赤安县二支队派我、杨占华、王弟、王世兰等人，于九月初九在列宁小学山上平了敢碉堡，十日又平了赵家梁敌碉堡。组织上叫我和王世兰成立华池县游击二支队，共十六七个人，分为两个班，我任队长，高有才、李兴玉分任班长。不久，我们在牛百万山活动，组织决定调我到战区保卫队，二支队由高有才任队长，杨生贵任副队长。

华池战区保卫队的前身是警卫班，由郝俊清任班长。扩编为保卫队后，我任队长，共 20 多人。

张邦英 1985 年 5 月 6 日谈平子游击队 宁县最早是平子游击队。平子有个何炳正，把村里几个青年组织起来，假装请敌人大吃大喝，喝得差不多了，打死了几个人，收了敌人几条枪，这是 1933 年的事。何炳正把人带到合水一带活动，当时还不叫游击队，敌人打他们，咱们也打他们。后来，与在那一带活动的红二十六军发生关系，成立了平子游击队，有 40 多人。1934 年三路游击队把他们编为第四支队。以后，发展到一二百人

陈国栋 1985 年 12 月 19 日谈平子游击队 平子游击队是 1933 年秋季成立的，队长何炳正(正宁乐兴人)，共六七十人。何炳正是哥老会老么，系共产党员，因和地方上搞不到一起，1933 年秋季来到红二十六军，带来 30 余人，所带武器全是梭标、马刀。当时给了个称号是平子游击队，让回长乐原活动，回去站不住脚，以后郭秉坤去当指导员。到 1934 年后季编入红一团为 1 个连。何在某次战斗中负伤，大腿被截掉，后被敌人俘虏杀害。何长珍 1988 年 8 月 8 日谈平子游击队我叔父何炳正是 1932 年农历八月初三起的事，九月二十日到合水固城川的小堡子，刘志丹带部队到这里，给发了 40 多条枪。我叔父问刘志丹，他们应叫什么名字，刘志丹和高岗商议，说叫平子游击队。

李得录、罗金财、刘永康 1981 年 3 月谈平子游击队 1931 年 4 月，刘志丹、谢子长的部队经过正宁县的小园子，到处书写打土豪、

分田地、废除苛捐杂税的标语。在红军游击队的影响下，榆林子何炳正组织了十几个人，杀了正宁县催粮款的先子灵部下团丁 12 人；夺得 12 支枪，在平子、榆林子交界的水围台组织了一支武装力量，打富济贫，后与红军取得联系，于 1933 年左右成立了平子游击队，编为两个支队 4 个班，共四五十人，战士多是平子一带的青年农民，在平子原一带活动。后来被编为正宁四支队。

刘永珍 1986 年 3 月 9 日谈平子起义时间 我属鸡相，生于 1933(癸酉)年农历八月初七日，现年 54 岁，正宁县榆林子镇文乐六队人，现为榆林子供销社营业员。老人在世时曾多次说过，在我出生的第七天，因为本村何炳正带人杀了国民党 5 个团丁，民团扬言要血洗文乐，我妈抱着我在北沟蒿坪土瓜烂窑洞里躲避，等到事情平了才回的家。

刘永禄 1986 年 3 月 9 日谈平子起义时间 我兄弟永珍，属鸡，今年 54 岁，生于 1933 年(癸酉年)。生永珍那年，宝成(即何炳正)杀了民团上的人，刘湘林(宁县半坡人，与文乐刘姓是一族)捎话，说他们(县民团)要到文乐抓人，叫我们刘家人躲一躲。那时，永珍出生才 7 天，我妈就抱着到蒿坪去躲。时间可能是八月，人都在收糜子。

李含章 1985 年 3 月 28 日谈宁县一支队 1933 年 11 月，我和韩得功等 3 人，到正宁湫头，见到了郭廷藩，要求参加红军，郭将我们介绍到一支队，我们找不见一支队，见到了梁老九，他又把我们编到县保卫队，十几天后，我又从观音动员了张德功、马德清、黄占财、李贵清 4 人投奔红军，我们 7 个人都在县保卫队。原来保卫队是 1 个班，1 个队长，1 个通讯员，共 11 人，来了我们 7 人后，共有 18 人，编 2 个班，有 7 支枪。又过了十几天。就把我们这个班分编到宁县一支队，队长张占荣，指导员乔占才(陕西旬邑人)。一支队原有 2 个班，十五六个人，连我们共 3 个班。支队共有 6 支枪，天天打游击，骚扰国民党的保安队、镇公所、联保处，扩大武装，保卫边区。到 1934 年七八月间，张占荣、韩得功调到肃反委员会。一支队队长是樊登甲(山河洼子沟圈人)，指导员乔占才。二班长张老九(张占胜)叛变时，

将樊登甲打伤，樊到宋家庄养伤，支队队长由王得胜(山河洼子沟圈人)担任。王得胜任队三四个月，阵亡在九岷岷子桥(与山河保安队庞明胜打仗)王德胜牺牲以后，宁县一支队队长由胡老六担任，他是湘乐狼牙湾人。胡老六当支队长不到2个月。在战斗中负伤，一支队队长是崔瑞山。崔只当了十几天支队长。在合水店子战斗中，我方失败，被打死大队长1人、班长3人，被俘五六人，损失很大，崔瑞山在这次战斗中牺牲。1935年七月，调王象祥担任一支队队长，指导员仍是乔占才。

梁天和、赵新勤 1986年3月8日谈半坡暴动时间 半坡暴动杀赵新玉弟兄俩正是割茬的时候，即农历九月。年份可用我庄里赵秉元的生日属相推算。那年正月初八早上，赵新和用镢头挖死他哥六拐子，当天早上就生的赵秉元，人都说赵秉元是六拐子转生的。赵秉元属狗(即甲戌年——1934年生)，今年53岁了。六拐子被杀一案是赵新玉(绅士)处理的。因为处理这一案的后事，钱给本村8个富户以“紧急借款”，向每户摊了10块钱硬币，赵新和家出的1头乳牛、8亩地被赵新玉空里得了。由此可推断，赵新玉的被杀不会早于1934年。

赵新玉被杀是他妹夫刘月勤晚上叫出去的，赵新玉死后，他妹子(刘月勤妻)怕官府报复，住在梁家北面小窑里避风，头一天住下，第二天就生了个女子，婆家在正宁乐兴，问一下生日属相，就可推知。

刘绒草 1986年4月20日谈半坡暴动时间 我娘家在宁县东半坡村，父亲叫刘月勤。我舅家在宁县小原子，三舅父叫赵新玉，是刘永培等杀了的，可能在农历九月。因我舅死了不几天。我妈在梁天和索生的我。我属狗，生于1934年(甲戌年)农历十月初三日。

唐致谈新正特务队 新正特务队是1934年成立，人员是从各游击队抽调的精干队员，只有十四五人，我任队长。不久，改名为武工队。装备比较好，战斗力较强。

袁长太谈新正三支队 新正三支队是1935年在罗川樊家湾子樊俊贤家的高窑上成立的。当时只有8个人，7支枪，队长是范三。范

三因母亲病故，我曾代理过1个月队长。东北军“围剿”期间，王得宽将一部分队员拉过去叛变了，留下的一部也解散回了家。

郭成才谈正宁五支队 正宁五支队是1933年成立的，张占英任队长，焦怀兴任指导员，共30多人，我在五支队当战士。红一团从五支队抽调了一部分人，我也被编入红一团，在骑兵连当战士。这时候，红一团团长是贾文义，政委姓马。

郭廷藩、罗金财、唐致祥、王明智谈正宁五支队 1932年二月，三嘉原有一部分青壮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3年三月，红二十六军在高风坡同国民党治成章旅战斗失利后，这部分人多数回到本地。四月，以这些人为骨干成立了10多人的游击队，队长张占英。后改为正宁五支队，队长张占英，指导员焦怀兴，其后支队不断扩大，左展到150多人，下设4个分队。

1934年，成立底庙游击队，开始只有10余人，因力量单薄，经不起敌人打击，进入湫头一带活动，同年改称正宁八支队，队长刘富奎，指导员赵铁娃。到1935年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经常在底庙、旬邑一带活动。

1935年十月。五、八支队整编，成立新正独立二营，营长张自行，政委张嘉伯。后在乐兴战斗中张嘉伯牺牲，郭廷藩继任政委，五、八支队为该营的五、八连。后新正独立二营奉命到陕北，同新宁独立一营、淳化独立三营整编为红三团，新正独立营为该团二连。

刘彦芳 1984年谈正宁十七支队 东北军“围剿”之前，在底庙三家庄村成立了十七支队，我任队长，任书勤任指导员。全队30多人，分3个班，黄得得、万树学、衡向儒分任班长。是在红一团(团长寇金财)的组织下成立的。

李清海谈正宁十七支队 1935年以前，秦善秀常到这一带活动，与产场的七先生(姓郭)混熟了，商量利用七先生的关系，以办保甲为名，去旬邑县领枪，以便组建游击队。七先生领回12支步枪后，变卦了，想用这些枪枝守护宅院。不仅不交出枪枝，也不与秦善秀来往

了。一天晚上，秦善秀带着正宁二支队包围了七先生的楼子，亲自去说服动员，但仍无效果，于是就强行下手收缴，在七先生部下的配合下打死了七先生，将这 12 支枪全部缴获。我们以这些武器，于 1935 年农历二三月成立了正宁十七支队，队长刘彦芳，指导员任书勤。全队 20 多人，分为两个班，一班长姓赵，二班长黄得得，我为二班战士。十七支队主要在底庙一带活动。永红县成立后，十七支队改为永红县保卫队，队长万银祥，共 10 多人，其余人员编入二支队去了。

李普青谈北后游击队 1933 年，在正宁县永和的罗沟圈成立北后游击队，队长万东根，指导员梁岁月(土匪， 后被我镇压)。1935 年前季，北后游击队在三嘉原被改编为正宁二支队，队长是赵铁娃(赵德荣)，指导员姓巩。双十二事变后，一部分编入大部队，一部分编入永红县保卫队。

王清殿 1982 年 4 月 21 日谈正宁十八、二十支队 宁县游击队是 1933 年成立的，刘永培和我一起搞的，王德宽(后叛变)任队长，李士新任指导员。1934 年成立十八支队、二十支队，十八支队队长何进才，二十支队队长王占义。乐兴战斗中，王占义、王明堂牺牲，新宁一区命名为占义区，二区命名为明堂区。

郭廷藩 1983 年谈巧取岷子联保处 1934 年 2 月，平子游击队曾巧取岷子联保处。岷子联保处共有保警十人，枪 10 余支，保长秦老四。为了便利工作，我们设法要端掉这个敌据点。通过秦的亲戚做秦的工作，劝他改恶从善。秦表示愿意站到人民一边来，配合游击队行动。一天，平子游击队派 10 多名战士，在联保处满地布置破盆烂罐，造成被袭击的现场。秦将全部枪枝弹药交给我们，秦老四及全部保警被捆了起来。游击队走后，秦即派人去湫头向驻敌报告，经现场查看，信以为真。

杨伯伦 1981 年 5 月 5 日谈南邑坳伏击战 1934 年有一次，我们几支游击队在南邑一带隐蔽，驻湫头敌人以为只是小游击队几个人，赶来打我们，被我们打了一个伏击，毙伤敌 7 人，缴枪 20 余支，余

敌仓惶逃去湫头。

郭廷藩 1981 年谈南邑坳伏击战 1934 年，宁马卅五师 1 个步兵营驻湫头镇，对驻南邑村的我三路游击指挥部构成威胁。我三路游击指挥部鉴于敌军人多，武器精良，弹药充足，且借助于坚固的城防，不易攻击的特点，遂制订了诱歼的战斗计划。耀县游击队、底庙游击队存南邑胡同埋伏，四支队到湫头诱敌。敌见四支队人少，倾巢出动追击。当敌进入我伏击圈后，我游击队展开猛烈攻击，使敌不知所措，慌忙调头，逃回湫头。

吕占魁谈南邑坳伏击战 1934 年三四月间，正宁五支队从湫头诱敌至南邑坳，时在南邑庙院埋伏的正宁四支队等立即集中火力，猛烈开火，一直把逃窜的敌人赶进湫头镇。在这次战斗中，赤卫军队员吕金魁手拿 1 把斧子，夺了敌 1 支步枪。

陈国栋 1985 年 5 月 20 日谈攻打汪家堡子 1934 年春季，麻子掌住着一户姓汪的地主，家中 20 来口人，有七八支枪，占据一个小城堡，对我们开展工作不利，三路指挥部遂决定拔这个钉子。有天晚上，张仲良指挥平子游击队等部包围汪家堡子，冲进去抓住了这个地主，收缴了全部枪枝，处决了三四个头目。

高维平 1990 年 8 月 18 日谈夜袭湫头 1934 年，我在三路游击指挥部当兵，特务队曾经参加打过一次湫头。当时湫头驻宁马部队 1 个营，晚上我们摸进去，打了一下，拉了敌人 17 匹马，缴了十几条枪。

郭廷藩 1983 年 8 月谈夜袭湫头 1934 年，湫头镇驻马鸿逵部马瑞卿的 1 个骑兵营，经常骚扰百姓，对我们开展工作也是个威胁。三月初的一天晚上，三路指挥部的张仲良派人把我找去到南邑，对我说：“今天晚上准备袭击湫头镇，你给咱找几个带路的，一定要可靠”。我叫了陈盘(陈永秀)、李老五(李进荣)、郭进亭 3 个人，由张仲良分配了任务。我们分 3 路：一路绕到城西，截敌退路；一路由东边袭击；一路从南边攻打。我们这一路刚到场畔，被敌岗哨发现，打了 1 枪，

把1个战士打倒了。敌人听见枪声就乱了，我们也只得发起攻击。战斗不到10分钟，敌拼命向西逃跑，我去城西的一路尚未到达，未能消灭敌人。陈盘这人胆子大，战斗刚一结束，他就跑到敌人驻地拉出了几匹马。这次战斗，打死敌连长1名，缴获战马7匹、步枪3支以及部分弹药。

李明春 1983年6月11日谈夜袭湫头 1934年初，马鸿逵部队从山河过来，追击红一团，当晚敌部队驻湫头镇，红一团准备袭击马部，由于地理不熟，叫了南邑的一些人带路，我与陈玉合、李进荣、郭廷藩、郭进亭、陈盘等去了。当时，敌驻湫头城东郭德财家，毫无防备。红一团分作几路冲进去，马部急向王郎坡逃窜。这次战斗打死敌连长1人，缴步枪5支，战马7匹。

孙长青 1983年5月15日谈庙梁截击战 1934年4月下旬一天，回民支队全体队员正在五顷原子开会，接到交通员王长孝的报告：马步芳的骑兵在旬邑县杨胡同被我打败，一股散兵向正宁逃窜，经西渠转龙嘴子而来。据此情报，王世英带回民支队迅速赶往庙梁设伏截击。战斗打响后，游击队火力交加，敌慌作一团，全部被抓获，其中有1个连长叫马德忠的。这次战斗共俘敌12人，缴枪10支、子弹500余发、手榴弹22枚。

常有福、赵元恒 1983年5月谈宁县三支队月明原为民除害 绅士李自来、北八社团头马五娃阴险狡猾，心狠手辣，常仗着国民党自卫队的势力，催粮要款，无恶不作，月明原群众无不痛恨。1934年10月的一天，寺沟洼王富俊结婚，正在热闹的当儿，李、马二人突然闯到王家逼粮要款，并扬言限期交清，不然要拉到三义庙上扶梁。群众无不咬牙切齿。这事被游击队侦知，即派杨万恒假扮收羊皮的到寺沟洼将消息打听确实。第二天游击队埋伏在寺沟洼庄后坟场里，当李、马二人再次来到寺沟洼庄里时，游击队迅速包围了庄子，从南、北两面一涌而下。马五娃看形势不对，即跳沟逃窜，将腿摔坏，被游击队抓住用石头砸死。李自来被抓住带来柴桥子，打死在赵喜珍家的场畔里。李、马二人被处决，为月明原人民除了一大害，人民无不拍手称

快。

刘景范 1959 年 4 月 25 日谈陕甘边苏区创建的历史条件 陕甘边苏区创立前的政治形势、经济状况。在大革命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陕西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陕北是井岳秀在统治着，井是陕北的土皇帝。在对待大军阀的态度上，井是随风倒，蒋介石来了归蒋，阎锡山来了归阎，只要叫他不离开陕北，能在陕北刮地皮就行。甘肃是北洋军阀张帮统的部下黄德贵的势力。大革命以后，冯军陆续出关，杨虎城部队入关，打垮了甄寿山(甄的土匪军队在陕西西府曾发展到 30 多万人)，收编了苏雨生。甘肃驻扎着陈珪璋、杨子恒、王子元等杂牌军队。蒋介石的嫡系部队，那时在西北没有。陕甘边苏区，东而是井岳秀，西面是马鸿逵，南面是杨虎城。杨虎城的部队和我们有关系(如杨部中的张汉民和王泰吉部)，甘肃的刘宝堂和我们也有关系。敌人的正规部队很多、很杂，但总的说来是杨虎城、井岳秀和马鸿逵三部分。地方民团武装则有陇东的谭世麟和三边保安的张廷芝等。这些敌军中，井岳秀打我们比较坚决，马鸿逵部马禄骑兵旅曾经是进攻我们的主力之一。综观当时敌人的情况，军队虽然不少，但不统一，除了井、马较靠拢蒋介石以外，许多军队是反蒋的，多不认真的进攻我们。因此，可以说当时陕甘边是敌人统治较薄弱的地区，这对于我们革命力量的发展是个很有利的条件。

经济状况。陕甘边劳动群众遭受军阀地主的层层剥削，加上连年旱灾，生活是十分贫困的，尤其是宁县、合水一带，群众可以说是穷的光溜溜的。没衣服穿，有些农民夏天还穿着棉衣服下地；家里没有被子盖，只有一只看门的狗。这里的土地是很集中的，庆北的土地，几乎被裕茂隆一个地主兼商业资本家占去了。土地集中的过程是这样，清同治年间回乱大屠杀后，百姓死亡，地无人种，当时的政府规定：谁交粮，地归谁有。粮额 1 亩(实际几百亩地)交银子 5 分。象裕茂隆家的半县土地就是这样集中起来的。地主当然也靠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但主要的剥削方式是高利贷。保安金佛坪张廷芝，就是一个大高利贷主(他家土地很少)，放债利息是“驴打滚”。开始是月利 15%，

后来竟成了 100%。他家养了一批专门收债的武装。一些欠债的农民，一年秋收之后，除交粮款外，可以说是一扫而光。张廷芝收债，土地、牛羊都要，甚至人也要，弄去给他当兵。另一个剥削形式是放赌。兰边保安一带，主要是张廷芝放赌。这些家伙通过放赌，勾结良民子弟赌博，使参加赌博的人倾家荡产。张廷芝曾在一夜之间赢了他的换帖弟兄刘某(父外号叫“杭州驴”，中农)502 元，“杭州驴”的全部家产被张廷芝搞去了。赌博也有大鱼吃小鱼的事情，如高双城一个营长高玉亭(高部当时住保安)和他的换帖弟兄土地主袁景枚打麻将，一夜赢了袁 1.1 万元，第二天就把袁关押起来，把袁的家产打扫了个精光。强迫农民种鸦片烟，不种就收“白地款”，这也是剥削农民的方式之一。谭世麟、张廷芝等还用扩兵的办法搜刮钱财。扩兵的办法是：穷人“摊兵”，中农以上人家“摊官”，地主“摊大官”。摊一个兵的可以出 50 元而不当兵；官可以坐，但班长要出 100 元，排长要出 500 元。到了土地革命时期，陕甘边阶级分化更加激烈，中农以及中小地主破产，大地主土地财产更加集中，贫雇农增加。由于陕甘边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历来就是广种薄收，农民所受的痛苦，首先是土匪、灾荒为害，高利贷、苛捐杂税的剥削，所以我们进行土地革命时，群众对于分土地并不感到多大兴趣，而对于打土豪，分粮食、牛羊和衣物，不交粮、款和租子，则很感兴趣，当我们一宣传，群众就问我们“什么时候实行”。当我们打了一些土豪，分东西给群众的时候，有几百里路以外的农民前来分粮食衣物。

这个地区文化很落后，一个县挑不出几个上中学的。

也正是因为这个地区的农民极端贫困，受压迫重，所以农民的革命要求也特别强烈，历来富有革命传统。明末农民起义领袖高迎祥(李自成的舅父)是安塞县人，张献忠是定边县吴起镇后街人。太平天国的残部刘四，在保安和安塞边界，搞起过 4 万人的武装，在那里坚持了几年。辛亥革命的郑思成和后来的张九才，都先后领导过保安一带的农民起义。

武海湖 1982 年 4 月 20 日谈陕甘边区民团武装 南梁地区在 1933

年以前小股反动武装很多，玉皇庙川马莲岔堡子驻王占财、张彦庆的民团，十几个人，6条枪；白马庙川驻郭万成(儿子郭振海)民团，十几个人，8条枪；二将川刘坪堡驻阎登第民团，4条枪；南梁堡子驻白子文、刘生严民团；东华池堡子驻张继成民团，2条枪；平定川驻陈官佐民团，6条枪；葫芦崖窰子驻杜先民团，2条枪；太白堡子、太白窰子驻黄有法民团，80多人，三四条枪；柔远上李沟门驻绅士田生孝民团，10条枪；余家坪驻绅士杨如林(侄杨禄)民团，7条枪；朱家堡子驻朱孝民团，3条枪；新堡驻绅士庞富国民团，30条枪；城壕石嘴子驻绅士王华民团；元城驻绅士高明山民团，10条枪；贺家砭驻绅士贺廷彦民团；将台堡子驻杜成章民团，10条枪；怀安城子驻陶生福(保长)民团；李家梁子驻绅士李含英民团。

习仲勋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谈陕甘边苏区的创建 一、陕甘边发展初期(1933 年冬—1934 年夏冲破敌人首次“围剿”)。当我们确立了建立一、二、三路根据地，即以南梁堡、华池县为中心建立基础，再向南北发展，主力二十六军依据这个中心地区，南北策应，把一、二、三路根据地打成一片，创造大块的陕甘苏区。据此任务，我们的方针是准备与成立武装，开展游击运动。首先扫清阎家洼子、东华池、南梁堡民团赵老五及二将川这些地方的地主武装。又因这一带的群众很落后，高岗与我们就挨家挨户的进行宣传工作。并在该地缺乏牛羊的情形下，发动他们配合游击队分牛羊，就这样的提高了群众的觉悟。发展了二将川、白马庙川、南梁堡、豹子川、平定川、义正川、吴堡川等地的群众组织。吴岱峰、刘约三等同志去保安搞游击队，王子良去合水一带搞游击队，吴亚雄在安塞组织游击队，杨培盛搞义勇军。但我们把义勇军改为游击队时，因成分没有改造过来，不能执行党的任务，反而逃跑了一部分。到 1934 年春，在这个发展的基础上，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三月间，敌人举行了八路的“围剿”，甚为凶残，而终在我廿六军绕在外线作战的方针下取得西华池大胜利而被粉碎了，过了 1 月多天，敌人又大举进攻，我军在五顷原子打了败仗，敌人完全占领南梁一带，但由于二十六军打了几个胜仗，并绕在敌后方去进攻，使敌人退出苏区，粉碎了

这次“围剿”。在这一创立过程中，先进行了群众工作，建立武装，再开辟苏区，建立政权……

二、陕甘边苏区大发展与粉碎二次“围剿”(1934年夏—1935年夏)。

1、陕甘边苏区发展的新形势，首先，陕甘边的游击运动从1934年夏季以后，有了很大的发展，成立了保安、定边、庆北、合水、南区、富甘、安塞等地的游击队，总数约2700多人。这样的发展就是主力红军给群众帮助一些枪枝发展起来的。如南区游击队就是小石崖川群众向红军要枪，在红军给了4支枪，的帮助下，他们解决了民团建立了游击队……在这样大量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刘景范同志领导的红二团，强家珍同志的兵步营，王宝珊同志的保卫营，以及关中的红一团。其次，陕甘边苏区已扩大到东至临镇、西至定边、南至耀县、北至高桥川、宁条梁一带，建立了南区一带革命委员会(领导关中几个县)，庆北革命委员会、淳耀革命委员会、肤甘革命委员会，定边革命委员会、靖边革命委员会、合水革命委员会，安塞、赤安、华池等县苏维埃政府(是由各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起来的)。到1934年十月革命节才召开工农兵代表

会议，成立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设粮食、财政、经济。土地、肃反等委员会，并附设放足、禁烟、禁赌委员会，在军事上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刘志丹同志为主席，统一陕甘边的部队，从以上两方面看来，我们就知道陕甘边苏区是怎样的发展了。

2、粉碎敌人二次“围剿”。这次“围剿”是在1934年冬开始的，规模比较大，涉及范围也广，在马鸿宾以10个团向陕甘边进攻时，我们粉碎“围剿”的战略计划是：放弃南梁苏区到敌人的后方去发展。在果果川、头道川一带创造发展了新苏区。骑兵团在韩城、宜川、白水、蒲城一带切断冯钦哉的后路。关中红一团向正宁一带敌后进攻，并配合关中游击队坚持斗争，王宝珊带游击队向陇东发展，二团向三边发展，红三团、义勇军则上陕北配合红二十七军消灭高桂滋敌军。

在这个计划下，进行了反“围剿”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南梁群众受到了很大的摧残，但总是和我们一起坚持战争，终于在刘、高统率下的主力红军在杨家园子、延长、靖边等战役后粉碎了敌人的二次“围剿”。

3、陕甘边苏区实施的几个主要政策：(一)土地政策：早在 1932 年我们就开始了分土地，这时就有一些经验，其主要内容为：①没收富农出租部分的土地，地主参加劳动的可以分地；②分川地不分山地，这因为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川地也是种 1 年休息 1 年；③中心地区分土地，边境地区则不分，这因为边境区的群众自己的牛羊都不保，还要什么土地，而边境区因苏区的扩大而变成中心区时，仍进行分土地；④田、苗一齐分，因农民最需要的是苗，若分田不分苗就会降低农民的情绪；⑤没收地主富农多余的土地，牛羊分给没有地没有牛羊或少地少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⑥阶级划分是依该户的主要生活资料的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来决定的；⑦争取与改造流氓参加生产；⑧红军家属分好地，具有分地的优先权。(二)财经粮食政策：①发行苏票，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②成立集市便利交易，在白马庙、荔园堡等地建立了集市，群众大感方便；③保护小商人，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④对农民则是鼓励其生产，使之发展；⑤成立牧场、养猪喂羊；⑥粮食政策的中心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建立流动仓库，分散储藏，对群众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靠收买军粮供给军队；⑦财、粮来源主要是取之豪绅、地主，并有计划的向敌人夺取。(三)军事政策：①在战斗动员上规定了各种条例，如少先队、赤卫队的条例，动员方式是自愿的、武器是没收豪绅地主的，红军纪上也规定出新的条例；②成立民间递步哨，帮助红军做情报工作；③自愿的兵役制，群众参加游击队后，经过一个时间的训练成排连的编到红军里去；④对死亡战士有抚恤费与埋葬费规定；⑤费少队参战死后也有抚恤费与埋葬费；⑥奖励群众买武器，买到新式武器则特别奖励，收缴下的武器归私人使用；⑦在赤少队的基础上广泛的成立游击小组；⑧成立军、政干部学校，培养部队上的军政干部。(四)对土匪的政策：土匪为陕甘边苏区的内患，我们的具体政策：①有政

治背景的土匪则彻底消灭；②为群众所痛恨的惯匪无法争取，如杨谋子之类也采取彻底消灭；③此外的一些土匪，我们是采取一坊办法来争取与改造他们，例如对郭宝珊、梁占奎、贾德功等土匪就是采取改造的政策；（五）对民团的政策：①对同情靠近我们的民团则与之建立互相关系，或互不侵犯，如对罗连城、何子新、艾老五等就是这样；②对极端反动的民团则坚决消灭，如赵老五、梁保定等；③对那种不反动也不接近我们的民团，是在实际中教育他们，使之体验到我们的好处，向我们靠拢。（六）各种社会政策：①对哥老会采取争取政策，因苏区哥老会的人很多，大多讲义气，对我们有过不少帮助，并与我们有长期的关系，如其中有反革命分子，要发动群众去清除，不要直接出面干涉。②对扇子会、红枪会、硬豆、软扇等会道门组织，则采取争取政策，这里各种会道门在苏区内相当多，他们虽然迷信，但都带有反抗统治阶级的作用，在这一点上能改造他们；③颁布禁烟、禁赌、放足等条例，并向群众宣传不要赌，不吸烟，好好参加生产；④在劳资政策上，开始我们要求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手巾等物，多偏重于雇农方面，而有些雇农则好吃懒做，以后我们规定凡是雇农一定要劳动；⑤对红军家属、社会上的孤寡、残废，均实行救济。（七）肃反政策：①对敌探及有确实证据的反革命分子（如苏区内敌人的坐探）则采取杀掉的办法，若群众愿保，不杀亦无损于革命，可以保释予以感化；②对犯人分别主犯与从犯；③对确有证据的反动豪绅地主采取杀掉的办法，反之只向他们要粮索款并不杀掉；④每当处决犯人时经过群众大会决定，决不偷杀犯人。（八）对知识分子政策：我们对政治上清楚的知识分子一概相信，分配给适当的工作培养他们。（九）对白军的俘虏则采取教育、争取、改造、使用的政策，不随便杀掉。以后红二十六军里的排连长很多都是从白军中来的。（十）最后是在文化教育上是注意到了，办了些列宁小学，学生很多都是自愿的。

刘景范 1983 年 5 月 16 日谈苏区的创建 1933 年 10 月，陕甘红军的领导机关在合水包家寨子开会决定建立三路游击队，开辟陕甘边根据地。成立第一路游击队，强世卿为指挥，魏武为政委，以安定为中心，建立陕北根据地；成立第二路游击队，杨琪为指挥，高岗为政

委，以南梁为中心，建立桥山北段根据地；成立第三路游击队，王安民为指挥，张仲良为政委，以照金为中心，建立桥山南段根据地。这次会议刘志丹同志总结了过去失败的教训，对照井岗山的道路，提出建立三路游击队和三块革命根据地的正确主张，是战略性的决策，也是战略性的转变。从此，陕甘红军游击队和根据地在刘志丹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得到很快地发展。

1933年冬到1934年春，红二十六军在陕甘边南梁和照金地区消灭了大量的白军和民团，这两个地区在陕甘特委领导下，群众性的武装斗争广泛的开展起来了，各县游击队和革命委员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在这个基础上，于1934年2月在南梁地区建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5月成立了陕甘边区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1934年苏联十月革命节，正式选举产生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习仲勋当选为主席。到1934年底，陕甘红军粉碎了敌人五次较大的“围剿”，在旬邑、淳化、耀县、中部、宜君、宁县、正宁、合水、庆阳、保安、安塞、靖边、定边、富县、甘泉等十八九个县的大部分和部分地区建立起革命根据地。这些革命根据地都建立了临时的或正式的革命政权。每个县都有游击支队或游击队。红二十六军发展到4个团和义勇军共有2000多人。各县游击队共有1500多人。这是当时西北建立最早、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影响也最大的一支红军。

李生华 1983年7月4日谈苏区的创建 1934年2月，听人说南梁来了红军，我就到了南梁，给别人做庄稼(挑份子)三七分成。不久，革命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长白天章对我说：“兄弟！参加革命是咱穷人的事，咱一起干吧”！7月，我就正式参加了革命，当农会会员。“九·一八”纪念活动日过后不久，开会选举苏维埃政府，共选举政府委员25名，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张钦贤任劳动委员长，蔡子伟任文化委员长(只搞了一段，实际在政府机关)。原先的土地委员长是张步清，张家中比较富裕，对土地革命不热心，刘志丹对习仲勋说，你把土地委员长不换，土地永远分不开。后来，

我就接替张步清当了土地委员长。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政府机关驻寨子湾。

同时，成立了华池县、赤安县，贾生秀、边金山分别兼任县主席。华池县包括南梁、林镇、紫坊畔、山庄、白马庙、太白等地区。以后有庆北县、安塞县，安塞包括甘泉。1935年春，国民党部队“围剿”，我们在东部开辟了新的苏区，整个局面打开了，苏区连成了一片，成立了靖边县。5月，我任陕甘边区特委书记。

1934年冬，宁马部队骑兵在老爷岭一带骚扰，我奉命去合水带游击队。后来，赤安县大部被敌占领，我又去赤安开展对敌斗争，不久打开了局面，成立了县政府，我就离开了。那时的工作就两条，一条是分土地，实行土地革命；另一条就是搞武装斗争。各县都成立了游击队，有的县两三支游击队，枪枝不好，但灵活性很大。

陕甘边最早分土地在荔园堡。我先后去赤安县义正川、甘泉县马家老庄搞土改。当时，我们的土地政策是：地主的土地全部没收，或者只留给些不好的地；富农的土地只没收出租部分，即他们自己种不了的长余土地。为了解决活动经费，游击队有时也出去搞些浮财。把豪绅地主抓来押起来，让他们的家属出钱来赎。当时老百姓说话算数，大家说这人名声比较好，我们收钱后就把这人放了；大家说那人很坏，我们收钱后把那人也杀了，不杀老百姓不答应。有时候也拉豪绅地主家的小孩，让他们拿钱来赎，马匹、枪枝也可以。南梁地区由于土地集中。地多人少，地主又多住在庆阳城，林镇一带多是韩家的土地，元城一带多是田举人家的，都在庆阳，他们对前原的租子收的紧，后山有时顾不过来。因此，群众有比较宽余的土地，对土地的要求不太迫切，与陕北恰恰相反。

贾生秀 1959年4月谈苏区政权建设 1934年9月18日(纪念列宁)时，正式成立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当时代表的产生是10人至20人产生代表1人，代表会开了3天，代表约100余人。选举时进行了投票，选出习仲勋、贾生秀、牛永清为负责人。接着下边分了两个县，

一是华池县，主席是贾生秀，住址在荔园堡何家沟门；一是赤安县，主席是边金山，住址在吴堡川。省政府在南梁堡的寨子湾。

1935 年 9 月，陕甘省政府迁至义子沟。二十五军来后，习仲勋被从义子沟叫去。扣留在瓦窑堡。习被扣后，政府主席换为王生玉，副主席是朱开铨同志，后来主席是李生华。

1936 年初，省政府移至套统原，4 月移至王家坪，后迁到陇东。

张志富 1959 年 4 月谈苏区创建 1934 年春，刘志丹同志带着约有千人的大队上来，牲口也很多，这里的驻军赵福奎匪军早就跑了。红军到这里后，即展开了活动，蔡子伟等同志到处开会宣传，组织游击队、赤卫军。陕甘政府就住在这里，政府负责人是习仲勋同志，军委是刘志丹同志。这年下半年，又成立了党校和集市。党校是蔡子伟同志负责，轮训干部，讲课的是政府和军委的负责同志。为了便于交易，成立了集市。当时这里的干部和军队很多，吃粮是个大问题，同时，购买日用品也很困难。成立集市后，买卖粮食很方便，日用品当时也很多，还有白区的小商贩到这里来的。当时，使用的是油布票，如有人不愿要时，每集财政部都设有现洋兑换油布票处。当时，军队和干部买鞋的人很多，集市供不应求，后来政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给群众发布让做鞋，并规定了合理的手续费，群众都抢着做。

1934 年下半年，召开了陕甘边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了习仲勋同志为主席，正式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会期 3 天。当时开庆祝成立大会时，并带有阅兵大会，当时来了 13 个赤卫军大队，刘志丹等同志讲了话。

1935 年三月初一，马鸿逵军队进攻这里，我们的主力部队到陕北去了，这里有保卫队、庆阳游击队，约有 100 人左右和敌人作战，由于寡不敌众我们主动的撤退。九月间，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走后，我们又回到这里，动员群众挖敌人做的碉堡。就是在敌人占据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和赤卫军联系晚间到处贴标语散传单来扰乱敌人。

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撤走后，我们这里县委书记是崔凤鸣同志，

团委书记是张志德同志，县长高生荣同志。并召开了群众大会，恢复了这个地区，下面成立了 13 个赤卫军大队。当时游击队有保安、庆阳、合水 3 个游击队，不久这里成立了区，有白马区、林镇区。我们是白马区，区委书记是林盈保同志，区长是李兴高同志，青年书记是我(张志富)。我们这个区当时约有 1000 多户，包括白马庙川、二将川、玉皇庙川、东华池、半道川等地，人口约有四五千。当时，这个根据地西至悦乐镇，东到洛河川，南至太白镇、五亭子，北到志丹县的水泛区。当时，周围的敌人庆阳有谭世麟、国民党中央军；吴旗、三边有张廷芝、北边有马步芳。

1935 年冬季，开始分配土地，各村召开群众大会，讲清土地政策，评定成分。当时，不给地主分，将地主的土地、粮食、牛羊等没收，分配给贫雇中农。同时，政府在这个时期，还出了布告禁止赌博，禁止吸大烟，禁止缠足等。

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山区落后面貌，创办了列宁小学，我们这个地方 90% 以上的人都不识字，当时宣传人人要识字，动员学生上学，在石嘴子成立了列宁小学，教员张放心(女的)，学生约有五六十人。

国民党三十五师军队进攻后，仇良民军队还来了一次，住了约三四天就走了，谭世麟就跟仇团来，来时还带的铡刀，活埋了许多群众和干部，在阎家洼子就有两个坑，1 个坑就活埋了 12 个人。

这个时候，各村有妇女代表，各村还有农会组织，区农会主席是李麻子，工会主任是高明保，区妇联主任是吴月英，另外区上还有组织、宣传和青年等组织。

当时，游击队、保卫队，大部分是本地方的人参加，参加时采取自愿，只要一号召都抢着要参加，甚至连老汉也愿跟上游击队到外地拉土豪、拉牛羊去。

红二十五军来了以后，听说将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扣押。群众都说，这成了什么世事啦，为我们穷人谋利益的同志都被押了，红二

十五军是干什么的，又听说随便给你扣豪绅、地主、富农的帽子，随便杀人，群众都很害怕。

高生荣 1959 年 4 月 22 日、23 日谈苏区创建 1933 年农历十一月，荔园堡一带开始组织村政权。其方法是按村召集贫苦农民开会，秘密选举村主席。我被选为南梁村主席，主要任务是召集群众开会，侦察敌情，向红军报告消息。十二月，开始组织赤卫军。小河沟共八九十人，编为 1 个大队。当时根据地包括豹子川、小河沟、二将川等地，活动区域北至慕家沟，南至葫芦河，西至老爷岭，东至平定川，长宽各近百里。

1934 年二月，刘志丹率红军主力回师南梁。志丹将 9 个大队的赤卫军、群众集合起来，在荔园堡开了四五千人的大会。赤卫军拿着红缨枪和大刀，看起来很威风，志丹在大会上讲了话，他号召红军、游击队、赤卫队打张廷芝和张廷祥。他说：红军前边打，你们赤卫军后边来，分他(张廷芝)的牛羊，抄他的家。你们拿的红缨枪不塌火，一刺一个敌人。大会开了 3 天，杀了许多羊，大吃了 3 天。会后，红军和赤卫军即到脚乍川与张廷芝打了一仗，将张打败。红军遂将九嘴坡同家(志丹岳父家)、瓦子川胡新庄胡家等大豪绅拉走。

农历八月，在荔园堡召开代表会，成立了苏维埃政府，还成立肃反委员会和赤卫军指挥部。习仲勋同志任省政府主席，贾生秀、白天章任副主席，边金山任肃反委员长，朱志清、郑德明任正副总指挥。这时，赤卫军已有 13 个大队。根据地已发展到北至吴堡川、义正川，南至和尚原，东至平定川，西至柔远东沟、城壕川，长宽各约一百七八十里。成立了华池县，共分为 9 个区，区下设村。区有区主席、劳动委员、土地委员等，村有村主席。

这样从省到村的革命政权全部建立起来后，随即开始分配土地。对地主豪绅的财产全部没收分配，如对白马庙郭万城、豹子川杨庄科薛万铭等小地主，给他们什么也不分，撵上山去吃草，后经地主哀求，才允许给政府做活。对富农的牛羊全部分掉，对多余的土地(按人口

计算超过当地每人平均数的土地)也分掉，对招“门客”伙种庄稼的地也分。按人口平均分给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除在苏区进行土地斗争外，赤卫队和游击队还深入白区拉土豪、赶牛羊。当时，在白区拉回的土豪四五十人，统交保卫队管押，保卫队队长郭锡山，下辖2个中队。保卫队管押的土豪，除少数没有什么恶迹，经群众讨论释放外(如元城子姓高的，樊川李家因乡行较好获释)，对绝大多数土豪，在把他们的钱财、牛羊搞来后，都杀掉了。

省政府刚一成立，为了便于群众交易，就在荔园堡成立了集市，逢一有集，每月3集，对白区商人采取欢迎的政策，保护他们利益，使他们有利可图，开始白区商人来苏区者较少，都是一些过去常来这一带做买卖的商人，或在苏区有熟人关系的商人前来交易。后来就逐渐增多。他们来时，驮的盐、粮(细粮)、布匹等东西，回去时贩卖牛羊、烟土等。敌人企图封锁边境，但封锁不住，脚户还是常到苏区来做生意。

1934年农历三月，仇良民的军队1000多人，并带有太白民团20余人，从合水、太白、二将川一线进犯南梁根据地。仇军在这里住下后，将小河沟、自马庙、豹子川一带的房屋尽皆烧毁，窑洞全部破坏，粮食烧光，奸淫掳掠，无所不为。仅在老庄河一地就烧掉粮食10余石，麻材1窑，打锅3个，群众都被迫钻了梢山，其残酷程度是空前的。仇军住了6天后，从白马庙川北上，到保安县，挖了志丹家的祖坟，又从洛河川下去，经张村驿回到合水。

1935年春，马步芳以10团之众，分3路“围剿”南梁根据地。一路从城壕川、太阳坡，一路从柔远东沟，一路从二将川三里畔一带向苏区进犯。敌人在太阳坡一带受到阻击，在那里滞留40多天，后探知红军不多(主力红军北上安定)；遂大举进入苏区。省苏政府迁至洛河川，习仲勋同志率保卫队到瓦子川，被马家军追上，打了一仗，习带一部分人转到房家湾。当时群众为了反抗敌人围剿，就将粮食等东西坚壁清野，将牛羊赶入梢林，青壮年男女群众皆躲入梢林。马家军到根据地后，即在平定川、豹子川一带放火烧山，迫使大部分群

众赶上牛羊回来。敌人在寨子湾驻了3天，搜了3天山，企图捕获我革命干部。敌人为了破坏根据地，不准群众在南梁、小河沟、豹子川一带居住，强迫那里的群众移民并村，将那一带的群众家舍全部毁坏，门窗被挖光，炕被打掉，牛羊全部赶至庆阳三十里铺。

同年四月，就在马家军进犯南梁根据地后1月多时间，红军主力在安塞李家塌经3天战斗，打下了寨子，接着打下了兴隆寨，红军又北上至安定。当时，我到延安湾，任区苏主席，不几天，即到安塞工作。

六月二十前后，在林峁沟进行阅兵。参加阅兵的除红军外，还有8个游击支队和赤卫军1万余人。

九月，每县选几十名代表，到永坪参加会议，选举和成立陕西省苏维埃政府，会议开了3天，以后接着成立了干部党校。这时，红廿五军从白豹川、洛河川到永坪和红廿六军会师。会师后，经过劳山战斗，红军主力回到洛河川休整。不几天，又去打瓦窑堡，敌人被吓跑了。这时，陕北根据地大大的发展和扩大了。

此时，马家军退出南梁根据地，成立华池战区，我任主席，崔凤鸣任书记。当时，群众生活很苦，秋田没有按时种上，粮食全被敌人吃光，就靠野菜度日。为了开展工作，即组织游击队，从红军部队中领回枪杖23条，成立了三路游击队。这时，东北军驻在太白镇一带，马家军尚在庆阳卅里铺等地，但南梁根据地却发展到南至东华池，北至志丹，西至木瓜岭、麻子岵岷、吉胡坪，长宽各约300余里了。

十一月，东北军一小部来“围剿”，被游击队击退，俘敌数人送至洛河川。

腊月，游出队在含水北川麻子岵岷袭击敌人运输队，缴获马4匹，洋面数百斤。

王殿斌 1959年4月23日谈苏区的创建 1931年谢子长带领300余人到南梁，驻半月有余就走了。当时，赵二娃有80余人，在二将

川一带活动；杨培盛有 100 余人，在白豹川、二将川一带活动。谢子长到南梁后，刘志丹将赵、杨两部收编，加上谢部共 500 余人。经合水到三嘉原，成立了西北反帝同盟军，宣传打富济贫，开展革命活动。

1933 年农历九月，红军又到南梁，旗号是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王太吉任师长，刘志丹任参谋长，下辖两个团，红三团两个连，王世泰任团长；红四团有 1 个骑兵连，1 个先锋队，赵国卿任团长，共约 500 余人。到 1934 年农历九月，红军扩编为 4 个团，红二团团长刘景范，杨森任师长。还有义勇军 100 余人，郭宝珊负责。

1933 年农历九月，红军到南梁，即成立了保安、庆阳、合水 3 个游击队，保安游击队 11 人，刘约三负责；合水游击队 6 人，张振东负责；庆阳游击队 8 人，杨培盛负责。主力红军离开南梁后，游击队配合地方工作干部搞群众工作。到十一月，保安、合水游击队均发展到 40 多人，庆阳游击队发展到 60 多人。到 1934 年元月，这 3 个游击队均发展到 100 余人，新成立的安塞游击队也有 30 余人，由王子昌负责。

1934 年农历十二月，为支援红军和开展土地斗争，成立了后方委员会，吴岱峰任主任委员，下设特务班，进行拉土豪的斗争。由习仲勋、张策负责地方工作。开始，群众对红军还不很了解，红军一来都吓跑了。红军就以实际行动扩大影响，吃了群众的饭，都要折算成钱，以大烟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留下字条：“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解放穷苦老百姓”等等。离开时，把住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以来，群众对红军由害怕到不怕，再到关系密切。搞地方工作的干部，挨门挨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每村都组织一个农联分会，设分会长。还组织赤卫军等群众组织。到 1934 年元月，豹子川、二将川、白马庙川、荔园堡川都成了根据地，组织了南梁、玉皇庙、白马庙、二将川、东华池 5 个赤卫军大队 1000 余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年春季，南梁一带开始分配土地。五月，柔远川、脚乍川、白豹川，吴堡川一带的工作都开展了。到 1934 年农历九月时，根据地已大大扩大了，东到府君店，西到悦乐川，东西长 200 余里。

赤卫军发展到了 18 个大队，4000 余人。群众选代表，主要选贫雇农。召集苏维埃代表 100 余人，在荔园堡开了 7 天代表会，将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劳动、工农、土地、财政部及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同时，成立了华池、赤安两个县，华池县主席贾生锈，驻何家沟门，设 5 个区；赤安县主席边金山，驻吴堡川。12 月，又成立了庆阳县，接着成立了安塞县，主席王聚德。

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1934 年 5 月，红军主力在三嘉原与敌作战失利，部队被打散，1 个连的马全部丢了，先锋队 80 余人)仅回来 40 多个；骑兵连 40 余人，仅回来 30 个左右。接着，仇良明军队进犯南梁，烧毁民房，破毁窑洞，在阎家洼子活埋 24 人。红军主力从南梁退至洛河川，顺着大东沟绕过去，到敌后袭击敌人，缴获步枪七八支，不多几天，仇部即退委员会，吴岱峰任主任委员，下设特务班，进行拉土豪的斗争。由习仲勋、张策负责地方工作。开始，群众对红军还不很了解，红军一来都吓跑了。红军就以实际行动扩大影响，吃了群众的饭，都要折算成钱，以大烟作价付给群众，并给留下字条：“我们是穷人的军队，打土豪，分田地，解放穷苦老百姓”等等。离开时，把住地打扫得干干净净。这样以来，群众对红军由害怕到不怕，再到关系密切。搞地方工作的干部，挨门挨户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每村都组织一个农联分会，设分会长。还组织赤卫军等群众组织。到 1934 年元月，豹子川、二将川、白马庙川、荔园堡川都成了根据地，组织了南梁、玉皇庙、白马庙、二将川、东华池 5 个赤卫军大队 1000 余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这年春季，南梁一带开始分配土地。五月，柔远川、脚乍川、白豹川，吴堡川一带的工作都开展了。到 1934 年农历九月时，根据地已大大扩大了，东到府君店，西到悦乐川，东西长 200 余里。赤卫军发展到了 18 个大队，4000 余人。群众选代表，主要选贫雇农。召集苏维埃代表 100 余人，在荔园堡开了 7 天代表会，将革命委员会转变为苏维埃政府，下设军事、劳动、工农、土地、财政部及军事委员会等机构。同时，成立了华池、赤安两个县，华池县主席贾生锈，驻何家沟门，设 5 个区；赤安县主席边金山，驻吴堡川。12 月，又成立了庆阳县，接

着成立了安塞县，主席王聚德。

国民党军队对根据地进行了多次“围剿”。1934年5月，红军主力在三嘉原与敌作战失利，部队被打散，1个连的马全部丢了，先锋队80余人)仅回来40多个；骑兵连40余人，仅回来30个左右。接着，仇良明军队进犯南梁，烧毁民房，破毁窑洞，在阎家洼子活埋24人。红军主力从南梁退至洛河川，顺着大东沟绕过去，到敌后袭击敌人，缴获步枪七八支，不多几天，仇部即退出根据地。1935年正月，马步芳部队从镇原向根据地进犯，占领了柔远川、元城子至老爷岭一线。当时红军主力不在根据地，就靠游击队、赤卫军与敌人对峙。农历三月十一日，马家军到荔园堡，省政府从寨子湾迁至洛河川延家湾。红军在豹子川，张大岭和敌人打了两仗，在柳村原向敌人反击时，因发生误会，歩兵团和自己的骑兵团打了起来，敌人以后又向歩兵团进攻，所以受了很大损失，遂北上清涧安定一带活动。此后，只是游击队和敌人作战。

当时，省政府经白沙川向洛河川迁移途中，被马家军队追了10余里路，后被敌人包围，习仲勋同志被围在当中，我与习的警卫员且战且退，到后半夜，行至瓦子川，才摆脱了敌人的追击。但不见了习仲勋同志，找了很长时间，才在一个梢沟里找到他。我们集合了40余人，在瓦子川驻了7天，后到大东沟驻了3天，被马家军发现追杀，我们又被打散，习仲勋同志骑马脱险。后又集合了一些人，才到延家湾驻下来。

1935年四月，红军主力在绥德解决了高桂滋两个连，缴获轻机枪33挺，步枪40余支，子弹8箱。遂到洛河川下寺湾开庆祝大会。此时，红军主力2000余人，编为两个军。赤卫队3000余人。在庆祝大会上，杀了永宁山两个团总。大会后，接着打下了高桥、安塞、李家塌(缴获步枪28支)、镇定、安定、临镇等地。

1935年七月，红廿五军到陕北，从豹子川、白沙川到了洛河川。八月，东北军来“围剿”，劳山战斗中，解决了敌一〇九师3000余人。

九月，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在榆林桥战斗中，消灭敌一〇六师一个整师。

劳山战斗后不几日，由于“左”倾路线错误的肃反政策，习仲勋等同志被捕，押送瓦窑堡，王生玉任省主席。

在南梁一带，过去有许多民团：黄世林驻太白，赵富奎驻二将川，白子文驻南梁，路武学驻永宁山，刘生枝驻柔远川，童八驻九嘴坡，李鸿轩驻合水，谭世麟驻庆阳一带，陈珪璋驻平凉一带。

张钦贤 1979 年 9 月 17 日谈苏区的创建 1933 年秋季收割庄稼的时候，刘志丹率红军部队来南梁，在荔园堡消灭了国民党张廷芝部的梁邦栋营 100 余人。春节前，习仲勋、张策都来了，在这一带发动群众，组织工会，说我是工会的会长。工会做雇工的工作，活动长工向地主做斗争，要求增加工钱，换衣服等。当时也组织赤卫军，我们这里大队长是张步云。我与张志德、张志福、李元恒 4 个人一起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张志德是支部书记。农历三月，仇良明、谭世麟部队来“围剿”，活埋了白阳珍、李青山等，杀了 6 个人。仇部撤退后，成立革命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白天章任副主席，下属经济委员长呼子录，肃反委员长郝文明，土地委员长张步清(后季为李生华)，劳动委员长牛永清，张策是秘书。十月在荔园堡开了几天代表会。十月革命节那天在戏台上开大会，宣布成立苏维埃政府，习仲勋任主席，刘志丹给习仲勋授了印。政府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劳动委员长是我，肃反委员长郝文明，土地委员长李生华，财政委员长呼志录，军事委员长刘志丹，文化委员长蔡子伟，粮食委员长武生荣，张文华为秘书。当时惠子俊是特委书记，吴岱峰在军委会工作。大会后，在荔园堡河西台地上检阅，参加受检阅的除红二十六军部队外，还有 27 个赤卫军大队，柔远川，白豹川，吴堡川、瓦子川、脚乍川、麻地台川、豹子川、二将川、雷家川，杨清川的都来了，共约 2000 多人。

武海潮 1979 年 6 月 20 日谈苏区的创建 南梁根据地创立初期，我们阎家洼子村主席马振元，我是村会成员。当时主要是慰问红军伤

病员，搞募捐。冬季，在荔园堡老爷庙上开代表会，我是农民代表。代表共有八九十人，不上百人。选举时，我找刘志丹写选票，共写了二十二三人。选举后开大会，蔡子伟主持，会上还给习仲勋授旗来。

1935年4月，马家部队进攻，驻到南梁荔园堡的转嘴子、九眼泉，直到秋收时才走的。赵富奎的还乡团也来了，到处抓兵，有的群众分的牲口被赶去了，李家湾有公家的六七十只羊被吆去了，开始，群众都跑到山里，有的跑过保安去了，五六月才零零星星回到家里。

马家部队撤离后，我们政府的一些工作人员回来，成立了华池战区，崔凤鸣是书记，高生荣是主席。恢复了7个乡：即阎家洼子、玉皇庙川(高台以北)、林镇、南梁、白马庙川、二将川等。战区机关驻荔园堡，并开始分配土地。我当时是乡主席。这一时期很“左”，打土豪，分土地，分财产，包括衣物、农具一齐分，把地主扫地出门，以后又给补充留了一点土地。每个村还留五六亩公地，是最好的，给红军解决经费供给。

11月，战区机关搬到红崖洼，开始搞肃反，武生荣被崔凤鸣杀了；中央派出去搞兵变的1名干部，引回3名联系起义有关事宜的，也被杀了。

南梁政府发行的苏币是用白布印的，上面刷一层桐油。票面分为1角、2角、5角三种，当时叫苏票。拉土豪拉去的高六(高明山)专门印票子。

王生金 1959年4月21日谈南梁一带的群众工作、土地改革、经济文化建设 1933年，刘志丹率领红军到南梁，消灭了荔园堡梁邦栋部，随即开展地方工作。当时，刘志丹、王世泰、杨森等同志作军队工作，习仲勋、张策等同志做地方工作。红军初来时，白天深入群众中开会宣传，晚上就走了。第二年政府成立后，这里的工作就大大开展起来。政府机关驻南梁寨子湾，粮食科长杨玉亭，医院院长马锡五。

这一带开展初期，参加红军游击队和赤卫军的人很多，每区每村

都有赤卫军组织，壮年男子几乎全部参加，有些老人也参加了。赤卫军总指挥朱志清，副指挥郑子林。红军军纪严明，威信很高，群众主动要求参军，当了红军的不少。少先队也组织起来了，少年儿童按自然村编为小队，荔园堡 3 个队员，我任少先队主席。少先队受赤卫军领导，任务主要是开会和斗争豪绅。赤卫队活动很活跃，对保卫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例如，赤卫队曾配合游击队打过旦八寨子，将地主的白羊赶回一群。还配合红军守卫老爷岭一线。我们这个队共 100 多人，9 支枪，每隔两三天，夜间就去骚扰敌人 1 次，使他们不能安稳休息。

革命委员会一成立，即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组织贫农团，开始了土地斗争。土地委员会设委员长 1 人，委员数人(区设四五人)。我曾任土地委员会委员。当时没有农会，就由贫农团负责领导土地斗争。这里的土地绝大部分都是属于庆阳恒义成、裕茂隆(皆为商号)所有，再加上当地的地主，几乎所有土地都是地主阶级的。荔园堡张清玉是个破产地主，但也有川地 200 多亩，山地 2000 多亩，粮食几十石。在土地斗争中，首先由土地委员会调查掌握和没收地主的全部财产，然后再定成份，进行分配。在分配时，首先照顾雇农和佃农，给他们全分的是好地，然后再按成份给其他缺少地的农户分配。这里的土地广，每人可分川地 10 亩。我家 5 口人，共分川地 50 亩，山地约有 100 多亩。对山地是采取拔块的分配方法，谁要多少就给他分多少。对其他财产的分配，也是先照顾雇农佃农。给地主什么也没有分，组织他们进行“打生产”。给红军战士和家属同样分给一份土地，给在白军中当兵的暂时不分地，但留有公地，待他们回来后，再给分地。1935 年春，由于这里农户增多，又采取抽多补少的办法进行二次分地。这时，给当地地主张清玉才分了一些坏地和烂窑。

土地改革后，政府领导群众主要抓粮食生产和牲畜牧养。原来这里牲畜很少，几乎没有羊。加之土匪常来抢掠牛羊，有钱的人都将牛羊赶走了，因缺乏牲畜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土改后分到了牛羊，畜牧业发展了，每村都有了马，有了羊群。当时每套牛可种川山地

100 亩左右，产粮二三十石。生产发展了，群众生活改善了，南梁一带农户也多起来了。这一带地多人少，横山、靖边迁来的农民很多。如荔园堡原来只有 5 户，逐渐增加到 20 余户，大都是根据地建立以后迁来的。

为了便利群众进行物资交流，开展贸易往来，政府发行了油布币。荔园堡建立了集市，苏币面额有一角(红色)、二角(兰色)、五角 3 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货币禁止流通。苏币币值稳定，很值钱，每元苏币相当白洋一元，携带方便，很受群众欢迎。当时，对从合水西华池一带来苏区做买卖的商人，采取欢迎态度。他们在集市上卖得苏币，可到政府供给处兑成白洋。荔园堡集市初成立时，每月 3 集，逢一(即初一、十一、二十一)为集。逢集日，白区商人运来兰、白布匹、粉连纸、绿红纸、油墨、食盐等物品，在集上购买牲畜、土特产，带走大烟和白洋。根据地人民主要是卖熟米，细粮、马料，并卖用兰布做的鞋，每双 1 块白洋。

在荔园堡成立了干部学校，主要训练军队连排长以上干部，吴岱峰、蔡子伟等同志任教员，学员约 200 余人。在转嘴子成立了列宁小学，学生近 60 人，男教员郝建德，女教员张芳馨。在群众中还进行了反对吸大烟，禁止赌博，提倡放足的宣传。

王殿斌 1979 年 6 月谈南梁一带的群众组织、政权建设 1933 年十一月，刘志丹来南梁，在芋子庄开会、宣传，留下习仲勋、张策、吴岱峰开展群众工作，组织农会、工会。首先在小河沟、豹子川开展，自家洼子村会张社宗负责、芋子庄村会王建保负责，老庄河村会邵凤山负责，焦台沟村会张子修负责，白峁村会田月喜负责。十一月下半月在四合台庄成立苏维埃，主席是白天章，管一道沟，逐步扩大。1934 年 2 月，在南梁(堡子东岷岷)成立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肃反委员贾生秀……农村编赤卫军大队：南梁、豹子川、小河沟为第一大队，大队长郑德明，辖 3 个中队；玉皇庙川、马莲岔为第二大队，大队长高生贵，辖 3 个中队；白马庙川为第三大队，大队长朱志清；二将川为第四大队，大队长梅生贵(后为阎树堂、王俊山)；葫芦河为第五大

队。

1934年农历九月，在荔园堡开会，有代表80多人，参加会的有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黄子文、吴岱峰、张策、惠子俊等。会上把革命委员会改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选举习仲勋任主席、贾生秀、牛永清任副主席；下属各部门的负责人是：土地委员长李生华，劳动委员长张钦贤、肃反委员长郝文明、经济委员长白天章、粮食委员长杨玉亭、军事委员长刘志丹、文化委员长蔡

子伟、工农检查委员长惠子俊、政府秘书长张文华、妇女委员长高敏珍。赤卫军总指挥部指挥朱志清，副指挥郑德明，参谋长梅生贵。成立大会，参加赤卫军18个大队，2000多人，举行了检阅。同时设立两个县：华池县主席贾生秀，副主席李彦，县址在何沟门；赤安县主席边金山，秘书张策，县址在朱家沟。华池县设立了4个区：南梁、豹子川、小河沟一带为一区，主席高生荣；玉皇庙、郭崋畔一带为二区，主席高生贵；石嘴子以北白马庙川一带为三区，主席白生贵；二将川梅园子至上刘坪为四区，主席边海旺。十一月以后又成立了庆北县(县址龙木庄，后迁黄大原)、靖边县(今志丹县境内)、安塞县(洛河川)。

1935年正月，马家军进攻南梁，红军在老爷岭一带抗击1月多，三月初十敌占荔园堡，十一日敌到小河沟。习仲勋带赤卫军100余人、红二团160多人撤退到瓦子川。九月，一部分工作人员回到南梁荔园堡，在李家沟门成立华池战区，由白凤武负责，保卫队长何兴旺，副队长郑兴。半月后，崔凤鸣来战区任书记，高生荣任主席。这时南梁政府在洛河川阎家湾。

1933年到1934年，南梁地区打土豪分田地，宣传的精神是谁种的土地归谁，但没有划分阶级成份。从1936年起，才按照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划定了阶级成份，并颁发土地证。

刘景范谈金岔沟农民联合会的成立 金岔沟的农民联合会成立于1934年二三月，白杨珍是主任。我在白天章家里住过，在那里还

跟人拈香结拜，就在金岔沟后沟烧了香。那时刚离开部队，想方设法和老百姓搞好关系，越亲近越好，需要拈香就拈香。那次拈香还有高岗，我们两个是红军里的，其余几位都是农民。在群众工作中，也发展党员，主要在青年农民中发展。但进展比较慢。

白万金 199 年 3 月 20 日谈柔远赤卫军大队 柔远一带是赤卫军第十三大队，惠连友是大队长。1934 年冬，成立南梁政府，召开庆祝大会检阅，惠连友带我们参加接受检阅的。

杨子勋、蒋成英、王殿斌 1979 年 6 月 2 日谈陕甘边苏区赤卫军组织 1934 年南梁政府成立时，南梁一带共 18 个赤卫军大队，包括南梁、白马庙川、玉皇庙川、二将川、桥河、刘沟、杜家河、平定川、东华池、脚乍川、白豹、安塞，吴堡川、樊川、义正川、麻地台川、瓦予川、苗村、阁家川。

李子贵 1979 年 6 月 20 日谈陕甘边区赤卫军总指挥部 我 1934 年八月到南梁赤卫军总指挥部当通讯员。当时，总指挥是朱志清，副总指挥是郑四(郑德明)，参谋长是梅生贵，秘书是史瑞生(史玉高)。另有 1 个通讯员叫杨林荣。总指挥部有 2 支枪，2 匹马。总指挥部管辖农村赤卫军共十七八个大队，七八条枪。管辖地盘，北至宁塞川(吴旗)，南至和尚原，东至洛河川(旦八以东)，西至柔远川(杜河、武家河、太阳坡一带)。记得起的大队长有：白马庙川大队张步云，后为朱志清；二将川大队梅生贵，后为阎树堂；玉皇庙川大队高生贵；荔园堡大队郑德明，后为陈贵存。十月革命节成立南梁政府，同时成立华池、赤安、安塞 3 个县。现在华池县紫坊畔公社阎庄、墩儿梁以东归赤安县。

白天章 1986 年 4 月 8 日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南梁根据地创建初期，在金岔沟成立了农民会，我父亲(白杨珍)任主任，贺二任副主任。那时候，我年青力壮，胆子也大，常给送信跑腿，张策就叫我跟上干。那是 1933 年冬天的事。

1934 年农历正月十二日(即公历 2 月 25 日)，在四合台成立革命

委员会，习仲勋任主席，我任副主席。习仲勋、高岗、张策搞地方工作。革命委员会下设委员会，委员长都是老百姓。边金山任军事委员长、贾生秀任肃反委员长、梁天爷任土地委员长、呼志录任财政委员长、张步清任粮食委员长。开会是由高岗主持的。

开始我是副主席，以后贾生秀当了副主席，我当财政委员长，直到这年十月。拉豪绅赶回来的牛羊牲口叫我卖哩，我既怕卖的贵了，又怕卖的贱了，觉着自己在地方上工作不适应，心里不畅快，给习仲勋谈了，要求去部队。十月我就到合水二支队当指导员去了。

刘景范 1986 年 11 月 7 日谈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 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是 1934 年农历二月以前成立的。我是二月带了几十个人来到南梁的。二月二曾在马大爷家里吃过粘糕。我见了习仲勋以后，习叫我去张策那里去领检，这时习已经是主席了。这次来南梁，我们那个游击队配合部队打了蔺家砭、元城，我们把高六送到南梁，就回保安去了。西华池打仗再没有参加，这时已到三月了，革命委员会肯定是这以前成立的。

张秀山 1988 年 4 月 20 日、1986 年 4 月 20 日谈南梁会议 1934 年 6 月(五顷原打仗以后)，在寨子湾召开会议，实际是红四十二师党委会议，我、刘志丹、习仲勋等人参加，权且叫它南梁会议吧，商定了几件事：①恢复特委。我们陕甘边特委原来在照金，第一任书记金理科，第二任书记秦武山。照金失败后，秦武山跟主力部队，包家寨子会议后到白区去了，以后被捕，陕甘边特委委员们就分散活动，机关也就垮台了。南梁会议才决定恢复特委，我当特委书记。我算是第三任书记，从 6 月到 9 月，3 个多月。特委机关人也不多，后来张邦英任组织部长(以后到南区去了)，原二十六军的党员班长张静元任宣传部长。特委机关设在南梁，记得在革命委员会后面那个庄子里。②成立军事委员会。南梁会议决定，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刘志丹任军委主席。③南梁会议还决定，杨森任红四十二师师长，高岗任政委。

张秀山 1985 年 5 月 14 日谈阎洼子会议 阎洼子会议,是在 1934 年农历七月即公历 8 月召开的,会期两三天,参加的人员是: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政委郭洪涛、参谋长贺晋年等,陕甘边参加的有刘志丹、习仲勋、张秀山、高岗,张邦英等同志。

会议由习仲勋、郭洪涛、张秀山主持。会上谢子长传达了中央北方局两封指示信,郭洪涛讲了话,其他同志也讲了话。王明路线给红二十六军扣的帽子很多,郭又长篇大论的讲了一通。

会议决定撤了高岗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委的职,由谢子长兼任;红三团上陕北,开展活动。这次会议影响不大,批评就批评了,打仗还继续打。会后,陕甘边特委发了个决议(即: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泌),内容有帮助陕北建立一师红军的任务,这在阎洼子会议以前没有提出过。

张邦英 1984 年 8 月 22 日谈阎洼子会议 阎家洼子会议是在 1934 年七八月间,开会时间只有两三天。当时谢浩如、郭洪涛、贺晋年带领陕北游击队一、二、五支队来到陕甘边,要求红二十六军去配合粉碎敌人对陕北的第一次围剿。另外,老谢还是北方局代表,他是当年三四月间由北平回到陕北的,回来带有北方局和上海临时中央局给陕甘特委及红二十六军的两封信。阎家洼子会议主要就是传达这两封信的,传达后郭洪涛发了言。有些事情是下面谈的,并没有在会上讨论决定。如派部队去陕北,支援陕北 100 多人枪的问题就是会下商定的。谢浩如带的游击队就住在阎洼子东北六七里的慕家沟,我们还去看过他。会后,陕甘边特委派红三团(此时只有红三团在南梁)去陕北打破了第一次围剿。另外,这次会后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认识,在路线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刘景范 1985 年 4 月 28 日谈阎洼子会议 阎洼子会议是 1934 年 8 月召开的,有人说 7 月,那是农历。参加会议的有陕甘边区特委书记张秀山,陕甘边军委主席刘志丹,陕北游击队总指挥谢子长(陕北游击队总指挥部是 1934 年 7 月成立的,当时有 120 多人,90 多支枪),

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习仲勋，还有郭洪涛、贺晋年，二路游击区总指挥杨琪，红四十二师师长杨森，还有王世泰、高锦纯、黄罗斌。三路游击队的张仲良、陈国栋由于在关中离得远，没有来得及参加，吴岱峰当时在豹子川军政干部学校，也没有参加。我当时带游击队在保安一带活动，防备张廷芝的破坏，回到阎洼子会议还没有开完，我只参加了最后一天。召开这次会议是由于：一、陕北形势紧张，敌人开始第一次“围剿”，要求陕甘边给予支援；二、陕北游击队发展了，武器少，经费缺乏，要求给予补充和解决；三、中央驻北方代表委托陕北特委转交陇甘边特委的一封信(陕北特委和陕甘边特委之间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陕甘边特委归陕西省委管辖，省委被敌人破坏后，几次派人和中央都没有接上头，就独立活动)。

北方代表的信纯粹是王明“左”的观点，把二十六军大骂了一顿。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很快恢复起来了，成立了四十二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解放了许多地方，这本来应该表扬，可这封信中却给戴了五顶大帽子，什么开展游击活动是“梢山主义”、“逃跑主义”、“游击队带土匪色彩”、“右倾机会主义”等。这次会议决定：①撤销高岗红四十二师政委职务；②陕甘游击队抽出 100 支枪，支援陕北游击队；③红三团上陕北，和陕北游击队共同粉碎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习仲勋 1945 年 7 月 11 日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在 1934 年夏，谢子长、郭洪涛 2 同志到了南梁，举行了阎家洼子会议。当时我们满怀热忱，希望在这个会议上，把过去斗争的经验作一检讨，谁知会议开始后，×××同志就大肆批评斥责陕甘为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撤了高岗的政委职，留党察看 3 个月。此后我们以兄弟党的关系，给陕北特委写了一封信，提出：①认为自己的力量已等于井岳秀、冯钦哉力量之和是一种过“左”的估计。②在现在革命阶段实行集体农场是错误。③乱杀人的办法是一种过“左”的肃反政策。④认为神府红三团已成为铁军，是不符合实际的估计，铁军应当为我们红军奋斗的目标，但还不是现实。根据上述事实我们指出：这是“立山路线在陕北党内的复活”。但×××同志并没有从原则上来看这些问题，而

进行宗派斗争，说我们是造谣，是侮辱陕北的党，并诬我们是受蔡子伟的影响。这也表明了志丹、××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对“左”倾机会主义斗争的继续与更加明朗化。

郭洪涛 1945 年 7 月在西北党的历史座谈会上的发言 1934 年 7 月间，我与子长同志列南梁，子长是北方代表的军事特派员，我是陕北特委的代表，这时北方及上海中央局对二十六军都有指示，我根据这些指示的精神，检查了二十六军的历史，召集了陕北及陕甘边军政联席会议(阎家洼子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我在政治上组织上都犯了错误，是以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反对富农路线的名义，反对正确路线。会后，连同报告记录都送到北方，当时对二十六军许多批评都是错误沟。如：在军事上刘、×已从过去斗争的经验里找到了以农民为主，军事为主，打游击战争，创造了梢山根据地的一条正确路线，我则反对逃跑主义，反对梢山路线；杜衡主张红二十六军南下，离开梢山，过了渭河，因而招致失败，这本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错误，而我认为杜衡“左”的还不够，反而批评二十六军是右倾机会主义领导的结果。在优势敌人西前，为了保存自己，转移阵地是正确的，我认为这是逃跑主义(如渭北及照金苏区)。关于收容土匪、改造土匪的政策是成功的(如郭宝珊的例子)，我以为这是招兵买马，拉拢土匪流氓，带有浓厚的土匪色彩。王太吉同志是个共产党员，曾领导过两次兵暴，后来牺牲的决心与勇气，我认为纯粹是在革命高潮下的投机。当时孙殿英到宁夏，写信与我们联系，刘、×给他回信做统一战线工作(子长同志也赞成，当时我批评这是对孙殿英的右倾估计。又批评革命委员会没有一条正确制度，游击队游击习气很大等，在杜衡使二十六军南下失败后，以××同志为首，把旧游击队收拾起来，逐渐恢复了二十六军，我不把二者区别开来看，有功的反而有罪，认为一些干部对形势的估计一贯右倾，这恰证明了自己“左”倾，自己看问题的方法，有个公式和结论，然后把事实都套到公式教条里去，这是教条主义的思想方法。此后我还批评他们在边界和梢山里不分配土地；其实在边界上敌我经常来往土地没有人敢要，梢山里用不着分配土地。在阎家

洼子会议上打击了××同志，给了他撤职留党察看3个月的处分，把正确的同志打下去，据我今天的认识这就是从路线上篡党篡军。他们怀疑蔡子伟是右倾，谢子长证明蔡子伟在北平和特科有关系，他们认为黄子文为右派捉起来了，谢子长认为黄虽有错误，但是党内问题，恢复了黄的自由。这两件事我都同意，以后撤×的职务，会议提议我任政委，自己觉得能力威望不够。坚决拒绝，后推谢任政委。在会议之后，我把写的文章连同会议记录送到北方，这是我把北方的“左”倾机会主义带回来而且发展了。我又把这里执行的结果报告上去，这样就使北方对西北党的估计更错误。

张文华 1979 年 11 月 1 日谈陕甘边苏区党政军建设 陕甘边区党的领导机关是特委，书记惠子俊，宣传部长龚逢春，组织部长蔡子伟，军事部长刘志丹，常委会常委有习仲勋、刘志丹、龚逢春、蔡子伟、惠子俊等。特委机关设在南梁堡子。1933 年在薛家寨时，书记是习仲勋。退到南梁后，习仲勋作了地方工作，直到南梁政府成立后才恢复了特委。

我是 1934 年农历九月初到南梁的。我到之前成立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牛永清。政府设有执行委员会，委员都是执行委员，我十月开始担任秘书长。同时，成立了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军委工作人员有马锡五(保管)、杨载泉(秘书)等。

陕甘边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政策和中央根据地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是蔡子伟起草，1934 年腊月的特委、省苏维埃政府的会议上通过。总的原则是：“依靠贫农，巩固地团结中农，区分富裕中农，不与富农混淆，反对富农，消灭地主(没收地主一切土地)，按人口与劳动力的混合原则分配土地”，“划分成份，先由贫农团通过，再经全体农民大会通过，再分土地”。这参照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文件——毛泽东主席的讲话起草的。

南梁政府当时组织了合作社，华池县各区都有，红三团还给捐款

六七十元。合作社组织群众养蜂、养猪、养鸡。当时这些都订有计划、并向各区和干部作了传达，可惜由于宁马部队“围剿”，未能完全实现。

红二十六军成立时只有 1 个团(叫老二团)，团长王世泰，政委汪锋。杜衡指示南下，在洛南失败后，基本是全军覆没。在照金地区，耀县地下党组织起义，王太吉骑兵团起义，还有李妙斋的游击队，在陈家坡会议上，对部队进行了集中统一。把李妙斋游击队、耀县陈学鼎游击队组成了红三团，团长王世泰；成立了义勇军，王太吉为司令员。在这之前将渭北游击队改为红四团，团长黄子祥，政委刘映胜(后为杨森)。新的红二团是以后成立的。1935 年在关中成立了红一团，团长陈国栋，政委张仲良(后为郭炳坤)。红一团成立初是 2 个连，三路游击指挥部的特务队为一连，连长张治怀。第二连连长姓马(胡宗南部杨步飞的六十一师手枪连班长，是兵变过来的。这个手枪连驻在宁县，9 个班长打死了连长，起义投诚变过来的。最早是十九路军部队)。郭宝珊原在黄龙山土匪梁占奎、贾德功部下当营长。这股土匪经杨虎城秘书杜斌丞做工作，准备收编为驻西峰的杨志恒师为一个团，路经合水时，我方派人慰劳。这股土匪到西峰，杨志恒师已撤走，无人发军饷，供军粮，给养困难，经过商议，叫郭宝珊假称兵变，到宁夏一带搞粮饷。1935 年 2 月，路经城壕川通过我们做工作，同时有合水、庆阳游击队配合，全部缴械，缴枪 300 条，成立义勇军。

张秀山 1986 年 11 月 7 日下午谈陕甘边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
1934 年 11 月，陕甘边根据地开了 3 天工农兵代表大会(刘景范插话：4 日至 6 日开的代表会)，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选出来了，7 日召开大会庆祝苏维埃政府的正式成立，刘志丹、习仲勋、蔡子伟等人讲了话。晚上演戏，龚逢春唱京剧，用纸条作胡子，白焕章扭秧歌，李登瀛也是好演员。群众反映说，革命队伍里可有能人啦!会后，各县苏维埃代表大会相继召开，照着样子办，苏区、红军发展很快，对苏维埃运动是一个很大的推动。所以，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是一次动员大会。当时的政策都是按照毛主席在第二次苏维埃代表大会

上的讲话制定的，有了正确的政策，也有了坚强的领导，从而使陕甘边苏维埃运动蓬勃的发展了起来。代表会是在荔园堡开的，但办公地址在南梁。政府旧址先在南梁上，后在寨子湾，特委机关在一户群众家里。

武海潮 1982 年 4 月 20 日、8 月 14 日谈工农兵代表大会及反围剿斗争 1934 年 11 月，在南梁荔园堡老爷庙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到会代表百十个人，会期五六天，最后一天上午投票选举，多数代表不识字，由别人代写，我请刘志丹写的选票。当时生活很艰苦，多数代表穿着毡袄、毡秧秧。会场布置也很简单，写了些红纸标语，桌子就用庙里的供桌，代表们坐的石头、砖头。庆祝大会在戏台子上，阅兵时搭了个台子，骑兵、步兵、游击队、赤卫军都参加了。

华池县政府成立是四五月间，在何沟门大场的槐树下开会，刘志丹讲了话，宣布贾生秀为主席。华池县当时 4 个赤卫军大队，配发了 40 支枪。

国民党围剿南梁，一次是 1934 年农历三月二十七日到四月初一，是杨志恒部的仇良民团，谭世麟也跟着。当时红军的物资一部分送到南梁了，大部分在阎家洼子。有打土豪拉的牛 30 来条，缴获的各种枪枝 60 多支。听说敌人要来，我们就把牛赶进梢沟里，把枪埋到墙根底、大场边，枪的上面埋了些婆娘娃娃的包袱蛋蛋。二十七日，敌人来驻到庄子里，把婆娘娃娃的包袱也挖出来了，枪却没有挖着。敌人这次共住了 5 天，活埋了 12 个人，有李青山、白杨珍、侯富、何连、杨二、马医宫，还有些伤病员。杀害了曹××兄弟俩、杨达等 4 个人。到保安刨了刘志丹家的坟。

另一次马家军队围剿在 1935 年。农历正月十五日，敌人就到了城壕川、老爷岭一带，由于我们的保卫队、赤卫军阻击，敌过不来。我们第二赤卫军大队与庆阳游击队邵凤麟支队在店蝼蛄一带阻敌，白天把红旗插在山上，人到沟里割草；晚上点起火堆，并到敌驻地附近放几枪。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不敢前进。三月十七日，邵凤麟游

击队跑了4个人，第二天敌人就过荔园堡来了。老百姓都被集中到岭上。我和李生荣到了赤安县，以后又到下寺湾。到九月习仲勋叫我们回去，动员老百姓回家。崔凤鸣，李生荣两人负责成立了战区。

红军和革命力量是1933年腊月到华池南梁一带的。1934年农历六月，红廿六军来南梁，开展地方工作，组织区、乡、村的革禽政权，不久，成立华池县，县长贾生秀，地址在何沟门。华池县辖4个区：一区豹子川，区主席高生荣；二区玉皇庙川，区主席林应彪；三区白马庙川，区主席白全贵；四区二将川，区主席边海旺。

1935年农历十月，崔凤鸣来南梁任战区书记，搞“左”的那一套。地主土地全部没收，富农给留一些坏地。当时每人分5垧地，无土地证。把荔园堡寡妇张老婆家打成了富农，财产全部没收，连一块馍也没给留，要赶上山去吃草。在金岔沟杀了许多人，连自己人也杀。王占元因为到富人家吃饭，就要杀，王占元跑了。我伯父因为6石糜子的问题，没弄清楚就杀了。

白天章 1983年6月6日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 1934年11月7日在荔园堡召开纪念苏联革命17周年大会。各路红军、赤卫军都回来了，主力红军有红三团、骑兵团，还有庆阳、合水、安塞、保安、富县的游击队也来了，大约有五六千人，大会开了5天。秧歌队还表演了文艺节目。临时革命委员会秘书张秀山宣布选举结果：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政府秘书长张文华，政府秘书张第，财政委员长是我，肃反委员长郝四，文教委员长蔡子伟，劳动委员长张钦贤、张静文是搞妇女工作的，但没有妇女委员长。呼志录是政府委员。郭锡山是保卫大队长。军事委员会主席是刘志丹，副主席边金山。

宋飞 1985年5周谈边区保卫大队 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保卫火队成立之前，我在红二团工作，1934年秋，党送我到红军干部学校学习，11月1日召开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抽我为会议通讯员(骑着刘志丹的小红马)。11月7日在阅兵仪式前宣布苏

维埃政府成立，同时成立了政府保卫大队。

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庆阳、华池、合水游击队集中于南梁堡，担任会议的保卫工作，会议结束时将这些游击队合编为南梁政府保卫大队。共有队员 300 多人。大队直属苏维埃政府领导，设 1 个大队部，郭锡山任大队长，宋飞任副大队长，文书、通讯员、供给员各 1 人(姓名记不清了)，大队下设 3 个中队，一中队长高生喜，二中队队长姓李，三中队队长姓自，每中队有 1 个指导员，1 个供给员(名字均不记得)。

保卫大队的职责主要是警卫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维护治安和押解犯人。在我任职期间，带领大队配合红二团打旦八(1934 年农历十二月)。战斗失利，在旦八活动一段时间又回到了南梁。

我在保卫大队工作只有 3 个多月时间，1935 年 2 月我回关中探家，党派我到赤淳县任主席(保卫大队以后的事我就说不清了)。当年秋天，关中“肃反”我被捕了，释放后在地方工作了 1 年，“双十二事变”后又回到了部队。

马文瑞 1943 年 1 月谈华池、庆北党史 华池自马区及温台区的一部分。1933 年冬，红二十六军由薛家寨一带行动到达上述地区，占据后即建立了根据地。当时将该地区划成两个县。即一是华池，另一是庆北。在 1933 年冬，党还没有什么组织，仅只有个别的党员。那时，个别的党员姓名如下：白天章、贾生秀、郝四及边金山等同志。到 1934 年，党的组织才正式建立起。在华池有 1 个区委和数个支部，区委的负责人是高生荣等。庆北也有数个支部，负责人有强家珍、李树林等。1935 年春因宁马军队的制攻，我军即放弃该根据地，而党随之被破坏。但宁马军队不久即撤走，因而在 1935 年下半年，我军重在该地恢复苏区和党。可是庆北区商到红军西征后才恢复。

蒋成英 1985 年 10 月谈南梁中心苏区的创建 1933 年冬，张策、习仲勋等同志就来到华池的南梁一带开展群众工作，首先调查了各阶级的状况，掌握了各阶级的思想动态，由于当地人民深受庆阳大地主“裕茂隆”、“恒义成”和当地大地主赵福奎等的压迫和剥削，生活十

分困难，革命的欲望十分强烈，因而在张策、习仲勋同志的亲自组织下，很快就成立了雇农工会、贫农团和农民联合会。

雇农工会，吸收雇农(长工、无地的农民)参加，当时在华池境内共成立了 12 个雇农工会，每个工会选举了 1 名主席。农民联合会由贫农、中农参加，富农也可参加，但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农民联合会由选举产生主要负责人。

群众组织发动起来后，还成立了赤卫军。当时华池县成立前就成立了 4 个大队，第一大队是周园子一带，大队长是郑德明；玉皇庙川一带是二大队，队长高生贵，白马庙一带是第三大队，队长朱志清；四大队是二将川一带，队长梅生贵。这是 1933 年冬 1934 年春的事。1934 年后季发展到了 18 个大队，朱志清任赤卫军总指挥部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参谋长是梅生贵。

赤卫队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1)搞好递步哨，每村都设哨口，白天 1 人，夜间 2 人。(2)传递信息，一发现敌情立即向乡主席和政府报告，当地绝大多数人都不识字，送的信大都是用纸摺的一个角，在上面插一根鸡毛，表示情况紧急，这些信传送很快。一村转一村都按时送到了政府；(3)清查外人，对进入本地区的陌生人立即报告给乡政府进行审查；(4)打土豪。打土豪是政府组织的。1934 年 4 月的一天，高生贵带我们 30 多个赤卫队员到旦八拉了土豪曹四，走到半路(义正川)，曹俊章带旦八民团追来，这时正遇郭锡山带的保卫队在这一带活动，配合我们来了个埋伏，击毙民团团丁 1 人，活捉 3 人。

1934 年 11 月，群众组织蓬勃发展，群众武装在各村相继建立。7 日，南梁政府成立时，宣布成立华池县苏维埃政府。随后，在何沟门召另了代表会，我哥蒋成德为代表，出席了这次会议。会上选举了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政府主席贾生秀，副主席李彦，下设劳动、财政、粮食、土地等部，贾生秀兼任肃反委员长，财政委员长武生荣，土地委员长常远祥，其他部门的负责人我就知道了，县址设在何沟门，下辖 4 个区。

一区主席高生荣，下设3个乡，一乡辖小河沟、豹子川一带，乡主席冯仁山；二乡辖东华池、土崖窑，主席高生珍；三乡辖算帐沟，林锦庙一带，主席×××

二区主席崔生荣，下设2个乡，一乡辖靠陕北的边沿地带，乡主席卜占珍；二乡辖玉皇庙、郭崱畔，乡主席×××

三区主席白生贵，下设3个乡，一乡辖荔园堡，何沟门、牛王台一带，乡主席张殿虎；二乡辖白马庙一带，乡主席赵生旺；三乡辖白沟门、郭儿湾，乡主席张振业。

四区主席边海旺，辖二将川的山庄、刘坪一带，多少乡我记不清了。

政府成立后，随即成立了华池游击队，就是以后的老游击队，初建时有队员7人，队长黄克秀。政府成立后，积极响应边区号召，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我记得政府成立前后仅在华池县内(南梁中心区)共打土豪12户。最大的是胡克升，共吆羊2000多只，牛100多头。

1935年国民党三十五师进占南梁后，县政府迁至洛河川，政权组织和党的工作转入秘密，有的地方也停止了工作。华池游击队在黄克秀的领导下，仍然坚持在南梁边缘地区的太白一带，寻机袭击敌人，部队发展到数十人。

国民党三十五师部队九月撤出了南梁，这时组织派高生荣、崔凤鸣、李兴高等同志成立了华池战区，战区设在李沟门。崔凤鸣任书记，高生荣任主席，张志德任青年书记，还有一个姓李的。1月后战区搬到了荔园堡，当时还成立了警卫队，警卫队住在政府下面，腊月二十六搬到了金岔沟，这时张建业已来，带来代万才任保卫局局长，一个姓李的任战区工会主席，张建业任书记，开始健全组织。财政委员长雷世英，粮食委员长折生应，内务部长李向红，土地委员长王春洁，工会主席李××，保卫局长代万才，妇女主任梅桂英，妇女干事许凤莲。团委书记张志德，少队部长武海潮，战区秘书杨再红，组织部长

李××。

1936 年正月十七八日，战区搬到山庄，这时马仰西由省委派来恢复苏区，任战区书记，张建业任组织部长，主席高生荣，副主席董海峰，宣传部长刘仲英，工会主席姚安杰(延川人)，其他人员好象没变。

1936 年 4 月，战区又撤到武家河，这时敌人来袭击战区委员会，战区撤回二将川的柳树湾。不久，敌人袭击庆北办事处，办事处迁到二将川同战区合并，成立了华池县。

战区有 2、个区，即林镇区和白马区，林镇叫二区，白马叫一区，二区主席张仲义。

我是战区游击队第一任队长，初建时有 7 人，30 多支枪，由于枪多，很快发展到 40 多人，主要是防守西北线，活动在白豹、元城一带。1935 年 10 月，我带游击队在怀安冉砭同藺士升民团相遇，我游击队员英勇作战，敌人逃跑，我队俘敌战马 1 匹。回到战区又出击太白，将东北军在直罗的败兵 3 人抓获，获子弹 400 多发，长枪 3 支。1935 年 12 月初，高有才接任队长，任期 2 月多，后调陈英利任队长，高有才任副队长。以后，这支游击队编入庆环独立四团二连，连长仍是陈英利。我当游击队长只有 3 个月，一直活动在西北线，以后到警卫队任队长。

王海清 1995 年 1 月 6 日谈赤安县苏维埃政府 赤安苏区是

1934 年春开始开辟的。同年 11 月 7 日，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在荔园堡成立，同时宣布设立华池、赤安、甘泉 3 个县。赤安县苏维埃政府是在今志丹县吴堡乡朱家沟成立的，以后在桃树嘴(今属华池县紫坊畔乡)、李台、高家沟、王家峁等地都住过。政府主席边金山(后袁万祥接任)，副主席黄廷雄，党代表张策。政府下设：秘书樊俊德，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赵玉文，劳动委员会委员长王海清，赤卫军大队部大队长王生贵。赤安县设 7 个区：一区 (水宁山)，区主席朱福；二区(樊川、必正川)，区主席郝应 春(后刘有华接任)；三区(吴堡川)，

区主席杜福仲(后李万成接任);四区(脚扎川),区主席李金堂;五区(白豹川),区主席杜守清;六区(杨清川),区主席贺满朝;七区(曹塔、顺同川),区主席董志良。1935年又增设了保安区,区主席高邦学;顺宁区,区主席范金祥;三台区,区主席高培荣。今华池县紫坊畔乡当时属赤安县吴堡区,为一乡。

高世清 1979年8月7日谈庆北苏区 1932年秋季种完麦,在柔远的柏树掌开群众大会,到会二三百人。会议由边金山主持,选举成立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开始提议让朱培福当主席,但群众不选,提议我当,大家一致同意。将材料呈到边区,结果批下来是强家珍为主席,我是副主席。县上没书记。县址设在龙木庄。县政府财贸部长高登洲,文化部长马仰西,畜牧部长朱培福,青年部长李向步,会计白连升,共7个人。冬季,在田家河成立区政府,主席李培福,秘书是马占荣,还有李富财。不久,宁马军队来“围剿”,住半年,敌退后才成立区乡。

黄镇 1979年8月8日谈庆北苏区 庆北县苏维埃政府是1934年十一月在庙湾的龙木庄成立的。县主席是强家珍(后阵亡于宁条梁),副主席高世清。是由张秀山、边金山、王宝珊、李树林等主持在柏树掌召开群众大会选举(举手表决)产生的。政府秘书王英,财贸科长高登洲,文化科长马仰西,畜牧科长朱培福,会计白连升,青年科长张芝。1935年2月搬到黄大原。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在田河成立了温台区政府,主席李培福。我们配合王宝珊游击队攻打了悦乐堡子,分了恒义和家的粮食。清查统计了温台、杜河一带的户口。庆北县管辖城壕(石嘴子以东)、温台、柔远、桥河打扮一带。庆北县辖区有4个游击队,即以高世杰、杨树林、张天长、张生杰为队长的4支游击队。

1934年宁马部队“围剿”南梁时,我在边区政府保卫大队。当时,为保卫南梁,根据地军民英勇奋战,1个赤卫军大队只六七十人,在老爷岭、墩儿梁一带抗击敌1个正规团20多天。我们保卫队二十七八个人,只有十二三支枪,在梁沟门坚持20多天。为了保卫南梁

政府，梅生贵(赤卫军总指挥部参谋长)英勇战死。

马占荣 1942 年 8 月 16 日谈庆北苏区 红军初到庆北，人民有些恐慌，经宣传解释，都知道了，刘志丹的名字也传开了。不久，就以赵占彪为首组织起来了游击队，刚发展起来，即被陈团

袭击。后来，游击队叛变，赵占彪牺牲了，指导员也牺牲了。后来，王宗万等带了些游击队，在温台活动，与李培福联络起来，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讨论分配土地。地区划分，柔远为第一区，城壕为第二区，温台为第三区。1934 年十月，李培福任温台区主席，我是温台区秘书。但李培福也管其它区的事。后来，宁马军队住到田家崾峁，红二团已到，我们就开会计划，怎样对付敌人，打了一仗，不分胜负，各自退却。后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正式成立庆北县。1935 年 3 月，宁马军队再次来进攻，我们就打游击，撤到合水一带。七月，从合水返回，重新组织游击队。九月十六日，我们杀掉了李万义，正式成立游击队。不久，又成立庆北办事处，我仍任秘书。城壕区已成立。十二月，庆北办事处住杏泥沟，李树林任办事处主席，李培福为战区总指挥。这时开始组织土地委员会，分配土地，但没有什么手续。1936 年正月，庆北与华池在关道岔开会，正式合并。

杨子勋 1942 年 8 月 16 日谈庆北办事处 1934 年三月间，红军游击队开始来柔远东沟活动，五月间就开始组织农会，由群众选举。十月，在雷家川建立庆北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强家珍。并在田河成立了温台区，李培福任区主席，我是土地委员。同时，柔远也组织了区政府。1934 年农历腊月初九，马家军队住悦乐，“围剿”庆北，二月初四(公历 1935 年 3 月 8 日)，红军在黄大原消灭了马家部队 1 个连。三月二十九日，敌人向庆北办事处进攻。直到这年八月，红军大部队来了，敌人才撤走。

李占义 1979 年 10 月 26 日谈庆北苏区 1934 年前季，庆阳游击队在队长邵怀德、政委张秀山的率领下，来温台一带活动，开辟庆北苏区。农历六月，在边金山的主持下，在杜家河成立了庆北第一个乡

政府，乡主席是李培福。同时编组赤卫军，我(当时叫李义)是赤卫军大队长。农村所有青年人都是赤卫队员，每村编1个班，每人1把矛杆。同样，每村成立一个村会。八月，建立了城壕乡政府。同时，在龙木庄成立了温台区政府，李培福任主席。不久，成立了庆北县，强家珍任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马仰西做党的工作。县址设田窑，后迁至黄大原。1935年春，宁马部队“围剿”根据地，庆北县工作人员有的撤退到东区，有的分散隐蔽活动。

1935年农历五六月间，李培福、李树林、田生弟等返回温台一带，成立了1个小游击队，叫庆华游击队，开始由李树林、田生弟负责。宁马部队撤离后，成立了庆北办事处，李培福、李树林负责办事处工作，田生弟任庆华游击队队长。十月间，田生弟率庆华游击队；与边区保卫队在悦乐街攻打东北军部队失利，田生弟阵亡。庆华游击队遂编入黄克秀的老游击队。

马占荣 1979年8月7日谈庆北苏区的开辟 1934年南梁革命委员会派张秀山、马仰西、强家珍、边金山、蔡子伟、张志孝、王宝珊等人来庆北开辟工作。首先组织赤卫军，共4个中队，中队长分别为：城壕杨树林，悦乐张生俊，钥匙沟高世杰，柔远张天孝。中队以下是班，队员扛的都是矛杆子。

同时，也组织了许多小游击队，如惠连友游击队，吕占海游击队，白万和游击队，王兴成游击队，王怀山游击队，李树林游击队，白生秀游击队，赵占彪游击队等。

成立庆北县苏维埃政府，强家珍是主席，我是秘书。马仰西是书记。县址设在黄大原。我们经常在杜河庙上开会，宣传开展春荒斗争。

杨子勋 1979年6月7日谈庆北县土地改革 1934年六七月，柔远一带开始分田地，没收了4户的土地，全分给种地的门客了。1935年春，土改还在进行，由于马家部队进攻，土改工作停了。1935年冬到1936年，这一带大搞，普遍地分地，并进行登记，发土地证到1937年至1938年了。

王占奎 1981 年谈太白的建党建政 合水最早的党支部成立于罗家塬小学，称为葫芦河党支部，时间是 1933 年农历八月，有党员 14 人，黄锁(即黄克秀)和殷云山分任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黄德明同志公开叫军事教员，秘密的叫党代表，成立支部时是张仲良宣布的，连家砭和苗村一带有党员 4 人，是刘志丹亲自发展的，也成立了党小组，归葫芦河党支部领导，比葫芦河川里的 4 个党小组迟成立了两三个月。葫芦河小组的党员有王占奎、张朝会、白栋贵和小学教员。

太白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于 1934 年农历十一月中旬，是继南梁政府成立不久就成立的，主席潘应乾。潘是刘志丹亲自发展的党员。副主席是高清荣。太白区管辖子午岭以东的合水地界。

张邦英 1985 年 5 月 6 日谈陕甘边南区 1934 年七八月，我由红二十六军调到陕甘边特委，当了二三个月组织部长，特委书记张秀山找我谈话，派我到南区成立南区党委。我去南区时准备带邵风麟游击队，恰在这时小石崖罗连城下边的人造了反，打死了罗，革了命，队伍来到南梁。这两支武装编到一起，共四五十人，出我带领到了小石崖。陕甘边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是秋末九月在桥山山脉中段东侧黄陵县(中部县)小石崖(即双柳村)成立的。我任党委书记，黄子文任革命委员会主席。在这之前并没有工委这个组织，黄子文原是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派驻三路指挥部的办事处主任。三路指挥部总指挥是陈学鼎，政委是张仲良。南区活动区域大，子午岭以东有黄陵、富县、甘泉、宜君的一部分；还有洛川，是以后发展的。子午岭西部和南部有宜君的石底子、转角、马栏以及耀县、淳化、旬邑、正宁、宁县等，以后还有彬县。

张仲良由三路指挥部先派去正宁、宁县一带开展工作，1934 年正宁就有了党支部，郭廷藩入党早，是第一个党支部的。1934 年秋末，与南区党委成立的同时，派李尚勤(原红四团的)、杜苑、杜林治到宁县、正宁等地成立地方工作委员会，工委开始就这 3 个人，可能就这时成立了正宁、宁县工委。1935 年夏秋，工委逐渐改成革命委员会。冬季，南区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成立新正、新宁县苏维埃政府。

1935 年七月以后，南区党委和革命委员会机关迁到正宁县的三嘉原，后义迁到南邑。大约八月份，我就担任了革命委员会主席，从西北工委调来的唐洪澄担任了党委书记。我们把各县的名字都改了一下，原来叫正宁、宁县、旬邑、淳化，我们改成新正、新宁、赤水、淳耀，还有 1 个叫永红县。这些名字都是我提的，因为我是主席。这时候，于午岭以东黄陵那一带的工作就交给了陕甘边特委，山特委另派干部去做工作。隔了两个月，红二十五军到了陕北，陕北开始搞肃反。不久，鲁贲带了 1 个团(实际上是 1 个营)来到南区。鲁贲来后当党委书记，唐洪澄调任组织部长。冬季，成立苏维埃政府，各县派了代表，在正宁县的三嘉原选举秦善秀为苏维埃主席，我为副主席。那时用工农干部，这个人是贫农，实际工作还是我搞。我当主席阶段，南区游击队指挥部领导是陈国栋。

张仲良 1982 年 9 月谈陕甘边南区 红二团南下失败后，我受陕西省委的指派，于 1933 年 7 月 21 日由西安返回耀县，同县委一起组织群众革命武装，配合王泰吉起义。王泰吉原是我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失去联系，当时任西北军驻耀县骑兵团团长。我到耀县的当天起义就发动了。耀县县委会议确定，迅速建立游击队，决定我和陈学鼎等同志立即到耀县阿姑社，发动农民，组建游击队。在党员和进步农民的配合下，一支 100 余人、六七十支枪的武装队伍很快建立了。陈学鼎任队长，我任副队长，张邦英任政治指导员。我们带着这支队伍，经过许多战斗，转移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的薛家寨。在那里，耀县游击队被编为第三游击支队。

王泰吉起义后，率部南进，途中遭敌截击，部队溃散，余众 100 多人也退到照金。由渭北游击队改编的红四团随后也来到照金。

1933 年 8 月 14 日，在照金根据地召开了有重大意义的陈家坡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习仲勋、高岗、秦武山、张邦英、张秀山、陈学鼎、黄子祥、王伯栋等。会议总结了南下失败的教训，克服了一些同志的失败主义情绪，决定成立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委，下辖耀县起义出来的抗日义勇军、耀县游击队、红四团

等。

10月，照金根据地失守。1934年夏秋之间，根据陕甘边特委的指示，我以陕甘边特委特派员的身份，到甘肃宁县湫头原建立了该县第一个农村支部。同年秋，特委决定将第三路游击队活动地区划为陕甘边根据地南区，在黄陵小石崖成立了陕甘边南区党委和南区革命委员会(党委书记、游击队政委为张邦英、革命委员会主席为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驻南区办事处主任黄子文)。接着在宁县、淳化等县相继成立了党政领导机关。还在农村发展了农会和赤卫队等群众组织。这年冬，革命根据地不断扩大，以小石崖为中心的关中革命根据地扩展到正宁、宁县、淳化、耀县以及黄陵、富县、宜君、铜川的一部分地区，游击队活动区域已达到东边沿成榆公路，西边靠近两兰公路的10多个县境内，形成了农村对一部分县城的包围势态。

郭廷藩 1985年7月谈陕甘边南区、新正县 1934年，苏区发展很快。4月，边区党委派唐洪澄同志为关中工委书记，张邦英任副书记，杜宛任组织部长，郭秉坤任宣传部长，陈国栋任军事部长，统一领导各县的建党、建政工作，为了便于领导，关中工委根据当时情况决定成立5个新县：即关中的旬邑、彬县、宜君各一部分地区和陇东正宁的一部分狭长地带，设立新正县；划铜川、宜君、耀县、淳化4县的各一部分衔接地区，设立铜宜县；划彬县，旬邑，淳化3县各各一部分地区，设立赤水县，划陇东正宁、宁县各一部分地区，设立新宁县；划淳化、耀县、三原3县的各一部分地区，设立淳耀县。这5个新县的设置，从行政系统上把分散的小块根据地连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对国民党政权形成了包围圈。关中工委驻新正县的南岭村。5月，成立了新正办事处，我任主任。封振宝、杜宛2人协助我工作，具体筹备新正县苏维埃政府的事宜，地址就在五顷原子里而的两顷原子槐树沟，后又迁到两顷原子。办事处只工作了不到3个月就遭国民党正宁县雷同春自卫队袭击破坏了。自此，我们就不能立脚了，转移到柴桥子一带活动。八月，成立了新正县委，这是关中工委所属5县最早成立的一个县委，卢永财任书记，李科任组织部

长，赵澄壁任宣传部长，我任统战部长，高得发(男)任妇女部长，还有个青年主任。当时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我们就用单线联系的方法。以严密党的组织，主要任务是调查敌情，培养骨干。在彬县、旬邑、宜君和正宁县城内，从广交朋友拉关系入手，经过许多周折，大体上掌握了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随之大力选拔了一批贫、雇农积极分子，作为开展活动的基本力量。还团结了除反动的地主分子以外的开明人士。对地方上的老知识分子，也进行争取和团结。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八月下旬，我们在张邦英的领导下，在湫头召开了旬邑、彬县、新正3县地方党政干部和贫雇中农代表大会，100多名代表在湫头经过3天的讨论，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会后，当选委员在张村开会分工，我当选为主席，左怀玉、李进荣当选为副主席，委员会下设民政、财政、军事、土地、劳动、审判、教育、粮食8个部，分别主管各项业务。高仰月为财政部长，张占英负责军事，左怀玉兼管劳动，张崇林管土地，高学智管粮食，张化民管文教，张有本管公安。关于名称问题我们当时商量了一下就叫正旬彬革命委员会。记得当时杜宛等人还说为什么加正旬彬，我们当时解释说，这里不仅有正宁的，也做旬邑、彬县的工作，底庙是旬邑的，北极、永乐是彬县的，工作我们都做了。以后还要向那里深入发展。所以临时也就这么定下来了，一直到1935年底。

王立成 1981年5月22日谈正宁县建党 正宁县地方党组织的建立是1933年，这时有了支部，但并没有在一起开过小组会或支部会，因为开始是不公开的。正宁县最早的党员是1931年在刘志丹部队里入党的，那和地方上没有联系，我开始就是在部队经强龙光、强世清同志介绍入党的。1934年党员就发展得多了，支部工作也就公开了。

李进荣 1982年10月26日谈正宁县建党 1933年，杜宛来五顷原子，开展党的地下工作。他来后与我接头，也经常给我布置工作。10月我们这里发展了党员，我就是那时入党的。那时，每村有一两个党员，但互相之间谁也不知道谁，都是秘密的。后季，开始建立政权。那时，3个村设1个行政主任，每村有两三个村长。1934年成立

党支部，7至9人1个支部。3至5人1个党小组。

高仰月 1984年6月谈正旬彬革命委员会成立 正旬彬革命委员会，大概是民国23年，已经到秋季了。一天在湫头开会，人很多，约有一二百人，会开了几天。我也被选到里面了，主要管财政经济。那时候的经济没有什么，主要是打土豪来的财物，都归我管理。

郭廷藩、唐致祥、周儒谈正宁县土地改革 1934年，张仲良率领游击队在五顷原、孟家河、龙嘴予、洞子沟一带领导贫苦农民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没收了赵老八、郭进发、赵秉义4户出租的土地198亩，按照谁种谁有，指片划界的原则，分配给了何正兴、范宗义等10多户佃农，并宣布废除了所有的租债、契约、初步解决了部分贫苦农民的缺地问题。

郭全森谈永红县 永红县于1905年农历十月间在下南坡头村成立，主席是梁文汉，副主席是李银清。

我当时是一乡代表参加了成立大会。

刘邦彦 1985年2月4日谈永翁县 永红县是在后季成立的，地点在南坡头村两一群众家院里，我参加了成立大会。会议由赵红得(后改为赵红军)主持。会上选举了永红县领导成员：赵红得任县委书记，赵清宝任副书记，梁文汉任主席，李银清任副主席，我也是副主席。成立时间不长，即第二年正月初二，我去中央党校(在瓦窑堡)学习，两个月后回来，东北军已将永红县冲散了。

黄伯福谈永红县 永红县是在南坡头成立的，赵红军是县委书记，副书记是赵德宝，苏维埃主席是梁文汉，副主席是李银德。刚成立起来不久，东北军围剿。永红县即转入地下。后又将永红县所辖区域恢复为新正六区，六区区委书记是樊嘉祥，樊振述区长，我是副区长。

赵清保 1985年2月谈永红县 底庙一带原属新正县第六区，大约在民国24年十月间在这里成立永红县。当时为了扩大根据地，向

彬县、旬邑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关中特区指示而设县的。在这以前就派来了秦善秀、赵红(即赵红军)等人经常来这里活动，和群众接头，后来才说是在岁六区这块地方新成立一个县，叫永红县。

一天，在寺村原下南坡文一家群众大院里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永红县。记得会议是由赵红主持的。会上通过民主选举了县的领导人，梁文汉被选为苏维埃政府主席，李银清为副主席。县委书记是赵红，他是上边派下来的。我被提名当选为副书记兼文书工作。

永红县成立不久，东北军“围剿”开始了。这一带大部分地方被敌人占领了，县委机关就转入地下活动了，赵红即回关中去了。

武装方面，永红县成立后组织了1个保卫队，共十几个人，队长是东牛坡的万根墙，它主要是搞县委及政府的安全保卫工作。常在这一带活动的有新正县二支队、十七支队和赵铁姓带的新正游击队等。

罗金财 1981 年 10 月 20 日谈新正县建党建政 李德录 1932 年 8 月和平子游击队经何炳正、股云山介绍入党的。11 月，他离开平子游击队，负责宁县党组织的建立工作。我就是经李德录同志介绍，于 1933 年农历五月入党的。当时游击队中有党小组，我们一过组织生活，1933 年秋，宁县三支队中首先建立过党支部，卜富民任支书，党员有刘永培、王清殿，王占义、杨万恒等。

1933 年秋，在宁县月明原的杨家园子成立了党小组，由罗金财、张兴财、张金奎，李清海、刘则福 5 人组成。年底又发展了 4 名党员就成立了党支部，出罗金财任党支部书记。

1934 年春，九龙川(支书王秉祥)、九岷(支书董生瑞)，平道川(支书马应才)、金村(支书高富才)均成立了党支部，有党员 30 多人。到 1935 年十月，新正县已有党员 200 多名，因为当时关中特委召开第一次党代会，规定四五十名党员产生 1 名代表，新宁县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 6 名，即焦怀兴、王秉祥、罗金财、董生瑞、马应才、雷伟(因病缺席)，这次会在三嘉原关家晃召开。

会议研究了建党、扩红和对敌斗争问题。

1933 年年底，在宁县杨家园子成立了农民赤卫军，有 7 个村的青壮年 40 多人，赤卫军大队长张金奎，罗金财任中队长。

1934 年农历九月，根据小石崖南区革命委员会的指示，在杨家原成立了新宁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由李德录主持，小石崖南区革命委员会派李尚勤参加大会，并讲了话。参加大会的有三支队和农民赤卫军及农民群众四五百人。大会选举张有鹏任主席，王清殿任副主席。

王秉祥 1985 年 3 月 4 日、4 月 27 日谈新宁县 1934 年初在小石崖成立宁工委，主任刘永培兼。这个工委住九岷桃树庄，负责人是刘永培，组织部长李得录，李尚勤是否宣传部长，记不清了。工作人员还有张荣德、王立元、米世发(因害怕，到庞明胜那里去了一趟，以后再没有干)。1935 年春季“冶骡子”部队进攻，敌一个步兵队住在北庄子，庞明胜住南咀子。这一次“围剿”实际上是为了破坏 1934 年刘永培在这里扩大的根据地。这说明刘永培建立根据地就是 1934 年后季，政权建设的时间就是 1934 年后季，“围剿”也是 1934 年。

1935 年在杨园子成立政府，张有鹏任县长，后是李积成代理县长，张荣德代理副县长，西安事变后政府到下齐家，副县长是陈含玉，县长是由地委通知并经选举的白天章，没有到任。实际代理县长是陈含玉，鲁思温、郭进庭也在下齐家，李积成在湘乐，刘永培在栗掌任县长，还有王立成，解放后是罗金财。

1934 年 12 月或 1935 年 1 月正式成立新宁县政府，在杨园子开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当时下大雪，我哥王立元参加了会议，被选为县政府粮食委员，记得他穿着棉袄，还说青年农民张有鹏被选为县主席。

县委成立在 1934 年底，先有县委，后有政府，当时党委说了算。我是 1935 年 9 月到县委任宣传部长的。

刘永培 1985 年 9 月 8 日谈宁县办事处 宁县革命委员会办事处，成立于 1934 年后季。我当选为南区苏维埃政府(小石崖)副主席，并委派我为宁县革命委员会办事处主任，李尚勤同志为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开辟子午岭山区(九岘、月明原)一带的根据地，发动群众建立地下秘密政权，筹建宁县革命委员会(即县政府)。我的实际工作职务是第三路游击队宁县三支队指导员。在一些村庄成立赤卫队打土豪，成立农会等，直至 1935 年 8 月，我调离宁县，到淳耀一带第四路开展工作。宁县办事处及三支队手续交给杨伯伦同志负责，发展党组织由李德录同志负责。

陈天财 1985 年 10 月 15 日谈新宁县苏维埃政府 民国 23 年(1934 年)正月十四日，我参加了宁县三支队。北八社赤卫军大队长是张金奎。历来我到红一团。1935 年农历九十月，红一团(团长贾文义)参加了直罗镇战役，过次战斗我负了伤。战后部队向西开到了正宁地界，部队派人送我回家治伤，知道 1939 年才归队。我到杨园子时，大秋作物已收割完毕，正在打茬。我回家以层两三灭，就在杨园子张贵有家院里召开新宁县苏维埃政府成立大会，我也参加了，到会群众有 300 多人。县委书记记焦怀兴主持了大会，记得他宣布：第一项，鸣枪开会!保卫队行动迟缓，焦怀兴着急了，大产喊，“武中信(保卫队负责人)打枪嘛!”这样一喊，保卫队的人才前后不齐地鸣了枪(当时的武器也不好)。接着焦怀兴宣布，成立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又宣布了任职情况。并讲了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等内容。会上，杨园子富农张贵元当场烧了所有的帐(地约)。当时天气很冷，人们

抬柴烤火。开会的群众几次铺进张贵有家喂牛的窑里烤火，被干部叫了几阵子。那时我弟陈义得出生才 1 月多，我妈还坐月子里。弟是属猪的，1935 年生，1982 年 48 岁病故，他若在世，今年 51 岁了。

吕兴才 1985 年 8 月 28 日谈荏掌办事处 1934 年，我联系王占奎等 12 个人去找习仲勋，因王和习仲勋熟悉。到后季，就到了富县洛河川盼下寺湾找见了习仲勋。王找习要枪，习认为我们几个人力量单薄，就没给枪，却开了个条子，内容大致是：介绍

王占奎、吕兴才等在盘客荏掌一带发展苏区。下署习仲勋的名字，还盖了下寺湾机关的长方形大印。

当我与王占奎从下寺湾返到槐树庄时(同去的另外 10 个人，习给发了路费回家去了)，在这里养伤的许兴堂(党员，在杨森的骑兵连当指导员)，就听到消息，主动来找我们，说：反正我也病了，随不上队伍，咱们 3 个正好成立个组织，到荏掌一带开辟苏区。过了几天，我们 3 个人到盘客川庄子落脚。王占奎随之把全家搬来了(老母亲和一个妹妹)，我们都在他家生活。隔一段时间，黄克秀带游击支队到了武洛南边的枣木洼，和我们见了面，晚上由许兴堂介绍我和王占奎入党，接着成立组织。黄给许说：“你们 3 个人正好，你(指许)当主席，那两个娃娃(我和王占奎)当委员就行了。”确定我当组织委员，王占奎当宣传委员，组织名称叫荏掌办事处。我们管辖范围在盘客原的潘村峁子以上，共 4 个堡子：潘村、荏掌、罗后、武洛。我们当时的活动主要是给游击队提供消息、情报，到盘客撒标语。以后，我们就把 4 个堡子组织起来了，成立了村会和赤卫军。潘村村会长李学连，赤卫军队长×××；荏掌村会长刘志霄，赤卫军队长刘志卜；罗后村会长杨怀治，赤卫军队长杨俊岳；武洛村会长张吉祥，办卫军队长朱占成。

到 1935 年冬，荏掌办事处才和新宁县苏维埃政府、县委联系上，我到过杨园子，汇报了我们的活动情况。焦怀兴又派雷伟和李积成 2 同志协助我们工作。这时开始成立区乡，许兴堂派我到原来的部下杨伯伦跟前给他请假，从此回榆林去了，再没来。

米世英 1985 年 5 月 8 日谈宁县建党 1934 年后季，黄龙山土匪贾德功部队把我拉去到了庆阳，从十月到第二年正月，我都在贾的部队里。正月初八，这个部队哗变出来拉到二将川，改编为红军西北抗日独立军打游击。三月初被红军收了枪枝，山当时小石崖苏维埃主席黄子文介绍我回了家。所以，在此以前党在九岷地区的活动情况我不了解。

1935 年我回家后，记得刘永培、李德录、李尚勤、杨荣等同志叫我参加革命活动。十月在九岷南嘴子栗文杰家中，由李德录介绍张发元、刘汉良、董瑞姓、刘长生和我几个人入党，没有预备期。并宣布成立了党支部，宣布我担任支部书记。支部成立后直接与李德录联系，隶属关系我不清楚。

关于赤卫军的发展及活动情况，只记得总指挥是谭得智，副指挥米桂林。1935 年五六月份去春荣一带打了 1 个豪绅，出动了大约二三百人；第二次去榆林子井子崖窑打国民党保长任永仓，熊世耀是九岷赤卫军大队长，脚后跟受了伤。当时赤卫军的主要任务是盘查放哨。我从庆阳回来后就有赤卫军，这说明成立赤卫军组织在 1935 年以前。

当年十一月成立二区，我任区委组织科长，肖志鹏任区委书记，张荣德任区主席，杨林任秘书；十二月我去特委(三嘉狼牙洼)土地训练班受训，习仲勋是特委书记。宁县去受训的还有将台子的马正芳、杨园子的李双海。受训 1 个月后。回来就去九岷原、平道川、金村庙全面开展了土改。我担任县土地委员，参加的人有胡金玉、姚发元、张成和、秦麻子、魏举贤、韩万元、马烈贵、邵秉荣、刘富录等，共约 30 多人。赤卫军白天晚间都跟着放哨。土改中的县委书记是杨伯伦、县长是李积成、军事部长唐致祥、食粮部长王立元、财政部长杨万恒，县址当时没有固定地点。土地革命时期也计算剥削量，剥削量达到 25% 就是富农。土改搞到 1936 年三月，敌人进攻边区后就结束了。

韩秀升 1983 年 3 月 9 日谈新宁县建党建政 我们这一带开始来开展革命活动是刘永培、李德录、李尚勤。刘永培带着宁县三支队，可能是指导员。当时，开群众会宣传革命道理，也进行个别谈话。在各树组织村会，实际只有 1 个人。还成立了赤卫军，九岷原从鲁家子往东是 1 个大队，队长熊世耀，下面还有中队、班。平时分散，有情况就集中，盘查放哨，相当热火。以后，还到榆林子、湘乐一带打土豪，把土豪的浮财拿走，把粮食分给穷苦百姓。

1935 年农历十月，在九岷南嘴子栗文杰家由李德录介绍，我与米世英、张自发、刘汉良、董瑞娃(生瑞)5 个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在李德录的主持下，成立了党的支部，米世英任支部书记。

建立党支部后，接着就建立政权。先建乡苏维埃政府，一乡西坡、主席樊志清；二乡贾峪川，主席丁贵财；三乡韩坳，主席赵玉贵(赵之前是个外地人)；四乡左家川，主席贾立新；五乡九岷，主席是我；六乡平道川，主席朱万有；七乡金村，主席姓李。接着，各乡选代表成立区政府，区主席张荣德，区政府设在马洼。

不久，在山河韩坳的寺沟洼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是张三(有鹏)，委员有王立元、胡金玉等。同时，成立了县委，书记焦怀兴，王秉祥、李德录在县委任部长。

1934 年 2 月，宁马部队抄了南梁政府后来到九岷一带，放火烧杀。九岷编了个游击二中队，人员有韩天佑、何聚财、王富才、王升堂、郭振兴等，归宁县三支队管辖。

张自发 1983 年 3 月 7 日谈宁县建党建政 1935 年后季，我们这里开始建立政权，乡主席是韩秀升，我是乡政府委员。先建政权，后成立党支部。最早的党员有韩秀升、董瑞娃、张自发、刘汉良、刘长生、罗贵耀、米世英，都是李德录介绍入党的。成立党支部在九岷南嘴子栗文杰家中，支部书记是米世英还是刘长生，记不清了。

宋飞 1985 年 6 月中旬谈赤淳县 我是 1935 年春来淳化工作的。当时赤淳是个新县，为开辟工作而成立的，只仅是淳化边界上几个村子，东至城前头，西至庙上，北至清水原，南至王赵家原。

1935 年是个发展时期，我当时在南梁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保卫大队工作。由于回家过春节，张仲良就决定留我在关中开展革命活动。他说他给南梁写信，南梁方丽同意派我开辟关中区域，叫个赤淳县。当时也没有政府所在地，也没有人交待工作。我来后，黄子文带的封正宝，他说把封正宝给我留下。我是以苏维埃主席的名义，县委也没有人，只有我一个人，党政军都管，中心任务是开辟区域，扩大游击

队。我去后，当时就有九、十支队。我主持又成立了十一支队，队长李文喜。县上还成立了特务队，袁福太当队长。郭存信肯跑东区，铁王一带；我跑西区，王赵家、马家山一带。因为我家在中嘴，马家山、中嘴就是我的办公地点，就是县政府。除封正宝外，当地干部有马家山的马保金、任贵选和东沟畔的姚振华，都是我当时分工的部长。那时没有正式文字档案，谈了话后成了部长。封正宝是财贸部长，他不识字，一次跟我这个主席到农村去，吃了饭开个条子，写着“群众造反，支洋一毛”。

有组织介绍的就参加活动，没有介绍的不活动。我们也没有力量接收人们那么些支部。上边任命的主席还要经过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我是书记，但没有发展党员。当时黄子文给我说，有些情况、地方先不给我交待，因为还不巩固，来几个人算几个人。黄子文活动比较多点，我在这里筹建苏维埃政府，任命的苏维埃主席只当了几个月，组织关系发展的不多，主要是发动群众起来革命。到清水原开过两次会，王赵家去过两次。其他地方随去随走，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坚定他们的革命决心。

我是3月份来的，7月份麦收了走的。黄子文来召集了会议，地点在马家山。参加会议的有黄子文、宋志奇、马保金、姚振华、郭存信、王振喜。黄子文在会上安排了工作，就调我走了。我走后的工作由王振喜来搞。我在赤淳县工作时宋志奇来帮助我，名义是县委秘书。他原是耀县地下县委书记，组织破坏后，他来这里是上级组织在考验他。

到特区去是唐洪辰同志给我说的，调我去指挥扶风的“把把客”（游击队）。这一年的八九月份，刚把秋收了，特委又调我回来。我回到淳化，肃反开始后，我、杜宛、宋志奇3人就被捕了。以后没有见大家的而，也就离开了淳化。

任成玉 1982年12月、1983年11月谈赤木、淳耀 1932年到1933年，刘志丹领导红军闹革命，经常在淳化的马家山、蒋家山、

城前头一带活动。在农村组织贫农团，秘密发展共产党员，打开了淳化的革命局面。

1934 年刘志丹率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在甘嘴子消灭了敌何高侯五、七两个连，缴获了许多枪枝弹药。

1934 年成立了办淳工委，书记是金理科。接着，苏维埃政权就建立了，开始分东、西两个区。赤水苏维埃政权是在旬邑县土桥附近的烽火台成立的，大会代表有 100 多人。苏维埃代表中有我、张德发、焦兴财、梁积仓，部队的有任新财，赵家的赵金财、赵英俄，烽火台的梁德发，焦家畔的侯春泰。代表的产生是先提名，经过选举发红榜公布，代表大会是 1934 年冬还是 1935 年初，反正那时天气还很冷，大概是阴历的十一月吧。

代表会主持人有宋人、封振宝。先成立西区，后成立了东区。代表还有张积家，他在会上代表大家讲了话的。代表们选举王振喜为赤水县苏维埃政府主席，财政部长任贵选，保卫部长马保全，粮食部长梁积仓，土地部长赵英俄，武装部长任连俊(他当时任十一支队队长)。

宋飞当时主持赤水苏维埃政府成立，其身份是赤淳工委。

南区党委书记是张邦英，是他在梁武帝开会成立关中 5 县的。5 县的名字是他起的，他宣布的。

赤水县委是 1935 年 11 月成立的。地点是东沟畔或峨岷。县委书记依次是：金理科、郭仲良、李科、郭存信、周志宏、牛汉山、陈学鼎、郭廷藩、康润民、我。

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开辟苏区。第二、发展党组织，加强党的建设。秘密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贫雇农入党没有候补期，今天谈话就接收为党员。郭文学、罗吉玉、罗吉祥 3 人就是我一次发展入党的。我在东沟畔、梁家庄、卜家、旬邑土桥、清水原、张洪、彬县龙高等村都发展过党员。第三、发展游击队，壮大红军。当时武装力量是十一、十三支队。我当时还参加十支队，队长

王振西(后叛变)。我们靠这些支队从敌人手里搞枪枝弹药。一天晚上，我们打龙高联保处，我们把联保主任、保长、甲长的家属姓名调查清楚，到敌碉堡跟前，叫他们的乳名，敌人以为他们的家属在当场，因此不敢开枪，就乘势进攻，大喊缴枪不杀，这样敌人为了自己家属的性命，也就把武器放下来，然后人走出来，就这样，我们一枪未发，就搞到二三十箱子弹，100多条枪，发展壮大游击队。第四，开展土地革命斗争，打土豪劣绅-分粮分地。赤水(西区)成立土改委员会，赵英任主任，从旬邑的清水原、郝村、到淳化的蒲家、高俭、蒙家等村，都丈量分配了土地。1935年8月，东北军来了，分配土地工作才停止了。第五，开展白区工作。白区工作的重点是打击地方联保反动势力，打击土豪，争取民主人士。

我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到1944年底一直在赤水县工作。

贾兴奎谈淳耀县 秦河这一带叫东区，后来成立政权改为淳耀县。这里的苏维埃政权是1934年前后建立的，主席是姚殿新(小池人)，副主席是卢德明。西区后来改为赤水县，我听说主席是王振喜。我是秦河区(一区)一乡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黄龙合任主席。还有朱喜贵也是副主席。淳耀县成立后，县委书记叫郭存信，县长是封振保。

首先进行登记土地，接着就进行分配土地。我们这个乡(一区一乡)大约分了1400亩土地，分给了35户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民。这次土改时，上面派了个叫王嘉兴的同志在这一带负责工作。我们这个乡根据上边的精神成立了土改委员会，由刘兴财负责。在充分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乡上还成立了赤卫队，队长汪生财；贫农团，团长何生春；妇女会，主任唐秀英。土地分配工作进行后，群众生产积极性很高。我家共4口人，这一年就给国家交了1石多粮。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交来净是白米；贾家桥有一户分得户，那年交粮20多石。群众的热情特别高。

我们一乡共有4个行政村：桃渠河、后沟、吐鲁、史家老庄。

姚善芳 1985年4月谈赤水、淳耀县 淳化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是

1934 年七八月成立的。当时由南区党委书记张邦英主持，在蒋家山召开大会。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姚殿新、王振喜、任贵选、马宝全、张喜财、任新才、王堵华、杜宏年、封振宝和我。会开了以后，第三天我们回到家里，院子里的枣子已红了，我和张喜财还吃了枣的。

淳化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主席是姚殿新，副主席是王振喜。下面有组织、宣传、经济、食粮、军事、土地、肃反、妇女 8 大部。封振宝是经济部长，张喜财是土地部长，我是粮食部长。下面分了东区、西区。主席和各部部长都是东区 1 个，西区 1 个。

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就开展了土改工作。我家在西区，属铁王乡小池村。土改开始后，县上成立了 5 至 6 人的土改委员会，上边还派了个人叫张十(旬邑太峪人)和县土地部长张喜财具体负责，还有全成发，我们还在贫雇农中选了姚俊谦、姚自立参加土改工作。开始从秦河区进行，先登记土地，在这基础上再进行分配。秦河搞了一段，铁王正准备开始搞时，敌人“围剿”开始了，土改工作也就停下了。

1935 年七八月的时候，在东区、西区的基础上成立了淳耀、赤水县。淳耀县是在桃渠原开代表会的，有 100 多代表，我任粮食部长，所以就给代表们安排吃饭问题。会议选出的代表是封振宝。

王华等 7 人 1981 年 7 月 24 日至 27 日座谈创建洛河川苏区

(一)、洛河川的政治、经济背景。

5、红军游击队的早期活动。

洛河川处于陕甘、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的交错地带。早在陕甘游击队时期，红军游击队就曾经常途经或出没于这一区域。他们所到之处，斗地主、分浮财，摧毁反动的地方武装。在当地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影响。1933 年冬，陕甘红军经过数年的浴血奋战，几经挫折后，在合水包家寨召开会议。会议决定恢复创建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开辟三路游击区，建立以南梁为小心的革命根据地。红四十二师

恢复后，为执行上述任务和解决部队冬季被服供给等问题，决定分东西两路出击。刘志丹同志亲率红三团由合水东进，经府村川、高家哨等地，沿洛河川向北挺进。红军所到之处，地主、恶霸、土豪、劣绅无不丧魂落魄，四处逃窜。人民群众则欢欣鼓舞，拍手称快。我军进到葡萄沟时，遭到延安驻军高双成部 1 营兵力的追击。我军奋起反击，打垮了敌人的进攻，粉碎了敌人围歼我军的企图。红军的这次洛河川之行，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鼓舞了洛河川人民的斗志，成为次年秋开辟洛河川苏区的先声。

（二）、五、六、八支队的建立。洛河川苏区的开辟。

围绕南梁根据地的创建过程，陕甘边党、政、军的大批领导干部，诸如张邦英、蔡子伟、张策等同志就曾在中部(今黄陵)、麟县(今富县)、甘泉、安塞、保安(今志丹)等地进行了大量革命活动。

阎家洼子会议(1934 年 7 月)后，陕甘边特委先后派遣王聚德、赵世清、王志昌、郝新民、朱××(老朱)、扬培盛、杨庚武等同志分赴洛河川一带，执行开辟洛河川新苏区的任务。

1、五、六、八支队的建立。

七月间，由王志昌、朱××(老朱)等同志率人收缴了刘老庄、胡皮头等地民团的枪枝，组织了一支革命武装。随后，与王世明、奚玉山等股武装合伙，沿洛河川南下，连续收缴了关槐峪、封家湾、魏家沟、高家哨、山郎屯等处的民团武装。队伍扩充到 50 余人枪。八月间，陕甘边政府派遣郝新民等同志到达洛河川与之会合，在孟家洼正式组建了“陕甘边二路游击队第五支队”(又称安塞游击支队)，队长王志昌、副队长王世明、指导员郝新民。五支队建立后，以洛上川为据点，主要活动于洛河川、高桥川以及安塞和保安接壤的广大地区。他们所到之处，斗地主、分浮财，打击地方反动势力，为洛河川苏区的开辟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九月间，在原府村川一带的土匪崂青山部的基础上，经过整顿改编，组建了“陕甘边二路游击队第六支队”(又称麟甘游击支队)，队

长杨培盛、指导员杨庚武。全队约四五十人，枪二三十支。六支队建立后，以洛下川为基地，经常活动于洛下川、府村川、道镇及平原、东村一带。消灭反动的地方民团，开辟南线的游击区域，围困、监视甘泉驻军之动向，保卫洛河川苏区的安全。

五、六两支队，在创建、巩固和发展洛河川苏区的斗争中不断成长壮大，最后均发展到人枪二三百余。1935 年底，分别整编为安塞县独立营和甘洛县独立营。

“陕甘边二路游击队第八支队”(又称肤甘游击支队和红泉游击队)，原系 1934 年冬由冯长斗、杨文贤等人组织的一支游击队。腊月(1935 年 1 月)，在石门村正式改编为“陕甘边二路游击队第八支队”。队长冯长斗，副队长杨文贤，指导员杨庚武。全队初建时，约有 10 多人，枪 10 余支。八支队建立后，主要以石门村为依托，活动于劳山川、延安南三十里铺以及金盆湾、临镇一带，八支队在其发展壮大中，一部归入骑兵团，其余最后均归入红十五军团(劳山战役后)。

2、洛河川苏区的开辟。

在建立五、六支队和肃清洛河川各民团的同时，王聚德、赵世清等同志也已到达洛上川，并开展了积极的工作。他们宣传群众，动员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贫农团、雇工会，组织地方赤卫军，站岗放哨，检举坏人。10 月间，在安家坪成立了安塞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王聚德，同时成立洛上川区政府(先住安家坪，后迁住桥扶峪)，主席朱生奎。与此同时，洛中川和洛下川的群众也纷纷行动起来，建立贫农会、赤卫军，设立岗哨，传递信件。11 月，陕甘边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正式成立。12 月中旬(13 同)，安塞县革委员会正式转变为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仍为王聚德。

1935 年初，洛河川的基层政权建设全面展开。其步骤是：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经过民主选举，至下而上地建立村、乡、区政权；然后在区、乡一级设立党的组织(注：二、三区开始仅建立村、区政权，未建乡一级政权)。截至 4 月下旬，安整县苏维埃政府所辖

的各级政权已经基本上建立(计 3 个区):

桥扶峪区(又称一区): 主席朱生奎(后为许忠祥), 书记张怀有(后为霍德义), 秘书冯向学。全区有党员 30 多名(注: 一区党的活动是公开的)。辖 4 个乡: 孟家洼乡(一乡); 桥扶峪乡(二乡); 胡皮头乡(三乡); 雨岔沟乡(四乡)。

下寺湾区当时称银矿区, 由田家沟传说有银矿而得名; 又称二区, 主席强海鱼, 秘书曹秀。

王家坪区(当时称秦州区, 由这里的“秦州城”而得名; 又称三区): 主席许占刚(后为柴复来), 秘书白生彩。

至此, 方圆百里的洛河川苏区已经基本形成。

(三)、陕甘边党政军机关进驻洛河川。苏区的扩大。

4 月下旬, 陕甘边党政机关进驻洛河川。各机关的驻地是: 陕甘边特委驻王家湾(9 月迁驻下寺湾); 边区政府驻阎家湾(9 月迁驻义子沟); 陕甘边军委驻屈沟坪(9 月迁驻贺家湾); 边区政府经济委员会驻桥扶峪。不日, 陕甘边政府在胡皮头村召开群众大会(约二三千群众参加)。会议宣布: 陕甘边政府正式进驻洛河川, 安塞县苏维埃政府东进高桥川, 原属安塞县政府管辖的桥扶峪区、下寺湾区和王家坪区分别转归为边区政府直属一、二、三区; 建立了赤卫军总指挥部, 总指挥刘金声, 秘书李金堂, 统一赤卫军的领导(各区设赤卫军大队 1 个, 约二三百人)。

1、洛河川苏区的扩大。

陕甘边政府进驻洛河川后, 一面派出大批干部分赴三边、肤甘、临镇、宣川、洛川等地, 开辟新的游击区域, 建立革命政权。一而在原洛三川的基础上, 沿洛河向上、下游扩展。短期内, 使边区政府的直属区域由 3 个区扩大到 5 个区: 在洛河上游的永宁山一带建立边区政府直属第四区(后划归赤安县)。在洛河下游的道镇、府村川一带建立边区政府直属第五区(初建于四五月, 10 月间区、乡、村政权全部

建立)，主席阎福堂，副主席常庆有；区委书记魏占海，少共团委书记陈德胜；区游击队队长常登云，指导员吴光勤。辖 6 个乡(乡下没村，村称主任；小村称村长)。

与此同时，劳山川一带的革命政权也建立起来了(当时属肤甘县革命委员会)。6 月中旬(农历五月十三)，登山峪寨子被克后，即在登山峪成立了肤甘县委、县革命委员会，书记王生海。同时成立登山峪区政府，主席王国述。9 月中旬(农历八月十六)，登山峪遭敌马崇秀(马兆仁之子)民团袭击，肤甘县革命委员会迁驻延安龙儿寺，区政府迁驻杨庄科。10 月间，劳山川的区、乡政权全部建立。区政府仍驻杨庄科，区长李世成，书记刘汉英，组织刘汉祥，宣传王尚义，区保卫队队长魏玉山，指导员雷汉升。辅 4 个乡。

另外，在洛河川周围还建立了 3 个县级革命政权：在高桥川一带的安塞县苏维埃政府；在临镇一带的红泉县革命委员会；以王居仁为主席的麟甘县革命委员会。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2、洛河川的土地革命。

洛河川的土地革命是与洛河川苏区的开辟同步进行的。以其采取的具体形式和深入的程度上大致可以划分为 3 个阶段。洛河川的初创时期，由于当时还处于广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革命武装，摧毁反动的地方民团，红色区域尚不稳固。因而，仅限于斗地主，分浮财。七地的分配形式也限于谁种的地主土地，归谁所有。对没收地主的钱财、衣物、粮食、房屋和牛羊等，除留出部分供给临时政府的开支和干部、红军、游出队的食用外，大多分给了贫苦民名，以解燃眉之急。

1935 年 6 月，在洛河川区、乡政权普遍建立的基础上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分配运动。这次运动是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据陕甘边政府的有关法令进行的。各地紧紧依靠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划定阶级成份，区分土地类别，依据人口多寡，划定地块地界。通过数月的工作，洛河川的土地革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

由于三次“左”倾路线的影响，在土地分配中也出现了一些“左”的、过火的行动。诸如“地主不分地，富农分坏地”。或者把地富的好地都分给群众，给地富留少量不好的土地(如劳山川一些地方)；把地主扫地出门，男的组织“打生产”(劳改队)，女的给红军伤病员洗衣服(洛上川蔡家沟等村)；不适当地划定阶级成分，把地富与中农等同，侵犯中农利益等等。

1936 年春，对洛河川的土地分配情况进行了复查调整，最后由陕甘省政府正式签署颁发了“土地证”。至此，洛河川的土地分配胜利完成。

3、几次会议的情况。

陕甘边政府进驻洛河川后，在洛河川组织召开了许多重要会议，也有许多大的群众活动。其中规模和影响较大的有如下几次：

4 月下旬，陕甘边政府在胡皮头村召开群众大会。会议由王聚德同志主持，习仲勋同志讲了话。赤卫军、群众约 2000 余人参加了会议。

6 月上旬，陕甘边政府在阎家沟庙灵台(下寺湾北)召开杨家园子、延长战役视捷大会。红二十六、二十七军主力部队及当地赤卫军、群众约四五千人参加大会。会议由习仲勋同志主持，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讲了话。当地群众抬着猪羊等慰问红军。

8 月 1 日，在史家河滩召开赤卫军检阅大会。洛河川、安塞、保安等地的游击队、赤卫军约 4000 余人参加会议。大会由习仲勋同志主持，李景林、张文华等同志讲了话。会场上分别设有加入共产党、参加红军报名处。

9 月 7 日，徐海东、程子华等同志率领红二十五军到达保安腰子川。陕甘边党政军领导人习仲勋、刘景范等同志前往迎接。随之，陕甘边党政军各界在屈沟坪召开大会。热烈欢迎红二十五军长征胜利到达陕甘边根据地。会后设宴招待了二十五军连以上干部。

10月上旬，在史家河滩召开劳山战役祝捷大会。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讲了话。

(四)、错误肃反的产生及其被纠正。甘洛县的建立。正值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节节胜利，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一场旨在推行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肃反发生了。一时间，洛河川成了错误肃反的“前沿阵地”和“主战场”。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及其所属各县、区的主要领导几乎被一“肃”而光，大批革命同志惨遭杀害。

就我们所知，也洛河川一带被捕入狱的陕甘边各级领导有：习仲勋(陕甘边政府主席，被捕地点王家坪)、刘景范(陕甘边军委主席，被捕地点贺家湾)、马文端(东区工委书记，被捕于临镇)、张策、张文华(边区政府秘书长)、杨玉亭(边区政府经委会委员长)、划秉温(肤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王生海(肤甘县委书记)、王居仁(麟甘县革命委员会主席)以及李西萍、惠德仁等等。被捕并遭杀害的领导和干部有。冯树立(边区政府教育部长)、李郁(边区政府机关报编辑)、张锦文(女，原在肤甘县，后调直属四区干部)、张××(肤甘县赤卫军总指挥)、朱××(在白区搞兵运工作的一干部)、冯向学(直属一区文书)，保安县起义民团10多人等等。

那时，洛河川一带的恐怖气氛十分严重，保卫局、手枪队等横行乡间，动辄抓人杀人。搞的洛河川的干部群众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有的干部怨惧成疾，从此脱离革命(如一区主席朱生奎等)。下寺湾、油粉村、高家哨、王家坪、乱柴沟等村成了埋人、杀人的主要场所，一坑一坑的尸骨至今仍历历在目。致使陕甘边党政军的各级领导机构全部陷于瘫痪，根据地面临着十分严重的危机。

10月19日，党中央、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旗)。11月3日，毛泽东、彭德怀等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到达下寺湾，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随之，在下寺湾村的旧戏台召开了群众大会(欢迎中央红军大会)，毛泽东等同志讲了话。

不日，党中央作出决定，制止并彻底纠正了错误肃反。陕甘边的一大批党政军领导人陆续被释放出狱，重新回到人民中间，洛河川苏区重新恢复了生机。党中央挽救了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而三次“龙”倾路线的积极推行者们则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11月，陕甘临时省委成立，书记朱理油(后为欧阳钦)。同月，中共甘洛县委、甘洛县苏维埃政府在王家坪宣告诞生(不久，迁驻高家哨)，县委书记王生海，宣传部长朱志锋(后为郭子清)，军事部长刘崇明(后为朱志锋)，保卫局长刘志义(后为井道松)，少共书记贺××(后为田维杨)，白区工作部长李华堂；县政府主席王生荣，谢主席高尚贤、蓬海峰、魏树藩，秘书戴宗礼、李金堂(后为王居仁)，财政部长刘向阔，土地部长赵维强，国民经济部长王守仁。下辖5个区(原边区政府直属二区一分为二，分别同一、三两区合并，并改称甘洛县一、二区；高家哨成立甘洛县三区；原肤甘县登山峪区改为甘洛县四区；原边区政府直属五区改称甘洛县五区)。

从此，洛河川人民在党中央暨陕甘省委的领导下，进入了新的更加伟大的革命时期。

王生玉等 25 人座谈洛河川苏区的创建 1933年3月间，刘志丹同志带约百人以上从甘泉一带上来，在胡皮头杀了一个收税的外号叫杨木匠，并召开了群众大会进行了宣传。当志丹等同志从下边上来时被敌高双成部下驻甘泉的张水楼团发觉，随后追赶。第二天和红军在新庄科打了一仗，由于游击队寡不敌众即退到西南山中去了。1974年春，刘老庄寨子的群众由于红军宣传的结果，许多户自动移下来居住。7月间，游击队30余人来到这里，几个便衣队员跟随驮水的群众进入刘老庄寨子，打了几枪，收缴了民团枪12条，消灭民团后，即顺洛河川而下至胡皮头，准备消灭该寨子上的民团。这个民团得悉刘老庄寨子的消息后，即自动缴枪投诚，接着又在南边山上收了土匪余丑娃、怪四、怪五40多人。抢10多条。从此，西至方家河，东至胡皮头，约有60多里路被红军全部解放。由于初解放，还不十分巩固，游击队经常出现在这个地方。当时这里的游击队主要是五、六两

支队。五支队队长王世民、指导员郝新民，六支队队长杨培盛。解放后，接着就成立了临时的安塞县政府，地址设在安家坪（实际上不固定）县主席王聚德，土地委员李子全，优红委员边生祥，保卫队长肖风海，当时保卫队的工作是保卫政府和维持地方治安，管押豪绅地主。正如当时唱的“杀豪绅地主，肃清反革命”。另外，还设有财政、粮食、经济、劳动等部。组织了赤卫军和少先队的群众武装组织。

1934 年 8 月间，在胡皮头开了一次群众大会，约有八九百人，主要是从外地赶来地主豪绅的牛羊给群众分配。1935 年开春，这个地方更扩大，向东发展至石门子村，东西约有 100 里。

洛河川全部解放后，即开展了建立革命政权，分配土地，组织赤卫军少先队，成立集市，成立学校等工作：

第一、建立革命政权。1934 年秋，解放胡皮头以上地方时，成立了临时安塞县政府，县主席王聚德。同时在各村指定了村会长负责全村的工作，以后又成立了区乡政府，当时只成立 1 个区，地址设在桥镇，区主席是朱生奎，副主席边生祥，秘书冯向学。以下设了 2 个乡：一乡主席是李继成，二乡主席是刘万银，各村成立了贫农团、雇农工会的群众组织，选举了土地委员 1 至 2 人。当时村会长除负责全村一切工作外，还送鸡毛信（信上插有鸡毛，说明信的重要，要求传递迅速，因村会长系可靠的人）。贫农团、雇农工会的工作除协助村会长分配牛羊、粮食、打土豪分田地外，战争动员等方面起的作很大，另外还要地主给雇农发单衣、棉衣、毛巾等物。土地委员是专管计划分配土地，丈量土地等工作。

1935 年初，地盘扩大了。这时各村都进行了选举代表工作，为正式成立政府作准备，每 10 人中选 1 个代表。2 月间，各代表在胡皮头召开选举安塞县苏维埃政府组成人员大会。结果选出王聚德为县主席。县政府设胡皮头，接着成立了 3 个区，按原来的洛上川、洛中川、洛下川来分：第一区主席朱生奎，区书记张怀有，地址设桥镇；第二区主席张海渔，地址设阎家沟；第三区主席许占刚，地址设王坪。

区上的组织有财政部、粮食部、劳动部、工农检查部，优红委员、土地委员、赤卫军营长，还有青年、妇联，贫农团、雇农工会等群众组织。区以下设有 14 个乡，乡下是村，区乡政府负责人员都是经过代表选举正式产生的。

当时的特点，政权的产生，是由下而上的建立，先成立省苏维埃政府，其次是县苏维埃政府，再就是区乡政府。

第二、分配土地。1934 年冬季，成立临时政府后，胡皮头以上(不包括胡皮头村)各村对地主的土地、窑洞、牛羊进行了分配，宣布了地主的土地谁种归谁，窑洞谁住归谁的政策。对地主家庭的人员扫地出门，组织“打生产”，就是叫地主到机关内担水、扫院、背柴、铡草等，叫地主的婆姨给伤病员洗衣服，缝补袜子。当时对地主的土地，以村为单位，大概地进行了划拨，只是暂时的办法。

1935 年春，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后，各地即进行了正式的分配土地，在分配土地以前，先评定出各户的成份。依各家各户的主要生活资料来源及其剥削与被剥削的程度，划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中农、贫农和雇农。对地主的土地、窑洞、牛羊、粮食等进行了没收，分配给没有(或缺少)土地、窑洞、牛羊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地主也分配一部分土地、窑洞，但都是质量不好的，对富农只是征收其封建剥削的部分(即放帐、出租的土地和牲口等 1)，对宋庭财产及土地等均不没收。这种政策是根据 1933 年陕甘边特委的秋收决议案，以乡为单位打乱平分，每人两垧半(即 6 亩 2 分 5 厘)。当时分地时，只分川地不分山地，因为这时川道人很少，山地很多，没有人种。分配时，红军家庭分好地，有充分的优先权，对雇农也照顾好地、近地。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官兵不予分配土地。接着，没收了地主的地契、窑契和放帐的单据并当场进行了焚毁。当时在分配土地时还留了一部分公地，作为政府种菜地和投诚归来的白军战士之用。

但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父系，造成许多混乱，连富农刚够用的土地也要没收，对富农乱斗，乱没收。他们象疯了一样，看到

边区政府杨玉亭经济委员会的钱，也要没收。说是公款，还一定要没收，把群众斗争领导到这步田地，随便拿东西。

第三、组织赤卫军。赤卫军是不脱离生产的人民武装组织，任务是巩固苏区，消灭土匪，掩护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军队，扰乱和控制敌人；担任警戒、放哨、担架、捉土匪等任务。当时赤卫军动员的方式是自愿的，但每户至少有1人参加，拿的武器是大刀长矛和部分枪枝，这些群众武装组织又是红军的来源。有了这些群众组织，红军就得到补充和扩大。

1934年秋，临时县政府成立后，成立了两个赤卫军大队：第一大队长杨登华，第二大队队长周光富，两个大队约有200到300人，每个大队又有4个中队，每中队有1面红旗，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还写着陕甘边区赤卫军第几大队第几中队，旗中间画有五角星、镰刀斧头。

1935年春，随着地盘的扩大，赤卫军也进行了整编，按新划的区，每个区有1个大队。第一大队长杨登华，第二大队长曹秀，第三大队长刘金声，这时每个大队约有200到300人，

为了统一领导，统一行动，还成立了赤卫军指挥部，部长刘金声，副部长王继芝，参谋长陈德福。

第四、成立了集市。为了方便群众，便利交易，在胡皮头成立了集市，农历逢五集，每10日1集(初五、十五、二十五)，以前群众买东西要到百里以外的甘泉和安塞，来往极不方便，同时驻扎机关后，干部也多了，吃穿也成了问题，如粮食问题。当时我们的粮食政策是保证军粮，保证民生，对群众也不动员粮，也不“欢迎”粮。仅收买民粮，供给军队，但是收买民粮，集市是最方便的场所。这一带又不产棉，布匹主要靠白区供应。当时，对白区小商人，采取保护政策，允许其来苏区做生意，并使其有一定的利润可图。同时苏区也有一部分人到白区去贩货。成立集市后买卖的人很多，每集约1000人，甚至保安、安塞边界的人也赶到这里来。集市上有卖粮、布匹、鞋袜、

牲畜、吃喝等。为了便利交易，政府发行了苏票(油布的)流通金融，解决了市场缺少零钱的困难。同时，每集政府供给部设有苏票兑换现金处，当时苏票(油布票)很吃香，红军战士为了携带方便，争着兑换。

第五、成立了列小学。这个地方过去没有小学校，群众几乎都是文盲。敌人也利用这种落后状况，也希望这种情况继续保持下去，以便他们欺骗、敲诈、剥削和压迫。政府成立后，即住桥镇，阎家沟、王家坪等地各成立了1所列小学，当时每个学校有二三十人。阎家沟教师贺寿山，王家坪教师胡兆阳。学生的文具和教员吃用，全部由政府供给。

边区政府在洛河川时，在王家坪成立了军事学校，校长刘景范兼，训练对象是班排长干部，学员约有五六十人。

1935年3月间，马鸿宾军队进攻南梁革命根据地，红军为了避免重大牺牲，暂时放弃了南梁革命根据地。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出荔园堡迁到志丹县石峁湾住了10多天后，迁到洛河川的阎家湾，政府主席习仲勋，副主席贾生秀，秘书长是张文华。这时，根据地逐步扩大已发展了许多县。如靖边、赤安、安塞、鄜西、肤甘、甘洛等县，9月间，边区政府迁移到义子沟。这时红二十五军已来到这里，由于错误的肃反政策，在田家沟、下寺湾、王家坪等地，杀害了如小峰、张克宜、李彦、张静文等许许多多的干部。10月间又以开会为名，扣留了习仲勋主席，后送至瓦窑堡。习仲勋走后，“左”倾机会主义者就派了一个流氓吸大烟而曾受过处分毫无工作经验的王生玉代替主席(原副主席贾生秀到甘洛县代替李彦的工作)。在这时，洛河川群众很恐慌，如以前当过干部的赵兴旺吓的生了病，前赤卫队长周光密整天不敢出门。各村庄在白天群众的门户都是关着，很少有人走动。晚间早早都安了眠，白天就是在田间作活，群众也不敢向大路上瞅看，两三个月后边区主席换为李生华，副的是朱开铨。1936年元月，边区政府迁到套筒原。

刘景范 1984年5月谈陕甘边苏区党政军机关移驻洛河川 陕甘

边政府原计划在 1935 年 2 月间转移但并没有转移。真正的转移是 4 月才到甘泉县洛河川的桥扶峪。边区政府住阎家湾；陕甘特委住王家湾，军事委员会住屈沟坪，经济委员会住桥扶峪。

放弃南梁是有计划的，转移到甘泉县洛河川也是有计划的。因为，西北工委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有个指示：“要把红二十六六军主力集中到陕北和二十七军新成立的红一团配合消灭陕北的敌人高桂滋和井岳秀部”。红二十六军主力部队到陕北以后，发了一个战争动员令。准备消灭国民党中央军的高桂滋和陕北井岳秀两个师。高桂滋师是围剿陕北的主力部队，装备又好，但他们刚从河北调来，人地两生，容易消灭，也好补充红军的装备和力量，结果也是这样。

到了 9 月份，陕甘边党政军机关又搬到下寺湾一带。特委住下寺湾，政府住义了沟。陕甘边特委在南梁时书记惠子俊后调西北工委任书记，陕甘特委书记由李生华担任，李生华担任后义去陕北学习，实际特委书记是由习仲勋兼着。政府主席仍是习仲勋。刘志丹担任西北军事委员会主席后，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由我担任。政府当时下设由有：经济委员会杨玉亭，文化教育委员会冯树立，粮食委员全马锡五，劳动委员会李生华，土地委员会张步清，大体上没有变动。

地方的中心问题是：搞土地革命。我们的口号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孤立富农，消灭地主封建剥削。对哥老会、知识分子、工农兵群众争取团结他们。1935 年三四月间就在甘泉搞过土改，搞的比较好。分配了地主的土地、牲畜、粮食，但还给地主留有一点土地，自己劳动生产食用；富农除了封建剥削的而外，其他富农很少分配；中农一概不动。后来到六七月陕北派了个工作组，搞“查田运动”。把地主扫地出门，当时叫“打生产”（即劳动改造）。对一些不是地主的也搞成了地主，这是由李景林领导、惠碧海搞的。当时把边区政府的物资也分配了。这样，我们看不行，特委开会把“查田运动”撤销了。为此事给我们坐罪说我们是“右倾取消主义”。

军事活动就更多了，打马家军，开展游击战争，配台红军，打高桂滋、井岳秀等等。

我们靠洛河川开过好多次大会。如在下寺湾北面，有个拐沟进去，召开过一次大会。这次大会是打罢劳山战役，消灭东北军何立中师，俘虏的 1 个政治部主任也是特务，就枪毙在那里。这次会上我和习仲勋都讲了话，时间在 10 月上旬。

张文华 1983 年 11 周谈陕甘边区党政军机关东迁 退出荔园堡是有计划的。1935 年农历三月初，红四十二师在合水柳村原失利，由习仲勋同志决定吴岱锋任三团团长，派赵启明、李启民、张文舟任连排长。遂又举行党政军会议，习仲勋主持会议，具体分析了敌我情况，肯定估计到敌军必然要进占南梁地区。参加会议者：特委书记惠子俊，宣传部长龚逢春，组织部长蔡子伟等。杨森、张秀出因指挥部队驻荔园堡未到会(会议地址在寨子湾，相距 20 里)会议决定惠子俊去东路调甘泉与邠县游击队，张文华去南区调红一团向太白镇行动，伏击来犯敌军。

边区党政军机关转移到洛河川是 1935 年 4 月下旬。陕甘特委、边区政府在洛河川住下后，主要是领导指挥，巩固扩大边区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等。由于红军扩大，游击队扩大，陕甘边军事委员会要求要把游击队军事活动达到红军的水平，在王家坪建立了军事学校，刘景范同志兼任校长，为红军培训军事干部。军委又注意到新建游击队的发展工作。我给习仲勋建议让王忠秀同志(人称洛川王)返回洛川，习批准后他在洛川地区很快建立、发展到 200 人的一支游击队；保安北部王大有去三边方向发展游击队；王殿斌在邠县也建立了游击队。特别是在宜川、临镇由杨森的骑兵冲进宜川时沿路发展地下党员，并在民团中和白军内也发展了地下党员。还设立了东路指挥部，习仲勋派马文瑞到东路指挥部当政委兼红泉县县长，曹力如任总指挥，当时发展到 100 多名党员。

对后方的经济问题如粮食、布匹、物资问题特别重视，还有羊只

除了分配群众外剩下 4000 多只，除留供红军吃肉的一部分外，下余的由财委会安排处理。

我们还收到甘泉、延安、鄜县教育局和高等学校转来上海中央局发出的“八一宣言”材料，知道了中央红军北上抗日，号召组织地方抗战队等，也知道了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项英、张图焘。军事委员会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在 7 月下旬，陕甘特委代书记习仲勋同志主持召开扩人会，由我起草决议案和形势报告以及动员 1000 人参加红军通知，经会议通过后印发各地。

教育部长冯树立同志，编印了列宁小学课本，领导创办了列宁小学工作，“八一”又在洛河川史家河滩召开军民大会，由习勋主持，张文华同志讲了华北形势，“八一‘宣言’”的精神，组织义勇队积极参加革命工作。李景林在大会上号召报名参加红军，参加共产党。会场上放两个桌子，一是报名当红军处，一是报名参加共产党处。这次大会有军队、赤卫军共约 4000 人参加，检阅了赤卫军，又由部队作军事表演，为赤卫军示范，又为大会助威。

9 月 7 日，红二十五军到达保安腰子川。由习仲勋、刘景范、张文华亲自迎接到洛河川，对徐海东、程子华、戴季英进行热情欢迎，向二十五军写了欢迎信。由习仲勋主持召开欢迎大会，徐海东、戴季英到会。习仲勋致欢迎词。二十五军两位代表讲了话。在文艺节目中演出眉户戏，徐看后说“好戏、好戏”。

洛河川在 1934 年冬，出王聚德领导在洛上川、初步进行过分配土地。1935 年苏区扩大，洛中川、洛下川进行土改。因为土改是大问题，还办了一个土改骨干训练班，准备冬季正式进行土改。这时李景林、金凯、惠碧海 3 人以“查田运动”为由下到农村乱订成份，侵害中农，对地富扫地出门，乱分东西。还把杨玉亭管的银子鏰、银元等物资也要分配，杨玉亭劝阻不住，他们分了。杨玉亭只好向特委、政府汇报。习仲勋召开会议作了结论，停止乱分配，纠正错误，土改到秋后再正式开始。

韩明奎、薛生荣、任学才谈富西革命委员会 1933 年 9 月槐树庄一带组织起了 30 多人的赤卫队，由张生太担任队长。不久，又改为游击队，队长张生太，由上级派来刘安祥为指导员，开始外出游击。10 月，由南梁派来李彦同志在小河子川雷家沟成立了富西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员有何彦江、柯玉建、赵全美、郭振明、宋金定等人。从此，小河子川的革命活动也开展起来了。革命活动的蓬勃兴起，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的恐慌，南沟门的土豪安炳珍纠集了一些亲戚和亲信一二十人，偷偷跑到富县城内领回枪枝，组织地主武装，打击当地赤卫队。11 月，为了以革命的武装来打击反革命的武装，李彦同志又在小河子川创建了 20 多人的赤卫队，参加的有韩明奎等。不久，在赤卫队基础上，又建立了游击队，队长段保全。腊月，张邦英、何彦江介绍韩明奎入了党。同时，边德荣任了富县游击队队长，段保全任指导员。从此，富县游击队由小到大逐渐壮大起来，下设 3 个中队。一中队队长韩明奎，二中队队长李兴发(监军台人)，三中队为少先队，队长白志明。游击队经常出击甘肃和陕西的黄陵、洛川、甘泉等地，配合甘肃平子、早胜游击队和中宜、富甘游击队，以及红二十六军、三路游击队，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创建党组织和革命政权。1934 年 3 月下旬，南梁和小石崖派来李彦、高岗、陈国栋、兰志敏、张文华等在药埠头召开小河子川和葫芦河川的 30 多名群众代表，酝酿、选举了富西革命委员会。会后第二天，又在暖泉寺召集会议，宣布富西革命委员会成员：主席韩明奎、秘书赵文昌、经济委员任学才、土地委员何彦江，粮食委员赵全美、军事委员李兴发和郭正明，委员还有张建荣、屈尚文、何山川等。驻地开始在雷家沟，后曾驻李家沟、文家庙等地。接着，成立了富西保卫队，队长薛生荣，指导员方有才，队员由开始 10 多人发展到 30 余人，编为 3 个班：一班长李景春，二班长杨森林，三班长何彦勋。其具体任务是保卫革委会，配合游击队出击。富西革命委员会，主要管辖小河子至槐树庄和葫芦河川上至安家川、下至党家湾等村，并建立了政权。

随着红军、游击队的活动和富西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富西地区党团组织和各群众团体也相继创建。1933 年 6 月，何彦江随杨森骑兵

回到槐树庄，开始在小河子川活动，并和韩明奎等接头研究工作，布置任务，至年底共有 4 个党员：何彦江、韩明奎、柯玉建、薛建有。从 1934 年开始到 1935 年，富西地区共发展党员 47 人，建立了 3 个党支部。

刘生玉 1988 年 6 月 3 日谈富甘革命委员会 1934 年古历二月，马文瑞、贾生秀等人来府村川宣传建立甘富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在李湾与阳坪之间大榆树下召开群众大会成立甘富革命委员会。主席王居仁(后李彦)，秘书张尚达，土地委员常××，食粮委员刘麻子，肃反委员雪万仁、阎福堂和我 3 人，雪万仁负责，管军事的叫李涛。革命委员会的住地在府村往后走三四里曹家沟两孔旧石窑里。曹家沟当时只住几户人家。

我当时家穷给红洞沟一家姓惠的招女婿。人家叫我去开会，会后革命委员会把我留下，因我年龄小就叫我当交通(实际就是送信，送文件)，革命委员会在府村曹家沟大约住了半年时间，以后就朝富县搬走了。我后来参加富甘一支队，

刘秉温 1944 年 6 月 18 日自传谈肤甘革命委员会 1935 年 4 月。红军来了，宣传动员我参加革命。我在安塞受过有钱人的气，抱着要报仇的想法，参加了革命。我跟上游击队、赤卫军吆过豪绅地主的羊。负责宣传附近群众归顺红军，并且很快就在 3 个村子里宣传开了。过了 1 个多月时间，陕甘派人来成立了肤甘革命委员会，有 1000 多群众选我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到了 7 月，革命委员会秘书任文明同志介绍我加入共产党，那时任文明公开做政府工作，实际上是做党的工作。9 月，由陈传高任主席。张志成、刘长旺、常有智 1985 年 8 月 23 日谈肤甘县 登山峪的团头叫马兆仁，有团了七八十人，长短枪和折腰子枪 50 多支，他们在 1934 年就开始修寨子，他跟的是杨虎城将军。1935 年修成，到了古历五月十三日，由六支队、八支队和自卫军向他做工作，用和平谈判的方法解除了武装，把枪都交出来了，人员一部分解散，一部分归咱们了。当天晚上，马兆仁就跑到甘泉他侄儿子马崇秀那里去了，马崇秀是甘泉县的保安队长。

登山峪现在是甘泉辖地，解放后延安也管过。1935 年时也属甘泉管。五月十三日寨子开了以后在延安的龙儿寺成立了肤甘县，主席是刘秉温，他是延安万花碾庄人，是个大胖子，给人家揽过工。成立肤甘县以后，登山峪就划归为肤甘县的四区。到了阴历六月，登山峪扎下了区政府，区长是毛培智，是延安燕沟麻滩人，区委书记也是延安燕沟稍原寨人，叫张和堂。

吴岱峰 1985 年 5 月 13 日谈苏币发行 1934 年，陕甘边苏维埃军事委员会成立后，我们在荔园堡设了集市，群众很欢迎。也印发了苏票，苏票是财政委员会制发的。财政委员会是杨玉亭负责，印苏票的是李登瀛。苏票是用白洋布油印成蓝色的，印成后用桐油一油。印有壹元，还有几角的。李登瀛当时是共青主任。

蔡子伟 1985 年 5 月 8 日谈苏票发行与集市贸易 陕甘边根据地时期我们没有银行，苏票是财经委员会印发的。苏票是细白洋布印的，用木头刻个方形章予，用蓝颜色印在白布上面，有壹角、贰角、伍角几种，中间有个镰刀斧头，最后用桐油一油。那时候苏票价值很高，群众乐意用银元兑换(没有苏票买不到苏区的东西)。荔园堡在清同治以前曾有过集市，同治年间倒了，这里群众交易很困难。我们在荔园堡立了集市，群众非常欢迎。集市立起来后，我们和外地商人搞交易，我们用羊只换回我们需要的布匹、油印机、子弹等。

张文华 1985 年 4 月 30 日谈列宁小学 据我所了解，继第一所列宁小学成立后不久，在合水的太白(当时属华池管辖)也建立了 1 所列宁小学。有 20 多个学生，1 个教师叫张仁杰。还在荔园堡川口建立了 1 所，有学生 10 多个。具体建校时间和教师已记不清了。

王四海 1986 年 11 月 6 日谈列宁小学 列宁小学是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苏维埃政府成立以前成立的，开始在九眼泉 3 个石窑涧里设立，以后搬到转嘴子。11 月 7 日，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庆祝大会，列宁小学学生还参加会了，大一点的学生拿着红缨枪，在戏台前还表演来。

宋飞 1982 年 4 月 21 日谈红军干部学校 1934 年秋天，在荔园

堡成立军事干部学校，我是第一期学员。这一期还有边德荣、马志英、康健民等。10月1日开学，28个学员，学习了28天，因为要筹备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提前结束了，我们都当招待员、办事员去了。志丹对我说：“你的腿受过伤，跑不动，把我的马骑上当通讯员。当时我们的军衣是群众用绿草水染的，人说红军成了绿军了。”

吴岱峰 1959年5月21日谈红军干部学校 从1931年到1935年，陕甘边先后办过以下军事学校：①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军政训练队。1931年冬由西北反帝同盟军党组织办起，反帝同盟军改编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后，训练队改为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军政训练队，队长张××(留苏学生，现在内蒙工作，北京市委刘仁同志了解)。分两个班次，高级班，训练排长以上干部；普通班。训练班长与优秀战士。课程有游击队怎样活动等，主要是讨论部队的改编问题。训练队设在正宁县的三嘉原。1932年春结束。②红二十六军二团随营学校。1933年春，创办于照金根据地，红二十六军二团南下渭华失败后，学校也垮了。③陕甘边苏区红军军政学校。成立予1934年春，是刘志丹同志办的。志丹同志鉴于部队扩大，就吸收了许多农民参加，他们的军事知识太差，急待训练，于是办了 this 军事学校，来提高整个红军的质量。刘志丹同志兼任校长，吴岱峰同志任军事主任，校址设荔园催。1934年春到1935年春，共办3期，对象都是排连级干部。第一期30多个学员，学习1个多月；第二期70多个学员，学习70来天；第三期3个月，100多人。第一期学员毕业后曾停办一个时期。二二、三期是连接办的。政治课有：“工农红军”、“共产党”、“土地革命(怎样分配土地)”，“六大决议(十大决议、革命性质等)”。军事课有“制式训练(基本动作)”、“尖兵活动”、“班、排、连进攻”等等。除训练干部外，还附带训练了10多个县长。学员毕业后，分配到红军、游击队中工作。

杨伯伦 1982年11月来信叙述红军干部学校 红二十六军千校的建立及活动情况。1934年在荔园堡召开了陕甘边苏区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苏维埃政府。这时陕甘和陕北革命也成立了县、

区、乡各级苏维埃政府。在这种陕甘边工农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和苏维埃政权相继建立的形势下，边区政府开始创办了红军干部学校，培训军政干部。

干校开始设在荔园堡一座破庙里，住3月余后迁到豹子川。校长刘志丹兼任，具体管理办学的是副校长吴岱峰，教员马文瑞、蔡子伟。当时一切都很简单，没有教室，学员动手挖了8孔窑洞，在里面学习、住宿。学习的科目是：红军一、二、四方面军的作战战术；南方苏区的建立和发展情况；游击战争的战术以及苏维埃选举法；分配土地等。学员没有课本，每人发10张麻纸，1支铅笔。上课时，老师讲，学生记(多数学员不识字，不会作记录)。刘志丹也亲自讲过几次游击战术的课。学员来源主要是部队中的基层干部和开展苏区工作的积极分子。我当时是骑兵团的排长，参加了第一期学习。第一期学员60多名。时间每期3个月，共办了3期，1935年肃反开始就停办了。这所干校虽然规模不大，但在陕甘边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事件，它是我们党在陕甘边创办的第一所军政学校，对于培养提高广大军政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起了重要作用。

贾生旺 1959年4月23日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3年农历腊月，刘志丹、习仲勋等10多人到南梁开辟工作，刘约三率游击队在保安、吴旗一带活动，吴岱峰负责押豪绅。当时根据地很小，旦八、太白、二将川一带，尽是民团。不几天，延安高双城带1师军队前来“圈剿”，从豹子川过来，刘志丹、吴岱峰等人在当天晚上就押着十几个豪绅，从二将川向西走了。第二天早晨，高双城部到南梁。敌人问我：“红军向哪里去了？”我现路上有马粪，用脚踩时，发现马粪未冻，即向二将川追去。红军在山上打了几枪，留下2个豪绅、1个洋人，钻了梢林转移走了。当晚。高双城部又返回驻南梁。

仇良明军队在1934年3月来“围剿”，把这里的老百姓给扎了。敌人将群众的锅打烂，水缸打破，门窗挖去烧了。在阎家洼子活埋了24个人，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白天章的父亲白杨珍也被活埋了。

1934年冬就有了马家军进攻的消息。1935年农历二月，马家队伍向南梁根据地进攻。敌人采取步步为营的战术，每晚用木头和群众门窗围成木城，上面挂着手榴弹、地雷。木城外面，挖的深壕，里面挖的战壕，看来他们对红军很害怕。三月十一日，敌人到了荔园堡；十二日，到了小河沟四合台。在敌人到来之前，群众都坚壁清野，赶上牛羊，在红军掩护下，向东撤走，钻了梢林。马家军在上午到四合台，即一面追踪红军，一面在梢林中赶群众的牛羊。在平定川红军和敌人打了一仗，马家军退至豹子川。此时。贾生秀(我三弟)和陈贵存(政府工作人员)也钻了梢林，生秀腿部负了伤。第三天，他俩被敌人包围，生秀爬着逃脱了，陈贵存亦逃走。陈的家属被捕，敌严刑拷打，要他们供出贾生秀，他们都说我见。敌人说：“贾生秀骑的花斑马还在这里。人怎么能跑了？”于是，敌人一面继续寻捕贾生秀，一面要来抄我家。生秀在梢林中听到敌人要抄我家，连夜派人给我送信，要我带全家躲入梢林，千万不能被敌人发现。我及时带着全家，赶着牲口，驮着粮食，逃入梢林。马家军将群众和群众的牛羊大部都赶回来。几天以后，躲在梢林中的其他群众也都因为没由粮吃，陆续回来。这时敌人将庙烧了(防止红军驻扎)，形势有了很大发展，红军和红军游击队建立了很多组织，好多县将窑洞全部破坏，不准群众在豹子川、小河沟和南梁一带居住，强迫群众迁至白马庙川，并强拉老百姓修碉堡、挖战壕。马家队伍在根据地一直住到农历九月才撤走。我家三月十二日出门，直到九月十三日才回来，整整在梢林里生活了半年。我老婆六月十三日在山中一个破窑洞生了一个女孩子。马家队伍走了，我才回家。马家队伍走时，拉走了几百名青壮年农民。

在马家军占领南梁期间，红军在洛河川下寺湾、胡皮头一带创造了新的根据地。生秀以后也到洛河川工作。马家军走后，红军又回来，将华池划为战区，下设区、乡、村等组织，有区长、乡长、村长。小河沟是一、二村，豹子川是第三村，我任二村村长。

白天章 1983年6月6日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农历

四月，庆阳民团团总谭世麟与仇良明部队进犯南梁。那时候，老百姓还没有对付敌人的经验，敌人来了就跑。民团专砸老百姓的锅。以后老百姓回来没台锅做饭，我们革命委员会就出钱请来钉锅匠，给老百姓补锅，有些锅是原来就破的，老百姓也乘机拿来，我们都给钉好了。这次敌人来，活埋了我们3名红军战士，1名医生，1名枪炮修理工，还有3个老汉：杨二、张候富、冯连志。这次遭枪杀的还有4人，我父亲白杨珍、哥老会大爷曹士忠、土地委员长梁大爷、曹士忠的小舅子。

李生华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4年古历三月，国民党仇子康团来到东华池。老百姓大多相信迷信，前几天就到庙里去问“神”：这几天敌人会不会来？“神”说：这几天不来。一天中午，我正在山上耕地，看见远处人喊马叫，知道情况不好，是敌人来了。这次敌人在阎家洼子活埋了十几个人，其中有我们兵工厂厂长李青山、南梁革命委员会副主席白天章的父亲白说：他们已在几天以前走了。敌人不相信，就到处搜索。他们发杨珍、农民杨二老汉(我常见了叫干大)。后来仇子康串到赤安县挖了刘志丹的祖坟。

刘景儒等 12 人 1959 年 4 月座谈南梁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1935年农历二月，西北军阀对南梁根据地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围剿”，甘军马步芳从平凉一带逼近南梁。敌人共10个团分3路向苏区进犯，一路从太阳坡、城壕一带进攻，一路从柔远东沟进攻，一路从二将川进攻。二月初，敌人占了老爷岭、元城、柔远一线。在我红军游击队、赤卫军的抵抗下，对峙了40余天，后敌人得知我红军主力北上安定一带，遂大举向南梁进犯。农历三月十一日是荔园堡逢集之日，赶集群众很多，突然马家军进至荔园堡。省政府转移至洛河川延家湾，马家军即占领了南梁根据地。到处是一片白色恐怖。敌人每到一地就拉民夫修碉堡，挖战壕，砍伐树木，拆卸门窗，真是无恶不作。

在敌人“围剿”期间，根据地人民进行了坚壁清野，将粮食炊事用具埋藏起来，赶上牛羊躲藏在森林之中。敌人一到南梁，就进行搜山、烧山、炮击山林，群众不得已，返回家中，又要受严刑拷打，企

图从群众口中得知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及政府工作人员去向，但他们存这里的群众口中什么也得不到。马家军曾出告示，悬赏捉拿习仲勋、贾生秀，凡抓住习仲勋赏白洋 2000 元、马 2 匹；抓住贾生秀赏白洋 1000 元、马 1 匹，结果还是一无所获。群众牛羊全被赶到庆阳三十里铺，美其名曰是“缴获”红军的“战利”品。敌人为了彻底摧毁根据地，将南梁、小河沟、平定川、豹子川一带的民房全部烧毁，窑洞全部破坏，强迫群众移民并村，将这里的群众全部赶至白马庙川和二将川，使该地村庄变成一片废墟。敌人的这种暴行更加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义愤。这时赤卫军转入秘密活动，他们与游击队配合，几乎每夜都骚扰敌人，弄得敌人恐慌万状，一夜数惊。马家军在这一带住了半年之久，于当年农历九月才撤走，走时强拉壮丁 200 余名。当时根据地人民生活极端艰苦，粮食被抢光吃完，牛羊也被杀吃弄光了。在敌人退出根据地后，陕甘省政府决定暂时成立华池战区(高生荣任主席)，行使原来县政府的职权，积极领导人民拆毁碉堡，平掉战壕，重建家园，大力进行生产自救。

1935 年 10 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形势大为好转，在红军协助下，拔除了根据地外围敌人的顽固据点，如旦八寨子等，使根据地不断巩固扩大。

1936 年 6 月改战区为县政府，主席李培福，下设柔远、白马、温台 3 个区，7 月以后又增设悦乐、元城子、水泛、吴旗 4 个区，乡村政权组织亦相继成立，使根据地又巩固和发展起来。

李树林 1987 年 4 月 11 日谈华池战区“肃反” 1935 年秋，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在陕北搞了一场罪恶的“肃反”，把红二十六军和陕甘边的大批干部关押起来，有的惨遭杀害。这时，华池战区与庆北办事处刚刚恢复，庆北办事处由华池战区领导。战区书记崔凤鸣、五路游出总指挥王德胜都是“肃反”的忠实推行者，加上一些人的符合，战区也搞了“肃反”。我当时是庆北办事处主席(李培福有病)，带领庆阳游出队(队长田生第)开展游击战争。10 月的一天，战区通知我去开会，我带游击队到战区机关驻地金岔沟。参加会议的有崔凤鸣、高

生荣、李兴高、许风莲、张志德等。会上，崔凤鸣提出两个问题。一是李树林带着游击队不与敌作战，是“右倾投降主义”，庆北的土改执行“富农路线”，李树林是“右派”。二是要进行二茬土改，查三代。把地主、富农的所有财产全部没收，人都赶上山去吃草，多么荒谬的论调。我当场提出异议：“地主、富农也应区别对待，有好、中、坏，即使有罪，但他们的妻子、儿女、后辈儿孙有什么罪呢？人怎么能吃草呢？这不是被迫他们投敌嘛？说我李树林不打敌人，是右派，我们天天都在游出，而你们躲在梢林都干了什么？我们只有几十个人，怎能与敌正面硬拼呢！”会未闭，我就带游击队回到了庆北，继续开展游击活动，没有理崔的那一套。但是过了不多几日，那个五路总指挥王德胜来到庆北，极力推行他们那一套。由于我们坚决抵制，“肃反”在庆北行不通，于是在军事行动中又另搞一套。悦乐战斗中，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布置在敌人未进工事前利用有利地形，来个突袭，而这个总指挥高傲自大，带领保卫队不按作战计划行事，贻误战机，直到敌进入工事后才去硬攻，结果没有消灭1个敌人，却给游击队造成损失，致使队长田生弟和两个战士不幸牺牲。

蒋成英 1987年3月16日谈华池战区“肃反” 1935年九月，陕甘“肃反”风波及华池。当时，我任游击队长，据我所知，池战区成立后，崔凤鸣任书记，高牛荣任主席，张志倦任青年书记。崔凤鸣等人积极推行“肃反”的那一套，将1934年订的富农全部打成土豪，许多中农被打成富农或地主。并把地主、富农都赶上山去吃草，没收了其所有财产。如果地主、富农家有人从事革命工作，都要开除。下刘坪有个姓刘的青年，在警卫班当战士。表现很好，因家中划为富农被开除。有一个张纸匠从陕北乞讨来南梁，给地主张彦庆家拉长工，被说成是地主的“狗腿子”而杀害。武生荣曾任华池县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长，敌占南梁时，因腿病未能随机关转移。以后，他主动带领群众坚壁消野，将政府的十几头牛赶进密林隐蔽起来，但不幸被赵富奎民团抢去，崔等便以“投靠反动民团”、“叛徒”、“贪污”等罪名将武生荣杀害。赤安支队王二鸿受张策同志派遣化妆成货郎到南梁一带了解敌情，崔等便以逃跑罪名逮捕杀掉。在马鸿宾部队做兵运工作的中

共地下党员李××千辛万苦拉出来敌人1个连投奔我军，部队进驻土桥，李××带3名起义官兵找我方组织接头。到华池战区，崔等不仅不予协助反将其关押。这4人再三辩解：“现在1连人命在旦夕，请尽快帮助我们找到组织，若组织说我们是特务，即使千刀万剐，死也甘心。”崔凤鸣等置党的原则于不顾，连夜将这4人杀害。被杀害的还有高有富等人。中央到达陕北后，纠正了陕北“肃反”，撤换了崔凤鸣，派来张建业任书记。与崔凤鸣一起胡作非为的王德胜叛变为匪，后被我处决。

李生华 1983 年 7 月 4 日谈陕甘边“肃反” 1935 年 7 月，由于第三次“左”倾错误路线，习仲勋被捕。此后，我是名义上的苏维埃政府主席，但我并不知道。8 月，我任陕甘代表团团长，驻在永坪，召开陕甘革命委员会。会后，代表团成员都回去了，把我留下，程子华给我谈话，把我调到西北革命委员会，没事干，整天骑个骡子放牲口，实际就是停职检查。“肃反”中。在下寺湾活埋的有安塞县委书记张良才，靖边县政府秘书周子恒，陕甘边政府文化委员会的小冯，甘泉人白光彩。我见到刘志丹、习仲勋、张策等被刚从监狱里放出来，脸色蜡黄，手腕上有深深的铐痕。不久，我也获释，担任瓦窑堡区委书记，管几个乡。后来，中央派我担任陕甘省政府主席，副主常是朱开铨，教育部长王子荣，财政部长张慕尧，国民经济部长马锡五。

郭廷藩 1984 年谈关中“肃反” 1935 年关中肃反和整个陕甘的肃反是一回事，它是陕甘的一部分。主要是朱理治、鲁贲搞的。1935 年 8 月，将关中工委改成关中特委了，鲁贲当特委书记，把原来的特委书记唐洪辰为组织部长了，特委就驻在三嘉的吴家圪坨(巴塔)，我那时是正旬彬革命委员会主席。特区苏维埃政府就在白沟，主席是三嘉一个雇农叫张月，副主席是张邦英。鲁贲来后，推行“左”倾路线，主持召开了新正、新宁、赤水、淳耀 4 县的县委书记和一些支部书记联席会，共 40 多人，会议用了两天时间，讨论安排了关中的肃反问题。这次会后，全关中的肃反就全面开始了。张仲良、习仲勋都被关押了，那时人见了人很少说话。一次，特委叫我谈工作，我去见唐致

祥在院畔，他非常惊奇地问：“你干啥来了？”我说：“叫谈工作”。我当时就觉着不对头，一个窑里可关了不少人，谈完工作我出了门，唐看我出求了，啥话没说就催我走：“快走!快走!”我也来不及说什么，就同湫头了，那时就开始抓人了，后来听唐致祥说，在贾连坡埋过 2 次人。杜宛、黄兰就是这时活埋的。10 月，中央红军到了以后才把这场肃反制止了，不然的话，死的人还要多哩!

宋飞 1982 年 4 月 21 日谈关中“肃反” 1935 年错误肃反，我在关中任赤宁县主席。关中肃反是由鲁贲主持搞的，鲁是为搞肃反专门从上海调来的，我被捕比刘志丹、习仲勋等迟一点。当时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被捕的人，给戴个筒筒帽子，只留出个眼睛。不准与人讲话。审讯时，杠子、皮鞭，各种刑具都上，与四川渣滓洞的刑罚没有两样。对我还算宽待些，老虎凳也坐了，下指头用子弹壳也绞了。活埋时还要找证人，算是验明正身吧!那天晚上活埋我，一起埋的有金理科、术子琦(耀县县委书记)、黄兰(黄子祥女儿)等。本来要埋我，结果黑摸着拉错了人，把另一个拉出去埋了，把我顶下了。直罗镇战役后才放了我们，但长时期还被当犯人看待，冬天不给发衣服、铺盖。这次肃反害死了不少人，毛主席曾经说，杀害了 240 个马列主义者。

唐致祥 1982 年 4 月谈关中“肃反” 1935 年，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关中红一团和游击队都调到延安搞联防，只留下 1 个保卫队，下属 3 个班，共 20 多人，我任队长。当时，特委在三嘉巴塔，鲁贲带了几个人来到湫头，记得这几个人中有个姓常的和一個姓惠的，还有鲁贲的爱人小安，其它人记不清了，鲁来后任特委书记。首先在保卫队把他带来的人每班放一个，当副班长。一天，我见鲁贲和他带来的几个人缝黑布袋子，便问鲁贲：“你们缝干粮袋吗?”他们同答：“就是干粮袋”。我又问：“干粮袋咋缝那么短?”他们说：“咱们是秘密行动，短了便于隐蔽”。我当时还信以为真。过了几天，他们从政府所在地后坡搬到前马原。一天晚上，鲁贲、老常、老惠和他们带来的 3 个副班长，便把杜宛，姚智一，还有个姓周的(当时在镇府机关

刻印材料，写标语)，绑了起来，头上带着黑布袋子，绑后把他们都关在窑洞里。姚智一一直喊我，我去一看，绑的绳子已勒进肉鞋，我悄悄地给他放松了绳子。不久，把保安司令陈国栋的职也给撤了，让他组织了几个村的妇女，在秦曲办了缝纫厂。那时，差不多天天都有会，我看见开会来的人多，走的却少，但究竟在关中绑了多少人，我就不清楚了。逮捕人在前马原，活埋人在贾连坡。据我所知，这里共活埋 2 次，6 个人。一天，老惠通知我说：“今天晚上有个任务要你去执行，”我问：“什么任务？”他说：“到时候你就会知道的。”晚上，我去了，见他们拉着杜宛。到贾连坡后，我才知道他们要活埋杜宛，不知道什么时候早就挖好了 1 个坑，老惠把绑着绳子的杜宛推到坑里，向坑里铲土，杜宛直喊，叫我把他打一枪，我忍受不了，就对部下说：“给他一枪吧！”姓常的当时骂我：“你若要打他一枪，我把你也埋掉！”就这样把杜宛活埋了。另一次是副班长秦正祥给我说的，有一灭晚上在贾连坡活埋过 5 个人，有黄子祥的女儿，只十八九岁，原在西安上学，来关中时间不长；有个姓周的(是政府刻印材料、写标语的)；有个田指导员，还有一个县委书记，另一个不知是谁。肃反后期放了一些人，记得黄子文的妻子当时也微抓，也关在一个窑洞里，她身边带着 1 个 3 岁的儿了，叫黄北平，母子俩以后被放出来了，还有一些人被带走了。